伪满军事

主编　孙邦

副主编　于海鹰　李少伯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满史料丛书

伪满军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伪满史料丛书
伪满军事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125印张插页 4 560 000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册
ISBN 7—206—01913—7
D·573 定价：平18.50元 精21.50元

序

刘云沼

反映伪满洲国历史的十卷系列丛书，在久久期盼中终于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项巨大工程，可喜可贺。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而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序幕。一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伪满洲国的历史，是我们祖国六分之一的领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英勇斗争、抗日救亡的历史。回顾中华民族近百年来蒙受屈辱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萎靡难以腾飞，落后必定挨打；不能崛起，必然陷入沉沦。今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反腐败斗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胜利完成四化的宏伟蓝图是何等的重要。

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是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史料的大型系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八五”计划的重点书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它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扩大文史资料的社会影响和利用价值，必将推

动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全书共十卷，选用了一千二百多篇文稿，共五百五十多万字。从“九·一八”事变写起，到殖民政权、伪满军事、经济掠夺、日伪暴行、伪满文化、伪满社会、伪满人物、抗日救亡、伪满覆亡等，各卷既是独立成卷，又有内在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如此浩瀚的史料，涉及到东北沦陷后十四年的方方面面，十卷丛书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殖民统治的概貌，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详尽记述。同时，这又是一部以口碑史料为主，首次披露的史料丛书，与所有有关伪满的学术研究专著、论文及档案资料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作者大多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具体史实为根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充分证明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实质。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整个伪满洲国内幕的实证，既然是史料，又限于作者个人的所见所闻，虽然它是真实的，也难免有疏漏，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文字量过大，在编辑过程中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取舍详略之间，考虑不周之处，在所难免。至于编辑上的疏漏和差错，也是少不了的。无论如何，构筑如此浩瀚的史料工程，又文出多人，几经易稿，都是费了心血的。如此巨篇，如果没有全国各级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鼎力相助和广大学者、专家、文史工作者的辛劳，特别是我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对伪满洲国史料的锐意搜求，是很难完成这样一个在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的史料工程的。只有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各方面专家的指导和参与，才使这套丛书更加专题化、系列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政协确实是一个人才荟萃的群体，在挖掘整理文史资料上有独特的优势。

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十卷伪满洲国历史丛书，就是这样一套回顾历史，启迪当代，教育后人的好教材。我们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研究在我国东北曾出现的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因为今天的中国，五十岁以下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家乡，在半个多世纪前遭受的那一段苦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什么国仇家恨统统说不清楚。用这些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激励革命意志，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重温历史，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是以史为镜，教育后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伟大的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因此，搞这样一套历史丛书，对加强中日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现在，日本仍有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还在念念不忘过去他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一直留恋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涂脂抹粉，企图篡改、歪曲历史的

本来面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斗转星移，历史毕竟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耻辱的历史已经过去，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让我们引古鉴今，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不息。

谨以此书告慰无辜殉难及为国捐躯的千万个英灵。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

编辑说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于1932年又炮制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十四年之久，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浸透血泪的一页，永远记住它，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战败时，销毁了他们在中国的大部分档案资料，战后，在日本又有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撰文著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亚洲的罪行。因此，揭开历史迷雾，系统地揭露、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种种罪行，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真相，是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过多年来搜集、挖掘，征集了大量亲历者口述整理或撰写的有关伪满的稿件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始编纂工作。编辑过程中坚持领导、学者和编辑人员密切合作，经过多次论证、修正及精选精编，终于完成了《伪满史料丛书》。全书共分十卷，约550万字。收入1200余篇文稿，基本囊括了有关伪满的方方面面。

一、丛书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文史资料为主，辅以历史学者

的论著及有关的档案资料。

二、丛书按内容类别分卷，各卷内又分若干专题。由于某些文稿内容往往涉及到多种专题，为保持资料完整起见，采取了集中编排。如有关“细菌部队”的文稿，均收入《日伪暴行》卷中，其他卷、专题不再收入。另外，某类稿件稿源丰富，又涉及到多方面，则根据稿件内容，分别收入所侧重反映的专题内。如有关“劳工”类的稿件，主要反映“劳工苦难”的稿件收入《伪满社会》卷中；关于“人力掠夺”收入《经济掠夺》卷中；有关修筑军事工程后劳工被残杀的稿件收入《日伪暴行》卷中。

三、丛书由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各卷均有专人负责编辑。

四、丛书选用部分日本战犯、伪满汉奸及日本历史学者等的供词或文稿，但其中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选用时作了适当的删节，保留史实部分，或加编者按、注释予以批驳。故请读者批判地阅读。

五、编辑体例

1. 丛书框架结构视内容而定，各卷分别采取列一层题、二层题，一、二层题并存的三种形式。

2. 对入选文稿或资料，基本保持原文格调。如需对原文改动，主要是采取删节或压缩。

3. 丛书的数字、年代的使用，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不定数使用汉字。

4. 丛书注释分三种形式：作者简历注为*；凡属作

者或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解释性文字，均加（ ）；其他注释一般采用脚注圈码，不用文后集中注释。

5. 凡属繁体字、古体字和异体字，除有特殊含义（如姓名）外，均改为通行简体字。

6. 文稿出处置于该文稿之后，一律注明“摘自”某某刊物或书籍。

六、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指导。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为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指导并做了大量工作；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等兄弟省、市、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给以了热情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望读者对丛书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卷首语

《伪满史料丛书》的军事卷，应包括日本关东军及其附庸伪满洲国军，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还应包括苏军出兵东北和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内容。但由于本丛书的分卷设有伪满洲国出笼、抗日斗争和伪满洲国覆灭章节，为避免重复，本卷在编辑过程中，对有关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苏军出兵东北、八路军挺进东北，以及部分关东军屠杀东北人民的惨案、关东军的末日等史料没有选入。因此，读者要了解本丛书军事方面的全面史料，请阅读本丛书有关其他各卷。

编入本卷的史料主要内容，着重反映日本关东军及在其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军疯狂“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史料，以及日伪军在“讨伐”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残酷屠杀东北人民，制造血案的史料（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覆亡前销毁有关资料等原因，本卷第二至第七部分的内容尚显不足）；关于关东军在张鼓峰事件和关东军发动诺门罕战争的史料；关于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史料；关于伪满洲国军的史料等。编辑指导思想在于揭开关东军神秘的面纱，勾勒出关东军的罪恶轨迹。

选入本卷的史料，主要来源是国内各级政治协商会

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征集的文史资料，这些史料具有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同时，也选入了一些专家、学者调查整理和撰写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稿。此外，还适当选入一些侵华日军的供述材料。

本卷收入的史料，是从着重揭示日伪军罪行事实的角度出发，为保持史料的面貌，对文中的错误观点和一些不适当的提法没有逐一予以纠正。因此，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另外，由于史料的作者所处的地位不同，不可能都了解全貌，因而难免在反映史实上有不尽完整和准确之处。请读者在利用时，注意核对和考证。

编　者

目　录

一　关东军

二 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哈尔滨及热河

三 一九三六年前关东军的“讨伐”及大屠杀

四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五　三江“特别大讨伐”

六　野副大讨伐

七　热河“讨伐”

八　张鼓峰、诺门罕战役

九　伪满军内幕及头面人物

十　伪满军管区及十二支伪军

十一　伪满军校及伪军官兵生活

十二　伪满军反正

一

关东军

侵略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

李作权　李茂杰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就驻扎侵略军，1919年以后，又改称为关东军，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尖兵"，是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九·一八"事变前的关东军

1904年2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霸我国东北，在我国东北境内进行战争时，日本天皇批准编成"满洲军总司令部"。

1905年8月29日，日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攫取了东清铁道南段及其附属地与辽东半岛租借地的权益。9月26日，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设立关东军总督府于旅顺，直接隶属日本天皇，以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总督。关东总督总揽了日本在我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大权，它是日本驻在我国东北的军队和其他机关的总领导。它既统帅"满洲军"，又是关东州这一殖民地及满铁附属地的民政的监督和统辖机关。1906年9月1日，关东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原关东总督大岛义昌留任为关东都督。

日俄战后，日军留驻东北的兵力为两个师团。1907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立后，将部分"满洲军"改成了6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配置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此，除守备队外，日本陆军驻在东北的兵力，由两个师团缩减为一个师团。日本独立守

备队和日本驻军，统由关东都督府下设的陆军部领导。

1919年，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同年4月12日，改变了军政合一的方式，实行了军政分离。同时，公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军令第十二号）。于是，关东军就成为日本天皇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侵略我国东北的武装力量，而在我东北留驻下来。从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的兵力，一直保持着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兵力约为10400人左右。关东军先后轮替有10个师团曾驻过我国东北。

日本关东军统辖的6个独立守备队大队，每大队人数为900人，共为5 400人。独立守备队司令部始终设于公主岭。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再次将其第二师团调往中国东北，为发动事变做准备，师团长为多门二郎中将，参谋长为小野辛吉，第二师团司令部设在辽阳，该师团所部驻在长春、奉天、旅顺、海城、公主岭等地。

日本驻东北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是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兵力。关东军司令部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军司令官由大将或中将担当，而由日本天皇亲任。从1919年关东军司令部成立，到1931年的关东军司令官次序：首任1919年4月起为立花小一郎，1921年1月河合操，1922年5月尾野实信，1923年10月白川义则，1926年7月武藤信义，1927年8月村冈长太郎，1929年4月畑英太郎，1930年9月菱刈隆，1931年8月本庄繁。这几任关东军司令官任职时全部是中将级，以后除村冈中将外，全部都晋升为大将，武藤信义晋升为元帅。

关东军司令官由天皇亲任，但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及动员计划等方面，要接受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的指挥。

关东军司令部的机构：

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司令官

- 参谋部
- 副官部
- 兵器部
- 经理部
- 医务部
- 兽医部
- 法务部
- 人事部
- 特务机关部
- 陆军仓库部
- 卫戍病院部
- 陆军军法会议部
- 宪兵司令部
- 旅顺要塞司令部
- 独立守备队司令部
- 旅顺重炮兵团部
- 海军司令部（驻东北海军）

关东军的任务，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条令第1条规定，统帅关东州及驻在南满各地的陆军各部队，担任关东州及南满铁道的防卫和保护的任务，即保护其既得的权益。但实质上是日本驻在我东北的一支侵略军。它时时在企图借机侵占我全东北并进行殖民统治。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就不断地侵犯我国主权。它与满铁一文一武，相互配合。

1927年，日本为了加速推行它的侵略东北的政策，于6月至8月间先后召开了“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在会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表示：“只要政府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无论如何，命令一下，我就执行这个政策。”

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经过密谋策划，积极准备，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以“柳条湖事件”为导火索，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统治东北十四年的关东军

（一）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关东军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

“九·一八”事变前，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工具和急先锋；“九·一八”事变前后，它是发动事变和炮制伪满洲国的元凶；伪满洲国出笼后，它一跃成为控制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的统治，采取了外观上是“独立国家”，而在内部则严加控制，即所谓“内部统辖”。1932年3月，即溥仪充当伪“执政”之前，就在与关东军司令官签订的密约中，规定了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署吏也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征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炮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亦称“八八”决议，则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纲要》中决定“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统治，使之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日本政府这一决议，确定了关东军司令官是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伪满的控制，力谋统一它在我国东北从事侵略活动的四个系统和机构。早在1932年8月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兼任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直到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日本驻满机构改组，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大使，废除关东厅长官，在关东州设敕任级州知事；在日本国内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总裁。根据此次对在满机构改革，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全权大使，参谋长兼任行政事务局长，行政事务局长兼大使馆参事官，关东军宪兵

司令官兼任警务部长，关东军交通监理部长兼任监理部长。因此关东军司令部和驻满大使馆，不过是一个实体的两个名称。关东军司令官真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代理人。

关东军控制伪满洲国，首先是表现在对伪满皇帝溥仪的控制上。伪满洲国在《组织法》中虽然明文规定，“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但实际上掌握统治大权的不是溥仪，而是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派驻帝宫内一个常驻代表，以后于1940年才给这个代表以“帝室御用挂”的头衔。吉冈安直充任常驻代表长达10年之外，溥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看吉冈的眼色行事。正如溥仪自己在《我的前半生》一书所写“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

《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规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政府的控制，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长进行。原来伪满政府各机构中都设有日本人的官吏，而日本人官吏正是实权的控制者。所以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的官吏为600人，其中20%为日本人。到1935年日本人官吏已增到3 000人。

关东军控制伪满国务院是通过总务厅，尽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是国务总理的幕僚机关，但它实际控制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实际成为伪国务院的总理。总务厅长官为日本人，绝大部分都与关东军秘密勾结，第一任为驹井德三，以后为阪谷希一、远藤柳作、长冈隆一郎、大达茂雄、星野直树、武部六藏。总务厅内的官吏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中国人则寥寥无几。关东军参谋长致伪满总务厅长官通牒中规定“国务院总务长官遵照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统治日本人官吏”。而关东军对伪满政府进行“内部指导”的专设机构是它的第四课，而总务厅是第

四课的对口机构。这样关东军第四课——总务厅，这就是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总务厅长官于每周二召开次长会议，即“火曜会”，决定伪满洲国的一些重大决策。伪满初期国务院各部都设有总务司，司长都为日本人。1937年行政机构改革后，撤销总务司，设立官房。另设立日本人充任的次长。次长即成为各部的真正领导者。各省也设立次长，各县设副县长。次长制成为日本统治伪满洲国的一种政治形式。总务厅长官召开次长会议所决定的各项决策，一般地提到伪国务院会议时，都是原封不动的通过（伪国务总理主持、各部大臣参加的国务院会议于每周一召开）。甚至有些机密事项，只须总务厅长官批准便执行。

次长会议所讨论和决定的各种事项，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和批准。一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和利益，经常向伪满洲国下达各种指示和要求。总务厅长官就通过次长会议研究，做出决定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各部的一些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次长会议决定后，还要得到关东军司令部的同意才能执行。关东军司令官于每周五召开由参谋长、副参谋长、伪满总务厅长官和协和会本部长参加的“满洲最高首脑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做出决议，并向伪总务厅长官提出要求事项。

（二）关东军的组织系统

关东军司令部从1919年成立，到1945年覆灭的26年中，它的内辖机构和统辖的兵力是不断变化的。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关东军的组织系统如下表：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

↓

关东军　　总司令官　　山田乙三

↓

- 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课五个部
  - 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
  - 副参谋长～池田纯久中将
- 补给部～补给总监秦中将
-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田大将
-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大将
- 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上月中将（驻朝鲜）
- 第四军～司令官上村中将
- 航空队司令部
- 关东军宪兵队
- 关东军情报部
- 野战筑城部
- 军马防疫厂
-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 关东军兵器厂
- 关东军货物厂
- 关东军汽车厂
- 关东军陆地测量部
- 野战铁道司令部
- 独立守备队司令部
- 关东军科学研究所

关东军司令部根据“昭和15（1940年）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求，将关东军司令部改称关东军总司令部，因此梅津美治郎及其后任山田乙三便都称为关东军总司令了。与之相适应的，1942年6月24日军令陆军甲第42号决定成立装甲兵司令部。1942年6月27日军令陆军甲第43号决定成立第一和第二方面军。7月，编入关东军。9月16日军令陆军甲第79号决定成立关东军补给部，统辖各兵站业务，补给部总监由参谋长兼任。

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设五部、四课：

五部：参谋部、兵器部、经理部、医务部和兽医部。参谋部下设四课：第一课担当作战、伪满的防卫、教育、编制动员；第二课担当苏联、外蒙的情报；第三课担当兵站、交通、通信；

第四课担当对伪满的政策，是关东军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的炮制者，也是秉承关东军司令官之旨意，指挥伪满洲国的实际执行者。第四课经常参加伪总务厅长官主持召开的次长会议，以贯彻关东军的意图。曾在第四课任职的高级参谋有片仓衷大佐、黑川邦辅大佐、小尾哲三大佐、池田纯久少将、宫本悦雄大佐等人。

第二课担负情报，日本关东军为了准备对苏作战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设有庞大的间谍特务网。第二课对中国和苏联进行特殊阴谋活动的中心是关东军情报部，这是设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它在我国东北各地，如新京、奉天、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佳木斯、间岛、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都设有支部，构成了遍布全东北各主要城镇的关东军特务网。另一方面，于1937年由关东军第二课的山冈参谋和第三课的片仓衷等策划，在伪满成立了特务活动的中心保安局，专门从事“秘密战”，这一特务组织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挥。

关东军宪兵队是关东军司令官指挥下的一支镇压中国人民的刀斧元凶。伪满统治期间，关东军宪兵队在无数次的日伪军警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中全都参加了，而且是处于核心和指挥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宪兵队只有1个队，约计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约计1 000人；到1940年，增加到19个队，约计2 000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由中将或少将担任，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当过关东军宪兵队的司令官。

关东军的内辖机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形势的需要而有所改变，如1931年12月11日决定撤掉参谋第三课，设立统治部，执行第三课的经济、行政业务。于1932年将统治

部改为特务部，1934年12月又撤消了特务部。第四课也是伪满洲国成立后才成立的。至于统辖兵力的变化则更大。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的兵力为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开始不断增加兵力，9月21日，日军驻朝鲜第39混成旅团就侵入我国东北，不久，日本命令第8师团入侵中国东北。以后由于加强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疯狂的进行军事围剿，以及准备进攻苏联，兵力不断增加，1931年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达到12个师团。1941年7、8月间，实行“关特演”时，关东军号称100万人（实际有七十多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有13个师团，其中关东军司令部直辖第十、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师团；第三军辖第九、十二师团；第二十军辖第八、二十五师团；第五军辖第十一、二十四师团；第四军辖第一、五十七师团；第六军辖第二十三师团。此外，各军辖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各兵种部队。

1942年10月1日，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总司令部后，相应地成立了方面军司令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第一任司令官为山下奉文中将。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第一任司令官为阿南惟几中将。关东军直辖有第十、二十九两个师团。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扩大和逐步失利，关东军的兵力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大量关东军被抽调，但从1944年开始，关东军再次增兵，1945年关东军又增至70万人，但有些是新编的部队，因而战斗力不强。

关东军的灭亡

关东军从它建立起，就是一支野蛮的殖民侵略军。它侵占我国东北后，就不断增加兵力，为日本“北进”（对苏进攻）积极准备。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31个师团。这是关东军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由于日本大本营战略方针的改变，由“北进”改为“南下”，转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样，原关东军准备进攻苏联的一系列部署，几乎全部被打乱。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到惨重的失败，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因兵力不足，大本营不得不由关东军抽调部队。1945年初，尽管关东军拥有31个师团，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都相继调往太平洋战场。1945年1月，大本营由关东军又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使关东军所辖部队的战斗力急骤削弱。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别是1945年4月初美军开始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大本营不得不决定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再次从关东军抽出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贮备的近三分之一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使在我国东北的关东军的兵力仅剩下1943年和1945年新编成的12个师团。

1945年5月初旬，由于法西斯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苏联强化了东方的戒备，日本大本营感到日苏战争已迫在眉睫，乃于1945年5月30日指令关东军准备对苏作战，并发出《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重新调整作战部署，要求“关东军确保京图线以南，京连线以东的重要地区”，固守以通化为中心的三角地带。根据大本营的指令，关东军总司令部举行兵团长会议，具体部署作战方案，开始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一方面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

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另一方面，指使伪满洲国军、勤劳俸仕队和强迫抓来的劳工，赶修通化一带的作战工程。关东军虽然经过扩充，兵力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但其武器装备、战斗素质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兵员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而内容空虚浮肿”。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兵气势低落，因而作为日本天皇的“皇军”——关东军的战斗力，已经降到最低的程度。

就在关东军扩充兵力的同时，苏联军队大批向远东集结。中国战场的中国军队也进入了全面大反攻，日军处于中国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太平洋战场日军的失利，以及本国的全面危机，这一切构成了关东军必然覆灭的结局。

尽管日本大本营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关东军也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军部的错误估计，认为苏军不会很快发起进攻，幻想决战的时刻应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关东军总司令部也未能提前得到。面对这种突变形势，关东军召集紧急会议，还在制定什么《满洲国防卫法》，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关东军的防守阵线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才慌忙决定放弃“新京”，固守通化，并指令伪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在反法西斯阵线的全面打击下，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9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向苏军投降。至此，为侵略中国而建立的关东军，走完了它全部的里程，终于遭到覆灭的下场。

由于关东军的投降，所谓“神光”开辟的“宇宙”伪满洲国也随之崩溃了。

（摘自长春市《宽城文史资料》第三辑）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

高丕琨*

主宰伪满国政的是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帅的化身，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历任关东军司令官有本庄繁陆军大将、武藤信义元帅、菱刈隆陆军大将、南次郎陆军大将、植田谦吉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最后是山田乙三陆军大将。这些人都是陆士、陆军大学出身，历经考验，日本政界公认为精明强干，劳苦功高，是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今分别叙述如下：

本 庄 繁

本庄繁于1931年8月以中将资格担任关东军司令官。他在日本陆军部内颇孚众望，尤其得到田中义一大将的青睐。曾任张作霖将军府的顾问、驻华使馆武官，熟悉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情况。策动侵华勾当的阴谋分子，如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军官都是他得意的幕僚。以他为首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利诱溥仪、

* 高丕琨，伪满总理大臣秘书官。

罗振玉、郑孝胥等复辟野心家与他签订卖国密约，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和掠夺中国奠定了基础。于1932年8月调回陆军部。因侵华有功晋级为大将，仍任要职。退官后担任日本国际红十字会总裁。在1942年伪满建国十周年时曾以“满洲会”会长的身分到“新京”（长春）参加庆祝活动。日本投降时自杀。担任本庄司令官参谋长的先后有三宅光治少将和桥本虎之助少将。后来二人均晋级中将，关东军参谋长是辅佐司令官的最重要角色。

武藤信义

1932年8月，武藤信义继本庄繁之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是一个武功赫赫的将领，为大正年代的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及军事参议官等职。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率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此次他以大将资格，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是所谓日本在满机关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因而引起世界的注目。到任不久，即升为元帅。和伪满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并对伪满的控制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第三课（后改为第四课），专管伪满政务，进一步巩固了日满一体的关系。1932年死于任内。日本天皇特授予男爵勋位，以旌其功。他的参谋长是小矶国昭中将，副参谋长是冈村宁次少将。

菱 刈 隆

1933年7月武藤死后，菱刈隆大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菱刈隆在陆军部内以严肃果敢而知名。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堪称军中之魁。他到任后将伪满改为帝制，让溥仪做了皇帝。更进一步强化了关东军对伪满的

统治。把伪满一切事宜改为第四课办理。调整伪满省区与军管区，并进行收买北满铁路（旧中东路）等重要工作。于1934年12月调任为军事参议官。他的参谋长先是小矶国昭中将，小矶调任为第五师团长后，由西尾寿造中将接任，副参谋长为板垣征四郎。

南 次 郎

南次郎于1934年12月，继菱刈之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当时已撤废关东厅长官，在全权大使下设关东局总长。南大将是“九·一八”事变当时的陆军大臣。他曾任过陆军部和参谋本部的要职，是策动侵华的行家里手。到任后不遗余力地对伪满军、政两界进行调整。将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撤换，改任张景惠为总理大臣。1936年3月调回参谋本部，后任朝鲜总督。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将校20多人率领1 400名下级军官和士兵，以铲除破坏国体的元凶为理由，发起兵变，袭击重臣与朝日新闻社，杀害了内府斋藤实（79岁）、藏相（财政部大臣）高桥是清（83岁）、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63岁），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重伤。传闻冈田首相亦被打死（其实未死）。要求改造国家。政府当即出动军队包围兵变部队。通信机关陷于瘫痪，内阁总理辞职，称为“二·二六”事件，轰动了全世界。为处理善后，将南大将调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于当年7月3日，由陆军军法会议，对64人起诉，判处17人死刑，草草了此事件。策动兵变最活跃的桥本欣五郎大佐退伍后，做了“新正诚会”的骨干，专搞军事秘密活动。那些负责引退的被编为预备役之中的，如大岛陆太郎少将、涩谷三郎大佐等被派到满洲国充任要职（注）。南司令官的参谋长是西尾寿造中将，副参谋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

（注）大岛陆太郎少将是大岛大将子爵的儿子，大岛陆太郎世袭子爵，是贵族。当时他在东京任旅团长，引咎辞退，被派往伪满后先任警务司长，继任牡丹江省长。后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回国。涩谷三郎大佐当时是东京的联队长，被勒令退役。到伪满后，先任滨江省警务厅长，继大岛之后任警务司长、牡丹江省长、治安部次长，最后任哈尔滨学院院长。日本战败后，先用手枪打死妻与子，然后自尽，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

植田谦吉

他于1936年3月继南次郎之后出任司令官兼大使。植田是一个典型的老牌军官。在战场上负过重伤，失去一条腿，他矢志为天皇尽忠，不惜马革裹尸，疆场捐躯。为绝后顾之忧，从未结婚，是个单身将军。曾任驻天津日军司令官，洞悉中国情况。从他任司令官后，伪满开始实行产业五年计划，为日军侵略服务。他发动诺门罕与苏联交战事件。在交战中虽互有伤亡，总的说还是日军失败，最后双方签定了诺门罕停战协定。因此，植田于1939年9月被调回国。他的参谋长是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转任第五师团长后，由东条英机中将继任，未几，东条又调走，换了木村兵太郎中将。

梅津美治郎

梅津由陆军士官学校、陆大毕业。曾任军务局课长、参谋本部课长兼陆大教官、联队长、通信学校研究部长、参谋本部总务部长、驻中国侵略军司令官，曾同何应钦订过协定。后任第二师团长、陆军次官。于1939年9月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综观其官历，可以说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传说他是个手腕灵活、精明强干的将军。我曾随伪总

理大臣张景惠数次访问过他，给他们作交谈时的翻译。他个子不高，表面上态度和蔼，毫无傲慢之气，且用语亦极谦恭文雅，如不着军装，谁也想不到他是百万大军的统帅、大将司令官。可是，他恰恰是个面善心狠、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他于1944年7月调参谋本部任参谋总长，显赫一时，他的参谋长先是饭村穰中将，后为笠原幸雄中将。

山田乙三

山田于1944年7月继梅津之后接任司令官兼大使。这时，所谓“大东亚战争”正在走下坡路，形势日非，侵华战场亦不容乐观，苏联人也在厉兵秣马，使日本处处棘手，事事焦心。日本的军队几乎倾巢出征，国内非常空虚，光集结在伪满境内的关东军就有六七十万人之多，身为关东军总管的山田乙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本来就不高的个头，看上去更矮了。面孔显得苍老消瘦，疲惫不堪。他是未战而败的将军，带头避难逃往通化，最后作了苏军的俘虏。因搞非人道的细菌战，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最高刑期25年，这就是他的下场。他的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

关东军参谋长、副参谋长

关东军司令官是关东军的统帅，必须由名望显赫的大人物来充任，而参谋长则须是有真才实学、精明强干的将才。因为参谋长是司令官的左膀右臂，是辅佐司令官和带领幕僚活动的重要角色，既须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又须是能掌握军中一切人事和军政活动的中心人物。关东军历任的参谋长与副参谋长都是日本军中的突出人物。也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有的虽离开军界后仍对中国人民犯有滔天罪行。如

在本庄任内的三宅光治少将，后任中将师团长，退役后任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是协和会的第一把手。本庄大将的另一个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升中将后任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退役后特任伪满参议府副议长并兼祭祀府总裁，这是个不寻常的官职。

小矶国昭参谋长是制定和实行统治伪满总方针政策的主谋，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北创建了“殊勋”，也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晋级大将后，在太平洋战争中大肆杀戮。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充任昭南岛（新加坡）总督。在日本将败的所谓非常时局下，又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收拾东条英机所造成的残局。是个文武兼备的军事政治家。

西尾寿造晋级大将后，出任日本侵华派遣军的第一任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晋级大将后，任日本侵华派遣军的最末一任总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利用他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被蒋介石放回日本。

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都曾做过关东军参谋长和副长，后均升为大将。板垣做过侵华师团长、陆相、侵华派遣军的首任总参谋长。日本投降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任首相时，曾一身兼任陆军、外交、内务、文部、商工、军需等各部大臣和参谋总长。权倾一时，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的跋扈者。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当过关东军参谋长为时不久的原军务局长木村兵太郎，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充任过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晋级中将后当过师团长。因与东条政见不同，未升大将即退役。转入政界，曾被选为仙台

市长。

任过梅津司令官的参谋长饭村穰中将和笠原幸雄中将，都是军中的佼佼者。我曾数次见过笠原，他的作风颇似梅津。

秦彦三郎中将是最末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的参谋长，也是关东军最末一任的参谋长。秦是搞特务谍报的老手。当过日军在伪满的特务机关长，最后充任山田乙三的参谋长。日本投降后，为收拾关东军的残局曾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

（摘自《伪满人物》一书）

日本侵华兵力与关东军

姜克夫

日本自明治维新即建立起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军制模仿德国，受天皇和内阁统帅，参谋本部和陆海两省为天皇和内阁统帅军队的机构。“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军阀在我国东北冒险的成功，军阀也逐渐左右日本政府。受德、意法西斯扩军备战的影响，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少壮军人发动政变，杀死主张限制扩军的首相斋藤实和藏相、陆军教育总监，刺伤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规定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行倒台制度，从此，日本政府便成了日本军阀的傀儡。1937年“七·七”事变前，天皇为日军最高统帅，代表天皇管理军队的为参谋本部、陆海军两省和主管军队训练的陆军教育总监。当时的陆军大臣为杉山元，海军大臣为米内光政，教育总监为香月清司，参谋总长为天皇幕僚长，向由亲王充任，战前总长为闲院宫载仁，次长为多田骏。淞沪会战期间，于11月16日通

过日本内阁决议，设置战时日军大本营，以裕仁天皇为大元帅，陆、海、藏、外大臣及参谋总长等均系大本营成员。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的轨道。

日本军国主义者自从甲午战争战胜中国、日俄战争再胜俄国，“九·一八”事变又侵占我国东三省后，便狂妄达到极点。它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而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红军陆军和英美海军作为假想敌。为达其灭亡中国、打垮苏联、称霸世界的目的，于1936年8月7日，由日本政府制定了个“国策基准”方案，明确规定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企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海洋政策和基本方针在于“对南方海洋，特别是以南洋方面，努力促进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一面避免刺激他国，一面以渐进的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在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军部提出的日本帝国上述总的战略计划前，军部还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日本陆海空军都要大大加强。其具体指标为：陆军常设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扩充到50个师团。海军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102艘，潜水艇70艘。陆上航空兵力在战争初期要有140个中队，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为完成以上扩军备战计划，1936年至1937年度军费达到10.6亿日元，占日政府全年支出的46%。对军事工业投资1936年度达到9.82亿日元。上述计划虽规定6年完成，但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时，日军步兵师团的人员武器装备几乎赶上英美，超过了法国，并且拥有一批新式火炮。飞机也从1931年的600架增加到1 500架。海军舰艇数量和海军基地扩建也大大加强。现根据战后日本政府防卫厅公布的材料，对日军战前编制、部署和战争爆发后日军的编制、武器装备概况分别作

一介绍：

根据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975年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记载，1936年底日本陆军总兵力为25万人，编成18个师团。每师团人数、挽马师团（野炮兵编成）人员11 858名，马1 592匹；驮马师团（山炮兵编成）人员11 715名，马1 443匹。根据陆军编制法，每个师团辖两个旅团，每旅团辖两个步兵联队，另外师团还直辖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4个联队及通讯队、卫生队等。

"七·七"事变前，日军这18个师团分布情况如下：日本国内共驻11个师团。伪满驻7个师团：其番号第二师团（驻牡丹江）、第四师团（驻佳木斯）、第八师团（驻东宁）、第十一师团（驻哈尔滨）、第二十师团（驻绥芬河）、第一师团（驻孙吴）、第七师团（驻齐齐哈尔）。另有独立混成第一、第十旅团，骑兵第一、三、四旅团，独立山炮第四联队，野战重炮第九联队，高射炮第十二联队，铁道第三联队、第一至第五独立守备队等。因派遣到伪满的师团国内都留有留守部队，故每个师团定员为10 583名。

朝鲜驻两个师团：第十九师团（罗南）、第二十师团（龙山）。

华北驻1个旅团：河边正三混成旅团。

台湾驻4个联队：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山炮联队、基隆、马公重炮联队。

航空部队：关东军有个飞行集团，下辖飞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等五个飞行联队，司令部驻伪满长春。

我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既未能很快将我国压服，而苏联红军又在伪满边境跃跃欲试，日军统帅部为加强对我国军队作战和增兵伪满防苏，遂以常设师团的后备役兵扩

编若干特设师团。

常设师团，每师团辖步兵两旅团，每旅团辖步兵两联队。

特设师团，每师团辖步兵两旅团，每旅团辖步兵联队二。

以上两种师团每次出动作战，均配属一个战车大队。这两种师团根据火炮装备异同，又区分为甲乙两种。凡用挽马装备者称之为甲种师团；用驮马载运火炮者为乙种师团。

骑兵集团，辖骑兵旅团二。

独立山炮联队辖山炮大队二。

野战重炮联队辖重炮大队二。

独立野战重炮联队辖重炮二大队。

独立野战重炮大队每大队辖三中队。

迫击炮大队每大队辖三中队。

日本陆军根据任务不同，组编有各种类型的师团，至1939年已有三种编制的师团。抗战前日本设置的18个师团为“常设”师团，亦称甲种师团。这种师团四四制编制，设有两个旅团司令部，人员众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卢沟桥事变爆发入侵我国的即属于这类师团。其中以第三、第十三师团战斗力最强，称为日军王牌。其次为第六、第九、第十四、第二十师团，战斗力亦强。这些师团往往作为突击兵团投入战场。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大本营增设第十三、第十八、第一〇一、一〇四、一〇六、一〇八、一〇九、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特设”师团，亦称乙种师团。这种师团以常设师团的后备役编成，和常设师团的兵力相差无几，只是将骑兵联队减少为骑兵大队而已。

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者认识到用武力使中国屈服已不可能，遂改为以谋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吞并中国

的策略。蒋介石也认识到用自己力量赶走日本侵略者也不可能，只能保存实力，等待英、美和苏联打败日本后再收复失地，因此改变其国策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样，日军在我国正面战场上的能征惯战的“常设”、“特设”师团和指挥才能卓著的将领就派不上用场了，遂自1939年春天起陆续将这些师团及著名指挥官调往满洲或复员回国，而在伪满增兵尤多，由抗战前两个甲种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4个独立守备队增加到10个甲、乙种师团、9个独立守备队，并建立起4个军的指挥部。

为接替从中国正面战场被调走的甲、乙两种师团的防务，日本军部又召集后备役兵组建成第十五、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等师团。这些新编师团均按三单位丙种师团编制。另外又以后备役兵陆续编组了独立混成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独立混成旅团配备在华北和其他占领区负担维持警备治安任务。每一个混成旅团直辖5个步兵大队，两个炮兵中队，1个工兵中队，全员约计5 000余人，不仅装备极差，而且士兵也多系老弱，战斗力极差。

1939年后，因为日本军部以对苏作战为重点，故其在我国南北战场和伪满的兵力均作了重新配备。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参谋长矶谷廉介

直辖部队

第五师团长（甲）

第一独立守备队

第二独立守备队

第五独立守备队

第九独立守备队

第三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长前田正实（驻牡丹江）

第二师团长（甲）安井藤治

第八师团长（甲）

第十二师团长（甲）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五司令官土肥原贤二　参谋长仓茂周藏

第四师团长（甲）

第七师团长（甲）园部和一郎

第十一师团长（甲）

第六独立守备队

第四军司令官中岛今朝吾　参谋长牟田中廉也（驻孙吴）

第一师团长（甲）

第十四师团长（甲）

第八独立守备队

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　参谋长藤本铁雄（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长（机械化）井上政吉

第八国境守备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

第一战车师团长安冈正直

第二飞行集团长仪峨彻二

1941—1942年间，日本除侵华战争外，又发动了最大的军事冒险。1941年7月为准备侵苏从我国内地战场上和其国内抽调大量攻击力量最强的"常设"和"特设"师团到我国东北。及至1941年12月德军困于冰天雪地，日军大本营认为侵入西伯利亚也捞不到好处，而英美则丧失所有欧洲阵地，在北非战场亦屡遭失败，英伦三岛岌岌可危。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取英美

在远东的殖民地，并切断重庆国民政府的海外交通线，遂又从我国大陆抽调大量能征惯战的野战师团发动了所谓“大东亚圣战”。为进行这场力不从心的大战，日军不断从我国抽走进攻能力强的师团，而以独立混成旅团扩编为“警备”、“治安”两种师团，担任对我国作战的任务。同时由于减少对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进攻，兵力也比前几年减少，总兵力减少到60余万人。

日军的这种“丙”“丁”级师团，基本上是以原独立混成旅团为基干，再增加3个后备步兵大队编成。每师团辖3个步兵联队，不设旅团司令部，只设1个步兵团长指挥3个步兵联队。其配属的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与“常设”师团基本相同。另外还配备骑兵搜索队及通讯队、野战医院等。前者每师团兵员15 000人，后者兵员只11 000人。两种师团后方兵力少，野战攻击能力不强，适宜日军占领区承担警备任务。但日军的编制往往随作战任务的不同，随时加以改装，故有时两旅团4个步兵联队编制的“乙”种师团在华北改装成“丙”种师团，而丙种师团调往华中正面战场或东南亚，为增强攻坚能力，又改装成“甲种”或“乙种”师团。

这个时期日军虽已对美英开战，但未放弃对苏联戒备。根据“关特演”的经验，于1942年10月，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为便于指挥作战又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并将驻防大陆“甲”、“乙”两种师团布于伪满各战略要地。

现将1942年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大陆和伪满军队编制、主官姓名、分布地区列表如下：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　总参谋长后宫淳

二、关东军

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参谋长饭村穰

直辖部队

第二十七师团长（丙）（驻锦州）

第二十九师团长（甲）（驻辽阳）

第七独立守备队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驻敦化）

直辖部队

第二十八师团长（甲）（驻哈尔滨）

第二军司令官（驻延吉）

第七十一师团长（丁）（驻汪清）

第九国境守备队（驻珲春）

第三军司令官（驻牡丹江）

第九师团长（甲）（驻掖河）

第十二师团长（甲）（驮）（驻东宁）

第一国境守备队（驻虎头）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二十军司令官上田良月（驻虎林）

第八师团长（甲）（驮）（驻虎头）

第二十五师团长（甲）（驮）（驻鸡西）

第二国境守备队（驻东宁迄林）

第三国境守备队（同上）

第十国境守备队（同上）

第十一国境守备队（同上）

第五军司令官（驻东安）

第十师团长（甲）（驮）（驻佳木斯）

第十一师团长（甲）（驮）（驻东安）

第三骑兵旅团长

第四国境守备队

第十二国境守备队
第六独立守备队（驻东安）
第二十四师团长（乙）（驮）（驻林口）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驻齐齐哈尔）
直辖部队
第十四师团长（甲）（驻齐齐哈尔）
阿尔山驻屯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驻昂昂溪）
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驻孙吴）
第一师团（甲）（驮）（驻孙吴）
第五十七师团长（乙）（驻山神府）
第五国境守备队
第六国境守备队
第七国境守备队
第十三国境守备队
第八独立守备队（驻北安）
第六军司令官喜多诚一（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长（机械化师团）（驻海拉尔）
第八国境守备队（驻海拉尔）
装甲军司令官
第一战车团
第二战车团
第三战车团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
第一独立守备队（驻奉天）
第二独立守备队（驻长春）
第五独立守备队（驻哈尔滨）

第九独立守备队（驻承德）

第二航空军司令官铃木率道

1943年夏起，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海空战中不断遭受惨败，而在我国施展所谓“谋略”却招降了三四十万国民党军队，认为这些伪军再加上伪满蒙和华北齐夑元伪军可以填补其占领区的防务，为保卫其侵占的太平洋和大洋洲诸岛，遂纷纷从我国大陆和伪满抽调兵力，增援该地的守军。

关东军始终为日军侵华重兵集团，虽与我国作战6年，但1941年7月，日本大本营调到伪满参加“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师团大部分未调出。及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处境危殆，为解救孤悬东南亚的日军打通我国大陆交通线，日军大本营始陆续从伪满调出“常设”和“特设”师团。但为防御苏联红军进攻，又以独立旅团装备起几个甲乙种师团。同时又召集居住伪满各地的日本“在乡军人”组建大量的“警备”和“治安”师团及独立守备队等，分布于伪满和华北等侵占区。

关东军

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参谋长笠原幸雄

直辖军队

第二十九师团（乙）（驻辽阳）

第一百一十一师团（丁）（驻通化）

第七独立守备队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乡诚一（驻敦化）

直辖军队

第一百二十七师团（丁）

第三军司令官根本博（驻延吉）

第十二师团长（甲）（驻东宁）

第七十一师团长（丁）（驻汪清）

第一国境守备队
第九国境守备队
第四独立守备队
第五军司令官饭村穰（驻牡丹江）
第十一师团（甲）（驻东安）
第二十五师团（甲）（驻鸡宁）
第三骑兵旅团
第二国境守备队
第三国境守备队
第四国境守备队
第十国境守备队
第十一国境守备队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驻沈阳）
直辖军队
第一百零八师团（丁）（驻赤峰）
第一百一十二师团（丁）
阿尔山驻屯队
第三独立守备队
第四军司令官横山勇（驻孙吴）
第五十七师团（乙）（驻山神府）
第五国境守备队
第六国境守备队
第七国境守备队
第十三国境守备队
第十四国境守备队
第八独立守备队
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驻海拉尔）

第二十三师团（机械化师团）（驻海拉尔）

第八国境守备队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

第一独立守备队

第二独立守备队

第五独立守备队

第九独立守备队

第二航空军司令官板花义一

装甲兵司令官

第一战车师团长

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后，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夹击日本本土的时机已日益迫近。侵华日军一面要向西作战，压迫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一面又须加强华东沿海防备，反击美军登陆作战，因而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日本东京大本营为在我国大陆垂死挣扎，除设置新的日军指挥机构，重新部署其侵华的武装部队外，并更换了包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内的大批高级将领，同时还从国内和伪满搜罗炮灰，以扩充在我国大陆的侵略军，将一批独立混成旅团编为丙、丁两种师团，将野战补充队升格为独立步兵旅团。1944年秋至1945年春，师团数在我国关内曾达到34个，将近120万人。这时日军的战略重心仍是压迫蒋介石国民政府屈服，以打通大陆通往印度支那的交通线。及至1945年初，美军攻下菲律宾首府马尼拉，日军大本营认为美军将要在越南北部和我国华南、东南沿海登陆，夹击台湾和琉球群岛，遂将战略重心向以上地区转移，除加强第十三、二十三两军的兵力外，并在杭州、温州、福州地区设立第六军，由冈村亲自指挥，以防御美军登陆，并为加强北越的防御力量，由中国派遣军支援寺内南方军两个乙种师团。1945

年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成功，接着，5月德国投降，莫洛托夫宣布废除《日苏中立协定》。在此形势下，日军防御重点已非美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而是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夹击日本本土之战已迫在眉睫了。为此，日军大本营除从中国大陆抽调4个师团加强关东军，并在伪满征召在乡军人急忙拼凑起二十几个丙、丁级师团外，复命令冈村火速收缩在大陆的战事，将深入我国华南的侵略军撤到京、沪、汉一线和华北地区与关东军协力，与苏、美、中军队作持久战，以保卫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土。但正在冈村按照大本营的决策重新部署其侵略军时，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率70余万关东军投降苏联，至此，结束了这场历时8年的侵华战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编制：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　总参谋长秦彦三郎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驻敦化）

参谋长樱井镣三

第三军司令官村上启作（驻延吉）

参谋长池谷半次郎

第七十九师团长大田贞昌（丙）（驻图们）

第一百一十二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丁）（驻珲春西部）

第一百二十七师团长古贺龙太郎（丁）（驻图们南部）

第一百二十八师团长水原义重（丁）（驻罗子沟）

机动第一旅团长木下秀明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二旅团长鬼武五一（驻大碱厂）

第五军司令官清水规矩（驻掖河）

参谋长河越重员

第一百二十四师团长椎名正健（丁）（驻穆棱）

第一百二十六师团长野沟贰彦（丁）（驻掖河）
第一百三十五师团长人见与一（丁）（驻掖河）
第十五国境守备队长西胁武
第一百三十四师团长井关仞（丁）（驻方正）
第一百二十二师团长赤鹿珏（丁）驻南虎头）
第一百三十九师团长富永恭次（丁）（驻敦化）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驻奉天）
参谋长大坪一马
第三十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驻新京）
参谋长加藤道雄
第三十九师团长佐佐木真之助（甲）（驻四平）
第一百二十五师团长今利龙雄（丁）（驻通化）
第一百三十八师团长山本务（丁）（驻抚顺）
第一百四十八师团长末光元广（丁）（驻新京）
第四十四军司令官本乡义雄（驻奉天）
参谋长小畑信良
第六十三师团长岸川健一（丙）（驻奉天）
第一百零七师团长阿部孝一（丁）（驻索伦北部）
第一百一十七师团长铃木启久（丁）（驻大赉）
独立战车第九旅团长北武树（驻四平）
第一百一十八师团长盘井虎二郎（丁）（驻锦县）
第一百三十六师团长中山淳（丁）（驻奉天）
独立混成第七十九旅团长冈部通（驻安东）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旅团长桑田贞三（驻奉天）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四旅团长后藤俊藏（驻临江）
独立战车第一旅团长阿野安托（驻奉天）
第四军司令官上村干男（驻哈尔滨）

参谋长大野武城

第一百一十九师团长盐泽清宣（丁）（驻哈尔滨）

独立混成第八十旅团长野村登龟江（驻哈尔滨）

第一百二十三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丁）（驻孙吴）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五旅团长浜田十之助（驻瑷珲）

第一百四十九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丁）（驻哈尔滨）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一旅团长宇部四雄（驻海拉尔）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六旅团长土屋直二郎（驻嫩江）

大陆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己（驻新京）

第二航空司令官原田宇一郎

第三十四军司令官栉渊镥一（驻咸兴）

参谋长川目太郎

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丙）（驻咸兴）

第一百三十七师团长秋山义允（丁）

独立混成第五十三旅团长上坂胜

独立混成第一百三十三旅团长原田繁吉（驻新京）

（摘自《民国军事史略稿》）

日本关东军驻长春军事机构的沿革

李茂杰

长春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部，是东北交通的要地，其战略地位也由于处于南北满的分界线而举足轻重。因此，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我国东北南部（亦称南满）的权益之后，日本派往东北的侵略军，在长春便开始驻军。1931 年9 月18 日，关

东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便将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直到1945年8月日本败降，才结束了日本侵略军盘踞在长春的历史。

一、自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前日军驻扎长春的概况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沙皇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权益，于1904年2月8日发动了日俄战争，至1905年9月5日，俄军败北，在美国的调停之下，日俄双方在美国东部的朴茨茅斯签订了瓜分我国东北权益的条约。依照《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我国东北南部的权益，接管了辽东半岛租借地和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即长春至旅顺的铁路。从此，日本侵略军开始了长驻包括长春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

1905年10月18日，日本在我国东北南部的辽阳城设立了关东总督府。1906年4月，关东总督府由辽阳迁往旅顺。同年7月31日，日本将关东总督府改称关东都督府，下设陆军和民政两部，以管理被其占领地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关东总督和第一任关东都督由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昌担任，其继任者顺次为大将福岛安正、中将中村觉、中将中村雄次郎。在关东总督时期，最初日本向东北派驻4个师团，不久便改为两个师团，即第十四和第十六师团。1906年2月28日，日本陆军省下令在我国东北建立6个大队的独立守备队，由关东都督指挥。1907年编成后，将6个大队分别配置于公主岭、铁岭、沈阳、连山关、大石桥和瓦房店等地。驻在公主岭的为第1大队，其中，第4中队驻在长春。驻长春的第4中队从1907年3月末开始，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前一直未变。

日军师团驻屯我国东北的数量从1907年10月起，改为一个师团，每两年换防一次。日军常驻东北的师团轮流换防情况

如下：

时间	师团
1907年10月 1909年9月	第十师团
1909年9月 1911年4月	第十一师团
1911年4月 1913年5月	第五师团
1913年4月 1915年5月	第二师团
1915年4月 1917年5月	第十七师团
1917年5月 1919年5月	第七师团
1919年5月 1921年4月	第十六师团
1921年4月 1923年4月	第十五师团
1923年4月 1925年6月	第六师团
1925年6月 1927年4月	第十师团
1927年4月 1929年4月	第十四师团
1929年4月 1931年5月	第十六师团
1931年4月	第二师团

上述师团在我国东北期间，都有一个旅团驻于长春，并在长春设置步兵旅团司令部。

二、日军在长春的作恶活动

自从日军在长春盘踞起，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前，无

所不为，极力从事侵犯中国人民权益的作恶活动，并频繁进行军事演习，为侵占我国东北做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前夕，日军警在长春的作恶活动更加与日剧增。

1913年3月3日，长春头道沟日本人三井洋行勾引日本警察将中国德发合商号执事和柜伙多人强行带到警察署严刑逼供，将高禄奉灌水致死。

9月15日，长春城内东三道街天津馆胡同一卖梨老翁王振升，有一日人称被王推车碰伤，立将梨车推翻，殴打。并且用电话叫来头道沟日本军警百数十人，向中国警察要人，中国警察不理，日军警大打出手，把中国巡警刘耀东绑去，夺枪二支，子弹50发，警刀等物品。

1929年8月16日，日军向长春增兵，与驻长日军一起进行实弹演习。更为甚者，在18日，日军竟在长春城内进行演习活动，横冲直闯，扰乱市街。

9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携其幕僚，指挥日军在长春进行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在演习中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肆意践踏农田，将即已成熟的农田踏平。据我长春政府当局事后调查，这次被日军踏毁的田地多达1 500余亩。

11月1日，驻长春的日本领事馆警察，无理干涉中国长春的市政，并与长春市民发生冲突，日警开枪打死中国市民7人。

1930年6月2日，驻长春的日军第一独立守备大队第四中队的士兵，无故开枪打死农民宁宝臣。

同年10月，日本驻长日军把长春城和宽城子火车站作为进攻目标，进行攻城演习。

1931年6月9日，日军和日本领事馆警察队联合进行演习。在日驻长旅团长中川和警察署长武波的指挥下，越出满铁附属地，到处架起枪炮，进行城市巷战演习。这次演习是日军配合

在长春北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一是炫耀日军武力，二是企图以此给中国长春县当局施加压力。

在此之前，于6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怂恿朝鲜农民与长春万宝山农民挑起冲突，日本驻长领事馆肆意扩大事态，派出武装警察对当地中国农民开枪。借此，还煽动朝鲜当局掀起排华事件，在日本国内制造仇华情绪。企图借万宝山事件制造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借口。

7月1日，日本国内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废除每两年轮换驻东北师团的制度，改为派一常驻师团到东北。并决定在辽阳设立常驻师团本部，在长春设立一个步兵旅团司令部和一个联队。

7月15日，驻长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公开向中国当局宣布：自是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须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进行一切军事演习。

8月29日，驻长日军又再次越界进行军事演习。

9月2日，驻长日军宣布把长春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作为演习地域，把长春作为攻击目标进行演习。

9月13日，新上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偕参谋到长春视察，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和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陪同，在长春观看军事演习。本庄还向日军发出训示，要求日军要服从命令，以保卫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为天职。

三、“九·一八”事变时驻长日军机关

到1931年，“九·一八”关东军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驻长机关和部队如下：

1. 日军第二师团所属驻长部队

1931年4月，日本把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以准备在东北寒冷地区作战的需要。该师团在多门二郎中将的率领下进入中国东北后，总部仍设在辽阳。以长谷部照俉少将为旅团长的第三旅团驻扎在长春。该旅团司令部机关主要人员的组成是：

旅团长　长谷部照俉少将

第四联队，队长大岛陆大郎大佐

第一大队　队长　鹿野新一郎少佐

　第一中队　队长　松川安世大尉

　第二中队　队长　永井元大尉

　第三中队　队长　高桥贞之丞大尉

第二大队　队长　黑石武城少佐

　第五中队　队长　江口小一郎大尉

　第六中队　队长　星实敏大尉

　第七中队　队长　大久保朝雄大尉

机关枪队由联队直辖

　队长　长谷川兵四郎大尉

该联队的各种队编制为180人。

2. 日军独立守备队驻长机构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驻扎长春。由独立守备队司令部第一大队（驻地公主岭）管辖。

第四步兵中队机关人员

　中队长　芳贺丰治郎大尉

　幕　僚　全泽朝吉中尉

　浦野孝次中尉

　吉泽了三

此外，独立守备队在长春设有高等步兵学校，主官为坂田

彻治少佐。

3. 关东军宪兵队驻长机构

在关东军司令部所辖部队中，还有关东军宪兵队的分支机构驻扎长春。关东军宪兵队总部设在旅顺，部队长为二宫健市少将，下设7个分队，分别驻扎在旅顺、大连、辽阳、奉天、四平街、长春和安东等地。驻长宪兵分队分队长为坂野光太郎少佐。

4. 关东军卫戍病院分院

关东军司令部所辖的铁岭卫戍病院在长春设有分院。

铁岭卫戍病院长春分院主要人员为：

分院长	高原武一	军正
幕　僚	佐藤宽刚	军医
	小林太郎	军医
	内山繁一	军医
	丰岛辰二	军医

5. 日本驻长领事馆警察队

日本在长春设有领事馆，在该馆设有警察署（机构和人员不详）。

6. 日本在中国东北各地设有在乡（退伍）军人会

在吉林省各地的在乡军人，平时虽不具有武装军人的性质，但是在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陆军省发出密令，指令各地在乡军人于9月8日分别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集中。集中后的在乡军人，被编入日军之中（在长春的在乡军人分会详情，目前尚未搞清）。

四、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长春沦陷于敌手及驻长日军概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军部的支持下发动了进攻中国东北军的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挥下，驻东北各地日军全员出动，到处攻打东北军警和政府机关。驻长春的日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在旅团长长谷部照俉的指挥下，该部步兵第二大队长黑石少佐率第五、第七中队日军二百多人，攻击东北军驻长春南岭兵营。大岛大佐率第4联队4个中队攻击东北军宽城子兵营。同时，将第三旅团第二联队由公主岭调往长春，支援向南岭兵营进攻的日军。

日军向长春中国军队进攻时，中国军队官兵回以激烈的抵抗。因此，在9月19日当日军攻占沈阳、营口、本溪、安东等地后，长春仍在战斗。鉴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将旅顺的日军步兵第三十联队、海城的野战炮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调往长春，增援日军对南岭中国军队的作战。由于日军大量增援，而中国军队事先没有准备，加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虽然中国军队进行抵抗，终因上述原因而于9月19日也被日军攻占。长春从此沦于日本关东军之手。

日军攻占长春之后，便进一步向长春集结兵力，准备由长春向吉林进攻。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决定把第二师团其它部队和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独立守队第一、第五大队的兵力向长春集结。9月21日，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率部进攻吉林，由于以熙洽为首的吉林省政府开门揖盗，向日军投降，因而日军第二师团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到9月23日，上述各部队全部进抵长春。

至此，日军在长春驻扎情况具体如下：

①日军第二师团机关及所辖

　　师团长　　多门二郎　　中将

　　参谋长　　上野良丞　　大佐

　　参　谋　　鲤登行一　　少佐

　　　　　　　西山福太郎　少佐

　　　　　　　吉田荣治郎　大尉

步兵第三旅团　　（已在长春）

步兵第三十联队　　（由旅顺调来）

　　联队长　　　　坪井善明　　　　大佐

　　第一大队长　　队长　桂朝彦　　少佐

　　第二大队长　　队长　相崎信太郎　少佐

该联队下辖6个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

野炮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由海城调来）

　　大队长　　知久八万　　少佐

该联队下辖二个中队

上述部队于10月调往黑龙江。

②日本空军

日军攻占长春后，于9月20日决定在长春西郊新建机场，该机场完工之后，将关东军飞行队独立飞行第8中队调往长春机场。

中队长　　平田辰男　　少佐

中队附　　加藤邦男（少佐）等15人

士　官　　多田义一（特务曹长）等13人

军　医　　正木丰（三等军医正）等3人

士　兵　　80人

该中队共112人

该队配备“八八式”侦察机

10月5日，关东军决定扩大侵略，轰炸锦州，于10月8日，本庄命该中队在平田率领下驾机轰炸锦州中国兵营和平民百姓。这次轰炸给在锦州的我国军民造成很大伤亡。该飞行中队后来在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时，被调往泰来机场。

到1932年春，关东军进一步扩大在我国东北的占领区，于4月15日调整了在长春的军事部署。除独立守备队仍按原来驻防未变之外，第二师团已调往北满。新设立吉长警察队，担负吉林、长春附近之警备（机构、主官、编制不详）。将关东军飞行队第十二轰炸大队调往长春机场。大队长岩下新太郎大佐，下辖第一、第二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福岛正夫（大尉），第二中队长石川祥一（大尉）。大、中队干部26人。

五、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

1932年10月30日，在伪满洲国成立半年之后，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控制，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和伪执政溥仪，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加强对苏联的战备，将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从此，长春成为关东军活动的指挥中心。迁来初期，关东军司令部驻在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院内，后迁往新建的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司令部

司令　　武藤信义　　大将

幕僚

参谋部

参谋长　　小矶国昭　　中将

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　　少将

参　谋　　斋藤弥平太（大佐）等13人

部　附　　堤雄平（少佐）等8人

副官部

　　副官　　筱原次郎（大佐）等4人

管理部

　　部长　　筱原次郎（大佐）兼

　　部员　　志波信孝（少佐）等3人

兵器部

　　部长　　富冈辰次郎（大佐）

　　部员　　合屋成雄（大尉）等5人

经理部

　　部长　　佐野会辅（主计总监）

　　部员　　杉浦章（二等主正）等20人

军医部

　　部长　　伊藤贤三（军医监）

　　部员　　家原小文治（二等军正）等4人

兽医部

　　部长　　田崎武八郎（一等兽医正）

　　部员　　松原茂平（三等兽医正）等4人

法务部

　　部长　　大山文雄（法务官）

　　部员　　冈田痴一、古川清一

军司令部附

　　多田骏（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等96人

在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的同时，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也迁来长春。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

司令　　桥本虎之助（少将）

副官　　上砂胜七（宪兵少佐）等2人

部员　　坂本俊马（宪兵中佐）等4人

部附　　大村贡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下辖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宪兵队。

长春宪兵队

队长　　小山弥（宪兵中佐）

该队下辖长春、吉林、四平3个分队。

长春宪兵分队

队长　　高地茂都（宪兵少佐）

关东军病马收容所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于同年11月在沈阳设立了病马收容所。后随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设在宽城子。

所长　　安达诚太郎

所附　　庄司武助等4人。

临时铁路线区司令部

该部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军事运输而设立的。

司令部设在沈阳，司令为佐伯文郎。在长春设有支部，支部长为小川一郎。

关东军陆军仓库在长春设支库，支库长为槌田一次。

停车场司令部

长春停车场司令官村上菊重（中尉）

临时兵站部

司令官　　高舒秀太郎（中佐）

长春支部长　　住友信太郎（大尉）

六、关东军司令部机构调整

1932年7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长春病死。同年7月29日，日本天皇裕仁任命在“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大将再次任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任后，对关东军司令部机关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关东军司令部机关情况如下：

司令官　菱刈隆　大将

参谋部

　参谋长　西尾寿造　中将

　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　少将

第一课

　参谋　冢田攻（大佐）等9人

　部附　矢野音三郎（大佐）等5人

第二课

　参谋　喜多诚一（大佐）等9人

　部附　酒井直次（中佐）等13人

第三课

　参谋　原田熊吉（大佐）等5人

　部附　尹相弼（少佐）等2人

第四课

　参谋　秋山义隆（中佐）等2人

　部附　宫胁襄二（少佐）等2人

副官部

　副官　上野勘一郎（大佐）等4人

　部附　丹羽玄（少佐）等2人

管理部

部长　　上野勘一郎（兼）

部员　　泉可畏翁（大尉）等2人

兵器部

部长　　木村弘人　（大佐）

经理部

部长　　铃木熊太郎

部员　　金山几太郎等49人

军医部

部长　　梶井贞吉

部员　　森岛侃一郎等3人

兽医部

部长　　渡边中

法务部

部长　　竹泽卯一

特务部（新设）

部长　　西尾寿造（兼）

部员　　高尾庸彦等24人

交通监理部（新设）

部长　　大村卓一

部员　　片村四八等13人

军司令部附

兵事

小村准等3人

谍报

土肥原贤二等15人

军政部顾问

多田骏（少将）等53人

吉林省警务顾问

儿岛正范

铁路

安达二十三等4人

大使馆嘱托

植木镇夫等3人

通信

船舶

兵站

无线电教育

鸠育成

七、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于11月在沈阳设立了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在关东军司令部迁往长春时，病马收容所也同时迁移到长春的宽城子。

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的任务，是对关东军使役的病马进行治疗，调查我国东北各地牲畜病疫状况，搜集病疫菌苗进行研究和试验。

1933年4月，关东军为了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和准备，由兽医部长渡边中下达了研究细菌的任务。到1935年以后，病马收容所改成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38年由宽城子迁往孟家屯新址，改称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直到1945年8月随着日本败降而解体。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历任部队长和任职时间如下表：

小野纪道	兽医中佐	1931年11月～1932年8月
安达诚太郎	兽医中佐	1932年8月～1933年7月

高桥隆笃	兽医中佐	1933年8月～1935年7月
竝河才三	兽医大佐	1935年8月～1937年7月
高岛一雄	兽医大佐	1937年8月～1939年7月
竝河才三	兽医大佐	1939年8月～1941年7月
若松侑次郎	兽医少将	1941年8月～1945年8月

关东军一〇〇部队机构

总务部　　下设两个分部，负责总务、后勤、医疗、卫生

种植实验场。

第一部　　下设若干分部，负责细菌病毒的试验，确定动植物病菌的效能和传染。

第二部　　负责细菌、病毒的研究、制造。

第一分部　　细菌分部

第二分部　　病理学分部

第三分部　　实验动物管理分部

第四分部　　有机化学分部

第五分部　　植物学分部

第六分部　　细菌武器生产分部，该分部于1943年10月建立。

第三部　　制造血清、疫苗。

第四部　　动物饲养

第五部　　教育培训技术人员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下属支队：

1940年以后，该部队在大连、海拉尔（后迁克山）、佳木斯、拉古建立支队。1941年在四平增设一支队，并在关东军驻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军团内设兽医部队，配合一〇〇部

队的细菌战活动。

盘踞齐齐哈尔的日军部队

叶永才

1931年11月19日，是齐齐哈尔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曾遭到马占山率领的爱国部队沉重打击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在师团长多门二郎的指挥下侵占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齐齐哈尔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经受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

当时的齐齐哈尔，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又是军事上不可忽视的战略要地。在她身旁不仅有沟通松花江水系和黑龙江水系的嫩江，而且有横亘东西的中东铁路，她既是北部边陲的军事指挥中心，又是连接腹地的纽带。正由于这些原因，在齐齐哈尔沦陷的14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齐齐哈尔一直驻有重兵。

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是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因此，齐齐哈尔被日军占领后不久，关东军总部就急令第二师团开回长春一带保护日伪的大本营。继第二师团，接驻齐齐哈尔的是关东军第十四师团。这期间，虽然省城齐齐哈尔失陷，但广大农村日军还没有占领，众多的爱国将领，如马占山、苏炳文等正在高举抗日的大旗，进行抗日斗争。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倚仗精良的装备，对马、苏领导的义勇军进行了疯狂扫荡。至1932年底，血战数月的义勇军由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只好在苏炳文的带领下由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此后，第十四师团调走，由第一师团接替。它的主要兵力部署是，师团司令部驻齐齐哈尔，师团长河村；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泉）及所属的6个大队，分驻北安、泰安、黑河一带；第二旅团及所属的6个大队、骑兵联队、野炮联队、工兵大队、辎重队、通信队等都驻齐齐哈尔。1935年，又由第十六师团接替第一师团。该师团共有兵力7 022人。除第十六师团外，齐齐哈尔还驻有骑兵、炮兵、航空兵部队。具体情况是：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师团长蒲修中将，步兵第三十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安冈正臣少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田路朝一大佐；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及川源士大佐；骑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阿父津四郎大佐；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畑勇郎大佐；工兵第十六大队，大队长加藤恰三中佐；飞行第十大队，大队长白石付助大佐；辎重兵中队，中队长中西宇大尉；第十六师团通信队，队长常奇猛中尉；无线电所，所长石田直美中尉；经理部派出所，所长北野或正；齐齐哈尔支库，库长山下支太郎；缘瓦支部，官长墨野秀敏少佐；停车场司令部，官长丰田长治中尉；独立守备队分遣队，队长三原中义；医院，院长领助治一军正。

1944年以后，日军为加强对中东路和中苏边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防卫力量，齐齐哈尔军营林立，恐怖气氛笼罩全城。至9月，齐齐哈尔驻扎的日本侵略军有：

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代号13部队，原驻齐齐哈尔东树林，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第三方面军辖驻扎孙吴的第四十四军，该军辖两个师团，分驻海拉尔、阿尔山，与驻牡丹江的第五方面军构成对苏防线。

第十四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天野中将，该师团隶属于18部队，驻齐齐哈尔现正阳大街。

第二航空兵司令部，司令官下村中将，驻齐齐哈尔原日本神社附近，1945 年1 月改为飞行军第十三旅团。

步兵第五十九联队，代号209 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

步兵第四十六联队，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

工兵第十四联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轻重机枪第十四联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第十四师团通信队，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四十六联队院内。

关东军停车场齐齐哈尔支场，代号983 部队，驻南大营以南，火车站西南约300 米处。该场储存大量粮食、被服和其它军用物资，是齐齐哈尔、孙吴、海拉尔、阿尔山等地日军的物资补给基地。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齐齐哈尔支厂，代号76 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三里岗子，厂长烟草屋大佐。该厂主要负责战区部队的弹药补给。

关东军自动车队齐齐哈尔支厂，代号562 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以北。

关东军齐齐哈尔陆军医院，代号54 部队，院长井上少将，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附近。

关东军龙江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长谷直三少将，驻齐齐哈尔原伪高等法院附近。

关东军兵事部齐齐哈尔兵事部，司令官池田大佐，驻齐齐哈尔商埠路原日本宫前小学附近。

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齐齐哈尔支部，司令官安达大佐，驻齐齐哈尔铁路局内。

关东军齐齐哈尔停车场司令部，驻原齐齐哈尔铁道局内。

关东军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原为林义秀少佐，后为田中中佐，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陆军官舍内。

飞行队，代号1006部队，驻齐齐哈尔原火车站东南2公里处。

关东军齐齐哈尔经理部派出所，驻齐齐哈尔“忠灵塔”附近。

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驻现一百商店东侧的二层楼内（现齐市公用事业总公司）。

关东军工兵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驻齐齐哈尔南市郊船套子。

关东军齐齐哈尔野战马场，场长滨中甚五郎，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关东军重爆击队，驻大民屯以东2公里处。

工兵联队，代号1991部队，驻齐齐哈尔小民屯。

关东军齐齐哈尔自动车队，代号412部队。

航空队燃料场，驻榆树屯火车站以东。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齐齐哈尔支厂三间房分厂，驻三间房火车站以西。

独立守备步兵第42大队，队长米泽大佐，驻昂昂溪火车站东北约500米处。

迫击炮第三联队，代号416部队，驻齐齐哈尔火车站以东约1公里处。该部队是化学武器的试验部队。

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部队，所长秋山少将。该研究所约250人。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军官。除所长秋山外，部队中还有一名少将军衔的军官。这个研究所建于1938年（民国27年），主要是研究制造毒瓦斯迫击炮弹。该研究所不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直属于日军参谋本部。至1944年，除试验消耗外，研究所内还存有20万发毒瓦斯炮弹。研究所的仓库设在516部队以南约600米处。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奉参谋本部的命令逃往南朝鲜，库存的毒瓦斯炮弹由留下的一名少

将负责全部销毁。

1944年9月12日，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奉命调离，全部与由哈尔滨移驻齐齐哈尔的部队合编成107师团。1945年4月，107师团又调到白阿县五叉沟。1945年5月，日军第三方面军，即13部队从齐齐哈尔一带调到沈阳，部分驻扎于郑家屯一带。随后，驻扎在孙吴的第四十四军移驻齐齐哈尔。8月9日，四十四军又调往哈尔滨。8月13日，齐齐哈尔又新编成一个师团，师团长佐佐木中将。苏联红军攻占齐齐哈尔后，该师团及其他侵占齐齐哈尔的日部队向苏联红军投降。受降仪式在原13部队院内举行。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关东军在孙吴的军事部署

杨柏林

以下简述日本关东军盘踞孙吴的14年中，屯兵设防，部署军事的情况。

1933——
构筑第五国境阵地

1932年4月，侵入黑河省的关东军制定《对苏作战纲领》，在北部正面（又称孙吴正面或黑河正面）针对苏境阿穆尔州开始军事部署，在黑河地区选定霍尔漠津、瑷珲、黑河和法别拉战略要地，准备构筑国境阵地，并立即实地测量、设计，关东军设置筑城班主管修建边境军事设施事务。

建成后的第五国境阵地，即孙吴霍尔漠津阵地（今沿江乡范围），位于北部正面右翼，其任务为掩护东侧背，并在逊河附近筑有野战阵地。守备队编制：步兵四中队、炮兵二中队、工兵一队。主要炮火力定额：中榴弹炮、中迫击炮各四门，高射炮八门。阵地的主要部位能抵御口径30厘米级以上威力的重炮弹及1吨重的炸弹、50吨级重战车的攻击。混凝土厚度有3米，其他大部分部位的厚度一般都在1.5米左右，能抵御20厘米级重炮弹的袭击。曾经据守在孙吴霍尔漠津——胜武屯一带的关东军269团第五国境守备队的上等兵北源茂卫，战后在他的著述《阿穆尔的流血》一书中说："……胜山要塞与秋月山不同，并非突击建造的工事，而是关东军成年累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永久性工事。亚雷高地的炮台，只要一按电钮，其炮身可以自由地上升下降。在这里有10公分的加农炮和榴弹炮。即或是苏联坦克攻击过来，它也休想越过那么宽的防坦克壕沟。"

1940年后，关东军以国境阵地为核心，分别在其侧翼中间、后方等处重要地点，构筑有坚固的野战阵地，以巩固江岸的重要区域。其中毛兰屯阵地配有步兵五大队、炮兵三大队。然后又进一步向纵深扩大，孙吴、龙镇与北安附近设有最后抵抗据点，而且强调各类阵地之间的联系。担任北部正面防务的关东军第四军，其设想是：如对苏发起攻势，遭到苏军回击时，驻军主力预定最后撤到孙吴附近死守，计划将第五、六两个国境守备阵地作为前进阵地。

第五国境阵地于1936年初步建成。日本侵略者从辽、吉、黑、河北、山东等地强征大批中国劳工，沉重苦役，风餐露宿，无衣少食，疾病流行，工伤不断，一批批劳工相继倒下，侥幸幸存的也在工程后期被集体枪杀。

1938——
特别军事地区的形成

日本关东军在其《对苏作战设想》里策划，首先由其东正面发起攻势，另一部分主力集结于孙吴附近，利用大、小兴安岭天然屏障准备持久战。如苏军反击，日军则逐步后撤到龙镇、北安一带阻止其南下。1938年北部正面日军兵力比前几年大为增加，第四军司令部驻孙吴，兵力及火力装备为“师团4、独立机关枪大队2、独立装甲车大队2、战车联队1、野战重炮兵旅团1、独立野战重炮兵联队1、炮兵情报班1、野战高射炮队8、独立工兵大队2、独立航空队1、通信队本部1、野战电信中队5、无线电小队8、固定无线电信队、无线情报队各1、野战通信鸽队本部1、通信鸽小队3、架桥材料中队2、渡河材料中队1。”

1939年，北部正面第四军比1938年又有充实，增加数字有：驮运师团1、独立轻装甲车中队1、野战高射炮队2、新增野战照空队1、飞机场中队1，渡河、架桥各材料中队3。

关东军不但对边界线严加封锁，而且对伪黑河省全境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将黑河省全境划为国境地区，而且具体规定将孙吴以北至黑河一带沿江地区及东起乌云西至黑河三间房等地区划为特别军事区域。《特别军事区域》条文中规定“国境地区内居民满14岁以上者，须向当地警察署申请发给居住证明书”，“国境地区外居民，如欲迁往国境地区内居住者，须经民政部大臣发给移住许可证方可迁入。”关东军对国境地区居民居住、出入的限制是异常严格的，完全是出于军事需要。

1941——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日本军部精心策划，先后两次动员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在1941年苏德开战后半个月正式开幕，这是对当时德国希特勒进攻苏联遥相呼应的一次配合行动，又是向英美显示力量，阴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信号。“关特演”时期，北部正面第四军的任务是“策应、支援东部正面日军主攻部队与河川防守，渡江作战，进攻时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在军事部署方面，“如第二方面军于孙吴正面发起功势，第四军即为其核心而向前进攻，渡江作战……”日本关东军借“关特演”之机，在伪黑河省大力加强与修筑各种军事设施。据《伪满洲国史》记载：“修建有大型兵工厂两座，大中小型弹药库500余处，沿黑龙江边修山洞1 250余个，兵营50余处，仅孙吴一地就有25处。瑷珲县设有飞机场10处，孙吴3处。关东军修筑的这些军事设施还分地上、地下两种。地上如兵营、仓库、机场、碉堡等公开或半公开的一些设施，地下的如山洞、地道、秘密兵营、掩蔽仓库等。”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之后，关东军继续扩军备战。1942年制定的“对苏作战方案”北部正面的军事部署为：除4个国境守备地外，“以孙吴为中心，东起奇克、向西延伸经高滩、干岔子、逊河、嘎巴亮子、霍尔漠津、毛兰屯、小河西、孙吴、四季屯……至三道卡等地分别驻有第四军部队。具体部署：一旦对苏展开攻势，黑龙江下游以第四军第一师团主力驻奇克、霍尔漠津一带；黑龙江下游以该军第五十七师团主力于三道卡附近展开攻势前进，并派遣机动部队渡江切断苏境铁道线。”

1943——
静谧的北方

1942年下半年起，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战事逆转，日军失利。《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中规定："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关东军在东北边境的军事部署一般采取守势。自1943年下半年，东北边境出现了平静状态，即所谓"静谧的北方"。

日本大本营为挽回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南方战线。1944年开始，关东军被调出的兵力急速增加，驻于孙吴的第四军所属第一师团被调走，以后第五十七师团亦被调出，因此关东军总司令部内部发令立即中止边境"国防建设"，正式迈出了由攻势转入守势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苏联逐日不断往远东调运兵力，对日开战迫在眉睫。"静谧的北方"难再保持静谧。1945年8月，苏军进攻前夕，关东军勉强凑集了75万兵力，在战力、兵员训练素质、火力装备以及军事工程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就北部正面兵力编制来看："第四军所属师团3、独立混成旅团4、游击队1、独立速射炮大队1、独立野战炮大队1、迫击炮大队1、独立工兵联队1（重交通）、警备司令部1、特别警备大队3、特别警备中队12、特别警备工兵队1、电信联队1、架桥材料中队2、野战筑路工兵队1、兵站勤务中队2、备病院9、伤兵运输小队1……"而且，驻孙吴附近的第一一九、第一二三师团第一级兵员的兵器如掷弹筒、步兵重火器显著不足，炮兵装备也不足。其它均充足，但师团炮兵的机动能力不强。独立混成第一三五旅团系由原驻国境守备队兵员改编而成，装备充足。第一四九师团一门火炮也没有。独立混成第一三一旅团为新编成的部队；装备不足。这两个部队的战

斗力低下。关于这一方面的事实，北原在他的著作《阿穆尔的流血——中苏国境守备队最后的手记》中也有披露："……我们都十分相信，胜山要塞是十分坚固的。然而，我们却都不知道实际上是十分脆弱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在这一关键时刻，就在十多天以前，为了挽救日本本土危机，将这里的主要武器，都从后边运走了。榴弹炮弹堆积如山，然而榴弹炮却只有一门。加农炮虽然有那么几门，却缺乏炮弹，有许多机枪枪座，但是机枪却只有几挺。诸如此类情况，或许当官的能知道，而像我们当士兵的根本不知道。"

1945——
关东军全面溃败

日本战败时关东军驻孙吴部队为第四军第一二三师团，指挥官是中将北泽贞治郎。1945年8月4日，驻哈尔滨北部正面第四军司令官由指挥官上村干男向所属各部队发布紧急命令："如苏军进攻，要立即准备应战，根据作战计划拒敌前进！"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日，关东军第四军在北部正面部署概况是："第一二三师团驻孙吴阵地。所属部队有步兵第二六八、二七〇联队并各属炮兵一大队、工兵一中队。步兵第二六九联队所属有炮、工兵各一个中队。师团炮兵队仅有野炮一中队及二十四榴弹炮4门，预备队有步兵一大队及辎重中队。"其它如霍尔漠津、吴家窝堡、逊河等战略要地均有日军防守。

9日至11日晨，苏军主力渡江攻击，迫近胜武屯、孙吴、瑷珲等日军所据3个阵地，双方炮战激烈。

12日，苏军先遣队及一部主力出现在孙吴阵地面前，发起攻击。

14、15两日，"苏军对日军形成完全包围的阵势，经过激战

后，苏军攻破日军第一二三师团阵地一角。继之，苏军以优势兵力全面进击，日军节节后退。孙吴及瑷珲两阵地日军蒙受很大损失。孙吴阵地日军战死者约500名。”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和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等地的日本侵略军也全面溃败。

（摘自《孙吴文史资料》）

驻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

卜耕三口述　陈兴亚整理

伪满时我曾在大石桥街公所当过伪职员，对驻大石桥日本守备队的一些罪恶活动和守备队在我抗日义勇军痛击下节节失败的史实了解一些，现介绍如下：

日俄战争之后，1907年，日本侵略者以保护铁路及附属地日本居民安全为由，向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沿线各重要城镇派驻了大量日本军，称之为独立守备队，后隶属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管辖。当时派驻大石桥的，系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驻地即现在大石桥拖拉机配件厂）。起初约有一个排的兵力，“九·一八”事变后，派驻的兵力增加到二百多人，最多时约有500人。大队下设4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4个小队，每个小队又下设4个分区。留守大石桥的是第2和第3中队，第1中队在盖平、岫岩、海城一带驻防，第4中队驻防瓦房店。

大队设有队长室和副官室，大队长先后有7任，首任大队长是岩田中佐，继任的有井上、编野、紫田、山口、荣井、南波，都是中佐级军衔。副官先后任职的有4人，他们是川春、葛滕、

葛木、南波，都是少佐级军衔。副官室下设经理室，负责管理医院、通讯鸽、军犬、洗浴理发、木工等；还有情报室，情报室主任是刚本大尉和酒井大尉，情报员有荒木大尉，儿玉大尉和古川中尉，翻译是高其美吉和高木，有密侦12人，他们负责搜集上交我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情报。中队长先后任职4人，有山本、酒井、紫田、米岗、都是少尉军衔。

日本守备队第3大队驻守在大石桥的第2、3中队的武器装备多数是三八步枪，仅有少数迫击炮和重机枪。外有3台汽车。

驻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谓之"剿匪"，经常在瓦房店、盖平（今盖县）、盘山、营口、海城、岫岩、庄河等7个县，镇压我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搜捕我抗日义勇军将士和爱国同胞。

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我抗日武装力量，消灭义勇军，曾于1932年12月上旬，派出关东军多门师团的一个团，伙同辽阳马述山部和营口王殿忠部两股伪军，从四面向岫岩县刘景文部抗日义勇军（约5 000人）大举进犯。驻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也倾巢而出，从西线经接官厅、新开岭进犯岫岩。12月15日进入岫岩城后，大肆搜捕和杀害我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爱国同胞。在北城墙下面，就有30多具受难者的尸体。在大洋河边，日寇一次就枪杀"九龙"等9人，并将北中学校长赵景玉等3人抓走，以后下落不明。1932年抗日义勇军的第五十六路军的一部分，在岫岩县大虎沟一带，坚持抗日斗争。关东军驻大石桥守备队派出两个中队的兵力，前往岫岩大虎沟，包围了我抗日义勇军第五十六路军部分将士。在激战中，我抗日义勇军的1名团长和3名营、连长牺牲，战士也牺牲多人。临走时，日本兵又烧毁了两处民房。1934年，石佛寺村农民董德安（会铁匠手艺）因给抗日义勇军的一名弟兄修理枪支，被人告密，之后被捕到日本守备队，严刑拷打，最后活活被打死。同期建立村韩守安的三

儿子韩三乜，也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大石桥日本守备队抓去毒打后，推到狼狗圈，活活被狼狗咬死，惨不忍睹。1935年春，日本守备队以海城县石柱沟郇家堡子藏有枪支弹药为由，派兵前去逐户搜查，并将群众郇兰亭（原刘景文部下的连长）抓回大石桥守备队，经严刑拷打后杀害。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纷纷起来反抗，海城、营口一带抗日武装队伍也接踵而起。东部山区刘景文领导的抗日队伍日益壮大，河西张海天的抗日队伍揭竿而起，营口、海城、大石桥地区兴起了芦士杰和顾冠军领导的两股抗日队伍，不断给予大石桥日本守备队沉重打击。1931年秋，大石桥守备队去岫岩县，当行至岫岩关门山一带，即被抗日义勇军刘景文和邓铁梅部下的联合伏击，打死打伤日本守备队官兵多人。1932年秋，抗日武装力量"靠天"和"小五龙"率400余人袭击了大石桥日本守备队，打死日寇营长1人，打伤数人，后因"小五龙"负伤而撤退。1933年驻大石桥日本守备队1个中队，在荒木大尉率领下，去河西一带"讨伐"，当行至张家塘（现石佛乡张家塘村）以东的乡道上，被隐蔽在芦苇中的抗日武装发现，当即把骑马的荒木大尉打死，守备队死伤多人。待伪军来援时，抗日武装队伍已胜利转移。驻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在我抗日武装队伍的不断痛击下，狼狈不堪。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东亚战争"，为了应付战争，驻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官兵被陆续调上前线，最后仅剩下300人。

（摘自《营口县文史资料》）

关东军驻九台的第九四一部队

于庆阳

我原名于洪儒，伪满时期曾任过日本关东军陆军军属二等通译职务，直至光复，历五年之久。

九台“西大营”

所谓的九台“西大营”，实际部队番号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辖长春二六四部队驻下九台第九四一部 队。由于本部队位于九台城西部（即现九台粮库一带），因而一般称之为“西大营”。

日本二六四部队在东北驻在情况

该部队分为驻城守备队和筑城部队。守备队是驻在新占区的武装部队，人员较多，配备较强，对新占领区承担警戒、防守、镇压等任务。对占领已久地区不派守备队驻在的，为了他们的军事需要，在交通条件较好的中小城镇进行工程设施建设（如兵营、仓库等），这样任务则由筑城部队来完成。日本侵略军为使进或退不受影响，把物资和兵营有体系地分布到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小城镇，对物资实行分散保管。部队调动上也会使人感到为数众多，来去无常，以免暴露其真相。

九四一部队就是由二六四部队派出的一支分队，到下九台驻在。部队长是日本军官、陆军现役大尉西川承，外有现役军人60余名，“军属”约百名（即有技术军人退役后就职的）。担任通译的中国人3名（其中有我，另两名姓李和姓宋），李、宋

二人担当现场通译，我担当办公室通译，随行部队长和各班长工作。

九四一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建筑军需仓库，保管军用物资，运输分放劳工粮食和被服等事项，没有战斗任务。

九四一部队的机构

部队下设警卫班、庶务班、资材班、输送班、劳务班、运输班、筑建作业班、医务室、军邮信箱、副业组。各班室负责人均由现役军人充当，军衔是上士至少尉级。各班室工作人员大多数是退役职业军人、有技术的日本人和经挑选的加入日本国籍的朝鲜人。当时我在劳务班工作，承担劳工工资结算，劳工出勤记载、粮食被服发放等工作。需要时随同部队长或各班长外出做些和中国人办事时的口语翻译工作。

警备班50人左右，均为现役军人。班长是上士，承担部队内外一切警备值日值宿工作。

庶务班班长佐藤二男，现役军人，准尉。工作任务是掌管部队人事出勤、外出、办公用品收支保管、文书收发、印刷工作。

资材班班长小野太郎，现役军人，上士。工作是物资保管、整理、注册和互相分调统计等事宜。

运输班班长小林四郎，现役军人，少尉。工作是调入调出物资的运输事项。

劳务班班长田中，准尉。任务是对劳工的管理分配、粮食工资被服结算、工人卫生教育的管理。

医务室由日本军医大尉为主任，下有若干卫生工作人员（日本人和朝鲜人），承担军人、军属和其家属的医疗工作。一部分承担劳工的医疗。

军邮室工作是承担军方内部邮投工作和办理储蓄。邮号为九138号信箱。

运输队队长是按运输班命令担任物资运输工作。

副业组长是日本退役军人北守佐一男，承担工作为部队内一切蔬菜、蛋类的生产事项。

建筑作业班长是兵技准尉、入户野芳太郎，负担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工作。

各班主要配备情况

资材班有50延长米木制仓库共120栋左右，分布在队内西北侧。按建筑器材、食粮、被服、日用品、医疗、建筑工程工具等品种分类保管。每库由1至3名日本人负责，配劳工若干人从事体力劳动。运输班有汽车30余台。有轨手推台车专用线轨道1条，长约2 000米（由九台车站至队内），手推台车百台左右。胶皮马车50台，均由地方征集来的；每10台车为一队，每车配劳工2人，均由日本人或日籍朝鲜人负担管理。手推台车每台配劳工2人，每10台为一队，由军方负责使用。

另外有汽车修配厂一所，木工场一所，承担运输工具的修理。有汽车油库若干处在地下。

劳务班，有劳工1 500名、木工100名、大车50台，劳工宿舍15栋。劳工编制以村为大队，大队下为小队，小队下为分队，大队长由征用村政府任用，小队长由部队选拔任用，分队长为小队长任命。无论中队长、小队长、分队长和劳工，都是由地方征集来的。征用期间为6个月。大队长月工资伪币80元，小队长月工资50元，分队长日薪1.65元，劳工日薪1.45元，病休0.40元，雨休0.60元。每月末结算寄至征用单位（县公署动员科）。口粮每日粗粮0.6公斤，病休0.25公斤。被服是冬季一

套棉衣，夏季一套单衣，由劳工自费购买。行李和日用品自备，衣服款于征用期完了后统一由工资中扣除。

劳工情况

当时西大营的劳工都是地方伪政府征集来的。征集政策是以生活较好、人口较多、劳动力较强的户为被征集对象。但事实却不然，凡是来充当劳工的百分之八十是生活不好的贫、雇农。一般地富、中农们生活比较富裕，他们不愿当劳工，能拿出钱来雇用贫苦农民或闲人来充当其任务。一般6个月要花伪币400～600元雇用。日平均劳动10～11小时，口粮每日只吃0.6公斤，副食也跟不上去，因而病者日不下百名。日军对重患者和不治者返还该村，并补充征用。

（摘自《九台文史资料》第一辑）

驻锦州的第七七和第八七三部队

武连勤

自“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不断扩大侵略，但至伪康德7年（1940年）在热河、承德、凌源、朝阳不断发生反满抗日事件。这时，锦州已成日军“治安强化”的后方，为“讨伐”我抗日武装必须储备大量的装备、粮秣给养，便于锦州太和区北郊设立七七部队，建立军用仓库。

七七部队位于北郊单屯，距铁路局机务段道北600米，此地旧称北山。南抵五里，东至炮校，西至道口，为一高大丘陵地带。原为单屯农民种植粮菜之地。1940年秋，日本关东军岗泽

中队开进这一地区，因势圈地，强行占领，然后拉起刺线，安上电网，挖起地壕，形成一院。院内掘地为室，修起黯间简易工棚，然后在锦州地区家家户户要劳工，在市上抓劳工共约300人。入队后，由中国工头看管，在日本关东军监督下劳动。有的打扫平地，有的挖地窨子，有的修盖地下仓库。干活的劳工两头不见日头，吃的是橡子面掺苞米面，喝的是小米粥掺沙子，菜是萝卜干、咸菜。每日限量，所有的劳动人都吃不饱。只有工头吃得肥头大耳。工头多系由富户用钱雇来的汉奸、地痞，被日军收买后十分积极，这些人除了不干活外，还经常欺压劳工，特别是一些新雇来的劳工，由于手头有钱，都被工头用种种勒索敲诈手段弄去。如在工棚内公开设赌抽头，允许到外边溜达，请客吃饭，去妓院嫖妓女都叫他们花钱。劳工穿的是黑衣裳，冬棉夏单，两人一年一件，串换着对付着穿，脚上是胶皮鞋“水袜子”，生活十分困难。所以劳工们编了一个顺口溜：“入进七七八七三，两眼饿发蓝，吃的橡子面，穿的烂布衫，冬天冻发柴，夏天晒冒烟，饿得皮包骨，累得腰发酸，死了喂大狗，被扔老坟圈。”七七部队，为日军机械化部队储油之所，备有各型号、品种军用油，如飞机用的高级蓖麻籽油、汽油、润滑油等。日本在地下修建库房，并在上部预备大量沙土，以备着火扑救。

八七三部队在七七部队之东，位于今北郊市种畜场处，南到电业局变电所小河沟，北至大岭杨屯，西至马家洼，西与七七部队相连，其处所占面积极大，是东西走向之丘陵地带。此库物资极为丰富，为一综合性之军需仓库。它负担辽西走廊所有日军部队之储备，仅被服就有数十种：呢大衣、皮大衣、外衣、毛衣、皮帽、手套、帽子等；食品有米、面、粮、油、罐头、饼干、啤酒、清酒、白酒、香烟、药品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等。由日军三个中队防守，管理严紧，中国工头、日本军压迫

得很厉害，强制中国劳工作军训，唱日本歌。由于劳工受虐待，有在半夜于刺网上搭上跳板逃走的，如果一旦被抓回将受到极残酷之体罚。

“八·一五”光复后，这两块土地回到人民手中，在“七七”部队处建起了铁路局住宅，“八七三”处已成市种畜场。但人民永远也忘不了苦难的过去。

（摘自锦州市《太和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兰旗岭下的关东军大营

李　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阿城这块战略要地，于1936年（伪满康德3年）强占了阿城城东东至兰旗岭、北至小红旗、南至滨绥铁路线、西至阿什河，面积约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利用三年的时间，修建一座关东军兵营。1938年竣工后，陆续进驻了陆军医院、军官学校、炮兵部队、坦克兵部队以及各种附属机构，共有3 000多日本关东军官兵及家属常驻在这里。当时阿城一带的老百姓都称这座日本关东军兵营为“东大营”。当年，一提起“东大营”，人们都有一种恐怖和神秘的感觉。

1936年春，日本侵略者选中了阿城东兰旗岭下这块肥沃土地，派部队烧毁了这一带的民房，用刺刀逼走了在这里居住的三百多农户。尔后，从外地派来大批“勤劳奉仕”队开始兴建关东军兵营。

住在这里的关东军部队，调来，调走，流动性很大。统领

部队的最高指挥是一名少将军官。驻地日军兵营防守严密，四周都挖了约深3米，宽5米的大壕，架设了铁丝网，并有日本士兵站岗巡逻。中国人不能进入，也不许在附近行走或停留。

关东军驻地区域内，设置的情况是这样：

陆军医院，原来叫阿野部队，后来改称三九二部队，有医兵二百多人。主要为日本伤病军人医病，就连阿城一带的日人家属和开拓团员患病，也来此医病。

军官学校，原称知久部队，后改称三〇七部队。它是训练日本士官的地方。来此受训的都是从别处部队选来的士官，在此学校学习2年，出校后任少尉军官，派往关东军各部队。

炮兵部队，称二〇〇〇部队。有炮兵近2千人。设有一个炮群，有几十门大炮，并修筑了一个总碉堡。为了蒙蔽中国人民，他们演习时，从阿城北门进东门（或南门）出，连续巡回，不让人们知道到底是多少人，有多少炮。

坦克兵营，叫岗田部队（后改番号不清）。驻在兰旗岭岗上，约500名士兵。它是用坦克拉炮车的部队。

物资仓库，仓库里装的都是供驻地部队吃穿用的一些物品，以及从焦家岗（七八二部队）总库等地领来的枪弹等。

日本侵略者，为了驻扎部队官兵的生活方便，在这里修筑了军官家属房和军人会馆。每栋房八间住两家，每一家都设有供他们享用的会宾室、饭厅、澡池、寝室、便所。军人会馆，是日本军官跳舞吃饭的地方。会馆有舞女为日本军官伴舞。还有两座二层的独身军官楼和一处食堂楼，是日本独身军官食宿的地方。另有一座少将官邸楼，是兵营最高统帅少将军官的住所，设有岗楼，置兵士守卫巡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进驻阿城，接管了此地，遣走了关东军官兵，兰旗岭下的日本大兵营也随着

日本侵略者的投降而不复存在了。

（摘自《阿城文史资料》）

清原日本守备队的狗圈

张克明

“狗圈”一事，在清原流传已久，其内幕情况，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已41年，至今仍不为人们所详知。揭开“狗圈”之谜，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是颇有教益的。

“九·一八”事变后，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清原。首先来清原的日本侵略军是日本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中队长忽路大尉，他是沾满清原人民鲜血的刽子手，1939年去临江顾问部任少佐、中佐、大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南洋），进入清原县城后，强占清原师中校的校舍为兵营，并将东西路口用三角形的刺线网扎死，严禁通行。偶有误入者，不是被刺刀扎死，就是被扔进“狗圈”喂狼狗，把中国百姓作为狼狗的“饲料”。

当年在清原西街日本守备队院内设置的“狗圈”，就是日本侵略者镇压统治清原人民的工具之一。其状惨不忍睹，不寒而栗。下面请让我记录一段“狗口余生”者的回忆吧。

我叫韩永德，“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人到山沟烧房子，没法种地，我和哥哥等三人参加抗日军打日本。后来李春润的部队失败了，我两个哥哥战死，我回山沟种地。1937年5月的一天，我在清原西小堡挑菜，被警务科的特务郑秀林看见，当天下午金绍元（后当清剿队长被镇压）带6个人，到我家把我抓

去，押送到日本守备队院内，当即把我送进“狗圈”关押，用绳子将我捆在木桩上。我前边的小木桩的槽子里放着些猪食不如的稀糊状的东西，不用吃，一闻也要呕吐的。傍晚一个日本人，两个翻译一个姓金是朝鲜人，一个李翻译是中国人，把我从“狗圈”里拉出来，进行审问，叫我承认是抗日军，并叫我交出组织人员名单。我在审讯中一言未发。那个李翻译用柔道的方法摔我，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并说：你不说，送“狗圈”喂狼狗。经过审讯折磨见我还是不说，就把我送回“狗圈”过夜，这时的“狗圈”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阴森森的。关着的十来个人都已经奄奄一息了。有两只狼狗在里边趴着过夜。大约在下半夜，狗也睡了，我轻轻动一下，狗没咬，我动一动手脚，并没有绑，我挪到“狗圈”出口处门也没关，我轻轻爬到“狗圈”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我猛力翻过墙就是一所学校，我一口气跑到筐子沟，一想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不几天我找到三十道河，参加了抗日联军。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光复了。冀热辽军区第二十四旅到清原扩军，朱云龙参加到第六十九团任营管理员时，当时部队驻在清原西街学校院内（现天桥小学），即原日军守备队驻地。由于部队一时烧柴供不上，朱为筹集烧柴，找到后院西墙根处，发现一个大地窖，是用铁道枕木垒砌成的，里面潮湿阴暗，气味难闻。地窖约 2 米多深，长宽约 40 余平方米，里面分 40 余个小格子，每个格子不足 1 平方米，一个格子里有 2 个木桩子，大的木桩上有绳索和铁环子，小柱上有个小木槽子，恰似喂鸡的食槽，是给“犯人”装食物和水的。当朱下到窖里，这一切清晰可见，并发现累累白骨和生锈的刺刀枪管之类的东西。这个窖上盖与地面一样高，两边是通道，共分 4 行，每行 10 来个格子，中间有电灯，全部装满能容纳 40 余人。朱元

龙当时意识到，这就是人们传说的“狗圈”。由于没烧柴，将这个“狗圈”拆了，共拆除铁道、枕木二百多块。后来这个“狗圈”也就填平了。虽事隔40余年，我想仍会有我无辜同胞的白骨霉在地下，作为侵略者罪行的见证。据了解，当时日本守备队养了四五条狼狗，是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的。

清原的另一个“狗圈”是在日伪清原铁路警护团内设置的，是清原日伪警护团审讯“犯人”半地下式低矮的木板房，老百姓管它叫“狗圈”，人们接近木板房附近，便能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腥臭味，看到堆放在地下血迹斑斑的刑具。其中有一个大木棒子，棒子靠背上有一个木箱子，将“犯人”的头放入木箱里，将头、胸、大腿、小腿全部用木棍固定起来，使人一点也不能动弹，然后，用煤油、辣椒粉加水，用胶管灌受刑人，再叫“狗奴”(喂狗人)拉来狼狗参与审讯，叫狼狗撕破人的衣服，咬四肢、腹部，直至把人折磨得血肉模糊而死去。日本兵和汉奸，就是这样拿中国人民的生命当儿戏，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比起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日伪时期在沈吉铁路线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火车好坐，清原难过，不是喂狗，就见阎罗。”

日本侵略者在清原的罪行，何止这些，除“狗圈”秘密处决我们的同胞外，他们还在驻地大操场上公开杀人，每次杀人都命令中国人来到杀人场，看日本兵屠杀中国同胞。从1931年入侵到1939年日本兵从清原撤走，这期间每周要杀一次人，多者一二十人，少者八九人不等，凡被杀者都冠以“反满抗日”罪名，实则都是山沟里无辜农民。据查清原的日军，专门用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训练日本新兵。其残暴手段可想而知，被害者的尸体大都送往稗子沟的万人坑里埋起来。

（摘自《清原文史资料》）

关东军的特别大演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

6月24日决定了关于《国策纲要》的陆海军方案。对北方虽已决定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的准备阵，但东条陆相则表示出解决北方的意愿。

6月25日，田中第一部长对适应德苏开战新事态所讨论的事项记录如下：

一、准备对苏武力解决的第一阶段，在两个月内准备在满警戒态势（16个师团基干）问题。

二、迅速动员在满部队，并且动员派遣在朝鲜的第十九、二十师团，在内地的第五十一、五十七师团，以及部分军直部队（笔者注：师团以外的军直属部队，也简称军直）问题。

三、动员库页岛混成旅团及第七师团问题。

四、关于航空部队方面，迅速动员航空通信部队问题。

五、关于国土防卫方面，编成和派遣北千岛要塞守备队，以及库页岛国境守备队和国土防空问题。

六、重新研究充实军备问题。

七、按原订计划促进南方准备问题。

八、促进所需船舶的征佣问题。

九、内地、朝鲜、满洲铁路之向战时体制转移问题。

十、临时编成师团的整备问题。

6月25日，虽与《国策纲要》分开，决定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项》，但对北方施策，也在节节顺利进行。

6月26日关东军以该军参谋长吉本贞一中将的名义，对所属下达了通知："随着德苏开战，在有关时局的事项中，为了处理业务需要与平时事项截然区分者"，均应称为"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这是从计划保密考虑的，并向中央作了报告。以后中央与现地均以"关特演"作为实施对苏武力准备的总称。

6月18日预定对苏作战兵力为25个师团，但对苏行使武力已决定采取等待时机成熟的方针，因而考虑按下述基本设想，大致使用22个师团的攻势方案。陆军统帅部或许是根据6月26日前后的德苏战况，认为有此可能性。

一、对苏行使武力，一般说来，是以苏联在远东全部战力减少一半，作为发动武力的条件。即设想在8月上中旬前后，如能判断形势发展使远东苏联（包括库页岛、堪察加方面）的地上军队（30个狙击师）减半为15个师，航空（飞机2 800架）及其他军直部队（坦克2 700辆）减为三分之一时，则可从9月初发动武力进攻。

二、以上形势是否出现，主要在于苏联欧洲战局如何演变。德苏战的全局是否以短期战结束，抑或陷入持久战，至8月中将可作出判断。

三、远东苏军的补给，只靠储存的弹药、燃料及其他物资，估计其数量大致可用半年。

四、对付苏联远东军的15个狙击师，我方所需兵力估计如下：

日苏两军每个师（师团）战斗力的对比，在动员时加上军直部队的战斗力，估计为一比一。但远东苏军的整备情况，大致为应急派兵的程度，测算其战斗力，大约等于我动员师团的七成半。因而15个狙击师的战斗力不过相当我方动员师团的11个师团强。为了保持对苏大约两倍的战斗力，迅速将其击破，大

致需要22个师团。

五、战争与作战以急袭为根本，充分利用进驻法属印支南部，强行对华作战，外交及言论欺诈，缩短集中时间等手段，以期在最短期间内结束作战。

六、警惕美国的动向，研究处理堪察加及其东方的科曼多尔群岛的方法。

秘密准备与动员对苏行使武力

德苏开战后约一星期，外电报道了德军快速进攻的消息，但未能达到决定性阶段，而且出乎意料，远东苏军西调的动向并不明显。6月28日据参谋本部冈本第二部长向部长会议报告，迄今为止的西运兵力，空军十几个中队，装甲兵1个军（坦克两个旅、装甲1个旅、车载两个旅），狙击3个师。

此外，本日到京的关东军作战参谋久米川好春中佐，也就苏军情报与关东军的实况作了如下报告：

苏军从东正面向北正面，更向西正面逐渐加强警戒，德苏开战后侦知敌情极为困难。苏军于开战后虽未增强远东兵力，但西运的迹象也不明显。

开战以前确有西运情况。关东军根据年度作战计划，正在进行以攻势为基础的紧急准备。关于作战计划的具体化问题，正等待中央新的指示。

现在的警戒措施，所属部队大致按平时配置采取待机姿势，对苏联空军的警戒特别重视。对航空情报队下达了展开命令，战斗队正在邀击态势担任警戒。

如苏军进行大举空袭，立即进行迎击。但禁止在国境附近飞行。军队防空虽已加强，但民间防空尚未发布应急防空命令。

国境的警备。命国境守备队实行紧急战备，已命令一部进

行战备。

7月1日举行了参谋本部第二课与陆军省军事、军务两课的研究会，对于促使参谋本部下动员令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当天，新任第二课长服部卓四郎中佐作了如下说明：

关于德苏战争的前途问题，由于吃了在中国长期战的苦头，过分认为对苏战争将成为长期战。但不能因此即谨小慎微，畏缩不前。

考虑在北满对苏作战的特点，其作战期仅有两个月，不久即将进入冬季。因此，必须以秋季攻势为目标作准备，不可错过时机。希望在8月份内进行作战准备。如待来年时机成熟，美国插手，则构成极大威胁。

迄今为止，远东苏军的西调为3个狙击师和1个机械化军。对苏作战兵力的整备，第1阶段的目标为16个师团基干，第2阶段的目标为20到二十几个师团基干。单靠现在满洲、朝鲜的14个师团，甚至不足以保卫满洲，最小限度的防卫兵力也需16个师团。希望由内地增派两个师团（51D、57D）。第2阶段攻势兵力预定为二十几个师团，上述16个师团为攻势的核心兵力。

应速下开战准备决心，然后再下8月份开战的决心。作为统帅命令的步骤，应速下作战准备的命令，然后下达作战命令。运输军队每天派30列军车，要运输20个师团基干即需四十几天。希望自7月7日至10日之间在开战准备决心下，下达动员令。如7月上旬不能下此决心，则秋季作战即归无望。

服部第二课长反复强调了参谋本部作战当局一贯的设想。尤其是作战开始兵力二十几个师团的正式动员必须迅速纳入轨道。但服部课长在此却使用了“开战准备决心”的新词。这是根据陆军省方面主张的“正式动员需在决意开战确定之后”的阻力，设置所谓“开战准备决心”的一个阶段，以便决心进行

正式动员。其用意是如不将《国策纲要》的武力准备推进至此地步，则不能面对有利形势，解决北方问题。

对服部课长的说明，石井秋穗中佐（军务课高级课员）提出："开战宣言将如何？如行使交战权，恐将受到美国的全面禁运。"西浦进中佐（军事课高级课员）提出："苏联空军的首次攻击不知何时到来？航空兵力与地上兵力相比岂非更大弱点？如果动员地上部队，有极大可能首先受到打击。苏联大使馆的家属正在撤退。"

东条陆相虽对参谋本部作战当局的设想大致同意，但说不要刺激苏联，暂以临时召集方式动员约10万人，以后的措施另作决定。

于是7月1日主要对本土要地防空部队下达了临时召集令，继于7月3日奉命根据要塞紧急战备下令进行准备，临时召集了要塞高射炮部队主要人员。

然后以大陆命第505号命令北朝鲜的罗津和永兴湾要塞进行正式战备及北千岛要塞、关釜联络地区各要塞进行准战备。

总之，对于秘密进行对苏武力准备，在其内容上意见不一致，而且如要避免刺激苏联，正式动员等武力准备方面，即不得不受到限制。

关特演的发动

参谋本部作战当局以"百号"作为16个师团基干的代号，有"百号动员"、"百号运输"、"百号态势"等等称谓。7月7日下令实施第1次动员（通称"特动第1号"），确定13日为动员的第1天。

7月7日的第1号动员，首先动员在日本内地的300多个大小不等的军直部队及航空部队，同时于国内临时召集驻满、鲜

部队的整备人马。以此使关东军兵力约增加25万，共达60万人。7月16日以第102号动员令，又增加了第五十一、第五十七师团及军直部队、航空部队等达到约450队，85万的态势。

7月7日下午，在发布第101号动员令的同时，随着关特演的发动，将中央统帅部的意图通知了关东军。

（摘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

龙泉等人对"关特演"的证词

龙泉中将来到证人席上。1942—1944年他指挥关东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在这之前，他多年从事满洲的战略铁路建设工作。

问：您知道《关特演》计划吗？

答：鉴于德国已发动侵苏战争，《关特演》计划规定扩大在满洲的军队。根据这个计划，向满洲调动30多万军队。《关特演》计划是侵苏战争计划的秘密代称……

问：在满洲修筑的铁路能保障日军1941年侵入苏联领土吗？

答：是，能保障……兵力可以迅速调动。铁路的布局是参谋部作战部要求的。

公诉方向法庭递交了一份能够证实证人关于《关特演》计划证言的日本秘密文件副本。这份文件指出，要有大量掌握俄语的译员："……必须在日本所有外语学校以及哈尔滨大学进行俄语译员的补充培训，以便开始实行《关特演》计划时用他们

作军事译员。1941年9月16日。”签字：梅津。

接着公诉方又传唤了一些证人。

下边是先在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后于1940—1944年在日军参谋部作战部工作过的濑岛中佐的宣誓书面证言：

“从1940年1月至1944年8月，我在参谋部工作，这期间我履行职责时开始了解到我宣誓作证的下列事实：

在1941年12月我担任参谋部一部二课正式职务以后，由于调动军队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更详细地了解作战计划，因为计划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调动军队时，我有责任考虑有关作战方向的作战计划。这样，我就知道了1941年和1942年的对苏作战计划。”

然后，濑岛详细地陈述了那些规定要占领苏联远东领土的计划的内容，并归纳说：

“1942年，参谋部一部制定了新的对苏作战计划，直到1944年春未作修改。我不止一次看过这个计划，并概略记得它的内容。像以前几个对苏作战计划一样，1942年的计划也是进攻计划。对苏联的战争应当突然开始。”

而后，濑岛讲述了准备实施《关特演》计划的措施：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我知道已采取了下列加强关东军的措施：

1. 1941年夏在参谋部一部，我亲眼看到天皇关于该时期向关东军调派两个新步兵师的敕命的手抄本；

2. 1941年夏在参谋部一部，我亲眼看到当时印发给参谋部各部的关于把关东军的全部师均改为战时编制的天皇军事敕命的印刷本；

3. 通过在参谋部读过的文件我知道，1941年夏日本已进行了加强关东军的动员。动员的人数达30万。这是我1942年统计

关东军实力时了解到的。动员工作很秘密，我是凭个人观察才知道的，因为禁止像平时那样为应征者举行隆重的欢送活动。我因身在东京，不止一次看见由应征者组建的军队悄悄地走过大街，奔向车站，偷偷地开走了。”

公诉方递交了木田指挥将军用日语写的关于1942年战争计划的证言。1941—1944年，他指挥关东军的一个师团，从1944年10月起升为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他的证言详细地讲述了关东军根据《关特演》计划应该得到的兵员补充情况及兵员来源情况。然后，木田又谈了那个计划所规定的战斗任务。他继续归纳说：

“进攻计划规定夺取整个远东，直到贝加尔湖。日军参谋部同关东军司令部一起制定的1942年进攻苏联的计划大致也是这样的……只是由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各条战线均陷入了困境，才未能实现那个计划。”

公诉方还递交了经苏军总参谋部证明无误的两份日军文件的照像复制本。第一份文件是关东军参谋长在1941年12月师团指挥官会议上的讲话。下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两段：

“……为了完成不断进行的对苏作战准备工作，不仅关东军，而且第一线的每个军和兵团均应竭尽全力注视苏联和蒙古军部署经常出现的变化，一旦有必要……就有可能迅速查明形势转折时机的征兆。

因此，要求所属各部队确实掌握其负责地域内的苏军和蒙军情况，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角度来看，这是极端必要的条件。”

文井大佐来到证人席上。他是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的军官。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听过那次讲话，文件中准确地反映了讲话的内容。

伊万诺夫上校给他提了一个问题：

“您能否证实梅津司令官听过关东军参谋长的讲话而且表示赞成?”

答：这个文件曾得到梅津司令官的赞成……

这次给文井大佐出示了另外一份照相复制本—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4月26日，即中立条约签字后13天，在师团指挥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文井承认这个标记有“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是准确无误的。下边就是有代表性的两段：

“如上所述，我们针对苏联所做的战争准备工作同过去相比，不仅不能有任何改变，而且相反，还要加强……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属下人员全面理解那个条约(指中立条约——作者)的真正含义。

因此，必须……日益加强并扩大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准备在对苏作战中夺取一定的胜利……”

这又一次证实，苏联根据情报已经知道，日本如何看待中立条约。

为了使法庭能够估价日本为进攻苏联所进行的实际战争准备的规模和强度，公诉人递交了下列材料：

“1941年末——1942年初，日本陆军几乎有二分之一、空军几乎有三分之一集结在满洲和朝鲜。

到1942年1月1日，关东军已达110万人，驻朝鲜日军已达13.5万人。驻满洲和朝鲜地区的日军1942年初的装备有：坦克1 000辆，火炮5 800门，作战飞机1 700架。当时日本陆军的装备总数是：坦克2 260辆，火炮12 270门，作战飞机5 000架。

在靠近苏联的边界，日军构筑了17个筑垒地域。筑垒地带长800公里，共构筑了4 500多个永备筑城工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满洲修筑了近3 000公里铁路、300多个军用仓库，这些仓库可储存30万吨弹药、1.2万吨炸弹、25万吨油料。1941—

1945 年，日军在满洲地区修建了129 个航空基地和起降场，其中有42 个机场。营房总量，1941 年能容纳39 个师，而1945 年则能容纳70 个师，总人数可达150 万人。”

辩护人企图利用某些细节对这些材料提出异议，但未能得逞。他们还极力想使人相信，这些昭然若揭的侵略性军事计划具有“战略性防御”目的，结果也未如愿以偿。苏军总参谋部的文件已转交给法庭：

“筑垒地域的布局和性质显然是进攻性的．因为其纵深很小，而且都修筑在靠近苏联的边界的作战方向上．这些方向均指向苏联境内的重要作战目标。”

是的，作战计划可以烧毁，但苏军1945 年8 月胜利进军中所夺取的筑垒地域、机场、战略性铁路、军营却无法从地面上抹掉。

总之，用法学语言来说，日本破坏中立的表现就是采取了许多应当被看作是蓄谋侵略苏联的行动。这种蓄谋已久的犯罪准备由于不依被告人为转移的因素而未能转化为侵略战争。苏联当时已经知道这一切。

（摘自《东京审判》一书）

侵华日军士兵的恐惧与残暴

张建文

1932 年我在洮南县“东昌泰”做店员。该店是军阀吴俊升开设的钱粮代理店，兼典当行业。当时在该店驻居一个日军司令部，经常轮替有上百名的日军补充兵源，在这里短训、装备

后送往前线。前沿阵地是江桥，隔江相望是马占山指挥的抗日部队。该部队的炮兵，天天是弹无虚发地摧毁南岸日军的堡垒，使日军时有伤亡。驻洮南的军阀张海鹏，是最早投靠日本的奴颜婢膝的大汉奸。他仰仗日军势力，成立了一个“混血儿”的满蒙政府，自封为主席，挂出上红下黄的所谓“国旗”，自己印纸币，维持经济自给。他的伪军配合日军，妄图通过江桥攻占黑龙江，不过每天都断送一些官兵，陪葬日军，连他得力的徐团长，也在巡视中踏上地雷而送命。

同年的新年时分，又由日本国内补充一批新兵源来，开到“东昌泰”短训并度年假。这批近百名日本新兵，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这时我们店里也有一些青年店员，有时和他们接触，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顾民族间的尖锐矛盾，以同龄人的天真性格，沟通了无瑕的心境。碍于语言不通，他们有的想用英语和我们谈，而我们也不懂，只好用习惯的“协和语”，如“大大的”、“慢慢的”、“你的”，“我的”、“顶好顶好”……等等，加上手势和表情，加以理解。新年狂欢之夜，他们多是挂着泪珠唱歌。用半通不通而又十分痛恨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因战争被强迫离开可爱的校门和母亲身旁来到满洲送命的。我们假装说，“等战争结束，回家去好好的”。他们回答说，“不行，不行”并用手比划：子弹射到脑袋上，身子倒下装在火车里，一列一列地送到四平街去火化，骨灰盒可能回国！他们伸出大拇指说：“马占山将军厉害。”这些青年日军怀里都有一个铅印的小册子，拿给我看。通过其中的汉字，我们约略看出，册子里说马占山已在战斗中被击毙，并附有几幅“马占山残尸”和“遇难地点”的照片，加上文字说明。我们看完后说：“这回害怕的没有了。”他们晃着头说：“撒谎大大的有，马的不能死。”说话的表情十分颓丧。

其实，我们天天听到马占山军队的胜利消息。他们英勇战斗，行动机敏，大家都称马占山为常胜将军。日本军国主义者，挖空心思，以假乱真，欺骗士兵，注射强心剂，都是徒劳的。日本“大和魂”与“武士道”精神，在马占山名字面前，早已丧魂落魄了。

在洮南县东部农村，有一股叫红枪会的民众武装，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矛头指向日伪军政人员。这些人穿便衣带红袖标，由大法师领导，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驻“东昌泰”这个日军司令部，便调集大批日军加强武器装备，由张海鹏的汉奸队伍作向导，乘深夜搞突然袭击。当夜归来，“胜利品”堆积在大门洞里，因无日军看守，我们好奇地偷偷观看，只见大车上装着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一个大筐里几乎装满割下来的人耳朵。据日伪官方宣称，他们此次围剿，红枪会全被消灭。所割人头是大小头目，耳朵是每个死尸上只割一只，以此为据向上级请功领赏。其实由外乡来人说，有许多安份守己的农民被杀害，并被割掉耳朵。日军屠杀无辜的罪行，令人发指。

（摘自《法库文史资料》第四辑）

在吉林毙命的日军将领

薛春德　张子申

吉林，有着与朝鲜隔江交界的广阔而漫长的边界线，日本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以朝鲜为跳板侵入吉林，扩大侵略战火。日俄战争后，日军驻扎于吉林许多地方，奴役、压迫吉林人民数十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块圣洁的土地上才除去了侵

略者。日军占领吉林期间，曾在白城子建航校，训练屠杀中国军民的空中杀手。据日军史籍所及，在吉林共有3名日军将军毙命，1名事故死，1名被击毙，1名自杀。

宝藏寺久雄中将

1940年2月26日，侵华日军关东军白城子陆军飞行学校校长宝藏寺久雄少将，在吉林省西北部地区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毙命，死后晋升为陆军航空兵中将。

宝藏寺久雄，日本佐贺县人。1911年5月27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飞行科，同年12月16日，授予航空兵下士官军衔，开始在陆军航空部队服役。1921年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第33期，晋升为航空兵大尉。1934年12月10日，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飞行科教官，次年8月1日，累升至航空兵大佐，同时调任日本浜松飞行学校教官。1936年8月1日，任侵华日军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第九飞行团飞行第十战队长。该战队辖侦察机、战斗机、轻型轰炸机各一个中队，分别驻守在海拉尔、齐齐哈尔等机场。1937年11月1日，升任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参谋长，同年7月15日，晋升为陆军航空兵少将，同时调任该飞行集团第七飞行团长，该飞行团辖飞行第十二、第一、第十五战队，共3个重型爆击机中队、3个战斗机中队、3个侦察机中队，分别驻守在平安镇、公主岭、将军庙、新京（今长春）等地的机场。先后参加了对热河、内蒙古、察哈尔、河北等地的航空作战。1939年6月，又参加了诺门罕地区的作战。

6月22日，第二飞行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令第七、第九、第十二飞行团全部投入诺门罕作战。24日，苏联空军约60架驱逐机越过中蒙边境，企图袭击日军机场，宝藏寺少将急令飞行第一战队强行起飞，进行迎击作战。27日晨6时，根据“二飞

集作命甲第38号”命令，宝藏寺率飞行第十二战队，与第九、第十二飞行团各一部，约有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120架，袭击了苏军托木斯科航空基地，据日军战史记载击落击毁飞机约120架。当晚，又空袭了三贝斯地区。

7月1日，宝藏寺被任命为白城子飞行学校校长，不久后返回日本国内，进行该校的筹建工作。1940年1月，正式迁入中国东北白城子地区，并很快投入飞行训练，直至毙命。生前曾获得金鸡三级军功勋章一枚。

森玉德光

1944年7月25日，侵华日军吉林白城子教导飞行团长森玉德光少将，在中国东北边境空战中被击毙。死后晋升为陆军中将。

森玉德光，日本兵库县人。1915年5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航空兵科，同年12月25日被授予下士官军衔，开始军事生涯。1939年8月1日晋升为大佐，任飞行第四十四联队长，属中国派遣军直辖，曾率部驾机轰炸长江流域和大西北各大城市及中国守军的战略要地，仅1939年12月26日至28日轰炸兰州中，就和部属投弹二千多枚，炸死市民一百二十多人，炸毁房屋七千多间，造成群众一千八百多人无家可归。1941年8月1日任锋田飞行学校教官，对飞行员进行侵略中国的强化训练。1942年10月1日任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一独立飞行队长，率队驾机轰炸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乡，并与盟军多次空战。1943年2月12日在配合日军攻占芦苞、沙洋作战中，炸死中国军民数百人。3月16日配合日军第四十八师团进攻雷州半岛作战中，先后轰炸遂溪、赤坎、寸金桥等地。5月11日，再次率队驾机配合第四十八师团攻占广东东江惠阳、博罗等地。6月18

日，奉调到东北吉林白城子，任白城子教导飞行团长，一面对飞行员进行强化训练，一面轮流率领教导飞行团的飞行员参加侵华作战。1944 年 3 月 1 日晋升为少将。7 月 25 日，在东北边境空战中驾机被击毁坠落毙命。

中村次喜藏

1945 年 8 月 18 日，侵华日军第一一二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在吉林省珲春畏罪自杀毙命。

中村次喜藏，日本东京市人。1912 年 5 月 18 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 24 期步兵科，同年 12 月 24 日被授予下士官军衔，开始军事生涯。1938 年 3 月 1 日晋升为大佐，任预备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长。1939 年 8 月 1 日任步兵第一二四联队长，进中国广州地区侵略作战。8 月 23 日率部在宝安集结，作攻击香港的准备。10 月在军田、花县等地攻击中国军队，激战达 32 天，杀害抗日军民数百人。11 月，驻广州地区日军第二十一军为截断中国军队的西南国际补给线，进行南宁作战，战至 12 月 28 日，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团不支，请求支援，中村次喜藏奉命率部增援，使得日军再次攻占南宁东北要隘昆仑关。第一二四联队进占南宁后，中村纵容部属劫市，残杀市民，强奸妇女。1940 年 12 月 2 日任奉天（今沈阳）预备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专事培养残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1941 年 3 月 1 日晋升为少将。8 月 1 日任留米预备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3 年 3 月 1 日任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长，再次进入中国华南，在汕头、佛山地区进行治安肃正作战。5 月，率部“扫荡”东江惠阳、博罗。9 月，进犯四邑，攻陷台山、单水口、三埠。台山地区在中村次喜藏旅团的反复“扫荡”和天灾中，一年内死亡民众 20 万人。1944 年 6 月 27 日晋升为中将。7 月 14 日任第一一二师团长，从华南到华北，率

部在吉林省珲春地区进行治安肃正作战，作阻击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的准备。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中村率部对苏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8日，中村次喜藏慑于被押上法庭受到制裁，遂在珲春第一一二师团战斗司令所自杀毙命。

生前曾获金鵄三级、四级勋章各一枚。

二

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哈尔滨及热河

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及哈尔滨

姜克夫

一、嫩江桥之战

日本关东军派张海鹏侵黑失败后，即于1931年11月4日以满铁守备队千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以保护修桥为名向大兴站进攻。马占山到达黑省垣后，即调哈满线护路军苏炳文、张殿九、程志远等旅及黑省东部的吴松林骑兵旅以及由洮索路垦区退入黑省的苑崇谷旅等3万余人布防于嫩江北岸各要地，击退了铁道守备队的进攻。11月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又派多门二郎师团长率其第二师团等野战军向黑军阵地发动进攻。马占山亲自督战，苑旅与日军在大兴展开激烈战斗，以后阵地全被炮火摧毁，马遂下令退守三间房阵地。12日，关东军复调朝鲜师团的铃木旅团增援，再次发动进攻。在敌人飞机轮番轰炸，数十门大炮轰击和坦克冲击下，黑省军队陷于苦战，苏旅团长吴德林受重伤，马占山在阵地枪杀擅自后退的团营长2人，亦制止不住军队的退却，号称耐战的苑旅三间房主阵地最后亦被突破。马占山坚持至18日，终因后援无望，遂下令各军撤退。日军多门师团于19日进入齐齐哈尔。嫩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现将中日两军嫩江桥之战的战斗序列列下：

甲、中国军队方面

黑龙江军总指挥马占山　副总指挥谢珂

黑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张殿九

黑龙江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
黑龙江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
黑龙江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
东北骑兵第八旅旅长程志远
东北屯垦炮兵旅旅长苑崇谷
黑龙江督署卫队团团长徐宝珍
黑龙江督署炮兵团团长濮炳珊
黑龙江督署教导队大队长王兰田
乙、日本军方面
攻黑指挥官多门二郎中将
第二师团第三旅团长长谷部
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长天野
满铁守备队队长森连
张海鹏伪军方面
东北蒙边督办张海鹏
第一支队司令徐景隆
第二支队司令鹏　飞
第三支队司令刘茂义
第四支队司令张俊哲
第五支队司令张质明

张海鹏原仅有徐景隆、鹏飞两个正规团，其余均系“九·一八”事变后在辽北收编的胡匪。

二、双城之战

双城为哈尔滨门户，原驻有东北陆军二十二旅，因旅长关庆禄附逆，张作相提升团长赵毅为旅长。于深澂打败冯占海后，曾部署刘宝林旅于双城东十里铺监视赵旅。为了保卫哈市，赵

毅迅速消灭刘宝林。赵毅奉李杜命令，于1932年2月1日拂晓以突然袭击消灭了刘旅，然后将部队展开，阻击由长春北上的关东军天野旅团。赵毅部署刘德才团在老少沟破坏铁路，赵率该旅主力在双城站埋伏。不料刘德才投敌，敌人得以顺利通过松花江、拉林河，当晚8时天野的先头部队即到达双城车站。当日军在车站架枪取暖用餐时，突遭赵旅机枪和步枪的密集火力射击，天野部队猝不及防，死伤六七百人。这是继苑崇谷大兴阻击战后东北正规军抗日的又一胜利。但赵旅与敌激战一夜后，未及时脱离战场。次日拂晓，由长春开出的多门师团主力到达，即联合困守站房的天野部队向赵旅反扑，并有飞机20架在赵旅阵地轮番轰炸。哈尔滨派出的援军王孝芝团发现敌机即逃回哈市，致陷赵旅于苦战，阵亡团长吴永和、营长苏成翙等700人；赵遂率残部退往哈市。

双城失守，哈埠门户洞开。日军大队在多门师团长指挥下向哈埠进迫。2月3日哈尔滨保卫战开始。李杜、丁超任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将邢、赵、李、丁4个旅布防于哈市外围各据点；冯占海率本部5个营和张作舟残部担任敌后迂回。4日拂晓，两军开始接触。当时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早被日人收买，从内部进行瓦解，而丁超及邢占清又幻想国联干涉，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后4个月之久迄未在驻地构筑工事，战事发生又值隆冬，地冻三尺，临时无法构筑工事，军队只能利用民房和围墙做掩体与敌人搏斗。处此不利形势下，哈尔滨遂于5日陷敌。李、丁、邢三旅退往依兰，冯占海团退方正，赵毅旅退延寿。

哈尔滨外围之战，是张学良东北军和日军在东北进行的最后的一次正规阵地战。自此以后，东北大城市尽失，所有正规军和义勇军只有转入农村和日军进行游击战了。

现将哈尔滨之战双方战斗序列列下：

甲、中国军方面

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　杜　副司令丁　超

东北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赵　毅

东北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　杜

东北步兵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

东北步兵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

东北步兵第二十八旅旅长丁　超

吉林督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

乙、日军方面

指挥官多门二郎中将

第二师团第三旅团长长谷部

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长天野

（摘自《民国军事史略稿》）

与马占山的决战

（日）林义秀

编者按：本文作者站在侵略者的立场，将我国抗日武装污蔑为“匪”或称之“敌军”，望读者参阅时加以鉴别。

1932年4月上旬，伴随马占山的背叛，北满形势告急，不论是吉林省还是黑龙江省都迫切需要关东军的援助。

5月中旬，关东军乃命令第十师团在松花江下游三姓方面发动攻势；以从上海撤回的第十四师团主力扫荡中东铁路东部沿线（掖河以西）的反吉林军，策应第十师团，并令该师团之一部保卫哈尔滨，防御松花江以北马占山军的进攻。

当时，为警备哈尔滨而留下的部队有：平贺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二十八旅团司令部、步兵第十五联队（缺第一大队）、步兵第五十联队（缺第一大队）、装甲汽车队、战车队、汽车炮兵队等。该部队将一部派往哈尔滨对岸的马船口，警戒呼海铁路方面。自5月14日以来，马船口部队屡屡遭受占有优势之敌骑兵的袭击，不过，经常是给以敌军很大杀伤，将其击退。但是，呼兰方面的形势颇为严峻，吴松林骑兵旅的大部分人都是响应马占山，掀起反满抗日的高潮。吴松林麾下之邓文团长纠集各地的保卫团、土匪等在海伦召开军事会议以后，企图乘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一行抵哈之机夺回哈尔滨，为此大举南下，越过呼兰河，伺机夺取哈尔滨。

关东军为在呼兰河右岸捕捉、歼灭敌军，5月23日命令第十师团一部在蜚克图（呼兰东16公里）附近登陆，迅速向呼兰附近前进，以切断敌军退路。同时，在哈尔滨由平贺少将指挥的主力部队自松浦方向猛烈攻击前面之敌。22日夜，该部队紧急集合，向松浦及庙台子附近前进，准备攻击。24日拂晓，踏着泥泞前进，追击败敌，当日一举占领呼兰。

第十四师团主力完成在中东铁路东部线掖河方面的作战，于5月24日夜返回哈尔滨后，马上遵照关东军的命令，接受迅速向呼海铁路方面进击、扫荡敌军的任务。25日晨，立即向呼海铁路挺进，开始该方面的作战。

同时，步兵第二十七旅团平松少将指挥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第五十九联队（缺第二大队）、野炮兵第二十联队第三中队等部队向中东铁路西部线前进，与黑龙江省军协同扫荡肇东附近的李海青军。为此，25日晨由哈尔滨出发，27日抵达宋站，28日由该地出发向肇东前进。29日，攻击盘踞于肇东的约2 000名李海青军，并将其击退。30日，集结于安达站，与江

省军合作在附近进行扫荡。其后，6月4日离开安达，向齐克铁路方面前进，6月8日抵达克山。以后，该部队将主力置于克山，担任江省北部的警备任务。

向呼海铁路挺进的第十四师团主力，协助由呼兰向海伦急追敌军的平贺支队，于5月26日进入呼兰。

5月15日，马占山由黑河出发，经北安镇向海伦前进，呼海铁路沿线的残败之敌亦向海伦方向退却。5月30日，马占山进入海伦，其主力排成一字长蛇阵自海伦南下。但是，平贺支队于海伦以南地区一举击败马占山军，6月1日进入海伦城。

第十四师团主力接续平贺支队北进，5月31日进入绥化城，尔后在当地扫荡呼海铁路沿线的兵匪，恢复该路交通。

5月30日，关东军飞行队连续轰炸海伦，31日在该地区的马占山向北逃窜，其后于海伦西北、拜泉东北及克东东南地区继续指挥吴松林、邓文等进行反满抗日活动。第十四师团以一部继续警备呼海铁路及齐克铁路，其主力开始围歼马占山军。为此，命令平贺支队（以步兵第二十八旅团为基干）于6月12日从海伦出发，以其主力向海伦——通北——北安镇一线推进；命令平松支队（以步兵第二十七旅团为基干）主力由克山向克东附近前进，互相策应，以歼灭敌军。两支队协同击溃若干敌军后进入克东，但未与马占山主力相遇，6月19日各自返回克山及海伦附近。

6月16日左右，马占山在距海伦县城西南60公里的通肯河右岸之利金屯附近与各部将领聚会，讨论将来的军事形势。关东军侦察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第十四师团继续进攻马占山军。该师团将新近配属的骑兵第一旅团及从日本增援的骑兵第十八联队调至克山附近；命令平松、平贺及青冈三个支队于5月26日前占领拜泉、兴农镇、三道镇及望奎等地，以作为攻击的

据点；命令骑兵旅团（骑兵第十八联队、汽车中队及所属战车队）于26日前进入明水，尔后向三道镇方面前进，以谋求与江省军第一支队（司令张文铸）、第二支队（司令贾金铭）及师团主力联合展开大规模的包围战。

然而，以后师团已大致判明，20日前在利金屯及其以西地区的马占山军，其主力（才鸿猷、吴松林麾下约2 000人）在师团进行包围战以前，已于一里气方面渡过通肯河东去，其另一部（李云集、李天德所部约1 000人）亦沿该河右岸北上。因此，师团乃决定中止本次作战，命令骑兵旅团及平贺支队、平松支队、青冈支队分别返回海伦、克山、绥化，于26日至30日期间完成集结。

6月25日，确切获悉马占山在于张维屯以北8公里的刘大窝棚附近穿过铁路东去的敌军中。第十四师团官兵与马军决战的意识炽烈，决心以7月5日为期，包围庆城，一举歼灭敌军。7月3日开始行动，命令骑兵旅团从北方、甘粕支队从西方、宍户支队从南方进行包围；命令江省军第一支队由庆城南方迂回，进入庆城东方以切断敌军退路。但是，马军逃跑迅速，已于3日离开庆城，而我军各部队则是4日进入庆城。因此，师团以宍户支队及江省军第一支队在庆城附近搜索敌情、扫荡兵匪，其余各部队逐次返回呼海铁路沿线之原驻地。

尔后，第十四师团专心致力于搜索马占山主力情况，判定其企图南下进入松花江畔。于是乃命令步兵第五十九联队第二大队急速由呼兰进入巴彦，在该地附近切断敌军退路，骑兵第十八联队依然与江省军第一支队协同，直接由庆城方面从背后追击退却之敌，步兵第二联队原大队留守庆城，负责警戒。

我方判明，马占山离开庆城后经后梁大骡子、东兴镇，屯驻于该镇以东10公里的四十八道沟子附近的山寨。7月10日，

师团命令骑兵第一旅团由海伦出发,经兴隆镇进入巴彦方面,捕捉敌人，发动攻击。

马占山遭到我各部队急追，已不能逃往松花江岸，无计可施，又打算由东兴镇逃往山里，但亦未能得逞，最后只得改变退路，再次掉头北返。7月17日，经铁山包北走。

师团在海伦以东地区及呼海铁路沿线部署兵力，阻止敌军逃脱的同时，又动员步兵部队及骑兵部队的全部力量猛烈果敢地追击敌军主力，于诺敏河畔到处追歼敌军，将败退的敌军主力压制在海伦以东地区。各部队做出拼死的努力，在海伦以东地区担任阻止敌军北上的重任：步兵第十五联队田中大队经过机智、决死的奋战，终于在7月29日于安固镇以东地区歼灭马占山军主力，并且继续扫荡残敌。

由此可见，第十四师团对马占山军残部的扫荡大约持续一个月，大致达到目的后，8月下旬将兵力集结于呼海铁路沿线。

由于第十四师团克服气候、地形、风土等不利因素，征讨逆匪，并将其主力马占山所部彻底歼灭，使其不能东山再起，至此大体完成镇抚黑龙江的重任。

在此期间，始终与第十四师团协同作战的江省军队主要是第一、第二支队。特别是第一支队，其司令张文铸少将指挥得当；自始就与该支队一同行动，专属该支队并担任指挥的皆藤喜代志步兵大尉对恪勤奋斗、勇猛果敢的行动亦起到极大的表率作用。

（摘自《黑龙江沦陷始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军进攻热河

姜克夫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进行了一年的“扫荡”，将东北军和义勇军基本上打垮。日本炮制的伪满傀儡政权也在辽、吉、黑三省站住了脚。于是，日本军阀又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热河，于1933年2月23日发动了侵热战争。

2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热河，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攻热军总司令，控制板本政右卫门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部署于辽西绥中至义县一线；另配备茂木谦之助骑兵旅团及张海鹏、程国瑞等伪军两万人于开通、通辽一带。

战争开始后，守朝阳的汤军董福亭旅，由于团长邵本良在前线叛变，丧失南岭、北票，朝阳很快失守。万福麟军团王永胜二十九旅守平泉和三十家子；于兆麟三十旅守凌源和叶柏寿。董旅在朝阳溃散后，日军川原旅团及饭田骑兵旅团即猛攻叶柏寿，激战三昼夜，于旅渐不支，王旅增援，又坚持了两天，因日军炮火猛烈，终于败退平泉。万福麟掌握的丁、缪、孙三个旅也在凌南被西义一师团击败，退进喜峰口。日军快速部队一路无阻，直驱承德。至于热北开鲁、鲁北、林东一线，日军骑兵配以坦克发动进攻后，鲁北一带的刘桂棠部即纷纷溃逃；守开鲁的崔兴武旅，由于团长李守信率部投敌，开鲁不战而降；布防在开鲁一带的马、邓、李等部义勇军本属乌合之众，更不战而逃，退到赤峰。幸久经内战锻炼的孙殿英部一个旅及时赶到赤峰，阻击敌军骑兵七昼夜。板本师团攻占朝阳后转向赤峰、围

场方面，孙军且战且退，在猴头沟被板本师团切成数段，激战七八天，终于冲出重围，退往察东沽源。3月初，汤玉麟在承德闻日军已击败万福麟军西犯，即命张从云旅及直属部队两个旅布防于承德外围各山隘。但该两旅士兵闹饷，不听命令，当日军迫进时，汤即率卫队逃往滦平。日军先头部队128骑于3月4日晨进入承德。

承德未失守前，张学良在北平总部闻热军连失要地，即急催张作相赴热督师。张拟以其子张廷枢任旅长的东北第十二旅及其甥冯占海从吉林带来的义勇军编成军团，但张、冯两部还未及集中，日军攻热已开始。张作相到承德后不久，汤玉麟即逃往滦平。张手中无兵，只好回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立命其亲信王化一等带大令到古北口将汤玉麟就地正法，以振士气。不料汤已收拢起张从云、刘香九、富春几个旅退往察东沽源。以后汤部石文华、赵国增两个骑兵旅被孙殿英吞并，其余部队和装备均被宋哲元收编。

张学良拥兵30余万，不战而失东北三省，今又不战而失热河，受到了全国舆论的严厉谴责。3月11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热河之战中，日军序列列下：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　参谋长小矶国昭　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

第六师团长板本政右卫门

第十一旅团长松田国三

第三十六旅团长高田美名

第八师团长西义一

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

第十六旅团长川原侃

骑兵第三旅团长饭田贞固
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兵次郎
骑兵第四旅团长茂木谦之助
伪军方面
张海鹏部
程国瑞部
邵本良部
李守信部

（摘自《民国军事史略稿》）

山海关之战及热河沦陷前后

何柱国

榆关浴血抗战经过

1933年元旦早上，我在北平得知榆关情势紧张，断定战事即将爆发，乃奉命立即赶回榆关前线。我记得当时是乘坐一个专为我而开的火车头赶回去的。我上车后，因战事早已料定，而作战计划也早已决定，并早已向官兵们作了布置，所以并没觉得紧张忙乱。只是想起了一年多以来的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的为难情景，总算等到了今天，除打仗以外，再无其他事情牵挂，顿时如释重负，满身轻松，不禁哼出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诗句。到了秦皇岛，前方战火已甚猛烈，我除了下令坚决抵抗之外，一切皆照预定计划进行。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不过石河也有所准备，而榆

关方面则尽可能实行阻击。战事从1日夜半开始，激战至3日下午2时，榆关终于失陷。

当时战争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日方兵力，除榆关所驻部队及伪警之外，又由绥中增来步兵约3 000余名，野炮、野战重炮约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约20余辆，兵舰两艘。战斗开始，日军即用炮火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我临榆县城南门城楼、鼓楼、东南角楼、第一关各处猛烈炮击，并用飞机向我阵地及城内各处轰炸。又以石河桥配备之敌，牵制我六二二团西关之兵力。二里店、吴家岭之敌牵制我军北水关角山寺之兵力。

我军六二六团兵力，以第一营守南门，第三营守天下第一关，其余少数兵力随团长在西门应援。石河县我守军兵力共计2 257名，第二营在孟家店及角山寺等地，策应守城部队，共计1 346名。

自1日晚10点50分起敌军屡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枪声彻夜不止。我又派铁甲车驰往石河西岸掩护工人，修理被炸铁桥，并骑马奔驰各地，布置军事，指挥作战。至3日午前10时，敌军以海陆空三军的火力由南关向南门主攻。我方城内实际只有两营兵力，犹猛烈还击，战况悲壮，燃烧爆炸，硝烟连天；南北城楼，以及商民住宅，炸毁尽净；我方人马伤亡过半，南城门及东南城角、西南水门一带，战斗尤为激烈。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均为敌人攀登占领。我预备队自西门向南门增援反击。第十一连又自“天下第一关”向东南城角逆袭，遂将敌人击退。午后2时，敌复增加强大兵力，再度总攻我东南城角，卒城被轰成巨大突破口，敌坦克及步兵跟踪挺进，我军屡堵屡仆，北门至东门立陷无险可守状态。是时，我方营长安德馨以下，二连刘连长、三连连长关景泉、四连连长王宏元、五连连长谢镇

藩等人，尽皆战死，其余官兵也伤亡殆尽。团长石进安，振臂一呼，率预备队与敌坦克作殊死巷战，一连连长赵璧连也负重伤，排长以下官兵又伤亡过半，四门均破，只有十几人在团长率领下，由北小门退出，榆关终于失陷。

在这短促的战役中，我九旅以不足一团的兵力（实际只有两个营），事先，受辛丑条约规定之限制，不能预筑防御工事，与日本海陆空密切配合之强大敌人拼搏，竟毙敌400余人，安营长全营官兵覆殁在血泊之中。人民群众死伤在一千几百人以上，未能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部被日军屠杀。房舍被焚，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残堪浩叹也！

总之，榆关失陷，对于我这个守将来说，是责无旁贷的。"天下第一关"这个天险，沦于敌手，我固引为终身遗恨。当时我的任务是保卫平津，拒敌于滦河以东之线。所以在临榆失陷之后，我没有进行反攻，只是指挥外围零星战斗，按预订计划，严阵以待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拼搏，以保卫平津。但事出意外，敌人侵占榆关之后，没有以主力继续前进，而是试探性的向九门口及石门寨打了两个小型战役，遭到一定的伤亡之后，改道由热河一路进关，而放弃了由山海关一路进关的战略，以其主力直趋热河，很快的侵占了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并且长驱直入造成了进逼通州、唐山，威胁平津。这种局势的造成，显然是狡猾的敌人，预知我已有充分准备，如从山海关一路西进，必然要遭到我军痛击，而不敢轻易地长驱直入。

热河沦陷

日军占领榆关后，转攻热河，攫取长城各口。当时热河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张作霖"拉竿子"起家的老兄弟，一贯骄横跋扈。他是1926年由辽宁边防镇守使调任热河主席，

统带一个步兵旅到热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学良曾有意派张作相去接替他，张作相知汤之为人，不愿前往。东三省失陷后，热河在军事上，为战略必守之地，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乃宣称：日军如进攻热河，决予抵抗。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次长杨杰、参谋部厅长熊斌等到北平。这些人来，名为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长城各口及华北的防御计划，其实骨子里，后来才知道是逼张学良下野的。

2月17日，由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何应钦等到热河进行了一次视察。热河省会承德是清皇帝行宫之所在，宫殿富丽，风景优美。他们第一天是观赏风景，第二天汤玉麟开了一次欢迎会。会上宋子文讲话说："中央计划不惜牺牲一切与困难，保卫热河。"继又在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张学良、宋子文联名电告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说："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入侵。"张学良又与张作相、万福麟、宋哲元等20余名将领发出通电，表示决心抵抗，呼吁国人支援。当时估计，热河至少可以支持3个月。张学良、宋子文等回到北平后，拟定了热河保卫战的初步计划，成立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司令张作相，辖孙殿英一个军团、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冯占海等义勇军。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又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分配作战任务，宋子文等中央大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学良把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铅笔，勾划防线。当他划至冷口、喜峰口一线时，抬头向宋哲元说："明轩，你把守这一线。"宋却说："我的兵力单薄，装备也差，担当不了这一线任务。"张说："你放心，我派何柱国支援你。"宋仍是不肯接受。宋哲元原系西北军，曾与奉军内战几年，前嫌未消，故借辞推诿，所以热

河之战败得那样快，各军不能团结一致，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 月22 日，日军以锦州为大本营，用3 个师团兵力（约10 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张作相临时受命，兵力还未集结、仓卒应战，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如开鲁一线，敌军撂了几个炸弹，出动了几辆坦克，守将崔兴武旅不战而降；万福麟第四军团守凌源一线，闻风而溃，朝阳随之弃守。日军长驱直入，于3 月4 日午后，以128 骑的先头部队，突入承德，汤玉麟逃奔察哈尔，万福麟逃入喜峰口，张作相逃往古北口，热河就这样沦陷了。

长城各口之战况

热河失陷，长城各口之战即开始。张学良下野，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黄绍竑任参谋长。他们仍然秉承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方针，处理华北军事、外交事务。在外交上他们加紧活动，争取国际联盟制裁日本。在军事上对长城的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冷口采取一些军事防御措施，想依靠这两千多年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阻止日军入侵华北，保住平津；将原守长城各口的东北军撤下来，调到北宁线天津以东整顿布防；以傅作义部防守独石口，以中央军徐庭瑶的第十七军的黄杰、关麟征、刘戡三个师进驻古北口；喜峰口防务由西北军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担任，孙殿英部守多伦，以牵制日军后方。这种布防分明不是进攻，而是坐着挨打的阵势。3 月4 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南下喜峰口，原退集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东北军，即撤入口内。3 月9 日，喜峰口被日军占领。调往喜峰口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主力，尚在遵化，只有先头部队冯治安一个师于9 日黄昏时到达喜峰口。乘敌不备，用大刀进行夜袭，杀死很多日军，当夜夺回喜峰口。

这是长城各口之战唯一的一次胜利。日军另一个师团向古北口进攻；关麟征的部队尚未到达，原驻古北口的东北军王以哲部曾往抵抗，但节节败退。于3月11日古北口被日军占领。待关麟征到达，虽然反攻，也未夺回。敌已迫近长城，若被突破一口，即牵动全线。我防守石门寨这个阵地就形成突出，如冷口有失，敌人就可以直下滦州。喜峰口不守，敌人就可以占丰润、下唐山，后路就被敌人截断。军分会总部考虑到此种情况，于3月12日，命令我部撤至滦河的西岸，破坏滦河铁桥，靠滦河部署阵地。这一措施，当时曾受到报纸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被迫撤退。何应钦在招待记者谈话时，特为此作了解释，说明系战略转移，非屈服于日军压力。

当时，我所防守的北戴河至石门寨这一线阵地，虽然形成突出，有被敌人截断退路之虞，且又适奉命向滦河以西转进之时。但在3月下旬至4月初旬，敌人先后向我石门、石门寨、界岭口、青山口、响水、里峪沟、海阳镇等阵地多次猛攻时，仍能经过大小战斗20余起，有的敌人被击退，有的是反复战斗，尤以界岭口、石门寨两地，最为激烈，致敌我双方均有惨重伤亡。这时，我主力奉命撤至滦河之后，总觉得我的主力始终未得与敌人一拼，心有未甘。于是又有拉回北戴河一线之事。最后，蒋介石又派我的老师黄慕松前来，苦劝我服从撤退命令，说我那样屡进屡退，阻碍了中日的和平谈判。这样，我才再度撤至滦河西岸。防守多伦的孙殿英3万人，经不起日本的威迫利诱，于3月上旬，不战而放弃多伦。长城各口除喜峰口尚在固守中，其余各口都被日军占领了。当时，我的部队撤至滦河西岸，日军即进占抚宁、昌黎、卢龙等地与我军临时对峙。因敌人占领冷口及滦河上游迁安，我滦河西岸的阵地侧背已受到威胁，于4月14日，我指挥轻骑一部向石门敌人进行一次袭击，克复石门，并

占领安山车站。但敌人的主力，却继续进攻喜峰口之侧背，唯一固守的喜峰口，在危殆中。

先是于3月下旬，蒋介石自南昌飞来北平，在居仁堂开了一次会，我们这些将领都参加了。蒋除听取何应钦、黄绍竑汇报外，他指示："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他这时正在集中力量"围剿"苏区。他在北平停留了一天，就飞回南昌去了。此来不是为了如何加强对日作战，而是对何应钦面授机宜的。此时何应钦根据长城各口之战失利的情况，下令宋哲元部撤出喜峰口，转至三河、平谷以东；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傅作义部于昌平、怀柔方面亦步步后撤。总之，由于蒋介石屈于对日求和，于是命令我军后撤，以致防备空虚，日军步步进逼，迫近顺义，距北平只有25余公里，平津已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最后以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告终。

日伪军进攻热河

富璐善　刘　玢

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热河讨伐经过概要》节录

讨伐前夕的反满军情况

关于热河省内及华北的反满军情况，已见1933年2月4日本班发表的《满洲的扫匪与治安状况》一文。以后的形势变化大体如下：

汤玉麟正规军　　2万

汤玉麟自卫军	1.2万	
冯占海军	1.5万	
邓文军	0.6万	
李海青军	0.3万	
刘震东军	0.2万	15.4万
冯庸军	0.3万	
其他杂军	1.3万	
孙殿英军	2万	
沈克军	0.8万	
张学良正规军（步兵五师、骑兵一旅）	3.3万	

第一线抵抗阵地以开鲁、兴隆地区至朝阳一线为主，由义勇军负责；第二线是由赤峰经凌源至北章营子、干沟镇一线，这是主要的抵抗地区，配备主力；第三线设于承德附近。

山海关方面，张学良的24 000名正规军（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部署在最前线；第二线滦河右岸地区部署杂军，即商震所率16 000人和4万宋哲元军，计8万大军；第三线，即北平附近有张学良的25 000军队，还备有20余架飞机和10余门高射炮。

日满军的情况

1. 从开始行动到占领赤峰、承德

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密切配合，从2月上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至2月下旬各方面均进入行动。

(1) 茂林部队于23日从通辽附近出发，24日到达开鲁，驱逐李海青军。26日傍晚，以部分兵力击退下洼附近的冯占海义勇军约1万人，并占领该地。

主力从兴隆地区继续西进，追击匪贼。3月2日拂晓到达赤峰以东高地，击退占领该地之敌，上午11时，太阳旗已飘扬在

赤峰上空。

（2）坂本部队的大部兵力于23日，主力从通辽出发，部分兵力从彰武出发，冒着暴风雪和零下20余度的严寒进行强行军。27日其先头部队到达下洼，未事休息，驱逐数千敌军。2日傍晚，其挺进部队进入赤峰。坂本部队之一部，即松田支队，于23日从朝阳寺出发，经朝阳，3日占领建平，4日同在黑水附近占领阵地的约两千兵匪展开激战，敌军向西方溃逃，5日进入赤峰与主力汇合。

（3）西部队之一部于21日先发制敌，占领北票，继而以三列纵队向义州、锦州方面进发。途中，排除了在朝阳东南方高地设有阵地的张学良正规军的顽强抵抗，于25日进入朝阳。经过休整，于3日1日出发。其间，川原部队于3月2日占领凌源，3日进入平泉。未经喘息，继续西进，4日晨到达承德郊外。上午10时击溃承德东侧高地之敌，下午2时50分入城。在此之前向古北口方向败退的敌军，遭到我方空军的袭击，受到歼灭性打击，向南方及西方溃逃。

（4）服部部队于2月26日从绥中开始行动，以二列纵队前进，因途中山岳重叠险峻，又有近月以来敌军修筑的阵地，战斗相当艰苦。最后突破沙帽山、白庙子的堡垒，继而夺取北章营子。其先遣部队即米山部队于2日中午到达凌源，继而南进，击溃石桥子之敌，向冷口前进。鲇江部队在北章营子同主力分手，在该地以南喇嘛洞附近，同数倍于我，拥有优势的张学良正规军交战数日，借以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

（5）满洲国军中，由张海鹏军率领的洮辽军于2月25日在开鲁升起满洲国旗，从3月1日开始继续行动，扫荡各地匪贼，9日其司令部进入赤峰。

其他，李寿山军、程国瑞军、丁强军等也都追随皇军之后，

一面扫匪一面前进。

2. 进至万里长城一线

(1)由坂本部队组成的高田支队4日离开赤峰，途中击溃敌军，6日占领围场，配合茂本部队扫荡附近一带匪贼。9日在卡伦附近发生激战，孙殿英军遭到严重打击，向西方溃逃。

此外，残敌集中的乌丹城也于9日傍晚被我占领。

(2) 占领承德的川原部队的部分兵力，于4日傍晚进入滦平，从7日起，与川原部队主力共同进攻长山峪（在古北口东北约7里）附近的坚固的敌军阵地，经过激战，追击至长城线古北口，10日下午2时30分占领该地。随后，又击退拥有优势的张学良军和中央军。12日，古北口一带要地全部被我军占领。

(3)服部部队于9日傍晚夺取了喜峰口。然而，这一地区敌军仍不断反攻。

在此之前，米山部队快速南进，驱逐石桥子之敌，4日已在长城冷口升起太阳旗。继而向长城董家口方面转进，10日占领该地。

(4)中村部队作为军的总预备队在奉天待命，2月末转移至绥中附近。较一般部队稍晚，从绥中开始作战行动，以二列纵队向干沟镇前进，9日攻陷该地。然后立即南下，猛攻长城的界镇口，15日将该地攻克。此外，东方义院口要地已于3日为我军占领。

(5)关东军司令部以武藤大将为首的领导机关，于3日到达锦州，亲自指挥前线，鼓舞士气。后因我军已进至长城一线，作战即将告一段落，于11日傍晚返回新京。

到16日为止，热河方面作战伤亡情况如下：

战死　　118名

负伤　　217名

合计　　　389名

反满军情况

1. 热河省内

张学良的4个师正规军和汤玉麟军的2个师固守在从赤峰经凌源至干沟镇附近一带，素以热河省内的中间阵地自诩。但鉴于第一线的义勇军李海青、冯占海、冯庸等已经溃败，深感震惊。曾在北方的孙殿英、石文华、高春军等基本在热河西部边境；凌源以南的军队已退往承德、冷口一带。汤玉麟见此情景，战意全无，弃承德望风而逃，不知去向。张学良、蒋介石等得知后不禁愕然，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便将热河失守之责转嫁汤玉麟，下逮捕令，要处以极刑。

热河省内败军比比皆是，热河西部边境的丰宁附近有汤玉麟军，赤峰西北方地区有冯占海、孙殿英败军集团，据说通过多伦从华北接受物资补给。由于积雪即将融化，同后方联系困难，今后的扫匪任务将十分艰巨。

2. 华北方面

张学良连续收到热河战败的消息，企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下令确保长城一线。但是，杂军为了保存自己，都不想做日满军的进攻目标。如宋哲元只以部分兵力应付，主力仍固守长城以南的玉田及三河一线。

山西军之一部与其说是抗日，莫如说是趁火打劫。他们从张家口进入古北口或接近热河西部边境的多伦一带，企图扩大地盘。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军正在向华北进发。已有两个师北上，其中一个师已用于古北口方面。蒋介石的目的，一是为了对华北诸军进行督战；同时，也是为了对付华北的各种动摇与混乱。

富璿善补充交待材料

（1954年6月）

1933年2月到3月下旬伪满讨热作战的全期经过：

作战期间，1933年2月中旬到3月下旬，在热河省内对汤玉麟军的作战。参加这个作战的部队，主力：张海鹏部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索支队（也称暂编第三支队）、炮兵第一、二大队。这个计划（侵攻热河），是由伪满军政部高级顾问战犯佐佐木到一作的，有伪满军顾问日寇佐久间亮三参与及指导实施。2月中旬，伪满讨热军到达开鲁以后，张海鹏及日寇佐久间亮三令我给第一支队长王永清下一个命令，令它协力日寇茂木骑兵团进攻林西，这个命令，由我交中校参谋宋道仓办的。及至日寇第八师团占领朝阳、建平，第六师团占领赤峰以后，伪满作战前敌司令部率各部队向赤峰推进。这个命令，也是由日寇顾问佐久间亮三把命令要旨交给我，由我交中校参谋宋道仓办的。当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到达赤峰以后，伪满讨热军第一支队同日寇茂木骑兵旅团，在汤部石旅（?）没有抵抗退出的情况下，占领了林西（以后第一支队受日寇佐久间亮三命令援助李守信进攻多伦）。于3月中旬，当日寇第八师团占领了平泉、承德向热河省西南部长城线上进展，第六师团及茂木骑兵旅团占领了宁城、围场，向南进展到热河省南境的时候，日寇金川耕作顾问，对我指给一个命令要旨——第二支队为先遣，急速进到承德，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索支队进驻滦平鞍匠屯。这个命令案是由我办的，以张海鹏和日寇佐久间亮三名义给各部队下达的。伪满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部及部队，于3月下旬大概到达指定位置（仅第四支队是后到达的）。又在伪满军讨热作战全期间，我派一名参谋，

经常与顾问部联络，从而使日寇顾问熟知部队的状况，也给它们用兵上的便利。

刘玢等对佐佐木到一的检举书

（1954年4月17日）

关于佐佐木到一在热河地区的具体罪行：

1933年2月初，佐佐木到一命令编成讨热军，向热河进兵。计划是佐佐木作的。由伪顾问佐久间亮三带到锦州下达的。

1933年2月中旬，由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两个人的名义，命令骑兵第一支队长王永清协力日寇茂木骑兵旅团进攻林西。

同年3月上旬，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命令各部队向赤峰推进，接管日寇第六师团占领的地域，并担任当地的警备。

同年3月中旬，张海鹏和佐久间亮三命令第二队进驻承德，第三支队进驻隆化，第四支队进驻丰宁，索景清支队向滦平县西方鞍匠屯推进。

同年5月下旬，佐久间亮三命令日寇武田中尉指导第一支队协助李守信攻多伦，同时又命令伪顾问生田吉五郎指导第二支队侵犯沽源〔中略〕。

关于讨热军的组成如下：

讨热作战军总司令张景惠

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高级顾问佐佐木到一

讨热作战前敌总司令张海鹏　参谋长李盛唐

军事顾问：佐久间亮三（少将）、金川耕作（大尉）、北部邦雄（大尉）、生田吉五郎（大尉）。下有6个支队（支队下属3个团）、两个炮兵大队和1个骑兵独立团，是一支庞大兵力向热河进攻。占领热河之后，又策谋以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邢士廉、参谋长卢静远、支队长藤井重郎（靖安军司令）、顾问皆藤喜代

志（中佐）、伪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军事教官相马中佐、教导步兵第五团长姜学博、军事教官德江少佐、教导骑兵第五团长富璿善、军事教官平川森中尉、靖安步兵第一团长山崎积组成热河支队，协助日军进犯察哈尔省与华北、晋北地区，并进行了积极行动。

侵占热河的后果：

（甲）在军事压力方面：讨热的伪军协助日寇第六和第八师团实行武力进攻，帮助日寇警备占领的地域和镇压人民。

（乙）在政治上：对人民施行有毒素的宣传；建立伪政权——伪热河警备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公署。张海鹏任伪警备司令兼省长。使热河成为伪满的领土。

（丙）在经济上：成立伪满经济行政机构，对热河全省人民进行榨取和掠夺，为日寇侵略服务。

（摘自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8月版。）

热河沦陷与川岛芳子的安国军

楳本舍三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关东热河战役有如下一段叙述："……由于日方在日内瓦已有所保留，因此，仅需寻找某种借口，即可实现将热河并入满洲国的计划，起初是演了这样一出戏，以关东军石本军属，于1932年7月17日，在北票、锦州旅途中'失踪'为由，立即认定是被中国义勇军绑架，乃由关东军派兵前往热河搭救。进入热河省的该军部队带有火炮，虽

曾占领境内一村庄，但被击退未能完成任务。在此次战役中，日军飞机曾向朝阳市区投掷炸弹。另外，日军飞机于1932年8月中，曾于热河省上空持续进行示威飞行。1932年8月19日，又以交涉释放石本事为由，派一参谋前往北票与热河省境之间的南岭村，并有步兵部队随同前往。当于归途中遭受射击时，则以自卫为名进行应战。犹如事先所策划，后援部队开到立即占据南岭。南岭战役后，不久，即发表了热河省乃满洲领土的声明……”

据日本战败后获悉，热河战役乃是由以和平主义贩子闻名的远藤三郎中将，当时是少佐作战主任一手策划发动的一次战役。

当时关东军的干部阵容是，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第一（作战）课长斋藤弥平太大佐，作战主任远藤三郎少佐，航空主任冢田理喜智少佐，兵站主任中野良次少佐，第二（情报）课长喜多诚一大佐，第三（政务）课长原田熊吉中佐，第四（宣传）课长坂田义郎中佐。

战役进展情况是：1月2日，占领山海关；1月8日，张学良所部进入热河、山海关；1月20日，满洲国政府讨伐热河；2月23日，日满军讨伐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5月3日，张海鹏上将任热河省警备司令。

当时的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仰承天皇陛下旨意，曾指令，一兵一卒亦不许跨越长城一步，但派出机关置中央方针于不顾，一意孤行，一时关东军成为内外谴责的中心，成为战争的罪魁祸首。

芳子属下的一般土匪，其中也可能包括张学良部的残兵败将，正为满洲建国、建军而疲于奔命。这支号称五千兵力的队

伍，实际是芳子的亲兵，自封为安国军。据说是多田骏任命芳子为安国军司令的，实际上有些虚张声势。追随芳子左右的，仍然是堀田、岩野、大村等一伙人。芳子自称金璧辉，身着带有三颗金星肩章的军装，佩带一支手枪，跨下一匹战马，通常被人称为金司令，可谓英姿飒爽，不可一世的巾帼英雄。

正如她向堀田透露的那样，建军的目的在于培养干部，组织一支新军。她深知杂牌军招募几万人，也不过是白搭钱的乌合之众。插身热河局势的举动，也可能是受人启发，但作为一个年轻女性，不能不说她独具慧眼。

芳子在满洲被称为安国军上将金司令，在事变爆发的三四年中，反满抗日武装盘踞在热河、通化地区，多达30余万人。与此相对应，由日本人、中国人纠集起来的武装集团也蜂拥而起。其中闻名内外的如甘珠尔扎布的独立军，伊达顺之助、川岛芳子的热河民国安国军等，均属风靡一时，昙花一现的武装集团。据说建国初期，治安欠佳，几乎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是土匪。为此遂有上述自发的“自卫团”、“军队”等非正规军的出现，日本的旧军人大尉、中尉或准尉之流，乘虚而入，自封为少将或大佐指挥此类土著武装，大有战国时代的群雄割据之势。

其中以靖安游击队的指挥官素质最佳，其后相继改编为靖安军、靖安步兵团，成为日后满洲国军的骨干。为培养军官而建立的中央训练所，不久又改建成为军官学校。

在满洲事变前后，一批不满于日军现状的一些豪杰之士，或充当顾问背后操纵，或赤膊上阵，大打出手，纷纷投入中国旧军阀的怀抱。

金璧辉——川岛芳子，在日满两军进驻承德前夕，携带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的安国军司令委任状，突然出现于朝阳。

芳子在会见驻朝阳领导宣抚工作的关东军参谋田中新一中佐、岩畔豪雄大尉时，提出资助安国军军费20万元的要求，其后又曾向古海忠之提出10万元的要求，由于此项巨额筹款相当于现在一二亿日元，非同小可，尽管有军政部顾问从中疏通，结果均未实现。当时作为总务厅主计课长的古海忠之，担任热河作战办事处处长，在锦州设有本部，朝阳、承德、赤峰分设3个班。据了解，芳子的安国军，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烧杀掠夺，民怨沸腾，不仅干扰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且也给后方的政治宣抚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当古海返回新京，小矶参谋长接到报告后，立即亲赴朝阳，将川岛芳子逮捕送往奉天软禁起来，安国军被解散，以后甚至禁止她出入宫廷府。至此，芳子一心想将整个满洲土匪以及满洲国军都置于自己统辖之下的美梦，宣告彻底破产。

如果说，前此芳子是以复辟清朝作为其最高理想，并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那么从1933、1934年开始，芳子便逐渐丧失了作为清王室公主的品格与风度。这个利欲熏心的女人，日益堕落蜕变成为妖女、魔女了。当满洲国逐渐形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成长起来时，芳子的梦也只能以梦告终而永远不能实现了。

1935年春，川岛芳子应爱国社岩田爱之助天行会头山秀三之邀，前往东京国技馆看大相扑。身穿浅粉色友禅和服，束着红地金银丝腰带，梳着文金高岛田式发髻，花枝招展，引人入目。芳子时年已30，看来还是二十几岁的年纪。聚集在芳子周围的是一些右翼头目岩田爱之助、林逸郎、头山满之子右翼新秀头山秀三等人。

1937年春，芳子曾在东京住院治疗因落马摔伤的脊髓炎症。据长岛正三郎回忆，在下关迎接芳子下船，她身着白羊毛衫内衣，外穿茶色西装与茶色大衣，梳短分发，头戴黑色贝雷

帽，这种有如歌舞团的女扮男装演员，一派贵公子风度，令人为之愕然。不过，从这个身高不过五尺，小巧玲珑的女人身上，几乎完全察觉不出她是怎样成为胆大包天，出生入死，神出鬼没，变幻莫测的间谍分子的。

在满洲有关川岛芳子的传闻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新闻人物，这使芳子高兴万分，似乎颇为满意。

1930年至1936年，日本国内形势也并不稳定。如1935年相泽中佐杀死永田军务局长事件，1936年，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芳子对此表示异常关心，不过，在满洲没有给她提供活动舞台，在日本更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

1933年，芳子曾玩弄手腕，投奔堀内文次郎中将，立即获允借其宅邸一处，结果有30名壮汉住进寓所，然后又与堀内中将合影，使堀内成为其护身符和靠山，此事曾遭到堀内中将长子晴文的反对。

总之，芳子曾以她非凡的公主风度，广为笼络日本各阶层人士，举凡政治家、军人、文化人、学者、浪人、商人、艺人等，均奉其为英雄麇集其周围，趋之若鹜。

（摘自赵连泰等译《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关东军进攻长城及长城抗战

姜克夫

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之下，将责任转嫁到张学良身上，逼迫张学良引咎辞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任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指挥华北军事。当时东北军充满了失败情绪，大多不堪再战，何应钦除部署何柱国、于学忠两个军于天津至滦东一线外，所有长城各口的防务分别交其他军队担任：冷口为晋军商震部队，喜峰口、罗文峪为西北军宋哲元部队，古北口为中央军徐庭瑶部队，赤城、龙关、多伦为晋军傅作义部队。

日军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侵占东北四省之既成事实，于攻占承德后随即南下进攻长城各口，其投入的兵力除侵热的第六、第八两师团及服部、茂木两旅团外，又从伪满调来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及蒲穆第十六师团。3月6日，铃木旅团进攻古北口，长城抗战开始。至5月30日何应钦、黄郛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止，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9个星期。在此期间，东起石门寨，西至多伦，均有战事，其中以喜峰口、古北口为重点。

防守喜峰口一线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全军不过两万人，武器装备也很差，但该军官兵久经战阵，有一定的战斗力。3月8日，宋部奉命接防喜峰口，尚未到达，原来防守这一带的万福麟、沈克等军即蜂拥向口内败退下来。日军服部旅团跟踪进击，夺取了喜峰口外约10公里的孟子岭，并利用这个制高点向喜峰口进攻。宋部冯治安师王治邦旅赶到后，当夜即派团长王长海率部夺回了孟子岭，稳住了喜峰口的阵势。10日起，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向喜峰口进攻，与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旅激战，双方伤亡均重。11日晚，赵、佟两旅长各率两个团从两翼抄山径小道夜袭潘家口外敌特种兵宿营地。当时正值大雪，敌军警戒极其松弛。赵、佟率队出其不意，炸毁敌军大炮十八门，予敌以重创。敌军虽多次猛攻喜峰口，始终未能得逞，遂于16日开始转向刘汝明师防守的罗文峪阵地进攻。刘师与敌展开激烈

搏斗，旅长李金田、团长李曾志负伤，营连长多人阵亡，但阵地始终屹立不动。

日军以久攻喜峰口二十九军阵地不能下，遂于4月9日转向冷口商震三十二军阵地进攻。商部名为一个军，实际只有6个步兵团，而配置在冷口前线的只有黄光华师一个师的兵力，其前沿阵地全部守军不过三四千人，不足以应付日军的进攻。11日，冷口陷敌，商军退过滦河。日军随即于12日又向喜峰口二十九军进攻，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冷口失守，敌军得以由喜峰口右侧攻入，二十九军被迫于15日放弃喜峰口，撤往滦河桥。长城抗战形势至此急转直下。

古北口方面，原王以哲部师长张廷枢不听指挥，迭失口外险要，后退关上固守。3月6日，敌铃木旅团发动进攻，飞机轮番轰炸，张师渐不能支。第八军团总指挥杨杰率中央军关麟征二十五师集结在密云，奉命增援。10日下午，关师接防将军楼阵地，拟以张廷枢师在正面顶住敌人的进攻，关麟征亲自率一个团沿潮白河支流夺取北岸高地，对铃木旅团进行包抄予以歼灭。不料在部队运动时，关被敌人狙击手射伤，而张廷枢竟不通知即撤出正面阵地，致陷关师于苦战，关师原系教二师独立旅扩编的新师团，不仅山野炮全无，而且缺乏训练，仅凭一股爱国热情，顶不住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冲击。苦战三昼夜，旅长梁恺负伤，团长王润波阵亡，营连长以下死伤4 000余人。坚持到12日午后6时，第二十五师力竭，遂乘黑夜脱离战场，撤退南天门。

杨杰当时主张调大批中央军到古北口前线设口袋阵，诱敌进入予以歼灭。这一主张与蒋介石只图应付一下即与日军结城下之盟，以便调军队去南方“剿共”的意图相抵触，又加上关师包抄敌人遭到惨重损失，蒋遂将杨杰撤职，另委其嫡系将领

徐庭瑶为第八军团总指挥。由于关师实力已残缺，不堪再战，徐遂于3月13日上午派黄杰率其第二师接二十五师南天门防务。日军铃木旅团与关师搏斗亦受到相当损失，遂亦停止进攻。故从3月13日到4月19日，古北口前线曾一度沉寂。

日本关东军为了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迫蒋求和，遂集结其六、八两师团及第十师团的中村馨旅团，于4月20日夜向黄杰第二师阵地发动总攻击。敌军利用夜袭夺取了南天门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向南天门进攻。黄师苦战5昼夜，伤亡极大，退到后方休整。由刘戡八十三师接防南天门，又与敌人激战3昼夜，敌仍未得逞。5月10日，日军集中强大炮火，并有飞机十余架轮番轰炸，向刘师阵地猛扑。刘部团长魏巍受重伤，营连以下死伤惨重。刘戡曾拔枪自杀，被参谋长符昭骞救下。11日，八十三师撤下休整，由黄杰第二师接防。5月12日，敌人开始进攻黄师石匣镇阵地，黄师不支，徐庭瑶命二十五师增援不及，石匣镇失陷。至此，古北口通往北平的门户洞开，徐庭瑶第十七军三个师也受到严重损失。蒋介石只派杂牌部队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到九松岭设防应付一下，北平城下之盟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了。

傅作义军团防守的察东地区，只赵承绶骑兵师在多伦与张海鹏伪军小有接触。于学忠军团防守的天津至山海关一线，由于山海关隘口险要，在1月3日即被日军夺去。滦东一带尽属平原，无险可守。4月1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发动进攻后，何柱国军即放弃滦东五县退到滦河西岸。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其意图本在建立伪满和华北的缓冲区，故于21日又撤回长城以外，仅留程国瑞等伪军防守，何柱国又渡过滦河收复失地。5月月8日，日军又发动进攻，何柱国军再次撤回滦河西岸，故最初滦东战线并无剧烈战斗。及至5月中旬，喜峰口、古北口均告失守。为

了压迫何应钦订城下之盟，日军遂于5月12日渡过滦河。15日滦州失陷，何柱国、于学忠两军均退据芦台。同时，宋哲元军亦放弃苦守两月之喜峰口、遵化阵地，退保蓟县、三河；徐庭瑶指挥的十七军及萧之楚师亦放弃九松岭和密云。5月17日，亲日派黄郛奉蒋介石之命北上出卖华北。19日，中日双方下达停止战斗的命令。5月30日，签订了《塘沽协定》，长城抗战至此结束。

现将日军战斗序列列下：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　参谋长小矶国昭　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第六师团长板本政右卫门

第十一旅团长松田国三

第三十六旅团长高田美名

第八师团长西义一

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

第十六旅团长川原侃

骑兵第三旅团长饭田贞固

第十师团长广濑寿助

第八旅团长圆部和一郎

第三十三旅团长中村馨

第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

第二十七旅团长平松英雄

第二十八旅团长平贺真藏

第十六师团长蒲穆

第十九旅团长田中稔

第三十旅团长远藤五郎

第十四混成旅长服部兵次郎

骑兵第四旅团长茂木谦之助

（摘自《民国军事史略稿》）

三

一九三六年前关东军的“讨伐”及大屠杀

日本鬼子屠杀抗日官兵

范振义

1933年1月，李杜余部被日本鬼子追到虎林县境内，当天又带着家眷乘马爬犁过江去苏联了。

不久，李杜有一连散兵退到虎林县大青山边一个外号叫孙大烟袋开的旅店，一个个筋疲力尽，一进店就横躺竖卧地休息了。

上午11时许，13辆大卡车开到大青山脚下。车上架着轻重机枪，每辆车上载着20多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这是从密山追击李杜余部的。发现旅店有一些散兵，就立即包围旅店。这时，从旅店内走出一个带兵的连长向日本军官说："我们全部投降。"日本军官说："投降大大的好。你们马上把武器交出来，都出来站成队，向旅店后边走。"这年雪非常大，没膝深。这120多散兵迈着艰难的步伐向旅店后一片空旷大地里慢慢走去。

这一连散兵走到雪甸子里，一位日本军官命令他们把枪都架在一起，看样子这位日本军官准备训话。不料，他们刚刚站好，日本鬼子在队前架上两挺机枪，对准这一连兵"哒哒"开枪扫射，霎时间，都倒在血泊之中。日本鬼子在一阵扫射过后，对尸体逐个检查，发现还有一口气的，就立刻补上一枪。100多名中国同胞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在这一连人中，只有一个文书沈国华幸免，他到外边解手，见日本鬼子把旅店包围了，就悄悄地向苏尔德（今虎林县共乐村）方向逃命。沈国华一瘸一拐地到苏尔德前的雁来山边，见有三四十中国人手拿

长枪，就说：“你们快跑吧，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追过来了，他们已枪杀了我们一个连的人，一连人仅剩下我一个还活着，快跑吧！”说着沈国华就钻进雁来山。

雁来山前的三四十人，是截击李杜逃兵的虎林商会会兵，带队的是宝东解老六，小队长是徐宝英。听说日本鬼子追过来，有些商会兵也尾随沈国华往山上跑，解老六就对大家说：“有我解大人在此，你们不要怕，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结果日本鬼子追过来，又把这没跑掉的20多人枪杀了。

第二天，孙大烟袋旅店后面倒在血泊之中的100多死难者，由虎林当地百家长出头，带领附近百姓，将尸体用爬犁拉到小穆棱河，砍些树枝，把尸体架上，点火焚烧了。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寇欠下木兰人民的一笔血债

谭宝禄口述　宋国玺整理

在我二十六七岁的时候，蒙古山一带有不少“绺子队”（即所说的“胡子”），其中以李化民队最出名。这些队伍，除个别人是流氓、坏蛋外，大多是穷苦人，走投无路而当了“胡子”，他们有的是为图谋衣食饱暖，有的是反抗地主老财的欺压，有的是“闯祸”后躲避官府的追捕，有的是要报私仇，有的是要发洋财，等等。

赵尚志带队伍过来后，有一些“胡子”队都投奔了他们，被收编了。其中赵尚志手下有个祁指导员，就经常和李化民队伍

一起活动。他们经常出山到附近各村屯，筹集粮食，号召老百姓起来抗日。

有一次，祁指导员带人来到柳河镇万宝村的孙连甲屯，召集保长等地方头面人物开会，发动他们进行抗日活动。走时将保长孙洪德带进了山里。

这些被日本人知道了。一次，正当孙洪德的侄子结婚，日本人来了二三十人，把院子围住，将当时“捞忙”（即帮助办喜事）的人赶到一起，挨个问：“孙洪德哪去了？”不说的就打。当时我明知孙洪德看日本人来了，就猫着腰顺万宝河套跑到江沿，到江南去了。日本人问我，我说不知道，被日本人顺手拔起一棵向日葵杆（很湿很沉）打得我胳膊都肿得抬不起来了。

日本人没抓到孙洪德，就把刘信屯的吴奎、李芳屯的宋××、邹××和刘信屯的潘××等20来人抓去。其中还有后来成为柳石区有名的“东霸天”的恶霸董宪奎。但董宪奎不知玩了什么花招，又花了5000元钱，被日本人放了，后来他就“抖”起来了。

被抓去的人，给带到蒙古山后王守开屯南岗，共18个人，脸上都给蒙上黑布，绑在大树上，被日本人用明晃晃的刺刀挨个活活地挑死了。这是日本法西斯欠下中国人民千千万万笔血债中的一个实例。

（摘自《木兰文史资料》）

日军对吉林抗日武装的“讨伐”

吉房虎雄等

编者按：这里选编的7份材料，是战犯吉房虎雄等人的口供，从中可以看出关东军对吉林地区抗日武装的“讨伐”，对人民屠杀的历史事实。

1. 吉房虎雄口供

(1954年8月19日)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侵略中国的？

答：我从1932年5月开始任朝鲜平安北道江界宪兵分队长，同年6月配属于日军驻朝鲜国境守备队，作为配属宪兵长侵略中国辑安、临江，于同年12月返回朝鲜边界，仍任宪兵分队长。“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中国的全东北，因而日军驻朝鲜国境守备队以吉江协一为首，兵力为1250名，宪兵以我为首共13名，从1932年6月上旬，同时分兵侵略辑安、临江，到同年12月，我又回到朝鲜江界，仍任宪兵分队长之职。侵略辑安兵力为700名，我和宪兵8名；侵略临江兵力为550名，宪兵5名。

问：你作为驻朝鲜国境守备队的配属宪兵长，在侵略辑安期间都犯有哪些罪行？

答：1932年6月上旬某夜12点钟，由满浦镇渡鸭绿江，于辑安东门外、西门外、北面山地进行战斗，打死抗日军150人，打死和平居民125人，破坏房屋15间。宪兵逮捕刑讯和平居民

50 人，并搜集有关抗日军的情报。在此次战斗四天以后，抗日军反击，在辑安城北面山地、东面 2 公里的村庄附近发生战斗，打死抗日军约350 人，烧毁房屋35 间。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和平居民约40 人，于辑安城西门外江沿残杀。同年6月中旬，连续进行战斗2 次，在辑安北面山上及城东、城西等，打死抗日军最少有200 人。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和平居民约20 人，刑讯后，在辑安城西门外江沿残杀。同年6 月下旬，在辑安北面山地、东门外、西门外等地进行战斗，打死抗日军最少50 人，烧毁民房3 间。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刑讯和平居民约20 人，在辑安城西门外江沿残杀。同年7 月上旬，日军出辑安西门至横道河子村南头与抗日军作战，打死抗日军最少有150 人，并将全村250 间民房全部烧毁。当时，宪兵事前搜集了抗日军在该村集合的情报提供日军，并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该村和平居民2 人，带至辑安城，经刑讯后，于西门外江沿残杀。同年8 月中旬，于辑安城周围及北面山地进行战斗，打死抗日军最少90 人。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刑讯和平居民约10 人。以上即是我带领宪兵参加侵略辑安的罪行。

问：你指派宪兵侵略临江期间都犯有哪些罪行？

答：侵略临江与辑安是同时开始的。夜12 点钟渡鸭绿江后，在临江城内及北岗上与抗日军交战，打死抗日军最少有200 人，打死和平居民最少有50 人，炮弹击毁民房20 间，烧毁民房15 间。宪兵先后逮捕和平居民最少有60 人，刑讯、逼供有关抗日军的情报。同年6 月上旬，在临江城内及北面土岗上与抗日军作战，打死抗日军250 人，烧毁民房约200 间。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刑讯城内和平居民约50 人，并于临江西南鸭绿江岸残杀。同年6 月中旬，在临江城内外及北面土岗上与抗日

军作战，打死抗日军50人，逮捕抗日军3人，经刑讯后，于临江西南鸭绿江岸斩杀。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刑讯和平居民25人。同年6月下旬，在临江西北、东面及北面土岗上与抗日军交战，打死抗日军150人。宪兵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刑讯、残杀和平居民40人。同年7月上旬，侵略临江日军约200名，利用夜间侵犯八道沟，与抗日军交战，打死抗日军约100人，打死和平居民多人，放火烧毁全村民房约300间。当时，中江镇宪兵分遣队长事先搜集到抗日军在八道沟集合的情报，提供日军制订侵犯计划，在临江的宪兵随日军侵犯，并主张将抗日军根据地放火烧毁。以上是我指派宪兵参加侵略临江战斗的情况和罪行。

问：你部下参加侵略临江的罪行你是怎样知道的？

答：我侵入辑安后，曾到临江视察过，并听取了部下渡曹长的报告；以后也有文件报告，所以我比较详细的了解临江情况。

问：你及你的部下在侵略辑安、临江期间还犯有哪些罪行？

答：同年9月下旬，由日拆越大尉所指挥的一个中队及我和2名宪兵，向通化护送大米，当行至辑安北方约40公里，距通化约45公里的某村宿营，派一个小队携带机枪警戒，深夜中发现对面来很多人，即开枪射击，打死和平居民10人。同年8月下旬，在辑安与临江之间的某村庄，我和国盛大尉诱捕抗日军200人，掠夺了全部武器弹药，经2个月修筑阵地的劳役后，全部释放。

问：你参加此次侵略辑安、临江，其作战多少次？打死抗日军及和平居民各多少人？残杀和平居民多少人？烧毁民房多少？

答：此次侵略辑安、临江，由于宪兵每次事先搜集情报，使

战斗有利于日军。所以前后共作战13次，打死抗日军达1 790人，其中以通抗日军为罪名而残杀的约170人，斩杀俘虏3人，去通化途中枪杀和民居民10人，烧毁民房约800间。

2. 本行武夫笔供

（1954年7月29日）

1933年3月前后，在间岛省的老头沟进行了所谓师团讨伐。第十师步兵第十联队长人见顺士大佐命令："在这次作战中，就是妇女、儿童、老人，只要发现，就全部打死。"在第6中队长的指挥下，队员90名（包括我在内），枪杀抗日爱国妇女5名，砍杀抗日爱国者的子女1名，共杀害了6名：

1. 1933年3月的一天9时左右，第6中队侵入老头沟某村，奉第一小队长市川沼郎少尉的命令，我和9名队员一起，搜索了村内的两座民房，从豆秸里发现了抗日爱国者的子女1名，11岁左右，朝鲜族，当即逮捕。我亲手交给原野军曹，由他将小孩砍杀于房前30米处的洼地里。

2. 同一天11时许，包括我（步枪手二等兵）在内的20名队员，在市川沼郎少尉的指挥下，进攻距老头沟1公里的山麓中，发现并包围逮捕了一名30岁左右的抗日爱国妇女，一等兵安藤将叉子刺入其阴部，用步枪打死后，将尸体由岸上踢落林丛中。

3. 同一天16时许，中队长山本茂雄大尉指挥下的第6中队，进攻老头沟北方4公里处的某村附近，第一小队长市川沼郎少尉所指挥的20名队员（包括我在内），发现了抗日爱国妇女4名，约18岁左右，当即逮捕。上等兵山崎奉中队长之命，用轻机枪将4名妇女击毙。

1933年5月前后，连我在内的14名队员，在小队长市川沼

郎指挥下，进攻吉敦铁路威虎岭站，在西方1公里处与抗日军约50名交战4小时，打死抗日爱国者5名，刺杀伤兵（男，38岁）1名。当时我是第一分队的二等兵参加了此次战斗，集体枪杀4名。奉指挥者市川沼郎之命，以教育新兵为名，用枪刺将这名38岁的伤兵刺死，尸体弃于原地。

1933年7月前后，在吉林省哈尔巴岭站东约30公里的十五师兵营里，在人见部队第6中队第一小队市川沼郎的指挥下，连我在内的30名队员，在侵犯中与兵力不详的抗日军交战半小时，逮捕抗日士兵2名（40左右岁的男子）。将被捕者绑在房前挖好的坑里（直径2米，深1.2米，中有少许垃圾），分队长万代军曹以教育新兵（连我在内11名）为名，用枪刺将他刺成蜂窝，最后杀害了。

1933年3月前后，包括我在内的90名士兵，在人见部队第二大队第6中队长山本茂雄大尉的指挥下，侵犯间岛省延吉县老头沟的行动中，根据山本命令，将两个村子的20栋民房放火烧毁。

3. 桥本岬笔供

（1954年8月1日）

1934年9月，我任满洲国骑兵第十三团第一连连附及1935年2月任团附期间，协助连长、团长，命令指挥部下，在吉林省伊通县西部和南部边界地区，与红军和抗日武装先后进行了3次战斗，结果打死红军和抗日武装队员4名，夺枪3支、马2匹，并俘虏抗日武装队员1名。1935年2月，第二连附小林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1名，我与小林把他带到伊通县城外，由我拿枪警戒，小林用刀把他砍杀了。1935年3月，在战斗中俘虏抗日武装人员1名，由团部教官染川及小林和我把他带到伊通县城外

北面洼地，由染川、小林警戒，我亲自用军刀把他砍杀了。1934年11、12月间，我以上尉连附身分，协助连长率领全连在伊通、东丰、西丰县境交界地区，搜索抗日武装人员及地下工作员时，烧毁两处民房，共15间。

4. 吉兴笔供

（1954年6月5日）

1935年到1936年吉林地区大讨伐，根据军政部命令，第2军管区编成伪讨伐军，由我任吉林地区伪司令官，吴元敏为讨伐司令官。

一、伪军兵力编成7个旅和日寇军1个大队约14 000人。步兵第九旅长任永和一个旅驻桦甸、磐石，步兵第八旅长吴元敏一个旅驻永吉、敦化，步兵第十旅长邢士廉一个旅驻长春、九台，骑兵旅尹保衡驻桦甸、敦化，第二教导队驻吉林、舒兰、德惠，第五教导队朱家训驻额穆、敦化、黑龙江，骑兵第一旅长王克震驻榆树，日寇军驻吉林、舒兰、敦化、蛟河沿铁路线。

二、讨伐地区：永吉、敦化、桦甸、磐石、长春、九台、舒兰、德惠、额穆、榆树各县。

三、抗日联合军×××将军、李司令、王团长、崔贤、三江好、窜山红约共1 200人。

四、抗日联军损失500多人。杀伤人民1 500多人。烧山寨40至50处。

五、讨伐情况：第五教导队步兵团第二营与×××将军在莺家沟接火一次，损失数目不详。步兵团在烧锅屯一带与抗日联军接火，抗日联军损失10余人。步兵二连与抗日联军接火，抗联损失2人。骑兵连在清沟子打死抗日联军2人。骑兵第1旅第2团在榆树县弓棚子附近与抗日联军接火，抗联损失十五六人。

敦化步兵团在寒葱岭一带与抗日军接火，打死抗联10余人。骑兵团在寒葱沟杀死人民100多。抗日联军在官地南山头据点地方袭击日寇军，打死日寇军八九人，烧掉日寇军卡车三四辆。抗联损失四五人。

5. 中村正名口供

（1954年8月9日）

1933年10月，在延吉县三道崴进攻游击队。我和中山翻译共同拷问过4名中国居民，强要关于游击队的情报，其中一名是五十多岁的妇女，一名是十多岁的小孩。我收集情报后，又亲自带领第十联队第1大队去进攻。因未找到游击队，就在张子营烧毁民房七八所，三道崴烧毁6所，屯田营烧毁十七八所，并将中国居民骗回来，不分男女老幼集中起来，全部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死。又在六道沟烧毁民房10所；在三道崴又烧了约10所，其中两家共15口人，全部被我们杀掉了。我亲自参加了在三道崴杀人放火，这次我们大队共杀死中国居民65人以上，烧毁房屋五六十所。中国居民本来早就逃离了，是我们协助宣抚班把他们骗回来进行屠杀的。

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之间，又进行了十一师团冬季讨伐，我仍在第十联队担任汉文翻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2月上旬，我在宁安县金坑探听到抗日游击队王如起部队的根据地，怕金坑居民给抗日游击队送信，就把全村40多人监禁了一夜。第2天我就领着部队到金坑以西6公里处的游击队根据地进行讨伐，杀死了十几名游击队员，烧毁房屋两所。

1934年3月上旬，我探听到于忠义旅长的抗日根据地在镜泊湖南方的四道沟，就领着日军攻进了山寨，打死4名游击队员，其中有于忠义旅长。我从他身上搜出了他的图章、证明、金

怀表和120元钱。高田利贞少佐命令竹田曹长把于旅长的头割下来带走。在路上我又找老百姓辩认过，证明被杀者确是于旅长。

6. 太田寿男笔供

(1954年8月3日)

自1933年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在吉林省的讨伐。

吉林省讨伐是以第十师团（师团长广濑寿助中将）为主力，内有从骑兵集团（当时在海拉尔）调来一个骑兵中队实施的。师团给第十联队的任务是，搜索吉林省内所属地区（在吉林、长春、哈尔滨、磐石、延吉、黑石等地活动）。师团内其他部队则独立行动。此间虽然没有一次战斗行动，可是骑兵第十联队行动给抗日军的影响很大。当时，吉林省内的殿臣的部队是最强的，约1 500名，他能巧妙地躲避日本军的搜索网，行动迅速，我们的骑兵队也不可能发现。11月8日，骑兵第十联队自磐石往延吉移动后，殿臣部队集结在磐石附近。当时吉林军管区司令部顾问石黑中佐得知此事，对殿臣进行了诱降工作。此时殿臣决心归顺，把部队留在磐石附近，和若干部下乘火车奔往吉林军管区司令部去。知道此事的日本宪兵于烟筒山附近把这列火车爆炸了。炸死了殿臣及手下人员。其部下知道此事后，归顺者约有50名，其余大部逃散。当时因为日本军之间争功，对殿臣的招降工作未能完全成功。

1934年2月中，我和联队共同在密山附近清乡，驻于该地。我的中队（临时配备一门山炮）于2月5日傍晚由密山出发，2月6日拂晓到达了指定地点附近，搜查的结果，知道有兵力不详的抗日军，因而进行了攻击。抗日军发觉日本军进攻后，以若干部队抵抗，主力向北方退却了。

抗日军的兵力约120名。战场遗弃尸体5具，俘虏2名（战斗后枪杀了），破坏房屋一处（用山炮弹打的）。

1934年2月14日杨木岗附近的战斗：我和联队在密山附近清乡，共同驻扎于该地。我中队2月13日奉联队的命令，搜查杨木岗（密山东方约24公里）附近。

日本军兵力：太田骑兵中队（临时配备山炮一门），满军骑兵约200名（密山当时驻有满军骑兵500名）。

行动概要：2月13日半夜，由密山出发，14日早晨到达杨木岗西方约1 000米的森林地带，搜查发现前方村庄（杨木岗地方当时有四五户人家）有抗日军，进行攻击。

抗日军兵力概数约150名～200名（多半是骑马的）。

战场上遗弃尸体约30具。

编者注：太田寿男当时系第十师团第三十旅团第十联队中队长。

7. 中村正名口供

（1954年8月9日）

问：你把和第十联队在吉林一带进攻抗日游击队，屠杀中国人民时你的具体任务和罪行如实供述出来。

答：那时我仍然担任汉文翻译，但主要的是刺探关于抗日游击队的情报，并给日军做向导。

1933年9月上旬，第十联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带，进攻三江好抗日游击队。我在土门岭的一个农民家里搜查出了三江好部队住宿时遗留下的纸条子，我就报告队部，说这家私通游击队。结果，大队长下令杀了这家的一个女人，并把房子全烧了。

问：你把舒兰县日军守备队惨杀中国爱国志士的情况如实地供述出来。

答：1935年2月3日下午，出射刚大尉和我，带领新兵70余名，从监狱中把6名中国爱国者拉到舒兰县城外东南一公里的地方，当做活人靶子进行刺杀训练。杀到第3个人时，他要逃跑，我和另外几个新兵追上去把他打倒，又拖回原地刺杀了。

编者注：中村正名1933年9月在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步兵第十联队第1大队任翻译，1935年2月在伪吉林省舒兰守备队任翻译。

8. 吉兴笔供

(1954年12月5日)

1933年到1934年夏，讨伐抗日军殿臣事件。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吉林，殿臣起义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出没于永吉、磐石间，以永吉县界烟筒山为中心，围攻吉林市和袭击吉奉铁路火车，架走伪军旅长米力罕，威胁伪军，声势很大。我率第二教导队骑步兵1 500多人，并联合日寇军中村馨共约3 000多人，讨伐殿臣所部五六百人，结果，殿臣部共死伤200多人。我又用金钱诱降殿臣部下使其倒戈投降，结果他部下刘东坡投降，编入伪军，刘为团长。我又用诡计和金钱收买殿臣部下，设计打死殿臣，投降来归，遂完全消灭殿臣这支抗日军。

1933年11月，讨伐抗日军三江好。

三江好抗日军所部约200多人，在吉林市东北方尤家屯一带进行抗日活动，我派教导队长朱榕带步骑兵约一个团的兵力讨伐。未接仗，三江好抗日军向北退走。伪军追击10余日，到舒兰县小城子，三江好所部化整为零，潜逃入北方山中。

讨伐红枪会抗日军。

1934年夏，红枪会抗日军约3 000多人（头目不详）在舒兰

县一带活动。驻该地的伪军被围10余日，并被击40余人。我即派伪军增援攻击，将该股红枪会抗日军消灭。

当时驻在舒兰县的伪军有刘宝麟旅长的一部约一个营兵力，及炮兵连连长罗绵带领的四五十名士兵。我所增派的伪军为赵广礼团长，带二营兵力前去解围救援，缴获红缨枪四五十根。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伐"》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汪清县四道河子惨案记

姜永学

罗子沟地处东宁、珲春、宁安县交界，1934年至1935年，曾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第五军活动地区之一。

常驻罗子沟的伪军有一个营四个班，500多名官兵。营长是闻长仁，教官是日本人柴田清中尉。

四道河子在罗子沟以西7公里的偏僻山区，只有28户朝、汉居民。离四道河子不到5公里处，有叫四间房的地方，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第三团（以下简称三团）的密营警戒哨，再往上走15公里，就是秃老婆顶，在它附近簸箕状的山坳里，有几栋小草房，这就是三团的密营地。

当年的四道河子，有较大的三间空瓦房。革命军一到四道河子，常在这里开会、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周保中、金××、柴司令也常到这里，所以人们称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司令部"。

1934 年秋，四道河子地下党负责人王树彬，把探子徐日南扭送西沟进行抗日教育，并严正警告他不许给鬼子当狗腿子。当时徐日南有悔改表现，于是在群众大会上释放了拘押两个月的徐日南。但这个死不悔改的狗腿子，当瘸子团长（日本人）率领的红袖头讨伐队从东宁来到五甲准备过年时，偷偷跑到红袖头讨伐队去告密，他说："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老巢，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瘸子团长马上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秘密会议（柴田清也参加），筹划了罪恶勾当。

1935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之夜，四道河子群众还在酣睡的时候，瘸子团长率领100 多人马把屯子包围了。到拂晓时分，一阵枪炮声、喊杀声、惨叫声响成一片，无辜群众一个个倒在血泊里。仅 1 个小时的血洗，村中的房屋都化作灰烬。

大屠杀是从东头开始的，吴禹俊、金群三等几家人首当其冲。双目失明的丛树山母亲，腹部被敌人的刺刀挑得肠子都淌出来了。可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紧紧抓住已死的两个孙女儿的手，挣扎在血泊中。她的三儿子丛树×（当时19 岁）和赶车的老邹头儿，双双捆绑在一条绳上，惨死在屯中央的水井边。他们俩的头部各中了 3 发子弹，鲜血淋漓，脑浆迸流。单身汉老殷头正在煮饺子时，突然被敌人刺倒在锅台旁边死去。残暴的敌人还把群众赶到麦秸垛旁，用机枪扫射，进行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受难者当中还有外来的群众。三道河子的吴明学老人上山下夹子碰上红袖头，被打死。珲春县的地下工作者李英实和她的女儿来到金群三家，也惨遭杀害。

这场大屠杀，共杀害了57 名无辜群众，其中16 名是用刺刀挑死的。

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保住性命的，只有屯北头的三家人。当时，被枪声惊醒了的李用德老人，他急忙从家里跑出来一看，四

周看不见一个革命军，便知道情况不好，立即大喊："乡亲们！赶紧往河套逃啊！"薛德有、老丁、李用德三家的男女老少，听到外面的喊声，急忙跑到河边的柳丛中藏身，一直等到讨伐队撤走。这样，这3家的12口人免遭杀戮。

敌人撤走时，牵走了老邹头的两匹大青马。

天一亮，三道河子的百户长金龙云和近屯的乡亲们赶到四道河子，从麦秸垛旁的尸体中共救出了8个幸存的朝鲜族婴儿。金龙云自家留下一个女孩子，其余孩子都分给愿意扶养的汉族人家。

血洗的第二天上午，有亲戚的遇难者，由亲戚钉简易棺材盛殓掩埋；全家被害，又没有亲戚的，就埋在菜窖里。

舒兰县老黑沟惨案

姚一鸣

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开始的吉林省春季"大讨伐"，将驻扎齐齐哈尔的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调到吉林省参加"讨伐"。为消灭活动在舒兰县一带的宋德林、周太平两支抗日武装，进驻蛟河的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歧在得到密探陈生报告：老黑沟没好人，都是胡子。便于5月29日带领日军600余人及抓来背给养的劳力600余名，由陈生带路从退抟出发，分三路奔袭老黑沟。除其中一路因迷路未能到达老黑沟外，其它两路分别从呼兰岭和石门子进入老黑沟。老黑沟长约40公里，沟内分布大小村屯及散居农民共有300多户。日军一进入老黑

沟便开始抓人、杀人，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挑。从5月29日至6月5日，日军进行为期8天的血腥大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是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排队用刀挑或活埋等。日军多以小队或小组反复搜捕杀戳。共烧毁房屋达千余间，杀害无辜百姓约1017人。现查明有七处较大的杀人场：（一）5月29日，日军在桦曲柳顶子村，多是把村民堵在屋里杀死。村民李显廷听到外面有动静，出门看情况，被日军杀死。日兵闯进李家后，先把李妻杀死炕上，又用刺刀从二三岁的孩子背部刺进去，挑起玩耍，看着孩子在刀尖上挣扎乱动。日军还把抓到的老百姓驱赶到村外林边，先让被埋者挖坑，再把人推进坑里，土埋到身边大半截时，用刺刀向胸部、脖子刺进，顿时鲜血横飞，黑土染成了红色。仅此处就有七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了9口，埋在一个坑内。（二）柳树河村中的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子屋，也成了日军的杀人场。5月31日上午，日军把抓到的72名老百姓绑上，命令被害人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将他们一个个牵到胡家客店，每进屋一个老百姓，便从屋内传出“哎呀”一声惨叫。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奇形怪状的尸体，面貌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三）青顶子村外的月牙泡是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杀人场。5月31日到6月2日，日军就在这里屠杀了300余人，每天都有百人左右在这里丧生。日军让被抓来的老百姓脸朝月牙泡成排跪下，用机枪扫射后，再将尸体推到泡子里，鲜血把水都染红了。6月1日下午，又把一部分抓来的群众押到距月牙泡100米的东山树林中。一棵树绑上一个人，解开上衣露出胸膛，一个日军刺杀一名老百姓。而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将老百姓的手背过去，用铁丝拧紧，从两臂之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每杆穿20人左右，排成两排，每排三根杆，然后用机枪扫射。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

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

在大屠杀的日子里，日军空陆配合，天上有飞机撒传单、送给养，地上陆军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残杀无辜。屠杀路线基本是从沟上部往下进行，但从石门子进入老黑沟的日军，经过榆树沟时，见老百姓闻讯大都躲逃山林中，就对没跑的老人、孩子施以“安抚”，说什么：“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诱骗跑上山的人回家。而善良的农民以为自己是根本的庄稼人，日本子也不能咋的。不少人便从山上下来回到家中，而这部分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又突然从桂家街往回杀。日军连孕妇也不放过，榆树沟屯曹邦的二儿媳怀孕将要临产，日军将她衣服扒掉，用刺刀将腹部剖开，叫胎儿崩出以此取乐。6月5日天刚放亮，日军除留小部队在柳树河一带继续搜山抓人、杀人、烧房外，大部分进入桂家街和八台岭，在桂家街抓了120人，在庙里抓和尚、老道90人，共计200多人，捆绑押在慈善会大院里跪着，准备集体屠杀。桂家街慈善会长修广汉等人苦苦哀求驻在新街基日军独立守备队山回大队长，山回也感到继续滥杀无辜，于日伪统治不利，于是派人去桂家街，阻止了这场屠杀。还是这个三十八联队于1937年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是攻入南京的部队之一。血洗后的老黑沟从此长期无人敢居住，变得沉寂、恐怖。无人掩埋的尸体腐烂，又造成瘟疫在舒兰一带流行，吞噬了许多生命。农民刘淑珍、张文江、费德庆、李仁、孙德福、王占武等都曾亲眼目睹日军抓人、过堂、杀人、烧房的暴行。时至今日，在月牙泡捞鱼，鱼网上还常挂上来人骨。当地群众一直称此惨案为“杀大沟”。

抚顺县安家峪十七名农民死难记

张玉相

伪满康德3年（1936年）10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驻沈阳姚千户屯守备队，以“剿匪”为名，在抚顺县安家峪一带屠杀了17名无辜农民，至今已50周年。那年我24岁，就住在安家峪。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后，逐渐扩占到东北三省全境重镇，但对偏僻乡村控制困难，因而采取派军驻守重点乡镇，归屯、集家、修筑土围墙，按地势设门，日开夜闭等办法来控制农民，并经常以游弋形式扫荡乡村。多半是日间出动，夜间龟缩驻地。同时还组织汉奸特务侦查我抗日武装行动和抗日人员家属等情况，然后进行血腥屠杀。

周玉金其人

农民朱海乐，是抚顺县安家峪人，约于1934年后，他组织起一支有几十名农民参加的抗日武装队伍，在抚顺、沈阳交界区游击活动。当时他们所需的物资，大部依靠地主富户资济。但地主富户是不心甘情愿的，就由他人从中榷商，而这个人就是周玉金。

周玉金是抚顺县海浪村楼子沟人，是一个半闲半农的农民，30岁左右。周曾在台沟放养山蚕，和台沟安家峪的人认识多年，他与朱海乐相识，朱海乐的抗日武装队伍，所需经济物资，通过周玉金与地主豪绅富户商议成交，当时谓周玉金是“拉线

人”。

周玉金所作所为，不久便被沈阳县姚千户屯驻日本守备队汉奸特务侦悉，于是便策划逮捕周玉金，进而彻底消灭朱海乐这支抗日武装力量。

10月24日前后，周玉金去姚千户屯商店买东西，被日本守备队特务侦知，立即将他逮捕。在刑讯中，周玉金受到毒打，遍体鳞伤，头部下骸骨被打坏，不能吃东西，亦不能说话。他受刑不过，最后供出朱海乐抗日组织和朱海乐家乡住址。

27日中午，周被推上汽车，驰奔台沟、安家峪。

祸从天降

康大房距台沟里许。康大房农民李德发，正在台沟西山（山下即台沟）摘收山茧。当他头顶满筐蚕茧向山下走去时，正遇日本守备队警戒哨上山。一个守备队员未问一句话，挥刀便砍下他的脑袋，真是祸从天降，惨不忍睹。

摇头不算，点头算

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警觉的农民都向村外后山跑去，隐藏于山林中。但还有很多农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情，未有隐藏或跑出村外。

日本守备队汽车开进台沟村内，日本兵立即四下散开，挨家逐户地把居民赶出屋子，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集中街心。街心南北两面都架着机枪，面向人群。

汽车上的周玉金，头缠白纱布，只露出一只眼睛，纱布外渗出血渍，跪坐车内，面向人群，但人们不知他是谁（事后翻译说出周玉金名）？日本兵从人群中一个一个地往外拖人，拖出一个推到车前，问周玉金，是不？周玉金或摇头或点头，摇头

不算，点头算。这样，计有梁海林、梁喜林、梁春芳、梁春山、梁广林、徐振鳌、徐振会、赵成明、朱宝福、刘大香、辛赫轩等11人被推上汽车。当问到唐姓两个兄弟时，周玉金摇摇头，唐氏两兄弟立即释放，其他人未有问。周玉金为什么摇摇头呢？因为他曾和姓唐的在一起养过山蚕。被点头的人全部上车后，汽车便开出村去。

逃出虎口，又进虎口

朱士元住在台沟，他听到汽车发动机声音，向村外望去，看见数辆汽车向村子里开来，车上满载日本兵。他意识到情况不好，立即向后山跑去，穿出柴林越过山岭向安家峪跑去。他由村东头进村，向西跑边跑边喊："台沟来日本兵了！抓人哪！大家快跑吧！一会儿还来这儿抓人哪！"

午饭后，下地人少，在家人多。人们听到喊声，有的跑出追问，有的互相打听，有的上山钻进柴林隐藏，有的不以为然仍在屋内外干活。

朱士元跑出村西头上了大道（抚顺——本溪马路）正往邹家东沟方向躲去，日本守备队的汽车开过来在他身边停下。他无处躲藏只好站住。一个人问他姓什么，他说姓朱。由于他和朱海乐是同姓，安家峪又是朱海乐的老家，于是就把朱士元拖上汽车，然后驶进安家峪。

又一次摇头点头

午后2时许，满载日本兵的汽车停下，几十名日本兵纷纷跑下汽车，奔向各家各户，驱赶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向街心井沿空地集中。看到汽车上绑着的人和刚才喊话的朱士元亦在车上，人们才感到凶多吉少。

范长富正在房子上维修房盖（草房）亦被迫下房赶去街心。日本兵先后从人群中拖出20多人，推到汽车前面问周玉金，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被周玉金点头推上汽车的有朱玉田、陈万兴、陈玉水、范长富、陈玉和、陈玉堂、朱士敏（已80岁）等7人。这样连同在路上捉到的朱士元共抓捕了19名。翻译一看车上有这么多人是“通匪”、“济匪”，车下还有很多人，便大怒，对周玉金猛踢一脚，骂声“混蛋！”此后，再推来人问周玉金，他不再点头，只是摇头。于是其他的人就都被放掉了。事后了解得知，那个翻译姓杨，名字不详。

推上汽车的人，立即被三人一伙、五人一串地绑起来。只辛赫轩和朱士敏两人一条绑绳。

汽车开出村子，向海浪方向开去。约20分钟左右，人们听到南边响起一阵机枪声，更是提心吊胆的想念亲人。

听虎口余生回来的人说，汽车开到班毛岭上就停下来，日本兵将带走的人，全推下车，站在一条沟边，用机枪射杀了。

汽车回到姚千户屯驻地，辛赫轩（因翻译讲情）被释放回家，朱士敏被投入本溪县监狱，数月也离开了人世。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

日本侵略者火烧大东洲始末

李春祥

抚顺县小东乡大东洲村，原是一座古城，地处抚顺市正南，离城市只有13公里。

抗日时期大东洲村是较大的村庄（它下设屯），全村有一百

三四十户，800多口人，300余亩土地。1932年夏季，抗日救国军司令李春润部下丁文范、那凤久、邢龙久等三支部队在大东洲活动。其中那凤久这支60多人部队在小东洲活动。秋季的一天即9月8日中午，日本警备队13个骑兵由唐力屯来到大东洲村巡逻，侦察是否有抗日队伍，在村长彭香武家烧地瓜吃午饭，准备签字证明本村没有“土匪”。消息传到了那凤久部队那里，他们立刻从小东洲摸上来，爬上大东洲南山，向日本警备队开了火，打死日本完田伍长。但没有注意到敌人把通信鸽子放回去送信。当天下午3点钟，住在抚顺市内的日本守备队驾驶三四辆卡车开往大东洲村，在一架飞机掩护下，部分日本兵一进村就朝彭香武家猛扑过去，彭香武慌忙从后窗户跳了出去。日本兵一枪打掉了他的帽子，随后追了过去。彭香武躲进了高粱地。可是正在家门口站着的唐恒普却被日本兵一刀挑倒死去。当时日本汽车在小东洲村卡住耽误了点时间，使得大东洲村民有了撤离的机会，免遭一场惨杀。当大队日本兵进村后四处翻找，一无所有，就点上火烧房子，一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离去。第二天又派来侦探进行侦察。第三天即9月10日，日本出动500多人，从唐力屯、郎士两个方向向大东洲村扑来，包围了整个村子，接着就挨户放火烧房子。冯老六因为舍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烧掉没有走，被日本兵一刺刀扎死了。那明恩的母亲因为耳聋听不清日本兵的怪叫问话，也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王万涛的爷爷因年老体弱来不及逃跑，被日本兵关在屋里活活烧死了。

孟强、孟刚、王德恩等躲在村头被日本兵发现，也被日本兵一刀一个挑死。不到一天功夫，全村13名无辜百姓被杀，一百三四十户人家520间房屋被烧得剩下3栋（11间），所有牲畜烧死的烧死，抢走的抢走，家俱全部毁掉，整个村子一片凄惨。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屠杀，更激起了广大村民的反抗精神。1933年初抗日队伍与大刀会（自发组织）合并，重返大东洲村。这时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为了消灭抗日队伍，从沈阳勾来了全副武装的“红袖头子队”。敌我相遇战斗不到半天时间，双方均有伤亡，抗日大刀会因人少，火力不足而撤退。

日本人为了加强对大东洲村的统治和镇压，1934年在大东洲村实行“归屯”的残暴政策。他们强迫村子周围的零散住户搬到村子里居住，在村子四周挖了两丈多宽的深沟，在沟外筑起一丈来高的土围子，围子顶上还埋上木桩子拉上刺线。在村子四周还筑起4个炮楼子，出口安上铁丝大门。在村子里设立了村公所并配置了警察，在各屯又设了屯长，成立了汉奸武装——自卫团，每天训练团丁，轮流站岗放哨，把守炮楼。并抓一些民夫通宵达旦地蹲在壕沟里拍手叫号。总之，日本侵略者对大东洲村民的统治和残害越来越残酷。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日伪在新宾制造的部分惨案

曹之文

下湾子村大屠杀

下湾子，是伪兴京县木奇区辖下的一个大村。1936年，伪县公署警务科和日本守备队，把下湾子村列为“匪区”，指使木奇警察署下湾子分驻所对当地老百姓实行血腥统治。到1937年底，下湾子村民竟遭到十余起野蛮的大屠杀。

1936年8月，伪县警察特别搜查班子木奇村小桥南水泉沟，以通匪为名将农民何景文抓至下湾子村赵家堡。伪警察们把他吊在树上，脚下堆起干柴，倒上煤油，用点天灯的办法将何烧死，并强迫村内百姓围观。

11月27日，下湾子分驻所所长黄万选配合伪县警察队到各山沟进行"剿匪"。至关家堡子沟里朱家岭大北岔，将散居的农民于廷弼等户包围，并开枪射击。于廷弼之弟在院内大喊："我没有枪，是好人！"一警察开枪先将其打倒，随后一群警察闯进庄稼院将藏在豆秸底下的农民单德的脑袋打开了花。这时住户纷纷外逃，警察们持枪堵截。于廷弼的三个儿子发现警察中有一名亲属叫关相武，即跑到房门口，跪在他面前哀求说："三叔，你们快把我们放了吧"关凶神恶煞般地说："放你！叫你一路去吧。"随即一枪将其打死。伪警察们疯狂射击，先后将于廷弼妻、二儿、姑娘以及赵老太太、王增等7名无辜百姓杀死，而后放火烧掉房屋。临走还将7人头颅割下，带到下湾子村，以"胡匪"名义示众。

不久黄万选又率领30余名伪警察进山扫荡。至赵家堡沙松河，将高家、孙家窝棚包围，高庆山之母姜氏跑到房山头，黄万选一匣枪将其下巴打掉。这时有朱、黄两警察将姜氏拖至河坎，朱补打两枪未死，佟又添了一枪把她打死。随后伪警察便把百姓们全赶到高家窝棚，挨个搜腰，掠夺财物。一妇女怀中小孩吓得哭起来，黄万选上前一棒便将妇女胳膊打断，小孩掉在地上。丧心病狂的黄万选竟扯起小孩的双腿将其摔死。黄万选等人又将其余群众赶到房前山坡，令其跪成一行，并派朱、董两名警士将高宝山孩子、王宝仁夫妻、刘荒荒、黄同等7人杀死，而后放火烧掉所有窝棚扬长而去。

12月初，下湾子分驻所配合县警察队出动，在水壶沟发现

一间房子。即将住户张童全家8口人（1名妇女、2名小孩、5名男人）全部押到分驻所。次日，除婴儿被一个姓管的抱养外，其余全被拉到村外枪杀。

伪康德4年（1937年）春，下湾子分驻所的警队到大西岔讨伐，在沟里一间房里发现三个“人票”。王、马等三警察开枪先将两个“人票”打死，另一个“人票”被王警士用枪筒将其头部打个窟窿当即流血倒地。两警察又用铁丝将打伤的“人票”胳膊绑上，这时警察们已把房子点着，他们便将“人票”扔入火堆烧死。

10月14日，下湾子警察队到太保沟、北映沟讨伐。路遇一名老太太和一名背小孩的妇女，伪警察们将她们抓住，并对其拷打，而后逼她们给带路。在太保沟，警队将居民点包围，随即向各户开枪，当即杀死无辜群众20余人，带路的老太太和妇女亦被枪杀。伪警察们并把2名儿童活活串死在小树干上。之后伪警察们又将尸体按到磨架上把人头剁下来，带回下湾子挂在分驻所门外柳树上示众。

2月，下湾子警队赴大洛久家沟，将住户管福昌等家包围，并向住户射击。然后将管福昌哥嫂、母亲、孩子等20余名群众绑上，接着开始搜家。几名警士把一住户的三缸苞米粒扒出，全部扔掉。被绑群众当天带到分驻所关押。次日晨，于西门外被集体枪杀。

同年夏，下湾子分驻所警队到大洛屯烧房子。他们把妇女都赶到一块，逼迫她们把衣服脱下，扔到燃烧的房子里烧掉。然后把这些赤身裸体的女人，一个个放掉。

同年，下湾子分驻所警队俘虏了山林队首领——平日本，同时捕去农民吴清山夫妻等4人，押至下湾子。木奇警察署特派警察前来，将平日本等5人枪杀。当场一警察刘某用尖刀将平日本

心脏挖出生吃，并将两男性生殖器割下挂在分驻所刺线上。

下湾子分驻所警队在伪康德三年曾先后两次和“抗联”作战，先后杀害“抗联”指战员5人。该分驻所多次集体屠杀百姓，其中一警察承认他参加集体屠杀3次，杀死40余人。因该分驻所屠杀人民有功，这年11月伪兴京县警务科颁发给该分驻所全体警察集体奖金。伪警察马元清被授予“青年虎将”之称。

下湾子分驻所这些汉奸走狗杀人如麻，康德3、4年间，经常到四道沟、大葫芦头沟、卖马集、大洛等地讨伐，到处杀人放火，整日枪声不绝，火光冲天。几乎每天下湾子分驻所门外柳树上都挂着血淋淋的人头，惨绝人寰。下湾子境内原有千余户，五六千人口，至康德6年（1939年）时，经过日伪的三光政策，已经变成了无人区。

（此材料来源新宾县公安局存案犯马元清、王志德、王汉奎卷）

旧门惨案

旧门，位于新宾县城东10余公里，日伪时该屯归旺清门警察署管辖。

伪康德3年（1936）7月里的一天，有拨“胡匪”到旧门屯朝鲜族住户抢掠大米。旺清门警察署日本指导官今枝恒士利用此事件大作文章，挑起民族纠纷，制造了旧门惨案。

8月13日，今枝派警察队将旧门屯包围，对汉族居民挨家挨户搜查，并把住民隗景新、李玉祥、隗景山、谷庄山、高钟士、李景然和徐氏妇女等捕抓带往旺清门伪警察署院内。今枝及其部下警署，对所捕村民不问青红皂白，一通严刑酷打，轮流审讯，逼迫他们招认是“土匪”。他们拒不承认，特务系便使用“电刑”、“上大挂”等酷刑对这些村民进行逼供。农民隗景

新、李玉祥等3人，被特务警察们用牛筋鞭、木棒、铁器等打得鲜血淋漓，皮开肉绽，4天后都被活活打死。农民高钟士连连遭受“上大挂”、“过电”、“坐老虎凳”等酷刑，9天后被一日本警察拖倒，让今枝的狼狗将其咬死、吃掉。农民隗景山被诬为“勾结土匪”，日伪警察先用电刑逼供，而后用烧红的铁条、烙铁往其身上烙，最后把他活埋了。农民徐宝林被诬为“大土匪”，受刑20余天，并被装入木制的囚笼，笼内有钉尖，放到院子里滚来滚去。日本警察持枪站岗，无论任何人经过警察署，都强迫踢囚笼一脚，否则即要挨打受刑。他们还用烧沸的开水往徐宝林头上浇，过了十来天，笼里生满了蛆，而后将其扔到江中死去。农民李景堂被诬“通匪”，伪警们五次三番地对其灌凉水、灌辣椒水。肚子胀大后，再用脚去踩，将水踩出来再灌。谷庆山不承认“通匪”，伪警就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灌煤油、通电。其岳父拿20元钱到警察署向李翻译求情，李翻译嫌钱少不允。次日当谷的岳父借100元钱来保他时，谷庆山已于前一天晚上在鞭子毒打下死去。被诬为通匪的徐氏妇女正值孕期，多次遭特务警察毒打污辱，灌凉水等，几次昏死过去。而后特务警察竟残暴地用刺刀将腹部挑开，用刺刀将胎儿挑出。不久，伪警们又从旧门将另一名姓徐的妇女抓来，对其严刑拷打，并扒掉她的衣裤赤身裸体地绑在木凳上，特务警察用枪探子、汽车瓶往其阴道里捅。徐氏亦是怀孕，即将临产，多次被折磨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再行毒打。次日，徐氏被扔到江沿边，一特务警察凶狠的又用刺刀将其腹部挑开，婴儿裸露母体之外时尚在血泊之中蠕动。悲惨情景实在令人目不忍睹。

（材料来源新宾县公安局存案犯朴烟千卷）

血案累累的新宾万人坑

新宾县街北山上，日伪时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屠杀场，群众称为“万人坑”。解放后曾多次挖掘，仅1964年一次就挖出尸骨200余具，有的是大人、有的是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骨胳层层，形态各异，还有被焚烧的痕迹。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场所。

据调查，当年日伪曾在这里进行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这里仅将有文字记载的部分血案记述如下：

1. 东金沟事件。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经常在新宾红庙子村一带活动。当地地主崔长海勾结伪县警务科特务汪明显、于井阳等，向日伪当局密报了抗联活动和抗联家属情况。康德3年腊月十六，崔带领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乘汽车来到红庙子。红庙子分驻所长朱继广和伪警们到各户通知说：“来发配给了。每户一张，还有咸盐。”待把村民全部赶到分驻所前，埋伏在四周的守备队和警察立即将群众包围起来，用枪刺逼着，不许乱动。随即按金崔密告的名单，将爱国群众王臣吉、刘庆堂、刘才、白君恒、关庆武、高英杰、徐德义等人，从人群中抓出，用汽车拉走投入县监狱。经伪警务科酷刑审讯后便带至北山砍死。不久崔长海又向县警务科报告说东金沟的杨秀风、黄明生、周永腾、李大个子等参加过“抗联”召开的会议。日守备队便将东金沟包围，当场打死6人，随后逮捕500名村民，押入县监狱。经刑讯放回近200名，其余皆被分批杀害于北山万人坑。

（材料来源新宾县公安局存案犯崔长海朱继广等卷）

2. 伪康德2年9月，一区土棍兰学文勾结特务警察王明周，诬赖住民王喜臣和胡子有来往。王喜臣随即被逮捕，在县守备

队囚室关押10余天后，被拉到北山万人坑杀死。

3. 康德3年10月29日晚，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队30余人，乘汽车来到永陵下元东沟门，到农民黄风祥家以“通匪”为名将黄逮捕，同时还将该村农民何大石头抓去，投入县监狱。11月初，黄、何二人在北山万人坑被杀害。

马架子沟事件

康德3年春，日本守备队在湾甸子区马架子沟被山林队“海林”包围，并打伤日军官、士兵各1名。不久，由日军行平和巡官于俊卿带警队和自卫团20余人，在马架子沟搜山，因没见“山林队”，便将在南、北、西山坡劳动的20余名农民赶下山，当即用机枪把他们全部杀死。接着又以“通匪”为名，将张俊、张三、张贤路、杨德清、孙老十、丁宝善、张四麻子、杨老奔、杨景新、朱守义、徐长忠、周凤山等20余名群众逮捕。除周凤山被打死在湾甸子警察署外，其余均用汽车拉至县镇，在北山万人坑杀掉。

白家事件

康德3年6月3日，日本指导官绪芳带搜查班百余人至三区白家村一带进行“剿匪”。先后将大堡朱玉坤、吴凤云、高文宾、那子均；白家村李鸣、何文凯、丁国正、那××、赵××；腰堡屯黄李、董凤洲、黄祥、金起贵、金起云、孙佐清、宁长清；樟木伙洛屯王俊清、刘青；陡岭村刘长玉、佟佐洲和砬子沟曲文财、佟景和等20名农民逮捕。走到蒿子沟农民那子均被绑在树上打死。孙佐清等19名被带至县警务科，经刑讯后丁国正、高文宾、那××、赵××等被杀于北山万人坑。李凤鸣等人被押月余放出。但由于他们在狱中被打伤过重，加之受到惊

吓精神刺激，不到半月，李凤鸣、王俊清、宁长清、金起贵亦相继死去。

（新宾县县志办于永陵地区调查材料）

新宾永陵镇刘国宣老人回忆：康德三年，在永陵街卖柴禾时被坏人咬住硬说他是“红军探子”。当他和妻子同抓到永陵警察署时，见已有40余人在押。这些人挨个遭伪警察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灌洋油和皮鞭打等酷刑。刘妻已有身孕，伪警一脚就给踢流产了。刘在永陵过堂时，脑袋叫伪警给打塌了，鲜血淋漓，特别警察桂风一又拿烟千子从脚背扎过脚心。不久把刘及孙立兴等37人送到县。在司法股过堂时，金大刀一脚踢到孙立兴小便上，孙当场被踢死。刘被押到监狱后，见有170多难友。过了几天，金大刀手里拿个纸单一次就点出30人，拉到北山被砍死。刘说：“……到年腊月二十三这天，监狱里就杀剩五六个人了。”

（刘国宣回忆录存新宾县县志办）

日本战犯矢野荣治交待：1936年5月任职务时，在分署长小林未夫的命令和指挥下，我以外10名署员在兴京汪清门，协同当地警察和自卫团50名，以“抗日有关人员”罪名，逮捕中国和平居民田某30名，分乘二辆载重汽车押送伪兴京县公署警务局特别搜查班，由特别搜查班采取灌水、上大挂或在棺材里钉无数铁钉将其衣服脱光，放进棺材里摇动的方法拷问。同年7月以《暂行惩治叛徒法》于伪兴京县公署后山，日军岩永大队墨崎中尉以下4名军官和伪兴京县日本指导官，警务指导官等6名，砍杀中国人田某等20名。其余10名被捕者，则在墨崎中尉指挥下，被25名日军士兵作为练刺枪对象杀害。

（材料来源新宾县公安局存日本战犯交待材料，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六辑）

日伪对三角地带的“讨伐”

第一次讨伐三角地带

岫岩县长刘景文和前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邓铁梅，共谋举起反满抗日旗帜，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第五十六路司令，拥有县警察队及匪贼数千，割据奉天省西部三角地带，特别是邓铁梅在凤城县内，纠集股匪数千，以东部三角地带为根据地，自称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形成一个独立王国，致使满洲国的政令不能施行。故从大同元年12月起至二年1月间，奉天省警备军紧密地配合日本军第1师团及独立守备队，编成了王、李、赫三个支队，对匪团加以扫荡。其结果是上述匪首仅以身免，而部下皆纷纷星散。

第二次讨伐三角地带

一度归于平静的三角地带，也趁着日、满军主力参加热河作战之隙，再次蠢动。从大同2年4月15日起至5月下旬，对其进行讨伐。在以刘景文、邓铁梅为首的1 000余名中，除于深海等十余匪首投降，虽未将刘、邓匪首打死，但已不见成百的匪军，治安大致已被肃清。

第三次讨伐三角地带

警备军以主力讨伐东边道，从而削弱了三角地带的警备力

量，一度曾归于平静的邓铁梅、刘景文、李春润、任福祥等匪首，又纠集1 000来人，将大批武器弹药由水路运往陆上，反满抗日的气势又抬头，所以从大同2年7月开始，进行了两个月的扫匪，遂使之四散、溃灭，治安趋于平定。

第四次讨伐三角地带

由于经过了数次的讨伐和分散部署的扫荡，匪团的根据地虽然覆灭，但邓铁梅、任福祥为首的许多大小匪团又开始蠢动，其潜在势力是不易于铲除的，然自大同3年1月至5月间，进行了勇猛坚决地讨伐，收到了效果，捕杀打死了大小匪首数十名，未被打死者便只身潜逃，使之不能再进行大的策动了。

（摘自《东北“大讨伐”》卷）

野崎茂作口供

（1956年8月15日）

问：你把参加三角地带讨伐活动的罪行事实讲一下。

答：对三角地带邓铁梅爱国军的讨伐，是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而实行的。在这次讨伐中，我以副官的身份作为岸宪兵长的部下。在1932年12月6日，我事先参加了在复县公署召开的讨伐会议，会上决定从12月10日开始，以多门师团为主，对奉天、安东、瓦房店三角地带进行讨伐。

同年12月16日，我奉岸宪兵长的命令，率领部下宪兵16名、庄河县警察20名、自卫团30名，在庄河县城内外进行搜查，结果从城里逮捕了邓铁梅部下士兵5名，在附近村庄里逮捕13

名。我命令宪兵曹长以下10名，对爱国志士进行拷问，并在该日傍晚，奉岸宪兵长的命令，我亲自指挥宪兵15名在庄河县城北的沙滩上，将这18名抗日武装人员排成一横列，用马枪枪杀了，并将尸体弃在原处。

19日，我率宪兵12名，在大孤山西方20公里的村庄中，进行了盘问搜查，我和渡边伍长各逮捕了邓铁梅部下1名，中国共产党员1名；式守上等兵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员1名。在该村村长家中，我对这5名爱国者进行了拷问，我用了棍子打脸，翻译使用了大弯腰、喷气式等酷刑。我肯定该2人是邓铁梅部下，3名是南方人，中国共产党员。当晚，我命令渡边伍长及部下10名，将这5名爱国者带到该村北方的田地里，用马枪杀害。

12月13日或14日，宪兵曹长等6名，在复县和庄河县境的村庄，以及庄河县内的村庄，共逮捕了邓铁梅的部下10名，枪杀了。因为我曾对曹长等6名宪兵传达了岸宪兵长的命令："如捉到邓铁梅的部下，就地枪决。"

另外，从安东来参加讨伐的宪兵，也严重处分了30余名邓铁梅的部下，我也有责任。

现在我讲关于土城子事件中的罪行。1932年12月16日晚，森靖安骑兵队长在庄河县城西北方12公里的土城子，受到红枪会抗日武装的袭击，靖安军被打死16名，红枪会爱国军方面牺牲了7名。我奉岸宪兵长的命令，自17日从庄河县出发，到土城子调查此事。我从森靖安军阿部少佐处了解到土城子村长曾向导过该红枪会，袭击了靖安军本部。因此我对他进行审讯，知道他在16日晚让12名红枪会人员在他家吃饭，并将靖安军的宿舍驻地告诉他们。我遂命令部下将该村长绑起来，用汽车送交庄河县警务科，后来听说该村长被庄河县警务科枪杀了，并在城门上悬首示众。

在三角地带讨伐期间，曾搜集情报70余件，内容全是关于邓铁梅抗日爱国军的行动，都报告了讨伐队。还协助侵略部队的军需人员，掠夺中国人民大量粮食和财物等。

（摘自《东北"大讨伐"》卷）

日本侵略者在清原的大屠杀

王治山　王雅文

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至康德4年（1937年）期间，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和镇压清原人民，妄图割断人民群众与"抗联"的血肉联系，打击我抗日武装力量，派驻清原县两支日本守备队。一支驻清原街内，其任务是监视和镇压抗日分子和无辜百姓；另一支负责四乡讨伐，打击我抗日军民力量。

日本守备队在盘踞清原期间，铁蹄踏遍各地，到处杀人放火，穷凶极恶，罄竹难书。

南山城子地区几起血案

伪大同元年(1932年)，日本守备队在清原县南山城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随意杀害我无辜群众的事件。有的群众被诬为"通匪"或"反满抗日"遭到杀害，有的走在路上无缘无故被杀害。苇塘沟村住户徐文斌，被扣上"窝匪"罪名，全家老小4口人，全部被杀害。住在三间房村的我抗联三师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母亲和两个弟弟，被守备队抓走不久，母子3人全惨遭杀害。太平沟的祁哑叭，去南山城办事，路过守备队门前，凭空被以"土匪"罪名杀害。南山城村农民孙绍文的弟弟和杨玉珠的弟弟，

在走农村小道的路上遇到日本守备队，同时被杀害。更为甚者，于大同2年（1933），日本守备队竟把他们抓去的12人，都被扣上“通匪”或“反满抗日”的嫌疑犯罪名，在南山城烧锅院内集体屠杀。不久，又在郭铧炉院内屠杀无辜群众8名。残暴的日寇还将被杀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大树上示众。由于日寇常常无故抓人、杀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南山城地区。阴森恐怖的日本守备队驻地附近，几乎断了行路人。

崔庄子大屠杀

伪大同2年（1933年）10月，我反满抗日的大刀会40余人，驻扎于崔庄子村。日本守备队讨伐进村后，在大刀会驻地发现有大刀长矛，便逐户搜查。最后将搜捕的24名大刀会员，会首三人和农民王福祥的大哥，赵洪亮共29人，绑起押到刑场上，用机枪集体屠杀。

枪杀后，又在每个遇难者的身上各补一刺刀。惨案后，全村50多人家，都星夜外逃避难，村里只剩下两位病弱老人。被害同胞的尸体无人敢去掩埋，任凭狼狗撕扯，惨不忍睹。

王小堡大屠杀

伪满康德2年（1935年）3月24日，一伙山林队进入六区大地村王小堡。去夏家堡地区剿匪的日本守备队得到情报后，于下午3点钟赶来。当守备队离出屯不远时，山林队占据了山头，待守备队走进埋伏圈便开枪，双方打到晚5点多钟，山林队撤退了。激战中打死两名日本兵。守备队进村后，不管男女老少，不是开枪射击，就是用刺刀挑。不多时就有9名无辜群众被杀害。仅阎洪余一家就被打死3口。杨二晃子被刺死。他儿媳妇抱着小孩被鬼子杀害后，孩子还在妈妈的身上哭叫着。80多岁的赵文

忠老人也被鬼子挑死。最后又把全屯26间房子全部烧光。致使王小堡的老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

马架子大屠杀

伪满康德2年（1935年）4月初的一天，“海林”率100余人去大苏河，途经马架子村时，被走到东岭岗上的日本守备队发现。这30多名守备队和伪警察队，随即向土匪追击。追到马架子西岭时，被土匪包围。在与土匪激战中有两名守备队员被打死。战斗结束后，守备队把两具死尸抬到马架子村叶永富院里。随后便到各户搜查，见男人就抓，共抓到贫苦农民19人。他们强令这些人跪在两具尸体前，先痛打一顿，随后将每两个人绑在一起，押往村北。当走到街上又遇到一个叫苏宝贵的讨饭老人，也被抓来。守备队硬说这20名群众是“土匪”和“通匪”，押到村北地边上，就用机枪扫射起来。当场死亡17名，3名受重伤的不多几日也都相继死去。这次惨案的遇难者有：叶永富家哥仨、刘家爷俩、冯贵家3口、老穆家2口、老何家1口、老郎家1口、老于家3口和车老三、车老六、苏宝贵等。灭绝人性的日本守备队在大屠杀之后，又纵火烧毁全村住房。顿时，马架子村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无辜百姓叫哭连天。敌人撤走后，乡亲们忍着悲痛掩埋了亲人，然后都连夜逃走了。有的投亲奔友，有的流落异乡，乞讨街头。

上烟沟大屠杀

伪满康德2年（1935年）4月18日，土匪头子“逼累”率匪徒百余，窜进上烟沟村，逼迫群众给杀了18口猪，又派人去北三家为他们买烟、买酒，准备大吃大喝一顿。日本守备队在北三家车站得知情报后，立即前去讨伐。当守备队赶到上烟沟

后山时，土匪又乘机将守备队拴在村外的7匹战马牵走。日本守备队便对村民大肆进行报复，见人就杀。当场被杀死的有张殿甲、孙英的二哥、韩祥云的父母、唐振国的哥哥等16名。受伤的有孙英的父亲和大哥、韩祥云的姐姐等4人。最后又放起火来将全村100多间房子烧毁。

蔺家堡子大屠杀

蔺家堡子位于清原县夏家堡乡的北部，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村。

伪满康德4年农历二月初二，蔺家堡子群众正在过着传统节日——二月二。不料一早，一群土匪窜进村子，将群众过节准备的吃喝全部抢去，并将全村仅有的几头小猪杀掉，以供他们饱餐。早饭后，夏家堡区讨伐队长庞国彦，领着日本守备队30多人和伪军10多人，来到蔺家堡子，并在堡子南山接火，有两名日本兵被土匪击毙。土匪逃跑之后，日本守备队抬着两具尸体闯进堡子。进村后，到处抓人，为其抬担架。担架出村后，日本兵继续搜捕群众，将他们押到村内一口土井周围。日本守备队长务路大尉气急败坏地命令被捕者跪在井台上。老农民申庆丰一看形势不妙，便对务路大尉说："我们这里没有外来人，都是本村好老百姓……"还没等他话说完，一个凶狠的日本兵飞起一脚就踢掉了他的下巴。随后，日本守备队长务路大尉便下令向人群开枪。一阵机枪扫射之后，井台上的35名群众全部被打倒。接着凶恶的日本兵还逐个检查一遍，对未死者，再用刺刀捅死。70多岁的肖德恩老大爷，当时未死，又被补了一刺刀。此时另一批日本兵还在到处搜查。有个姓孟的老大爷，藏在村内被发现，当场被刺刀挑死。这一场血洗，当场死去30人，身受重伤的6人。

日本守备队出村后，妇女和孩子们哭天喊地的抢救亲人，全村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受重伤的6人，除辛玉山得救外，其余全都相继死去。

（摘自《清原文史资料》）

日军屠戮，城乡喋血

王宝仁

寇半沟惨案

1932年4月初，日伪安东地区警备队在司令李寿山带领下，正在大东沟的龙王庙驻防。一天，忽然接到日军命令，让该队速赴庄河寇半沟“围剿”庄河抗日独立团。正欲出发，突然遭到邓铁梅抗日自卫军袭击，李寿山大为恼火，没捉到抗日军，便把当地民众以“通匪”、“匪属”为名，逮捕62人（其中有抗日军伤员，还有一名家庭妇女），用绳子联绑在一起，挟带西行。4月7日中午，到达高岭曲木房。这时驻守在寇半沟的抗日独立团在刘同先和王宝绪指挥下，于双塔岭前坡正和日本守备队鏖战。抗日军凭借优势地形，把爬上来的日军打得焦头烂额。日军将死伤者装进汽车正欲逃跑，李寿山指挥1 000多伪军从双塔岭后坡向独立团猛扑过来。抗日军背腹受敌，乱了阵脚，被迫撤退，最后独立团被俘200余人。

4月8日，伪军把战俘（包括在龙王庙抓的百姓）从吕店带到寇半沟，关押在小学校教室里。李寿山就地设立“公堂”，逐个动刑审讯，并抬来十几口铡刀，扬言全部处死。龙王庙一被

捕青年农民因家有寡母需人奉养，苦苦哀告放他一命，李寿山不准，且当即打死。当地开明人士李德贤、寇永忱等冒着生命危险以身担保，保释出200多人，其余60多人多是在龙王庙捉获的，李寿山明知这些人都是平民，但他为了讨好日寇，邀功领赏，拒绝具保。下午，他从中提出32人，在背上插上“亡命旗”，拉到英那河畔，砍下首级。剩下30多人带走了，以后下落不明。

庄河惨案

1932年4月7日，日军驻庄河守备队，于双塔岭受挫，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怕抗日军来袭，二怕当地民变。为了维持他们在庄河的统治，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卑鄙手段。4月8日上午，日军派出一个小队，乘一辆汽车窜到寇半沟，从伪军司令李寿山的战俘里要来10名所谓抗日军，把他们五花大绑装进汽车里。往回走时怕被劫持，李寿山还加派了一队伪军护送。过了双塔岭，正好遇到两个串亲戚的农民从山路上下来。日伪军大惊，以为是抗日军，围住搜身时发现二人都系红裤带（他二人都结婚不久），便诬称他们是大刀会的人，生拉硬拽地将这二人推进汽车里载到庄河。第二天晚饭后，日伪军将这12名无辜百姓拉到小河东树林里枪毙，割下首级，悬挂在街边电线杆上。

赵水河畔的亡灵
——朱营子惨案

1933年4月中旬，日伪军对庄、岫、凤三县连界的地方进行第2次“讨伐”。日军的板津羽山、贯志兼石等支队和伪军配合，分多路向抗日军邓铁梅、刘景文部猛扑过来。邓铁梅自卫军之一部，在云海青领导下撤到高岭山区打游击。庄河伪政府

得到消息，忙调动伪警察大队，在刘庆春、曲子阳（外号曲大天）带领下窜入高岭，进行所谓“剿匪”。由于抗日军早有准备，警察队刚踏入来宝沟，就遭到抗日军的迎头痛击。日伪军慌忙调动日军守备队40余人、伪警察400余人，在日本参事官喜多章一、警务局长苗建发等人带领下，于6月3日窜入花院朱营子驻下，强迫花院、高岭、塔岭等五个村的青壮年4000余人，配合日伪军“拉大网”。他们兵分三路向高岭、塔岭群山围攻过去，扬言：凡从“大网”上摘下来的人一律砍头。日伪军一进入山区，便大打大杀。窜入高岭的一股日伪军，走到福宁、丛家堡子，发现一人往山上跑，他们不分清红皂白，便开枪把他打死，并割下耳朵。接着又用六零炮、机枪向丛家堡子、林家店一带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猛烈轰击扫射，结果打死了无辜百姓孙家裕等3人，伤者数人。

6月5日，各路“拉大网”的日伪军先后返回，麇集于朱营子曲家大院。所谓“拉大网”名义上是捉拿抗日军，其实抗日军早就转移了。他们用中国人民的生命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邀功领赏。日伪军把一些在山上打柴的樵夫、蚕民和串亲友的百姓抓了30多人，关在朱营子曲家大院，由日本参事官喜多章一亲自“过大堂”——施加酷刑。高岭子有些串亲戚的百姓被抓，心急如焚，联名请托村长赵相亭出面担保。赵先后把高岭子的丛德仁、丛德信等二十几人保出。剩下的7人是外地人到高岭串亲戚的，虽然先后多人具保，但一律被嗜杀成性的日伪军拒绝，晚上他们把这7人拉到赵水河畔杀掉了。

铃铛山下的冤魂

1932年3月21日，日本守备队120余人，在中队长饭冢带领下，乘8辆汽车，从庄河窜到青堆镇，扬言要“围剿”抗日义

勇军刘同先、王宝绪的队伍。其实刘、王的队伍早一天就撤离了青堆镇。守备队明知无“匪”可剿，却以搜捕抗日军为名，破门闯户、大抢商家财物。一时间把安静的青堆镇，搅得鸡犬不宁。一伙日军窜入青堆澡塘子，抓了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李开远，尽管百姓证实其为平民，日军却不肯释放，硬当成“便衣队”，拉到镇郊枪杀了。滕木匠是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出外干木匠活干完了往回走，正好遇上日军，阻住盘查，滕木匠一再说明自己是干木匠活的，但日军哪听他的，拉到小潮沟坝下枪毙了。

日军在青堆镇骚扰两天一夜，共抓平民百姓10多人，就地枪杀6人，余者带走，下落不明。

（摘自《庄河文史资料》）

日军在岫岩的暴行

岫岩政协文史办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日军即侵入岫岩。当时岫、凤、安、庄、海、盖、辽各县的毗界处，是抗日军的游击区，从日军侵入岫岩的那一天起，抗日烽火即遍地燃烧，抗日军民前仆后继，坚持抗日达8年之久。这些抗日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日军对抗日军民的屠杀也越来越残酷，他们不但疯狂地围剿抗日军，同时又极其野蛮地残害人民群众，甚至连妇女小孩也不放过，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一、枪杀

用侵略者的话说，枪杀还算是对中国人处以极刑的一种“恩赐”。岫岩全县死于枪杀者不可胜举。

1.1932年12月15日，日军兵分五路入侵岫岩。从海城及大石桥来犯之敌，在大偏岭及新开岭受到我抗日军的沉重打击，侵入岫岩城的日宪兵队长板元立即将无辜群众集体枪杀30余名，弃尸于岫岩城北墙角下，被野狗吞噬。

2.1933年春节后，红旗营子乡古龙村民自发组成一个高跷队，先后到岫岩城、关门山演出。当解散回家时，陈永芳、陈永茂、陈永胜、陈永礼及一个叫小信子的5个人，行经齐家堡子大河套，正赶上日军从南山下来追击抗日军营长庞景泰。日军未问青红皂白，一并绑到北限子大河沿枪杀。

3.1934年春节后的第5天，驻哨子河日守备队，突然包围了哨子河乡虎岭村（当时叫老赵家堡子），将茶余饭后聚在一起聊天的赵景英、赵连忱、赵连勇、赵连长及赵连勤5人抓走，带到三道河背阴汀大岗上枪杀。老赵家堡子是抗日的“少年铁血军”第二任总司令赵同及参谋长赵伟的家乡，住有本族49户，先后被杀害28人，有30余户的家屋、财产全部被烧毁。

4.1934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军奔向岫岩城以北的包家堡子一带讨伐抗日军，抗日军已闻讯转移。日军得不到抗日军去向的情况，就抓当地群众21人，用劈柴棒子打，皮鞭子抽，逼问抗日军去向。这些群众都咬紧牙关不开口。傍晚，日军把一个名叫罗玉维的年轻农民，从被捕的人群中拽出来，手持战刀做砍头的架式，威逼他说出抗日军的去向，罗玉维挺着胸膛说：“不知道。”日寇用刀砍死了罗玉维，以此来威吓被抓的群众，但日军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知道”。这20名群众遂

被关押在王家堡子守备队。日军用尽了各种残酷刑罚，也没有捞到一点情报。2月25日，这20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全被枪杀于王家堡子东河套。

5.1934年春，红旗营子乡东泉眼村傅多善领两个儿子给邻人维修炕后，于返家途中与日军相逢。日军见到他们三人满身泥巴，便认为是“马胡子”化装，当即捆绑起来带到哨子河，一并被枪杀。

6.1934年春，日酋提岛率日伪军百余人，由汉奸杨逢阁引导，进至东大营子的荒地大岭之三道沟，将当地群众男女60余人团团圈住，以通匪、济匪、窝匪的罪名，用机枪扫射。嚎啕之声，动地惊天，60余人，无一幸免。

7.1934年4月间的一个昏夜，日酋10余人野狼般将白鸿普等3人，从睡梦中逮捕。翌日即枪决于当时的“杀人场”八棵树。罪名是：白等3人在岫岩镇南街合资开设药铺，取名“同志药房”，不料，竟因此而引出杀身大祸。日军认为“同志”就是反满抗日组织。当时被杀的白某刚度完蜜月，同难的沈某也新婚不久，同时被枪决的尚有7人。

8.1934年5月17日，苗可秀部下蔡景春，因患时疫在东大营子的石头岭自家隐匿养病，被日军侦知捕去。不久，在岫岩镇八棵树枪决，一同遇难者8人。

9.东沟县黑沟村朱家堡子，在敌伪时期，隶属岫岩县王家岭村，是抗日军任福祥的故居。1935年春节时，驻哨子河街的日军，以为任福祥必能率队回家欢度春节，就悄悄地把朱家堡子包围了。搜捕未获，即将朱家堡子烧毁。春节后，又去朱家堡子邻近村屯刺探任福祥的消息，见到很多群众的门口墙上贴有“接福迎祥”横幅，日军便认为是欢迎任福祥的标语，即以通匪罪名，逮捕枪杀数人。又发现贴这样横幅的人家仍很多，就

又逮捕了四五十人。被难家属，以重金呈翻译，向日军说明这是中国人春节时的对联，与任福祥毫无关系，就这样，被捕人也遭到罚款和打骂，才得释放。

10．1935年5月4日，邓铁梅部十六团团长文立善，在其故居文家街为其父办理丧事时，驻哨子河日守备队率伪军300多人，将文家街包围，文立善率队边战边撤，亲属均随队撤离。日军便将另一家也因办丧事穿孝服的人抓去13名，带回哨子河。日寇在哨子河街东头柳树林子里，枪杀12人，并割首级送到岫岩县城报功。

11．1935年1月，日军一个小队在哨子河的董家堡子一带，与苗可秀部下相遇，遭到突袭，退至大山嘴附近的砬子沟。密探报告："这里老百姓都通匪"。这沟的30多人遂被押至洋河沿，尽遭杀害。

12．1935年冬，日军在小汤沟村（现为朝阳乡）的荒地一带搜山，搜出抗日军伤病员29人，诡称送岫岩西山医院医治。及车行至喜鹊大岭庙前时，日军把全员驱赶下车，用机枪扫射，只有一人机警地钻进丛林中幸逃，余28人全部被害。当年山中积雪近1米深，日军命令附近百姓，把28具尸体全部埋入雪中。及第2年春雪化时，日军又令附近屯牌长率附近村民，把死难者的生殖器全部割下，送县呈验是否有脱逃者。

13．1935年末到1936年春，日军在汤沟村（现为汤沟乡）用各种手段，残酷杀害农民和妇女40多人。如农民李小群子、李小二哥、顾德刚的三儿子及侯振华等人。

14．1936年2月15日及2月22日，日军在四道河村，以通匪罪名连续制造3起杀害群众事件，当时被枪杀者马玉珍等53人，此即"四道河惨案"。

15．1936年12月10日夜11时，驻岫岩日守备队长藤井率

部倾巢出动，包围搜捕了岫岩县教育界的名流关英华、江敦友等12家，并绑押到日宪兵队，以"捐资救国反满抗日"的罪名，先后枪杀5人，投掷抚顺监狱3人。

16.1936年5月，驻哨子河日守备队，为威吓同情"少年铁血军"白指挥的老百姓，竟将其家乡和家堡子（现名永贵村）地地道道的老农赵学吉、张吉林、张云龙的二女儿张凤玉、张凤英的爱人刘氏，以及李运广、李运春等6人，抓到哨子河全部枪杀。

17.1936年12月26日，日军大讨伐时，驻大山嘴的（现属红旗营乡）提岛队长，在防地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刚一开始，就把从三道干沟子抓来的农民姜春海、张俊曾等12人，当场枪杀。

18.1937年2月13日9时许，驻防于哨子河的守备队，和来自大石桥的警备队长酒井贞也，在哨子河小学操场召开大会威胁群众说：对马胡子的食宿行动要及时报告，否则枪杀不贷。说着说着，就把在押的文立善（抗日军）的家属及亲属文恒亮等14人搜出，其中4人被认为罪状较轻的被枪决，余者有的被刺刀捅死或砍头，有的被挖心。

19.1937年4月，石灰窑警察署逮捕了曹奎元、曹福元、曹占元、曹绪林等。这4人只因是抗日军曹国仕的同族，就和被捕的义勇军战士和无辜群众共24人，一并被枪决于爬虎岭小东沟。其中有妇女1人，怀中紧抱1个哺乳婴儿，当枪杀这个妇女之前，1个日寇竟用刺刀挑起婴儿摔出10余米远，婴儿头颅粉碎。

20.1938年10月3日上午，驻哨子河守备队长末田，及由大石桥赶来的警备队长酒井，伙同岫岩警务局特务股长海老古，在哨子河小学操场，召开全村村长、屯长、牌长及哨子河附近各牌的群众大会。会场两侧各安置机关枪1挺，由日兵4人，分立

两侧。在操场的四周，布置伪警察，手握枪托，枪上刺刀，气氛森严，如临大敌。当时的村、屯长，多数是抗日军——“少年铁血军”的同心会会员，或是同情抗日军者。大会开始前，命令与会者席地而坐。台上的酒井，目射凶光，扫射台下一周开腔了：“你们三角地区的马胡子，经常在这一带窜扰，能不食不宿吗？可是好久好久没有得到报告，偶尔得个报告，当我们去清剿时，十则九空，再不就遭受埋伏袭击。这个原因，你们能不明白吗？我们已洞察清楚里头是怎么一葫芦药了，今天要你们一定说个水落石出，不然决不让你们混过关去。现在发给你们铅笔和纸，只要你们写出谁通匪、济匪、窝匪，或者在谁家吃过饭、住过宿，这样我就不杀你们，还赏赐你们……”

说到此，喊出哨子河屯屯长汪盛林、黄旗沟屯屯长赵长泉、北堡屯长李景田及大沟屯长刘清林。并命令汪盛林先写或口头讲。汪盛林怒目挺立，一言不发，鬼子大怒，就指令两侧日军开枪，汪盛林当即倒于血泊中。赵长泉见状，立即钻进人群中，队形大乱，乘机逃出。2个日兵随又拽出李景田及刘清林。李景田趁鬼子兵之不备，反身猛向日兵小便踢了一脚，日兵惨叫，仰面朝天，另几个日兵立即把刘、李乱刀刺死，同时把“少年铁血军”小队长于德琛的叔父和一名农民赵××枪杀。当时与会者连惊带怕，号哭声，怒吼声，为状极惨。

二、填冰窟窿

1934年冬，日军将曹国仕（抗日军）的同族曹国昌等8人，在兴隆乡的二道河、三道河逮捕。一天，夜行军到达哨子河与大洋河汇口处，砸开冰层，开口约3米的直径，把这8人一一推进冰窟窿里，溺冻而死。

三、活埋

1.1935年冬，日军在东大营子北吴家沟曾活埋李四龙等无辜群众多人。

2.1937年春，日军从大营子北横山子抓走抗日女杰关世英之母沈氏及一个侄子两个侄女，同时抓走同屯的胡老五、刁永胜、马老五等30余人；到大营子镇后又抓来抗日军——“少年铁血军”第2路指挥赵庆吉之长子赵德宽及吴家沟牌长吴永祥（外号吴聋子）及群众刘庆祥等共51人，用一辆大卡车拉到鸡冠山北“棒棰岭”——沈丹线上一个涵洞，全部活埋。其中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怀里还抱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孙子，手里牵着五六岁的孙子，也同时被推落坑里，一并活埋。

3. 三清观居民陈兆凤之子陈大龙，参加了抗日军。1937年9月日军准备抓陈兆凤，适值外出，逐将其老婆及8岁的女儿逮捕。当天就在他家附近活埋。

4.1939年春，三角抗区的抗日军，已濒全军覆灭。有些抗日志士，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就潜匿于深山中。日军用“拉大网”的办法把“少年铁血军”一个姓于的小队长、战士蒋××、张成德等26人先后绑至岫岩城西爬虎岭，一同推入事先挖的大坑里活埋。

5.1939年春，日军行军到洋河的冷家沟时，突与农民佟玉春相遇，日寇头头当即令该人挖坑，然后将该人推落坑中活埋。

四、狼狗吃人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冬，日军侵入岫岩，为发泄对抗日群众的仇恨，入城后，立即在城东“八棵树”围了一个狗圈，内养狼狗十几条，直到1939年末，才将狗圈拆除。其间，

经常利用夜间，把所谓的“通匪犯人”扔到狗圈内，任凭狼狗生吞活剥。被狼狗吃了多少中国人无法统计，不过人们都知道，狗圈内从不曾投放饲料，在狼狗饿极呈现相互追逐时，日寇就把犯人投入狗圈，有时犯人的呼救声，狼狗的追逐声，凄厉惨叫声，撕人心肺，如遇深夜，声闻数里。

五、冻冰人

1935年1月大山嘴村（现红旗乡大山嘴村）关村长被日军逮捕押到岫岩县守备队，日寇逼他承认“通匪”，关村长拒不承认。日军遂将关的衣服扒光，绑在旗杆上，一个劲地向他身上泼冷水。当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关村长直至被冻成冰人而死去。

六、割生殖器

1936年2月，驻王家堡子日寇守备队的一个日酋，得知吃活着人的男人的生殖器可以医治他的瘤疾时，这个日酋就从关押的群众中挑选出身强力壮的青年农民曹有太，紧紧地捆绑后，把曹的生殖器割下来，曹有太疼昏后死于日军刺刀下。

七、挖心

1. 从县公安局敌伪档案资料查阅，汉奸张星武自供：曾杀人扒心供日本守备队长做下酒菜，前后有两次。一次是伪康德3年（1936年）7月，在岫岩城南八棵树，杀死曾当过抗日军营长周景桥后挖心。又一次是同年在哨子河街时，日酋示意要吃人心，就把抗日军小队长吴九春的父亲吴庆至刺死，把心扒出来做了酒菜。

2. 1938年2月13日上午9时，在哨子河学校操场，一次就

把和抗日军文立善有关系的人挖心4名。这次挖心，残酷已极。先将每个所谓的“罪犯”的脑盖皮剥下，盖住眼睛，再用冷水向胸部泼了一下，尔后割开胸腔，用手掏心。

此外，个别被扒心者也大有人在。东大营子北三清观的孙喜瑞的祖父母，在1937年同时被日酋扒心。东大营子北错草村农民甄开全的父亲也是在那年被扒心的。日寇所到之处，有时即以扒中国人的心来取乐。被日寇奴役的14年里，岫岩群众被扒心而死者不可胜计。

八、土雷炸

1. 1936年2月5日，日守备队佐藤小队长，得到密探报告：朝阳乡刘俊卿（外号刘二晃头）开个丝房子，叫刘家丝房，宅深院大，围以高墙，保有20多支大枪。日军随攻破刘家丝房，当场捕获30多人，其中有丝房主人，有护院炮手，绝大多数是缫丝工人。当天被带到汤沟郭家店，然后在德纪河套（汤沟乡、朝阳乡的岭前岭后）把所谓的“犯人”团团围住，就向人群中投掷土雷，一次就炸死林懂、张品山、刘绍忱、姜老四、顾奎生、刘羊倌、刘猪倌、王介山、王常胜等24人。惨案起因，本是刘俊卿引起的，结果刘俊卿用200元小洋钱，通过郭家店进贡给日寇翻译官的姘头郭小枝，借以得到庇护，安然无事，遭难者都是些缺衣少吃的无辜工人，所谓“猪替羊死”。

2. 1936年春，驻汤沟乡日守备队佐藤小队长把汤沟村古石沟卜家堡子居民卜文恒，以“土匪”罪名捉住，将手榴弹楦在他的裤裆里，把他炸死。以上两起被炸的人，都是血肉横飞，家属去领尸，均已无法辩认。

九、刀捅

1.1936年2月6日，驻哨子河日酋提茂队长在其卧室审讯“少年铁血军”中队长赵恩泽的妻子赵傅氏时，竟拟强奸。赵傅氏大喊救命，其同监的婆母赵卜氏，闻声怒极，闯门而入，猛扑提茂，手抓其脸，口咬其手。提茂大惊，急喊喽罗将赵氏婆媳拖出。两天后，将赵妈妈用黑纱蒙住双眼，铐上双手，拽赴哨子河东河沿。当捅第一刀时，赵妈妈大骂：“你们这些丧尽良心的鬼子死期不远了！”当赵妈妈再张口时，已被刺刀穿胸，倒于血泊中。

2.1935年1月13日，日酋提岛率日伪军60余人在小汤沟顾家堡子宿营，次日逐户搜索，并将全堡男女老少赶到大街上，问：“看到马胡子没有？”原来在日酋到达此地之前，铁血军第四路指挥曹国仕率队曾在此地住过两天，但群众谁也不肯说。提岛早已侦知实况，见问不出口供，便从人群中把王庆才、王春芳、李桂春、郑元垂、李富、刘忠文、顾德成、张铁匠、刘三晃等9人捆绑刑讯，敌人棒打脚踢，终不肯吐一语。日寇于当日下午，在一个影壁前把9人用刺刀捅死。所以当时叫做“影壁墙事件”。

3.1935年的冬天，小汤沟（现为朝阳乡）顾家堡子老朱家被并户后，因弄不到住处，就在烟囱砬子沟里挖个地窨子住下。被日兵搜山搜出来，没问青红皂白，一家9口，一个没留，连哇哇哭的孩子也全被日兵用刺刀捅死。

4.1935年冬，日军为追捕曾当过抗日军的杨永吉未获。一天数名日军闯入大房身太阳沟杨永吉的三弟杨永林家，杨当时正与妻女吃饭，敌伪连一句话也没问，就把杨永林从炕上拽下来，带到村北山沟里，绑在大树上，用刺刀把肚子挑开，肠子

流出来而死。

5. 1936年1月，小汤沟（现为朝阳乡）暖泉村王福庆一家，在一个地窨子住，搜山的日军把王福庆的父亲、母亲、老婆、哥哥、15岁的弟弟、18岁的妹妹，一家6口带到暖泉瓦房沟大烟卤砬子，全部用刺刀捅死。当时王福庆因外出幸免。他老婆当时挨了几刀，又被打了一枪，但都未中要害，后来渐渐缓过气来，得以死里逃生。此人现年已77岁，伤疤犹存。

（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军在清原于家沟的"三光"政策

王凤春　毕庶范整理

于家沟是清原西南25公里外所属敖家堡乡的一个偏僻农村，峰峦连绵，森林密布，抗日力量经常在这一带活动。驻清原日本守备队伙同汉奸队多次到那里"清剿"，都未见效。为了断绝人民与抗日力量的联系，企图彻底消灭我抗日力量，日本人想了个毒辣办法，实行"三光"政策，从而给于家沟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1934年1月27日，驻清原日本守备队、汉奸队和伪警察，突然窜到敖家堡于家沟，当即从沟外往沟里逐户烧房子，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时候大多数农民都出去干活了，看到冒烟，误认为是谁家起火，纷纷跑回来救火。回来后，日本兵端着明晃晃带刺刀的枪，呱呱乱叫，不准老百姓进屋拿东西，不准救火，农民吓得胆战心惊，悲痛万分。居住在于家沟的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全部烧光了，所有粮食、衣服、被褥、箱子、家

俱……等也都烧在里边。农民于占水因为有病没能爬出来，被活活烧死了。还有老高家一位妇女，生小孩才7天，就遭遇烧房子，他们家里人苦苦哀求，不但没有得到允许，反而遭到辱骂，他家里人无奈，只好把产妇和婴儿抬到背风山窝上，暂时安置一下。在那严寒的腊月里，健康人在山上过夜，都难以忍受，何况刚刚生小孩才7天的妇女。好容易熬过一夜，第二天，他家里人把她抬到亲戚家里，不到几天这位妇女便被折腾死了。

这次烧房子造成几十户人家无家可归，邵宝林（原敖家堡乡党委书记），当时才七八岁，跟着他80多岁的爷爷过日子。因为无亲可投，无友可靠，就搬到四面透风，缺门少窗的关帝庙里，住在关公泥像后边，用草盖在身上，爷俩缩在一起，冻的直打哆嗦。由于粮食烧光了，又没有吃的，只好沿街乞讨，因为要饭的人太多，家家户户都缺粮，一天就是残渣剩饭，也要不上一顿饱饭。他爷爷在第二年正月初就被折磨死去了。这年春天，老吕家6口人，父亲饿死了，5岁、3岁两个弟弟因为吃榆树皮吃磨碎的苞米棒子，大便干燥，便不下来，不到一个月也死去了。农民赵××的两个小孩因为没粮食吃，只好用野菜充饥，由于吃灰菜，全身浮肿，最后肿的把肉皮都胀开了，不过几天也死去了。邵宝林他姑姑两个小孩也遭到同样命运。据邵宝林讲，在那缺吃少穿的严寒季节里，年轻人还能抗一阵，老人和小孩就遭殃了。据他讲死的人不只是这几个，恐怕还死了不少人，不过现在无法可查了。

烧完房子以后，日本人逼迫农民都搬到敖家堡去。敖家堡仅有四五户人家，分散在沟沟岔岔的房子都烧光了，大约有上百口人被迫搬到敖家堡去，当时正处在严寒冬天，不能盖房子，就是搭窝棚也无法居住，无奈只好挤在这几间房子里，炕上屋地都住满了，挤的转不开身，没有下脚的地方。吃不饱穿不暖，

一冬天身子都非常虚弱，人人都带几分病态。就这样熬到来年春天（1934年），“窝子病”蔓延开了，家家户户都有人得这样病，没有钱医治，约计又病死了50多口人。庙西沟住五六家，死的人都没人抬。

（此材料是邵宝林、徐云、杨玉昆口述，摘自《丹东文史资料》第四辑）

日军轰炸盘山高升镇及屠杀与抗日军合作的伪警察

李显光

东北沦陷后，盘山人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极为活跃。仅1932年5月至8月间统计，破坏铁道，袭击列车4次，围攻县城6次，占领伪警察署与日伪军交战19次之多，严重地打击了日寇，迫使日寇龟缩在盘山城内，轻易不敢外出一步。他们除了不断调遣关东军与我抗日义勇军顽抗外，更惨无人道的用成批飞机轰炸，摧毁全县广大村庄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五架飞机轰炸高升镇就是其中一例。

1932年8月19日（旧历七月初八日）午前11时，日军飞机5架飞到高升镇上空侦察，盘旋数次，向街内进行疯狂低空扫射，继而又投下大量炸弹。当天正是高升镇的集日，远近居民来者甚多，未及躲避，很多人被炸死炸伤；各样物品满街都是，市面大乱。十字街以东，大街南北数百间房屋弹痕累累，30多间房屋被炸毁。北街孕妇王冯氏领着孩子在园中摘瓜，弹落身边，母子毙命；东街苏永才的妈妈、妻子、妹妹和弟弟等一家

7 口人被炸死 4 口；高风岐未来及到屋，炸弹落地，身体被炸去大半，一支胳膊落在屋顶上；赵永吉祖孙二人同时被炸死；此外田玉金、苏永柱的六弟、苏宪章的妹妹等都被炸死。在这次狂轰乱炸中，仅高升镇的居民被炸死 18 人。至于外地赶集的人死伤的不计其数。素以繁华著称的高升镇一时间弹片如雨；机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满街黑烟弥漫，血肉横飞。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日寇 5 架飞机连续轰炸达两小时之久，始向西南方向飞去。

日寇的野蛮兽行，再一次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狰狞的面目，更激起盘山人民的无比愤怒。抗日斗争日益活跃，广大农村普遍武装起来，全县伪警察署，除县城外，都被义勇军占领。8 月 31 日，袭击大洼火车站，与日本关东军展开激烈地战斗；9 月中旬，日本商船“幸神丸”被袭击，俘虏了荒木喜太郎等 3 名日本军人。日军处境极为狼狈，对盘山人民的正义斗争感到手足无措，转而移怒于伪满警察。认为警察“剿匪不力”，和“义勇军互相勾结”。

1932 年 10 月 17 日（旧历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一个骑兵联队，突然由台安窜入高升街内。这天也是集日。日本兵到街东，分三路，架起机关枪，不分清红皂白，向我赤手空拳的群众射击，市面顿时大乱，人们满街乱跑，日本兵随窜到街内逐户搜捕；又到伪警察署，将上至署长、巡官，下到巡警和自卫队员共 40 余人，齐集一起，略加询问，使用铁线捆绑起来，每 10 人一串，驱至西街阚振山后院。先用机枪扫射，再往身上洒满煤油，包括未射死的署长李春宣活活被烧死，然后纵火烧毁阚家房屋。

这一次屠杀中，仅与义勇军合作的伪满警察被杀害达 38 人，烧毁民房 10 余间，群众财物损失惨重。日寇在杀人放火之

后，于午后3时许才向西移去。

（摘自《盘山文史资料》）

盘山“正义团”惨遭日军屠杀

曾宪绂

1932年，我是伪警察局一个雇员（从事缮写）。当时日寇镇压我县“土匪”的情况，我既有所见，更有所闻。

“正义团”，全名为“满洲正义团”（系招降“土匪”改编的组织名称）。

1931年，日寇侵占盘山后，为了稳定局势，扩大侵略范围和统治势力，一方面对地方“土匪”严加追剿，一方面极力笼络地主汉奸，组织傀儡政府。伪县政府成立后就加紧组织大批军警竭力围剿，同时还散发“悔过自新”的传单，阴谋策划诱降，瓦解“正义团”（其中很多抗日义勇军在内，声势之浩大，使日寇惶惶不安）。日寇曾妄图消灭义勇军的力量，始终没有得逞。因大部分义勇军早已发觉，提高警惕，不为日寇阴谋诡计所利诱，仍坚持抗日斗争。于是日寇便施展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要对“正义团”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1932年春，有一个叫远山大八郎的日本军官，从奉天（今沈阳）来到盘山，声称是奉天省府派来的。到盘山后，立即就与裴东阁联系上了（裴系张学良部下，受阚朝玺指挥的陆军中将师长，年已70）。在日本人高官厚禄的利诱下，裴与日寇狼狈为奸，互通一气，几经蹉商，当上了丧权辱国的汉奸。从此，裴以“正义团”的名义，派人在盘山各地与各“土匪”头目刘海

山、东洋、老三点、南山等联系，进行招降。

1932年10月，有一天，县参事官石凡三郎和远山大八郎事先通知裴东阁，把所有“正义团”的官兵带到河南沿北侧的开阔地，等待远山大八郎的检阅。开始集结之地，由于过往行人较多，并离铁路较远，日本人不满意；又将大队移至铁桥南侧约100米处。这些被招降的队伍，本来有1 000余人，因对日寇心怀不满，仅到六七百人，而其中尚有一部分是花钱雇来的。如盘山河南崔铁匠，为了10元钱来顶名而送了命；榆树的蔡景昌为了两块大洋糊口，结果耳朵被子弹打了一个眼儿。

当天正午12点左右，警务局长佟伯文，从参事室回来，手里拿着降队名册，交给翻译祁杰民。不多时只见侯县长、石凡三郎参事官、警察大队长张润身等人，全都向大桥走去。及近，只见裴东阁已列队等候多时，“正义团”队伍中一阵骚动（可能意识到凶多吉少）。不多时，从沟帮子方向开来一辆铁甲车，车上满载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与此同时，又从营口方面派来一辆铁甲车，并且还有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整个“正义团”队伍被夹在两辆铁甲车中间。这时，翻译对裴东阁耳语几句，裴即命令：把枪架起来，后退十步立正站着（距铁甲车约四五十米远），等待远山和师团长检训。几句日本话尚未翻译，就对“正义团”照了像，同时告诉县里来的人回去（其中只有张润身的随从张国维，今尚健在）。此时有人预感情况不妙，便骚动想跑，然而早已是落网之鱼，哪里还能跑掉！就在县里人刚走出不远的时候，铁甲车上的机枪和六〇炮便向人群发射；空中飞机俯冲下来扫射，队伍大乱，四处溃散。远山大八郎登上铁甲车即地指挥，霎时一片火海，尸体遍野；裴东阁犹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刚想爬上车去，即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在车下。这个大汉奸，他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可叹的是那些被诱骗的“土

匪”，不知所以的被日寇杀害了。

这次大屠杀，枪炮声轰天震地，响遍全城。枪声刚停，日寇便下车逐个检查，见有未死者，则用刺刀扎死，真是惨不忍睹。第二天县警务局找劳工挖坑掩埋，只“正义团”被枪杀的就有300多人。

（摘自《盘山文史资料》）

虎口余生

刘占勋　龙厚全

1932年11月12日，日本鬼子以招降的名义，在盘山县河南老铁路桥西侧，进行了一场大屠杀，杀害四五百人。沙岭乡西灰村傅万令老人，是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活证人。他虎口余生，活到现在，今年已74岁，身体挺健康，还能干点轻活。老人说起这段经历，感慨万分，老泪夺眶而出。

那是1932年的事。日本鬼子占了盘山以后，抗日义勇军被打散了。我七叔傅忠生，号叫“六龙”，是辽南抗日义勇军的头头，带着部分队伍撤走了。我四叔傅忠忱等义勇军，只好躲在亲戚家里。当时日本鬼子发出布告，各处都贴满了。布告中说，凡是当过义勇军的，只要到盘山受招降，把枪一交就没事。愿意当兵的留下当兵，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今后不准当义勇军，要当良民老百姓。如果不去受招降，只要走出去，就要杀头。知情不举的也杀头，检举有功的受奖。布告一贴出来，日本鬼子天天枪毙人，弄得人心慌慌。11月12日早晨，我和三哥傅万荣，

还有同村的林秀阁、林秀喜、林秀平为了不连累亲友们，骑着马，背着枪，硬着头皮去盘山受招降。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叛徒，心想交了枪，回家种地，过个太平日子就得啦。我本来没当过义勇军，是替我四叔傅忠忱去的。我三哥傅万荣，当过义勇军，怕被鬼子扣住不放，吃完饭，他偷着跑回去了。当时我想反正我没和日本人打过仗，日本人也不能随便杀人，就没有跑。我们几个人，上午9点多钟来到盘山，在狼窝那个地方吃的早饭，叫把马放在高家。下午3点多钟，把我们四五百人，领到河南老铁路西侧，站好队，开始点名，点完名，下令架好枪，然后准备空手检阅。铁路桥南头西侧，停着两辆铁甲车，离我们有几十米远，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玩艺。检阅以前，由裴司令讲话。裴司令叫裴东阁，日本人叫他组织救国军，委任他当司令。裴司令在讲话时说：弟兄们，你们弃暗投明，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表示欢迎。你们请放心，今后中日要亲善。中日是同文同种，要共存共荣，我们要成立救国军，你们都是骨干。我们还要到北京去，要把皇上接回来，国家不能一日无君。裴司令讲了不少，我记住的不多。当时总想着快点回家。裴司令讲完了，日本人讲话，我一点也不懂。大约在4点多钟，忽然枪响了，"忽啦啦"前面倒下一片，我才明白中了日寇的奸计。我刚想跑，大腿中了一弹，鲜血顺裤子往下流，现在伤疤还在。我一看不好，就滚到沟里去了，也有跑出去的。把受招降的人都打倒以后，日本兵才从铁甲车里走出来，挨个检查，不管死的活的，都用刺刀扎几下。我身上被扎了三刀，现在还有伤疤。当时，我吓迷糊了，不觉得疼，也没喊叫。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就没管我。日本兵扎完就走了。晚上有8、9点钟，来了4个人，都拿着枪，一边检查、一边喊叫：有没有活着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这时候，我清醒了，知道浑身疼了，听见有人救我们，

我就答应了。4个人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你是哪一股的?"其实，我哪股也不是，怕他们不救我，我就说我是傅天龙的侄。那4个人一听很吃惊，说："你是傅天龙的侄啊，说什么也得把你救走。"他们找来两个农民，用抬筐把我抬走了。就这样，我才死里逃生，活到今天。以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去的老林家哥仨，都被打死了。那个挺神气的裴司令，也叫日本鬼子打死了。

（摘自《盘锦文史资料》）

辽西地区惨案

董济民　董兰云

在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无数忠贞的辽西、热（河）东儿女，奋起抗日，以身报国，严厉打击侵略者。日军对此恨之入骨，对抗日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并采取所谓强化治安的措施，不断制造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本文仅举四起惨案，由此可窥见日军在辽西地区的暴行。

一、二车户沟惨案

1932年6月20日，日本侵略者的一支武装队伍到朝阳县南部的哈拉贵沟一带骚扰，接着向东进至羊山乡，21日日军又从羊山乡继续向南进犯。当这支日军行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被驻守在当地的抗日义勇军发觉，义勇军团长王镇协同抗日联庄会长赵清泉率百余人队伍迎头截击。在激烈地战斗中，歼灭了以伊藤为首的日军32名，剩下的8名狼狈逃窜，当逃到曹杖子后山时，又被石明信沟联庄会头人王文福派员击毙2名，

其余的6人惶惶逃回本部。23日，日本军又从锦州派出一支队伍到达羊山乡，然后从羊山乡往二车户沟进发，企图报复。当时，正赶上义勇军离开此地去执行任务，群众自动组织起来同日军战斗，将日军打回锦州。

1933年2月25日，日军占领了朝阳县城，日伪统治机构在全县各地相继建立。因日军在朝阳县南部曾经受过打击，于是决心报复。人们传言“日本人要血洗南三区”，但经一段时间后没见动静，人们逐渐失去了警戒。1933年初秋的一天，一股日军从北部南下侵入二车户沟，拉着日本步兵的汽车停在下窝铺屯，开始点火烧了场院上的庄稼和下窝铺屯的房屋，60多户人家的200多间房舍毁于一炬，村内百姓吓得都跑到村外躲藏，未遭到杀害。11月9日，日军又侵入二车户沟。村民们有上次的经验，听到汽车响声就四处逃奔，大部分人往东沟跑，少部分人往上沟跑，农民杨玉峰和田凤歧正往地里送粪，没来得及躲开，当场被日军开枪打死。接着日军把逃跑的群众从山上圈了回来，给大家开会，日本军官说：“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如果哪个人再跑，就统统的打死……”等，日军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欺骗了善良的中国民众，稳住了人心。日军官讲完话之后，真的没杀人就走了。11月14日，一股日本军队又坐汽车从东梁开过来，由于人们相信了前五天日本军官讲的话，所以一个也没有跑。日军进村后，抓住王勇、周延荣2人给他们带路，到龙潭沟去看碑（陈美营子的汉奸狄文林为讨好日军，为6月份被打死的日军伊藤等人立的纪念碑），看完碑文后，日军就走了。村中老百姓没受到摧残，更失去了警惕。第二天（15日）鸡叫后，天刚刚放亮，日军开来了3辆汽车，载着60多人，下车后就露出了狰狞的恶煞面孔，手扣扳机，子弹上膛，刺刀闪着寒光，晨曦照着鬼影，趁老百姓未起床之机，包围了二车户沟村，

挨门逐户进行搜查，凡是找出十五六岁以上的男人，见一个杀一个。枪打、刀砍、刺刀穿，刹时，屋里屋外院内院外街头河边躺满了中国男性成年人的尸体。稍有反抗的女人也都被杀死，有的小孩含着妈妈的乳头与其娘一起被害死在炕上，还有的被割下头来。就在一清早，不足3个小时的功夫，二车户沟全村仅有的62名成年男子，除3名外出者和躲在草垛里的郝文章、王世云外，全部被杀死。王勇家爷四个、王彬爷三个全被杀害，断了根。

日军烧杀之后，扬长而去。妇女、小孩们吓得几天不敢回村。被害者的遗体无人掩埋，有的尸体被狗撕坏，有的头部被砍的面目全非，有的身首分离，景象之惨，目不忍睹。惨案过后，村里遗孤剩寡，老弱妇孺，满目悲凉。有许多妇女精神错乱，哭喊着见神见鬼，不敢进屋睡觉，只好几家人集居一处，互相仗胆。有一名叫周宽的老人，胆子大一些，他每夜手拿一个木梆子边敲边喊："没事了，快睡觉吧！"从此以后，在二车户沟村天天可以看到老太太眼含热泪领着小孩去抬水的悲惨景象。

二、水泉惨案

1934年抗日义勇军在朝阳县镜子山村（今北四家子乡）北部的水泉沟南山，打死了日军军官小野。义勇军走后，日军在小野毙命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并在碑前发誓"早晚要给小野报仇"。当年在镜子山村管辖内，南北各有一个叫"水泉"的小屯，南水泉屯北有条沟叫秋皮沟，北水泉屯旁有条沟叫邱家沟。南水泉屯有位绰号叫徐老品的农民，曾参加过在北水泉南山打死小野的那一仗。事后，日本鬼子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徐老品的名字自然就上了黑名单。日伪政权在朝阳站稳脚根之后，朝

阳大部分地方的老百姓被迫当了“顺民”，唯有县南的黑牛营子、长在营子、北四家子一带受王老凿（坚持抗日的村民首领）的影响，时有反满抗日活动。1937年有人向朝阳县警务科告密，说徐老品以他的家乡水泉一带为基地，学习王老凿与日本人作对。由于徐老品的名字早已在案，这一告密勾起了日本鬼子的仇恨，决定血洗水泉、秋皮沟一带村庄。8月30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伪县警务科调集了150多名马队，来到了镜子山村公所，日军头目找来伪村长刘子奇和土豪寇振东，问他们水泉沟、秋皮沟在哪里？他们告诉日军水泉沟在什么地方。这一天，天气特别热，北水泉村一片恬静，村民们干了一上午活计，回家准备吃中午饭。这时，四面山上各个山头日军都布上了岗哨。当日军向水泉进发时，村民邱凤正在家门口纳凉，见日军来了，立即逃跑，刚跑出几步，就被开枪打死了。日军包围了水泉沟和邱家沟，以召集村民开会为名，把凡是在家的人都赶到一座三间房子里，外边封住了门和窗户，然后架起机枪对准门、窗口，在房屋四周堆起柴草，就点起了大火。刹时火光冲天，屋里喊爹叫娘之声惨不忍闻。有的人破门窗冲出，也被机枪打死。“到会”的49人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枪打死，无一幸免。东杖子群众看见水泉大火，听见哀号，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眼尖心快的村民刘喜大喊：“快跑！”这喊声提醒了人们，有的向山上跑，被山上岗哨开枪打死，有的向沟里躲，也被鬼子搜出。日伪军包围了东杖子村，挨门逐户搜查，逼着人们去村前小沟里“开会”，“到会”的人多数被开枪打死，共50多人。只有几个人是死而复苏或压在死人堆下，才得以幸免。日军和伪警察查了查水泉、东杖子的死尸，共99口，犹未满足兽性，非要补足百人之数不可。日伪军撤至解杖子村时，在老李家碰见一个走亲戚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毛凤祥”，又问“哪里

人”，他答“梁北歪脖子山人”，又问“离水泉多远”，他答“不远”，刚刚答完，日军用刺刀把毛凤祥挑死，日军头目狂笑着伸出大拇指：“哈！哈！一百的死啦死啦！一百的死啦死啦！”一个伪军得意的迎合说：“百里缺一，在数难逃啊！”日军走后，水泉、邱家沟、东杖子的外逃百姓，过了几天才敢陆续回村，大热的伏天，死难者的尸体已经发腐，隔二三里顺风就能闻出腐臭味。进村一看，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许多尸体被狗拖狼拉的残破不全，这一个头颅，那一只胳臂，柴草丛中到处是人肠人肝。人们只能从衣着上及身体的特征上辨认亲人。李景会全家8口人死了7口，这7口人中有5个顺肩的姐妹，死时手拉着手，收尸时分都分不开。钱凤生一家4口，恩振廷一家5口，这两家9口人一个也没有剩下。乡亲们埋葬了死难者，把那5个小姐妹合葬一起，起名“五女坟”，坟尖高高的立在山坡上。

三、下五家子惨案

下五家子位于锦西北70公里处，是个七山二滩一分田，山峦起伏，地势险峻的偏远山区。早在1928年，由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护家防身，这里成立了民团，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出现了很多绿林人物。“九·一八”事变后，民团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抗日，打击来犯之敌。

1932年1月，抗日群众在江屯西菜园子歼灭了日本古贺大佐率领的联队；又于1935年秋，在下五家子西沟里，把驻守缸窑岭的日军打得丢盔卸甲，绰号“小疙瘩胡”的日本守备队长险些丧命。这两次战役，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侵略军，决心对抗日群众进行血醒镇压，一桩惨无人道的血案正在酝酿。

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抓走了下五家子抗日爱国群众张臣、姜

佐州、杨树祯三人，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抗日的群众。面对敌人的逼供，他们宁死不屈，使日军一无所获。11 月初的某一天，日本“小疙瘩胡”小队长和井上正光副小队长亲自出马，带领大队人马准备围剿下五家子，妄图把那里的抗日群众斩尽杀绝。

下五家子抗日群众料定日军必来报复，就随青壮年躲到了山里，日军扑了空。“小疙瘩胡”想出软硬兼施的花招，召集村里的老年人和妇女“开会”，想用甜言蜜语来麻痹群众。几天后，“小疙瘩胡”又来了，还带来了两名医生和一些糖果，给病人“看病”，分给老年、小孩糖果。“小疙瘩胡”假惺惺地说：大日本皇军是拯救中国人来了，是帮助建设“王道乐土”，你们叫家人回来好好过日子，既往不咎……一连几天，他们再也没有来骚扰，躲在山沟里的人放松了警惕，陆续地回家了。

1935 年 11 月 16 日凌晨，天空飘着雪花，人们正在酣睡着。“小疙瘩胡”带领 30 多名官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下五家子，将所有要道、村口、高地都布置了岗哨，封锁了全村。他们首先把张臣、姜佐州、杨树祯三人绑在村头大树上，用刺刀挑死。然后，闯进各家各户，拉起睡梦中的群众，把他们捆绑起来，押到村西河套“开会”。

河套四周架着机枪。枪口对准了被押来的全村老百姓。随着“小疙瘩胡”的一声号令，机枪疯狂地向群众扫射，人们一批批倒下去了。有的妇女被打死了，双手还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有些走不动的病人和走得慢的老人，就被鬼子挑死在家里或路上。刘昌的老婆在分娩，日本兵闯进屋，捅死刘妻及从外地请来的接生婆，刚出世的婴儿也被摔死在地上。这个小山村里，顿时尸体成堆，血流满地。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共 378 人。

大屠杀后，日军唯恐还有活着的人，又逐个检查，进行补

刀。当时，有个叫白金祥的小伙子，机枪一响他便趴在地上，在日本兵用刺刀检查时，他冷不防起身就跑，日本兵向他连开几枪没打中。他跑回家一看，房子烧毁了，老婆孩子死在血泊中，他的母亲倒在房后的枣树下，肠子露在外面，已奄奄一息说不出话来，无力地用手示意让他快跑。他流着泪，叫了两声妈，忍痛告别了母亲、妻儿，越墙逃走了。

刘明善身上挨了7刀，鲜血浸透了衣裳，当鬼子用刺刀扎他的脖子时，他一闪，就势推倒日本兵夺门而逃，一口气跑到横山子他叔伯舅舅家，才幸免于难。刘勤的头部挨了7刀昏死过去，日本兵把他拖到死人堆里准备烧死他。这时刘勤醒过来，撒腿就跑，敌人在后面猛追不舍。他跳入一口井中，敌人发现了正躲在井里的刘明思，便开枪打死了刘明思，刘勤得以活命。

日本兵把13岁的刘志中和其他6个孩子绑在树上，想把他们烧死。日军点着大火后，就离开了现场。刘志中弄开了绳子，把那6个孩子也放跑了。这些孩子跑到大门口，被鬼子发现，都被刺死了。刘志中躲在一个胡同里，才幸免于难。刘国廷藏在秫秸堆里，日本兵把秫秸堆点着了，他忍着火烧的剧痛没有动，等日军离去，他才从秫秸堆里爬出来，衣服烧没了，他赤裸着身体逃出了村子。刘国廷现在还活着，但满脸都是疤痕。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下五家子制造惨案的见证人。这次惨案中，下五家子全村除了二十几人外出不在家外，只有11人逃出虎口。日军在这次惨案中烧毁了全村400多间房屋，掠走牛羊，劫走财物，并把被害者的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烧尸灭迹。大火一直烧了几天几夜，人丁兴旺的下五家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侵略者对逃出的十几个幸存者也不肯放过，到处追杀搜捕。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处流浪，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48年，锦西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

他们才得以返回家乡，在残垣断壁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现在的下五家子有326户，1 200余人，人们过着自由、幸福的美满生活。

血染锦县北山沟

李葆荫整理

血染北山沟，是一个日寇入侵我东北所造成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惨案。事出在我县石山公社良屯大队。我们于1983年8月，曾走访了被刺7刀，而死里逃生的王恩波。据他说：

1932年冬，锦县河东的土匪们纠集了数十人于某夜袭击石山车站，在枪声密集，子弹飞舞之际，驻石山车站的日寇，抱头鼠窜，狼狈龟缩。虽然日寇没有多大伤亡（只击毙一人），但给予日寇以很大打击和威胁，也给老百姓出了气解了恨。

日寇遭到这次夜袭，愤悱之气，思有所泄。认为石山地区匪徒众多，滋扰严重，必须荡平。于1933年3月12日，驻沟帮子的日军，约数十人（其中有部分白俄），全副武装，乘铁甲车，气势汹汹地向石山车站进发。把铁甲车停在三家子桥洞附近，日寇等徒步到三家子大肆抓人。此时三家子×××为了维护自己和全屯的安全，竟向日寇翻译说："三家子老百姓统统是好人，良屯匪徒大大的有……"日寇转奔良屯。时值良屯老百姓听说日寇在三家子抓人，良屯必会殃及。除老弱妇孺不能跑的以外，都跑上北山隐藏。日寇见满山跑人，竟上山围抓。有的跑了没抓住，被抓住的约四五十人。把这些人围到北山沟里叫站好排。日寇哇啦哇啦乱叫一阵，由翻译说："良屯匪徒大大的有，抓匪

徒的干活。谁是匪徒，赶快的说，不说就统统的枪毙……”群众听了战栗相视，知道祸事到了。说是好人，鬼子也不相信。于是按个看衣着，看面容，像不像坏人。又看手有没有茧子，来决定好坏人。看有茧子的“这边的开路”到南边是好人可以回屯；看手没有茧子的“那边的开路”手指到北边山沟里的显然是坏人了。相面看手，筛选出7个人是到北山沟的。当场的气氛非常惨淡，死亡的阴影默默中向他们逼近，黑暗而悲痛的乌云，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日寇逼着这7个人，每人站一个沟豁口处，然后用刺刀惨无人道的逐个刺死。先杀刘文正、次杀黄金昌、再杀赵清选。赵是独身汉，到外屯借粮才回来，尚不知头脑儿就被刺死。最后刺王恩波。其他李老相和他儿子李生子及郑老质三人是枪毙的。把人刺死以后，用刺刀把沟豁口上的土石，推下来以掩埋死者，这就是“血染北山沟”惨案。现在仍在石山地区的群众中，留下了永不泯灭的愤悱和难以忘记的仇恨。

王恩波说：我是最后一个被刺的，被刺以后，我的好友王永生，听说我亦被刺，特赶到现场，表示哀悼。看见露外一条腿的像我，正当凝神哀思时，忽听我在土里呻吟一声，知是未死，急回家叫人，把我扒出，用门板抬回家，逐渐苏醒。因被刺7刀，伤情较重，流血过多，经医治年余始愈。这是在日寇的刺刀下血泊中爬出来唯一幸存者。

（摘自《锦县文史资料》）

北票长条沟惨案始末

李孔生口述　李学志　刘守军整理

我们长条沟村是北票市北四家乡王增店村的一个村民组。这条沟从沟口到沟里，共8华里长，沟两侧为高山峻岭，是地势比较险要的地方。在日伪统治时期，以兰天林为首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当时长条沟有3处住有人家：上长条沟只有1户人家；中长条沟有2户人家；住户最多的就算是我家所住的下长条沟了，那时也只有6户人家，46口人。

1935年8月，日本侵略者为镇压兰天林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曾调集了大量兵力围剿大黑山，开始了秋季大扫荡。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不得安宁。我们村的村民们，为免遭屠杀，有的投亲靠友搬走了，有的在山里挖了地窖子，随时躲藏起来。11月15日半夜时，有一支马队忽然来到我们村，把没有走脱的十来名村民召集起来，让男人去村边溜马，女人给烧火做饭。在这十来名村民里就有我的大娘和15岁的姐姐李孔花，她们亲眼目睹了长条沟的惨案。我在山沟里躲避回来后，她们向我讲述了日军制造惨案的全过程。

这支马队进村后，先是派了一名战士到地势较高的房框山山梁上放哨，然后就开始吃饭。从表情上看，这些人很和蔼，不像是土匪。但从精神上看，却都很疲惫。有一个人吃着饭就睡着了，把饭碗掉在地上也没有醒来。经打听才知道，这个马队是兰天林抗日救国军独立团的人，为首的叫张宝三，是团长。他是台吉营子人，据说他曾组织500多人跟着兰天林抗日，经常转

战在台吉营、黑城子和牤牛河东一带。这次是奉兰天林的命令，为避开日本侵略军围剿的锋芒，向大黑山区撤退的。他和他的队伍从东台吉营出发，一路上到处受到日伪军的围追阻截，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只好化整为零，分散着向大黑山前进。他和弟弟张怀三、儿子张廷和12名战士为一个小分队，经过昼夜奋战，左冲右突才来到长条沟的。

吃完饭后，张宝三就让战士们就地休息了。由于一路上的劳累，使他们很快进入了梦乡。不料，就在他们熟睡的时候，有4辆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军汽车，已顺着马蹄印追到了长条沟口。抓住一个叫宋奎的农民，让他带路冲进了长条沟。

当时，在房框山梁上放哨的哨兵，忽然听到后背山下有响动，就离开岗位朝着响声的方向摸去，最后才弄清是两个村边在山脚下挖地窖子。他就和这两个村民商量，能否回村去帮助他们去溜马。因而，他不仅没有发现敌情，就连汽车的马达声也没有听到。待他返回山梁上时，村里的战斗已打响了。

当日军的汽车开进长条沟的时候，在村边溜马的村民，首先听到了汽车马达声。他们忙丢下马匹，顺着山沟躲进深山里去了。家住村头的李占家，也提前听到了汽车声。李占家里只有一位74岁的老母、一个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李先是让两个孙子赶紧顺山沟往东山坡跑，回头又招呼儿媳和她一起进东山沟。她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又年事已高，没跑几步就跑不动了。当她看见儿媳妇已钻进了东山沟，索性就不跑了。她刚要返身回家，日军的汽车已开到了村口。这时，日军跳下车抓住李母，手指着正往东山坡跑的孩子，指责她放跑了"红匪"，举起战刀就将李母砍死了。

日军下车后，很快控制了东山梁和村口，架起了机关枪，直冲着我们村。我大娘和姐姐也听到了汽车声。开始以为是日本

的飞机，后来从窗口向外一看，才知道是日军的汽车。她们立即推醒了救国军的战士们。张宝三醒来后，知道情况严重，想冲是冲不出去了，决定同敌人决一死战。他先是让我大娘她们赶快扒在炕沿底下，嘱咐她们千万不要乱动，而后他冲出房门组织战士们选好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在太阳刚冒红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敌人的机枪、步枪像雨点般地往村里疯狂扫射，并逐渐缩小着包围圈。张宝三和他的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英勇还击，战斗十分激烈。有一个叫陈刚的战士，枪打得很准，他爬上一堵土墙，一枪就撂倒一个日本兵。但目标已被东山梁上的日军发现了，当他刚要打第二枪时，一阵机枪子弹扫来，陈刚身着数弹，倒在了血泊中。张宝三的儿子张庭，打仗也很勇敢，他抓住一匹紫红马，飞身上马，边打边冲，冲出了包围圈。但一想到父亲和叔叔们还在继续战斗，不忍心自己只身逃生，就又返回阵地继续同敌人搏斗。这场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救国军终因寡不敌众，张宝三和全体战士均牺牲在日军的枪弹之下。

战斗结束后，日军开始进村对各间房屋进行全面搜查。把干草都堆放在房屋周围，惨无人道地放起火来，村里的42间房子全部点着，一直到房子被烧得落了架，他们才狞笑着上了汽车。

第二天早晨，村民们陆续地回到了长条沟，看到房子被烧，尸横满村，有的尸体已被大火烧焦，此情此景真令人目不忍睹。村民们眼含热泪，先把李占的老母亲安葬了，然后又把张宝三等15具尸体都集中到南山沟，以便来人认领。第一个认领的是小四家村一个姓郭的，他是张宝三的朋友，他在群尸里只找到了张宝三和张怀三的尸体。张庭的尸体无法辨认，没有找到，只好把张宝三哥俩埋在南山脚下。当时，他在坟边插了两棵柳树

条，第二年春天有一棵柳树条活了，现在已长成老柳树了。第二个来认尸的是张廷志，他带人把其弟的尸体运回西官营梁杖子掩埋了。后来听说，张明志死后，他的妻子领着两个男孩改嫁了，把一个不足两岁的女孩送人了，弄得家破人亡。第三个是陈刚的家乡人，把他的尸体认领回去了。其他尸体再没有人认领了，村民们一起动手，将这些抗日英烈的尸体，一个一个地埋在了南山沟里。

这就是我亲闻亲见的长条沟惨案始末，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军血染大虎山四台子

赵昆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于12月进占我县境内大虎山地区。

1932年1月，驻大虎山日军第13联队，不破直治大尉率100人进驻新立屯地区"剿胡"(土匪的意思)。次日，不破大尉利用朝雾迷漫之机，前往新立屯东5公里五台子屯"剿胡"，当即被屯练长王锡繁、百家长刘志国组织村民迎击，恰巧东北抗日救国军首领高鹏振也赶到此地，双方短兵相接发生激战。高鹏振以极大的义愤，率垂先卒，全歼进驻五台子屯的日军，当场击毙36人，指挥官不破直治也作了异乡之鬼，并活捉广赖大尉、小野中尉、永田少尉等日本军官7人。

日驻大虎山军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武藤大佐率步、骑两

队直扑五台子屯，结果哪知高鹏振及团练们早无踪影。武藤恼羞成怒，又调转头来，往芳山镇、白厂门一带进剿，沿黑山、阜新两县交界处西进。当行进到四台子屯附近时，狡猾的武藤大佐，在战马上拿着望远镜巡视四台子屯内外，并命令日军停止前进。四台子屯距芳山镇北约4公里路，是一个仅有4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它位于新立屯、芳山镇、白厂门3个集镇的岔路口，是黑山与阜新两县的交界处。长着满脸横肉的武藤骑着战马，在村头与西山北侧窥视，突然发现西山上有人在行动，当即命令步兵围屯，骑兵进山追剿。

此时，四台子屯团练刘凤岐，开始也以为“土匪”来了，加上早晨雾大、看不清楚，就率领练兵迎击。等到双方靠近时，一看是头戴钢盔，手持战刀的日寇大队人马，山坡凸凹处已架起机枪。刘凤岐见机就立即传令，叫屯中老少，能转移的就尽量转移，能隐藏的赶快藏起来。就在这时日寇端着刺刀已冲上来了，刘凤岐下令迎击，经过一阵激战，团练们消耗弹药过多，加上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已无力抵抗。刘凤岐目视周围，群众已撤退的差不多了就率领练兵向西山转移。

武藤大佐带着步兵进屯一看，除猪、鸡外，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气得武藤吆喝叫骂不止。又用望远镜窥探，恰好此时刘凤岐等人刚刚进入西山沟口处，武藤命步骑两队合围射击，枪声如暴雨一般。此时，刘凤岐还没来得及组织还击，就背后中弹先殒命。大家一看练长阵亡，只好在慌乱中隐藏起来。可是不到片刻，武藤率兵追了上来，只听“轰隆”、“轰隆”几声炸响，刹那间西山坡尘土飞扬，血肉横飞。整个大地被吐着火舌的机关枪声吞噬了。

北风呼啸，阴霾惨淡，寒风凄厉，惨绝人寰的日寇，对手无寸铁的四台子屯的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仅仅3个来小时，

就杀害了我骨肉同胞300口人。屯练长刘凤岐中弹殒命后，又被扎十几刀，然后将双眼挖出。刘凤岐之父刘全胜被日寇当靶子用刺刀刺乱而惨死，并将满口牙打掉；刘凤岐之长子刘长顺，次子刘永顺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杂草中被日寇用刺刀挑出，摔在地上，爬到爷爷身边呼喊："爷爷、爸爸、妈妈！"。武藤"呜啦、呜啦"地乱叫一阵，将两个小孩子用战刀杀死。刘凤岐之母被扎死后，割掉双耳，抛在山沟里。刘凤岐之二哥刘凤山、宋小锁、于德发及于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孩，均被日寇枪杀。王桂花先被日寇将双乳房割掉后，取笑一阵，活活用刺刀杀害。特别是于德发之妻于张氏身怀孕快临产了，被日寇从山沟里抓捕出来，先将腹部用刺刀挑开，用手从腹中将血淋淋的胎儿取出，挂在树枝上取乐。其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视。穷凶极恶的日寇，在暴行施尽之后，脸上溅着血污，扬长而去。当乡亲们来收尸的时候看到这种惨景，无不义愤填膺，忍痛含恨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

事隔50多年后的今天，四台子群众为了悼念被日寇屠杀而死的亲人，曾寄挽词云："膏液润野草，肝脑涂荒郊"，要永世不忘民族恨，血泪仇！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也是黑山人民与日寇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史篇。

（摘自《黑山文史资料》）

骇人听闻的义县肖家屯惨案

闻　群整理

1932年，义县沦陷不久，就在义县城东南的肖家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肖家屯是七里河子镇育新村的一个自然村。当时有一名叫肖老献的财主。他家有700多亩土地，拴两挂大车，雇用长工20多人；高宅大院，四角有炮楼，有长短枪30余支。他的孙子肖中安在吉林张作相部下当副官，财大势大，是一方高草，无人敢惹。

日军进驻义县后，把肖老献看成是土匪头子，家里雇工都是土匪，有枪支弹药很多，准备组织义勇军等等。

在当年的旧历四月十九日拂晓，驻义县的日军和伪警察队120余人，从邻近的雹神庙、北树林子和西树林子三面包围了肖家屯，往肖家大院打枪打炮。

这天正赶上肖老献家盖东西厢房。因为日本鬼子来得太早，屯里帮工人来的不多，可是老肖家的伙计都到了。当时肖老献打算还枪抵抗，可是一看日本人太多，有机枪，还有小炮，一个炮弹落在炮楼上，就把顶盖给打塌了，因此未敢还枪。

日伪军一进院，就把肖老献和他儿子肖九鼎、管事的白连明都抓到了。二打头的姓刘（沙河竞人）一看不妙，想跳墙逃跑，一上墙被外面一个日本兵，一枪撂下来就打死了。其余的人再也不敢跑了。

这时日本兵哇啦哇啦喊叫，到处搜查。把枪支弹药都搜了出来。日军头目让翻译喊话："凡是肖老献的伙计都站东边，帮

工的都站西边。”有的就站到了西边，也有帮工的站到了东边。伙计肖九恩（本屯人）想往西边跑，日本兵看他乱跑，一刺刀就把他捅死了，其余的人谁也不敢乱跑了。站完队后，日军头目宣布：“凡是肖老献的伙计统统留下，其余的都回去。”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是肖家厨夫张维和，说家有80多岁的老妈，无人养活，放了我吧！一个姓杜的小牛倌，说我才来几天，放了我吧！通过翻译，向日本兵一嘟噜，就把他俩放了。剩下18个人，立即叫他们跪下。二车把王勃（曹家屯人）抗争说，我是个穷扛活的，又没犯法，跪下干嘛？日本兵一声怪叫，“死了，死了的好！”一战刀就把他脑袋砍了下来。然后一枪一个把这些长工全给枪杀了。这时屯里有个卖豆腐的叫孟大癞子，日本兵一枪把他打死。有个肖九山，看见日本兵打枪杀人，就往树林子里跑，也被一枪打死。张志云跑到北山坡蹲在一个土坑里，往外一露头，也被日本兵一枪打中头部死了。

这场惨案，日本兵共杀我无辜群众23人，然后把肖家大车套上，一车拉着他们所谓的赃物；一车拉着肖老献父子和白连明三人（把双手钉在车牙厢上），带回义县下狱。临走时放了一把火，把肖老献的房子全部烧光。

肖老献和他儿子肖九鼎、管事的白连明，到义县下狱不久，有人透露说，一天夜里被日本兵用绳子从城西南角上系下去，在城下挖坑活埋了。

（通过访问肖家屯肖玉昆等几位老人整理）

建昌县药王庙惨案

梅兰亭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14年之久，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建昌县药王庙这笔血债就是其中一例。

日本侵华关东军佐藤大队长，为了巩固他们军国主义的政权，消灭建昌县岭下一带的抗日力量，于1934年旧历十月间，带领二三百日本兵，骑马拖炮，还有二十几辆大卡车，沿着朝阳通往兴城的大路，杀气腾腾地扑向药王庙警察署辖地。一到药王庙，就威逼乡民集会，在会上，佐藤气势汹汹地叫喊了一阵子。金翻译官说："太君讲，你们统统的通匪，在三四天内不将匪首交出来，就将你们全部杀头……"一片沉默，人们谁也不吭声。

然而，认贼做父、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铁杆汉奸"，竟将当地义勇军首领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提供给佐藤。这时，佐藤兽性大发，迫不急待地下令围剿了药王庙、鸡冠山、施杖子、响水甸子、锥子山等村庄，进行了7天之久的残酷扫荡和烧杀掠夺。义勇军旅长杜子扬虽然没有被抓住，但却把房子全部烧毁。在严酷的搜查下，义勇军营长李云阁，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李长魁、杜大贵、赵万宝、赵小八和张老根等17人被抓住。日本侵略者对他们施以严刑拷打，令其交出枪支、子弹。同时，还威逼他们交出所谓匪徒名单。他们各个宁死不说。

气急败坏的佐藤，指挥日本兵，竟将这些不甘心当亡国奴

的爱国者，全部枪决。当这17人走到刑场时，昂首挺立，横眉冷对持枪的日军，就在这短暂的时刻，佐藤还紧紧追逼，令其交出枪支、弹药和所谓匪徒名单，并说“不交死了死了的。”义勇军营长李云阁，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挺起胸膛对侵略者说：“怕死就不是中国人。”还有一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当亡国奴！”遇难者们大声呼应。声音刚落，17人就倒在血泊之中。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又用铡刀将人头铡下。同时，把那位领呼口号勇士的心，又给挖出来。

佐藤杀人后，又立即召来全警察署管辖的村长、所长、甲长、牌长和乡民上万人，在刺刀威逼下开大会。他们把被杀害的人头摆在高桌上，各个都插上标签，写着什么：“匪首某某”、“有枪弹不交者斩尽”、“谋反不法者，视此。”佐藤耀武扬威地站在汽车上。金翻译官说：“喂，喂，大家站好，太君讲话了，好好听着。”佐藤板着凶恶的面孔，叽哩咕噜叫唤了一阵，谁也不知道他吼叫些什么。金翻译官呲着金牙，装出一副笑脸，拉长调门说：“乡民们，太君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大家不要怕，太君说只要你们守法，把枪、子弹、‘匪首’供出来，都是大大的好人，违者是要杀头的……”会后，乡民们三三五五地议论：“这伙鬼子杀人不当小鸡，他们不死绝，日子没法过。”

佐藤走后，留下山田和杨翻译，仍以回收武器为名，为非作歹，到处搜刮民财，对乡民每7天开一次会，来的人有时全跪着，有时还往身上泼凉水。对抓来的人严刑拷打，有的屈打成招，没枪就得给银大洋。孟子升是一名教书先生，就因没枪没钱，在1936年旧历十一月初三被枪杀了。

（建昌县政协供稿，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四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赵秋航

编者按：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是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由关东军策划，在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的直接指挥下，由伪满军进东边道北部地区（包括伪安东省、奉天省、吉林省和间岛的各一部分）的抗日武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讨伐”。“讨伐”的矛头指向王凤阁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以及在这一带活动的抗日联军。在“讨伐”中，由于捕杀了抗日救国军首领王凤阁，使该军损失巨大。

几年来，日伪军在东边道的“讨伐”，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日守备队还受到严重损失。

1936年春，驻柳河县日守备队长中川大尉，派日军一个小队约50人，还有伪警察20名，向柳河东南大荒沟讨伐。当到达白家堡转向东北沟时，抗日军突然从四面包围上来，喊杀声震山岳，弹如雨下。激战2小时，日本守备队的士兵仅逃回2名，其他尽数被歼灭。脱逃的2名日寇士兵，跑回柳河报告中川。他一听大怒，随即带队向大荒沟白家堡前进。

到后，中川说，该村全通“匪”。于是，将全村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驱逐到大荒沟，纵火焚烧了全村房屋。在大荒沟伪警察把304人，10人绑一串，驱赶到该村东南山根下，只听中川大吼一声，日军早已准备下的步枪、机枪猛烈开火，可怜百姓全部遇害。

日寇把东北的抗日军分为3种类型：共产党领导的叫“思想

匪”；原东北军、警团起义抗日的叫“有组织匪”；事变前以掠夺为生，事变后举旗抗日的叫“土匪”。活动在东边道地区的杨靖宇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渐发展，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被日本关东军视为严重问题。1936年秋，日本关东军决定对东边道进行“大讨伐”。

日寇为了肃清东边道的抗日军，决定由伪满军担负这个任务，叫做“独立大讨伐”。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既可把被牵制在东边道的日本关东军替换出来，准备向中国内地进攻，又吻合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谋略。在东北实行殖民地政策，做为侵略中国内地的基地，消灭抗日军，免除后顾之忧，这就是日寇东边道“大讨伐”的根本战略方针。

这次“大讨伐”把东边道的柳河、金川、辉南、濛江、抚松、长白、临江、辑安和通化等9县划为“讨伐”地区。此外，还有毗连的清原、海龙、东丰、桓仁、兴京等14县。由平梅（四平——梅河口）铁路到梅通（梅河口——通化）铁路以东归伪满军担任“讨伐”。不准抗日军越过铁道以西，务期在铁道以东尽数歼灭。使用的兵力有奉天伪第一军管区6个混成旅、1个骑兵旅和1个教导队，还有协助兵力3个旅（伪第三军管区1个混成旅、1个教导队、伪第五军管区1个支队），总计11个旅，兵员有2.5万多人。军队部署前后分为三线，组成一个大包围网。把部队分为堵击部队：凡抗日军行动要路、出口一律封锁；扫荡部队：遇有情报时，或出“奇袭”，或在抗日军意料以外进行搜索；游击部队：经常在山里穿梭般行动，以使抗日军的活动受到阻碍。人员、弹药、粮秣、被服的补充和情报的传递均受到极大的困难，并继绝抗日部队与群众的联系。

日伪把“讨伐”总司令部设在通化城里，并组织一个“讨伐指导部”。把东边道全地区分为5个“讨伐”小地区。即：通

化地区司令由总司令于琛澂上将直接担任，指挥的部队有第1教导队（队长吕衡少将），还有协同部队第五军管区的1个支队（支队长索景清少将）。临辑地区司令是第一混成旅旅长张益三中将，指挥的部队有第四混成旅（旅长闫家梅少将）。长抚地区司令是第三混成旅旅长李寿山少将，指挥的部队有第二混成旅（旅长高明少将）。濛辉地区司令是第五混成旅旅长廖弼宸中将，指挥的部队有协同部队第三军管区步3兵第十三旅（旅长朱风阳少将）。金柳地区司令是第六混成旅旅长董国华少将，指挥的部队有骑兵部第三旅（旅长赵秋航少将），协同部队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队长石兰斌少将）。各地区按“讨伐”作战计划分头行动，互相联系，彼此协力，通报情况。第2线部队除警备后方和交通运输线外，还负责镇压当地群众，不准乱说乱动。

1936年东边道的“讨伐”，没有日军配合行动。但是，伪满军要在日本军事顾问“讨伐指导部”的指示下行动。各旅和教导队中有日本军事教官，团、连有日系军官，部队的一切行动，事无巨细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1936年冬，金柳地区司令奉命临时组织一个游击部队，协助长抚地区“讨伐”。由日系军官友座中尉率领，称为友座部队，到抚松归日本顾问下山琢磨指挥。一次，向抚松东北山里“讨伐”雪深过膝，无路可寻。正徬徨间，突然密林中枪声大作，弹如雨下。只听见枪声，不见人影。伪军官兵不知所措，各个抱头鼠窜逃命。霎时间，尸横遍地。混战约3小时，伪军伤亡30余名，损失不少枪支。指挥“讨伐”的下山琢磨几乎被抗日军捉去。友座部队从此垮台。

1938年春，金柳地区讨伐司令部住柳河县凉水河子。指导讨伐的顾问安永笃次郎亲率步兵第一团长赵明达和官兵300多人，背给养民夫100多名，向辉南县境龙泉镇山里讨伐。趁夜间

向该镇东北沟里前进。刚走了几里路，发现前面有火光摇摆，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人侦察情况，又见两个火光摇摆，安永命令部队赶快向后撤退。就在这时三面枪声大作，吓得官兵乱窜，闹不清究竟该对那方应战，混乱成团。拂晓时，抗日军撤退，经查点人数伪军伤亡20多人，背给养的民夫死6人，伤10余人。

参加大讨伐的经过

吴国贵笔供

（1954年7月29日）

1936年9月，我任伪第五军管区军械处长职务中，被临时编入索混成旅任参谋长。该伪旅的编制：伪旅长索景清、日寇军事教官饭冢中佐、伪教官部勤务上野文武上尉、伪参谋长上校吴国贵、少校参谋张仲友、上尉参谋范鸿飞、伪步兵三十二团团长刘连钰、伪第五教导队步五团第二营营长王维周、伪骑兵队（由伪教导骑兵团抽出两连编成）队长范佐臣。

伪索混成旅受命增援通化，归伪通化地区司令藤井少将指挥，对抗日义勇军王凤阁进行“讨伐”。9月末开抵通化西英额布及快大茂子待命。10月间又受命转进通化南约25公里的头道崴子。伪旅部及伪骑兵队驻该地，伪教导步兵第二营驻二道崴子，伪步兵三十二团驻三棵榆树及其附近。10月10日前后，伪通化地区司令藤井少将来头道崴子视察，指示索旅在该管区内要彻底搜剿，不给抗日义勇军丝毫活动余地。伪索旅按照此指示，派伪第二营在二道崴子及其以南热闹街一带；派伪步兵

三十二团在三棵榆树附近及其周围，实行“搜剿”，该各团、营、队每月平均出动三四次，每次虽未与抗日义勇军遭遇，但都有烧毁山寨的报告，计两个月出动的总数约20多次，烧毁山寨不下30座。

大坪松雄口供

（1954年8月20日）

问：把你去东边道的任务和情况讲一下！

答：我带一连宪兵约80名去的。当时在那里主要是作宣传、宣抚、搜集情报和对抗日军的诱扣以及对爱国人民的逮捕镇压工作，受通化讨伐指导部和混成第1宪兵队长古岳新治的领导，连队本部驻在临江县八道江。当时派出两个分驻队，一个是张中尉领20名宪兵分驻在林子头，另一个是吴中尉领20名宪兵驻在红土崖。

答：将具体罪行讲清楚。

答：1936年11月中旬，通过利用的密探得知，有抗日军杨靖宇的部下约70名在八道江南的大镜沟一带。因为进行诱扣未成，我就率部下约50名去讨伐，晚间7时即开始战，半小时后抗日军撤退。我们攻到山上占领了他们1户3间的住房，但没抓到俘虏，只打死了3名抗日军，得了步枪3支，子弹五六十发。第2天回来时，将这1户3间房子烧毁，同时将粮食四五百公斤，牛皮一张，锅2口和被服的材料全部带回。为了消灭抗日军的地下力量和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于1936年10月，在八道江东北附近村庄，以我为总指挥，一齐逮捕了认为与抗日军有联系的中国人约30名，将其约半数的人进行严刑拷问后，我命令部下将其中7名在八道江村南的河岸枪杀。同年11月下旬，在八道江以南的村庄，实施了第二次大逮捕，捕了中国人民约35

名，将其中约15名进行拷问后，将其中10名认为与抗日军有联系的重大嫌疑者，命令部下在以上地区枪杀。同年12月下旬，在八道江的西方附近一带村庄，又一齐逮捕了中国人民约十六七名，将其中10名进行拷问，内有1名因受刑过重死在狱中，后将其中4名认定为抗日军的情报员，我命令部下予以枪杀。将其中3名的住房3户6间放火焚毁。抗日军保管的粮食约1吨也没收了。以上三次大逮捕，是在八道江、林子头、红土崖一带村庄，对所捕的中国人民，大部分都过灌凉水、拷问等酷刑。其中有20名经过拷问后，胁迫他们给宪兵提供情报后予以释放。

坂根觉次郎笔供

(1954年9月16日)

从1936年9月1日至1937年3月31日期间，根据奉天宪兵队长加藤泊治郎中佐之命，以特高课长富田直澄少佐及我与令井仪一伍长等3名，在通化县城组成伪军宪兵指导部，指导伪军宪兵混成第一宪兵队古岳新治中校等300名，进行情报活动及诱降工作。

在整个工作期间，共诱降了东北抗日联军及抗日部队战士约200名，利用他们在通化省内各地进行情报工作。工作结束后，将他们收容在通化县城混成第一宪兵队内，全部加以屠杀。其中50名，是我奉命指挥宪兵屠杀的。

1. 1936年12月末前后，根据指导部长富田少佐之命，假称送往西安煤矿劳动，进行欺骗，指挥伪军宪兵3名，将被诱降的战士30名，押送到通化与西安（今吉林省辽源市）之间，在西安街西山中，我指挥该地日军独立守备队士兵，用手枪将其打死，在现场将尸体烧掉。

2. 1937年2月上旬前后，根据指导部长宇津木少佐之命，

我指挥伪军宪兵，将诱降的20名战士押到通化县城西南方浑江江岸，每次令5名跪在浑江冰上的裂口边，指使伪军宪兵用手枪将其打死，尸体滚入浑江里。当时曾有一名战士欲行逃走，我遂将其推进冰窟窿里。

（摘自《东北“大讨伐”》）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与集家并村

王之佑

1936年9月1日，佐佐木到一亲自率领日本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数十人，及日系军官和军用文官多人，到通化组织东边地区“独立大讨伐指导顾问部”。他以伪满最高军事顾问和日本特务机关长的名义，指挥伪满军开始“独立大讨伐”，并指挥伪省、市、县行政机构，实施“肃正工作”。这个所谓独立大讨伐，就是伪满军不受日本军部队长的指挥，而由他直接指挥行动。这个所谓肃正工作，就是依照他的计划，在伪满军武力支持下，令省市县行政机构，实行“集家并村”、“检举”等“三光政策”。

在“独立大讨伐”行动中，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澂任“讨伐”司令官。率领幕僚在通化组成“独立大讨伐”司令部。指挥第一军管区的主力部队和调集来的增援部队，向王凤阁、杨靖宇、金日成所领导的抗日军发动总攻击。又将东边地区9个县划分为5个小地区，指定专人和专用部队来负责。计通化小地区：由于琛澂直接负责、指挥第一教导队少将队长吕衡和独立第一自动车队（2个连）担任通化县境内的“讨伐”。临辑小地区：由安东地区司令官张益三负责，指挥第一混成旅和由第五

军管区调来的索支队（少将队长索景清，步兵一团、骑兵不满一团）担任临江、辑安境内的“讨伐”。长抚小地区：由第三混成旅长李寿山负责，指挥第二混成旅（旅长高明少将）、第三混成旅担任长白、抚松境内的“讨伐”。濛辉小地区：由奉天地区司令官廖弼宸负责，指挥第五混成旅和由第三军管区调来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朱风阳少将）担任濛江（今靖宇县）、辉南境内的“讨伐”。金柳小地区：由第六混成旅长萧国华负责，指挥第六混成旅和第三骑兵旅（旅长赵秋航少将）担任金川、柳河境内的“讨伐”。这些所谓小地区司令和旅长们，都是在指导“讨伐”的日本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去指挥部下，就是于琛澂也要听佐佐木到一的指导，他不在时由军事顾问下山琢磨大佐来代替。而“讨伐”的各团长，则听从日本军事教官的指导。这些指导顾问和教官无恶不作，惨无人道，尤其是在指导“肃正工作”中更是造孽多端。

这次所谓独立大讨伐的行动，持续实行2年余，到1938年末，才撤销“讨伐”指导顾问部。其结果是由伪第一教导队诱捕住王风阁夫妇，送到通化杀害了。因而在东边地区的农民抗日武装力量从此瓦解，抗日联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害。总计起来，东边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减少了17 000余人。到1939年春，杨靖宇和金日成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据伪满军情报所载不满3 000人了。伪满军方面，伤亡和冻废者也达千人，而民伕伤亡还不在内。所谓增援部队，先后撤回原防了。

在“肃正工作”中，是依据佐佐木到一的计划，在他和顾问、教官们的指导下，由伪满军警尤其是伪宪兵的协助下进行。从伪省、市长到县长们，各率该属伪官吏、警察和地方“协和会”的“绅商”会员，进行“集家并村”和“检举”工作。这个大规模的检举，是以密告和嫌疑为根据的。其处理方法极其

凶残，交到伪司法机关处理者寥寥无几，而秘密处决的则占被检举者的多数。因而其结果是许多教员、学生、旧官吏和稍有威望的汉、朝族人士多被残杀。商人、富户被牵连者大批失踪。而“集家并村”更是为言尤巨。在“民匪分离”的口号下，把这个地区划出若干个“无居住地带”。其中较大的有通化县北部、柳河金川的东部、濛江抚松的南部、临江县的西部及山林地区，各造成一个东西长100余公里，南北长50余公里的大“无居住地带”。由这些县的伪官吏和伪警察，用暴力将这个地区里的农民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山，到指定的所谓集团部落里去居住。限期移完，焚毁房屋食粮，没收牛马农具，违者即以“通匪”论交司法机关惩办或就地杀害。迁出的农民到集团部落后，须先出人力畜力建筑集团部落的外壕内围，“义务劳动”完毕，才许自己盖房。其结果，在这一个地区里就有约万户农民，失去了田园庐仓、生产工具和畜力，而食粮、财物更难以数计。人畜被枪杀的也为数不少。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实质。这个地区在“集家并村”以后，因为失业而逃散或改业者更是不可数计，农民生活条件突然恶劣。于次年春夏之交，瘟疫盛行，仅一个约3 000余人的部落，就死亡达千人。使这个地区的人民数目锐减，土地荒芜渐多，给东边地区广大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

舅父王凤阁就义前后

李 通

1931年，我7岁，母亲王凤萍去世了，我跟着外祖母一起生活，对舅父王凤阁抗日救国的事迹知道一些。现将我舅父王

凤阁将军就义前后的事情回忆如下。

1936年秋天，东边道伪军对王凤阁率领的抗日队伍，进行了疯狂的围攻。王凤阁只好将部队化整为零，牵住敌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样周旋战斗到1937年春。这时，王凤阁带领十七八个战士，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爬冰卧雪，已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有一天，他们突然在孤砬子沟口发现一张牛爬犁，大伙上去堵住，把牛卸下来拉进口就宰了，借了个锅准备炖牛肉吃。那曾想，牛肉还没炖烂，敌人就上来了，他们赶紧转移。当时在景家街住有伪军一个王团、一个赵团，敌人又向通化守备队打电话报告，来了刘尚华教导队。他们发现了王凤阁，咬住不放，紧紧追赶。王凤阁带领这支小队伍，穿山越岭地转转了好几天，怎么也甩不掉，一连跑了好几天，边走边打，大伙疲劳不堪。这天晚上退到老虎山顶上，这时孩子和妻子因冻饿和疲劳而难以支持了。王凤阁稍微拢点火，暖和暖和，便收拾了一下，在这里住下了。

王凤阁把盒子枪放在脑袋底下枕着，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事不凑巧，王凤阁在翻身的时候，盒子枪跑排了，响了好几声。敌人听到枪声，寻着声撵了过来，发现房框子里有人，就开了枪。王凤阁立即带领战士还击。打了一个晚上，牺牲了几个战士。第二天一早又退到另一个山顶上。这时，日伪军把他们四面包围了。王凤阁身边就剩下几个战士了，子弹也全打光了，王凤阁和妻儿以及几个战士全部被俘。

开头王凤阁被押到景家街的一家磨道里，敌人怕他跑了，用钉子把双手钉在磨盘上。第二天一大早，小鬼子套上大车，把他和妻子以及年仅4岁的儿子小金子一块儿，送到通化混成第一宪兵队本部，请功受赏。听说宪兵队开始想使软招子劝降，特地在通化东江春饭馆摆了宴席，妄想规劝王凤阁屈膝投降。王

凤阁一看，就明白了小鬼子的用意，不慌不忙，走到近前，猛一使劲，掀了满桌的酒菜，弄得鬼子汉奸目瞪口呆。

王凤阁被关在宪兵队本部后院的监狱里，他的妻子和儿子关在隔壁。王凤阁穿着灰棉袄灰棉裤，精神很好，对抗日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因此，敌人每次给送去的饭菜他都吃得一点不剩。王凤阁的儿子小金子一见宪兵送去的大米干饭团子和咸菜，就大声喊："我不吃亡国奴饭，我不吃满洲饭。"

4月的一天，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天一清早，鬼子宪兵队宣布通化净街，马车、洋车和行人都不准行走，准备在通化柳条沟口杀害王凤阁将军。

鬼子把王凤阁和他的妻子、儿子分别押在两辆汽车上。当时王凤阁虽然双手被绑着，但两眼有神，威武不屈，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慨。车出东门，沿着大街朝北走，来到了柳条沟口。这时，玉皇山、柳条沟北山几个山头，鬼子都架上了机枪，布满了军警岗哨，生怕抗日联军来劫刑场。

在王凤阁殉难的地方，鬼子挖了两个坑 ，想把王凤阁和他妻子孩子分别处死。刽子手就把一家分别推到两个坑前。王凤阁将军在敌人面前硬是不跪，刽子手只好用洋刀砍了王凤阁将军。他的妻子看到王凤阁已倒在血泊里，愤然地抱着孩子奔了过去，一头栽了下去，鬼子的机枪也响了。王凤阁将军一家，为了抗日，战斗在一起，就义在一起。

（由天德、胡维仁整理，通化市政协供稿）

桓仁县西江惨案

王明玉　宋玉峰　搜集整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西江惨案就是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三），在桓仁杀害我抗日人士、无辜百姓，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填江案件。

1936年6月，日伪在桓仁的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一起出动，到桓仁各地对抗日军和“土匪”做所谓“收降”工作。并威胁城镇绅士下乡作保，配合特别工作部和警察特务做诱降欺骗工作。还利用亲属和私人的密切关系，对抗日军进行封官许愿，采取金钱收买等手段，使少数人动摇变节，其中个别人投降后，又充当日伪特务。就这样，到1936年年底，把一些零散的小股抗日部队和“土匪”陆续骗下山来。并让这些被“收降”的人都要到县警务科司法股，由司法股长张寿彭负责按手印、采指纹，还用缠在一起的三根针，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在被“收降”人的左手虎口上或左胳膊腕子扎出血，揉进墨，做为记号，然后再放回家去。

1937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日），特务股和司法股下令，让全县各警察署，在22日这天，把被“收降”人员全部送到县警务科司法股领“证明书”。各警察署接到命令后，陆续把人送到县城，由司法股长范斌和警尉初景山负责点收。当天晚上，把这些人都送到东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里去住。

1937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三日），这是人们难忘的一

天。这天早晨7点钟左右，日本守备队在西江岸约1公里以内，实行了戒严，断绝行人与车辆通行。并强迫车夫、行人和被甲长传来的人一起，在西江沿水深处（现在的西江桥以下50米处）顺江砍成一个三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与此同时，所有来领“证明书”的人都到县公署西院集中。8点多钟，由县城警察署长徐万程带队，警务科特务股股长金永奎，司法股股长范斌，警尉初景山等人和警察、便衣特务，负责押送。他们让来领“证明书”的人排成四路纵队，顺东关大街步行到西关守备队大院。

到守备队大院后，先让这四排人都两排两排对面站着，听日本军官训话，然后分别被关进几个大屋子里去。在一间小屋子里，由日本人设堂审问。这些来领“证明书”的人分批受审。被审查的人，除了7个小孩和1个叛徒外，把嘴都给堵上，用商会早就准备好了的绳子全都捆了起来。

负责装车的是特务股长金永奎和一姓韩的特务，另外还有警察署的人以及县城各分所里的人。他们把这些被捆上的人往车上扔，横七竖八地摞在一起。由纪纯义和警尉张洁臣负责，带领收查班和第二期训练班的人，往西江沿押运。一共用4辆汽车（警务科两辆，守备队两辆），每辆车派4名警察，每辆装30人左右，装满一辆，运走一辆，从守备队后院一直拉到西江沿。拉到了地方，全都推下车，并强迫这些领“证明书”的人都跪在已经砍好了的冰窟窿边上。

10点多钟的时候，守备队长野田和宪兵队长（名不详）指挥守备队、宪兵队往江里填人。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先是用洋刀砍，刺刀挑，把人杀死后再填到冰窟窿里去。有的受难者不忍心身首被砍杀，就自己跳到江水中去。后来，这些刽子手们砍杀得累了，就把人活活地推到冰窟窿里去。冰窟

窿里的人填得多了，有的就漂浮上来，守备队、宪兵队就用木杆往里捅。这300余名来领“证明书”的人，就这样全部被杀害了。尸体填进了冰窟，鲜血染红了江面，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直到晚上，还能听到从西江沿传来的马达声，日本兵的嚎叫声和伪警察的吵闹声。

在这些死难者中，大多数是坚持过抗日的“民众自卫军”、被俘的红军战士、地方工作人员，还有被认为是“土匪”和“通匪”的群众。

西江惨案之后，日本守备队又命令各警察署，搜捕没到县城领“证明书”的被“收降”的人，就地处决。拐磨子警察署长朱文元，亲自带领保甲兵，一夜抓了12人，于2月25日，在老黑漫子枪杀之后，填入富尔江。二户来警察署长黄金兰，于2月24日，在二户来南门外处决11人。沙尖子警察署在马圈子枪杀了19人。其他警察署也都在到处抓人杀人，全县被杀害的人很多，无计其数。

到了春暖开江的时候，被填进冰窟窿的尸体，逐渐都漂浮上来，顺着浑浊的江水向下漂流……。

（摘自《桓仁文史资料》第一辑）

五

三江“特别大讨伐”

编者按：关东军制订对东北抗日武装实行所谓“三年肃正计划”后，从1937年7月起，调集大批关东军和伪满国军，对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伪三江省地区，实行特别大“讨伐”。这次军事行动是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策划和具体部署的。关东军的第四师团直接调入伪三江省，并调日军第四独立守备队进入牡丹江地区。关东军使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澂兼任伪三江省省长，做为这次“讨伐”的总指挥，但实际上，“讨伐”活动皆由关东军司令部及在该地区的日军司令官直接指挥，由日、伪军联合进行。由于日、伪军兵力集中，数量大，使该地区的抗日联军蒙受巨大损失。这次讨伐一直持续到1938年末才结束。

日伪“三江大讨伐”

李文龙　周大鲁*

三江地区的讨伐，完全是依据战犯佐佐木到一的计划。把于琛澂由奉天第一军管区调到第四军管区任司令官兼三江省长，使掌握三江地区的军政两面，此乃为讨伐便利起见。当时，佐佐木到一命伪治安部高级顾问大迫通贞兼任第四军管区和三江地区的主任顾问，但未到任，由三江地区顾问北部邦雄代理。由北部邦雄顾问和驻在佳木斯市的山下奉文部队协定，把三江的东部地区划归伪满军讨伐，但是受山下奉文指挥。三江的西

* 证明人李文龙系伪第四军管区的中将司令官；周大鲁系伪第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此证明材料记录人赵玮系伪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

部地区，归日本军讨伐。

在北部邦雄顾问的计划下，把三江东部讨伐地区，区分为4个小地区：萝、绥小地区，主力为冯广友的混成旅外加骑兵第二十一团；抚、饶小地区，指导顾问牛方一角中佐，主力为混成第二十三旅（缺步兵第三十团）外加靖安骑兵团；宝清小地区，指导顾问柿村中佐，主力为兴安骑兵支队（缺一团）外加步兵第三十团；集贤小地区，指导顾问松田中佐，主力为混成第二十二旅、步兵第十七旅，以外有教导步兵第二团、骑兵第二十四团和宫超骑兵团。

此外，在佳木斯市有钱富安的步兵团。

在政治、经济及特务工作方面，成立了治安工作班，是由宪兵、警察、特务和协和会人员组成的，在顾问的指导下单独行动。任务是在反复讨伐的地区，用宣传、宣抚工作来调查户口、施行十家连坐和全屯连坐的办法，并同时实行逮捕，很多人民遭到屠杀。

其次，用集家并屯的办法，建设集团部落。把所有山内的住户一概驱至山外，同时烧掉房屋。人民被烧死的很多。举例来说，在饶河县的大、小别拉坑，关门咀子，大、小家〔佳〕河这些沟里都是无人区，把房子都烧光了。

由于集家并屯，把人民和抗日联军隔离了。因此，抗日联军由于吃穿不足，陷入极端困难的状态。北部邦雄顾问在此情况下，他利用了由山里归还的步兵第二十九团（此团以前曾一度入山里和谢文东合伙）的人，到山里说降，因此谢文东、李华堂、王荫武等人先后投降了日寇。这些投降的人，又被利用，带领讨伐队到山里，把抗日联军的粮窖、缝纫工厂和根据地都给破坏了（参加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仍为步兵第二十九团）。因此屠杀和瓦解了抗日联军。例如：

1937年冬或1938年春，正在积雪期间，基于宝清日军马场部队的计划，骑兵第三十九团在宝清的南部山地行动中，见有4个人向道路一侧跑去，骑兵三十九团的先头部队赶到，此4人中男的跳涧自杀，女的3人被俘。

1938年夏初，步兵第三十团在宝清的七星泡一带，与抗日联军部队30余人遭遇。步兵三十团对此实行包围攻击，抗联部队无法突围脱逃，遂全部被俘。在团的日系军官合议下，得到柿村顾问的同意，枪杀了20多人。

1939年夏天，抗日联军周保中指挥下的李师长以下20余人，在宝清西南近山的部落内吃饭，被宝清县警察侦知，在驻宝清日军同意下，县警察队崔大队即时赶去，李师长以下战死五六人。

1939年冬，抗联张师长等在宝清县西部炭窑窝堡为过旧历年，托烧炭的人进城购物，被警察探知，张师长以下全部牺牲。

以上仅是我们知道的具体事件。总的说来，在三江地区的讨伐中，对抗日军民的损害之大，实难一一尽述。

由于战犯佐佐木到一对三江地区的讨伐计划，从1936年的秋天开始集中兵力，准备三江地区的讨伐。从1937年春天到1938的秋天，开始大规模集家并屯。由于集家并屯和劝降的阴谋政策，瓦解了抗日联军。同时，在集家并屯的实行和治安肃正的逮捕下，三江地区的抗日军民被屠杀了3 000余人。我们亲眼看到的是饶河县大、小别拉坑等七道沟的沟里，被划为无人区，2 000多户的房子都被烧了。饶河县在没有实施集家并屯以前为6 000户，实施以后，只剩下3 000多户。依兰和勃利两县人口比饶河多的多，尤其这两县在牡丹江流域的户数也比饶河多，因为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在建立集团部落的时候所受的损失，也一定比饶河大的多，最少限度也在两倍以上。全三江地

区14县统计起来，农民损失财物的总计在万户以上，被屠杀的人也有2万余人，再加上被杀害的抗日联军，人数达4万人。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伐”》卷）

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的特殊性

东条英机

编者按：为揭露关东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的阴谋和罪恶，特选了“三江大讨伐”的指挥者东条英机的这篇报告书。文中充斥对抗日军民的污蔑称呼，这是他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一、三江省是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满洲国在这里的行政力量薄弱，日满军警的武力镇压也有很多不彻底的地方。由于几年来满洲国内大部分地区施行了治安肃正工作，共匪为寻找安全地区，逐渐向三江省方面聚集，而且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与共产党地下工作相配合，加强了共产党、团组织。昭和9年，土豪谢文东利用移民问题，率领许多农民掀起暴动。共匪不仅逐渐与其声息相通，而且将其置于自己掌握之下；又利用移民及其他问题巧妙进行煽动，向居民灌输反满抗日和共产主义思想，以扩大势力，最近又在省内各地强征壮丁，充当共匪。故现在省内匪民身份不清，界线混淆，所谓共匪统治区域，甚为广阔。

二、省内居民与共匪有血缘关系者甚多，土地又很肥沃，可以解决共匪给养，加以有靠近苏联的地理条件，又有鸦片、沙金等资源，因而是给养较丰富的地区。匪徒一般重仁义，不侵犯居民，保护居民，每当住宿时，给以较多的费用，以收买民

心，故居民对共匪的统治已经习惯，并不感到是受害。因此，在匪化地区内，很多居民不认为治安不好。另外，对省内居民更应该注意的动向是，还有3万朝鲜人，由于《国境地带法》[1936年施行]及朝鲜人移民政策等的实施，已有相当的动荡不稳之兆。尤其是这些朝鲜人过去有很多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信仰者，因此，他们利用日本移民、土地问题等散布流言蜚语，动摇人心。

三、在三江省的满洲国军警、自卫团中，有畏惧共匪者，不仅不积极采取对策，而且还与匪相通；更有甚者，借口保命，供给共匪武器弹药。另外，在警察官中也混进了很多积极的通匪者，多次引导共匪袭击警察署、自卫团。总之，三江省的治安极为恶劣，国家政策不能施行，匪民混淆不清，不仅使之分离甚为困难，而且共匪还围绕着移民政策，利用回、鲜、满微妙的民族关系，容易受到苏联的巧妙宣传。

（摘自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

“治安肃政”的机构、部队和活动

藤原广之进*

一、治安肃正机构

1. 满洲国政府中央治安维持会之下有地方治安维持会即省治安维持会，下面还设有县治安维持会。

2. 治安维持会的组成。省治安维持会是以省长为委员长，以政府行政、司法诸机关、关东军、满洲国军、警务诸机关

---

* 藤原广之进当时任佳木斯宪兵队汤原宪兵分队长，宪兵中尉。

（日满宪兵、警察、铁道警护队）组成；以省公署所在地的师团长或是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顾问，师团参谋长或是独立守备队参谋长充任为副委员长；以当地的警备队长、宪兵队长、警务厅长及其部下诸课长、协和会事务长为治安维持会的委员。

三江省治安维持会是：委员长为省长（不知其名）、顾问是第四师团长松井命中将、师团参谋长步兵大佐冈田资是副委员长，还有该师团的作战、后方两参谋，三江省警务厅长，警务厅特务课长，警务课长，保安课长，佳木斯宪兵队长（初是宪兵中佐祖父江仪一，后为宪兵大佐儿嶋正范），宪兵分队长（初是宪兵大尉毛利幸三，后为松田某）为委员。

汤原县治安维持会委员长是县长某（方向学县长的后任者），副委员长是熊谷旅团高级副官，顾问是熊谷旅团长，委员是副县长高比虎之助，汤原县警务局长某，警务局附警正舟桥任保，汤原县协和会事务长，汤原宪兵分队长，还有驻屯在汤原县城的仓石联队大队长。

3. 汤原治安维持会的活动。汤原县治安维持会是于1937年8月初召开一次会议（以后在我任期内没有开过会），参加会议的有省治安维持会的成员：驻佳木斯的第四师团参谋长冈田资，师团高级参谋，师团治安工作主任参谋，三江省次长，警务厅长，警务厅各部课长，协和会三江省本部事务长等及汤原县治安维持会的成员，各村长等约有60名，我也以委员身份参加了会议。

首先由县长致开幕词，接着由师团参谋长冈田资大佐介绍了三江省各县城受袭击、满军叛变、汤原县城遭受袭击、副县长被杀害、武器弹药被夺、铁路被破坏、电线杆被砍断、日军的交通联络员被杀等情况后，说明为了维持三江省的治安有必要进行治安肃正，要求各有关机关的协助。接着省次长讲话称，

进行治安肃正时，为了圆满完成治本工作（集家、建立集团部落、警备、建立通信网、宣传宣抚等），应给予协助。汤原县副县长高比虎之助继而说明汤原县治本工作计划，请求省治安维持会批准，并要求村行政机关协助。

根据汤原治安维持会的决定，由汤原县公署按计划着手建设集团部落，修筑警备道路、通信网，结果增加了人民的困苦。当时在治安工作上使用了如下的手段：

治本工作：主要以政府行政机关为主进行，包括宣抚、宣传，并按照治安肃正要求实行集家、警备等各项工作；

治标工作：由日满军队、警察部队进行军事讨伐，武力镇压；

思想工作有两种：（1）由协和会和政府行政机关通过改善宣传宣抚和医疗等以掌握民心；（2）由宪兵、警察实行思想对策。

二、驻扎在汤原的部队治安肃正状况

1. 驻屯在汤原的日本军部队是，熊谷旅团司令部直属下的2个联队，高度分散部署，同时经常出动讨伐。驻屯在汤原县城的仓石联队直属下的一个大队，及分散驻在县城外的一个大队的成果是，在1937年8月下旬许，根据上级的命令把逮捕或投降者，交给汤原宪兵队四五十名。汤原宪兵分队根据队长儿嶋正范的指示，留了尹洪明七八名外其余全部归农。

2. 以上仅仅驻在汤原县城及其附近部附近成果，如果将竹莲镇、鹤立镇的成果也算在内其数相当大。

由第四师团捕获的尹洪明的供述中，知道了汤原县的党的组织及三江省的党的组织。

3. 熊谷部队驻屯当时，因为治安不良受袭击，电线杆被砍断，道路、桥梁遭到较严重破坏。还有龟井大队机枪中队由竹

莲镇向汤原县的行军途中，受到袭击，中队长以下全被消灭。从此后联队的讨伐行动更加激烈。

（摘自《东北“大讨伐”》）

日野武雄毙命挠力河

周作民

赵尚志将军组成抗日救国军，出入于汤原、鹤立、佛山、乌云各县、地区及松花江下游，吉林省之同江、饶河、密山、宝清、虎林（以上各县今属黑龙江省）一带。

另外还有在密山、饶河、虎林、同江、宝清各县，抗联军大队长景乐亭，拥有步兵一个营的兵力，轻重机关枪十几支。两军配备，有时合力进攻敌伪，有时分路游击，在当时敌伪少数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恐遭抗联袭击。

伪康德7年（1940年）春天，驻饶河一带的伪第六军管区（驻三江省城佳木斯）所属之步兵第八团调回佳木斯，饶河防地另由延吉调来骑兵第十团，团长为日野武雄。虽说兵种称骑兵，多为步卒，只有骑兵一连而已。

该团调驻饶河以后，伪团长日野对于地方治安，不时派队搜巡。所过各处，民不得安。是年8月17日，该团长又乘后登小轮船，带兵一连，沿小佳河下行，向挠力河出发。抗日军探悉，乃调景大队长带队潜于河中流小南屯山岗柳丛中。当日下午2时左右，船行到山岗下边，日野正坐在船上，耀武扬威，左顾右盼，豪饮啤酒。突然从岗上柳丛中发出枪声，继之机枪扫射，手榴弹齐向船上猛炸。日野未及措手，船被炸沉，日野和

连长周明武、连副赵立宪、于永谋等同被炸毙，随船沉河。伪士兵被炸死伤者三四十名，其余跳河顺流逃逸。

逃回县城的伪军报告挠力河失利，日野团长被炸死及船被炸沉的经过。伪团部官佐和县长等，无不惊惶失措，立派援队乘坐小火轮，赶到小南屯，办理打捞善后各事，询问附近居民，抗联军早已撤走。伪军官兵，心始安然。第二天，8月18日，伪军沿河把守，抓逼附近农民打捞沉船和尸体。

捞出沉船和伪团长日野等尸体多具，运回县城，分别棺殓，敌伪各机关大开追悼慰灵之祭，惟有赵连副、于连副等家属均在饶河，遗下寡妇孤儿。

伪骑兵第十团长遗缺另以林宽补充，林宽接任后，鉴于前辙，遇事小心，不敢猛进，坐守县城。每月赴东安镇（距饶河县城北30余公里）防地看看。

由于林宽团长不常派队出发，挠力河一带反倒太平些。

上述这段事实，是由死于此战役的于永谋连副的家属，事后归吉向我所说。

日野支队长毙命于“满”苏国境

刘世昌

“满洲国”与苏联国境上张鼓峰事件以后，“满洲国”的国境监视队改编为国境警察队。原来国境监视队的军官及军佐们愿意留下做警察的就留下，不愿当警察的就调到其它军队去。因我不希望做警察工作，于1938年3月由珲春原国境监视队调到延吉间岛地区司令部部附军需。原珲春国境监视队队长、日本

人新吾上校也调到间岛地区司令部当参谋长，同时前任参谋长日本人上校日野武雄晋级少将，任命为日野支队长。

日野支队是日野武雄晋级少将以后组成的一支装备较好的、比较有战能力的、当时所谓思想比较好的，能够听从日本人指挥的部队。这个支队组成的官兵是在延吉抽调步兵第八团、步兵第九团、骑兵第十团及其它的日本人认为可以的部队合并起来，共有四个团的兵力。它的任务是开往虎林、饶河一带“满”苏国境线上，协助日本军对苏作战的。

我到延吉在旅馆住着，不几天还未等上班呢，又调我到抚松步兵第六团去。在延吉见着步兵第九团少校军需姚永春、中校军需孟繁棠、少尉军需刘乃琳等，他们对我说一些关于日野支队组成的话。所以我才能知道这些有关日野支队事情。这个支队是在我去抚松以后由延吉经过新京（长春）开往饶河一带的。

我在抚松步兵第六团不到二个月又转到军事部，听说在“满”苏国境线上有了几次战斗，日野支队长阵亡。初秋的时候，日野武雄的妻子及其儿子由日本内地来新京（长春）迎接日野武雄的遗骨。

步兵第九团军需少校姚永春来新京（长春）办事时到我这里来了，听他说“满”苏国境战斗激烈时，伪军官兵厌战不前。这时日野武雄每天酗酒找女人，度其荒淫的生活（当时一般人说他“作死”)。有时到战斗的第一线上去，威迫伪军官兵与苏军奋战。就这样在饶河的一次战斗中，日野武雄毙命了。

日野武雄死后，“满洲国”皇帝授予他很高的“功勋”，这个勋章及日野武雄的遗骨一同由日野武雄的妻子及其儿子接到日本去了。

同江县鲁民店惨案

寇珍兰

我是1914年生人，现住黑龙江省同江县同江镇。鲁民店惨案发生那年（1936年）我22岁，所以有些事情都能记得，尤其是这起惨案与我家有关，到今不能忘。惨案发生之前，我们是一家子人，有母亲、叔叔、婶子、弟弟等。事件之后，就剩下我和一个5岁的弟弟了。

鲁民店的旧址，在今同江县三村乡丰乐村西小岗的前坡，在同江镇城东8里处。当时村里只住七八户人家，人口比较多的有3家，除了我家外，还有一家姓兰的，一家姓韩的，余下的几户都是一两口人，总共全村不超过40口人。

我清楚地记得，1936年6月26日的晚上，大约是8点多钟，一支18人的抗联小分队又来到我们村。这次来，具体干啥我不知道，只知道要在这休息两天。

6月28日，早上天气很好，人们一大早就都下地了，是抢着往回运麦子。大约是10点钟的样子，从县城来了两个要饭的，离村一里多远，被站岗的小赵拦住了，谎称村里的小孩出花，不许生人进村，劝他俩先到别的村去，过几天再来。要饭的有些犹豫，似乎还有些不满意，但也没说什么就要走，小赵见状觉得这样处理好像不大妥，于是又叫两个要饭的等一下，转身飞快地跑回村，拿了两打煎饼才把要饭的打发走。事不凑巧，就在要饭的走到村头时，因两个战士疏忽，被要饭的看见了。这件事，没有引起抗联和村里人的警惕。

大约是在12点钟，吃完午饭时，日军就来了，有100多人，两辆卡车，三四个“电驴子”（摩托车），余下的都是马队。装备有机关枪、小炮、空中还有架飞机。

日军离村2里多远时，被小赵发现了，他赶忙往村里跑。几乎是同时，日军也发现了小赵，随即策马追赶，举枪喝令小赵站住。小赵一见情况不妙，便急中生智，一下钻进了高粱地里，继续往村里跑，日军一见火了，就开了枪。

抗联队伍听到枪声，断定发生了情况，便都纷纷地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小孩顿时慌做一团。这时日军已把全村包围了。

一个军官带着两个日本兵及翻译，气势汹汹地朝我家走来，没等他们进院，我叔叔便急忙从屋里迎了出去，手里还拿面白旗（当时他没有隐蔽，因他是村长，以便应付日本人），日本军官没等我叔叔说话，劈头就问：“来红胡子没有?”“没有”，我叔叔镇定地回答。“真的没有?”那个官又追问了一句。“真的……”没等我叔叔把这句话说完，他就气急败坏地抽出战刀，直朝我叔叔头上劈去，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枪声响了，日本军官应声倒下（是隐蔽在我家的抗联战士开的枪）。

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这时抗联战士凭借着院墙、门窗、壕沟等隐蔽物，猛烈地向日军射击，尽管武器、兵力相差十分悬殊，但战士们打得特别顽强。

这时，我因害怕，躲在屋内烟囱根底下，一直不敢动弹。至于我叔叔是什么时候被带走的，后来又是怎么被杀害的，就都不大清楚了。过后在掩埋尸体时，才发现叔叔被杀害了。当时枪声很紧，就像爆豆一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地停下来。我壮着胆子，刚出门，就见日兵开始到各家搜人了。这时，一个抗联战士趔趔趄趄地从房西侧走出来，他脸色苍白，顺

着左手直往地上淌血，右腿的腿绊在地上拖拉着。看样是想包扎一下。这时日本兵渐近，无奈，他只得匆忙地藏在下屋的面柜里。我转身返回上屋，一手拎着个布包，一手拉着我那5岁的小弟弟，做要跑之状，借以引开日本兵。就这样我被带走了。

在带我走的路上，我往四下一看，只见四周都是日本兵，远处的村道上有卡车和“电驴子”（摩托车）来回巡逻，屯上空还有飞机，飞得很低，看样子也是在搜人。

群众陆续被抓走了。先是分散着，东一个西两个地站着，后来把大家集中在村南的场院里。人渐渐地多了，胆子似乎也壮了些，于是有些人（大多是妇女、小孩）便坐了下来。日本人看我们坐在一起，就骑马往人群里乱踩，还不时地挥刀乱砍。顿时有的被撞倒，有的被马踩了，凄惨之声令人心碎。出于无奈，我们都躲到院南侧的小泡子里站着，这才安静了一会。

不一会，日本兵又把我们都哄了上来，让大家到场院当中坐下来。日本人都撤到四周，架上机关枪。这时，两个日本人到人群中拽出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在人群的前面，日本人挨着个指点着大人，让小孩称呼他们（或叫他们名字），被称呼上来的人被集中在一侧。有两个人小孩称呼不出来，他们立即把他们捆绑起来。这两人，一个是前两天才从山东来帮着老兰家割大烟的小王，年龄才20岁；另一个也姓王，40多岁，家住二村，是开油坊的，一大早赶来要帐的。他俩一见不妙，纷纷述说自己的情况，可是日本人哪里肯听，特别是二村的老王，当讲述到家里的老母、妻子、儿女时，竟失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于是大家担着风险为他俩求情，但还是无济于事。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兵把他俩拖到离我们约有20多步远的地方，只见一个日本兵在小王的背后，对准头就是一刀，小王一下子就栽倒了，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另一个日本兵也下了毒手，从

老王的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刺刀，随即老王发出了一声惨叫，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啊！

在这起惨案中死的何止这两个人，光我们家就是3口，累计起来近10余口人。还有老韩家的小哑巴，在日本人进村时，因急于找隐藏地点，也被杀害了，死时才12岁。

日本人临撤走时，放火烧了屯子，全村浓烟四起，火光冲天，从此，鲁民店就成了一片废墟。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

汤原李家鞭杆铺惨案

刘国才　殷勇为

1937年夏天，日寇在汤原县汤旺河西岸大屯村附近的李家鞭杆铺（今香兰镇大屯村南1公里处），用刺刀活活挑死了8名无辜百姓，制造了一起令人毛骨怵然的惨案。

那是阴历七月下旬，活跃在汤旺河西岸的抗联三军九师，在李家鞭杆铺西南的陈水倌处，巧妙地对日本鬼子打了一个伏击战。这次战斗，击毁敌人两辆汽车，消灭鬼子21人，并击毙了号称“唐锤子”的日军警备队长，给盘踞在汤旺河西岸的日寇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抗联部队撤走的第二天，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就调集部队，对抗日人民进行了野蛮的报复。

大屯村当时只有3户人家，张仁住西头，吕凤林住东头，王富居中间。他们三家相距各有三四十米远。这天上午，张仁赶着马车到竹帘卖小麦，家里只留下5个干活的长工。晌午的时候，伙计们打场刚铺完麦子，回家吃午饭，正坐在条桌旁等着

开饭，忽然听到一声大喊："统统的马胡子"。就见高粱地里忽啦啦地钻出七八十个鬼子。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很快就把这三家围了起来。鬼子分成几伙挨屋搜查，最后拉出了7个男人。其中有60岁的猪倌王大包、碾倌吴聋子、李凤海的大儿子、葛三和打头的，他们都是张仁家的长工。另外两人，一个是来张仁家串门的张老五，一个是后屯黑通（今大兴村）的"胡二玄"。"胡二玄"本来是找张仁的劳金朱挺录要钱的，没想到碰上了日本鬼子。他一看没处跑了，便不顾戒律跑进了月房，向正在坐月子的王富老婆炕里挪。一个鬼子发现后，窜上去撩开幔子，一把就把他拽了下来。并随手操起地上的一把镰刀，朝他的脑袋打了好几刀把，接着连推带搡把他推到那些长工一块儿。

这时，住在东头的吕凤林在场院刚打开一捆麦子铺场，就见鬼子从高粱地里钻了出来。他撒腿想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个老鬼子揪住他问道："马胡子的来了没有？"吕凤林答道："来了。""哪边的去了？"他用手指着昨天抗联撤退时，留在苞米地里的一溜马蹄印说："那边的去了。"鬼子见他说出了抗联撤退的方向，又瞅了瞅马蹄印，说了声"那边的去吧！"就把他放到了一边。

又折腾了有一袋烟的功夫，另一些鬼子从张仁和王富家，都集中到吕凤林家的厢房西边。并用一根食指粗的麻绳子，把王大包、吴聋子等7个人连串绑了起来，又带着从王大房绑来的董万友，一起顺着地垄沟向南边的李家鞭杆铺押去。

李家鞭杆铺的主人叫李横滨。在头天打仗的时候，他的家就搬走了，所以这里只剩下了一座空房子。下午1点多钟，鬼子把被抓来的人都推到这座空房子里。碾倌吴聋子腰上扎着一条围裙，一个鬼子猛地把它扯了下来，"咔咔"几下就撕成了条条，

接着，把这八个人的眼睛都蒙了起来。一刹间，这些魔鬼狂叫着亮出枪刺，一刀刀地乱挑起来。屋子里传出一阵惨叫声。此时，无辜百姓的鲜血流了满地，溅了满墙，8个人都悲惨地倒在了血泊里。兽性发作的鬼子为了发泄挨打的仇恨，在临走时又放火把鞭杆铺给点着了。

在这遇难的8个人中，只有董万友是个单个绑着的。他的肋下挨了一刀后，当即扑倒在地上，然后被其他人压在底下。过了几个时辰，他慢慢苏醒过来，急忙扯下眼睛上的蒙布，从死尸底下慢慢爬出来，一直到天黑才爬到自己家门口。他满怀仇恨地向家人诉说了日寇的滔天罪行。最后因伤势过重，于第2天早晨含恨死去了。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这起惨案，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汤旺河西岸的人民，特别是大屯村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摘自《汤原文史资料》）

六

野副大讨伐

“野副大讨伐”始末

曾凡秀

“野副大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结束之后，对东南满地区的抗日军民进行的又一次大围剿、大镇压。时间是从1939年10月1日到1941年3月19日。

这次大围剿是日伪军、警、宪、特、行政机关及协和会，在以关东军中防卫地区、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讨伐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对当时的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抗日军民的血腥镇压，故按其讨伐的魁首一般称为“野副大讨伐”，也有因讨伐地区而称为“东南满治安肃正”或“通化、吉林、间岛三省联合大讨伐”。实际上讨伐的地区还包括伪牡丹江省的宁安地区和伪滨江省的五常地区。而实际开始时间是8月中旬。

讨伐的主要目标是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以杨靖宇、魏拯民为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活动在东南满的抗日联军一路军，为配合全国抗战，牵制日伪力量，频频开展进攻。第三师为打通与进入热河的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奉天、抚顺、本溪一带；为支援三江地区兄弟部队的反讨伐斗争，减弱敌人的“讨伐”力量，从1937年冬到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魏拯民领导下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所属第一军、第二军，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在东南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日伪重点工程，袭击敌军据点、警察分驻所和集团部落，对日伪打击很大。抗联一路军对敌人

的频频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感到“三年肃正计划”执行的结果，虽然给抗日部队以很大伤亡，但东北抗日烈火远未扑灭，尤其是在“满洲治安之癌”的南满地区。日本侵略者认为，作为战争物资供应地和兵站基地的“满洲”，确立稳定的治安是当务之急。

关东军很快结束了对三江地区的讨伐，把镇压重点转向东南满地区，决定对活动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作最后一次“彻底剿讨”。1938 年底开始进行了准备工作。

一、“野副大讨伐”的组织结构

1938 年底，由关东军及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具体策划制定了“三省联合讨伐计划”，特拨款450 万元作为第1 期(1939年10 月到1940 年3 月)讨伐经费，以中防地区驻长春的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讨伐司令官，陆军中佐北部邦雄为参谋，1939 年5 月在吉林市具体组成讨伐司令部。其机构如下：

1. 参谋部，部长为作战参谋陆军中佐北部邦雄、后方参谋陆军中佐山本某；

2. 宪兵部，先后由宪兵少佐玉冈严、松本满贞、柳生馨、河野某任部长；

3. 警察部，先由伪治安部警务司长植田贡太郎、后由谷口明三任部长，成员有警备科长田中要次、特务科长鹤荣次等；

4. 伪军联络部，部长为石黑中佐；

5. 伪铁路警护队联络部，部长为吉林铁路警护队长川村进；

6. 伪法院联络部，部长为伪吉林省检察厅次长日本人某；

7. 伪协和会联络部，部长为伪吉林省协和会本部事务长；

8. 伪行政联络部，部长为宋敏雄。

每个部有部员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作为讨伐司令部的核心部是参谋部和警察部，编制庞大，下辖讨伐队和特务工作。除了参加讨伐的日伪军以外，基本上承担了讨伐的全部任务。

参谋部，在北部邦雄的指挥下，有第1、第2、第3三个工作队：第1工作队队长由北部邦雄兼任，其下领导游击队，队长为日本人片野某；特设队，是以抗联叛徒魏德成和林宇诚为领导的各有80到120名成员不等的队伍，既从事讨伐，又进行诱降工作；还有一个以宪兵曹长长岛玉次郎为班长的宪兵工作班，这个工作班是由日、伪宪兵和伪满警察官组成，还领导一个名为“黑崎游击队”的武装组织。长岛工作班大致活动在临江、抚松、安图、延吉、和龙一带。

第2工作队队长由田中要次兼任，下辖濛江、桦甸、辉南三个工作班。

第3工作队队长为金光庸正，下辖安图、汪清、延吉、敦化四个工作班。

警察部，以伪满治安部警务司长植田贡太郎（后为谷口明三）为头子。主要成员有警备科长田中要次、特务科长鹤荣次、指纹鉴别班长大美贺好一。警察部之下有由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警务厅长，即岸谷隆一郎、丰森（后为村井矢之助）、袖冈静太为头目的省讨伐队本部及其所指挥的警察讨伐队。各队本部之下除领导所属各县的警察队及警备科之外，还专门编成并直接指挥从事讨伐的警察大队，还有由各省特务科长领导的省特别搜查；而各县则有县特搜班，由县特务股长领导。另外，又将伪营口海边警察队的三架飞机调归警察部指挥，担负侦察、空袭、撒传单等任务。

参加讨伐的日军和伪军各部队统归讨伐司令部指挥，而伪

军在各地则还要受讨伐地区的日本军指挥官的指挥。日、伪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军事讨伐和掩护"治本"工作。而参谋部领导的工作队及警察部指挥的警察队，除参加或配合日伪军进行武力镇压外，还要从事大量的所谓"治本"工作。即敌伪文献所指出的："以专用部队的讨伐作为'纬'，以警防队及其行政警察、森林警察、协和会归顺工作作为'经'，同时并行强有力的"治标"工作和彻底的'治本'工作。发挥日满军警的综合力量，专心一意捕杀歼灭杨靖宇'匪团'"。

二、"野副大讨伐"的兵力

因资料不完整，所以参加"大讨伐"的日伪军警宪特的人数尚无确切数字，本文所列兵力数是根据作者接触到的资料及日、伪战犯供词综合考察而做出的。

此次大讨伐，时间长达一年半，大约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兵力皆有所增减，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只能把这次参加讨伐的部队、警察队、警防队（包括自卫团）等大致情况搞清楚些。下面分别叙述：

1. 日军

参加野副大讨伐的主要是关东军的几个独立守备队中的部分大队。据档案记载，有第669部队，即以野副昌德为司令官的第二独立守备大队；第451部队；第555部队，山崎大佐为部队长；第62部队；第916部队；第166部队；第890部队；第590部队；古见中佐为部队长的356部队。据长岛玉次郎等人揭发，除野副昌德的第二独立守备队外，还有古见中佐指挥的驻通化、濛江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五大队的约1 000名；布上中佐指挥的驻延吉地区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十一大队约1 000名；小林大佐指挥的驻桦甸、和龙等地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九大队约1 000

名；木崎中佐指挥的驻吉林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约800名；德弘中佐指挥的驻牡丹江宁安地区的独立守备步兵第八大队约600名；原田大佐指挥的独立守备步兵第20大队约1 000名；山崎大佐指挥的驻间岛地区的独立守备第四大队约1 000名。共约6 400余人。当时关东军在东北的独立守备队有9个，每个守备队有5个大队共45个大队，每个大队500～800人。参加讨伐的七、八、九大队属第二独立守备队，故长岛等人的揭发与档案记载的参加野副大讨伐的关东军独立守备大队大致相吻合，这即是直接参加军事讨伐的部队和日军人数。此外，还有一部分部队在讨伐区域周围配合讨伐，执行围困、堵截任务未计算在内。

2. 伪军

伪军参加讨伐的部队是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行动的。据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和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等人揭发交代，有以下部队参加：

伪第二军管区有驻敦化的步兵第二旅，旅长刘尚华；驻桦甸的骑兵第二旅，旅长尹宝衡；第二教导队。

伪第八军管区有以李裕平为旅长的第一混成旅，集结于抚松县城；以高明为旅长的第二混成旅，集结于临江县城；以王士锈为旅长的第三混成旅，集结于金川、辑安县城；以赵振邦为队长的第八教导队，集结于通化。第八军管区几乎投入了全部兵力。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军管区增援的部队：第一军管区驻山城镇的步兵第五团；第七军管区的驻佳木斯的一个混成旅，旅长邓云章；第六军管区驻牡丹江的一个旅；加上通信部队和汽车队等。

上述伪军部队共约25 000人左右。

3. 警察讨伐队

警察讨伐队是野副大讨伐的主要力量，编制庞大，数量很多。有由各伪省警务厅长直接指挥的省警察讨伐大队，可以不受地区限制进行追击；还有以各县警备科长指挥的仅限于在本县行动的县警察队、警防队及自卫团等；还有当地的森林警察队。现将各伪省警察讨伐队的情况分述如下：

伪通化省，在通化市设有讨伐队本部，由岸谷隆一郎担任本队长。

从伪通化省1939年度秋冬季“肃正讨伐计划”来看，通化、辑安、柳河、金川、辉南、濛江、抚松、长白、临江等9县有警察力量8 900余人，其中行政警察4 668名、游击队2 156名、森林警察2 077名。参加讨伐的是从4 660余名行政警察中抽出3 150名编成讨伐队，而游击队和森林警察也参加了本地的讨伐行动。加上各县重要据点和重要集团部落的警防队和自卫团约4 500人，共约11 883名，这是各县警备科长指挥的讨伐力量总和。

更重要的还有一支由岸谷亲自指挥的省警察大队10个，多以抗联叛徒任队长，每个大队200到300人、分编成2到3个中队不等，共约2 600多人。这10个大队是：程斌大队、唐振东大队、崔胄峰大队、李长林大队、王超山大队、桑文海大队、岳长久大队、范文渝大队、杨凤翔大队、申麟书大队。这些讨伐大队行动不受地域限制。伪通化省警察讨伐大队力量最强，人数最多，破坏性最大。这些叛徒们起到了日本法西斯起不到的作用。而法西斯分子岸谷隆一郎则因这次讨伐有“功”于日本军国主义，由警务厅长升任伪通化省次长，又因他讨伐“有经验”，从伪通化省次长调任伪热河省次长，参加了1942—1944年“西南地区特别治安肃正”，伪省警察大队原人马也随他调往热

河，去镇压屠杀热河抗日军民。

以上总计，伪通化省各县警察队、森林警察、游击队、警防队（包括自卫团）及10个省警察大队共约14 480余人。另外还有特搜班、指纹班人数不详。

伪吉林省，在吉林市设立讨伐队本部，由警务厅长丰森（后为村井矢之助）为本队长，成员有渡边政雄、牧芳太郎、野崎茂作、高柿一男等。据档案资料和当时参加草拟计划的警务科成员野崎茂作交代有关伪吉林省讨伐队的情况基本一致。

为便于指挥和有效地进行军事行动，又在桦甸、敦化县城分设两个队本部（是省本部派出机关，而非县的单位），各有成员6名，负责处理讨伐事务及指挥特搜班。队本部直接指挥14个省警察大队，各大队有2至3个中队，人数不等。属桦甸本部的有：红石砬子大队、家木讨伐大队、鲇川森林讨伐大队、琵琶沟森林讨伐大队、木箕河森林讨伐大队及锦州增援的一个警察讨伐大队，这些讨伐大队由加藤警佐等具体指挥；属敦化本部由富村警佐等具体指挥的有：鹈木讨伐大队、泽畑讨伐大队、吉森讨伐队（后改为敢死队）、高见泽森林讨伐队、石上讨伐大队及奉天增援的明石讨伐大队、滨江增援的滨江讨伐大队、中央警校增援的下西讨伐大队。以上14个大队，共约2 750名，省队本部直属的特搜班272名，指纹班105名。此外还有各县的森林警察队2 280名，各县的警察队、警防队4 500名（其中有自卫团1 700名）。以上总计共约9 650余人，近1万左右。

伪间岛省，在延吉市设讨伐队本部，本队长为该省警务厅长袖冈静太，队本部成员约100名，下辖5个大队和一个特别工作班，即永富工作班，以朝鲜族人员编成。以上大约2 500人左右。各县以警备科长为队长的县警察大队，即：楠田修指挥的延吉县警察大队、宇波彦次郎指挥的和龙县警察大队、大宝喜

基指挥的汪清县警察大队及以警正金某指挥的安图县警察大队。据宇波彦次郎揭发，每个大队500人左右，共约2 000余人。各县神撰队、警防队（包括自卫团）人数不详，其人数不应少于吉林省，因1940年3月以后，延边地区成了这次讨伐的重点，估计大约4 500人左右，境内的森林警察队约2 000多人。还有珲春的国境警察队也参加了讨伐，人数不详。加上从奉天调来增援安图、延吉一带“讨伐”力量的中村警察大队1 000名。伪牡丹江省警察讨伐队本部及一个大队约500人。除此之外，从资料上查到的，这段时间在这一带参加过野副讨伐的有堀内警察大队、须野警察大队、渡边警察大队、宫本警察大队、宋警察大队等，人数不详，是 否是省警察大队也不得而知。以上总计伪间岛省的讨伐力量约1万余人，实际远不止此数，因1万余人中不包括不知人数的警察队。1940年4月以后，野副又将伪通化省讨伐队本部及4个警察大队调到延边地区，合围我抗联一路军的第二、三方面军。

总计以上，日军6 400人、伪军25 000人、伪通化省警察讨伐力量14 480余人、伪吉林省警察讨伐力量约9 650余人，伪间岛省警察讨伐力量约10 000余人，共约65 000人左右。加上铁路警护队、汽车队、通信队、野副司令部直辖的宪兵工作班及配合讨伐从事所谓“治本工作”的行政人员和协和会人员，再加上上述不知其数的讨伐队及“诺门罕”惨败后撤回的一部分队伍，约75 000人到80 000人之间。这即野副大讨伐总兵力，但也是概数。

三、讨伐范围和军事部署

讨伐范围：伪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全部及牡丹江省之一部地区。

野副讨伐司令部将上述广大范围划分成五个地区，即：东地区、西地区、南地区、北地区、东北地区。各个地区的日伪军警讨伐队皆由地区的日军部队长指挥。至于各地区所属的范围和配置的部队因无资料，确切记述较难，但据笔者考察，东地区指伪间岛省大部地区，西地区即吉林省大部地区，南地区即伪通化省，北地区指伪吉林省北部部分地区和滨江省五常县一带，东北地区即伪间岛省北部及伪牡丹江省的宁安、镜泊湖一带地区。野副昌德企图将我活动在这些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的第一、二、三方面军分割包围消灭之。

据长岛玉次郎等人的揭发，军事部署大致如下：

古见中佐指挥的第五独立守备大队的主力配置于南地区的通化、濛江及桦甸一带，归入其指挥区处的有伪第八军管区的主力部队；还有伪通化、吉林省警察队之主力及第一工作队，主要目标指向杨靖宇率领的抗联一路军司令部、警卫旅之一部及曹亚范率领的第一方面军；

布上中佐指挥的第二十一独立守备大队主力配置于东地区的延吉、敦化地区，指挥伪军第二军管区驻敦化、间岛的主力部队及伪间岛省警察队主力，以及第二、第三工作队、伪间岛特设队，主要目标指向活动在敦化、和龙、安图等地的抗联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及第三方面军的部分队伍；

德弘中佐指挥的第八独立守备大队及山崎大佐指挥的驻牡丹的第四独立守备大队，小林大佐指挥的第九独立守备大队之一部，伪间岛省省警察大队及伪牡丹江省警察大队，及伪军第六军管区的部队配置在东北地区，主要目标指向抗联一路军陈翰章指挥的第三方面军与抗联第五军的陶净非所部；

木崎中佐指挥的第七独立守备大队配备于西地区的长春、吉林一带与伪第二军管区部队和省警察讨伐大队之一部，主要

目标指向活动在桦甸、敦化等地的抗联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指挥的部队。

长岛工作班前期主要在南地区执行任务，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将其转入东及东北地区活动。

据原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交代，1939 年8 月中旬，根据野副的命令，将混成第三旅骑兵第八团由团长魏传镛率领，第八教导队骑兵团、步兵团由团长李希才、朱彦儒率领归入通化守备队大队长古见中佐的指挥下，分别由集结地辑安、通化开始行动；混成第三旅步兵第七团由团长杨春煜率领，步兵第五团由团长戴元率领归入驻山城镇守备队大队长某大佐指挥下，负责铁路警护；混成第一旅步兵第三团、骑兵第三团，由团长于泽浦、部凤磷率领，归入某守备大队某大佐指挥下由集结地抚松开始行动；混成第二旅步兵第二团、骑兵第四团，在团长李海澄、马国栋率领下，归入某守备大队长大佐某的指挥下，由集结地临江开始行动。

四、与讨伐并行的“治本”工作及其罪行

日、伪为彻底消灭我抗日联军，在全东北实行了军、警、宪、特法西斯统治，采用了极其毒辣的政策和残酷的手段，进行所谓“治本”工作。到野副大讨伐时，这些法西斯统治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为了镇压的需要，又增加了新的措施，并贯彻到讨伐始终。

1. 断绝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匪民分离”政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抗日军民采取的一贯方针。一方面强化原有措施，另一方面又增加新的内容。

强化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仅伪通化省，1939 年“保”增加到121 个，“甲”875 个，“牌”8571 个。凡有“通匪

者”即全家枭首示众，株连邻里。

强化“归屯并户”政策。1939年在伪通化省有“防御部落”379个，比1936年增加了三倍多，“集团部落”75个，也比1936年增加了一倍多。在伪吉林省到1940年秋，由国库和地区拨款就建成了674个“防御部落和集团部落”，并加强了警备力量和设施。特别是在抗联活动地区、重要据点、交通要道实行了小屯归大屯，将小部落归并为大集团部落，归并到交通沿线或日伪军警据点较近的地方。部落内驻有日伪军，配备有警防队和自卫团。做到“集团之外绝无家屋，食宿之所一律捣毁”。在各县又制造了不少无人区。据王之佑交代，在“通化北、濛江南的大无人区，纵横各百余里”。给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发放居民证和采缀指纹，这是新增加的一项镇压措施，也是强化法西斯统治的手段之一。这一措施首先在这次讨伐的区域内实行。据档案记载和当时讨伐司令部的指纹班长大美贺好一写的材料，为采缀指纹，各县都设有指纹班。仅在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长白、蛟河，伪通化省的辑安、长白、濛江、抚松、通化，伪间岛省的和龙、汪清、安图、延吉等县的保、甲、牌和“集团部落”内就强制8岁到55岁的城乡和平人民50万人按指纹。在讨伐期间，特搜班和指纹班，在采缀指纹受到人民抵抗，或检查居民证和检查户口中，以指纹“不符”为由当作“嫌疑犯”而受到逮捕处置的就有80余人。

2. 切断抗联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来源，实行“饥饿政策”。断绝抗联粮道，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伎俩，在野副讨伐中又增加了新花样。

首先用行政手段禁止到抗联活动地区进行贸易和流入物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只配给居民两三

天粮食，如发现向抗联提供必需品者，祸及全家，并殃及乡里。

其次，强迫农民提前收割农作物，为了大规模军事行动，1939年、1940年两年从8月中旬到10月初，强迫讨伐区域内的农民提前并限期收割庄稼，打场完毕。这一措施是在军、警掩护下，由行政人员、协和会进行宣传动员，以当地警防队、自卫团为主，无论庄稼成熟与否，一律按指定日期集体收割、集体打场毕，严禁个人独自进行。打场之后集中搬运到指定地点存放，一般都集中堆放在警备力量较强的据点和部落，并派军、警看守，严禁粮食外运。据资料记载，伪吉林省“动员省内各县警备力量及劳动力于短期内在治安不良地区，实行特殊农作物之一齐收割，以期彻底封锁匪之粮道，时间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伪间岛省则“从9月20日到10月20日一个月之内，将水稻、玉米、谷子、高粱、豆类、蔬菜为重点，集中收割，集中打场，搬运到联防据点的部落中集中堆放，集中监守”。伪通化省则规定从8月中旬到9月末一个半月的时间，不管成熟与否全部收到集团部落中，严格看守。为防止外地区粮食流入“匪区”，如五常县，也命令农民提前收割。

提前收割庄稼，不仅给抗联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也给讨伐地区的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打击和灾难。这两年使农民减产一半，缺粮达半年以上。

3. 加紧修筑警备道路、警备通信网，建立警防所，强化自卫团，收缴武器。

日本侵略者为此次讨伐，又加紧新修了不少警备道路。1940年9月以前，伪间岛省新筑了安图县到抚松，二道白河到神武城，十里平到大荒沟，亮兵台到骆驼河子等公路；伪吉林省修筑了10条警备道路，公路线延长了350公里，架设电话线100余公里，修理电话线500余公里；伪通化省新筑公路8条，改修

3条，总延长了312公里。据日酋野副昌德讲话，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秋季以前，修筑警备道路960公里，建立警防所80余处。进一步提高了讨伐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警防所是建立在交通要道、重要据点或重要集团部落，配以专职警防人员。把警防所与集团部落的警备设施紧密结合起来。

4. 加强铁路的警护工作。铁路警护队除直接保证和配合军事运输外，还参加“治本”工作，在火车上、铁路沿线进行严格检查盘问，逮捕所谓“嫌疑匪”，保证铁路运输安全和畅通无阻。

为收集情报，监视沿线人民群众，配合军、警、宪、特搜查逮捕，防止抗联横越铁路，破坏铁路，在沿线建立所谓“铁路爱护村”。

5. 严禁在铁路、公路两侧种植高杆作物，不许农民在山坡谷地开荒种地。限期清除采伐铁路、公路两侧15米以内的树木和森林，封锁山林，严禁人民进出。据文件记载，1940年9月以前清除采伐约360公里。至今在延边、通化地区的一些公路两侧仍留有当时的采伐痕迹。

6. 大肆进行诱扣劝降活动。宪兵工作班、特设队、特搜班在抗联活动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侦察抗联部队的行动和领导人住所；威胁利诱收买叛徒，派遣特务，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诱扣抗日军民或抓捕抗联干部亲属，进行“说降”；或深入抗联活动的腹地，破坏地下组织，摧毁我山寨、据点，逮捕和暗杀我抗联领导人等。

我抗联指战员中，一些不坚定分子或投机分子，在敌人的各种方式引诱下，投入敌人的怀抱，充当了鹰犬。像林宇诚、魏德成曾是抗联的中层干部，被敌人诱捕投敌后，当上了特设队

长。伪通化省10个警察大队的头子大部是抗联叛徒。这些人熟悉抗联战略战术、活动的具体范围和领导人的指挥意图以及生活习惯。如抗联一路军警卫团参谋丁守龙，一路军军需处长、南满省委委员全光等人被捕投敌后，全盘无遗地供出了党、军的机密，起到了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又如抗联一路军警卫旅长方振声就是叛徒向敌人告密而被捕杀害的。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也是被叛徒所杀。抗联三方面军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则是被敌人奸细用谋略手段所杀害的。敌人利用我党、军叛徒来破坏革命队伍这一招是很毒辣的。

7. 武力镇压与"思想讨伐"、"文化讨伐"并举。侵略者们"痛感对付共产党，如果只靠武力讨伐，犹如只铲去地面之草，不能深入铲其根"，贼酋野副昌德认为"根除共产党必须讨伐与破坏其地下组织、外围团体同时并举，切断粮道，组成文化讨伐核心"。为此，以参谋北部邦雄、宪兵部长玉冈严、警察部长田中要次、新京高等检察官绪方忠雄等人为主，组织了吉林会议。从1940年3月开始，每月1日15日在吉林野副昌德讨伐司令部召开两次以研究"文化讨伐"为内容的会议。侵略者们认为"文化讨伐"是对付共产党的"拔本塞源"的根本办法。

为"文化讨伐"抽调大批行政人员和协和会成员组成许多宣抚班，自上而下地形成一个庞大的宣抚网，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大规模反共宣传。除了在报刊上大肆宣嚣外，还制作大量淫秽书刊、色情照片和反共传单，悬赏缉拿我党、军领导人的告示。连同"招降书"、"恳亲书"一起，贴在抗联活动区域的乡镇、集团部落，撒在抗联出没的要道上，以瓦解我抗日战士的斗争意志。据角田信一笔供："以作诱捕工作为目的，从吉林省警务厅长特务科佐藤警佐领到淫亵照片50张交给出胁警佐，我从中留下20张，在河村工作队任副官时，于桦甸县第四

区山岳地带侵略活动中，将该照片贴在树上或容易看到的地方，以此作为诱捕抗日爱国军手段”。比如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后，侵略者惊喜若狂，利用杨靖宇的战死，在报、电台大肆鼓噪，又是开会庆祝，又是座谈介绍，又将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割下，还派人捧着将军这颗不屈的头颅，在通化市街或中、小学游街示众，恫吓人民。并拍成照片印制20万张传单，张贴各处，或用飞机到处散发，以动摇抗日军民的抗日决心。

上述的毒辣手段和残酷政策，给我抗日军民的生活和斗争带来极大困难和危害，造成的损失比武力讨伐严重。

五、“野副大讨伐”的战略战术及经过

野副大讨伐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准备工作几乎近一年。由于资料不够全，难于全面叙述其军事行动的全过程，仅根据笔者手中的材料大略作一介绍。

这次大讨伐，敌人以重点占据讨伐区域内各市县的大小城镇、交通要道、小村据点、重要部落；对东、西、南、北、东北五个讨伐区域采取分区包干的办法，将我抗联部队分割包围；日伪军警各讨伐队按照划定的区域和指定目标进行游击和进攻，形成一个一个“讨伐网”；将工作班、特设队的警、宪、特及便衣分散活动于山林、游击区内，构成一个“情报监视网”；用特搜班、工作队、警察队配合日伪军进行烧林搜山，捣毁山寨、密营、地仓子和抗联后方机关；出动飞机侦察、扫射、轰炸，引导讨伐队进攻、追击；调动汽车组成“快速讨伐队”提高讨伐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用“踩踏战术、梳篦战术、拉网战术”来回拉网，轮番扫荡，残酷围剿，一个区一个区地洗劫，不使一人漏掉；又用所谓“壁虱战术”或“狗虱战术”对我抗联领导人咬住不放，穷追到底。

何谓“壁虱战术”？法西斯分子岸谷隆一郎在答反动刊物《协和》记者采访时，曾恬不知耻地介绍说：“讨伐队一旦开始追击，就决不能松手。稍一放松，他就会死灰复燃，而我们就将前功尽弃。所以，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彻底地进行追击。像‘壁虱’一样，咬住不放，不给对方一分钟的喘息时间。这样一来，任何人也得认输。不过这次对杨靖宇的讨伐，应该说是‘壁虱’战术的一个典型战例。”

据资料分析，敌人的军事行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即：第1阶段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第2阶段从1940年4月到1940年9月；第3阶段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3月。每个阶段中还分若干小阶段。第1阶段中分秋冬季讨伐，第2阶段中还分春、夏季讨伐，第3阶段中还分秋、冬季讨伐。

每个阶段五个讨伐区全面展开，又有重点；每个阶段中，军事行动和“治本”工作也各有侧重。第1阶段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南地区。第2阶段军事行动重点转移到其他讨伐区，但这时期“治本”工作则有所侧重。第3阶段军事行动转移到东地区及东北地区。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阶段讨伐的重点集中在南地区的伪通化省和吉林省的桦甸县境，主要目标是对杨靖宇率领的司令部、方振声领导的警卫旅及曹亚范指挥的第一方面军400余人的部队。

从资料看，野副大讨伐初期，即1939年12月中旬以前，讨伐进行的不很顺利，收效不大。这期间，抗联一路军的健儿们在杨靖宇、魏拯民指挥下，在反讨伐斗争中取得不少胜利，其中主要是9月中旬二方面军攻克和龙县二道沟金矿，袭击了警察所；三方面军主力在敦化寒葱岭伏击日军松岛讨伐队，歼敌日军少将松岛部队长以下百余名；10月杨靖宇指挥司令部警卫旅和一方面军主力在金川回头沟毙敌伪军警讨伐队50余人；12

月初二方面军主力又袭击了敦化六棵松森林采伐事务所，捣毁了敌兵营。抗联反讨伐的胜利斗争，使敌人非常气恼。据当时指纹班长大美贺好一交代说："初期，由于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讨伐队在吉林敦化县大石头、大蒲柴河、寒葱岭、额穆索、蛟河新站等地受到了重大损失。"吉兴说："日寇野副昌德蛮横已极，在桦 甸县召集讨伐队军警负责长官开会，因讨伐不利，士兵伤亡很多，指名大骂伪满军官。日寇吉林省警务厅长（丰森），当时死在会场里。"

据王之佑交代，实际军事行动从8月中旬就开始了，主要任务是强迫农民提前秋收和搜索无人区。

伪第八军管区的部队，在古见中佐的指挥下，骑兵第八团搜索完通化、辑安间的七道崴无人区后，1939年10月中旬到12月初转入八道江以东地区；另以教导队骑兵团为右翼，步兵团为左翼，由通化、柳河县境向北推进至八道江至凉水河子一线上；步兵第七团、第二团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由临江西进到临、濛交界的三岔子岭线上；步兵第六团、骑兵第三团由抚松西南推进到抚、濛交界的头道花园线上。对通化县北，濛江县以南，临江县以西，金川县以东的大片无人区（纵横各百余里）进行了严密封锁，日伪军警联合推进，由南向北，拉网搜山，东西各有大军堵截。与抗联部队在上述地区交战20余次。最大的一次是日伪军警600余人在金川回头沟与杨靖宇指挥的一路军总司令部、警卫旅和一方面军约400人发生激战，受到我抗联部队的打击，被毙伤俘近60人，我抗联部队只伤亡12人。

1939年12月上旬伪第八军管区的第八教导队在八道江到凉水河子线上；步兵第七团由旅长率领在龙泉镇到辉南线上；混成第二旅在濛江；混成第一旅在抚松；骑兵第八团在濛江二道花园；步兵第五团大部在山城镇，其一营在朝阳镇。战斗指挥

所设于龙泉镇。

12 月下旬，抗联杨靖宇指挥所部400余人在金川、濛江县境内的大板石沟与日伪军警讨伐队大部队遭遇激战，损失较大。12 月末又在濛江、桦甸县境七号桥伏击伪军一个尖兵连，但部队也受到较大损失。虽然在反讨伐斗争的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在濛江、抚松、临江、金川、辉南等大范围地区与敌人迂回周旋，连续作战不得休整，加上地冻天寒，无衣无食，连冻带饿和战斗减员，部队损失一半，队伍锐减到200 人左右。为筹集给养，1 月初，杨靖宇指挥部队袭击了龙泉镇战斗指挥所，获得部分粮食和物品，在韩仁和率部掩护下，杨靖宇率领少数部队转入濛江西岗地区隐蔽。

1940 年1 月上中旬，据野副的命令，伪第八军管区第一、第二混成旅由军管区顾问安永率领，在各旅长带领下，用火车运送到磐石，然后步行到桦甸，从北面包围濛江。

为围剿杨靖宇，1 月初野崎茂作曾去濛江县城与岸谷碰头，回吉林后即按要求部署伪吉林省警察讨伐队。派红石砬子大队、锦州大队、大蒲柴河大队、鸟畑队、吉森队约800 名从桦 甸县境进入濛江县境；将在伪间岛省的奉天大队、滨江大队约1000人从安图县境出动到濛江，形成包围态势。

1 月中旬，抗联一路军警卫旅长方振声在桦甸因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杀害于长春，由朴德范继任。下旬，警卫旅1 团参谋丁守龙在濛江被申警察大队逮捕叛变，叛徒全盘供出了杨靖宇的行踪。

野副讨伐司令部和伪通化省讨伐队本部根据叛徒的口供，判断杨靖宇及其所部仍在濛江山区隐蔽，于是调集日军大原、有马、小滨、有政等部队及通化省10 个警察大队约4万人左右进行合围，用飞机侦察、扫射、轰炸，指引讨伐队进攻。

1月末，杨靖宇率主力部队在桦甸、濛江交界的山里（一说马屁股山，一说山汤里）与伪军李裕平的第一混成旅遭遇，激战一昼夜，因伪军第二混成旅来援，开始撤退。这次遭遇战，抗联损失很大，死伤70余人。杨靖宇率身边60多名战士进入濛江五斤顶子。在这关键时刻，2月1日，杨靖宇的特卫排长张秀峰携巨款、武器和机密文件向五斤顶子警察投降，导致了队伍进一步离散，并引来了讨伐队。敌人的包围越来越小，并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化装成樵夫、农民，密布于濛江山区密林、交通要道。白天敌人的飞机仅擦着树梢来回飞行盘旋，发现目标便猛烈扫射、轰炸，指导讨伐队追击。2月10日左右，杨靖宇身边只剩下12名战士。2月18日，讨伐队从两抗联战士的尸体旁发现了杨靖宇的印章。敌人确定杨靖宇就在附近，包围圈更加缩小，目标更加集中，切断公路、封锁山林。23日下午，正值杨靖宇下山购买食物之际，碰上入山4名农民，其中一人报告并引来了讨伐队，杨靖宇在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的703高地与日伪军警讨伐队进行了顽强的搏斗，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有关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的详细情况有许多专文记载，笔者简述于此）。

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曾大肆宣传鼓噪一时，利用杨靖宇之死大作文章，企图以此来动摇瓦解抗联部队的军心和意志。但是，抗联指战员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副司令魏拯民的领导下，继续顽强地开展反讨伐斗争。

抗联一路军一方面军余部在曹亚范的率领下，1940年3月间频频打击敌人，袭击了临江县的珍珠门、大阳岔、三岔子敌伪军警和森林警察队，接着又在濛江的湾沟痛击了长岛工作班，缴获甚多。但由于频繁战斗部队减员很多。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龙泉镇被叛徒杀害。到此，一方面军因失去领导而解体

失散。

第2阶段，从1940年4月到1940年9月，即所谓春夏季讨伐。

杨靖宇牺牲后，日伪认为南地区讨伐任务已基本完成，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搜剿外，将讨伐重点转到东、西北及东北地区，目标主要指向金日成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和陈翰章指挥的第三方面军及活动在桦甸一带的魏拯民所部。此期间除继续军事讨伐外，更侧重强化上述各种“治本”工作的措施，进一步扩大“治本工作”的“成果”（已如前述）。

据王之佑说，敌伪在基本结束南地区讨伐后将伪第八军管区的第一、第二混成旅留在吉林，归入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指指下变为两个步兵旅，将伪通化省的警察大队大部调到伪间岛省。

这段时间，抗联一路军在魏拯民指挥下，在极其严酷和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战斗，将部队化整为零，避敌锋芒，转入敌人防守较弱地带和深山密林，伺机袭击敌人。二方面军转战于和龙、安图、珲春、抚松、敦化及东宁一带，并取得了一些胜利，特别是1940年3月25日在和龙红旗河伏击日军前田讨伐队及森林警察队200余人，毙伤敌人前田队长以下百余人，对日伪震动很大。

野副调集大兵围剿，参加围剿第二方面军的日伪军警讨伐队有：日军八重坚部队、大场部队、赤崛部队、入船部队、大神部队，伪军徐海部队、藤方部队，永富工作班、长岛工作班、广田工作班及所在省县的警察讨伐队、森林警察队、神撰队、春阳新撰队（由叛徒编成）和警防队、自卫团、协和会等，珲春国境警察队也参加了对第二方面军的围剿。

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在陈翰章指挥下活动于敦化、蛟河、

延吉、汪清、五常、额穆索及宁安镜泊湖一带。当时与陈翰章一起活动的还有抗联第五军的陶净非部。1940年春，陈翰章所部在敦化牛心顶子根据地遭到日伪军警讨伐队2000余人包围，受到重创。突围后在转移中因敌人穷追不舍，部队损失较大。牛心顶子根据地的密营 全部被敌人破坏，储备的粮食、给养及物资被洗劫一空。建设多年的后方基地没有了。根据魏拯民“必须离开敌人讨伐中心的敦化县”的指示，陈翰章率部向五常远征，命各部分别向蛟河、延吉、汪清等地转移。5月到7月，三方面军各部在转移中伺机袭击敌人，获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但解决了给养，而且还扩大了队伍。5月中旬，袭击了蛟河县窝瓜站森林采伐事物所，6月初又袭击了五常县拉林河森林采伐警察队香水河子分驻所，接着中旬又袭击了六道滴哒、石头河子、辛家营 子等伪军据点，并在张家湾与日本守备队、伪警察队发生激战。特别是下旬，奇袭五常冲河镇，获得较大胜利。以上的胜利战斗，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颂和支持，队伍也扩大了一倍。但是，8月中旬在回师途中，在牡丹江的三岔口桥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较大，队伍伤亡过半。9月12日，陈翰章率部进入宁安县境后，突袭了山河屯采伐公司和伪警察署，获得大量物资和现款。10月，陈翰章率60余人转战进入镜泊湖南湖附近，准备过冬。但这时敌人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

据资料记载，这阶段围剿追击第三方面军的日伪军警讨伐队有：日军橘中队、木下中队、山根队、山本队、渡边队，伪军吕魁部队、明宝部队、宫本警察队、延吉警校队、鹤原警察队、中央警校队、吉森挺身队、通化省警察讨伐队，熊泽特搜班、金特别工作班、敦贺工作班、唐特搜班及桦甸、蛟河县警察队，所在县警防队、森林警察队。还有伪牡丹江省警察队。

在此期间，由于敌人的工作班、特搜班、特设队的有效活

动，1940年7月中共南满省委委员金在范、金广学被捕投敌叛变。9月，警卫旅长朴德范在汪清天桥被金特别工作班逮捕叛变。

第三阶段，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3月19日。

1940年9月以后，野副重新作了围歼抗联二、三方面军的军事部署，以达到最后彻底消灭抗联第一路军的目的。为此，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秋冬季大讨伐。为便于作战指挥，将讨伐司令部从吉林转移到延吉，吉林只留守少数人员，名曰“吉林现地指导机关”。而日酋野副昌德亲临延吉，坐阵指挥，实施1940年“秋季大讨伐”计划。内容大致如下：

讨伐重点地区置于伪间岛省，特别是伪牡丹江、间岛、吉林三省交界地带及汪清、珲春、东宁、穆棱县境地带。

讨伐的主要目标，抗联魏拯民率领的部队和韩仁和领导的警卫旅余部；金日成指挥的第二方面军；陈翰章及其所部。

军事部署，将重点讨伐地带划分为间岛、北、西、南四个讨伐区；又将间岛讨伐区再分成东、东北、西北三个小地区。将日伪军警各部队分别担负各地区及各小地区的讨伐任务。

间岛地区讨伐队，队长为日军第四独立守备队长山崎大佐，队本部配以独立守备队第十九大队的1个小队及有线通信一分队。

在间岛地区内的东小地区讨伐队，队长为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十一大队长布上中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十一大队之大部，无线电两个分队，救护班1个；伪军第七混成旅，步兵第十五团，间岛特设队，步兵第一旅，第六军管区应援的通信队之一部及第八军管区应援的通信队之一部；警察队有伪间岛省警察队本部，间岛省警察讨伐队4个大队及延吉、和龙、安图三县的神撰队；区署的部队有安图、和龙、延吉三

县所属的各警防队及地区内森林警察队。

东北小地区讨伐队，队长为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九大队长小林大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九大队之大部，无线电一个分队；伪军步兵第六旅，第八教导队之一部，第八军管区通信队之一部，独立第一汽车队之一部；伪间岛省警察大队一个，汪清神撰队，伪通化省派遣警察讨伐队本部及4个大队；区署部队有汪清警防队及地区的森林警察队。

西北小地区讨伐队，队长为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十大队长原田大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十九大队第四中队之大部，第二十大队之大部，无线电两个分队；伪军第二十七团，第六军管区通信队之一部；伪牡丹江省警防队本部及一个警察大队；区署部队有宁安县警防队及地区内之森林警察队。

为侦察、联络和追剿专门配备有飞机。

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在日伪军警的严密包剿下，损失很大。1940年10月，陈翰章率60余人进入镜泊湖南湖头，并准备了四个月的越冬给养，由于叛徒告密，准备的物资全被敌人夺去和烧毁。陈翰章不得不带领人员继续筹粮和敌人搏斗。10月20日，十五团团长李云龙在汪清天桥岭被奸细用谋略手段暗杀。由于叛徒出卖，引来了大批军警追剿，12月8日，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弯弯沟鹦哥岭与包围的大批敌人激战中壮烈牺牲。陈翰章牺牲后，野副将讨伐重点集中到对魏拯民和二方面军，重新调整了部署，北地区讨伐部队主力向南部敦化方面，由伪军第二军管区增派步兵第五旅；西地区将兵力指向桦甸县；南地区将重点指向东北部抚松县方面。其他部队继续原来的任务。12月26日，野副讨伐司令部由延吉撤回第二独立守备队驻地。其作战命令以“吉林现地指导机关”名义发布。

为了最后完成围歼抗联一路军余部的任务和结束此次大讨伐，1941年1月13日、14日召开了两个会议即“第四次东南部地区治安联络委员会”和“讨伐队长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是日军部队长及伪军顾问。他们是日军第555部队长、第356部队长、第590部队长、第62部队长、第166部队长、第890部队长及伪军第二、第六、第八军管区顾问。

同时发布了冬季讨伐作战命令第4号及计划纲要。按照计划纲要规定，部分改变了以前地区部署及名称，合并北、西地区讨伐队为吉林地区讨伐队。由原北地区讨伐队长任队长，并指挥原西地区讨伐队；将南地区讨伐队改为通化地区讨伐队。除留下部分部队外，余者将陆续归还原部队或移交有关机关。冬季讨伐的军队区分及具体部署如下：

讨伐司令部，司令官野副昌德直属部队有日军第451部队、宪兵部、伪军幕僚部、警察部、行政联络部、协和会联络部、特别工作部、司令部通信队（包括伪军通信队）、日军第174部队之一小队，第一、第二工作队、特设队及其他。

间岛地区讨伐队，队长为山崎大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第62部队之大部、第916部队西尾队之大部及一小队、第166部队之大部、第880部队之大部、有线及无线通信队各一分队；伪军混成旅第四旅、第七旅、步兵第十五团、第二十七团、间岛特设队、步兵第六旅、第八教导队之一部；伪间岛省警察队（队本部、4个大队、独立3个中队及安图、和龙、延吉、汪清神撰队），伪通化省警察队（队本部及5个大队），伪牡丹江省警察队（队本部及一个大队）；区署部队有间岛省各县警防队、宁安县警防队、地区内森林警察队。

吉林地区讨伐队，队长德弘中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第590部队之大部、无线电两个分队；伪军步兵第二旅、第二教导队

之大部、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十二团、骑兵第二旅；伪吉林省警察队（队本部、14个大队、独立5个中队）；区署部队有吉林省警察（敦化、蛟河、舒兰、桦甸、磐石等县的警防队）及地区内森林警察队。

通化地区讨伐队，队长古见中佐，指挥的部队有日军356部队之大部、无线电两个分队；伪通化省警察队（队本部及4个警察大队）；区署部队有伪通化省警察（各县警防队）及地区内森林警察队。

以上各伪军警察队皆配备有汽车。

在野副指挥的1941年冬季讨伐中，我抗联一路军余部损失严重。1月30日，抗联一路军军需部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全光在抚松县高升屯被捕叛变，给革命斗争带来极大危害，敌人在报上刊登全光和日本侵略者的照片，进行大肆宣传。2月8日，韩仁和率领警卫旅20余人在宁安八道岗活动，与讨伐队发生战斗，最后不幸牺牲。3月4日，黄海峰率部在宁安烟筒沟活动，因叛徒告密，被敌人讨伐队重重包围，突围时英勇牺牲。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在杨靖宇牺牲后肩负重担，抱病出征，因连续征战劳累，得不到休息，加上敌人的封锁包围，得不到衣食，饥寒交迫，更无医药治病，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病情加重，3月8日在桦甸县夹皮沟与讨伐队作战中，壮烈牺牲。

到此野副大讨伐的基本目的已达到，1942年3月19日野副讨伐司令部发布解散讨伐司令部及各讨伐队，回归原所属及处理善后，结束大讨伐的命令。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结束。

此次大讨伐给抗联一路军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首先，牺牲指战员1 172人，其中有一路军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及师团领导干部曹亚范、陈翰章、方振声、韩仁和、黄海峰、李龙云等。余下的师团干部也所剩无几，不到200人，因无法继续

在境内坚持斗争，根据上级指示也撤入苏联境内，等待大反攻的到来；其次，敌人用各种毒辣的手段诱捕我抗联人员1 040人，其中有师团干部，如林宇诚、丁守龙、全光等被诱捕后投敌叛变，又变成了敌人的走狗，带领敌人讨伐围剿，这些叛徒起了最坏的作用；第三，抗联一路军在东南满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被敌人破坏，不仅是密营、被服厂、修械厂，甚至连地仓子都悉数被捣毁和焚烧，抗联指战员赖以休整和依托的后方基地完全丧失殆尽。但是，敌人却未能彻底消灭抗联一路军，余部仍坚持战斗到抗战胜利。

伪满警察在“讨伐”中的罪恶

三宅秀也

关于东边道讨伐。

一、东边道讨伐是关东军在“七·七”事变以后，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扩大和世界诸形势的变化，为了早日肃清其侵略基地伪满洲国的治安不良地区而实施的。关东军的意图是希望尽快结束军队对游击队［抗日联军］的讨伐，把对东边道的讨伐作为军事讨伐的最后一举。讨伐的目的是企图消灭被称为伪满治安最后之癌，即以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的山岳地带为根据地，顽强不屈地继续反抗的抗日联军杨靖宇部队(390）及×××部队（约100人）。讨伐的主要地区是伪通化省的抚松、濛江、长白、通化各县；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各县；伪间岛省的安图、延吉、汪清各县。

此次讨伐从1938年末着手准备，1939年初开始，到1940年末结束（应为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

二、关东军为了进行东边道讨伐，在伪吉林市设置讨伐司令部，以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司令官，陆军少佐北部邦雄为参谋，统一指挥盘踞在伪吉林、通化、间岛三省的日本军部队，及伪满国军以及三省的伪警察，进行讨伐。其兵力已忘记了，但推定日本兵约2 000名（伪吉林、敦化、延吉、通化的部队）；伪警察警备队1 600名（伪通化省500、吉林省500、间岛省250、应援警察队250，另有日本宪兵长岛准尉指挥的长岛工作队约100名）；总计约5 000名。长岛工作队（据说以投降的游击队员为主体编成）在通化省内主要担当搜集情报、逮捕及招降工作。

除此之外，在东边道地区内未直接参加讨伐的一般伪警察官及伪自卫团，亦配合搜集关于抗联的情报，担任警备警戒，并搜索逮捕分散的抗联战士和抗日部队的联络员、支持者及其他反满抗日的爱国人民等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此次讨伐。

参加东边道讨伐的伪治安部警务司长及有关伪省警务厅长如下：

伪治安部警务司长：植田贡太郎、谷口明三。1940年7月交替。

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

伪吉林省警务厅长：森丰、村井矢之助。1940年8月交替。

伪间岛省警务厅长：袖冈静太。

伪警务司警备科派遣伪属官1名，伪吉林、通化、间岛的各省警务厅派遣伪警官1名到2名，参加讨伐司令部，担当日常联络。

三、伪治安部警务司在东边道讨伐期间，将警政运营的重点集中于此次讨伐，伪警务司各科的业务，集中于东边道地区

内各伪省的治安肃正。伪警务科编成有关讨伐的预算，把所需经费分配给伪警务司各科及讨伐地区内之各省（即吉林、通化、间岛省）警务厅，或减少其他省的警察定员，增加讨伐地区内各省的警察定员，同时由其他省调集人员，增加讨伐地区内各省的警察力量，或者由其他伪省派遣增援的伪警察队至讨伐地区，以加强对中国爱国人民的镇压力量。

伪警备科协助讨伐司令部，指导监督伪警察全部讨伐行动，同时加强讨伐地区内伪省的警备通讯设施，把讨伐地区内各伪省警察备队的武器，统一为三八式步枪，以便于补充子弹，加强伪警察队对人民的杀伤力。

伪特务科在讨伐地区内，搜查逮捕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民、支援抗联的中国爱国者（供给食粮及资金者、报告日满军警的行动者及联络员等）和潜伏的游击队员，破坏抗日部队的基础。

伪教养督察科在讨伐地区内的各省地方警察学校，增加新任伪警察官的训练人数，同时加强战斗训练，使这些伪警察官毕业后，能立刻参加杀伤人民的战斗。

伪警务司指示伪全国各省警察厅长，要支援东边道讨伐，同时，各省为呼应此讨伐而彻底的讨伐本省内抗日部队，镇压逮捕有反满抗日思想活动的中国爱国者，以期完全肃清省内的治安。特别是与吉林、通化、间岛三省邻近的各省，加强省境附近的警备、警戒，协助东边道讨伐队。

伪治安部警务司在东边道讨伐期间，令伪警务司警备科长田中要次，经常与讨伐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又令伪警务科长及伪特务科长，及时与讨伐司令部联络，领会讨伐司令部的意图方针，担任讨伐地区内各省警察的指导监督。

四、东边道讨伐采用所谓“狗虱”战法（即一旦与抗日部队接触，就像“狗虱”一样叮住不放，彻底地跟踪追击，直到

歼灭)，彻底追讨抗日部队。当时，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对我说：杨司令的部队在雪中步行所留下的足迹，宛如一个人走的一样。但伪警察亦积累了很多经验，见到游击队的粪便，就能识别出几时拉的。他又说，伪国军因食高粱米，煮熟需要时间，因此怎么也来不及追击游击队。

在东边道讨伐期间，用此战法给抗日联军的打击，最严重的时期是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的冬季讨伐战争。

五、东边道讨伐期间，在战争中给予抗日联军及其他游击队的损害。

在配合本讨伐而实施的，对潜伏的抗日队员及支援人民(供给食粮及资金者、报告日满军警的行动者及联络员等)，及其他有反满抗日思想活动的人民的逮捕工作中，共有多少爱国人民被逮捕等，没有确切的记忆。但1936年度，伪热河省及伪锦州省逮捕总数达7 066名(内有处死的150名)。从这点和当时三省的治安状况报告推断，在遍及伪吉林、通化、间岛三省并历时两年的讨伐中，被逮捕的总数，最少亦达2万名(内处死约500名)。在东边道讨伐中，对抗日联军及其他游击队直接战斗和逮捕有反满抗日思想活动的人民，再加上5 000余名讨伐部队的盘踞和活动，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是难以计算的。

六、1940年初，杨靖宇司令战死，其部队亦被消灭。×××部队亦在杨靖宇部队消灭后停止了活动。其他的抗日部队亦被消灭。因此东边道讨伐于1940年末结束。

据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说，杨靖宇司令的最后情况是：

1940年初某日，杨靖宇司令与同志4人出山到一农民家，拿出现款委托其购粮食，一名村民见此情况后，向在附近警戒的伪警察队告了密，伪警察队急驰现场，要逮捕杨靖宇司令。杨

靖宇司令觉察伪警察来袭，在没膝的雪地里向山中奔驰，两手各持一号毛瑟手枪，向追来的伪警察应战，最后终于牺牲在伪警察队的枪弹下。

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将杨靖宇司令的首级拿到讨伐司令部及伪治安部警务司给一部分干部看。我也是当时看过杨靖宇司令首级的伪警务司干部之一。

东边道讨伐刺激了其他省，尤其是邻近各省的治安工作，加强了对各省内游击队的讨伐和对中国爱国人民的镇压逮捕。在东边道地区消灭了抗日联军后，更加助长了这种趋势，结果，至1941年春季，在伪三江省地区消灭了赵尚志的部队，在伪滨江〔牡丹江〕省地区消灭了陈翰章部队。

（摘自《东北“大讨伐”》）

日伪军警“联合大讨伐”

吉　兴

伪满军队讨伐计划，都是佐佐木到一主持规定下来的。由治安部日寇最高顾问规定有三种讨伐：一个是军管区独立讨伐；一个是增援讨伐；一个是日寇军指挥伪满军警大讨伐。军管区独立讨伐没有日寇军，在本管区内实行的讨伐，由司令官和日寇主任顾问指挥行动。增援讨伐是派队援助其他省区的讨伐。大讨伐是把伪满军警交给日寇军指挥实行广大范围的讨伐。1939年秋的大讨伐，就是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日军吉长警备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为总指挥施行的大讨伐。因1939年抗日军杨靖宇将军和×××将军以及崔贤等带部下2 000左右，由抚松、

濛江、敦化以及其他各县活动。为消灭在这一带活动的抗日联军，由伪满治安部最高顾问计划，以日寇军为主体，指挥伪满军警，名为吉林大讨伐，南自辑安县，北到长白县，西至敦化县一带，调集伪满各省区的军警交给日寇野副昌德指挥，实行讨伐，情况如下：

一、讨伐区域：吉林、敦化、桦甸、额穆、抚松、濛江、辑安、临江、安图、长白等县。

二、讨伐兵力：日寇军总指挥官吉长警备司令官野副昌德。

日寇军铁路守备队3〔5〕个大队，约4 500人。

伪满军第二军管区驻敦化步兵一个旅，旅长刘尚华；桦甸骑兵一个旅，旅长尹宝衡。

通化第八军管区两个旅（应为三个混成旅，一个教导队），旅长高明、赵振邦。

佳木斯第七军管区一个混成旅，旅长邓云章。

牡丹江第六军管区一个旅。

吉林省警察大队、热河省警察大队、通化省警察大队、奉天省警察大队。

三、讨伐布置：1. 设肃正工作班，以日寇顾问、日满宪兵和特务警察等组成；2. 在讨伐区域内各县街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驻重兵；3. 把伪满军警化整为零；以营或连为讨伐行动单位；4. 把伪满军编配在日寇军讨伐队组织内，受日寇军官长指挥；5. 建筑交通、通讯网，修路、架桥；6. 在实行攻击以前，强迫农民限期将农作物收割干净。

四、讨伐行动：1. 肃正工作班以特务、密探告发、密报，并严密搜查通敌、济匪、窝匪者和嫌疑犯、思想犯；2. 用兵严密包围山林地带，内外隔绝，断绝粮道；3. 山里居民令其限期搬出，逾期不搬者强行搬迁或杀掉，其他人民则准出不准入；4.

山里的山寨、村落、民房、地仓子一概烧毁。

五、作战行动：1. 在山林局部地方作战，用小部队进攻，日寇军一中队或一小队带伪满兵或警察一营或一连，由日寇官长区处，指挥作战；2. 如遇大部队的抗日军，则以大部兵力围攻；3. 各部队划分区域，指定目标，负责进攻或游击；4. 伪满军在前，日寇军在后，用中国人打中国人；5. 队伍分堵击和游击两样办法，堵击的驻在要隘或据点、或歧路，游击的专入山林地带寻踪进攻，专对某地兵或某首领游击。

六、赏罚办法：1. 有功者进级或赏钱，还有悬赏，不出力者撤差或法办；2. 买通敌方倒戈，或间谍离间，或使敌人瓦解，或收买引诱投降。

按以上各种办法，于1939年秋8、9月间始，实行讨伐一年多的期间，完全由日寇野副昌德总指挥，吉林第二军管区日寇主任顾问江藤中佐与日寇讨伐司令部参谋北部中佐联络。在第二军管区，由我派部下两个旅参加讨伐。当年冬季，到敦化县伪满军旅司令部视察一次，到桦甸县旅司令部视察一次。日寇野副昌德蛮横已极，在桦甸县招集讨伐军警负责官长开会，因讨伐不利，士兵伤亡很多，大骂伪满军官，并指名大骂，日寇吉林警务厅长，当时死在会场里(名忘记了，森丰?)。我在桦甸旅司令部，听旅长报告打仗情况说，打仗不过20多次，有几次被抗日军打败，有时抗日军退去，遗弃战死者也不过一二人，只有一次见抗日军战死的十四五个人，可是伪满军警和日寇兵伤亡有七八个或十几个人的时候也不少。看他打仗不利，可是祸害百姓可最利害，山里住的人家，或有嫌疑的农民，无一幸免。最甚的是肃正工作班，每日残杀人十几个或几个不等，真是惨无人道。至于山里的民房或地仓子(就山洞盖的小木架子房)全被烧光。

(摘自《东北"大讨伐"》)

我在日本守备队时的见闻

李廷有

我是辉南的老年人，于1934年6月曾参加“滚地雷”匪帮，任“粮台”①。在此期间和驻朝阳镇日本守备队翻译王化民经常有联系，不久和王化民交上了朋友。王常作我的工作，让我投到他那里去。这样，我于1935年3月在朝阳镇铁路警务段给日本守备队充当了特务。下面所谈驻朝阳镇日本守备队的情况，都是我亲历亲闻的。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边道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国斗争：通化、柳河、金川、辉南、桓仁一带由唐聚伍、王凤阁等人举起抗日大旗，组织了辽宁民众自卫军；金川的方春生也组织1 000多人的大刀会加入了王凤阁队伍。邵本良部下营长阚子祥也率部起义参加王凤阁部队，攻打金川、朝阳镇、辉南等县城。日军为了镇压群众性抗日运动，在调动了大批伪军向东边道进攻的同时，还向主要交通要道派驻了日本守备队。

1932年农历四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海龙县山城镇调一个守备中队，由菇保正龙大尉带领约80多人。这个日军部队番号是山城镇日本守备大队第1中队。这支守备队就驻在朝阳镇火车站，当时翻译是王化民。同年6月，山城镇调换尚田接任菇保正龙中队长的工作。1932年8月，王凤阁部配合阚子祥和方春生大刀会进攻朝阳镇。尚田中队长指挥田德胜（伪团长）防

① “粮台”系在匪帮中掌管粮秣供应的人。

守朝阳镇。当时田德胜是于芷山的一个团长，他在尚田中队长的指挥下，指挥一个团的伪军抵抗大刀会和抗日救国军的进攻。当时战斗非常激烈，尚田中队为了阻止伪军退却砍死了好几个伪军士兵。这次战斗打了3天，大刀会和抗日救国未能打下朝阳镇就撤走了。

这次战斗后，从山城镇又派来中山接任中队长，副中队长佐藤从铁路搬到朝阳镇街内（现在县交通局内），翻译由李长仁、李新担任。

中山队长是大黑胡子，非常残暴，凡是抓到的中国老百姓都扔到狼狗圈里让狼狗吃掉。1939年我亲眼看见抓一个老太太扔到狗圈里，两只狗活活地把老太太给吃掉了。中山接任了守备队长，就设了特务班。以胡振山、赵静廷两个为特务长。组成的特务班，下设有密侦人员和联络地点。

朝阳镇就以东顺客栈和东来客栈为据点。我也常去据点。密侦有李相臣、张冠芝、蒲学礼、王长先、吴宝贵、尚子业。

样子哨密侦有薛广武、杨建勋和我。这些密侦都是直接受翻译和特务长的指挥。

中山守备队盘踞在朝阳镇，经常出动讨伐抗日武装力量。这个部队活动于辉南、金川、样子哨、大肚川（抚民屯）、龙泉镇、大荒沟、山城镇等地。

中山中队长利用被收降的抗日联军和土匪分子，在各客栈和街里了解收集反满抗日思想情报，侦察民心动向，破坏我地下党革命组织。据守备队翻译李新讲，1935年破获了辉南县委，逮捕了县委书记等人，给辉南、金川一带抗日斗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日本守备队虽然有80余人，最大的官是个中队长，但只要是个日本人，就是这一带的“太上皇”，如果谁得罪了他们，谁就得被杀死或喂狗。

1932年5月初，因特务长蒲学礼接特务孙殿礼的诬告说：“徐井山通匪烧房子”，就把徐井山抓到日本守备队，中山队长审讯完，就把徐井山扔到狗圈喂洋狗了。还有外号叫李大胡子的朝鲜族，也是日本守备队的特务。李大胡子和3个日军从朝阳镇逮捕了5名百姓说是红军，又说这5个人和红军有联系，中山队长就自己决定，带到朝阳镇南门外亲手用刀砍死。

1936年8月，中山队长接到通化守备队长的指令，率部队往大肚川、濛江（即今靖宇）的龙泉一带进行“讨伐”。这次讨伐有我和薛广武二人带路。日本守备队行军到离龙泉镇约20余里的一条公路上，中山下令部队就地休息。正在休息时，翻译国济州发现山上有一个小房，便向中山队长报告说：“队长，你看，那边高山头好像有一座小房。”

中山队长叫我和薛广武上山侦察，当时我心里很害怕，怕有红军。因为红军枪法打得都很准，如果红军在树林子里，里面情况从外面看不清，非吃亏不可，何况我们又在明处。但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和薛广武硬着头皮往山上爬，爬一步就停一停，怕红军打枪。结果，树林子里并没有红军，我们平安无事地到了小房子里。我们在小房子里，发现一个破锹头拿回来了。回到公路上，我们二人把破锹头交给了中山队长，汇报说房子里好像住过人。

中山队长就像发现大敌一样，发出了战斗命令。日本守备队边搜山边前进，当日本守备队到山顶时，发现山沟塘苞米地里有人。

中山立刻命令80余人的日本守备队，以班为战斗队形，包围了苞米地，进行搜索。约半个钟头后，日本守备队抓来老百姓30余人，这些百姓中除掉老头、妇女、孩子之外，大部都是壮年人。

中山队长命这30余名老百姓在一个山头上并排站好后，就凶狠地向日本兵发出射击口令。一阵枪声之后，无辜的山民就全倒下了。事后当晚，这伙守备队到龙泉镇住宿，经龙泉警察所抓一个姑娘，中山强迫她陪住一宿。第2天，他们又在龙泉镇附近的村里放火烧了8间房子，当场烧死一个老百姓。

这就是中山队长所谓的讨伐，并向上司汇报消灭了30余名“红军”的“战果”。

驻朝阳镇的日本守备队一中队于1939年换防到牡丹江去了，从那以后，朝阳镇一带再没有日本守备队了。

（辉南县政协供稿）

磐石县的“治安肃正”

谷茂纲

1934年到1938年，我是磐石县黑石镇失学青年。

1934年春天，宋国荣在磐石抗日失败后，他的嫡系部队约600人。地方抗日武装“青山好”、“海蛟”、赵旅、马旅、周太平约2 000多人，分别溃散在磐石县黑石镇江南山里一带，继续抗日。随后，日本军、靖安军（红袖头队），相继侵入黑石镇讨伐，还有邵本良、田司令、王司令（王树棠）、绿柝队等汉奸部。百姓被诸如此类的胡子兵洗劫一空。这年秋天，磐石日本宪兵队组织派遣治安工作班到黑石镇来进行血腥镇压，对抗日有关人士“搜墙根”（肃清工作）和策反收降工作，并调查户口。黑石镇的人民，在特务任意摧残蹂躏下不能安生，不少人到处逃奔，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商店关闭，学校停课，人心慌慌。我

就是因此而失学，流落街头，亲眼看到敌人迫害，千百人因抗日抓进监狱的。

磐石日本宪兵队治安工作班的特务郑海鹏(朝鲜族)、周贵、王成唐，朝阳镇东团林子大恶霸地主大帮胡子头、匪头“滚地雷”，和当地特务李汉臣、廉相律（朝鲜族）在黑石镇地区所进行“搜墙根”，策动当地流氓、赌棍，检举密告，迫害抗日人士。据我知道的特务头子“滚地雷”用收编诈骗的手段，在黑石镇屯西老鸦砬子，一次就将抗日武装海蛟部缴械了18名，并将被缴械的人员推到辉发河冰窟窿里杀害。用“搜墙根”的方法，抓捕了蛤蚂河子蒋家店的蒋某、东朝阳沟的袁宝才、独立河口朝鲜族金光（抗联干部共产党员）、宋大发、“登举好”头目高某、谷喀巴，这些人都是因为参加反满抗日被杀害。

有些无辜百姓因于抗日人员有关系而被株连。我叔父在“青山好”部队参加过攻打磐石县城挨过押，受过刑；特务头子“滚地雷”，因此打骂刁难过我；赌棍杨兴业检举过我们；工作班搜查我们损失很大。还有开肉案子的陈某、粟某被抓挨过押。在受到策反、收降的引诱宣传后，思想不坚定的人归顺投降了敌人，光我知道就有“占中华”头目解福堂，“青山好”头目王长胜，“四季好”头目孙长闲等人。汉奸特务腿子班显禄（抗日部队首领西海龙的小鬼），向奥村队长揭发检举了他义父西海龙。伪磐石协和会县本部派董吉昆、王克斌、谬部员等，组成治安宣抚班，宣抚所谓“匪民分化”的反动政策，到处贴这类标语布告。

治本工作进行了半年之后，于1935年春天，县里又派来了“清水治安工作班”。在日寇清水指导官领导下有伪警佐沈又丹，翻译街浜顺等。工作班有作搞土地登记的。清水指挥伪警署三中队，到黑石镇江南烧毁了靠近山里边该地区的房屋。如：周

大房子、老营沟、石门子。第一线散住的农民，将原住民屠杀、撵光后，紧接着重新登记土地，发放二荒地。给一些流氓、地痞、落魄的地主、伪官吏带来了发财的机会。杜雅斋在王小沟、贾策安在东北岔、刘锡九在大邑力河各报领100余垧，以"招青份"来剥削农民。

清水治安队讨伐打垮了赵旅、马旅、"太平"抗日残余力量。宋国荣部第3团，在唐团长指挥下退到桦甸县江东山里。继清水工作班后，1936年在黑石镇开始了集家工作，彻底实行群众和抗日军分离。在江南蛤蟆沟子、大邑力河、红旗庙、王小沟、小营、东北岔、牛马行等地的第一线以内，归并了集团部落60余个。清水调走后，日寇野崎任黑石镇警察署的指导官，在警察署组织起来野崎治安肃正工作班。野崎指挥伪警察、保甲的头头大肆抓民工，修建黑石——细林、黑石——桦甸间两条警备道路。野崎在修细林河的国道时，伪保长张维刚（外号张扒皮），他每天手拿大棒子挨家挨户抓人。在督促修道当中张扒皮看谁干的慢，不容分说就给一顿马棒，有的被打的皮开肉绽，还扣帽子说："甚么思想！"张扒皮因此得名，被打坏的人民群众无计其数（张在黑石镇土改时被镇压）。这时，我也被抓去修葫芦头沟岗，挨过他的马棒。1937年秋天，治安肃正工作班到黑石镇西后水取柳川屯去清查户口，发现一家百姓住有抗联（当时称红军）张连、贾连的伤号一名。董锡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奸，亲自动手当场把这位抗联同志枪杀，把人头割下来，派人送到县里报功。野崎工作班各集团部落都建立了洋砲会（自卫团组织），实行保甲法，即一家出事九家遭殃。架设了警备电话，规定了警报信号；修筑了各部落之间连接道路，强化了警备网，各屯都有防筑设施。在黑石镇警察署举办了自卫团训练班，抓很多青年加以战斗训练。我当时也被抓受过训。治本工

作在1938年基本就绪，为后来的全伪满规模讨伐我抗日联军和掠夺我国人民物资（出荷，各种献纳）及开拓移民准备了条件。

七

热河“讨伐”

关东军在热河的“三光”政策

高木贞次等二十人笔述

（1954年12月27日）

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各机关：

西南地区是伪锦州省的锦古线以西地区，伪兴安省以西地区的一部，是关东军在热河省及河北省的行动地区。我们所供述的，就是以最大规模进行的以治安肃正为名的三光政策，它遍及长城沿线的热河省和河北省的抚宁、迁安、蓟县、平谷、密云、永宁等与热河省邻界的所谓关东军的行动地区。实施治安肃正的期间，大约是1940年4月起，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

在西南地区进行治安肃正的目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对中国的东北的殖民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丰富的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战争利润，大肆镇压、屠杀成为在西南地区进行活动障碍的中共党军政各机关、部队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抗日人民群众，摧毁人民解放据点，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力量。

西南地区治安肃正方针是，将关东防卫军及伪满军、行政、警察等的主力集中于热河省内，以讨伐、制造无人区、集家、镇压人民、经济封锁等手段，切断八路军的供应线，摧毁据点和领导机关。为此，在西南地区统一了各种镇压机关，设立了阴谋策划和实施治安肃正的伪西南防卫委员会。

（摘自《东北“大讨伐”》）

记朝阳县南部地区的“治安肃正”

赵省相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它进军华北，侵略全中国的需要，在1936年、1937年、1938年的初秋季节，连续三年在朝阳县南六家子一带实施了所谓“治安肃正”。

这个肃正工作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参与下，以伪第五军管区最高军事顾问于保为总指挥编成的。分为讨伐队和宣抚队两大系统。讨伐队是以日本军两个中队为核心，配备了伪军一个旅（旅长是张海鹏之侄），伪满武装警察四五百人，以及各地抽调的伪警、宪、特等组成。目标是集中在妄图消灭当时活动在该地带的爱国人民武装力量，主要有：苑久占、兰天林、老梯子、老北风等，总人数不下5 000人。

讨伐队在前方以搞“匪”民分离为借口，大烧、大杀、大掠夺，搞“集家”。对散居在偏远山区的穷苦百姓，统视为通匪有罪，先烧房子后杀人。一般说来，还较少染指大村庄，因为要照顾影响，推行其愚民政策。尽管如此，仅三年间，它夷平了多少土地房屋？杀害了多少中国百姓？这个讨伐队所到之处，已经不止是“十室九空”，而是“十室九被烧”，“十人九被杀”。有多少儿童惨遭杀害，有多少父母失去了儿女，有多少夫妇不得团聚？！真是惨绝人寰，有史以来空前的一场劫难。

但是，如果说：讨伐队在大张旗鼓地公开杀人，那么，宣抚队又是如何呢？

宣抚队长是伪朝阳县长戴景贤，副队长是伪警务局长王秉

乾。笔者当时是伪锦州省公署警务厅保安科长，在宣抚工作队里担任督促和检查工作。这个队是以一批汉奸、特务、文职人员所组成，大肆宣扬“王道主义”、“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大东亚共荣圈”等，“挂羊头，卖狗肉”，“嘴说天官赐福，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自欺欺人之谈。除此之外，还以施疗班（免费治病）、放映电影为诱饵，大搞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组织十家连坐，推行保甲连坐法——即以一屯为一甲，十屯为一保。如果保甲之内出现“坏人”，其同保、同甲都同受株连。还编组保甲自卫团，作为地富武装力量的帮凶，镇压穷苦百姓。更其恶毒的是缴收民间枪支弹药，强行摊派缴纳枪支数量，奖励密告。如果达不到要求或被他人诬陷，则灌凉水、上大挂，非刑逼供，那就是九死一生。有个翻译名叫李鸿启，有一次酒后扬言说：“我一天若不灌他三两个人的凉水，就觉得浑身不好受！”听了这话的，有人实在忍不下去，便顶撞说：“这毛病可得快改，若不，回到家去可不好办！”顶撞他的人第二天就被清洗回家，险些打成“思想犯”。

总之，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真是人命危浅，随时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所不同的，讨伐队在前方，大刀阔斧，屠杀中国人民；而这些收缴武器的警、宪、特们，则是“小打零闹”。三年时间，被摧残致死的更不知有几多了。日寇杀害中国人的手段：有的是大批大批用机枪扫射；有的是严刑逼供，拷打致死；有的把“犯人”砍头，他们说成是“试刀”。

就大屠杀来说：1937年旧历年底，日本人利用他们在前一段大讨伐、大宣抚中，对在“奖励自首投诚”口号的欺骗蒙蔽下，已经交出私藏武器的部分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善良中国人民，采取更加阴险毒辣的策略，施用甜言蜜语，胡说什么“发放救济物资和救济金钱，要求亲自去县城领取……”，导致

一时觉悟不高，缺乏警惕的善良人民200多受骗上当，被他们关进了临时粉刷一新的伪警务拘留所内，准备一网打尽。当这些受骗上当的爱国百姓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时，便在当天夜里，突然大喊大叫起来，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反抗行动。其中大部分人已经相互解脱了被捆在身上的绑绳，眼看越狱即将成功。恰在这时，竟被在场看守的日本宪兵所发觉，有两名宪兵进入拘留所里，企图重新捆绑。结果，这些爱国的、不怕死的人们，突然齐声怒喊"掐死他，掐死他!"齐心合力，将两名日本宪兵活活掐死。

事态的发展大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斗志，震慑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魂魄。可惜这些赤手空拳、身陷囹圄的中国英雄儿女在其他10多名日本宪兵的机枪扫射下，相继壮烈牺牲!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却写下了日本侵略者又一笔罪债。

笔者在事件发生后第6天去到该县时，还清楚地看到地面上新敷的泥土，墙壁上满挂着烈士们的丝丝血肉。据伪县长戴景贤和伪局长王秉乾介绍说：拘留所经过洗荡之后，第2天还从烈士们的尸体底层发现30多名幸存者，但也被日寇用车拉往朝阳西大沟地方，全部杀光。

至于在"治安肃整"中，日本人重点是在推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因而在这一带凡是散居在七沟八岔的星散居民，如黑牛营子、水泉等偏僻地区，均毫无例外地被夷平。到处呈现黄黑色烟与浓重血腥的"十里风腥新战场"的凄凉景象。

表面上斯斯文文的宣抚队，通过暴力收缴武器，很快暴露出其狰狞面目，使朝阳百姓畏之如虎。从此，有病不找施疗班，宣抚队放映电影不去看，宣抚队讲话无人听信。使日寇的奸计，无法施展，只得唱它们的独脚戏。接着再谈谈杀人：敌人除了

成批屠杀中国百姓之外，随时杀个三三两两也是司空见惯的。它们往往用刀砍，把杀人当成“试刀”的机会。有这样一件事：有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名叫池田兼作。他原是朝阳日本宪兵队长，后来因病转任伪锦州省警务厅司法科治安股长。一次他说：他每次砍人，都是在刑场上临时挖坑，强逼被杀者跪在坑沿上受刑。这样一刀挥下，人头自然掉进坑内。只有一次因为被杀者腿部伤残，不能跪下，就让这人坐在坑沿上。不料，一刀砍去，人头和尸身竟一齐向后倒来，结果，人头竟在着地的一刹那间，咬住了这个杀人魔鬼的裤脚，两眼向他怒瞪着，几次抖落不掉，终使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被吓晕倒地。从此患了脑神经分裂症，疯癫了半年多的时间。逢人就说：他的身边，时刻都有一群无头冤鬼缠扰……他颤颤惊惊，怕前怕后，精神受尽折磨，受尽痛若，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在三年治安肃正中，伪锦州省公署警务厅长——先是小林义信，后来换了个海村圆次郎（二人都是日本宪兵中佐），为当然的副总指挥。他们把这项工作看做是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中心任务，将他们的精力倾注在这项工作之中。通过他们在不同的会议或宴会上暴露出的内容来看，人们不难猜测到其总的罪恶目的乃在于打通和扫平从东北向中国关内进犯的辽西走廊。它同1937年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所谓卢沟桥事变是紧密相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大陆的一整套规划的组成部分，是蓄谋已久的事。无怪乎海村经常叫喊着杀、杀、杀。他所倡导和鼓吹的多杀人不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侵吞中国的目的所采取的毒辣手段吗？

然而，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朝阳人民与全中国人民都是坚贞不屈的。在那祸患横生、灾难遍地的年代里，使我最难忘怀的事是目睹朝阳县黑牛营子北山沟居住的一位姓张的农村妇

女。这位妇女一家6口人，由于房屋被烧，公公与二小叔因得罪了（武器）搜查班的特务们，被逮捕关押，情况不明营救无术。而其丈夫又在两个月前上山砍柴，（一说上山遇难）一去未返，便愤懑至极。在一天夜里，扔下一岁和三岁两个女孩用剪刀刺穿自己的小腹，肠流拖地致死。事隔两天，当工作队的人们前去验尸时，还看到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依然倚偎在妈妈的尸体上，寻救解饿的东西，把妈妈的鲜血涂抹在她们的全身、全脸以及口和鼻子上成了血淋淋的“血孩子”。一个刚刚会喊娘，一个咿咿呀呀地叫妈妈、找奶奶（奶奶不在当场）的凄惨场面，虽然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仍在记忆中不能磨灭，历历如在眼前。在同一个黑牛营子村，还发生过两起惨案。其中一件是一位李老汉投火自焚的事，这就是老汉见日寇把房子点着，痛不欲生，于是跳进猛烈燃烧着的房场之中，与房屋同归于尽。另一件是一位老大娘虽然已经发白齿豁，却用牙齿咬断了威逼索枪的日本特务分子名叫中山手指的事。类似这类中国百姓奋勇抗敌的斗争事例，到处流传，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

佐藤刀铡爱国志士

王瑞林　陈　瑛

1937年（伪康德4年）日本侵略者在北票朝阳沟、长条沟、关地沟等地对我抗日志士制造了枪杀、活埋、挖心、火烧等数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之后，于翌年11月24日，又在娄家沟用铡刀杀害我同胞11人，制造了娄家沟惨案。

娄家沟位于北票县城北约25公里处，是北票通往黑城子公路沿线的一个村。该村附近的兰家窑是抗日英雄兰天林的家乡。兰天林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医巫闾山以东举起“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的大旗，1933年又转战到家乡，号称“抗日灭满救国军”。兰天林同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抗日队伍联合，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围攻和突袭。如1934年奇袭奈曼、二打黑城子王府，1935年围攻北票等地，都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兰天林这支队伍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派来以“活阎王”佐藤为队长的日本讨伐队，四处追剿兰天林的抗日队伍，并在娄家沟村设置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以强化治安。他们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兰天林，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这抗日火种。

娄家沟遇难的11名同胞，多是兰天林队伍的成员（其中一人因其哥是兰天林的部下，也被抓来了），他们被俘以后，受尽严刑酷打，但始终宁死不屈。于是，敌人穷凶极恶地把他们用刀铡了。

这一天早晨，天空布满乌云，北风刺骨，雪花纷飞。佐藤率百余名日伪军，乘军用卡车冲进娄家沟。接着，娄家沟等3个村的居民，上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下到能走路的孩子，均被伪村长和伪警察驱赶着到杀人场上。杀人场设在村南靠树林的一片开阔地中间。东面是佐藤的指挥台，西、南、北三面挤满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包围起来的群众，场上并架起四挺机枪。上午10点多，11名爱国同胞被日伪军用枪托触打着，推拥着，押到一口铡刀前。站在最前面的是爱国志士齐孝祥，他被日寇捕后两个多月，经受各种酷刑，腿骨被打断，头部血肉模糊，但他对敌人，仍怒目而视。临刑前他向家乡拜三拜，而后抬起受伤

的手掖掖袄领，便毅然躺在铡刀上。此时，佐藤从太师椅上跳下来，手握战刀"哇啦"一阵，翻译官译成中国话说："皇军说，谁要再反满抗日杀头是问！"随后便开始动刑。刀下头落，血花四溅，洁白的雪地顿时一片殷红，其惨状目不忍睹。

事后，佐藤命令将11个血淋淋的人头，连同从外地携来的10个人头，一起挂在路边的大杨树上示众。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不断增兵热河

高桥茂

我于1942年8月任关东防卫军参谋，1945年3月5日充任后方主任参谋。1943年初关东防卫军的情况如下：

关东军将满洲划分为第一、第三方面军及关东防卫军三个管区，以完成满洲防卫的任务。

关东防卫军司令官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在自己的管区（滨江省、吉林省、四平省、奉天省、通化省、安东省、锦州省、热河省、兴安西省、关东州）配置以下的独立守备队：第五独立守备队为滨江省，第一独立守备队为吉林省、四平省、第二独立守备队为奉天省、通化省、安东省、锦州省，第九独立守备队为热河省、兴安西省，旅顺要塞司令官担任关东州的防卫工作。

独立守备队是由步兵部队3到4个大队编成的。

第五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滨江省防卫司令官。第一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中部防卫司令官。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南部

防卫司令官。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为西南防卫司令官。旅顺要塞司令官为旅大防卫司令官。

1943年初，八路军为了解放祖国，对热河省的进攻更加激烈地同第九独立守备队交战。

在此期间，因兵力不足，关东防卫军司令官根据第九独立守备队长的要求，逐渐从第五、第一、第二各独立守备队抽出步兵各1个大队计3个大队，派到热河，置于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指挥下。1944年春，任命防卫军参谋酒井少佐为第九独立守备队参谋，接着将防卫军高级参谋植山大佐派到现地，以便于西南防卫司令官执行任务。当时，在热河省除满洲国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指挥的2个至3个步兵旅以外还有热河省的警察队，组成三位一体的共同防卫体制。

1943年秋，第九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因感兵力不足，防卫军司令官向关东军司令官请求将辽阳的第二十九师团派遣到热河，关东军司令官以该师团准备对苏作战为由，未予批准。

结果防卫军司令官不得已，由各独立守备队抽出1个大队的兵力派到热河。另一方面，满洲国任岸谷氏（岸谷隆一郎）为热河省次长，他集合原来在通化省参加讨伐的旧部下，调到热河省。据闻，他将朝鲜人编成特别警察队。再就是，军方要求满洲国政府督促热河省的作战地区，迅速进行归屯并户，因此，于新京召开中央防卫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结果满洲政府约支出2 000万元（一户约50元）的预算。到1944年春，渐渐阻止了八路军的进攻。

同年春，关东军以第九独立守备队为骨干，编成第108师团，从夏季开始，关东军直接使该师团担当热河的防卫工作。

（摘自《东北“大讨伐”》）

兴隆县公安局
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

（1954年8月6日）

自1933年日寇侵占兴隆，历经13年的种种罪行是述之不尽的。最残酷的是由1940年日寇的“西南国境治安肃正”的杀人政策施行以后，日本派遣了关东军881部队一两千个鬼子常驻兴隆；扩充了警察，建立了15个警察分驻所，4个警察署，六七个警防所，在集镇上设有派出所，每个部落分派部落警；近万人的伪军讨伐队分布在兴隆各地；日宪、特务到处有；村村设有协和会实践集家队。这些组织，由日本人统一指挥，进行灭绝人性的“大集家”、“修人圈”、“下山”、“自首”的囚笼政策；“大检举”、“投匪家族检举”（抗日人员家属）、制造“无人区”、“围剿”、“扫荡”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谓“西南国境特别军事法庭”，并立了“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害我无辜人民。

1942年到1944年3月的春节前后，日寇进行了3次大检举，被捕的12 000余无辜人民中，被判决枪杀、刀砍、监押、赶入工矿者就达11 400余人。我县五区一个70来户的大莫峪村，在1943年正月一次就被“检举”去72口，大到70多岁的老头，小到14岁的小孩，连哑巴等也全部捕去，在当地就屠杀了42口，送承德判死刑15口，其余分送东北各地当劳工，大部也都死去。七区茅山村，1943年被日本一次捕去66名无辜人民，除跑出两名外，其余全部送承德杀害了。1942年正月十三日，鬼

子在我四区荞麦岭，一次杀死23名群众。1942年正月十四日，在六区小水泉被日寇抓去93口群众，当时就地给杀死了61口，剩下32口带到倒流水后，一个未留也全部杀害。

兴隆县人民被迫集家赶入人圈22 365户，111 800多口人。据7个区的大略统计，因日寇修“人圈”，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星点自由，被摧残而死者11 140余人。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寇烧毁的民房23 400多间，拆毁民房38 300多间。

在兴隆的南土门设有“万人坑”（距兴隆街2公里远），被“检举”之人，凡在兴隆，由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庭前来判处的，均押赴该地执行。仅1944年1月6日，就被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判死刑54名无辜群众，全部是绑到南土门执行的。1943年冬，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38名无辜群众，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个砍死的。这就是被迫进入“人圈”的人民，受到日本残害的铁证。

我县有2 390多户，1 3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0%的地区，划为“无人区”。有11 600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坚持在“无人区”守卫自己的家乡。日军对这些人民，对这片“无人区”，实行了残暴的三光政策。经常发兵围剿扫荡，见青苗割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就抢光，见人就杀光。据27个“无人区”行政村的统计，被扫荡打死我“无人区”人民达4 000余口。二区小河西一个村，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523口。三区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48个。五区暖和堂，胥景合一家13口人，全部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七区前乾涧，被日本捕去19名男女群众，将衣服全部剥光，用乱棍打到不能动的时候，又将这19个人装在菜窖内，活活地用火熏死。

1943年9月，日本鬼子集中了2万多兵力，围剿我各地“无人区”，15天的时间，仅中田一个村，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179口。“无人区”内的张凤彦的妻子，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被日军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肠肚。日本鬼子们走后，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小黄木沟一个窟洞内藏着17名群众，被日本鬼子活活地用火熏死在窟洞里16名。

有的“无人区”人民逃出了枪杀、刀砍，但却被日寇的三光政策摧残而死去大半，如中田一个村就无吃无穿无住冻饿而死者400余人。

我们的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在兴隆“无人区”内牺牲的，据这次调查统计就有200多名。如1943年1月5日在七区，日寇一次打死我军和抗日工作人员30余名。1941年在四区拨子村打死我们的县长新华。

日寇“抢光”的罪恶更是不胜枚举。在“无人区”就抢去骡子197头，马60多匹，驴1 300多头，牛1 800多头，羊近3万只，猪1万余口；抢去衣服四五万件，被褥六七千床，布2万匹；砸毁锅、缸二三万口；其它器具是无法数计。“无人区”碾磨一盘不剩，全部砸毁。

日寇就以此兽行摧残兴隆人民，把人民的美好家园变成了父兄被杀，母被砍，家破产的境地，把肥沃的良田变成荒芜的草原，把整齐的住宅变成了颓垣断壁和焦土，使人民处于无以为生的绝境。

兴隆县的广大人民对日本这一笔血债，清清楚楚的记在心内，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纷纷控诉日本关东军881部队、夏道队、小彬队、山下队、渡边队、导田队、冢纲队、黑严队、一

田队、日本宪兵队；控诉日本兴隆县长田正四三男、村上荣信、石川；控诉日本兴隆警务科长池尾、前田利一、深内坚一；控诉日本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及一切日本战犯的罪行。

（摘自《东北“大讨伐”》）

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

植松犹薮笔供

（1954年8月1日）

一、杀人

1.1942年4月15日黄昏前后，于热河省承德街东侧武烈川下游河畔，我以日本关东军承德宪兵队兵长的身份，奉分队长永山中尉的命令，将在伪承德监狱中的八路军冀察热军区第13团某连25岁左右战士7名，由牢房提出，用载重汽车运到武烈河畔，然后命被害者一个个跪在已经准备好的坑前，几名宪兵按照次序，用日本刀砍头，杀害了这7名八路军战士。跪在第3坑前的一名战士，被我用日本刀由背后砍头杀害，我并用脚把被害者的尸首踢进坑里。

2.1943年3月19日下午6时许，于热河省兴隆县兴隆街西南长城线茅山到黄崖关中间疏散的村庄道路上，日军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140名，按特高课长本村光明指示“在赤化地区，必须彻底的扫荡肃清，不留一草一木”的方针，将未及躲避宪兵偷袭，仍留在村里的病人、老人35名和吃奶孩子4名，共39名中国人全部屠杀。为消灭罪证，烧

毁了被害者的尸体。我奉生田队长的命令，分队长水野军曹、高桥兵长、田中兵长、尾崎和我（兵长）5人，将村中星散房屋里的卧病老人和怀抱幼儿的妇女，强制拖出，领到山里狭窄路上，将他们两手用绳子绑上，命他们就地坐下，我用日本十四式手枪两支，枪杀了年45岁至60岁的妇女9名、60岁左右的老翁5名、2岁左右小女孩1名，共15名解放区抗日人民。其余24名，被同伙宪兵全部枪杀，并用附近的高粱秸和蒿草盖在被害者的尸体上，洒上油类，放火烧毁，然后逃离现场。在这次罪行中，我主动屠杀了15名无辜的和平人民和吃奶的孩子，并亲自动手将尚未死的被害者两三名烧死，犯了超过魔鬼野兽的惨无人道的屠杀罪行。

3.1943年8月9日前后，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方——三道河子中间的山里，发现有中国人的零星房屋，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的身份，不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主动亲自跳进房屋，用日本马枪射击正在休息的两名20岁左右的冀察热军区第11团八路军侦察战士，一名在腹部，另一名在大腿关节上，受了贯通重伤。还逮捕了惊慌欲逃的户主，他是60岁左右的老翁。我用劈柴的斧子砍他的背部，使他受了重伤，陷于濒死状态。然后，我和增援的同伙冲野伍长、竹田伍长等一起，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把濒临死亡的战士和老翁共3名，拖到屋里，使他们躺在炕上，用易燃的家具压在被害者身上，随后用高粱秸放火烧房子，将他们一并烧死。当时，被害老翁18岁和20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婴儿共3名，被我的同伙捆绑，失掉自由。因为我和其他宪兵烧了房屋，杀了人，她姐妹俩在燃烧的房子前，哭泣着反抗宪兵。我想把这两名妇女和小孩也杀害掉，当用手枪正要射击时，因派遣队长的命令而未遂，遂将一名妇女（妹妹）衣服剥去，让其裸体，用

棍棒殴打。对抱小孩的妇女（姐姐）也拳打和脚踢，且大声说："对靠近八路军的，就这样处分！"强制把这两名妇女由现场赶走，使她们失掉了房屋和生活中的一切。我们便逃离现场。还从两名侦察战士身上，掠夺了抗日传单50张左右、信件、手榴弹十数个和布提包一个。

4.1943年8月19日上午10时前后，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三岔口村入口。当时我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扫荡系伍长系员，奉派遣队长山田恒雄的命令，将上一天即8月18日夜间被我们宪兵逮捕的居住在三岔口的2名中国抗日农民（35岁左右）拉到该村入口，在200余名的村民面前，威吓说："你们看，这是援助八路军者的结局！"我用日本刀，将两名抗日爱国农民杀害了，并强迫村民把尸首埋在村前的田地里。我为了想实验自己日本刀的利钝，主动向派遣队长请求，亲自砍杀这两名被害者，犯下了罪行。

5.1943年9月7日前后，于热河省七沟村东南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山峪，我以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的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游击扫荡中在山麓岩石角发现脚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1名（年25岁左右），向派遣队长山田恒雄报告，在还未下来命令的情况下，我便用日本马枪，对该八路军战士射击两发子弹，被害者的头部被子弹贯穿，当场死亡。将尸体遗弃，逃离现场。

6.1944年6月14日前后，于热河省平泉街关东军热河特别警备队平泉派遣队后院马厩前，我以代理派遣队长军曹的身分，对部下逮捕的抗日爱国农民刘贵（40岁左右，住热河省喀喇沁左旗三十家子村）使用灌水、过电和殴打等刑讯。被害者顽强地抗拒供述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我又施以非刑，审讯到一个小时半左右时，由于我的残酷刑讯，被害者气绝身亡。

二、参加和执行集体屠杀

1943年4月17日到同年5月1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茅山村西南长城县附近，游击进攻中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宪兵约70名，在永山茂通指挥下：(1) 4月20日前后，于兴隆县茅山西南长城线山峪，和八路军部队遭遇，进行攻击，用轻机枪和步枪一齐乱射，枪杀了八路军战士30余名和抗日爱国农民10余名。我以步枪手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并用步枪枪杀抗日农民三四名。(2) 4月29日偷袭兴隆县茅山西北某村零散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枪杀了25岁到35岁的抗日农民20名。

1943年5月到6月上旬，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周围的半解放区村庄，由承德宪兵队第2游击队生田大尉指挥的宪兵约150名的游击行动如下：

1.5月15日拂晓于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北方5公里的山峪村庄，偷袭抗日爱国农民的房屋，轻机枪和步枪一齐射击，枪杀了正躲避枪弹的抗日农民15名（年龄30岁到50岁）。我以扫荡系员伍长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5月18日前后，于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热水汤附近，偷袭零散的中国农民的房屋，用步枪射击，枪杀了试图逃难的抗日农民6到7名，并逮捕了6名，刑讯后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分，参加了这一罪行，协助扫荡分队长池田军曹，主动对被捕者灌水、殴打刑讯，将其杀害。

1943年7月下旬，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山田曹长等约25名，行动如下：

1.9月下旬，于七沟村以东承德县和喀喇沁中旗的县旗境界，以夜间潜伏的方法，逮捕八路军战士，袭击了通过县境的

八路军第八团某连战士约40名，战斗约两小时，打死八路军战士3名，逮捕8名，逆用约一星期后，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杀害了。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11月上旬前后，于七沟村西南三叉口附近，偷袭抗日农民的房屋，逮捕了农民3名，用殴打和灌水等刑罚杀害了。还逮捕了正在该房屋休息的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宣传员中国共产党员白玉林，当日送交伪承德热河特别治安庭，处以死刑。我以扫荡系员伍长身份，参加这一罪行。

三、逮捕

1942年4月17日到4月30日，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准尉内田一平等约30名：

1.4月17日，偷袭兴隆县兴隆街西南5公里的农民房屋，逮捕了抗日农民约80余名，殴打、灌水刑讯后，将20余名送交伪兴隆法院下狱，余者经刑讯释放。我以扫荡系员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4月20日，偷袭搜查了热河省兴隆县茅山村附近零散村庄的农民房屋，逮捕了100余名中国农民和抗日救国会员，押解到兴隆街，进行殴打灌水过电等讯后，将30余名送交伪兴隆法院下狱。其余的被害者经刑讯释放。我以扫荡系员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3月25日前后，于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家村至黄崖关间，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约150名，为了分离八路军和抗日农民，补充建设对苏军事基地、构筑阵地所需要的劳动力，逮捕解放区的农民。采取守候、偷袭和盘查等办法，将在房屋里的、行路的或正进行耕作的农民，一律逮捕。继续进行一个星期，共逮捕200余名，大部是青年农民。他们被

押解到兴隆，后经由承德送往东北满某地。我以扫荡系员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5月到6月，承德宪兵队第二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150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属下的抗日农民，用潜伏偷袭和其它方法，逮捕了居住在南榆树林子周围村庄有组织的农民约350名（男子，年龄25岁到50岁），经殴打、灌水和过电等刑讯后，将与抗日救国会有关的50余名，送交伪承德特别治安庭。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分参加了这一罪行。

1943年10月至11月下旬，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的承德日本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等约25名，在伪军约200名的增援下，对事先已经查明的七沟村周围村庄抗日救国会会员，连续进行了大逮捕，共逮捕约200名，其中70名送交了伪平泉热河特别治安庭下狱。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担任伪军（约25名）的指挥班长，亲自逮捕了20名。

1943年11月下旬，于热河省喀喇沁右旗五家村和七家村，承德宪兵队坂元中佐指挥宪兵70名和伪警察30名，逮捕了中共地下抗日组织的农民约150名，在当地就进行了殴打和灌水等刑讯。在百鸟伴治郎中尉指挥下，将抗日救国会员约20名送交了伪赤峰热河特别治安庭，其余被害者命五家村和七家村的伪村长取保后释放。

四、放火

1. 1942年4月17日，于热河省兴隆街西南5公里零散的村庄，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指挥的宪兵约30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以八路军部队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了零散的房屋约70余户。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2. 1942年4月21日前后，在热河省兴隆县西南茅山、黄崖

关附近，承德宪兵队兴隆派遣队内田准尉率领宪兵约30名，在该地区游击侵略，将认为有八路军利用危险的农民零散房屋约50余户（由于强制并村工作，被害农民的房产），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增援宪兵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3.1943年3月19日，游击侵犯热河省兴隆县西南长城县山峪的承德宪兵队第2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宪兵150名，偷袭了上述长城线山峪零散的解放区农民房屋，先逮捕杀害其家人，随即放火烧毁其房屋，共烧毁了约有40户。我以扫荡系员兵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4.1943年5月至6月，驻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南榆树林子村承德宪兵队第2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率领的宪兵150名，根据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对赤化地区须彻底扫荡”的命令，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一带，对因农耕不便和反对强制并村而未搬家的抗日农民的房屋，放火烧毁，使100余户的房屋化为灰烬。我以扫荡系员伍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5.1943年9月至11月，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队山田曹长率领宪兵25名，奉承德宪兵队长坂元正的“将七沟村一带不向并村地迁移的抗日农民的零散房屋放火烧毁”的命令，在两个月期间内，将七沟村四周的抗日农民约200余户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我以扫荡分队长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罪行。

五、强奸

1943年12月中旬，我以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长伍长的身份，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八里罕村，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命部下宪补汉奸黄希坚，以欺骗和金钱诱惑手段，将居住八里罕村的年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某，领到八里罕派遣宪兵队，我进行了强奸。

六、情报工作

1943年11月下旬至1944年2月，我以热河省喀喇沁中旗承德宪兵队八里罕派遣宪兵队长的身份，指挥部下6名，对中共承平宁县政府八里罕地区抗日的中国农民，进行户口调查和抗日活动情况调查，并搜集其他一切有关的情报，报告给平泉宪兵分遣队长木下万寿一，木下万寿一分遣队长于1944年1月21日，在八里罕地区逮捕了抗日中国农民约250名，其中15名被处死刑和杀害、病死于狱中。

七、掠夺

1.1943年10月中旬，我当时是承德宪兵队七沟派遣宪兵队扫荡分队长伍长，在热河省喀喇沁中旗七沟村东南某村庄，用手枪鸣枪威吓，逼迫两名放牧的农民逃走，掠夺了留在该地村庄前丘陵上的约50只山羊，送交派遣队长山田曹长。

2.1944年3月下旬，我任承德宪兵队本部特高系伍长，与本部特高系主任原曹长等几名宪兵一起，以逮捕八路军工作员为目的，夜间潜伏在热河省承德县下板城村入口处，鸣枪威吓，将从河北赶着200头耕牛从事贸易到承德县下板城来的中国农民逼走，掠夺了全部耕牛，并委托下板城村伪村长某将牛卖掉。此事向西南防卫司令官安藤忠一郎做了报告。

3.1943年5月至6月，驻热河省喀沁中旗南榆树子村的承德宪兵队第2宪兵游击队生田大尉等宪兵150名，从上述村庄的农民手中，掠夺了可供150人食用一个月的副食品——肉、蛋、蔬菜，掠夺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是扫荡系伍长，参加了抢劫行动。

（摘自《东北“大讨伐”》）

八

张鼓峰、诺门罕战役

张鼓峰事件真相的回忆

孟广信

1938年7、8月张鼓峰事件当时，笔者正在珲春河南图鲁屯小学任教，几百名难民从战地逃来，正值珲春河涨大水，都住在图鲁小学的新（春景屯建的）、旧校舍的教室里。我对当时战地的情况了解一些。

1938年张鼓峰事件前，驻珲春的日本军是驻朝鲜罗南的第19师团的鹰森部队。我于1935年春，去开办"九·一八"后停办的九沙坪小学校，后又在九沙坪第二次任教。那时一个中尉带着一些伪军，还有2个日本兵，驻在九沙坪；一个中尉带着一些兵驻在洋官坪，圈河对岸是庆兴（偏脸城），沙草峰对岸是古邑，日本都有重兵把守。

30年代前期苏联红军就登上并占据了沙草峰和张鼓峰，并在山巅修了国防工事，安上了哨兵。对岸朝鲜古邑的几个山头上，日本也修了国防工事，一直对峙着。1938年7月14日，日本派松岛宪兵伍长乔装成农民和另外的一个向导到张鼓峰几个山头，探视苏方的实情和军事设施。苏方发现后，松岛伍长当即被打死，熟悉张鼓峰的那个向导跑回去了。

7月29日，凌晨，云雾弥漫。日本军发动了第1次进攻，尖兵刚摸到张鼓峰山腰，苏方就开枪了。

7月31日，一部分日军从洋官坪迂回想要截断通往沙草峰和张鼓峰的后路，对张鼓峰进行第2次攻击。苏联的飞机起飞了几十架，出动了坦克几十辆，随后，步兵也冲上来了。飞机不

仅在战地投下了大量炸弹，就是朝鲜临江的几个集镇，如：庆兴、古邑、青鹤洞、阿吾地等主要车站和庆兴郡当时所在地——雄基，没有一个幸免。敬信几个密集屯落也常被轰炸，飞机看到人群就用机枪扫射。把清——罗线铁路炸断了很长很长的几段。从第2次总攻击开始，到8月10日这是战争最激烈的11天。8月5日前后是战争的最高潮。苏军进行了无数次进攻，控制了张鼓峰和沙草峰阵地。日军反攻一次，就被打退一次。中旬以后，日军因铁路瘫痪，江河涨大水，援兵运不上来。尽管也调来了几只战艇，但都被苏方打沉在江里。苏方的太平洋舰队，把图们江口封锁得很严。日军冲了几次都没有大作用。海上只能以失败而消沉。珲春的援兵运不上来，日本只依赖庆兴桥，最后也是半瘫痪了。水流峰一直被苏方占据着。峰顶的阵地非常坚固，张鼓峰后路输送线一直坚持得很好。如果日军再进攻，只能是全军覆灭。

珲春镇及附近的平原地带，也很紧张，各通路也有警察自卫团把着。8月上旬末，难民在敬信呆不了，才由敬信乡的职员和两名黑顶子警察队队员把他们护送到图鲁和春景。此时，珲春河正遭遇着自191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涨水。1934年日伪用钢筋水泥修的珲春大小桥，被冲垮倒塌，像两条长长的死蛟龙躺在河底里。战地来的难民都住在图鲁的新旧校舍里。这时我见到了分别12年的老相识于希水，他说：住在土字碑下坎江岸的老由头已经逝世，他还说：他"九·一八"后好几次被抢劫，没法住搬到黑木积，弄了点地种，这次开战，苏方的火力集中在平原沙草峰、张鼓峰、黑木积一带。飞机也扔了很多炸弹。洋官坪的江岸上有些房子，通古邑的渡口有日本军队驻守，沙草峰、黑木积的居民都迁出，没人家了。有一位朝鲜族老大娘，1926年我在她家住过六七宿，在圈河也见过她，攀谈的特别亲热，她

掉着泪说：日本人哪管我们，青壮年都被抓去给他们抬担架运死尸、参加战勤，也死了好多，我二儿子也死了。说到这儿呜咽得很厉害，她接着说：壮年妇女有的被抓去给他们做饭，丢下的孩子已经送命了。我们在开仗的第四天才从战场上率领全家跑出来。洋官坪的渡口、庆兴桥被苏军封锁得很严，过不去，难民从战场上都是三五家一伙地逃出来的。乡（村）公所在九沙坪设了一个收容所，前天才集合把我们送到这里。

这些淳朴善良的朝、汉住民受到了很大涂炭，有的老人和孩子耳朵震聋震坏了，直流血。好多房屋变成灰烬，余剩的也大部倒塌。家俱炸毁了，耕畜炸死、炸伤了。好多老弱妇婴也被炸死。有一个我在1926年初遇时还是小学刚毕业的学生。他说，开仗的头5天就被抓去给日本军队运给养。运军需装卸车，不知准备这些干什么？他是开仗的第3天跑出来的。最初，日本军也有几架飞机飞来了，叫苏军打掉了几架，后来再也不敢来了。汉、朝这些住民与我虽然相隔12年没见过面，但认识的人，见到我都很亲近，说话很爽直、恳切，愿意说出他（她）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但一看到村职员和不相识的人，立时就住口，原因是怕日本人、怕“狗”。几百名住民，住了十几天。8月上旬，在珲春镇附近日日夜夜都可以听到轰隆、轰隆连片的爆炸声，到中旬这种声响稀疏些了。8月12日的前一天午前，5架飞机从苏方哈什蚂沟上空飞来，有的到甩湾子、庆源、农圃、承良以西，盘旋迂折从图鲁上空飞回苏联。到太阳村上空时，地面小枪响了好长一阵。这时成千名军国主义的胡子兵（大部分都是再征入伍的在乡军人），听说是从华北战场调来的，步、马、炮都有。这几千名日本兵在8月初就到珲春，他们还没上战场，张鼓峰战争就以失败而终止。8月中旬后期，在珲春镇开了一个战争胜利展览会，表明战死了一名大佐，有十几名佐级军官，也

都毙了命，他们的血衣和被穿孔打坏的钢盔、遗物等……都摆上了。还有一些破枪碎铁、废弹壳、弹丸，标明这是缴获的胜利品。日军搞的这个所谓胜利的展览，实际是自吹、自擂。

战火平息后，珲春来了一个日本中将。在珲春安设了关东军师团司令部，春化去了一个旅团，敬信、平源东北的“五家子”驻一个旅团。在八道泡子南圈河山北麓，盖了一幢房，圈河口（八古比）盖了一幢房，庆兴桥头盖了一个哨所。从此，(1938年—1945年）圈河山南（庆兴桥南）列为军事禁区，不仅汉、朝住民不准去，就是敬信乡洋官坪等地区也划为无人区。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日本人在珲春拘捕了大把头衣中丁。这家伙是辽南人，会说日语和朝语，清——罗线铁路，靠近珲春这一段是他骗来的华工修的。珲春的国防工事修完后，就把劳工活埋在国境线上。修东满铁路也是他骗来的劳工干的。1944年秋，日本硬说衣中丁是苏联间谍，珲春的国境事件都与他有关系。逼问他到张鼓峰顶巅去过没有？严刑逼供，他被硬打死在珲春国境警察队刑讯室里。这个民族的败类，敌人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最后死于其主子的手下。

张鼓峰事件拾零

8月17日，战地的枪炮声响，更加稀疏了些。有一次，听见说前几天圈河山也是战场，不时听到开坦克的响声，山上有很多苏军。有一天在水流峰顶上用巨炮向偏脸城（庆兴）打了好几次炮弹，庆兴浓烟缭绕可能烧了不少房子。有一天日本的飞机来了一架，要去炸水流峰苏军阵地，没到就叫苏军打掉了，残骸还在南木正（一树亭）的山坡上。

伪满国境监视队

刘世昌　韩蔚

1938年6、7月间，伪满军事顾问部召集国境监视队各部队长开军事会议（这个会是机密的会议，没有中国人参加）。事后，“北部”顾问（日本军现役中佐）对韩倜[①]说：你要作好思想准备，选两个精明的属官，最好是会满语的，如果没有就特殊采用，多作思想教育。北部又说：可以在大臣官房中挑选。但对他们的思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使他们担任“甄别”工作，交给第一参事官室长岛参事官指挥。后来，选定了周敬修、张人浦二个属官，准备随长岛参事官执行任务。但不久又来命令又变更了，不要中国人担任。韩倜对这次出尔反尔的作法感到日本人说的再好听终究和中国人是有距离的。搞不清葫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药。后来，韩倜到酒保服装部去做军服，服装部的杉本主计对韩倜说：现正在给关东军加工1 000套满军士兵服装，您如不忙用，请稍候几天再做吧！韩又问杉本说：关东军怎么要做满军军服呢？杉本说：这批服装是关东军特约订做的。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奇怪，猜想这可能与经济战有关系。回到部队里就询问山崎大佐。山崎是经济战研究室的主任，跟韩倜处的还很密切。山崎笑着说：这算什么罕见的事，日本军就不许穿满军的服装吗？可能是国境监视队呗。国境的军事编制和部署都是要尽量符合现地情况，为了防患未然，在着装上也

① 韩倜即本文作者韩蔚。

不必要太机械了吧。近来接到珲春国境监视队的报告："张鼓峰"一带疫情严重，顾问部拟派军医处人员到现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技术上的处理"。山崎又说：这次疫情是由苏联边境线上蔓延过来的。将由松井事务官带人去收集对方的公共卫生措施、药品供应等情报。去的人要到军医处进行体格检查和预防注射。韩倜听到要先进行预防注射，便想到顾问曾经说过要进行细菌战是最危险的事。

这次到国境线去的人，要注射鼠疫、霍乱疫苗。

中尉军需官刘世昌是1938年9月1日调到珲春国境监视队去的，还有个上尉军需官（日本人）名叫"福留"，也是新调去不久。珲春国境监视队人数不多，仅招四个连的兵力，不过几天就调来两个军需尉官，可见日寇对"张鼓峰"事件，并未想速决的，而是计划着大举进攻苏联。刘世昌所见日本军驻珲春国境地带是一个师团，随时准备着参加战斗。还见到由伪军运来的大批的伪军装，是预备把日军化装成伪满军参加这个战斗的。

"张鼓峰"战斗中日伪军战斗情况：

"张鼓峰"战役兵力的部署是：第一线是伪满军的3个连，连排长都是日本人，连副是中国人。这3个连有一个连的士兵都是朝鲜人（多数是入日本籍的朝鲜人，也有的是由日本军退役的兵）带队官还是日本人。

另一个连作为预备队，据说：这次战斗是日本军化装伪满军在左翼参加了战斗，战斗不过二十几天就结束了，死亡有三十多人。

国境监视队在现地设立对空监视哨，立一架很大的定向天线。日军的高射炮隐蔽在战壕内。对空监视哨有一个日本军曹长，他不断地和日本军联系。无线台也设在伪军的阵地上，作

地面联络用。同时，在边境线上还埋有地雷。

由珲春到国境线的“国道”是平坦的，不但用于运输军用物资，而且利用平坦如镜的国道作为飞机的跑道。在国境线上设有路标及障碍物，如铁丝网都通着电。还在边境线的靠苏联边界撒布了细菌和毒品。

这个部队有宪兵办公室，上尉一人，中尉一人（都是日本宪兵尉官出身），部队里设立暗室。刘世昌有一次值宿路过暗室，听到室内有哭啼声。刘问卫兵谁在禁闭？卫兵答是犯人冻的叫喊。刘世昌感到奇怪又问是咱们部队的弟兄吗？卫兵说：是百姓，一个是中国老年人，还有一个朝鲜妇女。这两个人冻饿好几天了。听说他们在国境线上禁区砍柴时被捕来的。

张鼓峰停战后，国境监视队于1939年3月1日，改编为国境警察队。

张鼓峰事件的爆发

日本陆军部　战史研究室

1938年7月7日，关东军监听获悉苏联波谢特地区警备队长给在哈巴罗夫斯克苏哥洛夫中将的电报，判断苏军企图占据张鼓峰东北12公里的香山洞西方高地。当即通报朝鲜军（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珲春驻屯队和该地的特务机关。朝鲜军立即令第十九师团及珲春驻屯队等注意警备。

张鼓峰位于满洲国珲春县最南端、背向图们江与苏联沿海州的国境地带。珲春县当时被划入朝鲜军的防卫地域。

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被称为积极敢干的将军，属下

各联队长也多刚强之士。至7月20日，师团将士受中央部对苏军非法越境以实力给予一击的思想影响，锐意进行夺回准备。

7月30日下午，参谋本部收到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的急电如下：

29日晨，约10名苏军士兵出现于沙草峰南方1公里的高地，越境开始构筑工事。

古邑（古城）守备队以20名士兵于15时将其击退，以后该小队为了避免战斗，撤回到洋馆坪南方2公里的高地，正监视敌情。

于是以参谋次长名义，向朝鲜军、关东军两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沙草峰事件，目前可由正在坚持实施不扩大方针的现地部队予以处理，希命其及时报告现地情况。

随后收到报告称：第一线部队对沙草峰方面苏军的攻击前进及非法挑衅，已断然给予反击。30日夜，一举夺取张鼓峰，正确保该高地。

以后的经过表明，这是使第19师团官兵处于极为困难的战局的原因。

31日，多田参谋次长就此新冲突的战况上奏天皇，8月1日下午，奉到如下的大命。

大陆命第163号

命　令

一、朝鲜军司令官应暂时占据张鼓峰、沙草峰一带大致现已进入之一线附近，且对上述以外我军正面之满苏国境严加警戒。

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3年（1938年）8月1日

据此，参谋总长于同日发布了大陆指第215号指示。

一、于张鼓峰、沙草峰附近，只要苏军不进行挑战，军事行动不得超越目前范围。军的配置及行动，除准备迎击敌军反击外，应维持现状。

二、除上述外，对军队正面的满苏国境方面应严加戒备，但军队行动应注意勿刺激敌方。

三、军队的行动应全面保持慎重态度。

大本营在命令于张鼓峰、沙草峰一带现已进入的一线附近采取守势防御的同时，对于苏军以坦克、远射程炮、飞机向我反击，为了不扩大事态，对使用飞机加以控制。这样，装备本来劣于苏军的日军第十九师团，在缺少空军支援的状态下，完全陷于苏军优势火力攻击的险境中。

8月5日，朝鲜军参谋长向次长、次官、关东军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敌似在拖延外交谈判，赢得时间，依靠轰炸及远射程炮击，企图使本身不受损失，逐次消耗我战力，最后一举全力夺回张鼓峰，从而使此次事件及一般外交取得有利进展。

果真如此，则我军在限定战面内，战术及地形上又无运用兵力之良策。同时，在使第一线攻击前进时，推进山炮、压制敌炮兵，即须越境。而且此次战斗，并非必须等待其他方面战局发展之持久战，谓为空守阵地继续忍受消耗，并非过言。

今日师团官兵士气虽颇旺盛，得无足虑，但如长此下去，恐终将影响士气。

当时如爆发对苏战争，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于是，8月5日批准了关于朝鲜军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并派遣桥本群第一部长前往现地，负责决定传达及实行的日期。命令原文如下：

大陆命第172号

一、朝鲜军司令官应将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之兵力，伺机向图们江右岸地区集结，然后适时返回原驻地。

对军正面之满苏国境应严加警戒。

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此期间，统帅部为了缓和第十九师团的战况，下达了第十九师团的临时动员令，并增加了重炮、高射炮、列车炮等兵力，命其对罗津要塞进行紧急战备。同时，为了牵制苏军及制止其恣意行动，于8月10日采取了命待机于大连附近的大本营直辖第一百零四师团向珲春附近前进，以及关东军向绥芬河、东宁方面东正面移动兵力等措施。

尚未传达的8月5日的第172号大陆命，是为避免全面战争不得已而使防御战斗中的军队后退的命令，这对造成优秀师团的战败感，给与敌方过敏反应，乃至对日苏今后的政局和国际均有极大影响。同时由于正在促进外交交涉，所以此项传达不能轻易决定，以致第十九师团陷于战力消耗殆尽的困境。

真是上天保佑，正当走投无路的最后关头，10日半夜莫斯科停战协定成立，按我方主张在8月11日正午的线上停战。原来苏方并无扩大此次战斗的积极意图。这样，由于莫斯科达成协议，得以不致蒙受败退之耻，保住了日本国家及军队的脸面。

8月11日，以大陆命第179号下令“应自现在起，停止与苏军在张鼓峰、沙草峰方面之战斗行动”，并传达了前记第172号大陆命。

据当事人回忆：由7月10日开始的一个月期间，正是汉口作战部队集中的高潮，惹起如此事件，中央统帅部一时极感不安。然而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以后苏军虽在张鼓峰占领了坚固阵地，但我军并未企图夺回。苏方以张鼓峰事件作为苏军的胜利，大肆宣传。

据判断，苏军于7月9日占据长期以来有满鲜人来往的张鼓峰并坚决确保该地的意图，从全局观点并非认真对日作战，而是为了牵制日军的华中作战。同时为了准备对日战争，对通往北朝鲜、东满的日军作战铁路施加威胁，并侦察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此外，也可能由于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安部长留希科夫大将逃亡满洲境内事件，为了挽回远东红军的威信而进行的示威运动。

8月10日左右，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事件是由于现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红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

9月30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朝鲜军移交关东军。

一、解除朝鲜军司令官在珲春地区保护帝国臣民之任务，解除时间自10月8日起。

二、关东军司令官为防卫图们江下游方面之满洲地区，必要时得以一部军队配置于沿北朝鲜东部线地区。

（摘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失败的试探

称津正志

从朝鲜隔图们江与苏联接壤处有一座小山，叫张鼓峰。按1886年《中俄条约》，此处为两国国界，但无标桩，界线不明。

苏联称其为哈桑湖。它是从东方俯瞰海参崴的战略要地。1938年7月（第一届近卫内阁）上旬，苏军进入山岭地带。这时正是日军攻打汉口的前夕，为了避免与苏联的冲突，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采取不诉诸武力的方针。

关东军从2月起着手准备对苏作战，并提出所用战费最好从中国事变费中支出。在此之前，还命令参谋辻政信等人前往现场视察，同时将其强硬主张上报大本营和朝鲜军。这是因为关东军在干岔子事件中信心大增。陆军自中国事变以后，以战线扩大为借口，要求支付庞大的临时军费，以建立装备完善的51个师团。四年半期间，军费已增加到6万亿日元以上，其中一半消耗于中国战场，其余用在以后的扩充军备，包括对苏作战的费用。

大本营的外交谈判方针是要求苏联撤军。为预防万一，又命令靠近这一地区的朝鲜军第19师团（尾高中将）出动。该师团常驻朝鲜北部，其使命是准备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中国作战。

但是，大本营突然改变方针，企图试探苏联的态度，即打算要弄危险把戏。大本营认为，“在这样狭窄的地带，无法出动大批军队，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整个师团覆灭也无关紧要，这正是向苏联显示日本实力的大好时机。”然而，倒霉的只有士兵及其家属。

海军反对陆军的做法，认为汉口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因此要避免同对手玩弄危险的游戏。陆军置之不理，执意打一场有限战争，即只动员一个师团，而又不向苏联境内追击。陆军大臣板垣和参谋总长闲院宫都表示赞同。

闲院宫对天皇说：“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同时还提醒说：“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而宫内大臣汤

浅却对天皇说："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天皇问道："即使我不同意，他们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汤浅回答："这样就无法控制陆军。若引起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天皇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摆出一副旁观者的姿态。天皇是陆军大元帅，眼看着部下将国家拖入危险的境地，却仍任其胡作非为。作为大元帅，应该说这是极不负责的。元老西园寺对秘书原田谈道："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最好辞职。"（《西园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0页）

板垣和闲院宫为获取天皇批准而进宫。宇佐美侍从武官长传达天皇的旨意说："如为奏请使用武力而来，我则毫无赞同之意。"后经再三请求，天皇才接见了他们，并问道："你们同有关的大臣协商得怎么样?"板垣回答："外务大臣（宇垣）和海军大臣（米内）都赞成。"实际上，在此之前天皇已得知外务大臣和海军大臣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因此，天皇大为震怒，正言厉色地说："陆军的做法太不像话。满洲事变时在柳条沟也好，后来在卢沟桥也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作为朕的军队，竟然屡次采取不应有的卑劣手段。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不能动一兵一卒。"（《西园寺公和政局》第7卷第51页）

据外务大臣宇垣的记载，在他奏请和平处理这一事件的第二天，闲院宫上奏天皇，请求批准向苏联边境派兵。天皇看到奏折后扣压下来，没有批复闲院宫。奏折的内容是，命令朝鲜军师团和关东军的两三个师团驻防于"满洲国"东部边境。在奏折末尾的"备考"中奏明："有关今后这些部队的调动，请委任参谋总长负责。"如果天皇就这样批准奏折，那么，按照"备

考”的要求，对苏作战等重要权限将交给参谋总长，统帅权也将由参谋本部掌握，从而剥夺了天皇的权限。这样重大的事情竟未写入正文，而放在“备考”之中，显然是想用障眼法骗取批准。事后，宇垣感动地说：“陛下不予批准，真是英明。”军队企图夺取天皇的统帅权，策动大规模战争，而天皇处事谨慎，没有匆忙批准，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

大本营命令日军从冲突地区撤退，而师团长尾高率领部分士兵固守不动，打算依据《军队内务令》独断专行。

7 月 29 日，10 名苏军士兵到张鼓峰以北两公里处构筑工事，尾高下令进攻，苏军坦克随即出动。尾高不向大本营报告，擅自命令佐藤联队出击，攻占山岭地带，完全违背了天皇的旨意。可是，天皇听到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报告后，一反常态地命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同苏联远东军的决战》，见理性特集《昭和秘史》）也就是说，天皇高兴地承认事态的发展，向多田表示满意日军的行动。“事已至此，无可奈何”，这是天皇自满洲事变以来的一贯态度，因为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日军。天皇既然违背了自己的方针，那么不管胜败，都无意恢复原状。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虽遭各国反对，但只要不使用武力，天皇就心满意足了。这种态度助长了陆军的气焰，也养成不重视天皇的习惯。

由于上述原因，大本营承认了尾高的独断。战斗进入第二阶段，苏军开始炮击，从 8 月 2 日起，又以坦克、重炮进行反击。日军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未向苏联境内推进，全力坚守防线，伤亡惨重。危险把戏的灾难落到了士兵的头上。6 日，苏联出动两个师大举反攻，日军伤亡超过 1 400 人。这是战败后公布的数字，陆军发表的数字比这个少得多。军部惯用的伎俩就是夸大

敌方的损失，缩小自己的损失，以便蒙骗国民。

大本营甚至预感到整个师团将要覆灭，决定调关东军主力进驻“苏满边境”，牵制苏联。可是，这时正在中国进行着大规模的战争，无力扩大对苏作战。大本营最终放弃原来的打算，并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在这一事件中，日军对于苏军的方针即“如果国土遭到侵犯，将不断投入大量兵力”有了切身的体会，而且还取得经验，如果自己一方不投入大量兵力就会遭受重大损失，也就是说，若以儿戏般的兵力挑起战争，那就绝对不能取胜，而且损伤定会惨重。但是，实际上日军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通过交战地区的停战谈判，日军将坚守过的山岭地带交还苏联，然后撤退。早知如此，当初不打岂不更好。应该说，为死守这一地带而白白死掉的士兵是最悲惨的。

（摘自《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

张鼓峰事件亲历记

王辉* 张道森

张鼓峰位于我国和朝鲜、苏联三国交界的吉林省珲春县敬信乡，在图们江入海口的东岸，是个海拔152米的高地。张鼓峰又名刀山，原来在峰顶有一块岩石，形状如刀，因而得名。张鼓峰事件时，被苏空军扔下的炸弹炸碎，已不复见。峰南麓有防川湖，湖畔是防川屯，与朝鲜的豆满江里市隔江相望。峰东

* 作者历任伪满军第二教导队步兵第二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第二军管区上尉副官、兵事处处员。事件时任驻九沙坪的少尉排长。

是哈桑湖，峰北是波谢特草原。峰东南2.5公里处有土字碑。峰西北2公里处是沙草峰，高度略低于张鼓峰。

所谓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日本和苏联在张鼓峰和沙草峰这两块高地上发生的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伪满军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36号界标附近国境线一带，伪满军没有兵力驻守，只有少数国境警察巡视，处于半开放状态。伪康德元年（1934年）成立了国境监视部队，担任国防警备。该部全是招募的朝鲜青年，未受过军事训练，军纪涣散，滋扰百姓，不久被解散。又由吉林第二军管区指派、由延吉步兵第八团、汪清县步兵第九团和吉林市教导步兵第二团各抽出一个加强连（附重机枪和迫击炮）编成国境警备部队，直接归延吉地区司令部指挥，担任吉林省东部国境警备任务。吉林市教导步兵第二团第二营（新兵营）抽出的一个加强连（编成四个班），调到珲春县的九沙坪担任国防警备，范围由五家子山起，经36号国境界标、莲花泡山、沙草峰，到最南端张鼓峰一带的国境线。兵力和人员编制为：连长风间荣二（日系），连副小川一江中尉（日系），第一排排长尚国良中尉，第二排排长刘春华少尉，第三排排长王斌岐少尉，机枪排长秋原胜三郎少尉（日系）。连的兵力部署是：五家子山（含哨所）由第一排担任警备；莲花泡山（含哨所）由第二排担任警备；第三排和机枪排驻九沙坪为预备队。各排每半月调换防务一次。每天由驻九沙坪的部队派出骑兵，沿国境线我方一侧巡视。巡逻路线：由九沙坪出发，经莲花泡、三道泡、四道泡、五家子屯后，再返回九沙坪。

1938年5月，日军动员朝鲜军所属的会宁部队到张鼓峰的姊妹峰张其峰修筑碉堡，20多天后撤回。

7月，日本向苏联提出，张鼓峰附近的哈桑湖地区属“满洲”领土，应划归“满洲”，遭苏联拒绝。

7月15日，日军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一行3人，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到张鼓峰附近侦察苏方军事设施。他们由住防川的居民金海南和高云八带路，进入苏境后，让金、高二人放哨，松岛、伊藤等人分头绘苏边境军事设施图。被苏边防军发现后，松岛被击毙，其余2人逃遁，这是张鼓峰事件的导火线。

7月16日，日本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否则采取措施。苏方声明日军侵犯了苏联领土，因而开枪击毙松岛。同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命令驻朝鲜的日本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集中所属部队待命。朝鲜军司令官命令驻罗南的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准备出兵，控制国境线，并部署步兵4个中队、山炮兵2个大队和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

7月17日，中村孝太郎命令尾高龟藏，部队务必于19日拂晓前集中到庆兴、阿吾地一带。

7月2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向苏联政府强烈要求其撤出张鼓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方负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答复：任何威胁吓不倒莫斯科。

苏军加强战备。7月初，苏边防军10余人在张鼓峰西坡构筑阵地，到11日增加到40余人。7月20日上午，苏边防军10名在沙草峰构筑了阵地。苏境沿线公路上军用汽车急增，波谢特港口开进30多艘运输舰。

7月30日傍晚，日军偷渡图们江，集结于防川屯，疏散了当地的老少妇孺，留下18岁至45岁的男子挑水、送弹药。

7月31日夜12时，日军在朝鲜的洪仪里向张鼓峰开炮，第一发落在张鼓峰北坡苏联领土上，第二发落在张鼓峰顶，第三发落在张鼓峰西坡。日军一个大队于凌晨4时40分攻占了张鼓

峰。另一个大队在炮火掩护下于晨6时攻占了沙草峰。日军又向哈桑湖地区进攻。

8月2日至8月6日战斗最为激烈。8月2日，苏军出动10架飞机轰炸了张鼓峰、沙草峰、庆兴、古邑等地。苏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将第四十师主力集中到波谢特湾西部地区，将步兵第三十二师和机械化第二旅调入哈桑湖地区，布留赫尔亲临波谢特湾指挥战斗。8月4日，苏远东军步兵三十二师和机械化二旅的坦克营从南侧向52高地进攻，步兵从南、北两侧向张鼓峰进攻。8月6日下午4点，苏军猛烈轰炸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傍晚，步兵第四十师夺回了张鼓峰。于是日军出动参战全部兵力，发动夜袭，赶走了苏军，重新占领了张鼓峰。

在这5天中，日军受到苏军飞机、坦克和步兵的沉重打击，伤亡很大。加上连日暴雨、洪水猛涨，大桥被冲毁，清津至罗津的铁路、公路由于被轰炸而运输中断。苏军占领了水流峰，通往朝鲜的大桥被苏军控制，苏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严密封锁着图们江口。日军被包围在张鼓峰上，兵力、物资得不到补给，陷入了绝境。这时，日本不得不向苏联提出停战。8月10日夜，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张鼓峰停战协议。协议规定：苏日双方军队于8月11日12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军队维持11日上午12时的控制线；双方国界由苏联代表2人和日“满”代表2人组成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8月11日，日军和苏军代表在张鼓峰阵地会见，进行现场交涉。经过11日下午和12日、13日连续3次协商，决定双方军队从张鼓峰阵地各自撤退80米。8月13日，在张鼓峰东南侧双方交换俘虏和尸体。

在苏日激战期间(8月2日至8月6日)，伪满军和苏军也有小规模战斗。苏军炮火先是射向张鼓峰一带，后来逐渐向北转移，莲花泡山和五家子山也遭到炮火的延伸射击。这样，战斗

由张鼓峰转移到36号国境界标附近。五家子山伪满军哨所的一名朝鲜族士兵将一段炉筒子搁在哨所附近，被苏军炮兵发现，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就向五家子山猛轰，直到将炉筒子炸飞。伪满军也向苏军炮击，战斗时断时续，一直到第三天夜晚。在第36号国境界标的苏方一侧，苏军集结了约一个营的兵力，向伪满军炮击，直到傍晚不停。伪满军判断苏军有夜袭的可能，即集中兵力封锁通向第36号国境界标的大道，并以二道泡、三道泡为天然屏障，隔泡部署了步兵、炮兵和游动骑兵，以防苏军夜袭。是夜只有少数苏军侦察兵来扰，无大部队行动。第2天清晨，在大雾将散的时候，苏军一个营越过第36号国境界标，向伪满军发动强攻。伪满军用迫击炮轰击，用轻、重机枪扫射，以强火力封锁大道。苏军见火力太猛，前面又是开阔地带，未敢冒然推进，接火约1小时后撤回其境内。

张鼓峰战斗打响的第2天，驻延吉市的伪满军步兵第八团急调珲春待命，其第一营急驰九沙坪来援。第3天清晨，延吉地区司令官吴元敏少将到九沙坪视察，当天返回延吉。日苏停战谈判前，伪满军政部代表川岛芳子少将随日本关东军本部高级参谋到九沙坪视察。

据伪康德6年（1939年）出版的《满洲年鉴》载：张鼓峰战斗中，日军死亡158名（其中军官8名），受伤740名（其中军官17名），伤亡共898名。另据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记载：在张鼓峰战斗中，日军伤亡总数1440名，其中死亡526名。攻占过张鼓峰高地的七十五联队伤亡最重，共708名，其中死亡241名。

张鼓峰事件后，日军将张鼓峰一带辟为禁区，强行将洋馆坪、防川、会忠源和沙草峰四屯共140多户老百姓迁走。从此，这一地区变成了无人区。

诺门罕战争的“爆发”

厉春鹏

1939年5月，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和苏蒙军的一场局部正规战争——诺门罕战争。

这场战争从1939年5月4日开始，到9月16日停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伤6万余人。无论空战或坦克战，在当时的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空前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立体战争。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这一片不足600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带，损耗了5.4万余兵员和大量重武器，最后进行了细菌战，但仍然遭到惨败，被迫停战讲和。

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这场战争是日本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寺田利光到贝尔湖“旅行”

寺田利光生于1844年（日本明治23年）7月5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被授予尉官。日本陆军的情报机关为了培训到蒙古地方搞特务活动的人才，选送他到东京外语大学，学习蒙古语和俄语，尔后还学会了汉语。

1918至1919年，外国武装干涉苏俄，企图消灭刚刚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日本派遣了大量侵略军队——西伯利亚远征军。寺田利光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先后到过海拉尔、满洲里和苏联的赤塔、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等地。

1927年，寺田利光受命在海拉尔潜伏，进行间谍活动。公开的身份是日本商社——“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嘱托，住在日本人开设的松江旅馆，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1928年夏天，寺田利光用请客送礼手段，结交了呼伦贝尔镇守使及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他请寺田利光为他儿子教授日语。由此寺田利光逐步扩大活动范围，把手伸向呼伦贝尔牧区。1929年中东路战争时，寺田利光参与了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参谋旅行”，搜集了中苏双方军事情报，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供了呼伦贝尔驻军及全面情况。这期间，寺田利光指挥的间谍猪口三藏、白俄军官阿塔曼、谢苗诺夫、巴其西耶夫、桑巴拉、汉布丁、沙拉、那木斯来、宝彦等经常到蒙古和苏联境内搜集情报。猪口三藏在潜入乌兰巴托活动时，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防部抓获。后来寺田利光发现多次潜入蒙古境内搞破坏活动的沙拉、那木斯来不可靠，就指使人在阿尔善附近将其暗杀。

“九·一八”事变前，寺田利光积极结交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上层人物，常出入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与额鲁特旗总管凌升、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关系密切。

1932年冬，东北军爱国将领、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中将在海拉尔率军抗日。寺田利光积极活动，企图使苏炳文投向日“满”，被苏炳文拘押在满洲里。两个月后，海满抗战形势恶化，苏炳文的部队准备经苏联境内转回内地继续抗战，经凌升、乌尔金说情，释放了寺田利光。1932年末，日军占领呼伦贝尔，寺

田利光公开了他陆军中佐大特务的真实身份。

日本军方为表彰寺田利光的功劳，授予他三等勋章，天皇御赐给他烟草和带有天皇菊花徽记的烟盒，还赐给他皇后和皇太后亲手纺的真绵，以表彰他使日军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呼伦贝尔这块宝地的功绩。这时，寺田利光中佐志得意满，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是蒙古的大王爷了，我等待着指挥军队进攻外贝加尔地区时期的到来。"

进攻苏联外贝加尔并不只是寺田利光本人的设想，而是日本军方固有的打算。1934 年10 月1 日，日本陆军省在军中散发的《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中就说：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本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寺田利光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日军占领呼伦贝尔，为寺田利光的间谍活动和他本人带来了极大好处。如：撤消原来的副都统衙门，成立了伪兴安北分省；任命寺田利光的好朋友——原额鲁特旗总管凌升为省长；成立了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任命寺田利光的好朋友——原布里亚特旗总管乌尔金为司令官；寺田利光担任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兼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顾问，成了呼伦贝尔太上皇。从此寺田利光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自己有公馆、汽车和专用飞机。为了加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渗透，他以新巴尔虎左翼旗公署阿木古郎北4 公里处的阿尔善庙做为搜集蒙古情报的据点，不断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派遣特务。拉拢蒙古东部寺院的反动上层喇嘛，谋求武装叛乱。日本人这些破坏活动从1935 年起，先后被蒙古人民共和国侦破，派去的间谍仅寺田利光的得力助手猪口三藏（此人以随员身份参加了"满洲里会议"）侥幸逃回。

1935 年7 月25 日，寺田利光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令，以

去贝尔湖旅游为名，和女儿寺田英子、兴安北警备军顾问部负责“外蒙”情报的石井和一名差役乘汽车驶向哈拉哈庙。途经甘珠尔庙时与一位喇嘛用俄语交谈了一会儿并摄了影，然后乘车越过乌尔逊河，下午到达贝尔湖西岸的阿萨尔庙（也称阿斯理庙），在此地搭起帐篷住了下来。

7 月 26 日，寺田利光一行乘车沿贝尔湖西南下，途经查干敖包从国境哨所布隆德日斯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寺田利光命令石井站在汽车上观察，自己下车进行了一番“考察”。第 7 团的军官到附近敖包上用望远镜观察后报告：在汽车来的方向出现蒙军的游动哨。寺田利光等人急忙爬上汽车返回阿萨尔庙。

7 月 27 日，寺田利光视察了哈拉哈庙的防务，并在濑尾中尉的坟上献了花，然后回到距哈拉哈庙东 43 公里的阿尔善庙。阿尔善庙原是培养喇嘛大夫（蒙医）的地方，现在成了寺田利光的情报据点。庙里常驻有 5 名兴安北警备军的日本军官，以办蒙民小学校做掩护，从事特务工作。寺田利光在这里综合整理了布隆德日斯国境外的乌兰胡都格、阿达格多兰等地的交通、地形、气候及蒙军国境守备状况的情报，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了初步的作战设想①。

辻政信到诺门罕地区“旅行”

1938 年 6 月 13 日，苏联三等政治大将留希科夫叛逃到伪满洲国吉林省珲春县。留希科夫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总负责人。当时的苏联肃反工作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日

① 1937 年 7 月，寺田利光患脑溢血死在海拉尔。日本关东军为纪念他的侵华“功绩”，在海拉尔头道街公园里为他塑造铜像，封他为“呼伦贝尔之父”。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这个铜像被海拉尔市人民砸倒。

本军方认为，连肃反的负责人都逃离祖国亡命国外，可见苏联远东地区军内肃反运动是何等激烈了。

参谋本部判断，留希科夫叛逃后，苏方定要重新部署边防。因珲春毗邻朝鲜，日本参谋本部就把留希科夫提供的情报，通告了日本设在朝鲜京城（汉城）的军司令部。朝鲜军司令部立即命令陆军第十九师团开往珲春地区。

1938年7月7日，关东军获悉苏联第五十九国境警备队即将加强留希科夫出走地区的阵地工事，即珲春对面的张鼓峰一带。已开进该地区的日军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认为：不能让苏军修好工事，这正是乘隙占领这一带地区的极好机会。如能实现，则将威胁苏联沿海地区的波谢特滩地，从而拖住苏军防守南部沿海地区的部队，最终包围和歼灭苏军。7月30日爆发了“张鼓峰事件”。日苏双方战斗到8月11日正午，双方死伤6 000人。日本人没讨到便宜，反而将“满”苏双方有争议的地方划给了苏联。

1938年7月末，苏军少校弗仑特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叛逃到内蒙古苏尼特旗。弗仑特少校是苏联远东军驻蒙古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的军械部长，从弗仑特提供的情报得知：

1. 苏军步兵第三十六师现驻蒙古南部边境城市扎门乌德。

2. 蒙古军队以10个骑兵师为主编成3个军，总兵力1.5万人。缺乏大炮，服装比苏军好。

8月下旬，蒙军骑兵第六师宣传科长宾巴大尉，从塔木察格布拉格叛逃到伪满洲国的呼伦贝尔，提供了蒙古国内的肃反情况及苏联军队进驻的消息。

综合情报机关已经掌握的及留希科夫、弗伦特、宾巴等人提供的情报，日本参谋本部详细地了解到了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清洗和蒙古近年来肃反的真实情况。

两年来，苏联红军中约2万余名各级指挥官遭到清洗，5位元帅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2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果罗夫以及远东方面军司令、张鼓峰战斗时指挥苏军打败日军的布留赫尔元帅都被处决了。15名集团军司令有13人被清洗；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清洗；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清洗；406名旅长有220名被清洗。

这个数字实在使人震惊，就是说约有70%的军长、60%的师长、50%的旅长和20%到25%的其他指挥人员遭到清洗。未被清洗者中之大部，当然也是惶惶然不可终日。红军武装部队失掉这样一大批有经验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还能有效的进行战斗吗？英国首相张伯伦和英法总参谋部认为："1937年的清洗，使苏联军队内部四分五裂。"日本参谋本部也持有同样的评论，认为这是斯大林为了巩固他个人权力而不惜除掉对他有威胁的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

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在进行大清洗。蒙古部长会议主席耿冬，军政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杰米德，参加"满洲里会议"的蒙古代表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桑布等一批党政军要员在肃反中被处决。10名骑兵师长及一些军队指挥员被枪决。1937年8月至10月是大逮捕的高潮，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地方干部、军队指挥员、各寺院的上层喇嘛，约有1万余人被逮捕。苏军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进驻蒙古，其目的之一是确保蒙古肃反运动的开展。

关东军司令部认为，占领蒙古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二三年内，苏蒙军队难以恢复元气，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按照关东军的战略设想：占领乌兰巴托后，进一步向恰克图推进，尔后切断贝加尔铁路隧道，从而使远东地区与苏联内地失掉联系，以占领苏联远东地区。

为了衡量作战计划实施的可能，特派司令部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到“满”蒙边境的诺门罕地区“旅行”考察。

辻政信少佐到海拉尔后，选了30名兴安北警备军和20名白俄陪同他“考察”。对清代呼伦贝尔赴北京两条大道中间边境地区的气候、土质、道路、河流、高地以及牧民点等进行了详细的察看。

中东铁路通车以前，从海拉尔进京之路，除沿东南经齐齐哈尔驿站进京一线外，还有从海拉尔向西南经草地进古北口、张家口进京之路两条，称古北口大道和张家口大道。因为这两条大道均经蒙古草地，亦称之为草原路。张家口大道是从海拉尔向西南行195公里到达乌尔逊河，渡河后向西南行45公里到达布隆德日斯卡伦（边境哨所）。由此行25公里经乌兰胡都格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尔后，经塔木察格布拉格、穿越蒙古人民共和国走张家口，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全程1 675公里。古北口大道是从海拉尔向西南行180公里到达诺门罕，再行20公里渡过哈拉哈河进入蒙古境内，尔后穿越蒙古，过长城古北口，经密云、顺义，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全程1525公里。

所谓两条大道的中间地带，是指乌尔逊河左岸（东岸）和贝尔湖东北至诺门罕东南罕达盖图河一线地区。乌尔逊河左岸西北边境地区，寺田利光大佐于1935年9月已“旅行”过。后来，涩谷大佐的支队又由此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遭到失败。因此，这次“旅行”的重点，就是诺门罕地区。

旅行的结论是：从海拉尔通往哈拉哈河以西的地域，正是古代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军路线。沿这条路线从东往西推进时，后方供应方便，有海拉尔到将军庙、海拉尔到甘珠尔庙、将军庙到甘珠尔庙、阿尔山经罕达盖到将军庙等自然土路，均可通行汽车。由海拉尔铁路车站到达哈拉哈河仅200公

里。沿途没有较大河流，只需搭几座工兵舟桥，大兵团就可以顺利通过。而由西向东通过时，虽然广阔的草原有利于苏军战车的行动，但是来自西方敌人的后方补给线却是漫长而困难的，如从苏联最近铁路车站博尔集亚到达哈拉哈河的距离是750公里。因此，不利于敌人大兵团作战。还有海拉尔的要塞工事及大兴安岭的天然屏障都是敌人机械化部队的障碍。因此，关东军在海拉尔以西“满”蒙边境地区作战，进可攻，退可守。进攻出发地的最佳地点，就是诺门罕以西的哈拉哈河东岸的登陆场。

这次“旅行”结束后，伪满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7团奉命在哈拉哈河东岸有争议的地区部署了一个连骑兵。

苏联第57特别军进驻乌兰巴托

1938年10月，驻赤塔的苏联远东军第57军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改成第57特别军。所以冠以“特别”二字，是因为该军直属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指挥，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

第57特别军编成如下：

军长	H·B·费克连科	中将
政委	M·C·尼基舍夫	少将
参谋长	A·M·库谢夫	上校
摩托化步兵第36师师长	彼得罗夫	少将
第11坦克旅旅长	雅柯夫列夫	少将
第7装甲旅旅长	列索维伊	少将

关东军采取“果敢行动”

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第二十三师团，接到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七团郭文通上校的报告后，经过分析判断，认为战机已到。

首先，边境战斗已达到团一级的规模，只要用武力稍加诱导，战斗即可升级。其次是天气渐暖，草原土地干燥，在雨季到来之前还有两个月时间，正是用兵的良好时期。如果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入冬以前的6个月内，将能达到一切目的。于是，全师团动员起来，进行战斗准备。

在师团司令部作战室里，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听着作战主任村田昌夫中佐报告："已经向军（关东军）司令部发出详尽的电报；已命令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将该军第八团立即开往诺门罕支援第七团；该军其余各团速到海拉尔集结；已命令东八百藏中佐到司令部接受指令；已通知驻海飞行大队到哈拉哈河上空侦察支援地面作战；已……"

小松原中将听着汇报，一边在思索着：几天前刚刚组织全师团的军官研讨，领会军司令部下达的《满苏（蒙）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的精神实质，会上气氛热烈，将佐们高呼万岁，大声喊好。凭着过去特殊工作的嗅觉，他相信自己已经理解了军司令部甚至大本营的意图，已经敏感到盼望已久的军事行动终于来临，这一行动关系着他毕生的前程。如果军事行动顺利，蒙古或西伯利亚总督之类的桂冠也许就戴在了他的头上。他是有这个资格的，在陆军里还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深入地研究过蒙古和苏联的远东。当然军事行动中会有风险，当年涩谷大佐在前出塔木察格布拉格的军事行动中就遭到了惨败，弄得身败名裂。但是，军事行动哪有不担风险的？他有这个勇气。现在，他在指挥着一个完整的师团和其他部队，并且军司令部已经许诺如发生战斗将全力支持决不后退。比起张鼓峰战斗中的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来，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谋略和勇敢的气魄来执行这一伟大的能够载入史册的行动。况且，比较起1936年3月涩谷大佐的出兵，无论气候、时间、兵力、皇军对蒙古的战

略态势和国际的良好形势（指日、德、意同盟）等都要胜过几倍，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苏联和蒙古刚刚进行了“大清洗”，红军的指挥机构和战斗力的损失，那是日军用几十个师团也难以做到的。对天皇陛下的皇军之花——关东军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机会不可错过。苏蒙正规军将不堪一击，或者不会坚持多久，蒙军后方就会发生混乱。如果他们的情报来源可靠的话，第二十三师团将在蒙古大显神威，而这一切将要通过他——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去推动运行。想到这些，他真有些飘飘然了，尽管做过多年情报军官，但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满意地听取着村田参谋的汇报，手指则不断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进军鼓点，指关节在感受着马蹄践踏草地千军万马冲杀呐喊的神威。

“报告”！小松原将军的思路被打断了。第二十三师团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来到，听取师团长的指令……

5月13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收到第二十三师团长的电报，电文如下：

1. 5月12日，蒙军700人配有装甲车，由哈拉哈河越境，在诺门罕地区与满军一部接触，蒙军后方仍有增援迹象。

2. 师团派出搜索队主力两个中队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一齐出动，把入侵蒙军歼灭。

海拉尔部队的汽车及民间征用的汽车，全部用来军运，今后在海拉尔抽不出汽车。

3. 尔后还要往诺门罕增兵，需要汽车100辆。

为了防卫侦察，请急派侦察机。

目前在海拉尔的满军只有300人，已全部上了战场。

小松原中将这个电文，已把哈拉哈河作为边境线，电文的

实质是准备大战，要求增加飞机和汽车。关东军司令部是怎样对待这纸电文呢？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部编成是：

军司令官	植田谦吉	大将
军参谋长	矶谷廉介	中将
副参谋长	矢野音三郎	少将
作战课长	寺田雅雄	大佐
作战参谋	服部卓四郎	中佐
	村泽一雄	中佐
	辻政信	少佐
	岛贯武治	少佐
航空参谋	三好康之	中佐
情报课长	加藤	中佐
通讯课长	矶矢	中佐
社会课长	片仓衷	中佐

当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的参谋们接到小松原中将的电报后，欣喜若狂，他们经过一年来的精心准备和培育的种子，终于在西北边境破土而出。这封电报如同含苞待放的蓓蕾，很快就会绽开血红的胜利花朵。会议很快作出决定：立即满足第23师团的要求，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赴战地视察。

5月13日晚，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飞行第十战队轻轰炸机1个中队、飞行第二十四战队战斗机2个中队、第四十八和第五十一飞行场大队、汽车2个中队（每中队44辆卡车）立即开往海拉尔。

（摘自《诺门罕战争》）

诺门罕战事回忆

正珠尔扎布

一、诺门罕一带地形情况

诺门罕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即海拉尔南方稍偏西约180公里处。诺门罕地形复杂，大小沙丘很多，起伏不平，不像巴尔夏嘎尔大草原那样一望无际。此处人烟稀少、寂寞荒凉，在横贯草原的哈拉哈河（宽100至150米，深1.5米至2米）前方的赫尔斯台河一带。这里除了河流以外很难找到水源。虽然有详细的军用地图，但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1939年，日苏的诺门罕战争就是在这一带发生的。

哈拉哈河左岸，苏、蒙军方面的地形是以哈穆尔达巴高地为中心。沿哈拉哈河左岸都是高地，从高地后面直到苏、蒙军根据地塔木斯克宝洛克，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大草原，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好。从地形上看，对日"满"军方面是不利的。

二、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诺门罕事件于1939年5月4日发生在"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贝尔湖东方，巴尔夏嘎尔附近。由于国境线不明确，马群因遇暴风雪迷失方向越境，双方国境监视队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其后，于5月11日在诺门罕附近又一次发生了冲突，事件逐步扩大，因此，称为诺门罕事件。诺门罕事件曾一度中

断。兹分做第一次诺门罕事件（5月上旬至6月上旬）、第二次诺门罕事件（6月中旬至停战）来叙述。

三、诺门罕事件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

上述这种国境线上的小冲突，不仅在诺门罕一带，伪满成立后，在西北国境线上，以及贝尔湖、哈拉哈庙一带也曾发生过。据日“满”方面的统计，伪满洲国成立后类似事件曾发生过400余次。

早在1934年，日“满”方面即向苏、蒙方面提出召开“满”蒙国境划定会议的建议。数次交涉谈判的结果，双方同意在满洲里举行“满”蒙国境划定会议，这就是所谓“满洲里会议”。会议前后开了半年多，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未能达成协议。

日寇在伪满成立不久，就怀着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野心。它的王爷庙（乌兰浩特市）陆军特务机关（历任特务机关长为泉铁翁中佐、金川耕作大佐等）、阿巴嘎特务机关、海拉尔特务机关（历任特务机关长为寺田利光大佐、亲薄正锐中佐、天野中佐等），都派出特务间谍专门搜集苏、蒙方面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

诺门罕战争失败后，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向关东军建议，在王爷庙建立成吉思汗庙。利用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心理，拉拢和吸引伪满洲国外的蒙古人，企图借此使蒙古民族对日本和伪满产生好感。他们号召蒙古民族以成吉思汗庙为中心，团结起来。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从思想、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阴谋。

当时，尽管日本和英、美之间关系紧张起来，日本“南进”和“北进”方针尚未确定，但战略方面仍指向苏联。这个

事实在诺门罕停战一年多以后，日本关东军所举行的秘密特别大演习“关特演”就能看出来。“关特演”是历时一个多月的百万大军的演习，是规模巨大的一次对苏作战演习。

1938年4月，日本关东军规定了《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要纲”明确规定：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区域，该区防卫司令官可以自主地认定国界，遇到这个国界被侵略的时候，不要错过机会予以回击。

这样片面的决定，必然会引起国境线上双方不断的摩擦，日军可借以搜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政、经情报。但是苏联方面每次都调来优势兵力给日“满”军以打击，使日寇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日寇为了扭转挨打的局面，不得不逐次调兵遣将，遂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诺门罕战争。

1936年发生的所谓“凌升通苏事件”，也是为掩盖日寇在国境上被打败的事实而制造出来的。

1943年，驻齐齐哈尔日本军司令官阿南大将和驻五叉沟师团长笠原中将在王爷庙会谈时，笠原曾说：“我们（指五叉沟、海拉尔伪满西北部方面）是助攻，负担不大；东部（指绥芬河、宁古塔一带伪满东北部）才是主攻方面。”这番话可以看出日寇的战略方针（谈话当时我也在座）。诺门罕战争的扩大，为日军始料所不及。

四、日本军情况

诺门罕冲突一天比一天扩大而紧张起来。日军动员了小松原第二十三师团、冈崎部队、山县部队、长野部队、古闲部队、片山部队及其他部队3万多人。苏、蒙军方面也增加了更优势的机械化大部队，日军因而又调来了大批军队。如：驻公主岭的安岗战车兵团、野口雄二郎的飞行联队、本国千叶县的鹰司炮

兵旅团等和其它部队。

激烈战斗地区是：付伊高地、诺若高地、赫尔斯台河两岸。

战线日益延长，兵力不断增加，日本关东军增派了关东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大佐和辻政信少佐担任现地作战指导参谋，采取了攻势。8月战火激烈化，双方投入了大量军队，成为一次现代化的战争。

五、伪满军情况

伪满军方面参加战争的有：伪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中将指挥的乌尔部队，军事顾问市村中佐、参谋长丹巴上校、作战参谋南博中校，配属兴安骑兵第一团（团长敖瑞平中校）、兴安骑兵第二团（团长何维成少校）、兴安骑兵第七团（团长郭文通中校）、兴安骑兵第八团（团长索特诺布上校）等部队，担任右翼作战。

临时编成的、由野村登亀江中将指挥的兴安师担任左翼。该师军事顾问为野田又男少佐，参谋长后薄外马上校，作战参谋曾根崎清臣中校，情报参谋堀内章少校，专属副官中尾中尉，配属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上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中校）、炮兵团（团长平川森中校）和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等部队。

伪满军后方补给点是阿尔山。兴安骑兵第十团受阿尔山兵站监部指挥。乌尔金部队和兴安师的士兵全部是以蒙古族人编成的。其他参战的部队还有：伪第三军管区石兰斌少将指挥的第三教导队、炮兵营（营长亲薄中校）和第三汽车队等，这些部队是以汉族人编成的。

诺门罕事件发生时，我在奉天（沈阳）伪陆军中央训练处

专科学习。由于诺门罕战事扩大，专科学习中止。兴安军管区派来的日本同学曾根崎中校和堀内少校分别被任命为新编兴安师作战参谋和情报参谋，蒙族同学哈斯巴特尔（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正珠尔扎布上校和白俄同学郭索夫中校等被派往新编兴安师司令部实习战场任参谋勤务。哈斯巴特尔中校被留在王爷庙，办理收容归还兵（逃兵）工作，其余4人到战场实习。我因病晚到半个月。我们4人的任务是实习性质，不负任何具体职责。

六、诺门罕战争结果

伪满兴安师撤退后，在巴尔夏嘎尔草原，日、苏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的飞机和战车构成了立体战。战场上出现了火焰喷射器。日军战车兵团的战车形体小，性能不良，故障频繁，与苏军相形见绌，因而被歼。日军穷途末路，令士兵抱着火焰瓶，进行肉搏，伤亡惨重。日方准备从日本内地调旭川师团和札幌第七师团（新式装备师团）参加战斗，还没来就停战了。

诺门罕战争的规模相当大，以巴尔夏嘎尔草原为中心，双方隔着哈拉哈河，打了几个月，最激烈的是8月。仅这一期间的激战，据日方正式统计，伤亡1.8万余名。

七、诺门罕停战

日军方面原没有预料到苏、蒙方面有这样强大的机械化战斗力，当时还在研究着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所以有人说：诺门罕事件是日本“南进”或“北进”的试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侵华日军陷入泥坑，拔不出腿来，所以日本不愿在诺门罕方面作大量的消耗，

陷入大规模的战争。因而，日本求其盟国德国向苏联提出讲和。这时希特勒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军队开进捷克和波兰。据说，德国在苏联国境已集结了百万大军，苏联在德国的威胁下，接受了对日讲和，9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诺门罕战争失败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责难军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小松原师团长在巡视阵亡部下的坟墓后，自杀而死。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诺门罕战争亲历记

胡克巴特尔

1939年5月，在我国东北的西北部边陲的诺门罕地区，爆发了一场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对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实际上是日本与苏联两国的战争。

诺门罕战争开始时，我正在沈阳东陵（东山嘴子）“中央”陆军训练处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战术专科）。全班30名，都是从各部队派遣来的校级军官，其中“兴安军”派遣的6名学生是：正珠尔扎布上校、曾根崎中校、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

6月19日的午后，主任教官来到课堂，领上我们从“兴安军”来的6名军官到学校本部。真井少将对我们6人说：“现在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来电报，调你们6人即刻回到郑家屯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听候调遣。”宣布我们暂时休学。我们请求安置家属

后于6月20日出发。

6月20日午前，我准备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装：手枪、望远镜、水壶、图囊、雨衣等，还带上照像机和十几个胶卷，打算拍摄战场照片。12时左右与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中校按集合时间到了沈阳车站，这时，正珠尔扎布上校、曾根崎中校、堀内章少校已先到车站等候我们。

是日，阴云密布，细雨蒙蒙。午后2时左右，乘沈阳直通北安的列车，向郑家屯进发。一路下着雨，大约晚12时左右，到达郑家屯车站，冒着大雨去一家日本旅馆投宿。

6月21日，天仍然阴得黑黑的，小雨不停地下着。我们乘马车到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见了军事顾问野田少佐。他展开地图给我们介绍"敌我情况"。他说："自从5月初在西北部诺门罕地区发生战争以来，日军击退数次苏、蒙军不法进攻。截至5月末，击落敌机60余架，击毁坦克30余辆，装甲车10辆，击毙敌军2 000余名。6月中旬以来，苏军约二三个狙击师团配合蒙古军，在大批坦克、大炮和空军的掩护下深入我境内，在诺门罕一带占领了阵地，修筑了各种火器掩体和散兵壕，并在哈尔哈河上架设两座水下军用桥梁。目前苏、蒙军还在继续增加。苏军前线总指挥官为朱可夫中将。日军为了贯彻日满共同防卫的使命，保卫满洲国领地，以果断的行动，给敌人严厉打击，彻底粉碎苏蒙军进攻，将其驱逐出境。"

命令的概要是："兴安师"迅速出动，于6月25日前到阿尔山集中，受日本安冈中将指挥。正珠尔扎布上校、曾根崎中校、白云航中校、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胡克巴特尔少校等6人为"兴安师"参谋，立即出发赴阿尔山兴安师司令部集合。

我们接受命令后回到参谋处，每人要了一组20万分之一的战场附近"国境"线一带的地图，他们回旅馆，我冒雨去司令

部王新之上校家中。他对我说："这次战争，日军和兴安北省的警备军损失相当严重，战局不好估计。"到了旅馆，正珠尔扎布说他妻子有病，向野田顾问请了10天假，迟去前线。我心想，正珠尔扎布真有办法。

6月22日11时到王爷庙（即乌兰浩特）车站，上车下车的都是军人，已经有了战争气氛。进来几个日本人，前边是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事顾问兼王爷庙特务机关长泉铁翁中佐，后面跟随几个人，都穿着雨衣，带着手枪，腰间横插一把日本武士刀，穿着军不军、民不民的不三不四服装。他对白云航中校说："你不必去前线，留在王爷庙另有任用。"这样就将白云航中校留在王爷庙了。后来才知道白云航曾在苏联基辅骑兵学校学习过，日本人对他不太放心。火车一直向西北开进，过了索伦车站，列车员放下窗帘，不知道是防空措施，还是不让人看见外边情况。晚9点多钟到了阿尔山车站，蒙蒙的细雨，仍然下着。站台附近的道路上，杂乱地来往奔驰着汽车、大卡车和成队的坦克。十几条探照灯的强烈光芒，穿透密密层层的积云，巡视着天空。维持交通秩序的是一个头戴钢盔、手执步枪、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走进票房不久，来了两位接站的军官，自称是兴安师司令部的，把我们领到温泉的北山坡上一排木房子里。饭后，曾根崎中校到大和旅馆（阿尔山的日本旅馆）见师长和参谋长去了。

6月23日早晨满山云雾，街上一辆汽车也不见，鸦雀无声，昨天夜间的那些卡车和坦克不知到哪里去了。火车站和大和旅馆屋顶上的对空监视哨正用望远镜向四空观察探望，军官们在大和旅馆进进出出，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8点多钟，曾根崎中校才随着师长、参谋长来到我们这里。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过去曾经给我当过战术教官，50多岁，黑瘦干瘪，是个须发苍白

的小老头。师长是日军的现役中将，50岁上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长着一个突出的红鼻子，挺着胸脯，大有“征服世界”的神气。不一会，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装着军用帐幕、行军锅、汽油、粮食、罐头等等。师长命令上车，汽车一直向西北方向前进，不知往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兴安师部队在哪里。中午，汽车开到伊尔施，没有停止继续前进。又走了约有两个小时，望见前面泥泞道路上，有一二百辆卡车和坦克正在前进，还有几辆卧车，不少小吉普往来奔驰。我才明白昨天夜间在阿尔山车站的那些车辆都来到了这里。这就是安冈坦克师团的全部兵力。我们汽车跟着这些坦克走了一段路。坦克部队转向正北，向宝格得敖拉方向去了。我们仍然顺着原来的道路走去。

6月24日。在云雾笼罩的黎明，我们拆除帐幕，整装起营。卡车走上辽阔的草原，高速向正北方向前进，午前8点多钟，到靠近北山坡的两间小土房跟前，停住了车。这便是“兴安师”的集结地，有名的罕达盖。这地方四面环山，东、南、西三面山上密密地生长着松林，中间形成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草甸和湿地。

两间小土房是日军安冈司令官的临时司令部，我们在小土房的东侧附近山坡上选择了一块草地，架设了四个帐幕，师长和参谋长住一个帐幕，无线电台占用一个帐幕，我和阿勇巴图中校、堀内章少校、曾根崎中校、佐藤上尉副官5人一个帐幕，另一个帐幕里安置了军需后勤人员。午后又下起雨来，派曾根崎中校为联络军官，与日军司令部联系，受领命令。

“兴安师”的各部队，还没有到来，日军从海拉尔方面来的军队都集结在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空军基地在将军庙和阿木古郎。阿尔山方面的军队都集结在罕达盖以北宝格得敖拉附近。

6月25日，下着细雨。日军的小型坦克和军车向北方搜索

敌情。南方洼地草甸子上，有几十名日军试放“火焰放射器”，象射水一样，喷射出熊熊火焰。

沈阳梁濑部队的汽车30辆和3辆装甲车，配属给“兴安师”，担任后方运输工作，陆续从阿尔山运来弹药给养。我们把运来的弹药和给养，都疏散隐蔽在西山坡松林中间。司令部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钢盔，一副防毒面具。副官没有给师长准备，野村中将大发雷霆说：“在战场上不先给师长准备钢盔和防毒面具，是最坏的一件事情。”副官赶快把自己的钢盔和防毒面具奉上，师长这才消了气。

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最初指定“兴安师”的集结地在阿尔山，后来安冈中将命令在罕达盖集中。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紧迫，准备忙乱，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第五团和迫击炮团，半数以上都没有马，临时现派人去海拉尔、王爷庙的乌兰毛都等地派购军马。部队迅速出发，准备在集结地补充鞍具马匹。

6月26日到29日。汽车运输部队到罕达盖，徒步行军的部队也陆续来到，在海拉尔和乌兰毛都派购的军马1 000多匹，途中受到空袭，跑失、死伤100余匹，勉强赶到罕达盖集结地，补充到各团去。这些新军马没有调教训练过，有的是没有骑过的生马，士兵们开始骑乘训练。

这几天师司令部忙于分配补充弹药，编整部队，制定作战计划。

“兴安师”是不久前新组建的，上自师司令部下至各团队，除了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导团和伪兴安骑兵五团是原来的建制而外，其他团队都是临时从各部队抽调编成的。官兵之间互不相知，有的士兵不知道连长叫什么名字，更提不到有什么情感。加上部分军马生性不驯，造成许多困难。虽然如此，到6月29日为止，各部队的编制和一切作战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6月30日，雨停云散，天气晴朗。中午12点日军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的概要是：在罕达盖以北宝格得敖拉附近和将军庙附近集结的各部队，于7月1日拂晓开始前进，沿着胡拉斯台河两岸向巴尔善嘎拉、诺尔台高地进发，对盘踞在诺门罕高地一带的敌军，以果断的行动，给予彻底歼灭，军主力攻击重点为巴尔善嘎拉高地。兴安师协同军主力行动，在军主力左翼向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地进击。

根据日军司令部的命令要求，“兴安师”于本日下午4时左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的概要是：掩护日军左翼安全，于6月30日24时由罕达盖集结地出发，经达尔汗山向胡拉斯台河左岸的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地前进。行军序列：兴安骑兵第五团为左侧纵队，教导团为前卫部队，本队（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兴安炮兵团、迫击炮团）、后卫部队、兴安骑兵第四团的顺序前进。左侧纵队和前卫部队各派军官斥候（军官侦察）一组。

7月1日，部队正在前进的时候，忽有左侧卫第五团报告发现敌方装甲车。师长命令继续前进。师司令部越过一道漫长的山岭，瞭见一片草原，远处还有一个大湖，师长说：“这是不是查干诺尔湖?”派我去了解湖水情况，我便离开本队，和昭德宝二人向东北湖水的方向走去，中午12时左右才到湖边，打开地图对照，不是查干诺尔湖，好像查干诺尔湖西南方的一个咸水小湖，湖边不知在什么时候死掉一匹马，有十几只苍鹰秃鹫麋集在尸体上“会餐”。我们二人找到湖边一块高处草地，喂了马，我们也吃了一点饼干后向正西方向去追赶部队。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午后7时左右到达了达尔汗山，部队正在山上安排露营。我向师长报告了湖水情况，发现师司令部坐着一名俘虏的苏军中尉。原来苏军的一队侦察兵、三辆装甲车、

一辆卡车和我军左侧卫第五团遭遇，并被第五团包围，装甲车突围跑掉，卡车上的12名士兵全被击毙，俘虏了中尉军官。这时，达尔汗山西南方山岭上发现几十名敌军，并以两门炮火向达尔汗山南方湿地进行炮击，阻挠我军士兵下山取水，控制水源。同时还有3辆装甲车，利用林缘地带向我军驻地搜索。兴安师只派出几组爆破组和两门平射炮，阻击进行侦察的装甲车。

7月2日4点多钟，师司令部召集各团队长和司令部参谋副官传达作战命令："继续向诺尔台高地南方三角标高高地急进。为便于展开，随时随地攻击敌人，分两个纵队分进。左纵队：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兴安骑兵第四团、迫击炮团，纵队指挥官为第十二团团长田中上校。右纵队：前卫兴安骑兵第五团、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兴安炮兵团、教导团。胡克巴特尔少校为左纵队斥候长（侦察队长），带骑兵一个排，在左纵队前头搜索前进。阿勇巴图中校为右纵队斥候长，带骑兵一个排，在右纵队前头搜索前进。两纵队的军官斥候于晨5时出发。各团队于晨6时出发。师长在本队前头行进。"

我接命令后，即带第十二团第一连的第二排（排长日本人森中尉，三个班共40多人），携带轻机枪两挺、掷弹筒4个，每人三四枚手榴弹和十数颗反坦克地雷。我带领一排骑兵，两组搜索兵，顺着松林深处，灌木丛间，隐蔽前进。是日赤日炎炎，途中一点水源也找不见，出发前所带的一壶水，差不多喝光了，12时左右，远远听着从诺门罕高地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望见升起一片片的黑烟。东北方向聚起一片黑云，雷电交加，派出的搜索兵报告，前方发现"敌人"装甲车3辆、卡车2辆向我们冲来。森中尉要以全排展开攻击，我说不行，必须迅速占领阵地。我把部队带进右方沙丘中间的两个盆坑里，利用密密层层的河柳灌木，将马匹隐蔽起来。然后向敌人装甲车前进方向，派出

了3个爆破组，每组两名，由森中尉带领，埋伏好了。并命令士兵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准备在距离拉近后，一举歼灭“敌人”。敌人进入前面的沙丘后面，把汽车隐蔽了。沙丘上发现十几名散兵，沙丘左侧出现两辆装甲车，右面又出现一辆装甲车，向我们左右两侧包围而来。距离我们五六百米开始机枪射击。根据弹道判断，没有发现我们，我坚决保持一枪不放，引诱他们再前进。可是双方对峙一个多小时后，忽然“敌人”装甲车转回去了。沙丘上的散兵不见了。我很奇怪，马上派人尾追搜索，才明白敌人是发现了我军主力部队赶到而跑掉的。我迅速前进。到午后6时左右，离诺如台高地大约还有30余公里，前方沙丘起伏，灌木丛生，只有呼拉斯台河附近传来一阵一阵的炮声，除望见一片云烟而外，看不出任何“敌情”。师主力和左纵队停止在沙丘高地附近，我回到师司令部向师长汇报了情况，这时野田顾问也来到司令部。他担任兴安师的军事顾问。曾根崎中校建议:“目前地形复杂，敌情不明，敌人的阵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布署如何，在我们还没有十分了解以前，不如把马匹安置在后方，各部队以开进队形前进，多派几组徒步斥候兵，进行周密侦察，比较稳妥可靠，盲目前进，会受损失的。”师长不同意他的建议，说:“我是师长，听我的。”决定仍按现在队形继续前进，在什么地方遭遇，就在什么地方展开战斗。重新部署了部队，右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左第一线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第二线师司令部、独立骑兵连、伪兴安炮兵团、迫击炮团、伪兴安骑兵第四团、教导团为预备队。各部队根据部署，分作三部梯团，全部乘马，以开进队形向西北前进。下午8时左右，师长命令各线部队按前进队形就地露营，并向前方派出二组军官斥候，侦察敌情。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和第五团各派前哨连一个。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向左侧方派出一个连，占领阵地，掩

护部队露营地。各前哨连占领阵地作好警戒后，又派出军士哨、复哨，潜伏在各个要点，保证部队露营安全。

我在司令部附近一处柳树丛下休息，第五团的团副德勒格少校来了。我们两人坐在树荫下，谈论这一天经过的事情。德勒格少校1937年攻击大同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立过多次大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猛将”，不识字，土匪出身，迷信佛教。他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战斗，今天下午第五团骤遇雷雨，雷击伤了1名少尉和2名士兵，其中1名死去，战马击死两匹。还没有作战，先遭雷击，老天爷不容，违犯天意不会有好结果。”我说：“敌我装备悬殊，这个战斗后果难说，但事不由己，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两人取出剩余的一点白酒，狠狠地喝了几口，吃了几块饼干。德勒格少校又说：“昨天有川副官出斥候，要我的马骑，我不给，他对我发脾气，我抽出手枪要枪毙他，吉野少校出来劝解开了，日本人太欺侮人。”我说：“你忍耐一点吧！在战场上，日本人急了眼，什么缺德事都会作出来的。”我们谈到深夜，他离开我走了。

7月3日，虽然夜间进行了侦察，但对敌情仍不太清楚，只知道离敌人阵地不远。由于夜间下了一阵细雨，拂晓时云雾弥漫，在几十米的距离内，什么也看不见。师长命令按昨天部署的队形前进。上午8时左右，太阳上升，云散雾消，前面部队都在马上，正以密集队形前进。突然前方出现几十挺机枪不停地扫射，我军第一线骑兵，纷纷应声落马。这时从哈尔哈河与胡拉斯台河汇流的方向（我军右前方），先是几门炮后来增为几十门向师司令部、第一线、后方部队猛烈炮击，炮弹落在我们左右前后，溅起高高的沙土，烟火冲天，对面不见人，战斗开始了。与此同时，100余架苏军飞机，从哈尔哈河西岸高空袭来，遮天盖日，日军高射炮开始射击，炮弹在苏军飞机编队的前后

左右开了花。日军飞机由将军庙方向飞来，空中大战开始了。师长命令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增加到第十二团左翼，伪兴安迫击炮团增加到第五团方面，伪兴安炮兵团在师司令部左侧进入阵地，开始射击。师长命令我去后方迅速用卡车调运教导团到前方，迂回到苏军阵地右侧进行攻击。我骑上马飞奔后方补给所，遇见了加藤上尉（原第五团连长，1937 年攻击大同时出名的猛将），我要求加藤上尉协助我往前线运输教导团的工作。我和他带领 11 辆卡车到教导团所在地，向金永福团长传达了命令，把教导团的部分士兵载上卡车，由金永福上校指挥，另一部分乘马出发，由团副笠田少校指挥，我和加藤上尉坐在第一辆车上，带部队迂回前进。途中遭到了苏军大炮频繁阻击。卡车以最高速度冒弹前进，终于插入苏军阵地的右翼，展开了侧面攻击。我等到教导团全部展开战斗后，便和加藤上尉坐上卡车返回补给所。下午 7 时左右回到师司令部，忽见两个人戴着钢盔坐在掩体里吸烟，仔细看时，一个是治安部最高顾问平林盛人少将，一个是高级顾问小川大佐，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这时第一线的各部队，仍在紧张地战斗，未能前进一步。10 点来钟，苏军炮击停止，我们缓了一口气。师长决定：今晚各线部队利用夜间，接近敌人，明天拂晓，一举夺取阵地。由于苏军侧射炮兵火力严重地威胁着我军第一线部队和师司令部，遂命令教导团从我军左翼撤出，转移到右翼，利用夜袭夺取西北高地，掩护师主力拂晓攻击。

是夜，第一线的正面，阵阵传来激烈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哈尔哈河与胡拉斯台河的汇流点方向，远远传来隆隆炮声，火光冲天，是日军进行夜袭。师司令部随着第一线部队，逐步向前移动着。拂晓时苏军全部撤退。不知道是有意放弃阵地，还是由于我军猛攻而被迫撤退的。我军第一线各部队

乘胜追击前进，大约深入二三公里。这时教导团早已占领了西北高地。

7月3日，“兴安军”官兵伤亡100余人，军马50余匹。

7月4日早晨，在胡拉斯台河汇流点，巴尔善嘎拉高地方向，隆隆炮声，从昨夜以来，一直未停。成群的苏军飞机，从西方高空一批又一批地掠过我军上空向将军庙、阿尔山方向飞去。午前七八点钟，苏军步兵约2000余名，坦克20余辆，向我军进行反攻。伪兴安炮兵团在师司令部的左侧南方沙岭附近进入阵地，猛烈地开炮射击，支援第一线的战斗。但是我们的大炮都是日军不用的陈旧品，射程近、命中率低，加上炮兵阵地在一片沙岭后面，又没有很好的观测所，对苏军后方远射程重炮兵群基地根本射不到，对苏军第一线的炮兵阵地，又看不见、找不到。只有对反攻来的散兵和机枪阵地进行制压射击。可是在发射中，招来苏军远射程野战重炮的集中炮弹，不得不迅速转移阵地。比起苏军的大炮，我们的炮筒直像小孩玩具一样。午后2点多钟，我军炮兵正在射击，突然苏军的炮弹像骤雨冰雹般地倾泻在兴安军炮兵团的阵地上，炎炎大火，团团黑烟，直冲天空。有的炮身炸碎了，有的炮车轮炸飞了，弹药起火，自己在爆炸，炸得尸横遍野，血染黄沙，官兵们潮水般退下来。师长和参谋长都慌了，忙派阿勇巴图中校和堀内章少校去阻止，二人骑马跑去，好歹阻止住了。可是12门大炮一半受到损害，官兵伤亡很大。从此兴安炮兵团成了有名无实的单位，溃不成军，只好搞些偷偷摸摸的行动，在这里放几炮，赶快又跑到那里放几炮，再不敢明目张胆地暴露位置和“敌人”炮兵对战了。

午后六七点钟，钱家店军官学校候补生蒙古族学生少年队80余人，坐着卡车来到师司令部，都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儿童。据说是领他们来战场参观学习的，他们穿着肥大的军装很不相称。

使用的步枪差不多高出他们一头，师长命令他们和独立骑兵连一起保卫师司令部。这些离开父母怀抱的孩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战斗。一同来的还有郭索夫中校，他是1917年10月革命时从苏联逃来我国东北的白俄后代，是“满洲国”特种部队的队副（特种部队是由白俄组成的秘密部队），和我在沈阳“中央”陆军训练处军事高等研究班是同学，见到我开口便说：“前几天派我到日军当翻译，夜间差一点把我当作苏军的侦探刺死，在日军不便工作，才派我到兴安师来。”要我多加关照。我开玩笑地说：“当然应当关照，但不能保证你不受炮弹袭击。”

7月5日，日军沿着胡拉斯台河两岸，在巴尔善嘎拉、诺尔台高地线上继续激烈战斗。我军第一线各部队用尽一切力量，击退苏军几次反攻，处在对峙阶段。中午约有200余架苏军飞机和日军飞机在呼拉斯台河上空展开了空中大战。苏军坦克70余辆渡过哈尔哈河向巴尔善嘎拉高地挺进，其中十几台坦克向我军第五团的正面冲来。有五六台坦克冲破我军第一线部队，直奔师司令部方向，曾根崎中校迅速派梁濑部队的两辆装甲车阻击，我们的装甲车开去不到半个小时，全被击坏，烧起大火。我们随后用卡车去炮兵团运来两门山炮，这才把进攻的五六辆坦克击退。我和几名士兵去看烧毁的装甲车时，见1名中尉队长和5名士兵全部死亡，烧得面目漆黑，皮开肉绽。刚来的郭索夫中校，因为乘马去后方补给所联络事情，在归途中被苏军炮兵射击，马惊坠地，抬回师司令部时，已经半身麻木，行动不灵了，当夜送回后方。他真是来得晚，回去得快。这几天，苏军飞机编队，不断地轰炸阿木古郎、将军庙、阿尔山、白狼、五叉沟等地，切断阿尔山至罕达盖、诺门罕高地间的我军后方运输路线。我军的后勤运输车辆只好利用夜间行车。苏军连续反攻，成群的加农、榴弹等远射程重炮，由哈尔哈河西岸高地，不时向

我军阵地集中射击。

我军各部队的官兵，自从7月2日战斗开始以来，连续3天3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太阳火似地烤着，肚子饿得瘪瘪的，嗓子里火辣辣的，舌头像搅在粘胶里面，唾沫早已吐不出来了，可是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残酷的战斗。每个小时都有死亡、都有负伤人员，全师人数逐渐消耗。可恶的军需官们，在战场上竟准备了平时供应的高粱米饭，不是烧焦烟熏，就是夹生，装进麻袋里用卡车往火线上送。由于交通被苏军飞机和炮火完全封锁，一车一袋也送不到火线。加以苏、蒙军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攻势，对俘虏士兵当场教育释放，飞机散发日、蒙文对照的传单："不要替日本法西斯充当炮灰。""蒙古人不要杀蒙古人。""你们快杀掉日本军官投诚过来吧！""你们快回家吧！""不要受日本人的欺骗"等等。对这样的宣传文件，不管日本军官如何控制，很快传遍全军，士兵和蒙族军官大为动摇。每天各团队都发生逃兵事件，三三两两脱离战场。

7月6日，天明的时候，日军在巴尔善嘎拉、诺尔台高地线上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苏军不断向我军第一线正面增加兵力，连续反攻。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左侧方，发现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千余名、装甲车十几辆。只有西北高地教导团方面的情况稍有缓和。第一线与左翼部队的情况十分严重，各团长不断请示师长和军事顾问，迅速向日军请兵支援，但老师长坚决不同意。原来野村师长和野田顾问曾在日军司令官安冈中将面前吹了牛皮，兴安师保证单打一面。为了履行这个诺言，命令我去第一线给5个团传达命令。在激烈战斗的情况下，穿过敌我交错的火线，给1个团传达命令尚且困难，何况给5个团传令，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受了命令，乘马向西北高地出发。上午8时左右到达西北高地，教导团于夜间击退苏军一次反攻后，到现在

还未发生新的情况，只是不断受到苏军炮击，炮弹溅起高高的沙土，烟云笼罩着山头，见了金永福团长交待了命令："由西北高地撤回，迂回到左翼支援第四团战斗。"金永福上校在信封上签注收到命令的时间后，交给了我。该团第一连长扎玛彦札布少校胸部中弹，排长鄂青顺中尉头部负伤，还有几个负伤人员，正在准备送回后方野战病院。我骑马向东南兴安骑兵第五团奔去。第五团的正面，没有突出的高地，都是沙岗起伏的丘陵，丛生着河柳灌木。敌我阵地经过几天的战斗，犬牙交错，每时都有变动。地形复杂，情况也比较复杂，一不注意就有误入敌人阵地的危险。我每到一个沙丘，利用灌木隐蔽，仔细侦察后再向另一个沙丘跃进。中午12时前后，找到了第五团的团部，团长秦焕章中校和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都在一起，他们接到"坚守阵地不许后退一步"的命令后，对我说："4天4夜没吃到一点东西，弹药几乎使光，伤亡增加，逃兵事件屡屡发生，兵力减少，后方补充断绝，支援部队不来，让我们如何坚守，把情况报告师长吧。"我只好答应。又向兴安骑兵第十二团的方向奔去。

由于战线过长，五个团的正面，竟达10余公里，各团陷于孤立，中间空隙很大，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午后两点来钟，好容易找到第十二团的团本部所在地，团长田中秀一上校坐在一个沙丘后边的掩体里，一副苍白的面孔，几天没见，老了许多。他见了我一声不语。我把师长让他们坚守阵地命令交给他，看了半天，他问我："师司令部对第一线的情况了解吗？"我说："师长是昨晚接到你们的情况报告后下的这个命令。"田中上校说："不能守，守也守不住，我亲自见师长去。"第十二团的处境和第五团一样，如果不来援军，确实是守不住了。辞别了田中上校，向南方第四团的方向前进。穿过复杂的起伏地带，于

下午5点多钟，找到了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哭丧着脸，深度近视眼镜的一条腿不知什么时候掉了，用根白纱布条拴着，挂在耳边，右手包着绷带，双手拄着战刀，蹲在一个沙丘后面的斜坡上。旁边坐着第一连连长郝尔罗札布少校，左胳膊裹着绷带，用三角卫生布挂在脖子上。我上前交给高桥团长命令，说明来意，他大发雷霆说："师长什么也不知道，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现在这样情况，让我如何坚守阵地？"他写信让我交给师长。我一面等他写信，一面和郝尔罗札布少校谈话，问他为什么负伤不下火线。郝尔罗札布少校说："团长寸步不离，不放我回去呀。"第四团面临的情况，比其它团更困难。左侧千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正面的苏军步兵，形成三面包围，苏军步兵迫近到几十米的地方。上午，第一连连长郝尔罗札布和第二连连长特木其勒少校负伤，平射炮连长、重机枪连长、乌令阿中尉等十几名军官先后阵亡，士兵们的伤亡更是严重。处于这种情况，师司令部屡下督战命令，难怪高桥上校发脾气了。我考虑此处不能久留，接过信便上马离开，向师司令部方向奔去。

离开第四团阵地还不到1公里，忽然后面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我急忙跑上一个沙岭往回看时，第四团的阵地上黑烟冲天，到处熊熊大火，士兵像潮水般撤退下来。我叹口气"完了！"迅速策马向东北师司令部急奔。途中遇见退兵，三五成群，十个八个一伙，有的骑马，有的徒步。我向他们询问情况，他们齐说："苏军已经迫近，少校快走吧！""军官们都哪里去了？"他们回答说："都死啦！"太阳西沉，接近黄昏薄暮，遇见兴安骑兵第五团的团副吉野少校和上尉副官带着十几名士兵。他问我去哪里？我说："找师司令部。"他说："第一线全部撤退了，师司令部存亡不保，你不要找了。"但是我总不放心，

还是离开他们仍向东北方向走去。又遇见十几名士兵赶着一辆花轱辘车，套着3匹马，车上拉着1具尸体和两门迫击炮的炮身，拉车的马已经走不动了，几个士兵走在两边，手拿着皮带，一步一步地鞭打着。我变更前进方向，转向东南达尔汗山方向走去。南、西、北三方面射出一串一串的各色信号弹，划破黑暗的天空，这说明苏军在包围我军。我走进松林，听到有人说话，顺着声音找到他们。原来是第四团的准尉张兴亚、宜色春，班长玉林和二三十名士兵在那里休息。我下马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说我离开第四团阵地不久，苏、蒙军蜂拥般冲进阵地，机枪连、平射炮连和第三连的士兵大部未能退出火线，只有第一连和第二连的士兵撤出来了。高桥团长和木村团副见事不妙，夺过他们勤务兵金山的马，两个人退下火线。第一连连长郝尔罗札布少校眼见苏军突入阵地，他忙提起一挺轻机枪，没来得及扫射，就被击毙在阵地上。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看情况，如果苏军不追来，我们可以先进后方补给所找点东西吃，饱一饱肚子再说。"由于过度疲劳，我就地睡了。

7月7日黎明时，四面静静的，昨天撤退的那些士兵，不知都到了什么地方。我和张兴亚、宜色春到了补给所，少校军需谷垣长次和几个日本军需官正在早餐。公文箱子上边摆着牛肉罐头、鱼肉罐头和福神清牌的咸菜罐头，饭盒里满满地盛着大块炖猪肉，身旁放着一大筒白酒和几瓶月桂冠牌的清酒，还有黄焦焦的油饼，正在大吃二喝。见我进来忙让我一同吃饭。我饿了一天一夜，不客气地饱餐一顿。一面吃一面想，士兵们在第一线连高粱米都吃不着，饿着肚子拼命厮杀，他们却在后方享福。这时候曾根崎中校来到补给所，他是来收容退兵的。午后1点多钟，我骑马走进司令部的沙坑里，看见老师长戴着钢盔，穿着汗浸泥污的白衬衫，近视眼镜下边突出的鼻子格外发

红，拄着战刀蹲在一个沙坡的斜面上，一声不语。野田顾问几天没洗的黑胖发灰脸上，长着满腮胡须，一手提刀，另一支弯曲不直的胳膊，像发疯似地挥动着，不知在挥什么。老参谋长好像被判死刑，瘦脸苍白，蹲在师长旁边。我向师长报告情况，他很不耐烦地说："知道了。"我转身来到阿勇巴图中校跟前，他说："胡克！你回来做什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现在师司令部三面被包围，苏军步兵迫近二三百米的距离，师长宣布谁也不许后退一步，否则枪决。"我才明白师长和参谋长狼狈的原因。我低声对阿勇巴图说："如果真到紧急关头，我们可以试一下白云航中校教给的'要诀'。"原来我们由沈阳出发时，白云航中校曾对我们说过，如果被包围不得逃脱时，举手喊叫'蒙古人'，保险苏、蒙军不会杀害的。"说完，我离开阿勇巴图中校的独立骑兵连向"少年队"的阵地走去，望见沙坑里摆放着三四具短小尸体，旁边坐着几十名十四五岁的蒙古族少年队员，都用绷带裹头缠腿，痛哭流涕。"少年队"的队副有川中尉，头上裹着一条印有红日光的平纹汗巾，腰插一把战刀，刀刃朝上，右手按着刀柄，活像一条疯狗。不知道他想切腹自杀呢，还是要杀人，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候，日军派来一个联队约3 000余名士兵，配属十几门10公分口径的远射程加农野战重炮来支援。

傍晚6时左右，日军击退苏军。联队本部进入兴安师司令部阵地沙坑里。由于联队长长谷川大佐阵亡，中佐联队副继任联队长职务，就在兴安师司令部阵地沙坑里举行就职仪式，拜受军旗。至八九点联队本部前进了，枪声渐远。伪兴安师司令部就此解围，松了一口气，稍得喘息时间。这天师司令部损失很大，"少年队"伤亡30余名，队长战死，独立骑兵连也伤亡了20余名。

由于“少年队”伤亡过重，影响不好，撤回钱家庄。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团副德勒格少校和副官旺吉勒上尉，昨夜失踪，不知去向。

师司令部南方三四公里处的沙岭，远看像一头跪卧着的骆驼，师长命名为“骆驼山”。清理战场的人从骆驼山附近拖回三辆装甲车，这是我军唯一掳获的胜利品。从车里拖出两具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人尸体，曾根崎中校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我当是苏联人，原来是混蛋老蒙古。”好像骂我，非常刺耳。

在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中，兴安师损失很大，原来4 500余人，经过大力收容，仅剩2 600人。最惨的是兴安骑兵第四团，原编制800多人，仅剩高桥上校团长以下53人，抽出30名补充到独立骑兵连，其余20余名派到后方补给所充当炊事员，高桥团长暂时成了补给所长。从此第四团的番号在“兴安师”的编制里不见了。

7月10日。经过两天的整顿编制，调整了武器，补充了弹药。根据日军司令部的命令，午后1时许，兴安师司令部及所属各部队，向南方骆驼山附近转移。司令部驻在骆驼山上，着手部署军队，准备明早拂晓攻击三角标高高地。下午5时许，师长和野田顾问命令我为军官斥候(侦察)，拿出怀表把12点指向正北，平放在地上，命令从8点钟的方向前进，11点的方向回来。主要侦察我军左前方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的兵力和三角标高高地附近的苏军阵地配备情况。出发时，野田顾问把我叫住说：“你这次去侦察，存亡难保，如果被俘怎么办?”我毫不踌躇地说：“军人不能被生俘，执行自杀。”野田顾问说：“你是蒙古人，不能自杀，如果被俘，应当向蒙古骑兵宣传满洲国的好处，日军的强大，争取将800名蒙古骑兵带回投降我军。”我答应个“是”字，复诵了命令，骑上马带领5名士兵（中士班长敖特巴

雅尔、勤务兵昭德宝和另外3个士兵），向西南方向出发了。我在马上想，师长和野田顾问过于单纯，一个俘虏将蒙古人民共和国800骑兵带领过来，那么容易！他们愿意到我们这里受日本人的气吗？

午后6点多钟，正在前进时，突然发现七八名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从左前方沙岭后边出来，向我飞奔。我迅速占领阵地，命令两个士兵牵马，要过一枝马枪和敖特巴雅尔中士及一名士兵握枪等待。及至他们进到将近百米的距离时，我们三人一齐开枪，三个骑兵连人带马应声倒下，其他几名拨转马头奔向北高地。正在这时，右方几十名骑兵纵马袭来，挥动着马刀，闪闪发光。如果抵抗非被包围不可，立即命令上马撤退。我骑上马箭一般地跑过两个沙岭，收住马向后看时，敖特根巴雅尔中士随后赶到，3名士兵的马慢，不是被俘，便是被杀。跟随了我十几天的昭德宝，从此再没有见面。任务没有完成，损失了3名士兵。这时已经日落天黑，我们两人只好往回走去。夜间10点多钟才到达骆驼山，师司令部已经前进，一个人也不见了。正在这时，骆驼山南方传来阵阵马达声，有一个红灯光时现时隐，我估计可能是敌人装甲车夜间侦察，我们赶快离开骆驼山向西北方走去。深夜里方向难辨，不能盲目乱走。在一片灌木林下，将马拴好，在另一片灌木林中歇下。次日黎明，隆隆炮声震醒了我们，急忙站起看时，原来我们睡在四五具尸体附近。这些尸体已经腐烂，散发着臭味。我们骑马朝炮声方向走去。午前10时许，望见前方有许多马匹在灌木中隐蔽着，这是第十二团的战马。我询问牵马的士兵，知道师司令部进入三角标高高地了。

三角标高高地上，有木制三角架，是地形测量交会基点（师司令部占领该高地后将三角架撤去），是诺门罕、诺尔台高地南端的一处突出高地，苏军阵地南侧的一个据点，设有两道

密密麻麻的屋脊形铁丝网，构筑立射散兵壕，一条一条的交通壕交织在一起。阵地附近修成通往诺尔台高地和哈尔哈河一带的汽车公路。可以说阵地组织周密，交通便利。站在三角标高高地上，远远地可以看见被两岸丛柳灌木遮掩的哈尔哈河。

第一线的枪声时急时缓，苏军炮兵对我军第一线和师司令部不停地射击，炮弹连续不断飞落在阵地上。

日军命令兴安师守好三角标高高地，以掩护日军左翼安全。师长下达防御命令，进行兵力部署。右翼地区兴安师骑兵第五团和迫击炮团，左翼地区兴安师骑兵第十二团和教导团。师司令部和独立骑兵连在三角标高高地。

7月12日到15日，这几天苏、蒙军没有反攻，但苏军炮兵却连日不断地轮番射击我军各个阵地。我军伤亡人员被陆续抬下火线。

战场清理中，共找到我军尸体200余具。由于天热腐烂，认不清面貌，每人虽有小木牌符号，多数遗失，不好查对，只好一车一车地运到后方补给所东南（沙岭后面）集体火葬，然后将骨灰装在一个一个小木匣里。根据各团报告的花名册在小木匣上填写死亡士兵的籍贯、姓名，骨灰是不是本人的，天才知道。后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喀喇沁旗有个募兵名叫皮拉，在伪兴安骑兵第四团入伍，于7月6日战斗中失踪，战争结束后，第四团派人将骨灰送到他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可是死皮拉到家不久，活皮拉生还了，弄得一家老少哭笑不得。

正在尸体焚化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名日本和尚，敲着单面鼓，围绕着焚化场来回转，念着日本经。士兵大为不满，当面指骂："我们还没有死，就念催死咒。"不管士兵如何咒骂，这日本和尚还是坚持念经。一天夜间，补给所遭到严重空袭，堆积的物资全部烧毁，这个和尚才逃到王爷庙去。

有一次，3架日军飞机被苏军十几架战斗机追击到兴安师司令部阵地上空，展开了战斗，我们阵地上有4架高射机枪，王海山中尉和我各使一挺，对空射击，因为苏军飞机和日军飞机在高空现出同样的银白色，我们分不清“敌机”和“友机”，一阵乱射。

在这几天的战斗中，伪兴安师炮兵团的官兵仅剩五六十名，逃的逃，亡的亡。所剩4门山炮，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放列射击，不时在这边发射两炮，就迅速转移阵地到那边放射几炮。这一回又到师司令部左后方进入阵地发射。引来苏军大量集中炮火，成百上千的炮弹落在师司令部和山炮阵地上，一时烟尘笼罩，人马相继阵亡。4门山炮被击毁3门，兴安炮兵团的寿命从此结束，平川森上校也因病回后方休养去了。

后来从齐齐哈尔第3军管区派来一个野炮营（三八式野炮8门）。新到的野炮营，想显示一下神通，在司令部的左后方，构筑放列阵地，开始射击不久，同样招致苏军炮兵的集中射击，将野炮营的火力压制下去。士兵们心慌手乱，竟将信管的延期分划，误调为零。炮弹刚出炮口就爆炸了，把自己人炸伤了六七名。野炮营受到这次教训后，再也不敢逞强了。

有一天，忽从高空飞来一架苏军飞机，向我军阵地上散发了大量传单，师长急忙下令不许看，送到师司令部一起焚烧。但我已拾得几张，传单上印有德勒格少校和旺吉勒上尉的照片，并有他二人的言论，他们说，兴安军的蒙古官兵不要受日本法西斯的欺骗，进行蒙古人杀蒙古人的愚蠢战争，替日本法西斯充当炮灰，付出毫无价值的牺牲。蒙古同胞们，杀掉日本人投降过来吧，回家去吧，父母妻子盼望着你们早日平安回家呢。这时我才了解德勒格和旺吉勒的失踪是投降苏军了。

从7月16日以后，苏军炮兵的主力对付日本军，对兴安师

只是在每天早晨七八点钟和下午六七点钟，发射一阵。我们抓住这一规律，吃饭时间不定时，不是提前，便是挪后。第一线阵地保持互相对峙局面，苏军一步也不退，但也不进攻，不时放冷枪，一不注意，不是负伤便是阵亡，天天有伤亡。三五成群的苏军士兵，荷着枪，提着饭盒一类的东西，有时从我军阵地前沿走向哈尔哈河西岸，有时从哈尔哈河西岸到这边来，往来不断。成群的苏军坦克渡过河，从我军阵地前沿向诺尔台高地日军方向奔驰，我们也不阻击。但日军方面，战斗仍然激烈，日日夜夜炮声不绝，熊熊火焰弥漫天空，每天都有飞机空战。我军后方运输线，几乎完全被苏联空军控制，日间仅仅利用空隙时间单车往来，大量补给完全依赖夜间运输。

正珠尔扎布上校来到阵地，自从德勒格少校和旺吉勒上尉投降苏军以后，日本人对我们蒙古族军官特别警惕。我虽是参谋，对作战计划根本见不到，连自己以为是“日本人”并且更改姓名为“田中正”的正珠尔扎布，也看不见作战计划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对我说：“日军决定于7月20日开始总攻击。集中了几十门榴弹炮和加农炮，于20日开始向哈尔哈河两岸苏军阵地以及哈尔哈河西岸僧布尔敖拉山的苏军野战重炮阵地进行毁灭性射击。”果然7月17日午前，在我军阵地的右后方升起一个黑气球，我用望远镜看时，气球下边没有吊篮，说明气球上没有人。7月20日，僧布尔敖拉山一带，满天积云，这天没有进行炮击。

7月21日天明。日军的观测气球忽然变成灰色长圆形，下边吊有篮子，里面坐着三个人。上午7时许，炮击开始。苏军沿河阵地和河西高山上，一处一处升起黑烟。苏军炮兵应战，日军第一线部队开始了总攻击。上午10时许，从我军阵地前方飞来一架苏军战斗机，低空飞行，离地面仅数米，直奔气球冲去，

气球立即起火，摔掉下来，上面的三位日军炮兵观测军官和气球同归于尽。日军炮声顿时停止。约半小时后，日军轻重歼击机从东北方向大批飞来，每6架为一编队，向僧布尔敖拉山和沿河两岸的苏军阵地轮番俯冲。日军先头部队冲过河去，苏军沿河两岸阵地的士兵，受空、地夹攻，全线向僧布尔敖拉高地撤退。这时从僧布尔敖拉山东西山口以及平坦的山顶上，开出六七百辆坦克，布满了山野，撤退的苏军步兵，伴随着坦克复又返回。苏军大批战斗机冲进日军机群。双方高射炮发射不停，展开了激烈的陆空大战。午后三四点钟，日军被迫退回原阵地，这次总攻未成功。从此日军改变了作战计划，只作局部攻击。

这几天，我军后勤方面运来许多啤酒、日本清酒、白酒、牛肉罐头以及饼干等各种食品，分到各团队和师司令部。日本军官都得双份，蒙古士兵简直什么也分不到。说是“日本人生活水平高，蒙古人不习惯吃喝。”待遇非常不平等。

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秀一上校，将分配的食品放在自己掩蔽部外，堆积如山。给全团士兵们宣布，这些食品现在不分配，等攻过哈尔哈河，占领僧布尔敖拉高地以后，开庆祝宴会使用。可是他自己却每日三餐。

自从兴安师防御以来，每日都有几十名伤亡官兵退下火线，有一个士兵脚腕被打碎，曾根崎中校看见说：“这小子是逃跑被射中的。”日本人对待蒙古人就是这样残暴，替他们拚命作战，还不说一句好话。

临阵逃亡事件不断发生，派出去的斥候和联络兵，往往一去不返。老师长想出个办法，打算将马匹全部送到后方，防止士兵乘马潜逃。野田顾问不同意，马匹是蒙古骑兵的生命，如果使士兵离开战马，说不定会造成更大的乱子。顾问是关东军的军事代表，师长也不得不听，只好作罢。

7月25日到30日，天气暴热，一天，我在帐幕里乘凉，苏军歼击机30余架从西方高空向我军阵地飞来。与此同时，70余架E16型苏军战斗机，沿着沙丘起伏棱线，低空飞行，冲到三角标高高地，闪电般对我们进行轮番扫射。

7月31日夜间，伪兴安骑兵第十二团阵地被苏军步兵攻陷，田中团长带领残缺不全的两个连跑回师司令部阵地，将许多弹药和准备开庆祝宴用的各种食品，全部抛弃在阵地上，成了苏军的战利品。

听堀内章少校说，日军一个联队约3 000余人，于7月21日由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率领，偷渡国境，挺入苏军背后，经8昼夜的苦战，仅跑回100余人。这几天我军第一线阵地，步步被迫后退。苏军炮兵又开始整天不间断地射击。1 000余名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和20多辆装甲车，挺入我军左后方，切断了交通线。兴安师阵地一天一天在缩小，官兵一天一天减少，被压缩在三四百平方公尺的狭小地区，情况愈来愈严重。师长、参谋长以及日本军官，对我们蒙古军官更加警惕，加强了保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又不敢问。官兵普遍流露厌战情绪。听说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的石兰斌步兵旅来接替兴安师，但久无音信。

兴安骑兵第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因病退下火线，所剩100余名士兵补充给教导团。官兵战斗意志大大下降，天天盼望换防。

8月1日午后2时许，苏军歼击机三四十架飞到我军阵地投下大量炸弹，全线阵地刹时变成一片火海，露天堆积的弹药全部燃烧起来，自行爆炸。师司令部的马匹，全被炸伤炸死，我那匹心爱的白马也在其中。野田顾问负了重伤，阿勇巴图中校背部负伤，官兵伤亡很多。当夜把野田顾问和阿勇巴图等官兵用卡车送往海拉尔后方病院。

8 月 2 日，全师官兵不到 200 人，人心恐慌。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渐渐构成包围形式。午后 3 时许，左侧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开炮射击师司令部，野村登龟郎中将师长，头部划破一道口子，他便急忙将师长职务移交给后藤外马参谋长，带领王海山中尉副官匆匆离开阵地，奔回海拉尔休养去了。山田属官对我说："最好耳朵穿个洞，也好下火线"。他是在讽刺老师长。

8 月 3 日天明时，参谋长召集军官讲话："蒙古人不论官兵，把武器留下全部撤退（后援部队不来，官兵情绪非常不好，再坚持下去要出乱子），日本人全部剩下，最后决战，死守阵地。"我乘此机会回郑家屯，向伪军管区司令部请了一个月假，回原籍喀喇沁旗休养。

后来听说，后藤参谋长宣布"兴安师"蒙古族官兵撤退时，蒙古人只有正珠尔扎布未走，和日本人在一起，坚持到晚 8 时，将阵地交给日军的一个中队。30 名日本人和 1 名蒙古人（正珠尔扎布），于夜间全部撤退。8 月 4 日拂晓，苏、蒙军占领了三角标高高地，将一个中队日军完全歼灭。

兴安师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严重，大败而回。从开始 4 500 余人到最后只剩 31 人。

这次战争历时 5 个月，日军官兵死伤 2.8 万人。兴安师方面，焚化的尸体 310 多具，被俘 330 余名（交换俘虏的数字），其余大部逃亡。日、苏双方损失都很大，最后以日军惨败告终。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诺门罕战记

内仓　藤次

自昭和14年（1939年）夏，血染满苏国境以来，已经31年。“诺门罕事件”停战纪念日——9月16日，又将来到了。

从5月中旬到8月末，仅仅3个月时间，日军就有7 696人阵亡，8 647人负伤，1 021人生死不明，2 350人在战争中患了重病。近2万名官兵，成了这次战争的牺牲品。

时至今日，只要一闭上眼睛，战场的悲惨景象，就立时涌上心头。

牲畜越境是战火的开端

战场上的夏天，像火一般的灼热，一连几天，都超过华氏120度（摄氏约48度）。夜间，气温却急剧下降，穿单衣会感到有些寒意。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天竟如此之长。日没时间是晚11点，黑夜转瞬即逝，一到凌晨2点，太阳又从东方大模大样地升起来了。士兵对着太阳嘟嘟囔囔地发牢骚：照这样，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来去徘徊极光中，
北方俄国路茫茫。
夕阳西下东方亮，
阵阵钟声震长空。

昔日流行的《飘泊之歌》，又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

诺门罕，位于满洲的西北端，在国境城市海拉尔以南260公

里处（相当东京——丰桥间），地处比整个九州还大的呼伦贝尔平原正中间。如果说有房子，那就只有途中的喇嘛庙、将军庙和甘珠尔庙。

草原上，赶着近百头牛、马、羊群的蒙古牧民，全然不把战争放在心上，他们坦然自若，追逐着草地，不断迁徙着。

从海拉尔到战场，步行需要一星期，乘车只要七八个小时。除非雨后泥泞，车子到处都可以行驶。若是部队行动，只要领头的车辆不停，就要一路飞奔下去。

“诺门罕”是蒙语，意思是“和平”，但实际上，和外蒙军队间，小规模的冲突却总是不断出现。

昭和14年（1939年）4月，在哈拉哈河附近，以牲畜越境为开端，诺门罕警察分驻所的满人警士（巡查）于5月4日俘虏了外蒙军塔西努玛少尉和1名士兵，这个事件逐步升级，结果是100名外蒙军越境而来。

警报立即飞报海拉尔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司令官又报告给日本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和治安部大臣，于是，5月13日搜索队出动。

这时，海拉尔特务机关外蒙班长田村利美少校（相当于日本军少佐）曾向关东军提出建议：

“这个地方一向平静，也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作的必要……”

然而，遗憾得很，横井机关长由于种种顾虑，没有把这个意见向关东军报告，以致造成关东军对形势的错误判断。

无比激烈的平原战

小松原师团率领步兵3个联队和骑兵、野炮、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还包括国境守备队的兵力，以哈拉哈河为目标，在

诺门罕摆下阵势。

这时，满洲国军也由乌尔金司令官率领兴安骑兵第5团等上阵。

小松原师团长，曾任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驻莫斯科武官等职，大内参谋长也曾任过驻拉脱维亚武官，都是陆军部内享有盛名的“苏联通”。

尤其是大内参谋长，身为当地骑兵集团参谋，熟悉当地情况，参谋长就任伊始，就曾向关东军建议：

“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作战，只靠一步75公分的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那种日俄战争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过四五千米，用这样的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战争果真如大内参谋长预见的那样而告终。

5月22日，从步兵第六十四（联队）山县部队到达甘珠尔庙时起，敌人的坦克群就开始活跃起来。5月29日，第二十三搜索联队苦战一天，东部队长阵亡。

朱可夫元帅出场

苏军方面，6月5日晨，朱可夫元帅由莫斯科直抵哈拉哈河以西130公里的塔木斯克，迅速着手增强战斗力。

7月1日下午3时，1.5万名日军开始行动，越过火热的沙丘。当夜，步兵部队急袭哈拉哈河右岸“弗伊”高地，占领其一角。3日夜，在步兵一个大队的掩护下，工兵架设了浮桥，以小松原师团长为首的师团主力（包括第7师须见联队）冲过浮桥，杀进敌人阵地，烧掉炸毁敌坦克数百辆。

步兵第七十一联队小田大治上等兵曾自豪地说：“河有五六米宽，虽不是急流，但是茫茫一片，深不可测。架桥前，工兵

划船斜渡过河，在还没到对岸时，那种紧张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可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外蒙那面是一道很低的土堤。”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突然，在右侧的山脊后面，出现了敌群，我们猛烈地开始射击，那纯粹是胡乱放枪。敌人可能也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近的地方会出现日本兵。中队长大喊：‘抓活的！’逃得慢一点的家伙被抓住了，用枪口顶住了他们的肚子。战斗至此告一段落。这个大胜仗，使士气大振。”

遭到斥责的空军

空军部队也是本领高强。

我们汽车部队每次出发运输，总要遭到敌机“伊·一五”和“伊·一六”的轰炸和扫射。但是，接着太阳机一定会马上出现在空中，和敌机展开空战，结果，必定是“牛虻”（敌机的绰号）被击中起火坠落。

有一天，在车子前进的方向，敌人的降落伞刚开始徐徐降落，马上就有10台车把他们团团围住，对空射击的步枪声响过二三十响后，红头发的驾驶员就丢掉手枪，举手投降。

“别打死！抓活的！”

6月27日，我空军急袭了敌根据地塔木斯克，大破敌人机场上的重轰炸机、侦察机128架，取得了辉煌战果。

然而，参谋本部听到这一捷报后，不但不予以表扬，反而大发雷霆，并严命：“目前，不准空袭敌根据地。”

挫伤士气的不扩大命令

歼灭敌人是前线部队的使命，但是，中央部为了防止国境纠纷扩大战区，甚至发展为全面战争，对前线部队的行动严加控制。

这样，诺门罕战场的胜负和结果已成定局，这种看法也不过分。挫伤前线士气的不是敌人，正是中央部自己。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人们流血捐躯，奋战疆场呢？前线指挥官那种复杂，不，而是悲愤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月初，盼望已久的两个野战重炮机械化联队从国内赶来，这回可以压倒和消灭苏蒙联军了，全线欢欣鼓舞，寄予重望。但是，遗憾得很，并没有发动总攻击。问题是射程太近，弹药供应也不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第一坦克团（两个联队）实行改编。7月26日，奉关东军命令，经海拉尔返回了原驻地。其后再没有补充，第二十三师团迫不得已，只好采取守势。

8月4日，发令宣布编成第六军，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除第二十三师团、野战重炮和第七师团的一部分外，所有的增援部队全划归该军统辖。

到8月23日为止，苏联、蒙古军司令部，已完成了全面反攻的战斗准备。

“我们制定了一个迷惑敌人的计划，造成使敌人觉得我方没有任何准备进攻的假象。为此，我们装置了可以让敌人窃听的假无线电，让伪装部队移动的装置，发出像准备冬季宿营那样的钉椿子的声音，飞机、坦克发动时的假音响。”（《朱可夫回忆录》）

原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大村清太郎中尉说：

“日本也搞神经战。用飞机到敌军阵地上散发劝降传单。当然，敌方也打来日文的宣传弹。后来，夜间，敌人的装甲车把扩音器的音量放到最大限度，用日语高喊：‘日本士兵们！你们的后方已被我们切断了，往后，粮食和弹药都补充不上了，赶快逃到蒙古这边来吧！’”

并且，竟然向我方播送了雾岛升和哥伦比亚小姐（系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歌女——译者注）唱的歌曲《爱情的桂花》，接着，又传来了新内（日本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派——译者注）的合奏。这虽然是一种巧妙的作战，但是，这套玩艺对当时的日本军来说，却是完全行不通的。”

敌人增兵，我方无援

从8月19日夜到20日，敌人从空中到地面开始全面的总攻击。

24日早晨，我所在部队的监视哨，突然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

“敌军坦克！从距我方10公里处成横队冲来，现在，仍在前进。”

我们急急忙忙跳上汽车。“来了！来了！”无数豆粒大的黑点，向两侧扩散开来，很快变大了。

“全体上车！”这是撤离战场。

跑啊，跑啊！，但是，一切努力全落空了，在越过第三道山脊时，5辆敌军坦克早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哒！当！哒！当！”

是坦克炮的狙击，大家纷纷跳下汽车，狂奔乱窜地逃向草原。“哒！当！哗拉哗 拉哗拉！”随着坦克炮的轰鸣，草原四处越来越多地发出了呻吟声。

忽然，坦克炮不响了。悄悄抬起头来一看，在100米的前方，坦克停下了。一个长着苞米缨似的红头发脑袋，从坦克里面钻出来，瞪着眼睛向周围搜索。

战场变成了地狱

从这时起，到8月末，诺门罕战场简直变成了地狱。步兵第七十一联队，仅两个月，就换了4个部队长。第3任森田部队长和第4任东宗治代理部队长阵亡，步兵第六十四联队山县部队长、野炮第十三联队伊势部队长也都阵亡。7月4日，大内参谋长阵亡后，冈本参谋长、村田、伊藤两参谋、步兵第七十二联队酒井部队长相继身负重伤，野重第一联队梅田代理部队长被迫自杀了。

厄运的根源何在呢？就在于以坚持防守为名，把一个师团和增援部队，孤零零地暴露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平原上。敌军速增猛涨，而我方却势单力薄。明知如此，大本营还偏偏一味坚持“我不犯敌，也不使敌犯我”的命令，致使部队被死钉在战场上。从撤出两个坦克联队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战斗力不但没有增强，相反，却被大大削弱了。

直到9月初，大规模的增援部队，才纷纷赶到。

大家口耳相传：总攻就在13日。但是，14日白白过去了，15日，仍然听不到前线的炮声。进攻的准备已全部完毕，随时都可以出击，这时的战场，更是显得可怕地沉寂。

16日晨，命令紧急集合。“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张张士兵的脸，由于兴奋和紧张而痉挛起来。

停战命令的打击

但是，站在石油箱上的队长，却流着泪，抽搐着脸，宣布了“达成停战协定”。丧失了大批部下的队长，此时此刻，定是肝肠寸断了。

战斗力已经超过敌人，而偏偏在复仇的前夕，采取了这种

紧急措施。这一整天，士兵们都像傻了一样，垂头丧气，不吱一声。

打扫完战场，已是10月10日了。离开战场那天，整个呼伦贝尔平原，四处白雪茫茫。难道今天就要和战友葬身的土地告别了吗？对这渗透了战友鲜血的沙土，我感到无限的眷恋。轻轻拂开白雪，光着手抚摸一下沙土，冰冷冰冷，我默默地上了汽车。

我们活着踏上了日本国土。

（注：作者当时野战重炮第三旅团辎重队一等兵。现从事建筑业）。

日军飞机在林东丢失文件之后

彭祝三

事件之缘起

1939年7月间（伪满康德6年），长春市日伪株式会社民航飞机坏于林东机场。当时日伪驻在员荒木电请该社派机前来修理。该社遂派飞机携带机件前来林东修理。当时驻长春之关东军司令部有下达通辽第九军管区机密文件，让该飞机至通辽机场投下，并电告通辽军管区司令部，令日伪顾问前往机场接收。信件是以红白旗帜作标志信号。飞机到通辽机场上空，驾驶员即由座位底下将该信件投下然后飞往林东。第九军管区日伪顾问见投下来的仅是红白旗帜标志信号，并无机密信件。当日因风力很大，以为信件飘荡别处，即下令动员通辽全市机关市民及学生，以手携手距离由东门至北门转至西门，遇房上房，遇

河下水，在飞机场附近一带搜查三日，迄无踪影，当致电关东军请示要领。关东军司令部用电刑审讯该机驾驶员。驾驶员始承认该日因风力太大，仓促之间由座位底下仅将红白旗帜标志信号投下，及抵林东机场下飞机时，始发现该信件尚在座位底下，深恐获罪，当即将信件抛在林东日满旅馆附近墙角，以图推卸责任。这是丢失信件之缘起。

该文内容，系以后探询福冈参事官而知的。系关东军对诺门罕事件军事计划及作战要领，用书面下达通辽第九军管区。因信件丢失，深恐该军事机密泄漏，故另作计划，为诺门罕军事失利原因之一。

在林东搜查情况

关东军以该信系机密文件，至关重要，即抽调各处日伪宪兵队长六七人，于7月12日来到林东，住在日满旅馆，找此文件。召集伪巴林左旗首要人员及林东街有职责者，开会讨论搜查方法。警务股长卢诏因对答迟慢，当即受某宪兵队长拳打脚踢，并限期在三日内务必将该信件找到，否则均严惩不贷。当时旗公署布告商民，有拾得该文件者送来，赏金100元；如有知而不举者，均以军法论处。7月13日，并迫令各商民不分男女老幼，以中心街为界，西街商民均到旗公署大礼堂院内集合，东街商民均到林东街公所院内集合，各家不许关门下锁，以备进屋搜检。如有一人在家，格杀勿论。由旗派出之搜查小组的警察特务，大肆搜检。其日尚下小雨，在街公所室内者均系妇女老幼，在院内者均受雨淋之苦。又不令回家吃午饭，饥渴交迫，儿哭女涕及病者之呻吟声，惨不忍闻。延至日落天黑，始令各回各家，并令翌日早晨再来。14日早，仍如昨日一样，并有警察特务至各人面前搜翻。稍有行动及对答迟慢者即遭拳打脚踢。

各商民恐惧之状，真是难以笔墨形容。迨至午后，始由上青医院之刘上青献出该信件之外套封皮，说他在前几日赴后街潘家出诊时在其墙外拾得的。当即集中警特到潘廷和家严加搜检，连同邻居均受严格搜查，仍无踪影，当即追讯刘上青，由福冈参事官亲自用冰水灌他，始吐露真情。由他家中起出该文件。据刘上青供称前几日由其内弟×××拿一个大封袋，上面均盖有印章，说是在日满旅馆墙角拾得的，不知是何物件。由我拆开一看，知是关东军下达第九军管区机密信件，我就严密藏起。及旗公署布告拾得该文件者送去赏金100元，第二天尚首鼠两端，第三天终以贪得赏金而献出外套封皮，以后再献文件，或可仍得赏金。当时日伪各宪兵队长以为文件已得，便偃旗息鼓，返回通辽了。

警察特务搜查时的暴行

在该日，旗公署编有搜查小组，由日伪职员协同警察特务，在各街各户搜查，并派有督察队沿街巡行。适有一赵姓老人行走迟缓被特务王子厚遇见，问他为什么落后？赵姓老人回答年老有病走不动。王又问："你说中国好还是满洲国好？"老人说中国好，王特务将该老人打得头破血流，叫声不绝。还有张警务科长在街公所院内妇女群中挨个相面，见有柔懦可欺者，即说你知道信的下落，迫令交出，致一般妇女哭哭啼啼。正威逼利诱间，适刘上青供称该信件是其内弟拾得的。该×××正在街公所院中，由人群中将其叫出，由张警务科长先打嘴巴，随后一步一脚，一直踢到旗公署院内。当时商民群众均低头自叹，以为生不如死，笔者那时正充林东街长，首当其事，目睹惨状，又不知何日结束。既不能随声附和，又不敢代为辩护，坐立不宁，如坠五里雾中，只有听其摆布而已。警察特务借事生风。凶

恶已极，以后在土改时公审特务王子厚，群众请求政府将他点天灯，亦可见民愤之深了。

当年7月15日，旗公署召集商民开会，结束此事并对刘上青处理。商民群众要求严惩刘上青，将他拉下台来，扭打一顿，以泄群愤。当由旗公署解决，终以刘上青拾得该信后并未损坏，尚能献出，从宽处理。不发赏金亦不加罪，即令其回家了事。此事经过仅三日，后来方知产妇及患重病者因此死亡十数人，通辽亦遭此浩劫。

诺门罕战争之后

胡克巴特尔

一、"归还兵"

在7月6日的战斗中，兴安师第一线各部队的士兵，大批脱离战场，逃向达尔汗山和宝格得敖拉一带。经军官努力劝说并保证不处分，才收容回绝大部分，又参加了战斗。小喇嘛等率领的五六百人，不敢归队，从宝格得敖拉通过阿尔山北部兴安岭森林，直奔五叉沟、白狼车站（因为阿尔山有日军防守，不准通行）。

小喇嘛是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的中士班长，诺门罕战争前，曾因公去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喇嘛库伦庙，私自收买一些牛羊皮，来王爷庙贩卖，从中取利。不料被宪兵查获，以违犯皮革统制法的罪名，扣押在王爷庙宪兵团。后来诺门罕战争爆发，教导团配属兴安师出征，因此学校顾问泉铁翁大佐从宪兵团把他要出来，使他带罪出发，在战场上立功赎罪。他

在这次战斗中没有立功，反而率众临阵脱逃，这是小喇嘛不敢归队的原因之一。其次在战场上连续几昼夜进行残酷战斗，得不到饮食，加上苏、蒙军的政治宣传，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也是主要的原因。

小喇嘛等到白狼车站后，驻了两天。这时贡布札布（包文贵）中尉从王爷庙到白狼车站，进行宣传招抚。由于贡布札布中尉的态度生硬，摆出军官架子，惹起归还兵们的不满，便用刺刀将贡布札布中尉刺死。

小喇嘛等本来是临阵逃亡，按“满洲国”的陆军刑法规定，凡是临阵逃亡，属于违抗命令，“不论主从”一律判处死刑。这次逃亡事件，因为人数过多，同时为了迅速平定下来，缓和矛盾，解除逃兵顾虑，避免扩大事件起见，在达尔汗山、宝格得敖拉一带时叫“离脱兵”。对小喇嘛他们叫“归还兵”，用意是称呼他们是回家来的兵。尽力讳避“逃兵”二字，这是日本人用的政治策略。并通令沿途各地军警不准阻击，尽可能满足“归还兵”的各种要求，尽量供应。

“归还兵”沿着铁路附近一直东进，到达归流河车站附近。王爷庙军官学校顾问兼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大佐派白云航中校去归流河招抚，并送去许多慰问品。经白云航中校劝说招抚，收容了一部分带回王爷庙。但小喇嘛等始终不听劝说，带所剩200余人，窜入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在六户、学田地、宝石沟、杜列毛特一带活动，凑集一些散兵惯匪，又扩充到400余人。这时他们完全变成地方土匪，到处抢夺，奸淫妇女，造成地方上极大混乱。

诺门罕战争失利以后，兴安师的部队大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说是苏联军进入“满洲国”，日本即将垮台。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驻防巴林左旗林东的兴安骑兵第六团的第三

连和机关枪连400余名士兵，以不堪日本连长的打骂虐待为名，携带全部武装，由上等兵聚宝等率领叛变。先到白音卜统，后转到开鲁西双合兴，在双合兴大门外枪杀了招抚军官王秀兰上尉。又移转到查卜干庙东北方黄羊洼村，驻了3天。该村居民大部分是汉族，聚宝部进入该村后，大肆抢掠奸淫，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上下的妇女，无一幸免。时值兴安军管区司令部部副王新之上校赶到该村招抚，聚宝等给王新之送去一名妇女过夜，该上校也收纳，后来引起兴安军的军官普遍反对唾骂（不久将王新之免职）。

当时巴林左旗的日本参事官大为恐慌，叛兵要求什么就给供应什么，如大烟土、香烟、洋服以及牛羊肉、白酒等等。只要叛兵们肯接受招抚，用尽全部力量供应。

聚宝部从黄羊洼又窜入科尔沁右翼中旗北部，在杨得胜窑、喀喇沁爱拉附近，与该地警察队遭遇，交战数小时，击毙警察队长胖小儿，聚宝部也被击毙5名。这时原第六团团长，当时任通辽司令部参谋处长洪景祥中校到聚宝部，利用过去旧隶属关系，进行说服劝导，聚宝等同意归降，但提出条件：（1）将第六团第三连长和机关枪连长（都是日本人）撤职查办；（2）不回第六团，要单独成立部队，并要求在查卜干庙驻防；（3）不咎既往罪名，保证聚宝等几个领头人无事。洪景祥中校与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联系，完全同意要求，并指示在东科中旗舍伯吐村集结受编。同时驻通辽的兴安南省警备司令部派达理札布上校和副官处长关雅亭少校到小喇嘛部招抚。小喇嘛的条件不高，只要不判罪，保证生命，情愿归降。

1939年10月上旬，聚宝和小喇嘛部先后集结在东科中旗舍伯吐村，当时兴安南省警备军参谋长德永恭助上校率领兴安骑兵第十一团到舍伯吐村点名。将部队部署在村外，命令聚宝

部去阿鲁科尔沁旗查卜干庙驻防，命令小喇嘛部进驻通辽。

11月上旬，在通辽市以训话为名，将小喇嘛部全部解除武装，并把小喇嘛为首的17人提交军法处会审审判。与此同时，德永恭助上校赴查卜干庙打算解决聚宝部。德永上校到查卜干庙时已中午，不知谁向聚宝部透露了消息，聚宝当时率部撤出查卜干庙街。但德永上校早已布置第六团的一、二两连和第三团的两个骑兵连在查卜干庙近郊待命。因此将聚宝部包围在查卜干庙西北山上，交战不到两小时，全部缴械，于是日午后6时许将聚宝部等18名头目，徒步赶到查卜干庙警察署，德永上校立即命令枪决。薄暮时把他们18人赶到南门外山坡上，执行枪决。次日检查尸体时，只剩17具，其中一名伤轻得以逃脱。

在通辽军法处，对小喇嘛等进行多次会审，最后判处死刑。于1940年1月在通辽南门外沙坨里执行枪决。

其他一般逃亡叛变的士兵，遣回各原部队，编造名册，分别遣散回原籍，并委托警察、村长看管监视，后来部分派到矿井工地，强迫其终身劳动。

不论“归还兵”还是“叛乱兵”，普遍反映了蒙族青年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抗情绪。但当时没有政治领导和政治目的，因此沦为土匪，反而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引起受害居民极大愤恨。日本当局枪杀他们，也是借此以平民愤，缓和日本与东北人民矛盾的一项政治措施。

二、交换俘虏

1941年的春天，我在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时期，伪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少校军法官白晓东从海拉尔到王爷庙，曾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们谈到诺门罕战争时，白晓东对我谈过交换俘虏的情况如下：

1939年12月间，日、苏双方在满洲里互换俘虏。日本军的俘虏是由关东军司令部派人来接收的。兴安军的俘虏是由第十军管区司令部派参谋、军法官、宪兵接收的（那时兴安军管区司令部撤销，建立第九军管区司令部于通辽，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在海拉尔）。白晓东少校和宪兵团长（名字忘记）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兴安军俘虏共计331名，其中有日本军官3名（没有蒙古军官），两个日本中尉（名字不详），一个是兴安师司令部副官佐藤上尉。他们是7月2日派驻日军司令部联系，在胡拉斯台河岸附近被俘的。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和宪兵团将接收的300余名蒙古士兵，分别编造花名册，遣散还乡。将3名日本军官扣押在宪兵团院内3个房间，不准互相通气。过了几天，1名中尉服毒自杀，留有遗书；另一名中尉用手枪自杀，死在房后墙角，也有遗书。只剩下佐藤上尉，一天夜里，日本军法上尉和宪兵团长（日本人）在佐藤上尉房间里陪同佐藤上尉喝酒。他们2人劝佐藤自杀，佐藤反对说："苏联军没有杀我，你们为什么杀我呀？"军法官和宪兵团长一再劝说，非自杀不能表达对日本天皇的忠心。佐藤说："如果你们这样，请把我带到诺门罕高地，我在那里自杀好了。"他们3人相持到深夜。次日早晨发现佐藤上尉自杀，平整地仰卧在炕上，尸体上覆盖一面日本国旗，并有一份很长的遗书，这是日本法西斯对待被俘人员的控制政策。

三、德勒格与旺吉勒

听说德勒格与旺吉勒2人于7月6日投降苏、蒙军后，在乌兰巴托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他们2人从乌兰巴托回到厚和市（即呼和浩特）。德勒格到厚和市以后，逢人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如何好，不分对象场所，到处宣传。当时，正是日本法西斯在伪

蒙疆统治时期，弄得人们谁也不敢接近他。特务到处监视，他没有办法，只好到山西省五台山当了喇嘛。后来据说金川耕作大佐（当时通辽特务机关长）派人把他带到东部就失踪了。

旺吉勒到厚和市后，玩阔气，从东部哲里木盟把他的家属也接到厚和市。1945年春天，在王爷庙特务机关工作的拉西德瓦上尉对我说，旺吉勒被扣押在王爷庙街北上坎“保护院”（集中营），是年8月11日在“保护院”被日本人集体屠杀。

四、沈阳会议

沈阳东山嘴子中央陆军训练处的高等军事研究班，在我们参加诺门罕战争以后，由于战时关系，暂时停课。9月15日停战以后，该研究班于11月1日开始复课，我们又被召集到沈阳学习。12月中旬，听说兴安军方面的高级日本军官都到沈阳，在沈阳旧城大南关里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原张作霖官邸）开会。我的同学曾根崎中校和堀内章少校也被召集参加会议。正珠尔扎布上校和白云航中校说：“他们开什么会议，我们去看一看。”于是一天的午后，阿勇巴图中校、正珠尔扎布上校、白云航中校和我4人打算到会场上听一听研究什么。可是当我们到大南关里第一军管区会议室门外时，堀内章少校出来说：“你们如果有事，可以晚间到沈阳旅馆。”因此我们知道是开的秘密会议，不便参加。

1941年我和堀内章少校都在一起担任教官。有一次我到堀内章家喝酒，谈起沈阳会议的事情，堀内章透露的情况如下：

沈阳会议共7天，主要研究今后对兴安军的方针政策，总结诺门罕战争的经验教训。由治安部最高顾问花谷少将主持，有关东军参谋人员参加。满洲国军方面参加的有第三军管区的参谋长、第一军管区参谋长、陆军兴安军官学校顾问泉铁翁大佐、

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兴安师长野村中将、参谋长后藤外马上校、伪兴安骑兵第四团长高桥上校、第十二团长田中上校、迫击炮团长中野中校、炮兵团长平川上校、曾根崎中校、堀内章少校等30余名日本军官。

会议上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是兴安军空有虚名，不能作战，不如撤消兴安军改用警察；另一种意见是兴安军发生逃亡的原因，不能加罪于蒙古人，因为使用上有问题。再有兴安军逃亡，都往回跑，不像石兰斌部队成营成连地投降苏联，认为蒙古人比汉人可靠。

最后花谷少将下的结论，说兴安军失败的原因是：(1) 战略上的错误。不应该以蒙古人去打蒙古人，以后应使用蒙古人往南方去打八路军，以避免民族问题。(2) 凡是日本人充当团长的团，逃亡人数较多，蒙古人当团长的团逃亡较少，战斗力也强。因此都换用日本人当团连长的方针是错误的，今后应当除重火器部队仍应由日本人充任团连长外，一般骑兵部队完全应该用蒙古人当团连长，好掌握使用方便。兴安军应该建立步兵。(3) 战场上待遇不平等，临时凑编，伙食供给不好，装备低劣，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认为蒙古人头脑单纯，兴安省是他们绝对可靠的根据地。但他们没有想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后的几天当中，痛恨日本人、杀日本人最激烈的还是兴安军。

五、小喇嘛

1942年夏天，我参加第二师师长城户常规少将指导的现地战术时，在泰来县住了几天。有一次晚饭后我和王海峰少将在街上散步，忽听背后有人喊我，回头看时，不觉大吃一惊，军

法处会审已经执行枪决的小喇嘛，突然出现在面前。小喇嘛说：“咱们到一家饭馆谈一谈。”于是我们三人走进一家饭馆，当时日本统制烟酒，饭馆没酒。小喇嘛出去，不一会拿来一小瓶白酒和一大瓶“月桂冠”牌的名酒。我们边吃边谈，我们问他的遭遇情况，小喇嘛说：“在通辽军法处会审把他们17名判处死刑，1941年1月间，押到通辽南门外沙坨里执行枪毙时，金川大佐坐着卧车赶到刑场，问小喇嘛还有什么话说，小喇嘛说：“投降时已有条件在先，保全生命，为什么现在要枪决，不履行诺言？”金川大佐说：“现在还不晚，如果你能给我终身服务时，我可救你不死。”小喇嘛当时给金川大佐叩头，认他作干父。同时要求对一同处决的汪海龙和另外一人（名字忘记）赦免处死。金川大佐同意，当时赦免小喇嘛、汪海龙和另一个人的死刑，将其他人全部枪决后，带他们三人回到特务机关。金川大佐对小喇嘛说：“真的小喇嘛业已上报枪决，你现在不是小喇嘛了，而是另一个人了。”

从此小喇嘛当了国际特务，曾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三次。他的工作方法是两头说实话，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据自己知道的照实说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防人员，回来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也照实说给金川大佐。我们谈到深夜才散，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这位“神秘”的小喇嘛。

（摘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草木皆兵惊魂不定

黄勉之*

1939年7月，诺门罕事件发生后，在伪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的主持下，编成了伪满军独立第一旅。这支伪满军是由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第三教导队（辖步兵、骑兵、炮兵团）和吉林第二军管区第二教导队的野炮连以及沈阳陆军训练处的平射炮连混合编成。由第三教导队队长石兰斌少将任旅长，所以这支伪满军的代号就叫石兰部队。

8月中旬，由齐齐哈尔出发开赴诺门罕前线。这次出动是和苏联军队作战，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士兵都是当年3月入营的新兵，又是个新组建的部队。官兵们在私下议论说，这次去前线是“有去无回”，“白白送死”，人人都有畏战感。军官们有家眷的都留下了遗言，做了后事安排。像我这样未讨老婆的小排长，都把衣物行李送进了当铺。

登上了火车，官兵们一个个无精打彩，垂头丧气，默默不语。到哈尔山下车后，经一宿半天的行军刚到达罕达衔，就遭到苏军飞机的轮番扫射和猛烈轰炸，还投下一颗内装传单的巨型宣传弹。我们这支还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就遭到了重大伤亡，精神上也受到重创，官兵吓得失魂落魄。

行军中，到处可见日满军败退的狼狈景象。满路抛弃着鲶

---

* 黄勉之，系伪满中央训练处第五期军官候补生，毕业后先后任第三军管区教导队、石兰部队步兵第三团二营四连少尉排长。

鱼头式的日产汽车残骸、空油桶、弹药箱和被服。败退下来的兴安军士兵，三三五五成群的往回跑，还大声地向我们喊："快往回跑吧。"在日本关东军铃木部队（第二十三师团）和兴安军骑兵甘珠尔扎布的部队败退下来，日军再无增援部队的情况下，不得已才组建了我们这支石兰部队，并送上前线替他们当炮灰的。

我们在罕达街休息了一天，又夜行军向哈拉哈河方向前进。到达指定位置后，我们步兵团第二营和团部及配备的平射炮连占领944高地，第一营配原迫击炮连占领了970高地，旅 司令部和野炮连都在我们的后边。白天躲在掩体里，夜间到帐篷里睡觉。每天都遭到对方的炮击，有时我方炮兵也打几炮，但对方发现目标后，便把火力集中指向他们，这时我们的炮就哑巴了，光挨打，没有还手之力。

在战场上，最大的困难是吃饭喝水。我们携带的给养多数是高粱米和少量的大米，还有民国18年（1929年）东北粮秣厂制造的压缩饼干。诺门罕是沙土丘陵地带，阵地附近没有水源地，打深水井也很难打出水来，就是从井底渗出一点水，也不够人吃马用。前边的哈拉哈河里被日军投放了细菌，不能饮用，而且还控制在对方手中，也不可能到那里去取水。只能到后方托里拉湖用汽油桶去拉水。

汽车白天不敢去，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怕轰又怕炸，只能夜间去拉。有一次汽车运水回来，步哨听到马达声，以为是敌人上来了，对着汽车就开枪射击，其他步哨不问情况，也跟着瞎射起来，结果打坏了汽车，漏掉了水。

用汽油桶运回来的水，一个连只能分到一桶，一个班只能分到几壶。而且水的上面浮着一层汽油。事先用火柴把汽油点燃，这才能喝。用这样的水做出来的饭，汽油味很大，咽不下

去。没办法就得干啃压缩饼干。实在渴得受不了时，硬捏着鼻子喝上一口。遇上雨天，就用能盛水的东西接雨水，把沟沟坑坑里的积水都收集起来，煮出来的饭都是黑色的，一股马粪味。我们刚到970高地时，到了晚上都在山丘上露营，机关枪连的中尉排长张俊秀躺在草地里睡觉，拉水的汽车不敢开灯行驶，结果把张排长给压死了。

一天夜里，忽然枪声四起，说是苏军摸上来了。打了半宿，天亮一看，打死打伤的都是军马。原来是迫击炮的驮马受了惊，四处奔跑，被当成了敌人。第二天各连分了不少马肉，因为没有水煮，也都扔掉了。

夜间警戒都是复哨，新兵本来就胆小，到火线以后又受惊，吓破了胆，有点风声草动就以为是敌人上来了，也不查明情况，乓的就是一枪。有一天阴天，夜黑伸手不见指。一个哨兵过分紧张，竟向另一个哨兵开了一枪，幸未打中。那个哨兵问他："你打谁呀?"他回答说："我看有个人影晃动，以为敌人上来啦!"我们当官的最怕夜间出去查哨，怕暴露目标，不敢打手电；又怕挨哨兵的枪。所以，从老远的地方就喊："我是××，不要开枪。"

一次空战，正在我们连的阵地上空，一架飞机被击中起火，拖着滚滚的浓烟栽了下来。几个日本军官扬眉吐气地高呼"万岁！万岁!"这架飞机残骸正好落在我们连的阵地上，只见机尾涂着明晃晃的日本膏药旗，日本人灰溜溜地钻进了帐篷，一个个垂头丧气，什么话也未言语了。

苏军炮击停息的时候，士兵们就在掩体里赌博。团长崔风鸣拎着手枪到处去抓赌，因为事先派了放哨的，一次也未抓住。团长就问士兵们：你们还有闲心赌博?士兵们哭丧着脸回答说："我们手里的钱留着也没有用，不知啥时候就死了，还要钱干什

么!”从此以后，团长也不再抓赌了。

一天，五连在前沿阵地警戒，日本人上尉连长固武慌慌张张地带领全连溃退下来，一边跑一边喊：“敌人的坦克冲上来啦!”于是，整个阵地乱成一团，官兵谁也不顾谁，一窝蜂似地往后跑，枪枝、弹药、防毒面具、钢盔扔的满阵地，司令部的电台也被日本人台长砸了。机枪连的辛连长哭着喊:“等等我呀!机枪还未驮载呢!”崔团长跟在后边大喊：“你们跑也别把我扔下呀!”真是兵败如山倒。其实，并不是苏军的坦克冲上来了，而是一辆装甲汽车开到了我们阵地前沿。五连向后跑的时候，它也调过头朝回去了。反而把我们吓得人仰马翻。

这场虚惊过后，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团里组织了一个“肉追攻击班”，就是把炸药包、汽油瓶子绑在人身上，等苏军坦克上来时，就往坦克底下钻，连人带坦克一起报销。我们连的日本人连长命令我当班长，随时待命去送死。也是“老天爷”可怜我们，不久就停战了。

诺门罕战争中王显、徐春舫率营起义

金琦

1939年诺门罕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感到战场兵力不足，紧迫情况下派遣伪满军第三教导队为基干及训练学校炮兵队等部，指挥官是三江地区司令官朱榕中将，该部队到诺门罕前线时，炮兵放第一线，步兵第二线。可日军的装备劣于苏联，苏联炮兵都是牵引大口径，日本炮兵马拉野炮，射程又近，故将炮兵放第一线。诺门罕战场是沙漠地区，饮水特别困难，人

马饮水都由哈尔哈河去拉水，以后哈尔哈河被苏联飞机封锁，日伪军饮水的来源非常困难，有时渴得喝马尿。这次伪满军出动与日军共同在一个战场上，但待遇不一样，日军主食大米、面包等，副食罐头、鸡蛋、汽水、西瓜等；伪满军吃的霉高粱米、咸菜。这样不同的待遇，伪满军官兵满怀怨气。因此伪满军第三教导队王显、徐春舫两人秘密组织杀死日本军官策划起义，投奔了苏联。



九

伪满军内幕及头面人物

伪满军政部始末

洪　波

一、伪军政部的铺底

3月1日举行了“建国”仪式。不久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决定了“新国家”的各部门组织机构和人事任命。于是具有参谋、军令、教育训练、后勤供给等综合性的伪满“军事最高指挥部”的“军政部”下生了。

这个野生的胎儿，从下生后就具备它的畸形怪状。先是马占山投敌以后，参与建国大计，由黑龙江来长春时，曾从黑龙江军署带来一批班底。这批班底所有原省军署的参谋长、国防处、副官处、军需处等处的人员，约50余人。这批人员就成为伪军政部“开店”时的基本铺底。马占山来长春时，把一切军权暂由他的参谋长韩述彭代理。3月中旬，马占山从长春回到齐齐哈尔，以视察为名到了海伦。4月中旬，马在海伦、克山一带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重新率部抗日。这个消息日寇一直保守秘密，直到7月间，才为民众所知悉。

二、群丑粉墨登场

初期军政部的组织和人员的安排，据当时的传闻，黑龙江和吉林双方的实力派曾经有分赃式的约定，按军政部的编制、人事，双方平分秋色。

由于双方各拥有枪杆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日寇对他们并未

做过多的约束和限定，采取了以汉奸制汉奸的办法，佯做不干涉人事的姿态，因此伪军政部虽与其它7个部同隶属于伪国务院，然而它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却与其它7个部不同。

开店不久的军政部编制机构极为简单，总长、次长以下设有参谋司、军需司两个局，两司设有中、少将级司长一人。由于两派的约定，参谋司长由吉林派的郭恩霖充任，这个汉奸是熙洽最知心的红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是辽阳县人，对部下骄横。军需司长张益三，吉林双城人，原任黑龙江讲武堂教育长，吸食鸦片，人似老实，实系庸碌无能，但充当汉奸，却不甘人后。这两人后来都因卖国有“功”升任警备军司令官。

参谋司当初设有军事课，掌管用兵作战、军事编制、教育训练等业务；军衡课掌管人员任免，升降调补，赏罚事宜；军法课掌管军法有关事务；医务课掌管军事卫生业务；总务课掌管文书、印信、用品、部内财务。

军需司当初设有兵器课，掌管兵器弹药、装备器材、军马补充等业务；经理课掌管军需被服、建筑等业务；舰政课统辖江防、海防业务。

各课置有上校级课长一人；课下设股，股有中校股长一人；股下有科员（少校、上尉级），再下为文雇官员，大部系委任级。

第一任各课长如下：

军事课长郭福瀚，军衡课长刘某，后由郭岩霖担任，军法课长秋朋，医务课长宪原，总务课长赵秋航，上述群奸都是吉林派来的。军需司的兵器课长王济众，经理课长马金波，舰政课长范某。

从伪军政部的所谓首脑人物的名单上看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清一色式的中国人。表面颇有中国人有他自己“实力”迹象，不像其他7个部那种日满人员混杂一起，傀儡形象极

为昭著。当时伪各部都设有总务司，司长全部是由日本人担任。这个总务司长就是每个部的太上皇，大权在握，而且这些人物，又都是这个部的“专业人材”。例如曾为二次大战中的日本头号战犯星野直树，就曾任过伪满财政部的总务司长，这个沾满东北人血水的战犯，就是日本大藏省的专门理财的人物。他在伪满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由财政部总务司长升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这个长官一职，实际是伪满的国务总理。在他任职期间，曾经制定了许多侵害东北人民的所谓“国策”。

三、伪军的太上皇

伪军政部的一切都和其它7个部不同，以极小事实为例，如在科室称呼上，其他7个部司的下边科室名曰“××科”，而伪军政部司的下边科室名曰“××课”，这个“课”的叫法就充满了十足的日本味。因为日本陆军省，关东军司令部等军事部门就都以“课”命名科级组织。不仅如此，上述伪满各部皆设总务司，伪军政部却没有这样组织，它有一个具有极大权力的机构，这就是“军事顾问部”。各军区的司令部内也设有军事顾问部，这些顾问部里的军事顾问，全部是日本军队的现役军人，又都是关东军所属各部队各军种的参谋、军需、军法、宪兵等负责军官。凡伪满一切军事活动、给养和装备等，皆不需经过伪国务院，转请关东军核示（伪满除有关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政务，全由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掌握外），这些顾问直接签署批示，即可生效，不必再转请关东军。因此，这个顾问部权力之大，气焰之盛、可谓无以复加。

这个太上皇的第一任最高顾问多田骏，曾经担任过中国北京陆军大学教官。日本驻屯支那军司令官，是一个所谓“支那通”，通汉语。第二任最高顾问是头号战犯板垣征四郎（平型关

大战的败将）。第三任最高顾问是后来侵华日军的支那派遣参谋长松井顺太郎，也是一个所谓“支那通”。他曾任过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这些家伙们后来都成为侵华的战犯。

四、店铺的开来开去和它的职权

伪军政部开店时，本部并不是设在长春。伪国开张时，只是先把军政部的牌子挂在“新京”（长春）小五马路原“吉林省长春被服厂”大门上边。院内除伪军政部次长王静修的住宅外，什么人也没有。留在长春的仅三四个下级军官，每天在长春西四马路民政部内办公，每天负责转递公文。原来1932年3月伪满建立国家后，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沈阳，为了与日寇联系方便，便于伪军调动，因此，伪军政部的成员（大部分是马占山带来的黑龙江军署原批人马）全在沈阳大南门里“东北边业银行”旧址办公。其实并无什么公务可办，大大小小的成员，每天吃着燕菜，无事则打打麻将，听听鼓曲，有的寻花问柳，也有的喷云吐雾，过着幽灵般的生活。

8月间，由于关东军司令部迁至长春，这个尾巴官署的军政部也随着回到长春。在长春小五马路被服厂原址，开厅办公。这时吉林军署（熙洽系统）的新伪军政部参谋司成员才来会合。以上所述是伪满军政部新开店的前前后后简单经过事实。

下边再谈谈伪军政部的职权。伪满军政部这个畸形胎儿，它的形体虽小，却五脏俱全。它的编组机能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防部机构稍有不同。它把军事、军令、军训、后勤等有关部门，融为一体。由于他属于军事保密关系，许多事务都不公开，也不刊载于伪满的《政府公报》，所以有关的重要资料，恐怕存留不多。今就当时可记忆的情况，略记述于下：

伪军政部的参谋司，它不仅执掌用兵作战，军队编制等业

务，军令的颁布，兵员的教育训练，军事高级干部的培养，它也有责。因此，它既有总参谋部的性能，又有军事训练总部的职权。至于军官的任免、调动、赏罚、军法等业务，一般性军政业务，也由其统帅。伪军政部的军需司，实际负担全军的后勤业务，凡兵器、弹药、器材、舰政、飞机、军马、军医、被服、营建、费用等，都是这个司的业务。

伪满军政部直属的地方组织，建国当初分设9个警备军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由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军法处组成，后来又增设兵事处和兽医处。

9个警备司令部有奉天、吉林、黑龙江、滨江、热河、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等省，均设警备司令部。

奉天省警备司令部驻奉天市，司令官于芷山。吉林驻吉林市，司令官吉兴。黑龙江驻齐齐哈尔，司令官程志远，不久被刺死，由张文铸接替。滨江省驻哈尔滨，司令官于琛澂。热河驻承德，司令官张海鹏。兴安东驻扎兰屯，司令官忘记。兴安西驻林西，司令官乌古廷。兴安南驻王爷庙，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兴安北驻海拉尔，司令官忘记。

当时各省警备军具体兵力多少，因军事保密，下级无从知晓，兴安几省军队多属蒙族骑兵。奉天还设一个极特殊的部队，受伪军政部直接领导，这个部队名叫靖安游击队，后改靖安军。这个特殊组织起来的队伍，它不是由旧有的武装力量改编起来的，而是由日本人充任指挥官，由“满鲜”两族浪人编组。它的服装特点，是在军衣袖头上接一红色袖头，群众叫“红袖头。”这个队伍打抗日义勇军最狠毒，对老百姓的残害也最毒辣。伪满建国初期，辽东、辽西地区人民恨之入骨。伪军政部为了纪念它们的“功绩”，一直保持“靖安”称号。于1933年日寇侵略华北地区，这个军队随日军进关，做了很多坏事。

五、军警一元化

伪军政部于康德4年(1937年)7月，由于伪中央各院部的大改组，曾改称治安部。当时日伪为了加强国内治安，巩固他们的统治，围剿各地抗日武装。把军队、各警察队、警护队（铁路守备队）置于一元化的领导下，便于统一调动。于是把伪军政部的参谋司、军需司，把民政部的警务局，把铁路守备队归并一起，设置治安部。因为在此以前，伪满已改帝，所以治安部的头儿，改名叫“治安部大臣”，下设文职治安部次长一人，不干与军队，改组后的治安部随着形势需要，机构编制比过去庞大多了。改组后的治安部军警一元化，加强了日伪统治人民的工具。

六、伪满的军统

伪满军政部，在参谋司、军政司前，曾编组一个军事调查部，设有少将级部长一人，名目是搞调查研究和宣传，实际是一个特务机关，成员多系文职，职名什么部员、秘书之类，究竟成员多少，无法知晓，他们编刊物、出报纸、搞电影放映等。当时出版有《铁军》（汉文）、《铁心》（日文）是月刊，《精军》是旬刊。还有几个放映队，这是表面的工作。据说一些“嘱托”、“秘书”之人物，有的远至上海、香港等地，他们去做什么却不知道了。

警务司编制内有一个特务科，这个科没有中国人，一色日本人，有电台、有各种通信设备，办公室，发电室，不准满系人员进入。省市县也均有特务科，他们和日满军宪有密切的联系，一些进步人士、抗日爱国志士被他们处死的很多。这两个部是纯粹“军统”式的特务机关。

七、武官令和国兵法

伪康德4年（1937年）伪满公布了《武官令》。关于武官的任免、赏罚等一切，有了明文规定。接连又公布了《国兵法》，对征兵做出了明文规定。其他军事训练教育机关，机械化武装部队，空军部队也相继设置，不仅最高指挥部的军政部扩大组织，增加课室，有了兵事课、总务课、通信课等等。地方的队伍也有所增加，从日本又招来许多退役的士官，充实他们新编的特种队伍。

《武官令》就记忆所及，内容繁多。只就武官进级期限，略述如下：由军官学校毕业后初任少尉，满2年进中尉，中尉满2年进上尉，上尉满2年进少校。少校满3年进中校，中校满3年进上校。上校4年进少将，少将3年进中将，中将4年进上将。上将终身职，因军功可敕封为“将军”称号，身列“将军府”，这是伪满军人最高的荣誉职。据记忆受此称号的有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和吉兴等人。

武官令也规定了伪满的军种、服制。军种有：步、骑、炮、工、辎、军法、军医、军需、航空、海军等。服制、步兵以正红色领章为标志、骑兵绿色、炮兵黄色、工兵紫桃色、辎重兵天蓝色、军法白色、宪兵黑色、军医黑绿色、军需浅桃色、航空兵浅蓝色。这一套完全按照日本军一整套衣钵制订。

伪满的《国兵法》，实际是残害青年的严刑峻法，在民间流传的“国兵漏”一词更为普遍。它和“抓劳工”同等并列，人们一提起这个词汇时，那种种凄惨的往事，很自然地涌上心头。

伪国兵法规定每年征兵一次，由省军管区兵事处负责处理，与省市县联合行动。每次征兵都发生许多惨事，弄得家破人亡。由于承办人贪污受贿，更使穷苦人有冤无处可诉。特别军医人

员从中作鬼，有权有势有钱的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可以串通更换，无权无势无钱的穷家子弟，只好为日伪去做牺牲品。有人为了躲避兵役远走天涯，流浪他乡；也有的被日伪军警当局设法捕回坐牢，有的家属被抓入牢狱。

八、伪军的扩大化和它的覆亡

伪康德4年（1937年），军政部改组为治安部后，不仅中央级扩大了，地方组织也有了改变和增加。首先是各省警备司令部改为军管区司令部，由最初的9个军管区，增到11个军管区，人员编制也增加，旅团数都有了扩充。一些机械化兵种也陆续有了编制，航空部队也出现了。同时军事训练机关，也相应增强。日寇所以如此，是企图用这些武装来补充它在满洲防务的不足，并可做为它侵华的辅助力量。这些特种部队，一般都以团的组织编成，直隶中央，军官指挥人员多系日本军退伍军人，满系军官成分很少。这些部队中一部分部队，有的参加过张鼓峰和诺门罕战斗，有的随日寇到过华北，但是实践证明这些部队，不堪一击。还有的由于士兵具有民族气节，起义到抗日联军中去，有的哗变，四处逃散。

除了这些部队，还有一些后勤组织，计有被服厂3处；军械厂3处；通信材料厂1处；军犬训练所、军鸽训练所处各1处。日寇为了巩固统治，从建国后就成立了回收民间武器的“武器弹药回收集积所”，专门回收民间散存的武器弹药，把回收来的武器弹药全部运送日本毁炼，经过熔铸后再制成新品，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伪满的军训教育机关，起初仅有一所军官再教育的陆军中央训练处，后改名陆军中央训练学校。还有所军官学校，专招收日满青年学生入校训练3年，毕业后初任少尉军官。除此以外

还有飞行学校、宪兵学校、军医学校、通信学校等。每年还选拔一小部分现役军官，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做为军中的中坚力量，这些被选拔的军官，多系上层分子子弟。例如伪皇帝三弟溥杰就是一例。

从上述一些事实看，日伪的军政措施，似乎有一套长远打算。但是他们虽然竭尽了心机，这些被训练出的爪牙，许多并不合乎他们的理想，精神状态不能日满“一德一心”。

康德12年(公元1945年)，伪满洲国政府又一次大改组，名曰充实“大东亚圣战体制”。为了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把军警一元化的治安部，又分为军事部和警察总局两个机构。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军事部配合日军行动，警察总局负责国内治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打得日伪军四处溃散。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随之垮台。在关东军卵翼下的这个畸形的“军事最高指挥部”，亦随之寿终正寝了，落到可耻的下场。

(赵起超整理)

伪满军的内幕

万嘉熙

一、伪满军的组织概要

伪满军共有10余万人，设有10余个军管区。例如沈阳设有

第一军管区，吉林设有第二军管区，齐齐哈尔设有第三军管区，哈尔滨设有第四军管区，承德设有第五军管区……设在海拉尔的第十军管区主要为蒙古族编成的部队。

统辖各军管区的为伪军事部（最初称军政部，后改称军事部），军事部设军事部大臣，各军管区设军管区司令官。

这是伪满军表面上的组织形式，实际上伪满军完全处在日本关东军内外双层控制之下。

外层控制

日本关东军自称为“亲邦军”，虽然未令伪满军自称为“子邦军”，实际上把伪满军列于“子邦军”的地位。伪军事部当然要听从驻在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而在各地的伪军管区司令部，也必须听从驻在各地的日本防卫军司令部的指挥。这就是由日本关东军在外层对伪满军的直接控制。

内层控制

在伪军事部、伪军管区司令部和各伪军管区的教导队中，都设有日本顾问部，在各团都设有日本军事教官，各营各连各排都配置有日系军官。顾问、军事教官、日系军官都是日本人，伪满军的实际指挥权，都操纵在这些人的手里。

顾问是日本现役军官，乃由日本关东军派来的。军事教官是日本的退伍军官，由顾问部采用的。日系军官是日本的“干部候补生”出身的预备役少尉或是退伍下士官，到伪满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而任伪满军官的。

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在内层对伪满军的直接控制。

如果把伪满军的指挥系统用图来表示，就是这样的（见附图）。图中的虚线，表示表面上的指挥系统，图中的实线表示实际上的指挥系统。

二、伪满军中几种“帽箍”之间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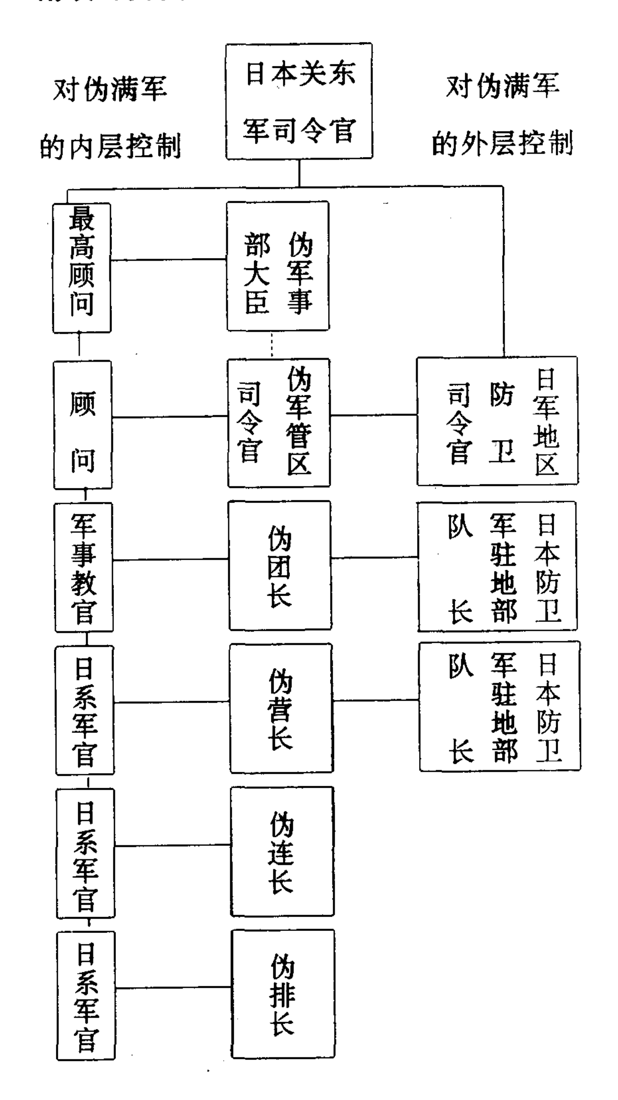
伪满军中有“红帽箍”和“灰帽箍”的名称。什么是“红帽箍”呢？就是指日本现役军官的日本顾问，例如日本顾问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头号战犯，都是当过伪满最高顾问的人，这些人在实际上也是代表着日本关东军指挥着全部的伪满军队。因为他们以日本现役军官的身分来当伪满军的顾问，穿的是日本军服，日本军服的帽子带有“红帽箍”，所以把他们叫“红帽箍”。

还有一种“红帽箍”，是日本的退伍的预备役军官到伪满军中来的军事教官。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如水町竹三少将（炸死张作霖的主谋者）、真井鹤吉大佐（日本“二·二六”事件的炮兵联队长）、南云亲一郎少将等人，他们初到伪满军中时，也是日本军服，“红帽箍”的帽子。不过，从远处一看，人们就可以发现这些预备役军官的“红帽箍”与现役军官的“红帽箍”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是帽箍的红色崭新，衣服整洁，而且戴帽人的年岁较轻。一方是帽箍的红色已脱褪很多，衣服破旧，戴帽人的年岁很老。这些佩戴着褪色“红帽箍”的老弱残兵，不论佩戴着怎样高阶级的肩章，哪怕是个少将，也要服从现役军官大尉顾问的命令，顾问就是他们的直属上司。

后来日本关东军，把这些退伍的预备役军官完全编入伪满军的编制之内，各照原级进一级，日本中佐变成伪满军的上校，日本大佐变成伪满军的少将，日本少将变成伪满军的中将，于是这些人就不能戴“红帽箍”而戴起“灰帽箍”来了。

还有低一级的原先是日本“干部候补生”、预备役少尉或者下士官出身的日系军官，这些人在伪满军中经过一段时间教育之后，当上了伪满军官，他们一开始就穿着伪满军服，戴着伪

附表：伪满军指挥系统示意图



满军帽的“灰帽箍”。

因此，在伪满军中的日本人可分为三级，一级是日本现役军官的顾问，二级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退伍军官的军事教官，三级是日本“干部候补生”、预备役少尉和退伍下士官出身的日系军官。

这些人从上到下渗透到伪满军各层组织之内，监视着伪满军。而他们内部之间则是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红帽箍”的顾问，威风十足，看不起这些退伍的预备役军官，更看不起“干部候补生”、少尉和下士官出身的日系军官，认为这些人都是到伪满来混饭吃的人，如不严加监督，就要为非作歹。

“灰帽箍”的军事教官、日系军官，穿上伪满军服之后，也感觉“红帽箍”的顾问，带着有色眼镜来看自己，很不服气，怨言很多。

三、伪满军中的差别待遇

在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日本人）和“满系军官”（中国人）的待遇完全不同。不但日系军官吃大米，满系军官只能吃高粱米之外，同一阶级的薪俸，日系军官也和满系军官大有悬殊。据说制定这种差别待遇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1. 日本人和“满洲人”（即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同。日本人高，“满洲人”低。因此，日本人的薪俸要高于“满洲人”。

2. 日本人和“满洲人”的工作能力不同。日本人的工作能力高，“满洲人”的工作能力低，日本人作主要的或重要的工作，而“满洲人”做不重要的甚至没做什么工作。因此，从按劳付酬来说，日本人也应高于“满洲人”。

3. 日本人是在国外，“满洲人”是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在

国外的薪俸当然要高于在国内的薪俸。

这种差别待遇的理由，日本侵略当局是公言不讳的。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军的控制，除上述内外双层之外，也逐渐日甚一日。最初时期，如伪军管区司令官、团长、营长等职务，还由中国人担任，只不过中国人的司令官，要配置日本人的参谋长；中国人的团长，要配置日本人的团副；中国人的营长要配置日本人的营副……后来，连这种表面上的形式也不顾了，直接由日系军官当了伪军管区的司令官或是团长等职务了。

四、伪满军官教育

伪满的军官教育，主要是由三个教育军官的学校担任。

教育初级军官的学校，原先是设在沈阳的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后改成陆军训练学校），后来迁到长春拉拉屯，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在这里教育由中学考进来的学生和由日本招募来的日本“干部候补生”和退伍下士官。在这里毕业之后，任伪满的初级军官。在这个学校的学生，中国人叫“军官候补生”，日本人叫“军官候补者”。

教育在职军官的学校，是设在沈阳的伪陆军训练学校。在这里教育自上校以至少尉各级的学生，分为甲种、乙种、丙种、丁种、戊种各种学生。主要教育内容是实兵指挥和重火器的使用。

教育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原先是设在沈阳的伪陆军训练学校的专科，后来迁到长春，改名为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在这里受教育的是自中校级至上尉级的军官，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日系军官”的日本人。

伪满军使用的典范令，如步骑炮操典、射击教范以及其它

军事书籍，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按伪军编制对内容略有增减。后来伪满军的军官教育，完全改用日文书和日本语了。

不论是任何教育，"假想敌"都是苏联军，伪满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作战。战术的教学方案，总是设想有一个师的伪满军在配合主力的日军作战，要求尽一切力量为日军主力打掩护，不是掩护前进，就是掩护后退，千篇一律地要求为日军牺牲。

但是，这不过是日本侵略者所打的如意算盘而已，实际上完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恰恰得到相反的结果。下述两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五、藤井重郎少将之死和楠本被刺

在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时，曾想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于是就派了伪满的王牌军——靖安军到华北一带参加作战。途经黑鞑子营时，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就被伪军中的士兵李某用枪击毙了。这个士兵在打死藤井重郎之后，因无法逃脱就自杀了①。据当时在场的人说，这个李某士兵在临死之前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现在日本鬼子进攻我们中国，我打死日本鬼子的一个司令，就等于消灭它的一个师。"

自从发生藤井司令被打死的事件以后，日本指挥伪军的军官们，时时刻刻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他们说，汉人"狡猾"不可信任，不如蒙古人"纯朴"可以信任。于是想利用伪兴安军的蒙古人做他们的炮灰了。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又是落空了。

---

① 李某为李玉峰，当晚被敌人杀害，并非自杀，参阅"长春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军在诺门罕的侵苏战争时，就是实际利用蒙古族伪兴安军的配合作战。这一战伪兴安军不战而逃，日军也被苏军打得一败涂地。

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时，原想派一些满军到菲律宾等地，为它壮壮门面。当时伪军事部最高顾问楠本笹隆中将曾到牡丹江一带伪满军驻地进行视察，在视察时。楠本被伪军一士兵打了一枪，不幸枪弹击中楠本军服上衣口袋佩带的钢笔上，未能把他打死。据当时和楠本一同去视察的伪军事大臣邢士廉说，他和楠本视察要塞，楠本先下了马，邢士廉正在下马时，就听见一声枪响，看见有一名士兵拿着“3号橹子”枪又在向楠本开第二枪，因为枪发生了故障，所以第二枪没能打响[①]。就在这个时候，该士兵转身就向山后跑走了。打中楠本上衣口袋钢笔的第一枪的子弹，顺钢笔而下，落在上衣的衣角里了。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日本侵略者愈来愈觉得伪满军不可信任，于是派遣伪满军到菲律宾去的计划也就取消了。

六、从“仪仗队”变成“工兵队”的伪满军

伪满军中屡次发生的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的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对于伪满军日益感到惶惶不安。在伪满成立当初，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大力扩充伪满军队来充作它的炮灰的。但在上述的形势下，也不敢扩充了。所以，伪满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都是破旧不堪并且是小口径的。例如，伪满一个军管区的炮兵不过只有一个连，并且都是小口径炮，不是山炮，就是野炮，没有一门重炮，也没有一门加农炮。这些炮兵，只不过在举行某

① 据肖玉琛、李野光的回忆及文章，枪并没有发生故障，只是在慌乱中，未能再击中敌人。

种典礼的时候，起着放礼炮的作用。

伪满军也有几个航空队，驾驶员绝大部分都是日系军官，飞机也都是日本旧式的歼击机，没有一架轰击机。伪满军中也没有一辆坦克。伪满军的装备内容，也就是如此。

在诺门罕败北以及楠本笹隆最高顾问遇刺以后，伪满军的顾问和日系军官们常这样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只起个'仪仗队'的作用罢了。"到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侵略战争中连吃败仗，由于前线日军武器的缺乏，竟把伪满军的野炮、山炮等也都让缴还给日军。于是伪满军的任务变成给关东军修筑阵地以防备"苏军进攻"的"工兵队"了。也就是在关东军的监督下，从事修筑工事。

伪满军从开始到垮台前夕，只不过是从"仪仗队"到"工兵队"的过程。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它所谓"太糟糕"、"不能信任"的伪满军，还要装扮成"精锐的军队"来给英国人看。记得在1940年春季有一个英国武官到沈阳伪陆军训练学校来参观，当时伪训练学校顾问小野正雄中佐就用伪满军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把戏。演给英国武官看的是步兵一个排和重机一个排的教练。原来伪满军步兵排编制只有一挺轻机关枪，重机枪排也只有两挺重机关枪。由于英国武官的参观，小野正雄顾问就临时把步兵排改成二挺轻机关枪，重机排改成四挺重机关枪，用以表示伪满军的装备不弱。据说这次演习，还得了英国武官的"好评"。

七、日、满军的矛盾和"帝军"二字的纠纷

在伪满军的兵营中挂有日军和"满军"两个士兵互相拥抱的宣传画，上面写着"日满两军亲如一体"。实际上则是矛盾重

重。日本关东军不但把伪满军看做是“劣等民族的部队”，并且把在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看做是下级日本人。走在街上日本士兵虽也给伪满军官行礼，但很勉强，有时举起手来一看是伪满军官就把手放下去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使身在伪满军籍的日系军官就感到这种滋味的难堪而怨言日增。尤其感到不满的是在伪满军参谋军官带参谋带的问题上，最初关东军也不准伪满军官带参谋带，说什么要和日本军参谋有所区别，只准伪满军侍从武官带一条参谋带，而且仅限于举行仪式时佩戴。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由于伪满军报刊使用了“帝军”两个字，使关东军大为震怒，实际上也就是日系军官和关东军的纠纷。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伪满军事部的第四科，是担任伪军教育业务的一个科，该科发行一种内部报刊，名为《精军》的报纸。担任编辑《精军》报纸的日系军官大槻上校，曾在某期“精军”刊物上，使用了《帝军》字样，他认为日本军可以称为“皇军”，当然伪满军也可以称为“帝军”。没想到关东军看到有人竟敢称伪满军为“帝军”，是与日军分庭抗礼，于是就追究起这个问题来了。日系军官大槻上校也就为这件事被撤职。

佐佐木到一对伪满军的改造与控制

刘启民*

伪满军政部高级军事顾问升任最高军事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对伪满洲国军的改造是夙有报负的。

* 刘启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伪满军事部少校秘书官。

佐佐木到一从陆军大学毕业，即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曾经结识了孙中山、李烈钧、程潜、潭延闿和蒋介石等许多国民党要人，所以他对中国军队的情况，了若指掌，他对改造中国军队早有研究。1927年2月，佐佐木到一著《支那陆军改造论》一书出版。其第三章《中国改造的基本问题》是本书的核心。他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革命运动与军阀混战的状况，指出日本对此不应坐视不管，而应“帮助”解决。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改造腐败的中国陆军。中国陆军又因雇佣制而造成腐败，所以要加强中央统制，削弱军阀势力，实行征兵制。所有这些想法都在几十年后的伪满洲国军改造中，变为实际方策付诸实施了。

日本间岛总领事馆曾报告如下的情况：“在昭和6年（1931年）有236名叛逃；昭和7年（1932年）竟达2 240名。”另据《满洲国军政指导状况报告》记载，大同2年（1933年）1至8月伪军逃亡4 673名。这种哗变，逃亡已成浪潮，冲击着日军统治。对此，佐佐木到一说：“满洲建国以来，满军实质上是协助了日军，其大部分足以信赖。但满洲国军部下叛乱、逃亡者亦不在少数。有鉴于此，对满军必须实施监督。”彻底改造伪满国军的任务，成为日本军事顾问部的中心工作。

1933年，佐佐木到一起草了改造伪满军队的方案，包括伪满洲国军建设、编制、训练案。佐佐木到一认为当时伪军逃亡、哗变等事件发生，是因满洲国军中“封建军阀风气”导致“个人义气千秋主义”而动摇了军心。因此，他把统一伪军编制、薪水制度，加强日本顾问、军事教官在伪军中的势力，控制伪军的训练权、用兵权作为改造伪军的中心。佐佐木到一在掌握伪满军政实权期间采取了如下两方面的措施：

甲、加强地方顾问制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即以"军事顾问"之名渗入东北军队之内，从事间谍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伪满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日寇为了控制伪军，大批向伪军内派驻"军事顾问"。1932年3月，伪满政权建立，关东军以满洲国防"委诸"日本为口实，向伪军政部派驻"军事顾问团"。4月13日，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组成，陆军大佐（后升少将）多田骏任最高军事顾问，其余陆海军顾问共22名。7月日本军事顾问部设立。军事顾问部下设一、二、三班以及马政、海军、法务等课，负责各地区顾问业务。军事顾问部最高指挥者是最高军事顾问；伪军政部凡事须经最高军事顾问批准方可实行。高级军事顾问（相当于参谋长）辅佐之。最高顾问和高级顾问是军政部的实权人物。

然而，此时地方顾问制尚不完善，各警备司令部及各师军事顾问的人数、军阶等较少较低。如于芷山的奉天警备司令部最初只有菅野少佐1人；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只有林义秀少佐1人；吉林警备司令部只有大迫通贞中佐1人；黑龙江警备司令部也只有东宫铁男少佐1人。

佐佐木到一任最高军事顾问后，努力扩充各伪军管区军事顾问的人数，提高级别。他把主任顾问提到大佐一级，其下又有分管用兵、教育、经理事务的顾问。将伪军管区内各项事务均控制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手中。如第八军管区，主任顾问是立花大佐，用兵顾问是安永大佐，教育顾问是石原少佐，主计顾问是细田少佐。这些人内联中央顾问部，外通旅团的日系军官，把军管区内指挥权完全掌握了。

在伪满军队基层，佐佐木到一以军事教官的形式实行军事顾问的职能。军事教官是以"应聘官"的名义，从日本陆军预备役佐官和尉官中邀"请"来的，每旅1—2人，每教导队2—3

人。名义上是辅佐旅、团长训练军队，然而实际上确掌握了旅、团长的兵权。1934 年，佐佐木到一把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水町竹三少将，作为应聘官请来，主管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的教育、训练大权；他又把自己的部下进藤弥三郎中佐、城户中佐、后藤中佐、河野满少佐等荐为应聘官。这些人进入伪满军后接替和监督着伪军官。

经过上述各项措施，到1936 年，日本军事顾问从上到下的控制了伪满军的用兵权、训练权，进一步使伪满军成为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的工具。

乙、削弱和控制伪军个人势力。

第一，实行奴化教育，培植亲信，淘汰旧军官。

日军占领东三省是通过一些汉奸取得的。但汉奸中部分是旧军阀和失意分子，如于芷山、张海鹏、于琛澂等。他们各怀鬼胎，有机会就会拥兵自重。佐佐木到一对此早有认识和研究，因此他在改革伪军过程中，一方面从军队组织系统方面整顿伪军；另一方面培养安插亲信，淘汰旧军阀的私人势力，巩固日军统治。1933 年4 月，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在沈阳建立。该处教育分既成军官补修教育和候补军官养成教育。既成军官教育是上校级以下伪军官，用分期轮训办法，培养伪军官“建国、建军精神”，服从日本侵略政策。候补军官教育是招募伪满中等学校毕业生接受一年军官候补生教育，灌输日满：“一德一心”的奴化思想，毕业后任官少尉，作为伪满军的基层军官。另外培养一批由日本军队编入预备役的“干部候补生”，下士官出身的军官候补者，他们是日本军事顾问的爪牙。经过培训派入伪军，来掌握伪军的基层权力。

1934 年，伪军政部规定非经中央陆军训练处训练者，不得任伪满军官，使旧军官逐渐被淘汰。1935 年，佐佐木到一对该

处日本军事教官讲："要了解被征服民族是很少有敢于反抗的。我们不要只着意于他们反抗意识，而要会使用他们给我们服务。要教育他们沿着建国、建军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教育成果，也是你们对满军指导上的责任。"这实质上是采取"以华制华"的毒策，企图培养伪军成为日军的忠实走狗。

第二，统一薪饷制度（即实行经理制）。

伪满建国初期，各部队仍按旧军阀时代的习惯发薪，造成伪军薪俸千差万别，军阶与能力以及薪俸标准不一，因而引起伪军官之间、官兵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佐佐木到一在《支那陆军改造论》中指出的士兵逃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佐佐木到一将军饷统一到中央，由军政部军需司发给，士兵领取薪俸时捺手印，防止克扣军饷，引起兵变、逃亡。

第三，废除警备司令部，推行军管区制。

伪满建立初期，设立了吉林、黑龙江等警备司令部。由于它们仍是军阀各占一方，不利日军控制。1934 年7 月至8 月间，军政部依据佐佐木到一的方案，颁布实行军管区制，削弱旧军阀的权力。1934 年，第五军管区司令官张海鹏升授侍从武官长，把洮辽军旧部逐渐混入其他军管区。1935 年免去于芷山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以军政部次长郭恩霖接替于琛澂任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司令官。从而削弱了旧军阀的个人势力。

第四，监视、调查伪军动态。

1935 年，佐佐木到一继板垣征四郎后任最高军事顾问。同年，他在军政部军事调查部内设立了第二课，任务是调查军队人心动向。具体实施由顾问系统领导各部队的军事教官，日系军官及亲日伪满军官调查，将调查结果上报。据当时任军事调查部长的王之佑回忆说："军事调查自 1935 年8 月开始，1936 年4 月结束。编成3 个调查班，每班4 个人，共调查5 个军管区和

1个江防舰队。主要查清各军管区部队的历史、官兵历史和素质，什么出身和什么教育及士兵籍贯。调查结果，伪满军队素质很差。1936年统计伪满军共14万人，有7万是关内人，其他是关外人或招募来的。也就是容易发生逃跑现象。”据此调查，佐佐木批准实行“寓征于募”征招伪军。1937年至1940年募兵达10万人，淘汰一些“旧兵”。1940年6月，根据《国兵法》公布第一批国兵入伍。

另外，佐佐木到一还在伪军内设密探，了解伪军官“人心动向”。王之佑曾说：“除了顾问、军事教官将调查情况上报外，还收买许多亲日男女密探，围绕在我们身边和家庭。办法有填写成绩考核表的，也有密报的。这时谁监视谁都不清楚，互相猜疑，人人自危。”

佐佐木到一改造伪满洲国军的自我评价和我们的结语。

1937年8月，佐佐木到一回顾他改造伪军的情况说：“从大正10年（1921年）在广东时期起，我已抱着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军队的信念。任满洲国军事顾问后，便把过去研究的付诸实行，经过5年努力的结果，得到意外的效果。”

经过改造的伪军，一时成为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确是勿庸讳言的。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的一年间，伪军为日寇作战而死伤者100余名。在1935年大讨伐中伪军“不仅已经出现数百名死伤者，还击毙了相当数量的匪贼，逮捕或杀死匪首（其中几乎全部是反满抗日的军队和群众），夺回人质的人数也超过100名”①。

1936年，佐佐木到一进一步驱使伪军镇压抗日武装。9月，他为了显示他在改造伪军上的“成就”，亲自策划了“北部东边

① 见1935年12月8日《新京日日新闻》。

道独立大讨伐”，将矛头指向抗日军王凤阁、金日成等部。10月，军政部在通化地区设立讨伐指挥部，佐佐木到一亲任部长。在佐佐木到一亲自指挥下，约有1.62万名伪军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大讨伐。1937年3月，伪军在八道沟附近逮捕了抗日英雄王凤阁及妻与子，4月，王凤阁英勇就义在佐佐木到一的屠刀下。

现在转过来我们再看一看以下的事实："七·七"事变爆发后，佐佐木到一命令组成"热河支队"，于8月1日向热河西南长城线进犯，与国民党高桂滋军作战。"热河支队"由藤井重郎任支队司令率领靖安军和伪第五教导队约7 000人参加战斗，进犯至北平附近，大肆烧杀、劫掠至同年底撤回东北。看来伪军确已成为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实并非如佐佐木到一所设想的那样。伪军中也曾相继出现使日军官胆颤心寒的事件。诸如藤井重郎在驱使伪军进犯中，被义士击毙；在诺门罕事件时，第三军管区席营长率全营反正；继之，又发生王岗飞行队叛乱事件；1944年第七军管区发生了枪击最高军事顾问楠木中将事件；迨八·一五日寇败战时刻伪满军到处蜂起举义等等，都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

四任伪军事大臣的丑态

马金波*

一、张景惠

第一任张景惠。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部长，后改部称总长。4月，他于黑龙江省发动二次抗日。军政部于7月正式成立时，在关东军策划下，经伪国务院公布，由张景惠兼任军政部总长，次长为王静修（当时为参议院议长）。张是一个人所皆知的无学无知、庸庸碌碌的军阀，所以最受军事顾问部的嘉许。当时最高军事顾问为多田骏少将，曾任过中国北京陆军大学教授，通晓中国语言。他与张谈话时总是说中国话，表示特别亲近，在公务方面总是说："老朋友一样，都好办。"遇到不得已的事情时，又说："对不起，面子事。"当时部内各司课日本人职员不多，对我们控制还不严重。我方职员心怀激愤，常因公务和日本人争吵。但我们是得不到应有保障。军事顾问一个个飞扬跋扈，任意专横。伪执政的（皇帝）禁卫军扩编部队，需要增加经费得不到允许。吉林省警备司令部的经费每月支给100万元（实行包干制）。因日久未领激起经理顾问住谷悌的不满，当领款人来到军政部时，愤怒地对来人说："不来领钱，我知道你们的钱太多了，我每月给你们司令部70万元好啦。"这一句话，就给吉林省警备司令部每月减少30万元。

---

* 马金波曾任东北军黑龙江省军署军需科长，1932年任伪军政部（治安部、军事部）参谋科长。

因此，吉兴司令官、熙洽省长（兼财政部总长）曾向张景惠、王静修，要求过几次，最后如何申请也未得到恢复。张还说："生气得病，都是傻瓜。"因日满双方人员待遇不平等，我们向张景惠提出要求。他回答说："给多少要多少，就没有纷争，心平气和。"因而，军事顾问部顾问们在军政部方面，好像"太上皇"一样。那时，一般人经常抱怨张景惠、王静修，可是终归是无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政部大小事务完全由军事顾问部发号施令。1934年伪执政就皇帝位，军政部总长改称军政部大臣。1935年5月任张景惠为伪国务院总理大臣。

二、于芷山

第二任于芷山。他是1935年5月任军政部大臣的。同年秋，军政部改为军事部，当时最高军事顾问是佐佐木到一少将。他粗通中国语言，由高级军事顾问升任的。处理公务向于征求意见，询问情节甚详，对他很好。于常对我们说："我不像张四爷（指张景惠）那样的怕日本人。"可是不久，军事顾问部方面对于是处处敷衍，即利用又不相信，有时还对他施加压力。于因他有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于任大臣时是他二人使的劲）为靠山而不自觉，忘掉了他这个大臣的职责，是以执行日本侵略政策为目的的。在执行事务中，是不能同军事顾问部发生冲突的。于 在每年2、9两月，定期人事任免移动时表现最为激烈。1936年春，王殿忠任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官（警备司令官改称），这是军事顾问部的谋划。于不同意并坚决反对。最后，军事最高顾问平林盛人少将（佐佐木少将后任）对他说："这是关东军司令官的意见，你能违抗吗?"该部次长李盛唐，后任郭恩霖。李虽是通达日本语言对部事务是漠不关心，对军事顾问说话，总是"好好好"。郭和于意见不合，经常是谁也瞧不起谁。

因此，军事部事务完全由军事顾问部掌握统制。于虽有时骂骂吵吵的，不同意军事顾问部自作主张。可是，同顾问们会面时，又喜笑颜开地说："你就看着办吧。"为了个人尊荣地位，最后就驯服地作一个日寇忠实汉奸。1937年春，将民政部警务司划归军事部统辖，改治安部。于在1939年7月被特任为参议府参议。

三、于琛澂

第三任于琛澂。他是1939年任治安部大臣的。当时，最高军事顾问为平林少将。于到部后成为历任大臣中最为军事顾问部赞赏的人。他善交际，同日本人往来更亲密，每一个军事顾问对他都有好感。于对日本人的关照是无微不至的，不惜金钱和贵重品都尽所能地供给他们，毫不吝惜。于在休息时经常穿日本和服以表示亲日。在公务方面同军事顾问部，从来没有矛盾和冲突事件发生。当时，次长是日本人真井鹤吉中将，为人圆滑，在军事顾问部和大臣间关系很好。可是对于我们一般人，顾问和日本人职员们张牙舞爪的跋扈。特别高级军事顾问石野少将，为最甚。有一次人事课长佟衡为人事任免事请示石野少将，可石野公出不在部内，经主管人事的顾问决定办理。当他归来后因不合己见，对佟衡课长大发雷霆骂人，竟给佟衡一个手贴脸，后来，另一个顾问闻声赶来这才罢休。又如，经营课为兵舍修建移驻事，发文至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因事关所属部队防地关系，早经军事课指定办法，由于部内分歧致有命令发生重复。该司令部派员来部，面见高级顾问石野少将，询问处理办法。经查是经营课主办的文件。但此项文件是中冢军事经理顾问个人主稿。而石野少将竟将经营课长马金波，找到他办公室责问原由。马回答说，不知道。他即大发脾气吵骂起来。

这时中冢军事经理顾问赶来站在旁边，当石野打课长时，遂即由中冢顾问把课长推出门外，才免挨这一嘴巴子。于在发生此等事件时，仅能给予安慰，对军事顾问部和日方职员，他是什么也不表示。有一次，石野军事顾问对部内讲话，他说："你们满洲国人民，不应该将我大日本帝国称为盟邦，从现在起要称亲邦。"他还说："盟邦是平等的两个国家称呼，你们满洲国人要注意。"最高军事顾问平林少将调走后，由松井石根少将继任。部内事务还是由军事顾问部发号施令。于为保住自己，用尽心力求得军事顾问部好感。1943年秋，伪政府高级人事移动于任军事咨议官。

四、邢士廉

第四任为邢士廉。他于1943年秋任治安部大臣。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精通日本语言。关东军军事顾问部都认为他是日本忠实可靠分子。当时最高军事顾问松井少将。邢任治安部大臣时，正是日本疯狂进行"大东亚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日本军事需要，邢则驯服地遵循军事顾问部方针，加强伪满军训练，扩张军备。如全满划分11个军管区司令部(以前8个管区)，并增加航空部队、高射炮兵部队等，军事设施都按日本战略需要设置的。部内事务则由各专任负责顾问掌管，任何一件事，不经过军事 司部同意，邢是不作决定的。他从不讲军事顾问部如何在事务上控制和压迫的事情，而怕暴露自己，失掉对他个人的信任。他常对一般人说：他像"牌位"一样高高在上，稳坐办公室逍遥自乐。那时日本人职员特别蛮横。我们惧怕被诬为思想犯，不敢反抗，此种情况邢是知而不问。可是他榨取部属和同僚的金钱手段却很高妙。在家中经常设赌抽头，名为"消遣"打麻雀，押小宝，玩牌九，日可得抽费一二百元。

但邢自己参加赌博时很少。1945年日本“大东亚战争”进入崩溃阶段时，对满统治政策，愈益加厉。时闻日本宪兵特务暗中侦查，因“思想犯”被押的人，日有所闻，使我们每天战战兢兢。邢对我们说：“日本人有坚强的大和魂精神，最后是能战胜的。”他还说，在新加坡日本飞机冲击英国主力舰有多么勇敢等等。邢是一心一意的祈求日本胜利。不料“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邢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于芷山其人

傅大中

于芷山，号澜波，光绪初年生，奉天省台安县黄沙坨子粘鱼泡村人①，系伪满大汉奸张景惠同乡。其青年时代，恰时中国清末，由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涂炭，甲午、庚子战乱后，奉天广大地区，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更不幸的是，兵灾弭过，又土匪四起，闲散在社会上的散兵游勇，不逞之徒，铤而走险，啸聚徒众，称霸一方。自清末以来，辽西、辽中一带，即以出产土匪著闻。《台安县志》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生灵涂炭……户口流离，干戈满目，几无完善之区。”

生长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于芷山，据说青年时代即生性粗野，好与人争强斗狠。17岁时，加入辽中巨匪杜立山绺子中，先当杜的马弁，后来当上了执掌一面的小头目“炮头”。当时奉天省境，不但匪系较多，而且土匪中的帮规也较完备，各绺子中

① 也有书籍谓，于芷山是台安县尖山泡村人。

除匪首“大当家的”外，设有“四梁八柱”。“炮头”则为“四梁八柱”的主要成员，专负军事行动的指挥责任。用土匪的黑话讲，当炮头的人，必须枪管直，即枪法准。可见于芷山青年时代，就已在绿林中略显了头角。

1907年前后，奉天省境几股大的匪绺被清廷收编，有势力者仅剩杜立山一股千余人，活动在辽中一带，拒绝招抚，这使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颇为头痛。徐命令被收编的张作霖剿除地方匪患，张作霖利用与杜立山堂叔杜泮林的关系，假以招安手段，诱杀了杜立山及10名大小匪首。据说于芷山当时也是去新民府受招安的匪首之一，因贪吃拉肚落在队后，才幸免被捕，免于一死。也有说于芷山当时也在10名匪首之中，张作霖见其年少聪颖、面貌英俊，遂产生喜爱之心，不但免他一死，还将他收为马弁。从此，于芷山又投入到张作霖的麾下，忠心耿耿替张效力，地位也扶摇直上。于曾任过张作相属下的哨长、连长、河防营长、护路团长，1922年率部入关，参加第1次直奉战争。战后张作霖退回关外，整军经武，改编军队，于芷山升任第五旅旅长，辖二个团，归二十七师指挥。第二十七师师长先为张作相，后为张学良。

1923年5月，曹锟贿选总统，激起全国各界反对，张作霖认为时机已到，通电声讨。奉军编成6个军，再度入关。于芷山部被改编为骑兵第八旅，编入奉军主力第三军，随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进兵秦皇岛，后移师京奉铁路沿线。

1925年，为奉军鼎盛时期。张作霖又统编奉军为20个师零10余个旅，于芷山被任命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八旅旅长，不受师的节制，有如独立旅的性质。同年，郭松龄倒戈后，于芷山出任第八师师长。

1926年，北伐军进入闽、鄂、赣，张作霖、孙传芳、吴佩

孚等军阀，为对抗北伐，联合编成安国军，推张作霖为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在北京组成军政府，并进兵南京、上海，阻止北伐。时值于芷山任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团第三十军军长，率部在河南一带作战。后因阎锡山转向北伐军，于芷山部又转到京绥、京汉铁路沿线，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1928年日本出兵济南，干涉国民党二次北伐，于芷山率部退至宣化、张家口一带。

1928年秋，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于芷山随张作霖逃回东北，途中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谋杀。张学良承父业入主东北后，东北军缩编，取消军师制，采用群旅制，改为省防军和国防军两部份，第三十军缩编为旅。于芷山交出部份军队，去东边道出任镇守使，所率部队改为省防军。从此，于芷山坐阵沈（阳）海（龙）路与吉（林）海（龙）交叉点的山城镇，一边经营买卖，一边负责管辖辽东一带22个县的治安。

“九·一八”事变时，于芷山有辽宁省防步兵3个团（团长姜全我、廖弼臣、田德胜），骑兵1个团（团长曹秉森）和卫队1个营（营长赫慕侠），兵力近7 000人，分驻在通化、凤城、西丰、东丰、西安（辽源）、新宾、桓仁等地。由于部队驻地偏僻，驻防分散，事变之际部队大部保存完好，仅驻在凤城县城的1个营，受到日本铁道守备队的攻击，450名官兵，在团长姜全我被俘后，随其降敌。

日军在占领满铁沿线的大小城镇后，辽宁省的政局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日军在占领地扶植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发号施令，拼凑地方伪政权；另一面，流亡到锦州的辽宁省政府，也在活动，严令各地不准承认伪组织。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张学良的政权已经基本被摧毁，流亡政府已经无力控制辽宁的局面，而日寇的势力，一时还仅限于满铁沿线的城

镇，广大的农村和远离铁路的偏僻城镇，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九·一八”事变初期，于芷山部，正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东边道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事变后关东军并没马上进兵，而是确定了对于芷山采用诱降的方针。

这时的于芷山，心态十分矛盾复杂。他清楚这次事变，非同一般，日军迟早要沿沈海路东进，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他曾请示张学良，要求率队退入关内，张学良不准，并一再电令他要执行中央的命令，不准抵抗。这时关东军也加紧了对他的策反工作，大矢进计、河本大作等人，不断进入他的营帐游说，鼓动他出来为伪政权服务。于芷山鉴于当时的形势，对事态如何发展，国联能否解决问题，日本是否能站得住脚，以及关内东北军是否出关抗日等都不清楚。因此还不敢公开投敌，只是尽量敷衍局面，一面与日寇勾结，请求暂缓向东边道进兵，容其做投降考虑，一面与张学良秘密联络，求得张的理解。

于芷山这种矛盾的心态，支配了他公开降敌前的主要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夜，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的第七旅被袭击后，历尽艰难退到了山城镇。于不但拒不收留，惟恐引火烧身，惹来日军的攻击，反而军阀本性毕露，乘王旅危难之机，收缴了王旅的大批武器，扩充个人势力，另编一团。当他得知防区内有人从事抗日活动时，即毫不犹豫地进行镇压。据说连逃散的北大营士兵，从事抗日活动，被他抓住都枪毙了，惟恐惹怒日寇。在这期间于芷山及部下，残酷地镇压了清河、西丰、新宾等地涌现出的抗日活动。

1931年10月16日，于芷山打出“东边保安司令部”的旗号，自任司令，宣布“独立”。但仍脚踩两只船，一面暗中与张学良联系；一面铺路投敌，任命日本留学生出身的曹秉森为参谋长，

加紧与日寇勾结。据曹秉森自己讲，他被委以参谋长，实属意外，因他不是于芷山的亲信，在当时情况下委以重任，完全是从投敌方便着想。

不久，日军进兵沈海线，武力压迫于芷山，令其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于在山城镇召集属下团营长及参谋长开会，征求投敌意见。会上于首先说："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奉天，各地维持会都已成立，中央命令我们不准抵抗，日军又陈兵压迫，我们怎么办?"席间有人主张打，于又说："日本那么强大，我们能打过吗？打了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张学良已经默认，即使我们穿上日本人的军衣，中央也不会怀疑我们。"他首先表明了投敌的态度，定下了投敌的调子。以后于芷山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商量投敌事宜，除少数军官拒绝投敌不参加投敌会议外，大多数人都表明了投敌的态度。10月下旬，于芷山向关东军公开了"归顺"态度，关东军随即向他提供了经费，命令他维持东边道地区的治安①。由于当时东边道地区的抗日活动已经风起云涌，实际上关东军是命令他去镇压抗日运动。

1931年12月中旬，伪奉天省政府成立，于芷山被委任为奉天省警备司令。不久，他率东边镇守使署的全部人马，开到了沈阳，驻进了原上将公署，开始了公开的汉奸生涯。

于芷山投敌后，部下步兵2个团，骑兵1个团，卫队1个营一同随他投敌。以后，在关东军的扶植下，步兵团扩充为旅，原团长廖弼臣、田德胜升任旅长。骑兵1个团扩充为3个团，卫队营扩充为卫队团，人员一时增至1.5万人。此外，于芷山还命令抚松、通化等东边道所属的8个县，每县抽丁25名，编成"东边保安游击队"，以土匪出身的邵本良为队长，到处游动，镇压

---

① 见《满洲事变作战概要》。

东边道各地的抗日活动。这支游击队后来编入第一军管区，成为伪满一支机动性很强的反动武装。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东北的伪军被统编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兴安东、南、北警备军和中央直辖部队。于芷山的奉天警备军，编成相当于10个旅的兵力，人数达2万余人。编制情况详见下表（1933年8月军政部调查）：

<table>
<tr><th>地区别</th><th>旅长姓名</th><th colspan="2">部队</th><th>兵力</th><th>驻地</th></tr>
<tr><td rowspan="14">司令部直属</td><td rowspan="14"></td><td colspan="2">司令部</td><td rowspan="9">678人</td><td rowspan="9">奉天</td></tr>
<tr><td colspan="2">卫队连</td></tr>
<tr><td colspan="2">兵器修理所</td></tr>
<tr><td colspan="2">无线电信班</td></tr>
<tr><td colspan="2">汽车班</td></tr>
<tr><td colspan="2">督察队</td></tr>
<tr><td colspan="2">军乐队</td></tr>
<tr><td colspan="2">陆军监狱</td></tr>
<tr><td colspan="2">后方医院</td></tr>
<tr><td rowspan="5">第一教导队</td><td>步兵第一团</td><td rowspan="5">2 718人</td><td rowspan="5">奉天</td></tr>
<tr><td>骑兵第一团</td></tr>
<tr><td>炮兵第一连</td></tr>
<tr><td>通信第一连</td></tr>
<tr><td>军官候补生连</td></tr>
</table>

<table>
<tr><td rowspan="5">鸭江地区</td><td rowspan="4">混成第一旅</td><td rowspan="4">廖弼臣</td><td>步兵第一团</td><td rowspan="5">2 467 人</td><td rowspan="5">凤城</td></tr>
<tr><td>骑兵连</td></tr>
<tr><td>炮兵连</td></tr>
<tr><td>通信连</td></tr>
<tr><td colspan="2">独立步兵团</td><td>第一营</td></tr>
<tr><td rowspan="4">安奉地区</td><td rowspan="4">混成第二旅</td><td rowspan="4">赫慕侠</td><td>步兵第二团</td><td rowspan="4">2 104 人</td><td rowspan="4">通化</td></tr>
<tr><td>骑兵连</td></tr>
<tr><td>炮兵连</td></tr>
<tr><td>通信连</td></tr>
<tr><td rowspan="5">辽东地区</td><td rowspan="4">混成第三旅</td><td rowspan="4">王殿忠</td><td>步兵第三团</td><td rowspan="5">2 467 人</td><td rowspan="5">营口</td></tr>
<tr><td>骑兵连</td></tr>
<tr><td>炮兵连</td></tr>
<tr><td>通信连</td></tr>
<tr><td colspan="2">独立步兵团</td><td>第二营</td></tr>
<tr><td rowspan="4">辽西地区</td><td rowspan="4">混成第四旅</td><td rowspan="4">傅布彦</td><td>步兵第四团</td><td rowspan="4">1 755 人</td><td rowspan="4">黑山</td></tr>
<tr><td>骑兵第四团</td></tr>
<tr><td>炮兵连</td></tr>
<tr><td>通信连</td></tr>
<tr><td rowspan="3">中央地区</td><td rowspan="3">混成第五旅</td><td rowspan="3">于芷山（兼）</td><td>步兵第五团</td><td rowspan="3">1 291 人</td><td rowspan="3">奉天</td></tr>
<tr><td>骑兵第五团</td></tr>
<tr><td>通信连</td></tr>
</table>

沈海地区	混成第六旅	董国华	步兵第六团	2 234 人	山城镇
			骑兵第六团		
			炮兵连		
			通信连		
	独立步兵团		第三营		
长抚地区	混成第七旅	李寿山	步兵第七团	2 104 人	临江
			骑兵连		
			炮兵连		
			通信连		
辽源地区	骑兵第一旅	彭金山	骑兵第七团	1 098 人	辽源
			骑兵第八团		
			骑兵机关枪连		
洮南地区	骑兵第二旅	王之安	骑兵第九团	1 625 人	洮南
			骑兵第十团		
			骑兵第十一团		
			骑兵机关枪连		
				20 541 人	

于芷山公开投敌后，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最初与张学良时有联系。这件事后来被关东军特务侦知，关东军对他极为不满，加之他的部队扩编后，自认为势力雄厚，在日本人面前有时忘记自己的傀儡身份，部下也与日军偶有冲突，惹怒了日本人。于是关东军指使驻山城镇的铁道守备队除掉于芷山。一天，于芷

山来到他在山城镇的买卖德裕粮栈，突然粮栈被日本兵包围。于见事不妙，立即给警备行辕打电话。这时，两个日本兵端枪冲上了楼，见打电话的人以为是于芷山的秘书，没抓他。后来他跳墙逃跑，钻进麦垛藏了两天。同时派人乞求日本顾问调停，并向关东军表示了忠诚。关东军考虑到他还有用，才易辙更张，放弃了除掉他的计划。于芷山接受这次教训后，便死心踏地地为日寇效力了。

东边道所属东北军的投敌，于芷山的组织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投敌，编成伪军比较大的一股。伪满政权以这股伪军为基础，编成了第一军管区，在伪满时期配合关东军对今天的辽宁省全境，及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于芷山本人，由于效力伪满有功，也得到了汉奸殊荣，得了几十万元的建国功劳金。先后充任奉天警备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1935年接替张景惠，出任伪满军政部（1937年8月改称治安部）大臣，官职为特任，军衔授至上将。1936年6月，溥仪又授他为终身官"将军"。

日本投降后，于芷山被俘，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

肖玉琛

于芷山其人

我之所以投奔于芷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考虑到于是东北军的元老，对我这个在东北军任职多年的年轻军官总还会有所照应。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卖国生涯跟他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

于芷山，清光绪年间生于奉天省台安县尖山泡子村。生性粗野好斗，机敏过人。17 岁就投奔到当时辽中一带的著名土匪头子杜立山麾下，当了杜立山的一名马弁。

1920 年，匪首张作霖被辽宁新民府知府增蕴收编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受命剿除地方匪患。张作霖假以“招安”，诱杀了杜立山为首的大小匪首数十名。于芷山由于少年英俊，不但幸免于死，而且被张作霖收为自己的马弁，于也死心踏地为其效劳，从此扶摇直上。在张作霖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后，马弁出身的于芷山也因效忠张氏有功，晋升为东北第三十军上将军长，曾率部南下河南各省，驰骋疆场，显赫一时。

1920 年秋，北伐军节节胜利，于芷山随张作霖退回东北。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杀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下令部队缩编，将于芷山所属的第三十军改编为1 个旅（3个团)，任于为东边道镇守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只知升官发财的于芷山投降日

寇，任奉天省警备军司令官。他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到处招兵买马，将原来的1个旅扩充为7个旅。我这个“落第武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应招来到沈阳的。

谨言慎行

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坐落在沈阳将军署胡同，警卫林立、戒备森严。卫兵见我衣衫褴褛，竟拒我于门外。我当即出示于芷山的便信。卫兵一看是司令官介绍我来找曹参谋长的，才放我进去。

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曹秉森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当过教官，给我们讲过《筑城学》。我想以“老师”相称，会显得更加亲切，曹秉森一眼认出我是他的学生，满脸堆笑地说：“欢迎你！”我向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他随即命令军需处发给我一套军衣和20元现款，然后派副官领我到参谋处报到。

参谋处共18人，除上校处长马养贤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刘尚华（兼警备科长）、戴元（兼教育科长）。我被分配到警备科情报系任上尉情报参谋。情报系共3名参谋，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叫赤尾，上尉衔，负责所谓“匪情”的综合处理；一个叫黑濑，任嘱托（文官，相当上尉），是专搞特务活动的。他俩都是由日本陆军部队的军曹（准尉）提拔起来的，既无学历，又无能力。我这个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优等生”，不仅在军事上不比他们外行，而且精通报务，还懂日语，然而，尽管这两位日本同行对我表示十分“亲善”，我却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不论是“满洲国”，还是“满洲军”，都是通过日本人来控制的。何况自己又在情报系工作，稍一不慎，情报上去，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我们住在司令部宿舍的军官，大都是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的老部下，也有一部分青年军官是由权势人物介绍来的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每天下班回来，不是逛妓院，就是打麻将、喝大酒。我自然不能同这些阔少爷相比，这不仅仅因为我的目标盯在作官上，而且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刚来的时候月薪只有30元，连衣食都得紧缩开支。后来虽然增到120元，除了每月留下40元的伙食零花外，剩下的80元全部寄回家里还债。所以平时连戏院子我都很少光顾，每天晚上呆在宿舍里写日记、读史书、看报纸。上边交给我的公务，我总是提前完成，令其满意……由于我处处谨言慎行，很快得到了警备司令部上将部附堀内一雄的赏识。

堀内一雄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其貌不扬，其心叵测。他为了讨得满洲人的好感，更名满良，美其名曰“满洲之良民”也。他深知日本侵华，如蛇吞象，食之有味，咽之不易，因而精心物色那些效忠日本天皇的满洲人，以实现其“以华治华”，建立“王道乐土”的美梦。因此，看到像我这样为其卖命的人，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抗日志士的身躯铺垫了我升官的阶梯

“九·一八”事变后，各色人物出现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有于芷山这样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汉奸、大卖国贼，更有爱国的官兵。于芷山的旧部，唐聚伍、李春润等，都打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于部所到之处，“打倒大汉奸于芷山”，“宁做丧家犬，不当亡国奴”的标语，街头巷尾，比比皆是。当时的抗日武装要数唐聚伍的抗日救国军实力最雄厚，他挥师万余众，活跃于辽吉边境；原通化保安团团长王凤阁，和凤城公安局长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约4 000人，也在东边道一带与日军

奋勇拚搏；此外，还有大刀会、红枪会、联庄会等抗日武装，神出鬼没，枪来剑往，弄得鬼子兵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特别是李春润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出没于沈阳近郊，闪袭哨所，破坏交通，枪声彻夜不停，吓得日本人寝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

1932年3月，于芷山招兵买马回到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发现沈阳城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尽管他一再向日本主子保证"立即肃清残匪"，但由于李春润采取打了就跑的麻雀战术，使于芷山的警备部队如猢狲捞月，毫无办法。直到8月，警备司令部的日本顾问菅野少佐给于芷山下了一道最后通牒，限他在一月之内招降或消灭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于芷山心里明白，这个小小的日本顾问，是关东军安插在司令部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监护人，手操自己的生杀大权。于是，他接连给李春润送去几封密信，劝其归顺，委以重任，但都遭到了李春润的严词拒绝。于芷山决定带领卫队团亲征永陵镇——李春润的根据地。

在出发前，于芷山指令参谋处派我参战，经过一番争论，参谋处参加这次战斗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中校参谋周良宪、上尉参谋佟玉琛和一个姓李的少校参谋。在行军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战斗局面和应变办法——因为，这是我向于司令官显示才能的最好机会。

第2天午后，我们的尖兵连在离沈阳东南100余公里的永陵街，和李春润的抗日救国军前沿部队交了火，我们的尖兵连被打得丢盔卸甲，败下阵来。于芷山随即指挥卫队团和手枪连对永陵前哨阵地发起强攻。经过1小时的激战，李部的两个营因寡不敌众，撤至新宾县城。我们攻占永陵街后，留部分部队驻守，其余继续东进，攻占新宾县城，李部被迫退入城东山区。

第3天上午，于芷山召集设防会议。根据中校参谋周良宪的提议，部队全部设防，固守县城，伺机进剿。

于芷山原以为李春润吃了败仗，暂时不会进攻县城。不料入夜10点，城外忽然枪炮声大作，抗日救国军包围了新宾县城，并集中主力部队猛攻东门。要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李部险些攻入城内。战斗一直打到天明，救国军才撤回山里。

第4天，周良宪参谋领我视察了城区情况后，重新研究抗日救国军的攻城策略。于芷山让我发表看法，我说："新宾县城南面靠山，城防坚固，又有炮台护卫，易守不易攻，敌人不会贸然进犯；城北有苏子河这条天然屏障，敌人暂时不会涉此险境；唯独东、西两面是进出城关的必由之路，而且地势平坦，是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分析表示赞许，接着说："昨晚敌人进攻东门被击退，今晚必攻西门无疑，预备队可隐蔽在西门附近。"司令官根据我的意见，作好了战斗布署。

这是我任上尉参谋作出的第1次战术分析，正确与否，将关系着上司对我才能的估价。因此，我多么希望李春润会按着我的设想行动啊！但出乎意料之外，深夜11点左右，战斗首先在东门打响，而且越打越激烈，我方已处于难以支撑的局面。这时周参谋指责我作了错误的分析，坚持要把预备队拉来支援东门。但我从东门抗日救国军声威有余，而西、南、北门过于沉寂的情况分析，他们肯定是声东击西。我不同意周的意见。果然，不出所料，12点左右，李春润主力对西门发动猛攻，枪林弹雨，喊声连天，如果不是预备队增援及时，救国军肯定攻入城内无疑。

战斗结束后，于芷山和周良宪对我倍加赞扬。于芷山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在第5天晚上的战术布署会议上，周良宪和我又发生了分歧。他认为李春润攻打西门失败之后，必然会改攻东门；我不同意地说："一个好棋手不但要料定对方的棋路，更重要的是要

料定对方会想到我们的棋路，因而改变自己的棋路。所以，我认为敌人今晚继续攻打西门无疑，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固守西门。”第5天晚上的战斗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李春润部再次遭到失败。

战斗进入第6天，周参谋分析，李部三次攻城失利，可能会暂停进攻；我则认为：双方兵力相等，对方虽三次进攻失败，但并未损伤元气，而且有两次险些攻入城内，他们必然会抓紧时机，连续进攻，以求速胜，获我辎重。而且，我认为，李部三次攻打东西两门不下，必然会铤而走险，进犯北门……周良宪付之一笑说：

“北门有苏子河相阻，攻难退更难，稍有军事常识，决不会出此下策……”

我坚持说：“李春润不是一般指挥官。正因为我们坚信他不会出此下策，则正是他作出进攻北门的决策所在。”

于芷山最后终于同意我的见解，除抽调手枪连加强东、西城关防务外，把所有机枪和预备队调集北门，做好了迎敌准备。

第6天入晚，救国军从县城东、南、西三面同时发动进攻，“打进新宾城，活捉于芷山”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战斗延续到半夜11点，救国军3 000余人果然从北门开始偷渡苏子河，救国军两次攻入北门，都被我密集的机枪火力击退。李春润知中埋伏，下令撤退，但因河水过深，又无火力掩护，伤亡惨重，遗尸500余具。第2天一早我亲眼看到抗日志士横尸遍野，良心上受到无比责备，但一想到我由此受到的赞许，想到升官有望也就心安理得了。

见风使舵

战斗结束后，行辕司令部转移到柳河，正待进行战后整训，

忽然接到辉南县朝阳镇第三团打来电报说："楼街昨日失守，守卫楼街的第一营除营长领十几名士兵跑回团部外，全部被俘。今团长卧病在床，无人问政，电请司令官指示"云云。

于芷山看过电报，对第三团失守楼街气极败坏，但考虑一营李营长是三团团长田德胜的干儿子，而田团长又是自己的老部下、老朋友。"九·一八"事变后，于芷山的几个老部下纷纷倒戈，而田德胜则是他投降日军的积极赞同和参与者，成为于芷山的左膀右臂。所以这次军事失误，于芷山不但不打算处分田德胜，反而决定派人前往三团进行安抚。

由于在新宾县城的守卫战中，我成了于芷山的得意高参，这次去朝阳镇慰问田德胜的使命，也就自然的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对这个差使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从柳河到三团所在的朝阳镇必须经过楼街。既然田德胜的一个嫡系营未能守住楼街，如今让我带1个骑兵排去闯楼街，岂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可不去又不行，军令如山，岂能儿戏；我又一算计，我在新宾之战已经崭露头角，这次如果完成任务岂不正是我再显身手、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我经过周密考虑后，请求于芷山增派两挺机枪，带领骑兵排连夜出发了。

攻占楼街的大刀会和红枪会，因以大刀和红缨枪为主要武装而得名。多数士兵来自农民，白天归田，夜晚出击。首领阎大法师，以传播佛道发动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作战时，官兵为驱除"死亡灾星"，口中念念有词，与过去的反英义和团一样，带有几分神秘的迷信色彩。大刀会和红枪会是通化唐聚五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的外围组织，号称10万余众，是当时东北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次攻打楼街时，大刀会调集1万多手执大刀、长矛的战士，进行轮番攻击，前仆后继，英勇异常。田德胜的第一营虽然武器精良，也无济于事，终被全部歼灭。

大刀会占领楼街后，料定突然东进的于芷山要倾巢出动，进行报复打击。我利用这一心理状态，命令骑兵排张排长分东西两路，用数挺机枪同时向楼街开火，制造“大军压境”的战斗气氛。由于天黑不见五指，又没有准确情报，大刀会驻守楼街的部队没有出击。我带领骑兵排边打边走，顺利经过楼街，于天明时分到达朝阳镇。卧病在床的三团团长田德胜见到我痛哭流涕地说：“楼街之战，损失伤亡1个营，真是罪该万死！我已经把那个草包营长押起来了，等待司令部来人处决，一待病好，我将向于司令负荆请罪……”

我明知田德胜舍不得处决自己的干儿子，才称病在床，巴不得送个顺水人情，安抚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李营长失守楼街，固然有责，终因寡不敌众，情有可原，不如降职使用，以观后效。”

“谢谢！”田德胜握住我的双手说：“今后还望肖参谋在司令面前多多关照。”

随后，我以于司令的旨意，要求重建一营，加强实力。同时把田德胜的病情和对一营李营长的处理结果电告于芷山。于回电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许，并告诉我，警备行辕司令部即将转移到辉南县山城镇，命我带骑兵排立即赶赴山城镇报到。

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

我到山城镇不久，多次发现几伙身着便服的人在街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于是我对于芷山说：“司令官，应该马上对这些人采取行动，不然将严重影响您在山城镇的威望。”

于芷山根据我的意见，命令巡查队逮捕了其中两名强奸民女的人。不料这件事却引起了日本铁道守备队中佐大队长小田的不满，多次来函要求立即释放被警备司令部关押的人。于芷

山拍着桌子骂道："他妈的，铁道守备队管不了我警备司令部这一段！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抓的这两个人犯有强奸罪，正在审讯，不能放！"

第2天，日本铁道守备队声称抓住了3名穿警备部队制服的所谓"作案犯"，说扰乱山城镇治安的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于芷山立即命令部队清点人数，发现没有一名士兵丢失，知道其中有诈，当即要求守备队把3名"作案犯"交还警备司令部处决，但同样遭到了守备队的拒绝。

还没等于芷山弄清事情内幕，铁道守备队于1932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包围了于芷山的德裕粮栈和公馆。

驻山城镇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相当一个加强营，下设4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一个连的编制。包围德裕粮栈的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照井，长相凶恶，性格粗野，经常公开咒骂伪军和于芷山。当然，这次包围于芷山决不是一个铁道守备队中队长说了算数的。

原来，于芷山投靠日本人以后，将他原来的1个旅扩充到7个旅，除了日本关东军之外，当时他的警备司令部堪称实力雄厚。因此，于芷山也就得意忘形，经常跟日本人拍着桌子吵架，甚至有时调动军队也不服满洲皇朝管。傀儡想爬到主子头上，日本人决心找茬干掉这个不听话的奴才。

这德裕粮栈是山城镇里的城中城，粮栈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堡。这天晚上，城堡上的士兵发现粮栈被日本兵包围，正要开枪射击，卫兵班长急忙制止说："千万不要开枪，我马上去报告连长……"

此时，手枪连长程凤周正在公馆里跟于芷山叙谈。听了卫兵班长的报告，二人不由大吃一惊。于芷山问手枪连长怎么办，程凤周认为，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能轻举妄动，他说："日

本人包围粮栈和于公馆，恐怕是直接对司令官您来的。眼下大部队都在城郊，粮栈只有我们一个连，万一打起来，司令官的安全……”

于芷山听从了手枪连长程凤周的意见，匆匆离开公馆，上前庭二楼给警备行辕司令部打电话。当时我正在行辕司令部值班，于芷山在电话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铁道守备队包围了德裕粮栈，你……你马上找到司令部大泽教官，问……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商量……”没等于芷山把话说完，电话就断了。这时，铁道守备队的两个排已用粗大的木杠撞开了粮栈大门，拥入粮栈进行搜索。于芷山不知电话线已被日本人切断，正要继续往司令部打电话，两个日本兵闯上前庭二楼。

“太君（指于芷山）的在哪里?”

在日伪统治时期，像于芷山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是由秘书打电话，所以两个日本兵没有想到打电话的正是于芷山本人。于芷山注意到这两个日本兵并不认识自己，便将计就计指着楼下说："太君的在后院。”

于芷山跟着两个日本兵下了楼，见粮栈院内到处都是搜索自己的日本兵，急忙以粮垛为掩护，摸到院墙根下——后来于芷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老天保佑我姓于的命不该绝，我突然摸到了一架搭在墙上的梯子，我顺着梯子爬上墙头，然后将梯子推倒，跳进隔壁粮栈的院子里，钻进了一个麦垛里躲藏起来……”

于芷山推倒梯子的声音惊动了日本兵，德裕粮栈院内顿时枪声大作，喊杀连天。经过几个小时的严密搜索，也没有找到于芷山的踪影。中队长照井再次来到公馆，逼着他的二姨太交出“太君”，二姨太张氏一问三不知。照井无奈，带着部队撤离德裕粮栈。

自从于芷山在电话里告诉我日本兵包围德裕粮栈的情况后，我当即用电话通知卫队团长赫慕侠“速来司令部商谈要事”。赫慕侠领着几名卫兵刚到行辕司令部，于芷山的秘书孙维珍也从宿舍到了值班室。正当我们都感到情况严重而又束手无策的时候，铁道守备队中佐大队长小田，派一名副官领着一个宪兵坐三轮摩托车来到司令部。日本副官看了我们三个人一眼，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谁的参谋？部队长的有？”

“他是肖参谋。”赫慕侠介绍说：“我是卫队团长。”

“很好。”日本副官把手一挥说：“跟我们的守备大队去……”

赫慕侠让孙秘书留在司令部值班，和我分乘两辆三轮摩托前往守备队大队部。

铁道守备队驻扎在山城镇东北郊约5公里的一处深宅大院。我们下了摩托车走进院门，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从院门通往内厅的百米过道，面对面站着两列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步枪，交叉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人字长廊，我们必须从这寒光闪闪的人字长廊下通过。

我尴尬地看了卫队团长赫慕侠一眼，壮着胆子走在前面……

守备大队中佐大队长小田像“阎王爷”一样坐在大厅的正面，大队附和一名副官分列左右。

“你们通通地站着！”少佐大队附命令着。

“司令官的那里去了？”大队长小田用不纯熟的中国话说：“你们不马上把司令官交出来，统统的枪毙！”

“八嘎！”站在我们身后的四个监视兵答应着。

很显然，日本人为了急于知道于芷山的下落，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我明白，在他们没有抓到于芷山之前，不会轻易拿

我们俩开刀。于是，我用日语回答："司令官去向不明，我们也正在找他。"

小田听我会说日本话，看了看身边的大队附。"你们马上把他找到这里！"

我和赫慕侠交换了一下眼色，走到前面，把手一摊说："刚才城里又是枪声，又是喊声，我们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司令官天黑以前就离开了司令部。深更半夜，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八嘎！"小田拍着桌子骂道。"晚上找不到就天明找，天明再找不到就枪毙你们两个！"

"我们尽量找。"

"找到了，马上报告我！"

"是的。"

"找到了于的不报告，就枪毙你们！"

"可以。"

"放他们回去……"

回到司令部，我对赫慕侠和孙维珍说："这件事情很蹊跷，后果不堪预料。我们应该马上把部队调出城外，集中待命，以防万一。"

赫团长和孙秘书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当即下令驻扎城里的第二营和迫击炮连撤到城外1.5公里的约旦屯后，步兵作好一级备战，迫击炮进入阵地，瞄准日本营地，随时准备战斗。

赫团长作好战斗部署之后，和我来到跟警备行辕司令部近在咫尺的宪兵队。因为我们必须找到司令部的日系教官大泽，才有可能弄清事件的真相。

这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异乎寻常的戒备森严，当我们还远离岗哨时，几个日本哨兵就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干什么的来

了？”

“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说：“找大泽教官。”

宪兵毫不客气地搜查了我们的周身，在得到他们上司的同意后，领我们去宪兵队办公室。走到门口，果然听到屋内大泽在谈笑风生，日系教官大泽在事件发生前撤离行辕司令部，这更加使我确信，这次事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我见到大泽后，装做若无其事地说：“教官，你我知道，这是由于几个扰乱治安的分子引起的一场小小的误会，你应该马上回去，因为你最了解于司令，是从中调停最合适的人……”

“好。”大泽笑了笑说：“你们先回去吧，我马上就走。”

我们回到行辕司令部，一直不见大泽回来，心里十分焦急。因为不可预测的事态发展，随时危及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报告！”卫兵领着一个小孩走进办公室。

“我是于司令派来的。”小孩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纸条递给赫团长。纸条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小字：“我在隔壁粮栈经理室，你们立即研究应变办法告诉我——于芷山。”

于芷山还活着，而且没有被捕，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三人决定去同他一道研究对策。但当我们走到门外，发现街上已经戒严，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我们只好返回司令部。直到第2天拂晓，宪兵撤走以后，我们才换上便衣，来到与德裕粮栈毗邻的粮栈经理室。于芷山见了我们，好像有了依靠，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苦笑着给我们让坐。赫团长汇报了部队已转移到郊区并作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于芷山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怎么办。

“这是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我果断地说：“从守备队直接包围德裕粮栈而没有惊动行辕司令部这点看，日本人的目标是

直接针对司令官的。如果不公开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患无穷……”

“他妈的，小鬼子不知好歹！”赫慕侠在桌上猛击一拳：“我们马上把司令部转移到三源浦一带的山区，同大刀会联合跟他们干！”

于芷山看了赫慕侠一眼，沉默不语。

“这是宋江造反，逼上梁山。”我补充说：“日本人既然对你老不放心，你老赤胆忠心地跟他们干，也不会有好结果。现在只要司令官出头抗日，你老的旧部都会归顺，几十万大军就会揭竿而起，司令官的名声……”我试探着说。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问秘书孙维珍：“你的意见呢？”

孙维珍面有难色：“事情发生得很唐突，我还没有成熟的见解……”

于芷山思索片刻，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地凑到我和赫团长跟前说：“不过有一件事——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我只告诉过孙秘书，还没有告诉你们。”于芷山看了看门外说：“前些日子，张学良从北京派来一个密使到沈阳，把缝在衣襟里的一块绸子交给了我，上面写着：‘伺机待命’四个字。我之所以扩充部队，既可为日本人所用，也可作反日本人之用。少帅既然让我伺机待命，我想等等少帅的命令再说。”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暗想：日本人这次没有抓到于芷山，能否就此罢休？万一调集部队把司令部和卫队团包围起来，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于是，我再次进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少帅命令等到什么时候？机会错过，时不再来。日本人诡计多端，万一部队一散，司令架空，到时候……”

“是啊！”赫慕侠担心地说：“趁日本人还没有防备，我们的

部队还完好无损……”

“唉……”于芷山长叹一声，“你们考虑过没有，我的大太太、儿子和财产都在省城，我这一走，岂不全都完蛋了……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赫慕侠看了我一眼，我们这才弄清楚于芷山的真实意图。

“我看这样吧。”于芷山忽然双眉一扬说：“我先派人到省城看看，如果日本人在沈阳也动了手，我们就同他干；如果还没有动手，就伺机再说。”

沉默了一会，赫团长问：“那么派谁去呢？”

“我看还是派肖参谋吧！”于芷山对我说：“今天有去刁羚的火车，你到省城后找警备司令部曹参谋长和菅野顾问，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的真相，能和解一定要争取和解，只要沈阳没有发难，和解还是有希望的。”

我乘当天下午3点的火车，于半夜10点到达沈阳。我到警备司令部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让值班的派了一辆汽车送到参谋长曹秉森的公馆里。我向参谋长介绍了山城镇事件的前前后后，他感到吃惊。经他证实，日本人不但没有惊动沈阳警备司令部和所属部队，而且对山城镇事件也守口如瓶。我对曹秉森谈了自己的想法：像谋杀于司令这样重大的事件，肯定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作出的。一旦谋杀不成，他们就会避重就轻地把责任推到山城镇铁道守备队大队长小田身上。

“对！”曹参谋长同意说：“走，我们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菅野顾问，给他们留个下台阶的机会。”

我和曹参谋长驱车到日本顾问菅野住处。敲了十几分钟的门，一个顾问部署官才慢腾腾地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曹秉森告诉他必须面见菅野顾问。经他通报后，菅野顾问在会客厅接见了我们。他对我的深夜求见，感到十分惊讶，问我回沈阳有

什么要事相商。我从头到尾把山城镇事件作了详细的汇报。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日本顾问对山城镇事件也一无所闻。他呆愣了一会儿，跟我们打了个手势，就匆匆走进内室。很显然，他是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去了。

我和曹参谋长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小时，菅野才满面春风地从内室出来。

“对不起，这是误会——是卫队团和照井中队相处不睦而发生的一次误会。”菅野歉意地说：“于司令官健在就好，我明天亲自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2天一早，菅野随我乘车回到山城镇。我们来到行辕司令部，看见于芷山正和赫慕侠坐在办公室谈话。菅野顾问上前握住于芷山的双手说：“司令官，我听肖参谋汇报了事件经过，这的确是个误会，我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向你表示歉意。”说罢，深深地对于芷山鞠了一个躬。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这才放宽心，连连说：“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还劳驾菅野顾问亲自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我们顾问团应该对司令官的安全负责。”菅野说：“我马上到守备队去一趟，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行处理。”

下午，菅野顾问从守备队回来，跟于芷山敷衍了几句，说什么夜袭德裕粮栈，是守备中队长照井一手造成的。大队长小田对此十分不满，除对于司令表示歉意之外，并将对照井“进行撤职处分”。随后，菅野对于芷山说：“于司令官，依我看，您长期住在这偏僻山镇不妥，还是回到奉天去吧！”

“好。”于芷山满意地说：“我过几天就走。”

菅野在当天下午离开了山城镇。于芷山和我们的行辕司令部也于第3天迁回沈阳。

狡诈的于芷山明知山城镇事件是日本最高当局蓄意谋杀

他，却没有暴跳如雷，倒戈相向，反而派我求助日本顾问从中调停，表现了他对关东军的“无比信任”和对日本天皇的“无比忠诚”，促使日本当局易辙更章，不但放弃了杀害于芷山的计划，并决定扩充伪军，健全伪军，使之成为关东军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摘自《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于琛澂和邢士廉

溥　杰

于琛澂的平日作风，一贯是假装豪迈，假装傻，更恃手中的“造孽钱”，专以小恩小惠收揽“人心”。他所以从伪军管区司令官爬上伪大臣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以金钱喂驯了他那军管区的东宫顾问。他在伪“治安部”也是如此：经常因人施饵，各投所好，以为拉拢。例如该部的高级顾问元泉馨由大佐升少将时，于又送厚礼又设宴相庆；在元泉的家中，还不醉装醉地对着元泉脱下来的军服上的少将肩章，深鞠一躬，并哈哈大笑说：“满金一个星，真了不起，元泉少将阁下！”他对日本人的这种谄媚方法，和张景惠呼板垣征四郎之妻为弟妹的肉麻献媚不同，在开玩笑之中或借着酒醉说出“入耳不烦”的话来，使受者志得意满，旁听者不太刺耳。

他还故意“宠信”给他当副官兼翻译（其实是他的监视者）的矶部伪少校，公私一切从不避忌，并经常送钱给东西，讨其欢心。所以从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伪“日系军官”，都认为他“心直口快，豪爽可亲”。因此，即使他当众辱骂顾问部的

"红人"曾根崎清臣，不但未招出日本顾问的忌恨也未遭到关东军的怀疑，反为敷衍他的面子，将曾根崎贬往哈尔滨的伪江上军，使他过了几年失意的岁月。其实他的心计是：抓妥顾问，向"日系军官"发发脾气，既可给自己"立威"，尤可取信于"满系"军官，给他们一种错觉："他不怕日本人。"

同时他也以小恩小惠笼络伪军官的上层主要人物。因他和张景惠只知尽力巴结日本人，把中国人不放在眼内的作法不同，所以当时伪军官对他非常尊信、亲昵。以至在他死时，伪科长们一齐坚决主张他应"国葬"，逼得伪次长真吉鹤吉不得不婉商关东军，以"国军葬"了事。他的手法是，每星期六午间必邀伪军军官到他家吃饭，大鱼大肉尽量款待，有时还借麻将、牌九故意输钱，使这帮人心满意足。他并不向这帮人卖乖，总是开着玩笑说："好容易买来的鱼肉，都被你们吃光了。"经常而定期地专门请中国人作客，在当时伪大臣中是谁也不敢作的事。即头号汉奸熙洽、于芷山等亦曾因为每月轮流请客一次（名曰"穷棒子会"，志在吃喝，原无政治上的意味），招致日本宪兵的调查而不敢再搞；可是于却在日本宪兵的疑忌之下，得到关东军首脑人物的关照，说了一句"好在是于琛澂么，他向来就是不拘细节的"了事。

于对我当然也不放过，常叫我一个伪少校羼加到该部的科长级伪军官里，参加每星期一次的"家宴"。还经常送东西或到我家来作客。一次他办生日时，把我让在上位，并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级别最小，所以今天你得坐首位……"说罢哈哈大笑，来宾们也只得附和着一阵哄笑。

总之，他就是经常耍这种"谄而不太肉麻"的手腕，博得敌伪双方的好感，几乎夺了张景惠的伪国务总理的交椅。张虽然对他早如"芒刺在背"但无可奈何。有一天于芷山向张开玩

笑，在张的耳目——退役的伪“新京宪兵司令”德楞额的面前，故意取瑟而歌地向别人说：“国务总理就要换人了，这回于险舟（于琛澂的号）可过上总理瘾了。”果然德楞额听到，立即藉故溜走。于知他是向张报信，大家就蜂拥跟踪到张家，果见张脸色铁青怒容满面。后张知于是为揶揄德楞额，便破涕为笑，大骂几声。

不过最后，于到底由于“豪放过度”，以致明升将军，实却丢掉了伪大臣的椅子。原因是于在关东军司令部喝酒时，“出洋相”过多，致遭到“新主人”——新任的参谋长笠原中将的不满，认为于“过于轻佻”且在军司令官面前“失礼”，结果“取张而代”没有作成，抑郁退居年余病死。

这时的伪大臣是邢士廉。他的作风又和于琛澂不同。他是以柔顺、不多事见“长”。谄媚日本顾问，“事事不过问”、善当“留声机”，同时对外却能“像个样子”。当时的元泉馨高级顾问，曾在酒酣耳热之际拍着邢的肩膀说过：“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作。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罢！”邢即得意微笑地搭腔：“我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他对于我常常套近乎，如一到任就请我到他家吃饭并送我一个外国制打火机。每逢上班时路上遇到我，总是停车呼我上去一同到部。有时宴会后还特意用车送我回家……总之他是专从“平凡”处下工夫，事事不露头角，却达到拉拢的目的。对于中国人的伪高级军官，虽也常以酒食相飨，但总是举行一两个人的家宴，有时也同邀“日系”中的中、上级分子，决不让日本宪兵因他而费脑筋。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

伪满的将官

高丕琨

伪满的将军或当过大臣的武官，如张景惠、张海鹏、吉兴、于芷山、于琛澂、邢士廉等的情况，已见上述，兹将其余的曾任要职的将官介绍于下：

王静修 陆军上将，1877年生，热河省承德县人，后迁沈阳市，1910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教育长、黑龙江国防军军务处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为马占山代表与洮南张海鹏和日本军方面折冲。1931年与马占山同降伪满洲国，不久，马占山反正，而王却作了汉奸。初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处长，晋级中将，任伪军政部次长。1934年任第五军管区（热河）司令官。他平日表面上善于装呆作傻，凡事均任日本顾问决定，颇得日人信任，乃晋级上将，调任第六军管区（牡丹江）司令官，又调任第一军管区（奉天）司令官。嗣任参议府参议，直至伪满垮台。

王殿忠 陆军上将，1880年生，营口市人，回族，江苏陆军补助教育团出身。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民国3年（1914年）任福建督军署中校参谋、骑兵团长、直鲁联军骑兵团长、直鲁第二联队司令兼江北警备司令、津浦护路司令，1928年任直鲁联军骑兵总指挥及步兵第一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任奉天省暂编陆军骑兵第一旅中将旅长、辽河地区警备司令，1933年任奉天警备军混成第三旅旅长兼辽河地区警备司令，1934年任陆军上将转第六军管区司令官，后又转第

一军管区司令官。此人好色，所到之处，都要找女人。他家虽有妻妾，还出外猎艳。笔者一次在牡丹江某浴池，就遇上他令其副官将来牡丹江演剧的名女演员（姑隐其名）找到浴盆单间苟合，可以说年老色狂，真不像话。对日本人善于逢迎，故为官一帆风顺。他是伪满的伊斯兰教（回族）总会长。当伪满建国十周年，马连良前来唱戏时，王特请马连良（回族）义演，为伊斯兰教总会筹款，救济回族难民。一部分回族还是对他有点好感的。

尹祚乾 中将，1887年生，湖南省芷江县人，日本东京高等商船炮术水雷学校毕业。历任中国海军部科长，利济、利捷、江宁等各舰舰长。伪满时任江防舰队队长、司令官，1935年晋级中将，任江上军司令官。退职后到伪汪精卫南京政府海军部工作。

王之佑 陆军上将，1892年生，辽宁省兴城县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安国军第五、六、七军团参谋长，察哈尔政务厅长、吉林省警务处长、吉林省政府委员兼全省公安管理处长。"九·一八"事变当时，反抗熙洽，筹划成立宾县政府，未能成功。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后投敌。1934年任陆军少将充伪军政部军事调查部长、晋级中将任参谋司长兼通信处长，后晋级上将任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1950年由苏遣返，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苏俘虏期间，为拘留人员讲《水浒传》消遣，能将宋江题的反诗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说得津津有味，不啻讲评书的。

于致功 陆军少将，1905年生，辽宁省金县人，保定北洋武备学校、日本步兵战术机关铳科毕业。历任排长、师副官长、参谋长等职。伪满大同2年（1933年）任奉天省顾问、黑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1934年晋级少将，任第三军管区参谋

长。

阎家梅 陆军少将，1892年生，辽宁省金州人，日本冈山师范、中央陆军训练处第三期军官学生队步兵科毕业。曾任奉天警务处、外交部奉天交涉署、东边道警备中队等机关的翻译官、安东警察厅行政科长、东边道保安司令部外交处长、奉天警备司令部上校副官、参谋长、司令部附。1935年3月任陆军少将、混成第四旅长。

王济众 陆军少将，1898年生，辽宁省北镇县人，奉天高等军校研究班毕业。伪满任兵器科长，晋级少将后任军政部军需局长，1939年任治安部少将军政司长。

郭恩霖 陆军上将，1895年生，辽阳人，日本士官、陆大毕业。曾任吉林陆军训练处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助熙洽策划投靠日本和成立伪满洲国，为熙洽长官公署的军政厅长。大同元年（1932年）任伪军政部参谋司长，伪康德2年（1935年）晋级中将任第四军管区（哈尔滨）司令官。后任军官学校校长，晋级上将，为伪满陆军元老，又是日本陆大毕业生，素以严整军纪为己任，所以投敌之侪辈都不敢轻视他。

张文铸 陆军上将，1894年生，黑龙江省讷河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讲武堂教官、黑河镇守使、齐齐哈尔警备司令。伪满任第四军管区（哈尔滨）上将司令，后任侍从武官长。曾去日本参观陆军演习。他曾在马占山部下从事军事活动，不但认识马占山，还颇受马的重视。当日军说马占山战死，发现尸首，无人证实时，就请张文铸鉴定辨认，经张反复查看，据说面目很像，尸旁的鸦片用具又确凿是马的无疑，因此断定死者确系马占山。于是日寇多门师团长上报马占山战死无讹。以后不久发现马占山未死，多门以虚报成绩，被召还免职。因此，张文铸亦被歧视，一时很感忧郁。他的顾问日本人

劝其积极到日本活动，万勿消极。就这样，张即频频与日本要人接触，果然引起日本人重视，不但当了军管区司令官，还晋级上将，升任伪皇帝的侍从武官长。

应振复 陆军中将，辽阳市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第八师参谋长、炮兵团长、第八师第十六旅长、马兰镇总兵兼东荒垦殖局长、东北第十六旅长，曾配合河南奉军参加各战役。1931 年任东省特区地亩局长。1932 年任伪满陆军少将中央陆军训练处步兵部长，1934 年任陆军中将吉林宪兵训练处长。

吴元敏 陆军中将，1886 年生，湖北省荆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军咨府第三厅第一科长、延吉镇守使署参谋长兼东北陆军第十二旅参谋长，1920 年任少将，1921 年任吉林督军府咨议。伪大同元年（1932 年）任吉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1934 年陆军军制改革，任吉林地区司令官，晋级中将任第二军管区参谋长、治安部参谋司长。

严昌泰 少将，湖北省兴山县人，东京高等商船学校毕业。历任海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参谋长、舰长、江上军参谋长，晋级陆军少将。司令官是尹祚乾。

曹秉森 陆军中将，1895 年生，吉林省永吉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历任东北讲武堂骑兵上校教官、东边道镇守使署骑兵团长，奉天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驻日使馆武官，侍从武官，晋级中将，任江上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1950 年遣返中国，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田德胜 陆军中将，1881 年生，锦州人，旧东北军第八师三十五旅、混成六旅长，任沿海地区警备司令。伪满康德元年（1934 年）任第五军管区锦州地区警备司令兼二十四旅长。

王永清 陆军中将，旧时期的土匪头子，报字“天下好”。

被张作霖收降编为旅长，又升任师长。郭松龄倒戈，在新民就是被王永清师逮住。当场枪杀的。后失宠于张作霖。“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为扩张个人势力，任命王为旅长，派充赤峰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二混成旅长、承德地区警备司令兼二十六旅长。后退官回家，住四平地区梨树县。1943年，笔者以伪总理秘书的资格参加了在梨树县收卖日本移民用地的现场会（为日本开拓民收买土地事曾惹起老百姓向伪总理跪拦坐车上书请愿。因此，其后凡收买用地时必请总理秘书临会观察），见到了王永清。他已60开外，有地有钱，在家享清福。笔者与他略事寒暄后，谈起他的眼睛来，听说他在夜间能望到比昼间还要远的区域，人称为“夜行眼”。他说老了，眼力也差了。他当土匪时，不是打家劫舍，是专抢大财主。在旧东北的官场很驰名。

李文炳 陆军中将，原属熙洽麾下的名将。任吉林军顾问，伪满任陆军中将，吉林警备第二旅长，转滨江地区警备司令。后因病退任。

鹏飞 陆军少将，满族人，祖籍辽宁省。曾在吉林督军张作相属下，充任督军署参谋长。伪满时随张海鹏左右，在第五军管区任第五教导队长兼朝阳地区警备司令、混成第三旅少将旅长。后转第一军管区。由于日本人发觉他不甘心作汉奸，遭到日本人的暗算而死。

朱榕 陆军中将，是朱庆澜（子樵）将军之子。因受伤腿有残疾。我见过他，容貌甚魁伟。在伪满任中将滨江地区司令。某年赴日参观演习，回来时在乘船上投海自杀。当时无人敢谈这个问题，故世间不明其真情。

郭若霖 陆军中将，系郭恩霖之胞弟，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晋级到中将，最后任第十一军管区司令官，驻密山，是国境要地。

郭文林 陆军中将，满族，和皇后婉容同属达斡尔族的郭博勒氏一支。1932年2月间，郭文林作为凌升的翻译，随之与张景惠等其他代表一起到旅顺请愿，盼望溥仪出山，以安定东北民心。请愿代表退下后，溥仪又单独接见了郭文林，鼓励他好好努力，并通过关东军赏赐玉石等物。还亲写委任状，任郭文林为上校。以后溥仪招募护军，当时的护军统领就是郭文林。连续晋级到中将，任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驻海拉尔。就在他任护军统领时，护军有几个人到大同公园游玩，与关东军宪兵队的便衣冲突，被勒令将护军解散了。

赫慕侠 陆军中将，日本士官、陆大毕业。是日本留学生中的优秀分子，也是伪满将官中的最年轻者。1938年被擢为第七军管区（佳木斯）司令官。三江地区接壤苏联，是国境地带，日本侵略者视为重要区域。赫在任司令官时，有一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顾问楠本中将到该军管区视察，行至山区，突然有一警卫士兵向大臣和最高顾问射击，慌乱之间这名士兵没有打死楠本。因此，赫以御下不严，被追究责任。但因日人认为赫慕侠对日伪忠诚无二，仅将其调迁为第五军管区司令官，未予其他处分。当时热河全境为八路军攻击之目标，令其带过立功以赎前愆。赫在热河未能打破困窘局面，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始终蜷缩不敢伸展。

王家善 陆军少将，日本陆士、陆大毕业。伪满军中的佼佼者。笔者在伪治安部警务司任刑事科长时，他在治安部军政司任军事科长（上校），在治安部科长会议上经常相聚。他为人痛快豪爽，谈起问题有独到之见，因此得到日本人的重视。以后出任部队团长。晋级少将任旅长。日本人发觉他桀骜不驯，虽重视但不完全信任他。日本投降后，他组织铁石部队任部队长，维持地方安宁。投国民党后，编为暂编五十八师任中将师长，驻

守营口，为营口警备司令。王在伪满新京军官学校曾任过教官，曾在军校教官（都是日本陆士和伪满军官学校毕业生）和学生中组织反满抗日的秘密组织“真勇社”。东北光复后，他以这部分人为骨干，建成军队。五十八师的军官从排长到团长，几乎全部都是伪满军官学校的教官和学生。伪军校的学生中有一些人，早已参加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联系，他们不断派人去营口，向身为王家善部下的同学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卒使一部分军官的思想有了变化，暗中筹划，伺机起义。伪满军校是中、日学生均收，模仿日本陆士的军事学校，中国学生在学校和日本学生待遇有别，中国人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学生间十分团结。他们最后也说服了王家善，在1948年于营口，由王家善率领，宣布全师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时期，曾入朝参战，表现突出。王家善转业后，任辽宁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病故。伪满军队的将级军官中，最后走上光明之途的，唯彼一人。

李文龙　陆军中将，曾任军管区参谋长、警备（地区）司令等职，最后任第四军管区司令官。李为人痛快直爽，部下对他无恶感，好诙谐，在部队庆祝会或一般宴会上，经常表演几段很不简单的魔术，博得满堂哄笑，人人喝采鼓掌不息。人称为谐趣将军。日本投降后，在哈尔滨被苏军逮捕。拘留在伯力俘虏营。遣返中国后，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吕衡　陆军中将，1899年生，台安县人，东北讲武堂六期毕业（步兵科）。历任陆军中校参谋、东边道镇守使署上校副官长等职。进伪军后，于伪康德元年（1934年）任少将，翌年任第二军管区（驻吉林）参谋长，后升任中将，任第七军管区（驻佳木斯）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苏军逮捕，遣返后监禁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杨镇凯 陆军中将，1898年生，河北省蠡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少将旅长、第三军管区（驻齐齐哈尔）参谋长。后晋级中将。

刘玉琨 陆军少将，1891年生，铁岭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吉林警备骑兵第一旅长、第二教导队少将队长等职。

附：伪军事部大臣及各军管区司令官一览表

兹将1944年的伪满军事部大臣及各军管区司令官名单列下，并加以简略说明。

军事部大臣	邢士廉	陆军上将
第一军管区（奉天）司令官	王之佑	陆军上将
第二军管区（吉林）司令官	关成山	陆军中将
第三军管区（齐齐哈尔）司令官	赵秋航	陆军中将
第四军管区（哈尔滨）司令官	李文龙	陆军中将
第五军管区（承德）司令官	赫慕侠	陆军中将
第六军管区（牡丹江）司令官	贾华杰	陆军中将
第七军管区（佳木斯）司令官	吕　衡	陆军中将
第八军管区（北安）司令官	周大鲁	陆军中将
第九军管区（通辽）司令官	甘珠尔扎布	陆军中将
第十军管区（海拉尔）司令官	郭文林	陆军中将
第十一军管区（密山）司令官	郭若霖	陆军中将
江上军（哈尔滨）司令官	曹秉森	陆军中将

据笔者所知，以上这些人中，在日本投降后，被苏联红军逮捕的有邢士廉、王之佑、关成山、赵秋航、李文龙、赫慕侠、吕衡、贾华杰、曹秉森等，其余的恐亦难逃人民的法网。被苏军逮捕的均在1950年后，遣返中国，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除在该所病死的以外，均经过改造成为新人，释放后为其安排职

业并与其家人相聚，充分体现了党的仁至义尽的宽大政策。

（摘自《伪满人物》）

伪满“将军”吉兴

王文锋

吉兴是伪满军界中一个重要人物，他由延吉镇守使，一直爬到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伪皇帝侍从武官长、伪尚书府大臣的高位，并获得伪皇帝所赐予的“将军”称号，为日伪政权效尽犬马之劳。

一、出身与发迹

吉兴，字培之，辽宁省沈阳市人。1879年生于一个世代为官、显赫的官僚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是清朝皇族爱新觉罗家族的一支，只是到了清末民初，家境才逐渐败落下来。吉兴10岁方入私塾读书，1895年考入贵族学校满清官学馆，成为一名官学生。1901年转入盛京官立省学堂，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11年回国。吉兴凭借其深于谋算、器于逢迎，他的官职扶摇直上。1914年升任奉天镇安上将军公署陆军炮兵中校，进入了奉军最高领导机关。

1918年，张作霖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直接插手北京政府，组成“南征军”入关南下。此时吉兴已升任驻北京奉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并兼任陆军二十七师参谋长。二十七师是奉军的鼻祖，是张作霖发迹、称霸东北的基础武力，也是张作霖自任师长、多年经营的老本钱，直到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

才任命亲信部下孙烈臣为二十七师师长。

1921年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兼行省长事，吉兴随之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1922年又晋升为陆军少将。

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进行整顿，将所有的军队严加改革，彻底调整，重新改组，将师的编号取消，改为旅制，共编成20个旅，吉兴被任命为陆军第十三混成旅中将旅长、兼延吉镇守使。吉兴成为掌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

二、甘当汉奸

延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国境，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所以日本侵略者早已把魔爪伸入延边。“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消息传到延边，激起了延边人民和当地爱国官兵的强烈愤慨。

此时，负有保土卫民重大责任的延吉镇守使吉兴却在紧锣密鼓地做着投降的准备。9月19日，驻延吉龙井村日本特务机关长河野悦次郎即和吉兴取得联系，告其奉天已发生事变，并询问吉兴对此事的态度。吉兴明确表示：决心坚决和日军采取合作态度，制止混乱局面的发生。当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吉林边防署参谋长熙洽无条件投降，将吉林城拱手让给日军时，吉兴紧步其后尘，决心投降。他一面派代表到日本驻间岛（延边）总领事馆“交涉”，表示“没有丝毫反抗意愿”，并保证“大军到来之前，尽一切力量镇压共产党捣乱”。一面又召集二十七旅（此时吉兴已改任东北陆军第二十七旅旅长）下属的团长开会。吉兴在会上谈了东北的局势，及日军势力强大无法抵抗并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意见，强行宣布投降。欢迎日本特务机关派日本宪兵大尉植野来担任他的军事顾问，一切行动听从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的命令，从此吉兴开始走上了汉奸道路，

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抗日武装运动的驯服工具。

同年11月中旬，吉兴来到吉林，同熙洽一起商谈建立伪政权之事。吉兴和熙洽同属爱新觉罗家族，又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投敌卖国、建立伪政权方面臭味相投。对于熙洽的卖国主张，吉兴极表赞同，特别是对于拥戴溥仪来东北建立"新国家"，更是欢迎，并再次表示：一切行动听从熙洽的安排，同心协力共成大事。

为了得到日本主子的垂青和信任，吉兴积极开始活动，去拜见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多门二郎师团长、大迫通贞顾问，奴颜婢膝表明了自己竭尽全力效忠之意，并对日本关东军所制定的伪满建国方案绝对拥护。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吉兴拥戴有功，被任命为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官，下辖步兵6个旅、骑兵2个旅、1个教导队，负责警备长春、吉林、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延边等广大区域。这是护卫伪首都"新京"、镇压抗日反满运动、维护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三、围剿镇压抗日武装力量

1931年12月7日，日本"三友敦图铁路测量队"的部分人员在日本军警的陪同下，强行闯入翁声砬子禁区，拿起望远镜四处乱望，并对前来制止的三营士兵说："我们是战胜国，你们的旅长吉兴都得听我们的，你们凭什么管我们。"两名哨兵忍无可忍，开枪击毙了两名日军。当营长王德林将这一情况报告吉兴时，他大吃一惊，诚惶诚恐，大骂道："妈的，谁让你们开枪打死日本人。"

并且马上派人调查此事，又亲自向延吉日本特务机关长河野请罪，表示对此事一定要严加处理，给被击毙的两名日军每

人发3 000元抚恤金。

王德林率队宣布抗日，在延吉县小城子成立吉林救国军。吉兴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是当着日本主子的面打他的脸，他一面和王德林通电话，劝其归回；一面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前去围追堵截。

吉林救国军与吉林自卫军联合作战，王德林任救国军总司令，原东北军第二十八旅旅长、滨江镇守使丁超任护路军总司令，共同对敌作战。吉兴亲自指挥伪军在日军第十师团的配合下，向救国军展开疯狂的进攻，吉兴还以同学关系给丁超写信劝降，劝其“要认清形势，皇军势力强大，投降后绝无生命危险。”

吉兴就任伪吉林省警备司令后，坐镇吉林，风起云涌的反满抗日运动，使吉兴惶惶不可终日。

1932年3月，在黑龙江宣布反满抗日的李海清率领抗日部队近万人，渡江南下，包围农安县，并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伪满首都“新京”。吉兴就此事马上和日本军事顾问大迫通贞共谋组织讨伐司令部，吉兴自任司令官。他亲临前线，并调来张海鹏所属的两个骑兵旅，直接由吉兴指挥。在日军的配合下，向抗日部队发起猛烈进攻，李海清部撤退后，吉兴紧追不舍，并非常残忍地将抗日战士的头颅割下来“示众”。

活动在永吉、磐石一带的抗日武装殿臣部，围攻吉林市，袭击吉奉铁路火车，并俘获伪军旅长朱力罕，声势浩大，对吉兴造成很大的威胁。1933年吉兴亲率伪教导军步、骑兵，并奏请日军中村旅团的配合，设立“讨伐”司令部，自任总指挥，以三千多人的兵力“讨伐”，仅有五六百人的殿臣部。他采取了剿抚兼施的伎俩，在武力进攻奏效不大的情况下，日伪当局用重金收买了殿臣的干儿子刘东坡，并以公开谈判、暗中埋伏的阴

险手段，使殿臣所部百余人牺牲，消灭了这支抗日武装力量。

1934年3月1日，溥仪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后，在日本关东军授意下，对投敌附逆的汉奸封官晋级，吉兴一是有率先投敌的拥戴之功；二是对日伪政权尽忠尽职；三是讨伐抗日军民“战功”卓著，晋升为伪满洲陆军上将、第二军管区司令官。

吉兴在伪满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任期内，亲自率军或指挥围剿抗日联军达85次之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参加并指挥的1939年大讨伐，这是日本关东军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日联军的围剿。由伪新京防卫司令官野副昌德担任讨伐总司令，调集了伪军6个旅、伪警察4个大队、日军3个守备大队等约为75 000人的兵力对活动在敦化、榆树、蛟河、桦甸、磐石、舒兰、长白、抚松等地以杨靖宇、陈翰章为首的抗日军2 000人的大讨伐，对这一带的中国人民采取了空前的屠杀手段、三光政策。吉兴不但直接参与了这次大讨伐的指挥活动，而且亲临前线，坐镇桦甸，亲自挑选200余名伪军作为敢死队，并任命伪教导队队副关启宇为队长。吉兴明确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打死或俘获杨靖宇。敢死队出发前，吉兴设宴招待，鼓励敢死队员说：人人努力，奋勇向前击毙杨靖宇，升官发财。这次大讨伐使抗联战士牺牲了500多人，无辜人民死伤3 200余人，杨靖宇将军、陈翰章等同志也都在这次大讨伐中牺牲了。

四、献计效忠，拜见日皇

吉兴为了达到他争功取宠、官运亨通的目的，他在积极参与残酷围剿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还为日本的侵略政策献谋献策，以表忠心。日本顾问大迫通贞曾问他：“要讨伐抗日军，采取什么办法最好?”吉兴谄媚地说：“必须采取断绝粮道的办法，

他们是利用山林地带活动，要把他围困住，封锁交通，日久无粮，不打自散。”日本侵略者在讨伐中把吉兴的建议付之实施。

伪满国兵法公布后，吉兴率先示范，亲自主持伪满第二军管区的征兵，并编成新兵营，首先进行为期3个月尽忠日伪的奴化教育。吉兴还亲临新兵营训话：“服兵役是青年人最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满洲优秀的青年，应当忠君爱国，用心学习军事技术，遇战努力杀贼是军人的天职，以后要竭尽心力向上。”吉兴为了扩大影响，还把新兵入营式，拍摄成纪录影片《壮志烛天》，并在伪满各地放映，对伪满国兵法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4年11月4日，吉兴再次东渡日本，23年前，吉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而此次吉兴则是作为伪满洲国军事参观团团长，为的是“善报邻邦，联络感情，参观友邦之军威，训练之整备，今岁日本天长节之阅兵式。”《盛京日报》1934年11月4日对此做了报道：“赴日本陪观11月中旬，在关东地于之陆军特别大演习之满洲国军政部吉兴上将以下陪观见习武官，一行33名，伴同板垣少将，在土肥原少将外多数送行之下，乘三日由大连出帆之‘贝加尔号’就赴日之途。”吉兴率领参观团，在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板垣征四郎的陪同下，到日本拜见小矶师团长、陆军省大臣林铣十郎、次官桥本虎之助，对他们给予伪满军队的援助深表谢忱。虔诚地参拜了天照大神、伊势神宫、明海陵墓后，谒见日本天皇裕仁，盛赞日本军队兵强将勇，军容严肃，战术精巧，举世无双，并请求天皇给予伪满军队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伪满军队的全体将士一定以日本军队为榜样，为日满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竭尽全力。一副十足的汉奸奴才相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五、护“驾”巡视，升任侍从武官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遮掩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为了表面上把伪满洲国装扮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出于宣传上的需要，安排傀儡皇帝溥仪多次巡视伪满各省。为了大造声势，在溥仪巡视经过的道路上派出大批军队随行保护，吉兴便以第二军管区司令官的身份多次率队随行保护。1934 年溥仪巡视奉天省、1938 年秋“幸临”哈尔滨江上军舰观式、1938 年赴锦州巡视、1939 年春赴牡丹江巡视、1940 年夏赴吉林视察小丰满水电站等。溥仪每次巡视之前，吉兴是事无巨细，亲自布署、亲自检查，预先演习行车、停车，并准确计算行程所需时间。铁路两侧都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溥仪经过的路途上百姓必须回避，并断绝交通；吉兴统辖的军队、警察、特务，以保护“皇帝”为名向人民敲诈勒索，随意抓人，有时竟关押一二千人。吉兴护“驾”有功，既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又得到了溥仪的信任。1941 年春吉兴升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侍从武官长，掌管侍从武官处。该处是以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为主要职责以及军事方面的上奏、奉答及传达命令。凡官兵操练、巡幸及其它祭祀、典礼、宴会、觐见等，都要陪侍扈从。所以溥仪对这一机构的人选相当重视，以最亲信者充任，以此可见吉兴的受宠程度。

在侍从武官长之下，设侍从武官 5 人，由少将或中校以上军衔的陆军军官 4 名或校级以上海军军官 1 名充任。吉兴此时的职责是：1. 伪皇帝举行典礼时，如“特派式”、“亲任式”、“建国节”、“万寿节”或接见外国使节，他都要在溥仪左右两侧站班。溥仪定期要去“建国神庙”参拜，吉兴也要随行侍候；2. 溥仪外出巡幸，他必须随行，并日夜不离身边；3. 按惯例每年

年终侍从武官长都要代表溥仪，携带慰问金和慰问品，到日本侵略军驻地和伪军队、伪警察驻地慰问，向士兵宣读溥仪的“敕语”。侍从武官长因为是代表当时“皇帝”，所以走到哪里都十分神气。当时侍从武官长的一切行动，都是由日本人事先规定好的，他的权力也只是照章履行手续。此时期在伪满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可见到六十多岁的吉兴笔直地挺立在溥仪的身后。

1943年，吉兴被授以伪满军队中最高荣誉“将军”称号。伪满当局公布的“将军令”明确规定：对陆海军上将之勋绩卓著、历官有年者，表彰勋劳，并示尊崇优遇之意，决定由皇帝敕授以将军称号。伪满军界被授以将军称号的人屈指可数，吉兴获此“殊荣”足见其不遗余力地效忠日伪，不但得到溥仪的信任，也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

六、末日中的伪尚书府大臣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的局势已日趋明朗，在日伪政权的末日里，同年7月，吉兴又升任伪尚书府大臣，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但美中不足的是伪尚书府大臣在名义上很尊崇，但实际的职权范围很小。伪尚书府大臣之下秘书长、秘书、办事员、差役总共也不到10人，他们的任务简单明了，成批的文件要盖印，他们就去请玺到府，在吉兴的监视下一一盖印后，将盖印的件数奏明溥仪，日常少数需盖印的文件，则由吉兴派秘书官捧呈清单，进宫侍候“钤玺”。

伪满国玺为二寸五分立方青玉，上镌云钮，文为“满洲帝国之宝”，铁线满篆，宽边光地。“御玺”为二寸五分立方白玉，上镌蝉钮，文为“皇帝之宝”，铁线汉篆，宽边光地。

让我们再看一看伪尚书府的职责：“典存御玺、国玺，并掌关于诏书、敕书，及其它文书之用玺事务。”具体地说就是伪皇

帝的监印官，正如吉兴后来在他的供词中所交待："我由侍从武官长转任伪尚书府大臣，职责是看守伪皇帝的'御玺'和盖印，所有伪皇帝的诏书、叙勋证书、任命状，都须盖用伪皇帝御玺，由我监视用印。所盖之印，每月月终列表统计，奏报伪皇帝溥仪。我的任务除监视用印外，别无它事。我所盖印的文件，内容都是些出卖祖国人民利益，奴役、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一系列反人民的反动文件，对于效忠日寇，屠杀人民来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兴在伪尚书府大臣任内还不到一年，伪满末日就到来了。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吉兴得到了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命令：必须跟随溥仪"迁都"通化大栗子沟，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示意说：关东军为了阻击苏联红军，固守东边道防线，退守南满。吉兴对此唯命是从，8月11日晚陪同溥仪出逃通化。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7日午夜，吉兴参加了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召集的"重臣会议"，会上念了一通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这些伪满洲国的"重臣"们和吉冈安直一直叫溥仪最后一次裁可。吉兴含着眼泪和溥仪告别，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晚逃离大栗沟，连夜赶回长春，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国民党军队接收。8月31日，吉兴在长春柳条路的家中被苏联红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年7月31日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病死于此。

（长春市宽城区政协供稿）

“志士社”的组织及其罪恶

韩　蔚

一、志士社的由来

志士社是元泉馨调到伪满洲国军事部与最高顾问南本（日本现役中将）为争夺领导权互相倾轧。后来南木气病了，元泉馨从此操纵伪满军事大权，成为伪军高级人物。从此，在内部搜罗骨干，准备成立在他指挥下的特务机构。在外部，有他亲信的学友林敬三（日本现役中佐后升任大佐）、南情中校（日本人伪军衔，不久即任上校）。内部有山崎（日军退役大佐）和为其摇旗呐喊的韩倜[①]。韩倜唯官是图，百般地迎合元泉馨从而元泉也把他作为亲信帮凶。还特邀橘武夫（日宪大佐）为驻伪满宪兵顾问官（该人与元泉有亲属关系）。这些人被元泉召来开秘密会议，会议是在高级顾问室开的。会议是元泉与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侦探部召开的。元泉藉机要在伪满洲国独树一帜，操纵伪军政要人的思想动向。

元泉原拟定在“国防军事调查委员会”外，另设一个“志士社”。志士社为效忠裕仁天皇的无名英雄的称号，志士社的形成是在1944年初。这个组织成立，正是伪满军日系军官开会时，元泉藉机会议，召集亲信在他家里开会，决定了组织名称“志士社”，元泉以日本少壮军人派的关系，拉拢了幕前幕后支柱，

---

① 韩倜即本文作者韩蔚。

幕前的有：笠原幸雄、中村少将、山田彦三少将（日本陆军省任职，是山田乙三的弟兄，黑龙会的上层人物）。幕后活动的有伪满甘粕（满映理事长，也是日本的著名特务之一），在华北有富永顺太郎（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局特务班长），还有满铁株式会社的一个叫人本的（记不清了）是课长。军事部内有：山崎、韩倜。其他部队：林中佐、南情中校、中村少佐、佐佐木少佐。警察方面：长尾警务总局长、松井泰三。日宪方面：橘武夫大佐、长山大尉、谷野大尉。各军区也都有人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由山崎起草了工作方案，并由山崎作了解说后，便一致通过了。元泉命他最亲信的帮凶山崎代他负这个组织的实际责任。在本年3月间元泉又在他家召集开会，已有20多人了。军事部内有长岛参事官、中村大尉、市井少校、清水上尉（朝鲜人），还有在乡军人会的2个人，有长尾局长的代表、松井理事官、马恒中校也参与了这次的会。后来，成员日渐增多，到元泉调任驻山西第十四旅团长时，已经达到具有80多人的组织了（外围关系并不在内）。

元泉临行时，将外部的关系人特召到顾问部开的紧急会议，这时林敬三已升任大佐了，充任铁石部队最高顾问，担负伪满军入关内的指挥权。林顾问派韩倜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给林顾问、山崎大佐各追补了一枚武功章，元泉在会上总结了志士社在几个月中的工作成绩。元泉走后志士社由山崎大佐暂代执行任务。

二、组织概况及主要负责人

志士社在伪满军事顾问部秘密成立以后，最初组织了五个班，①视志班：由长岛参事官充班长，班员若干名。②除奸班：由中村少佐充班长，班员若干名。③宣传班：由韩倜参事官充

临时兼职班长，班员若干名。④特高班：暂由市井少校代理，松井理事官辅助，班员若干名。⑤总务班：由山崎兼班长，班员若干名。担负志士社组织联系责任者都是骨干分子。主要组织者：元泉馨、橘武夫、山崎健太郎，这三个人是志士社的主要负责人。这特务组织的成员为了完成秘密工作，被分配到各军管区，有的派到各省市兵役科。不仅各地区军事上直接在他们操纵下，各地伪政府也多数受到这些人的控制和摆布。

三、志士社的罪恶活动

志士社成立即起到了监军的作用，特别是对旧军人和进步人士监视尤严密。有的人知道了这帮人是一类什么样的，都以敌视的眼光视之；有的人公开称他们为秘密宪兵。因志士社已经操纵了伪军警宪特的权势，深入到各机关和社团的内部，进行着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对伪军事部上、中层（校官以上）伪军官的思想动向进行秘密监视。如具有进步思想或在某方面有同情共产党和国民党者，都要被诬以“叛徒”的罪名，多方面进行搜查和检举。对稍有思想动摇者即说成是反满抗日的危险分子，立即进行秘密视查，罗织成为反满抗日的嫌疑犯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在监狱里。1944 年10 月秋季大搜查，元泉召集志士社在新京市的人员分担了特殊任务。同时又发给日本宪兵司令部以特别通行证、住宅搜查证，派山崎大佐为这个临时任务的指挥。

韩倜临时派到国都宪兵团，松井派到首都警察厅，马恒对内进行监视和尾随工作，秘密指挥着二十几个人。这次搜捕的大多数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有少数的进步人士。伪宪兵团的任务是对军事电台和新京电台工人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国都宪兵团特务科长某向韩提出赤色分子嫌疑者×××是军事

部的现任少校。这个任务历时三天就结束了。据说，宪兵团对军事部这位少校进行调查，尾随多日，当时没得到韩的同意，因怕伤他自己的面子。后来知道是特务科长和宪兵团长于百清合谋下利用商人造的谣言。不久，宪兵团特务科又在吉林通信支处逮捕了一个姓张的属官，严刑拷问，要他供出×××叛逆行为来。张坚贞不屈并未涉及他人。据说后来把张送到军法处处理。松井被派到首都警察厅不到三整天，回来汇报说逮捕了有叛徒活动的分子40多名。在此期间，一天晚上伪满洲国通讯社编辑《新满洲》总编郝玉臣（公度）的老婆到韩倜家，求情说：郝玉臣在头天晚间12点多钟，被警察厅特高科协同宪兵逮捕了。要求挽救郝玉臣。我与郝玉臣是中华时的同学，又结了金兰之好。元泉馨到伪满不久，经过我的介绍，经顾问部特殊采用为嘱讬。但郝玉臣素与国民党有联系。联系方式是利用报刊上的小品文或散文中的某些特定词句进行的。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不断到郝玉臣家。郝的一切活动我是知道的，因我俩的倾向一致，故默默中支持郝的工作，得到郝被捕消息后，我多方面为郝奔忙。后来由首都警察厅内部透露消息说：警察特务科长已与首都宪兵团特务科取得了联系，为预防我对他的庇护，将郝玉臣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处理。这是当时警察厅特务科长给宪兵团特务科长打电话时说的。

1944年10月25日，军需处一日本属官对我说：日宪兵司令部长谷川科长来电话问参事官的电话号。在那个时代的人，谁听到日本宪兵队不惊恐呢？正在犹豫不安时，元泉的勤务员找我到高级顾问室去一趟。元泉问我与郝玉臣是否有不轨活动？我硬着头皮说：除工作上的联系外并没有不轨行为。元泉笑着说：你到宪兵司令部去吧！我随后就去，如没有时间也可能叫宪兵顾问去（是指橘武夫说的），我到宪兵司令部后即被软禁在长谷

川的办公室里，要我写出与郝玉臣、军事部×××少校的关系。

惨无人道的刑讯

这是我亲自在日宪兵司令部见到的日寇对中国人惨无人道的种种刑讯。当晚，将郝玉臣由警察厅解来，长谷川让我与他一同来到了审讯室。我一进门就见到一个头上戴着用黑布特制的口袋的人，从穿着上可以辨认出是郝玉臣。长谷川叫一个曹长把郝头上口袋摘下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郝本来是一个黑圆脸型，但露出脸来的似一具浮肿的僵尸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头发前顶已经脱落了许多，看得出是在刑讯时拽掉的。站在郝玉臣身边的是两个宪兵。长谷川叫一个曹长给郝注射了一针，郝玉臣恢复过来了。我这时才明白，郝玉臣是被用毒药麻痹了他的意志，故而不能说话。郝玉臣的脸色渐渐地又红润起来后，长谷川问郝玉臣与韩参事的关系，是不是由国民党给你们联系的？郝连说不是。长谷川又叫来两个宪兵拿着竹剑你一下我一下地打在郝的头上或身上。把郝打昏过去了，再用凉水喷过来。接着用手铐铐在郝的左脚，另一头铐到他的右手腕上，然后用木棒串上架到两张桌子的中间吊起来。这时郝的汗珠子、泪水不断地往地下落，使人目不忍睹。郝被吊有两个小时，直到眼角流出了血，才放下来。长谷川邀我去吃饭回来后，又开始了第二次刑讯。这次没问几句话，就灌凉水。我看到郝玉臣的眼光，是对我有种乞求的样子。我只好默默地示意给郝玉臣，好坏就在这一晚上了，如能过这一关，我们明天早8点钟，就可能恢复了自由。我望着那个刑讯时用的特制的凳子发呆，那个可怕的刑具一头是个槽的斗子，将头卡到槽里，想动也难。另一端就是“木狗子”，是两个槽将两脚卡到里边，就别想动了。有两个宪兵坐在郝的大腿上，用钢笔杆挑肋骨，真是惨不可言。如此非人的刑讯，但郝始终没有招供。这时已经

是夜间12点多钟了。后来，郝和我恢复自由后，郝对我说：一天夜间12点多钟的时候，首都警察厅特务科的便衣特务姓张的，带着三个日本人也都穿着便衣，到屋子里就搜查。郝问他们身份时，日本人说：他是宪兵队×××曹长。搜到的不过是《新满洲》的底稿，还有我交给郝的俱乐部原稿。搜查完了没容分说，用一个口袋往脑袋上一套就拉着走了，上摩托车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四、志士社的外围组织

元泉为了加强这个组织，秘密指示军管区顾问培植亲日分子，在各军管区顾问直接指挥下另行编成特种小组，受军事顾问部的指导。原计划要在各军管区大量地发展外围组织关系。并且发展各地方的伪官吏。但必须要进行“甄别”，还要填表宣誓等。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表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效忠日寇，一切唯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切使命是从。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重的处分。为了郑重还要有介绍人两人亲自签署。然后逐级上报到元泉本人核阅。中国人填写的表格都是由韩倜复查，经过我在表格上都作了小结、签署。

具体的组织，是以各军管区的情报参谋为中心（都是日本人），不另设办公室。有的是以伪满宪兵特务科长或各地方机关的兵役科长为中心，每个特种小组人员不超过15人。除地方机关官吏参加外，还有地主、富商的子弟在大中学校考试不及格而失学的学生。凡参加特种小组的，不但免除了兵役，而且还能得到顾问部保送入学的机会。这类学生被发展成特务分子后，便对同学进行监视思想的动向。这种秘密特务，在伪新京市内约计有三十多个人。这些人为了献媚日寇，对思想进步的学生

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分子，各方予以刁难，进而施加迫害，轻者秘密关押，使其失去自由。从此，各地进步人士和学生失踪的时有所闻。在各部队从事人员的任务是监视部队长的思想动向（指中国人），对其中的忠实分子都晋级提升，并得到顾问部的特别津贴。例如：清水上尉，用一种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革命阵营中的叛徒薛文鹤破坏了革命组织（延边一带的案件），而得到关东军的奖金万元。清水利用这笔巨款在新京开设了药房，利用京图线大量走私贩毒。当时跑这趟车的有一个乘警（中国人）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要检查清水所带的皮包，清水反抗检查，以利诱的手段把乘警骗到车门口用无声手枪打死，把乘警扔下了车。然后唆使薛子鹤说：该铁路警是共军的地工人员，因畏罪脱逃被清水开枪打死的。

凡是志士社外围组织人员所到之处，无论是机关或社团和学校的人员们都被监视被调查，其中，特别是着重调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情况。因而，各机关社团和学校中都布满着恐怖。随时都有被扣上红帽子的危险，人人都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

五、以文教或社会团体名义出现的各种组织

文化商业中学，是在1935年前后，由日本特务机构黑龙会派坪田武思、五十岚等人，在伪新京市以教日语为名而设立的。实际上，受日本老牌特务头子头山满的指挥，在我国东北进行秘密活动。

1944年初还组织过“除奸团”。这个“除奸团”也就是满蒙除奸团的产儿，仍由坪田武思（已经兼任大同学院的教授）和五十岚负责，五十岚还打入某部的会社。坪田武思的这个组织非常庞大，是志士社的外围组织之一。当时还将大、中学校的

军事教官吸收到志士社的外围组织中，并对他们进行甄别。后来我奉命去华北，由长岛参事官负责审查，但他们是否加入该组织，后情不详了。

六、控制电信和言论

为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顾问部命警务总局及各地警察部门，在各大小城市的邮电部门设立邮电检查人员，他们也是志士社的外围，对报刊和电报信件进行拆封检查。如发现有进步的报刊和电报信件立即扣留，寻根追底，对有关的人罗织罪名，施以种种迫害。志士社在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方面，是操纵着各机关的大小会议，寻查是否有党派分子的活动。会议上稍有不满的言论，即认为是危险分子，随时秘密逮捕。志士社的大小头头都授以逮捕之权，设立秘密留置场（即是拘留所），对进步人士竭力加以迫害。1944 年的一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中，失踪的不下几十人。志士社的特务有时以仇陷害某人反满抗日，并借机敲诈勒索钱财。

七、配合伪警宪搜查

志士社在搜缴民间的武器中，配合警宪特进行住宅搜查。事前由当地志士社外围关系制造所谓的黑名单，按单搜捕。有时借捉捕浮浪者为名对凡是被认为是危险分子的人们，特务们在夜间进行尾随，当走到没人的地方秘密绑架到留置场扣押起来。利用这种办法，把在伪新京各机关职员中思想稍有动摇者逮捕的不下几十名。

各地军政机关的职员和官吏，随时都有被扣上红帽子的可能。就是军事部这样一个单位来说，也有两个被捕的，交给军法处判处，后经被害者家属起诉到顾问部，经我复查只是为了

一张八路军的战绩简报而给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经各方证实并没有非法活动，顾问部虽予以保释，但还是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给予撤职永不录用的处分。志士社逮捕的伪军政职员，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刑讯或审判时，志士社内部及外围负责人也参加。

1944年7月间，我被“邀”参加了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审判会。军事部除我以外，还有长岛参事官、马恒中校。伪满各部和宪兵团的高级日本军官、警务总局的高等官在松井理事官的带领下也参加了会，共约30多人。这天是星期六，通知下午1点在日宪司令部集合。人到齐后命令都把枪支交出来。这引起人们的不安，“这不是缴械吗？”大伙还是驯服地交了枪。之后，伊藤带我们到地下室。一进门就看见有十几个中国人，跪在墙角边，面朝墙，不准回头。还有穿着朝鲜族服装的人，也跪在一起。在他们身后，有3个宪兵持枪监管。

地下室并排摆着两张办公桌，后边有几把椅子。在另一面也摆椅子，是给我们这些旁听人准备的。大家坐下后，伊藤少佐和几个中佐坐到桌子的前面。这时，由宪兵带来两个戴着刑具（脚镣、手铐）的人。到会者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当中的一个不是前两天还在一起开会的竺参事官吗？怎么突然就成了阶下囚呢！我们这些人都怀着慌恐不安的心情，心想自己的安全也是朝不保夕，谁能保证自己不遭到同样的下场？伊藤见到大家的惊恐，随即叫人把竺带下去关押。留下的一个人是瘦长脸、高个子，满脸灰尘。细看才认出是铁路警务段的金段长。伊藤问：警务段改编为护路军，你对部下是怎么说的？金未做答。伊藤一挥手，两个宪兵就将他推到事先准备好的木凳子上。宪兵的嘴里还说：“上美人床上去享受吧！”只见金头朝下，仰着身子，躺在凳子上。宪兵用湿毛巾盖在金的脸上，使

他不能用鼻子出气。趁他张嘴呼吸的功夫，另一个宪兵用自来水管子就往嘴里灌水，噎得他喘不过气来，肚子鼓起老高。接着用子弹头挑肋骨，灌汽油，呛得鼻子、嘴里直冒血。灌昏了再用凉水喷醒。之后，宪兵又将一个特别的椅子搬来，叫着说：这个玩意可比"美人床"舒服得多，来吧！说着就把他推到椅子上关上电门，只见受刑的人直打哆嗦。刑讯半个小时也未问出什么来。就又把这个人全身的衣服脱光，倒剪绑上了，并往身上泼了一盒什么药水。在前后3个小时内，把金折腾得死去活来，参加者们面对此情此景各自偷偷落下了眼泪，这正是日本人吓唬参加者的一种手段。伊藤在招待参加者吃饭时说："吃完饭把那个家伙喂警犬，要是吃，就算他命短，不吃就算他不该死，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后，又把金某和另外5个人都提出来了，让我们去观看犬吃人的场面。我们来到警犬队，长岛对我说：有一次他来时看到警犬咬伤咬死20多人。我想，这不是到鬼门关来参观吗？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日本宪兵走。只见把押出来的人身上衣服扒光扔进了警犬圈。十几条灰色警犬，竖着两只大耳朵，吐着红舌头，蹲在一个日本宪兵的身旁。伊藤走近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身边说："你的说，八路军哪里的有？不说，死了死了的有。"那人一句话也没说，先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用逼人的眼光瞪着他。吓得伊藤倒退了几步。接着，他又像狼嚎似地叫喊："你的说？"那人好像听不见似的，也不言语。伊藤用手一指，那个日本宪兵冲着警犬喊了一声，几条狗一齐扑了上去，啃下一块块肉来。只听那人惨叫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们旁观的人，有的低着头，有的背过脸去，都不忍再看这惨无人道的兽行。伊藤走到我们面前，看每个人的气色。伊藤又一挥手，那个狗指挥官嘶叫了一声，狗又扑上去，把一个活活的人喂了警

犬。接着把另外3个人一齐扔进了狗圈。伊藤又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们的说，国民党哪里的有？不说死了的有！"有两个人说了几句什么话也没听清楚。日本宪兵不叫再说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见似的，伊藤马上叫人把这两个人押回。剩下的那两个人遭到同样的结果，也惨死啦。这时，又把姓金的也扔进了狗圈。伊藤问他说："是什么人主使你！"金说："这是仇人陷害。"伊藤也是一挥手。但是那些狼狗只是在原地转圈。未朝金扑上去，离着老远的嚎叫起来。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伊藤耍的花招。事先把一种药水泼到金的身上。狗嗅到后，不敢到跟前去。伊藤反而说："狗给他求情，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再说吧！"完事时已经是12点钟了。我们临往外走时，看见日本兵正给狗洗嘴呢。日本人常说中国人肉臭不让狗吃，日本人把中国人看的连狗都不如。

八、强化保甲和组训奉公队

志士社在名义上协助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行保甲制度，实际上是参加进行监督执行。1944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以收缴民间武器及一切军用物品为名，大量收回金属，无论是金、银、铜、铁、锡的器皿，都一律强制收缴，这个任务就交给保甲长办理。并发布告示："如有暗藏不交者，以军法治罪。"把金属回收和收缴民间武器混淆。由于强制收缴致使金属堆积如山，不久便运往日本国去了。在这次金属回收中成绩突出的保甲长得到了当地伪政府的奖金，鼓励他们效忠日寇。后来，在联保主任当中选拔了一批忠诚的奴才，吸收到志士社的外围组织中。

组织义勇奉公队。奉公队队员由依照国兵法要求而条件不合适者即谓"国兵漏"（即壮丁）所组成。具体作法是：通过当地伪政府举办壮丁干部训练班，由志士社抽调训练人员，以培

养反动的骨干，将年满18岁以上、30岁以下的青壮年编组为奉公队，进行反动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分配担任站岗放哨。在训练期间竭力灌输法西斯思想，将其中的忠实分子也吸收到志士社的外围组织。这些人受训结业后即担任各级队长，并得到特殊津贴（由志士社的报密费中支出）。以这些人为骨干统治压迫人民群众。把奉公队的骨干作为志士社的外围组织，是我由华北回到伪新京后，在特种会报上见到的。

伪满冀东“战地行动队”

韩　蔚

一、“经济战研究室”

伪满洲国设有“经济调查委员会”，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有“经济战研究室”，伪满军事部内设立分室。分室由顾问部秘密指挥。分室的秘密活动是在1937年平林盛人任治安部最高顾问时就开始了。该室人员也参加关东军的“经济战研究室”的秘密活动。

1939年9月间，松井太久郎继任最高顾问时，“经济战研究室”稍有起色。松井到任不久扩大了该组织，将山崎和我调到该分室负责组织“经济战研究室”的特务机构。又发展了几个中国人的嘱托，都是财贸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

1943年，元泉馨任伪满军事高级顾问时，又重建“经济战研究室”。该室主任是由一个日军退役大佐山崎担任，副主任由我兼任。还建立了“满绸贸易公司”，我担任总经理，副经理神

谷促太郎（日宪退役少佐），总公司设在天津。公司下附设“吉井洋行”，由吉井负责。吉井是日宪特高课大尉，是安清道义会名誉会长。这两个公开组织设立出张所若干处。这个组织在我国东北是以“会社”的名义；在关内又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出现的，实质却做的是封锁关内外解放区的经济。

二、战地别动队在冀东活动情况

伪满军战地活动队首先制订了入关后的行动计划。主要是奉关东军司令部附兼伪满军高级顾问元泉馨的命令，到冀东首先要抓市政权；而后加强警察机构，设立训练班，组织专门训练特务的机构。我入关前，从军、警、宪、特务机关中调用了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若干名，以备入关后建立冀东警逻网（即情报网）。

随我入关的骨干分子有李兴棠、王德润、郝玉衡、封唯一。他们均受过谍报和破坏的特种训练。还有由宪后机关调来的尉官赵大吉、程玉章。

（一）经济方面：由李兴棠、王德润（属官）二人组成经济调查行动组，李兴棠任组长，王德润任副组长。组员若干名，是由现地伪政府抽调的。对外名义上是调查关内外的物资交换事项，但实际是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及扰乱解放区的金融各种活动。

（二）政治视察组：由郝玉衡任组长，程玉章任副组长，组员若干名（是由伪满警宪机关抽调的），专门调查高级军政人员的思想动向。

（三）战地行动组：由封唯一任组长，赵大吉任副组长，组员若干名（是由各部队抽调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对方后方进行策反活动，破坏、造谣煽动人心，搜集经济军事情报等。赵大

吉是一个黑枪手，由他为首在战地行动组内组成突击小组，组员十几名。

因封唯一受过日本特务机关的专门训练，由他组成组训小组，专门培训特务，训练化装、暗杀、刺探军情，绘图、照像、撒毒等技能。以上是原制订的计划。

我到冀东后，冀东行政长官姜鹏飞对我起了戒心。姜鹏飞过去是伪满军的旅长，和我虽是同学，但他是我的前期，以学长自居，在官阶上我比他低。我到冀东后并未拜访姜鹏飞，而我和唐山市长袁规交往较深，袁正是姜的“敌人”。姜是多田骏的人，袁是元泉馨的人，冀东地区又在元泉的势力范围内，我到冀东又是元泉馨特派的，难免姜鹏飞忌妒。

元泉得到消息后，命令又变更了，顾问部指令：“战地行动队”暂设在铁石部队内，与冀东行政机关保持亲善的关系，但暂不参予行政问题。对外以“绸部队”或“满绸公司”为代号。从而“经济战研究室”设立了“战地别动队”的组织。

三、具体活动范围

经济方面：主要是控制冀东经济。而军用物资的调查，不仅在华北，还深入到华中、华南各地。可知少校到任后力主制造解放区的货币，以扰乱对方的金融，对解放区的物资流通进行封锁。令各部队的情报参谋提供军事、经济的情报，不断地派特务深入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

使我记忆犹新的是1945年初，经济行动组长李兴棠向我汇报铁路运输的情况，他说：由伪满洲国军事顾问部发来了10个用陶瓷罐包装很严密的东西，由日军一个大尉带着30多名士兵护送。这里可知少校亲自与日军接洽的，不叫我们靠前。由第二百四十部队的载重汽车在站上接货，可知少校陪同护送到某

地。

当天午后7点钟，顾问部给我打电话，要我立即到第二百四十部队参谋室开会，只有林顾问、南博部长、江中处长等参加。林对我说：是元泉阁下在7时命令召你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林又接着说：今天这个会，是冈村宁次阁下派人主持的，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和松本大佐来参加会议。他说今后的任务，受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双重指挥。今井参谋长强调设战地行动队的重要性。并新部署了对解放区撒布毒药或细菌的特殊任务。可知参谋从任“战地行动队”副队长以来和我见面的机会很少。他活动时只带几个亲信日本人和朝鲜人，“战地行动队”只带郝玉衡当翻译，行动秘密。而由“满洲”运来的重要军事物资，可知乘我不在现场时亲自率人检验，不准原“经济战研究室”的人员过问，因此我和可知是明合暗斗，矛盾百出，部下也分为两派。

政治视察组：它的任务是视察军政人员的思想动向。但可知到任后公然命令外勤人员擅自搜查公共场所，代行司法权。我记得是在1945年春，可知亲率外勤人员逮捕一个来自开滦中学的学生，通过刑讯，确认是八路军的地工人员，或者是开滦中学的青年团的干部，而交给军法处了。我当时只是为了与可知争执权利，找到顾问那里，以“我们的任务是保密的，这种滥用职权逮捕人，暴露身份不利今后的工作”为由，就说起可知以现任军官自居，不服从领导等等。林顾问因我和笠原幸雄的关系，又有元泉的介绍，就批准将该嫌疑犯交给战地行动队部队长处理。后来我以利用该人深入敌后进行策反活动为由，将这个学生释放了。从此，我和可知矛盾便公开化了。

四、可知纠合铁华部队长，秘密撒发细菌

1945年，铁华部队为了在短期内肃清铁道沿线的“赤色分子”，便要求日本军支持，或者特邀“荣”部队的别动队来支援(荣部队即是设在南京的细菌部队)。看来，可知是在那个部队拿来的杆菌。参与撒布杆菌的有李兴棠等人。李兴棠回来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只是把一个用铝皮包装的木箱给铁华部队运去，就叫我们回来。是否使用和使用的方法，我都没看见。事后据说，在铁道沿线的两侧(5公里内)发生了蔬菜被污染，而牲畜吃了被杆菌污染的草类，有的中毒死亡。就是用这种手段来威胁铁道沿线的居民，从而达到强迫迁移的计划。铁路沿线说成是疫区。这是1945年5月间的事情。

五、用化学武器进行实验的罪行

1945年6月间，伪满军驻冀东宪兵团渡边科长和行动队的可知带了一个翻译(郝玉衡)同去秦皇岛参加日本军事演习。郝玉衡过来对我说:这次演习，由特种部队参加(第100部队的别动队)，是做冀东气候的测验，又死了两个人。当地日本军押解来了两个囚犯，送到海边的草地上，有一架飞机从西南向东北方向飞行(这是他在利用风向)，当天的气温约有零上20多度，有轻微的小风，空气潮湿。天空晴朗，飞机低空飞行，距离被害者约有二三百米的时候，撒布毒气和另外一种化学药，波及地区约有100米到200米。两个被害者的皮肤都被灼伤，看样子呼吸困难，眼睛流出泪水。他们全身裸露的部分(面部和手足)，看样子都感到痒痒。飞机过去后约有30分钟，在被害者的皮肤上长出了红斑，有扁豆大小，眼看着都涨起来了，发了脓。据日本军医说:非常近似第二级火伤。但腐蚀作用比较强。在

毒气散布的地方，农作物及野生物的叶子上长了白色的小圆斑点。跟中毒者的身体裸露部分上长的红斑点差不多。

六、用空中爆炸炸弹的方法，做杀中国人的实验

渡边、可知等参观了空中爆炸演习，飞机是由东北来向西南飞行，天空是万里无云，眼看着飞机投下来一枚炸弹，声音异乎寻常地微弱，爆炸时空中产生了一股黑烟，接着地面上笼盖着一层黄绿色的烟雾（在有烟雾的地方早已准备好了被害的人们）。烟雾消失后约30分，验证了被害者中毒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嗓子沙哑、晕眩、咳嗽、流鼻涕、头疼、浑身软弱无力，皮肤发热，呕吐、口流白沫，最后口流鲜血而死亡。这里我说明一下，郝玉衡是伪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对中毒情况说的比较详细，因我在青年时也学过医，因而记的还较清楚。

初期的“满洲国军”

多田骏*

事变初期，军队摆脱了张氏政权之束缚，在各地独立，以保安军之名义，专心维持各省治安。在新国家成立，国务院开始办公，以及军政部创设后，逐步接受其统辖。尔后，通过军事顾问、军事教官之指导与皇军配合，消灭叛军，肃清匪贼，直至今日。

以下，就各军之沿革梗概，作分别叙述。

---

* 本文摘自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1933年8月给关东军的报告。

一、奉天省警备军

在东边道由于芷山收容的旧军队残部和在营口崛起的王殿忠军及从中分离出来的李寿山军，在司令官于芷山统辖下，与新国家建立同时形成奉天省警备军。

二、吉林省警备军

熙洽首先据吉林而独立，成为新国家建设之先驱之后，当时吉林军中原属于国防军之主力成为反吉林军而进行反抗，对此，以原省防军之外的非正规军、收编土匪等对抗之，在司令官吉兴统率下成为今日吉林省警备军。

三、黑龙江省警备军

1. 事变初期，曾对抗皇军的驻黑龙江省原国防军在马占山及其后的程志远司令官领导下成为本省警备军。

2. 马占山叛变后，该军曾奋起讨伐，然而，其后在司令官的更迭和改编问题上被刺激，以苏炳文叛变为开始，全军几乎全部叛变。

3. 由于皇军之积极活跃而获得了呼伦贝尔作战的光辉胜利。与此同时，全部叛军投降，归复司令官张文铸之麾下，经过若干改编而成为今日之警备军。

四、热河省警备军

该军是在建国前为平定黑龙江省，由张海鹏收编匪贼而编成的，其后作为洮辽警备军担任四洮、洮昂铁路沿线之警备。今年春开展热河作战后，属讨热作战军前敌总司令官张海鹏领导与各种暂编军共同策应皇军，参加热河作战。进入热河省后为

担任警备而驻防该省，以张海鹏为司令官，成为本省警备军。

五、兴安南分省警备军

该军是建国前为实现蒙古独立，而由蒙古人编成的拥有一万数千人之内蒙古自治军的后身。建国后成为兴安省警备军，但仅保留少部分，将主力解散，构成今日警备军之基础。而兴安北分省及兴安东分省成立警备军后，该军便成为兴安南分省警备军。

六、兴安北及兴安东分省警备军

苏炳文被消灭，在大兴安岭东西部无一兵一卒。为彻底贯彻兴安省以蒙古人为中心进行统治的原则，该军是以蒙古人编成的小兵团。

七、靖安军

该军是事变初期，为补充皇军兵力不足，在日本人司令官及日本人指挥官之下编成的特种部队，当时称为靖安游击队。建国后暂时归关东军直辖，后来编入满洲国军，改称靖安军。开始属奉天省警备军，而归中央直辖至现在。参加各地剿匪，有功绩。

八、暂编各军

根据各种需要而产生的暂编各军是满洲国军政之癌，对于财政有可能形成强大压力，已经大部解散，或断绝了关系，目前几乎没有留在国内，概述如下：

1. 建国军

因为热河作战，当初即着手编成建国第一、第二军。作战

爆发前中止了第一军的编成，只有已编成的索景清部队作为暂编第三支队属洮辽军进入热河省。

热河工作结束后，索景清部队又参加了多伦作战，理应去国外，但因各种关系而留在热河省内，已于最近将其解散。

建国第二军由程国瑞统率，在东部热河作战中收到相当成绩。但因到处与民团冲突，对于未来统治将造成不良影响，因而断然将全军武装解散。

2. 护国军

系刘桂堂率领之反满军，被怀柔而配合讨热作战，由多伦附近去国外。

3. 救国军

李际春（假名丁强）指挥救国军参加讨热作战进入热河南部，其后出滦东策应皇军之华北作战，西进北宁路沿线。另一方面，企图在滦东独立，后经日中停战协定及大连、唐山两会议决定，将其大部解散。保留一部以战区保安队之名义作为中国方面的警察队，固定于滦西。

似乎有潜伏之亲日亲满基层组织存在。

4. 李守信军

系在讨热作战倒戈投降之崔兴武部队，而崔下野后由李守信取代指挥，配合皇军进入多伦，但被击败而归还国内。目前将其一部留在省内，将再度恢复多伦。

本军之一半由蒙古人组成，将来仅限于少数蒙古人部队，准备以此编成兴安西分省警备军。

5. 内蒙自治军

如上所述，内蒙自治军之大部已撤销。其后由于兴安南分省至奉天省之一部匪势猖獗，再次自然组成内蒙自治军。军政部虽不承认其为正规军，但由于各种情况，不得已将其一部作

为暂编部队编入奉天省警备军，以后也将其撤销。

九、新京警备部队

1. 新京独立骑兵旅

系由黑龙江省警备军抽出归中央直辖，并与靖安军一起构成全军之总预备队。

2. 首都警备司令部

系去年（1933年）夏特设于军政部内，职员全部属于兼职，未能形成真正的独立司令部。

3. 京师宪兵司令部

系建国以来就存在之力量微弱的司令部，待将来撤销之。

4. 翊卫军及护军

系建国以来担任执政府警卫之部队。前者是禁卫队性质；后者具有宫廷警察队性质。

十、教育训练机关

1. 中央训练处

系去年（1933年）新设于奉天，一方面为训练现役军官，而另一方面为培养新军官候补生之机关。

2. 第一、第二、第三教导队

系从原来军队中抽出优秀部队组成，最近新设于奉天、吉林、齐齐哈尔3个地方，作为模范部队而成为改造之先驱，并直属中央。但在财务及其他关系方面则属各省警备司令官管理。

十一、其他

被服厂、军械厂、军乐队等略。

十二、海军

1. 江防舰队是在事变后投降满洲国的旧江防舰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大同2年增加了新砲舰2艘、砲艇3艘.

2. 海防舰队尚未建立。

（曾凡秀译）

十

伪满军管区及十二支伪满军

各军管区兵力的使用

王之佑

伪第一军管区

伪第一军管区的前身，是伪满奉天警备司令部。1934年9月1日正式改编为伪第一军管司令部，以奉天、安东两省为伪管区，总兵力约1.8万人。

此时的“讨伐”重点仍在安东省，其目标为邓铁梅、王凤阁、杨靖宇及×××等（总人数以当时的统计约2.7万人）。1935年春，在伪安东地区司令官王殿忠指挥下，集中兵力在岫岩地区击散了邓铁梅（他被伪第一教导队杀害了）等抗日军。6月，于芷山升任伪军政部大臣，以伪第4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澂任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满良任伪参谋长，“讨伐”目标乃专指向东边道地区。

1936年夏，增添了伪骑兵第三旅（由原洮辽军彭金山部骑兵改编的），以赵秋航任伪旅长，在新民、打虎山地区打击“老梯子”。当年秋季（9月），举行了“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1937年6月，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王静修转任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继续担任“东边道独立讨伐”的任务。至1938年6月间，在东边道又摧残了抗日人民力量约达7 000人，并由伪第一教导队杀害了王凤阁夫妇及幼子。同年7月，第六军管区司令官王殿忠转任伪军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继续担任“东边道独立讨伐”的任务。同年秋季开始至1939年4月末在由吉林伪第二军

管区派遣来的伪骑兵第二旅（伪旅长尹葆衡，次年“回防”）及伪宪兵训练处派来的伪宪兵学兵队（约300人，3个月后始回吉林）的帮凶之下，又摧毁了抗日力量达6 000人（三年的统计，共损害了人民抗日力量约有2.4万余人）。

同年5月1日，奉到伪治安部的命令，将安东、通化两省区域和伪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部队及伪第五旅的骑兵团、第六旅的步兵团移交于伪第八军管区，同时撤销了伪东边道讨伐司令部及伪讨伐指导顾问部，将东边道的讨伐任务移交于伪第八军管区。裁撤了伪五旅、六旅和伪骑兵第三旅的队号，董国华转任为伪治安部部附、赵秋航转伪第六教导队队长。同年8月又依伪治安部的命令，以伪步五团（伪团长戴元原。属第五混成旅）对伪第八军管区的讨伐作增援，盘踞在山城镇及朝阳镇，任守护铁路、交通路的任务。至此，伪第一军管区的反动统治势力兹确保，镇压爱国抗日力量的所谓讨伐行动才告终止。

1942年，当伪国兵入队时，遂增强了第一高射炮队的编制，添设了伪炮兵一营（高射炮八门），配属在日寇南部防卫司令官即从前日寇的守备队司令官之改称，在防卫上是在伪第一军（管区）的指挥下，担任着沈阳、抚顺、鞍山、本溪的防空任务。又奉伪治安部的命令，派遣伪第五团（除掉伪新兵营）赴热河平泉县，给伪第五军管区的镇压抗日人民去作帮凶。1943年6月，奉军事部的命令，由伪第一军管区参谋长岩田薰负责，在沈阳筹备成立伪高射炮队司令部，统辖全国的伪高射炮队，分任着防空的任务。8月5日，美国的B29式飞机轰炸鞍山后，伪第一军管区遂派遣第一、第二、第九、伪工兵队去担当鞍山的恢复作业，并构筑道路。1945年8月11日接到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最高伪军的军事顾问秋山义隆的联名命令：“第一军管区司令官受兵团长（即后宫淳）的指挥，归入战时体系，发放管

区内全部官兵战时津贴一年，派遣驻沈阳、打虎山、营口的工兵队帮助日本军构筑防御工事。到“八·一五”裕仁广播无条件投降，遂把工事填毁，于19日投降了苏联红军。

伪第二军管区

伪第二军管区是就原吉林省军队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原吉林省为伪管区，总兵力共2万余人，在日寇吉长地区守备队司令官署下，曾对李海青、冯占海、宋国荣、傅殿臣等抗日力量作过打击。1934年7月，改为伪第二军管区，将其管区缩小（由原吉林省内划出滨江、三江两省），同时将步兵伪第二旅、骑兵第三旅、混成第二十一旅拨归伪第四军管区隶属。这年曾在吉林、磐石、宽甸、敦化各县使伪第八、第九两旅和伪第二教导队均施行了所谓的讨伐，致摧毁掉傅殿臣的抗日军队。1935年成立伪第二汽车队于长春。由本年秋至1936年，曾举行了对吉长地区的讨伐，使用了4个伪混成旅、1个伪教导队和伪骑兵一、二个旅的兵力，对于×××、李司令、崔贤和三江好等抗日力量施行打击。同年秋季，划间岛省和伪混成第七旅的兵力，编入了伪第六军管区。1937年，又以伪混成第八、九两旅兵力在额穆、敦化境内，曾对金日成、杨靖宇等的抗日军加以侵犯。1938年更派遣伪骑兵第二旅窜犯东边道区，给伪第一军管区的所谓讨伐作帮凶。1939年8月，开始与伪第八军管狼狈为奸，在日寇吉长地区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的指挥下，曾进行了臭名昭著所谓日满军警联合大讨伐，至1940年2月，杀害了杨靖宇等抗日军三千多人，结束了最后屠杀抗日军民的工作，确保了境内的反动统治势力。1942年更派遣伪步兵第十一团赴热河，作镇压人民抗日力量的帮凶部队。

1945年“八·一五”之前，8月11日，接到伪军事部大臣

和伪军最高顾问的命令，使伪第二军管区的部队进入长春，加入防御编制，而将其归入了战时体系之内。但未发生战斗的情势，至18日遂投降了苏联红军。该伪军管区最后兵力7 700人。

伪第三军管区

伪第三军管区是就原来黑龙江省军队的基础上而建立的。1934年7月，改称伪第三军管区，区域为龙江、黑河两省，担任着“国境”警备与镇压当地人民爱国抗日的行为。

于1936年曾派遣伪骑兵五旅的第22团进驻通河，给伪第四军管区的镇压人民抗日力量作帮凶；伪第三教导队则赴通化，给伪第一军管区的镇压人民抗日力量去作帮凶。1937年8月奉令，派遣第三教导队赴承德，给伪第五军管区去作帮凶者，9月，就由顾问池边万三率领侵入古北口，即当时所谓进驻北京的伪石兰部队（伪步兵团长张金祥、伪骑兵团长刘玢），这是他们援助日寇侵略祖国之又一实际罪行，同年12月撤归原盘踞地。

1938年，改编伪第三教导队为独立第1旅（驻齐齐哈尔），以伪混成十三旅改编为伪第三教导队，任于政功为伪队长，驻洮南。同年，将伪混成十五旅（伪旅长冯广友）转入伪第四军管区，进犯三江地区，以镇压人民的抗日力量。1939年3月，撤销了伪地区司令部，将盘踞在黑河的伪混成第十二旅转到北安。又由伪第四军管区将滨北地区并入伪第三军管区，并将伪混成第十八旅的步兵第二十四团转属于该伪军管区，与伪混成十四旅的步兵十七团合编成为伪步兵第四旅，以王作震任伪旅长，驻海伦、庆安，担任该地区内的镇压人民巩固反动统治势力的任务。5月，李文炳任伪司令官。6月，发生了诺门罕事件，伪独立第一旅参加了这一侵略战斗，失败窜回原盘踞地。于是石兰斌停职，以关成山任朱旅长，这回又是给日寇作帮凶而侵略了

苏蒙。1940年10月由伪混成第十二旅（伪旅长胡文藻）、伪步兵第四旅（伪旅长王作震）派兵在绥棱、海伦、绥化三县内山林地区，向赵尚志部下抗日军进犯，窜扰了三个星期。由11月至年末，伪司令官指挥着伪第三教导队骑兵团（伪团长孙强）、伪骑兵第二十一团（伪团长陈明山）曾在嫩江、讷河和嫩江西岸对于王明贵率领的抗日军，作了达两个月的窜扰侵犯。

当年春夏间，只有小部队的伪军，向人民抗日力量作窜扰打击。夏秋间，曾派20辆，参加了乌布林扎拉嘎的构筑国防工事工作。入冬，奉伪治安部大臣于琛澂命令，派伪骑兵第二十一团给伪第十军管区作帮凶去镇压爱国人民抗日力量（共3个月）。当年又强征伪国兵共3 700人，于1942年3月入队。又成立了伪第三高射炮队（伪队长岩田熏）于昂昂溪。又于当年初夏之交，伪骑兵第二十一团，曾在嫩江县霍龙门进犯王明贵的抗日军，致杀害了十数人，这是在该年内镇压人民抗日力量中的最大一次战斗。

1943年8月，奉伪军事部大臣的命令，派伪步兵第四旅长王家善率全旅（伪步十七团长刘玢、伪步二十四团长王锡鹤）及伪第三汽车队两连（车120辆），进驻热河省凌源、青龙县内，给伪军第五军管区镇压人民抗日力量作帮凶，直到1945年的“八·一五”尚未归还。该伪军管区的最后兵力编制——共约7 400人。于1945年3月，曾派遣伪骑兵一连编入伪铁心部队。同年6月，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伪军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受日寇上村中将的指挥，归入日寇的所谓战时体系内，但是当“八·一五”苏联红军进兵解放东北时，在苏联军到达了齐齐哈尔立即迎降，没有发生战斗。

伪第四军管区

伪第四军管区是在吉林省滨江、依兰两地区和大汉奸于琛澂率领的伪东铁护路军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就这个基础上，于1934年7月成立了伪第四军管区。当时以滨江省、三江省及绥宁地区为伪管区，任于琛澂为司令官，在哈尔滨成立了伪第四军管区司令部。指挥着伪军担任镇压当地抗日人民和所谓警备国境线的任务。1935年6月，任郭恩霖为司令官。在当年间，曾不断地对于抗日爱国人民施行镇压。1937年6月，于琛澂重任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兼任伪三江省长，将讨伐重点转移到伪三江处。当年7月朱榕任伪三江地区司令官。这时，驻依兰的赫奎武伪步兵团崛起反抗日伪，经两个月的哄骗才重回伪防地。1938年，曾集结了该伪管区内伪部队及帮凶的伪军——伪靖安军、伪兴安骑兵旅、伪第三军管区的冯广友旅（后来编入了伪第四军管区内）和伪骑兵第二十二团等伪部队，实行了臭名远扬的三江地区的所谓大讨伐，摧毁了赵尚志、周保中、夏云杰、谢文东、李华堂、王荫武等率领的抗日军，共计达4 000人。1943年8月，任李文龙为伪司令官。奉伪军事部命令，派遣伪步兵第二十五团赴热河去给日寇作镇压人民抗日力量的帮凶（至1945年未归）。1945年，改为混成第十七旅为伪步兵第十七旅，以刘显良任伪旅长（驻哈尔滨），又编成两个伪工兵队、一个伪辎重队，这就成为该伪军管区最后兵力的编成（总兵力约7 200人）。当年6月，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伪军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使该伪军管区受日寇上村兵团长（盘踞在哈尔滨）的指挥，列入日寇的所谓战时体系内。“八·一五”日寇投降后，遂投降于苏联红军，并无战斗行动发生。

伪第五军管区

伪第五军管区是在热河省区以张海鹏的伪洮辽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1934年7月，改称伪第五军管区，担任着境内镇压人民、维持反动统治势力的任务，对于抗日人民力量，曾作过多次的摧残。1935年1月，王静修任伪司令官，曾派遣该伪军管区部队的一个团，开拔到东边道区给伪第一军管区的镇压抗日人民力量作帮凶。1936年6月，邢士廉任伪司令官，在沈阳成立了伪第五汽车队，将伪第五教导队移驻于滦平，于秋季又派遣伪部附索景清率约1伪混成旅的兵力赴东边道援助镇压该地的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将先派去的一个伪团换回），至1937年6月才回到原盘踞地内。同年7月7日，发生了所谓卢沟桥事变，伪治安部遂派遣了热河支队（由伪靖安军和伪第五教导队编成）于8月1日由承德出动，在丰宁县西南长城线上与高桂滋师作战，这时该伪军管区则担负着后方的勤务。并将伪混成第二十六旅、伪骑兵第七旅向西南伪国境线上侵犯。又于8月下旬伪第三教导队奉伪治安部的命令移往滦平，受伪第五军管区的指挥，9月初该伪部队（即所谓的伪石兰部队）遂由古北口窜犯怀柔县和高丽营子。上记两支伪部队，至年末曾先后由北京和宣化以列车输送撤返防区。1938年6月，甘珠尔扎布率伪兴安骑兵两团（即所谓伪廿支队），奉伪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命令来热河作帮凶，到承德后即应日寇要求，派归日本侵略军的区署，由古北口窜入关内，在密云、平谷、蓟县一带承担进犯八路军的任务，至年末回承德后，转回了伪兴安南省。1939年3月，撤销了伪地区司令部，将伪锦州地区返回到伪第一军管区。5月，任应振复为伪司令官，将伪军兵力转移到西南伪国境线上，任防御人民抗日力量的进讨和对于反满抗日人民力量的镇压。

1941年2月该伪军管区兵力改编成伪步兵第八旅（伪旅长冯秉忱）和伪混成二十五旅（伪旅长阎充）配属在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指挥下，担任对西南部的窜扰，曾侵犯到长城以南和察哈尔以北地区，给予八路军以相当的损害。又由伪第八军管区拨来伪步兵第五旅（旅长周大鲁）率伪步兵第五旅步兵第二、第六两团盘踞在丰宁县境，担任对境内抗日武装力量的镇压。由此时起，在该伪军管区内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逐渐增加起来。1942年8月，任吴元敏为伪司令官，由第一、第二、第四、第八伪军管区调来伪步兵4个团，分布在承德以东地区充当帮凶的角色。1943年，又由伪第三军管区调来伪步兵第四旅伪第三汽车队（两连）和由伪第六军管区调来伪步兵一团。加入帮助日寇镇压抗日人民的工作。伪军最后所谓讨伐的重点、遂转移到热河地区来。同年8月任赫慕侠为伪司令官，由伪第一军管区调来伪骑兵第三十九团驻在赤峰，1944年编入了该伪管区内，又新成立了一个伪步兵旅。1945年添设了一个伪辎重队，至此遂成为该伪军管区最后的兵力（总兵力约1.55万人）。由1942年至1945年，该伪军管区总集合了日、伪警大部力量（约2.8万人）来和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八路军为敌，并施行了集家并村，筑路设卡勾当，摧毁了大部人民抗敌力量，还耗用了大量人民的劳动力，给人民造成了冻馁伤亡等说不尽的灾难。在“八·一五”当时，该伪军管的各伪部队，仍在和人民为敌而与八路军对抗着。

伪第六军管区

伪第六军管区，是于1936年秋在牡丹江增设的。由伪第二军管区划让出间岛省区和伪第七混成旅（驻间岛），由伪第三军管区拨出伪混成第十一旅、伪骑兵第四旅，由伪第四军管区划

出牡丹江省地区及混成第十六旅、伪混成二十旅（驻穆棱）和伪骑兵第三旅（驻密山），编成为伪第六军管区及其隶属下的伪部队。指挥着各伪部队，担任确保伪管区内的反动统治势力和警备伪国境县任务。

1943年，成立了伪间岛特设队于明月沟，专收朝鲜族的伪国兵（共三四百人），加以训练，使之担任镇压当地抗日人民的任务。同年8月派遣了伪步兵第八团赴热河帮助镇压抗日人民的武装力量。1944年奉令改编，于1945年遂将伪步第八团、步第七团编为伪步兵第三旅（伪旅长刘玢）、又增设了伪第三十工兵队和伪第六辎重队，这就成为该伪军管区的最后兵力编成（总兵力约5600人）。同年6月，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伪军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使该伪军管区受日寇最高司令官喜多诚一指挥，归入于日寇所谓的战时体系内。于是派遣了伪汽车兵、工兵、步兵，在东京城附近构筑阵地。8月15日，同日寇军队向后撤退，投降于苏联红军。

伪第七军管区

伪第七军管区，是于1939年5月在佳木斯增设的。当时由伪第四军管区划出三江省，担任镇压境内人民和警备伪国境的任务。由1941年至1942年，编成为伪第二特设队，专作镇压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之用。1943年5月将所谓国防的任务全部交与了日寇关东军之手，伪军只是专门担任伪管区内镇压人民的任务。1944年冬，奉令派遣了伪步兵一个团编入了伪铁心部队内，侵入了山海关（至“八·一五”仍未归还）。

伪第八军管区

伪第八军管区是由伪第一军管区分立的。分出安东、通化

两省作为伪管区，总兵力约1万人，担任伪管区内镇压人民、打击人民抗日力量的任务。1939年1月——8月开始参加在日寇吉长地区守备司令官野副昌德指挥下的通化、吉林地区日、伪军警联合大讨伐，致使抗日军300余人死伤，因而于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遂遇害于濛江（现在的靖宇县）。1940年3月奉命改编，于是裁去了伪混成第三旅的队号及3个伪骑兵团的队号，均改为伪步兵（团），又招募了500壮丁，编成伪兵第一旅和伪步兵第二旅（兵员数7 200人），派赴吉林去帮助镇压人民的爱国抗日力量。于1943年4月，依据伪军事部大臣的命令，派遣伪混成第八旅的步兵三团（伪团长尹宪斌）赴热河受伪第五军管区司令官的指挥，给镇压人民武装抗日力量作帮凶。10月，该伪军管区奉命移驻北安，将当时的伪管区及伪部队移交于伪第一军管区接收，伪司令部、顾问部、通信队均前往北安，接收了由伪第三军管区移让过来的北安、黑河两省防区，及伪混成第十二旅的步兵第十九团、伪海伦病院及在黑河北安的伪兵事处。1944年，由北安、黑河两省，强征的伪国兵达1 800人，将伪部队加以改编而成立了伪步兵第十二旅，担任着镇压该伪管区内的抗日人民的任务。1945年春，新成立了伪第八辎重队（驻四站）及第二十八、二十九两个伪工兵队（借用伪三军昂昂溪的营房），以供运输及作业之用。同年6月，受到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及伪军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使该伪军管区列日寇侵略军的战时体系内。但在“八·一五”前后，在该伪军管区内并未发生战斗而投降了苏联红军。

伪第九军管区

1940年3月，撤销了伪兴安军管区，将其分为伪第九及第十两军管区。伪第九军管区是合并伪兴安南、西两省的警备，受

着日寇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之区署。1941年，在林西设立了伪骑兵旅司令部，担任着所谓国境的警备。

同年6至9月，派遣了一个伪团的兵力，去构筑乌布林扎拉嘎国境上的防御阵地。1942年，奉伪治安部命令，将伪第二师归入伪治安部大臣直辖。1943年3月，任甘珠尔扎布为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官，于1944年伪第二师重隶属于该伪军管区。同年冬季，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伪军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以伪兴安骑兵旅长岩田薰伪少将任部队长，由兴安伪骑兵旅和伪陆军兴安学校教导队抽出兵力两团（伪团长胡克巴图尔、郭文通）编成了臭名远扬的伪铁石部队，受伪中央直辖，派到山海关，在日寇加藤部队的指挥下向八路军进犯，至1945年"八·一五"后逃回通辽。1944年4月，撤销了伪独立骑兵连，而扩充伪炮兵连，成为伪山炮营。至8月10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曾受到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伪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使之受日寇远征兵团长指挥，归入日寇的战时体系之内。8月18日投降于苏联军。

伪第十军管区

伪第十军管区是于1940年合伪兴安东、北两警备军司令部而编成（其建军经过如第九军管区内所述）。其间最大的用兵就是诺门罕事件，当时曾由乌尔金率领着全部的兵力及骑兵第一团配属第三教导队的炮兵，作为日寇的右翼部队，在黄金冈喀作战，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改编伪第十军管区时，任乌尔金（伪中将）为伪司令官，女屋岩（伪上校）任参谋长，在海拉尔成立了伪司令部。将兴安东、北两省分为伪管区、其隶属部队为伪兴安骑兵第七、第八两团，均驻南屯，伪独立骑兵连、山炮兵连、自动车班、通信队，均住海拉尔，受日本军兵团长的

区署，担任镇压境内抗日人民的任务。在该伪管区内，有王名贵担任领导的日伪军骑兵，常往来于大兴安岭、嫩江之间，所以每到历年冬季，都曾派兵前往镇压。

当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由伪司令官郭文林、伪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领部队撤到西尼河，向苏联军通信投诚，于是遂于12日在乌兰哈尔嘎那投降于红军。

伪第十一军管区

伪第十一军管区是于1941年10月增设的，由伪第六、七两军管区内分东安省和勃利县作为伪管区，驻密山县，担任镇压境内反满抗日人民之责。至1945年8月，在镜泊湖附近构筑了阵地。同年6月，奉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和伪最高顾问秋山义隆的命令，使该伪军管区受盘踞在牡丹江的日寇最高司令官喜多诚一的指挥，归入所谓的战时体系内。“八·一五”当时，曾由密山撤退到哈绥路线上，投降于苏联红军。

我所知道的伪第三军管区

由潜如口述　宋金林整理

我于1908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在伪第三军管区混事，所以那里的情况知道一些。

1931年齐齐哈尔沦陷后，为了谋生，我到一所学校当了教员。一年以后，有位朋友说给我找到了合适的差事，是搞通信业务的地方。我虽然学的是工科，与通信业务不相干，但毕竟是搞技术的，更主要的是去那里的收入要比教员高得多。于是

我就进入了伪第三军管区通信队。刚去时我只知道它的名称，至于它的职能、业务一概不知。干了一段以后才知道，它的准确名称叫“军用通信处齐齐哈尔支处”，后来改叫第三通信队。

第三通信队，是伪满军队通信部队之一。业务上受“新京”（长春）总部领导，配属于第三军管区，为保密单位。因此，对人员的挑选、审查很严格。对队内人员的管理就更严了，进了通信队，尤如进了牢笼，也就失去了自由。

我在通信队度过了八年牢笼般的生活，耳闻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的种种丑闻。伪第三军管区的官员们多数对日本顾问摇尾乞怜，百依百顺，而对下属却狐假虎威，非打即骂。我所知道的三任司令官张文铸、朱榕和赵秋航都是这样的人。张文铸大我十几岁，我们都是民国黑龙江省一中毕业。张文铸在一中毕业后投考了保定军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前他只是个中校，事变后被日本人看中，平步青云，当上了伪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张文铸这人，在事变前还比较正经，生活也算检点。当上伪军管区司令后，他为了讨好日本人，证明自己是主人喜欢的那种人，便施展起投机钻营的伎俩。他手提“双枪”，一把钢枪，一杆大烟枪，逛妓院，进赌场，给日本人以吃喝嫖赌无所不好的印象。他并从妓院里赎出一名妓女为妻，以此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张文铸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时，军管区参谋长是于智恭，也是个铁杆汉奸，他直接管通信队，曾兼任过通信支处处长。继张文铸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的是朱榕。朱榕任军管区司令后，参与了日本人和苏联打仗的诺门罕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日伪军遭到惨败，日军参战军官大部遭到处罚，有的自杀谢罪了。朱榕是参战伪军的最高负责人，听说日本人以让他去日本考察为由，在途中被日本人推进了大海。接替朱榕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的是赵秋航。

伪第三军管区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傀儡机构。军管区设有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和军法处。每个处都有日军顾问，日军专门在军管区设有顾问部，军管区的一切决策权都在日本人手中。配属于军管区的通信支处，处长由军管区参谋长兼任，以示它的重要，后来改为第三通信队时改由日本人任队长。当时的通信队队长叫高宗久，是个日本海军上尉。

通信队内按照通信专业分为无线、有线和鸽子通信三个部分。有线通信的范围不太大，主要与城内和邻近县的部队及有关单位联系。无线通信的联络范围较广，有黑河、呼玛尔、奇克特、安达、泰来、克山、拜泉、满洲里和兴安省（扎兰屯），还有一个秘密点，代号叫“国境”电台，它在什么位置，工作人员不知道，也不许问，只是联络时按规定的密语呼叫即可接通。这些电台每天都定时联络。鸽子通信平时主要掌握鸽子的喂养与训练，一般不作实际通信之用。

通信队的人员，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技术人员都是日本人，他们大多是日军正规部队退下来的技术兵。他们到军管区搞通信要比在部队好得多：一是不打仗，日本兵大多数是不愿打仗的；二是少受长官打骂，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人之上；三是待遇不低。当时的通信队队长高宗久就是从日本海军调来的。日本海军素与陆军不合，其他从日本陆军调来的人员与他有矛盾，经常发生一点摩擦。以后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通信队的日本兵陆续被抽去参战。被调走的日本兵大多数都很不情愿，有的甚至发牢骚，表示对战争的不满，当然，决心以死效忠天皇者不乏其人。

通信队内的日军技术人员，不像武官那样凶暴，对中国人的专横跋扈差一些。他们也很少谈论政治，他们议论更多的是

待遇、家庭和业务技术问题。通信队内的中国人、中国雇员和士兵受着双重欺压——日本人和中国官长的欺压。在军管区内，实行的是日军的一套规章制度，提倡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官长打士兵，上级打下级，日本人打中国人司空见惯。即使你被打耳光，也得立正、挺胸、抬头、伸长脖子，等着挨第二、第三撇子，直至长官出完气为止。我们这些中国雇员和士兵被上属官长召见时，不能面对官长，不能正视官长。院内遇到上属官长要立正侧视回避。

我到通信队后，虽不懂通信业务，但懂日语，所以让我作庶务。我之所以能在那干8年，也仅仅是因为我懂日语。到了1942年，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日军不断抽调大批军政人员到前线，因此，也决定抽我到热河的一个部队去。我得到这一消息后，设法在抽调前离开了通信队，算是逃离了牢笼。

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尽管对往事的记忆有些模糊，但这段亡国奴的历史总是历历在目，它从另一方面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而奋斗。

（摘自《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伪满通化驻军概况

周佩卿

一、伪满初期驻通化的伪军情况

1933年阴历九月二十日，先调进通化的部队，是伪满鸭绿

江地区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少将司令官是廖弼宸，他率领3个步兵团进入通化县。司令部驻南围子（现前进路小学），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守卫司令部。迫击炮连驻防东江沿（现五中学校的地址）。此外在郊区的长流、二道江、金厂子、银厂、江东、快大茂子村，各驻一个步兵连。团部驻张家屯附近，由两个步兵连守卫。在通化城郊区共有12个连驻防，总兵力1 800余人。其它两个团驻辑安、临江、桓仁等县境内，那时鸭绿江地区的部队达6 000余人。

二、日军侵驻通化情况

日军驻通化的三十联队，队长桥本大佐，他的部队除驻城里（现卫生学校）500人以外，多在郊区各地驻扎。此外还有日本宪兵队，队长为长崎少佐，有官兵50余人。院内设有狼狗圈、埋人坑，各种刑具齐全。宪兵队长专镇压抗日志士及爱国人民，手段及其恶毒。

三、伪满中期通化驻军情况

1934年3月1日，通化驻军全部变动。以前鸭绿江地区的军队全面改编和调转，司令廖弼宸也调走了。这时全“满洲国”的军队，进行新的改编，共编成8个军管区。通化县城调来第八军管区所属的军队，司令官是中将王之佑，上校参谋长刘尚华。司令部驻南围子地点。司令部有顾问部，有日系军官10余人，指挥伪军的行动，顾问部最高顾问是黑石大佐。他们都是日系关东军的现役军官，处于伪军中指导和监视的地位，权力很大，司令官也得听从黑石的指挥。司令部内设8大处：军法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兽医处、传达处。各处长均为中校阶级，唯有传达处是中尉阶级。司令部南侧有第八宪

兵团，团长松本大佐，有官兵250人。其任务是专监督各部队的军风纪，每天大批宪兵在大街上巡逻，管制军队士兵的行动。如有违犯法律时，进行逮捕，带回团中审讯。构成犯罪者送交军法处执行处罪后，送到陆军监狱。不够犯罪的也得重打一顿，其部队派军官领回。所以部队中官兵全部怕这些人。司令部内有通讯排，官兵50人，业务是掌握电台及有线电话、军鸽和军犬训练等事宜。司令部有两个步兵连守卫，担任警备。守卫兵由各团轮流派出。司令部下设第八教导队司令部，少将司令周大鲁，上校参谋长张秉哲。直属部队有军士候补生连，连长雄切、山炮连连长蓝子静、军士进修连连长山口雄伟。司令部和这几连地址在江东月牙泡附近（现变压器厂后面）。该司令部守卫任务，由山炮连担任。军管区司令部下还有步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尹宪斌，中校团副路邻清，少校团副尾形。第一营营长大崎治作、第二营营长前林、第三营营长金指次郎。该团有兵力16个连，官兵3 500人，地址在银厂子河沿处。伪康德7至8年时，庙沟还设有骑兵第五团，上校团长高连山，中校团副隋志民，少校团副前田正雄。此团编制和步兵连不同，不设营的机构，以连为单位，共有12个连，官兵1500人，战马千余匹。另外还有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黄芳刚、中校团副周连升、少校团副山本正男。这个团共有16个步兵连。官兵3500人，该团驻月牙泡儿附近（现粮库地址）。除给在团部担任守卫一个营外，其它两个营分驻于二道江起到八道江各地。

四、伪满末期通化驻军全部撤走情况

在1942年春天，日伪当局认为：东边道地区各处治安稳定，抗日武装先后被消灭。这时伪满将第八军管区的部队调入日伪政权的河北省配合关东军作战。同时，南满地区的伪军调入热

河省兴隆等地，在长城线上驻满了伪军和警察讨伐队，跟八路军交战。但第八军管区的家属和留守人员仍留在通化。这时通化县已改为通化省了，省公署设于市内，第1任省长由姜全我担任，警察厅厅长佐木一雄，县长仍为刘天成。县内设有参事官，均是日系人，警察署等都配指导官，后又增建了警察署数个，还增设了警察学校。每期招生200人，学期为1年，校长文德喜（地址现为第5中学处）。

我在通化军管区的经历

肖玉琛

“七·七”事变后，日军极力削弱伪军上层领导机构的权力，将原来王静修直接领导的第一军管区划分为奉天、安东、辽河、通化四个地区司令部，通化地区管辖范围既原来东边道所属各县。由于通化东部地区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是抗日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司令李寿山上任不久，就把司令部从通化迁到地处高山峻岭的抚松县。随即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数以千计的贫苦大众被诬以“窝匪”、“通匪”的罪名，惨遭杀害。由于李“剿匪”有功，被日伪当局晋升为中将，调往山东。他的遗缺由董国华接替。

董国华原任步兵四团团长，阴险粗暴，杀人不眨眼。他手下有位中校团附叫朱长鲁，精明强干，被他忌恨。一次，两人研究作战计划，董见朱不断查看作战地图，不满意地说：“看那玩艺儿干啥？”朱长鲁说：“不弄清详细的地名、地形，怎么下达作战令？”“凭经验！”董国华拍着桌子说：“我不会看那玩艺

照样当团长！”“那还要这作战地图干什么！”朱长鲁一气之下，把军用地图撕得粉碎。

事隔不久，董就向于芷山诬告朱长鲁“企图率部谋反”，于芷山当即命令董国华干掉朱长鲁。

当时，我正在司令部，对于芷山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意外。董国华走后，我劝于芷山说：“司令官，你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就杀掉一个中校团附……”

“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懂什么！”

不等我说完，于芷山就咆哮起来：“你要再胡参谋，我连你也一块杀掉！”

当时，我对于芷山这种反常行为百思不解。直到于芷山调任军政部大臣离开时，他才私下对我说：“四团的几个营长都是董国华的亲戚。我杀了朱长鲁就稳住了董国华，否则，他可能真要带兵造反了。”

哦！我这才恍然大悟。

1938 年春，我奉命调离步兵五团，出任通化地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和阴险粗暴的董国华共事，一个名叫大泽的日本中佐担任顾问。至于我的顶头上司——上校参谋长菊井太郎，则是个酒色之徒。每饭必酒，每酒必醉，醉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

壮哉——杨靖宇将军

1939 年春，通化地区司令部行辕仍驻抚松县，执行“讨伐”任务。由讨伐总司令三木中将指挥的步兵四团、步兵五团以及骑兵第三团，在安图、抚松、濛江一带扫荡、堵击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同年 8 月，通化地区改为第八军管区，我被晋升为上校副官处长，虽不再参与讨伐战争的参谋工作，但我对参谋处的活动和情报还是了如指掌的。

邓铁梅、王凤阁等一些著名的抗日首领被敌人杀害以后，威震一时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组织相继失败。唯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第一军在军长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越战越勇，越打越强。

1936年6月，日伪动用了它的所谓“常胜军”邵本良游击队，妄图一举歼灭抗日联军。

邵本良原是个胡子头，在东边道的大森林中钻了二十多年，练就一手“骑马打飞雁、跑步射游鱼”的好枪法。他经常带领匪徒打家劫寨，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是东边道的一霸。后来被军阀张作霖收降。于芷山任东边道镇守使时，邵本良已是一名步兵团长了。“九·一八”事变，他跟于芷山投降了日军，被改编为邵本良游击队，经常围剿、扫荡、堵击抗日武装。

自从邵本良受命围剿抗日联军以后，他命令部队：“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咬住抗联的‘尾巴’不放。”杨靖宇熟知邵本良这支反动游击队的作战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敌追我跑，敌停我扰，敌困我打”的战术，拖着邵本良游击队在深山峻岭中兜圈子，捉迷藏。最后在本溪县赛马集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一举歼灭邵本良这支对抗日斗争危害极大的顽匪。

这天早上八九点钟，邵本良游击队尾随抗日联军来到本溪县赛马集境内，这时，他们已经被杨靖宇部拖得人困马乏，举步维艰了。当邵本良领着部队跌跌撞撞地进入赛马集梨树甸子沟口时，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四面山坡上的抗联部队万枪齐发，喊声四起：

“消灭胡子兵，活捉邵本良！”

号称“常胜军”的邵本良游击队被打得蒙头转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靖宇将军指挥部队四面出击，不到

一个小时，就把一千多人的“胡子团”全部歼灭，邵本良身负重伤，后死于沈阳。

邵本良游击队被歼后，日本法西斯一面强化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妄图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一面又命令从热河省调来的所谓“剿匪劲旅”索旅，对抗日联军大举讨伐。

“索旅”是因旅长姓索而得名。该旅是骑、步两个团组成的混成旅。士兵多系蒙古人，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虽然抗日联军歼灭邵本良游击队以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得到了加强，但同“索旅”无法相比。因此，杨靖宇将军仍采取以多胜少，打了就跑的战术，尽量避免与战斗力很强的索旅兵对兵、将对将的正面冲突，使得弓张箭拔的索旅“无用武之地”。

1938年8月，日伪军事当局得知抗日联军转移到集安、临江一带活动，当即命令索旅连夜赶赴集安，进行围剿。索旅自认为兵强马壮，“天下无敌”，没有把号称“土八路”的抗日联军放在眼里。他们到达集安不见抗联的主力部队，就兵分两路（一路为一个支队），搜索进山。

这是8月的一天，杨靖宇将军听说索旅一个团（支队）向头道崴子进发，下定决心要吃掉它。为了把敌人引入伏击圈，杨将军派出一支小部队攻打文字沟的一个伪军据点。索旅支队听说文字沟被袭，掉头急奔文字沟。埋伏在文字沟沟口的抗联主力部队，单等索旅支队进入口袋，立即发起猛攻，打得索旅乱成一团，遗尸遍野。逃进密林中的一部分也被抗联部队紧紧包围。当他们突围时，被事先埋伏在森林外边的抗联战士一枪一个，打死过半。其残部一看走投无路，都举手投降了。索旅全团被歼，无一漏网。

1939年3月，杨靖宇将军又指挥抗日联军发动了声震辽东

的木其河战斗。

木其河在敦化境内。河的上游有一个满洲林业株式会社的木场，拥有一支300人的森林警察，统治着几千名苦难的伐木工人。木场四周筑有高墙，设有电网，储备着大量粮食衣物和枪支弹药。为了得到粮弹补给，迎接青纱帐的有利战斗季节，杨靖宇将军决定攻打木场。他把冬季分散在各地的战斗小分队迅速调集在一起，日行百里，夜走八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木其河木场。等木场警察听到动静，仓皇应战时，联军部队已排除刺网，翻越围墙，冲进了木场。他们打开仓库，获得大量粮食武器和马匹，并解放了大批林业工人。根据自愿的原则，一部分参加了抗联部队；一部分回到家乡。

抗日联军节节胜利，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日本法西斯进一步施行残酷的"治安肃正"政策，强化了它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凡是百姓集居的部落，院墙高筑，实行保甲连坐，发放"良民证"，清查户口等一系列"隔离"措施，各个部落都设立了警察署、警察分所、宪兵队、特高课等法西斯组织。百姓出门种地、砍柴、挑水都必须在警察的监视下晚出早归。凡不经允许单独行动和多人叙谈者，就以"通匪"或"反满抗日"论罪，日军还在"集团部落"挑动村民大检举、大揭发，有不少无辜群众因私仇夙怨，惨遭杀害和株连……当时所谓的"东北大后方"，被日本法西斯蹂躏得满目疮痍。

在日军的疯狂围剿和残酷统治下，抗联与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处境维艰，特别是程斌的叛变，给抗日联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程斌原是抗日民主联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叛变后，得到通化警务厅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赏识，任他为警察大队长，

下属6个中队，分驻在东边道所属的各个县城，广泛收集“抗联”情报，组织“联合讨伐”等。在长白县的一次战斗中，由魏拯民将军领导的抗联部队被迫撤离后，叛徒程斌当即带领警察，全部捣毁了抗联秘密建造的地窨子，起走了部队储存的全部衣服、粮食和弹药，使抗联的军需供应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程斌的这一“赫赫战绩”，得到了岸谷的大力夸奖，并为他设宴庆功。我这个军区上校副官处长，当然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庆功宴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叛徒。虽然汉奸和叛徒都是一丘之貉，我却意外地对这个跟我亲切握手的程斌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他身高1.6米左右，长方脸、蓄分发，说起话来尖声怪气……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并没有白费这桌酒席，后来在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战斗中，这个叛徒成了他的主要帮凶。

1939年冬，杨靖宇将军为了搜集粮食和衣物，率领部队到桦甸一带，准备攻打日军的军用仓库，不料当经过濛江县交界的那尔轰以北山地时，与伪军两个团发生了遭遇战，双方伤亡惨重。杨靖宇将军带领200多名指战员突出重围，转移到濛江、辉南、抚松、金川县一带活动。数月后，当杨将军回师那尔轰，再度遭到敌人堵击的危急时刻，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也叛变了。这个叛徒向他的故旧程斌提供了杨靖宇将军所部兵员、武器和行动计划的全部情况，使日伪军警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围剿和堵击，抗联损失严重，兵员由200人迅速减少到150人、100人……到1940年1月，杨靖宇身边只剩下50多人了。杨将军为了尽量缩小敌人跟踪的目标，将所剩人员化整为零，但仍甩不掉敌人。1940年2月23日，他在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的山坡上，只身与敌人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杨靖宇将军死后，一说是在激战中中弹阵亡，一说是歼敌

后自杀殉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和军区司令官王之佑专程到濛江县了解将军殒命的实况。濛江县吕县长向我们详细叙述了杨将军殉难的经过：

1940年2月22日，天寒地冻，杨靖宇只身转移到濛江县西南保安村2.5公里的三道崴子。他在地窨子里隐蔽一夜，饥寒交迫。第2天（23日上午）发现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上山打柴，杨靖宇误以为是善良百姓，拿出一些钱求他买双棉鞋、衣服和吃的。这个打柴人看出杨靖宇不是一般人物，为了领赏，报告了叛徒程斌所部的警察队（情报记录）。警察队当即出动30多名警察，在打柴人带领下，直扑三道崴子。到后发现杨靖宇不在地窨子里，但雪地上留存足迹。他们跟踪搜捕，终于在一棵大树下与杨靖宇发生枪战。杨靖宇将军手执双枪，打死了7名警察，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自杀身亡。

杨靖宇将军死后，日本人为解开杨将军赖以维持生命的谜，将他的腹部剖开，发现腹内没有一粒粮食，全是草根和树皮。此刻，连凶残的日本刽子手也无不为杨将军尽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叹！

日本法西斯为了炫耀战绩，恫吓百姓，将杨将军的头割下，悬挂在通化东门城楼上达数日之久。当地老百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首级，无不含泪而过。我还记得当时群众为歌颂杨靖宇将军谱写的一首歌曲：

十冬腊月天，
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
长活在人间。

残忍的日本法西斯

1941年秋，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转任第三军管区司令官，由吴元敏中将接替遗缺，我再次调任参谋处长。

吴元敏到任不久，屡次接到热河第八教导队报告战事失利的电报。吴元敏为了解战况，让我陪同赴热河省视察。我们一行三十几人（一名副官和一个警卫排）乘火车到锦县（今锦州市），然后改乘轿车，由随同我们来的警卫排护送，向热河大阁镇进发。

我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到达大阁镇。略事休息，教导队长周大鲁就向吴元敏司令官详细报告了部队训练、后勤供应以及作战情况。同时提到八路军纪律严明、战术灵活、作战顽强。

我们休息一天，乘车去教导队三团驻地赤城县视察和慰问——也许是八路军有意给我们下马威，慰问团离开赤城的第2天，教导三团就遭到伏击。团长李海澄连续组织三次进攻，都被隐蔽在各个高地的八路军打下山来，全团官兵死伤过半，团长李海澄的脸上也负了伤，领着残部退出山谷，扔给八路军大量的武器弹药；一些来不及逃命的受伤官兵被八路军俘获。

第2天，被俘的第五连连长王迎源和一名日系军官跌跌撞撞地逃回大阁镇司令部，叙述了他俩负伤被俘后，冒险从山顶上滚下来，侥幸脱离虎口的经过。教导队根据他俩的具体情况，经司令官吴元敏批准免于处分。但热河第五军管区日本主任顾问却坚持认为，被俘归来是“军人的耻辱”，命令把他二人调到第五军管区军法处受审。后来这位日本主任顾问见他俩伤势严重，才免于起诉，赐以自尽。王迎源连长和那位日系军官就这样被迫自杀了。

这件事在日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不少官兵私下议论说：八

路军优待俘虏，而日本人却逼不愿当俘虏的人自杀，真是太残忍了。

后来我听热河前线来人说：自从教导第三团连长王迎源和那名日系军官被强令自杀后，再也没有一个被八路军俘虏的我方官兵跑回来了。有的伪军官兵还自动投奔八路，调转枪口，向日本法西斯宣战！

独立通讯队的特殊使命

1942年2月，军事部正式下令免去我第八军管区参谋处长的职务，任命我为军事部直辖独立通讯队队长，并指令我立即到吉林市东大营上任。

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何在？怎么建立？人员有哪里？器材怎么办……当时我一无所知。

“大臣”我来到军事部大臣邢士廉的办公室：“我接到了新的任命，建立独立通讯队，不知归谁负责？”

“哦……”邢士廉思索了一下说：“你去找次长就了解了。”

在真井次长办公室，各司司长和官房长官正在向他汇报公文。次长见我进屋，示意我坐下稍等。直到他把汇报的官员都打发走了，才回过头来问我有什么事。

我说：“我接到了担任独立通讯队长的命令，但建立这个通讯队的目的、任务以及如何建立、要求程度等等，我全然不知，无从着手……”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研究这个问题。”真井次长笑着说：“建立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你不必知道。你的任务是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无线电营、一个有线电营。怎么建立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编制表说：“人员找人事课，器材找军务科……”我想，有了编制表，一切就好办了。我告别次长，

跟人事课和军务科打了一个招呼，就匆匆回到吉林市，住进一家宾馆，着手组建独立通讯队的编制工作。

由于我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又在东北航空司令部担任过空地联络通讯地上勤务员，对通讯业务并不外行。我根据一个队部和两个通讯营的建制，计划配备军官60名（各军官学校毕业生）、通讯技术员5人、士兵1 200人；需要用车辆和各种器材：队长用小车1辆、无线电通讯车10辆、无线电（收发报机）12台，以及各种有线器材等，3个月后，独立通讯队建立起来了。

人员和器材的完备，并不等于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通讯队伍。因为全队将近2 000名官兵，只有少数几个人懂得通讯业务。所以我决定把刚成立的通讯队办成一所通讯学校，把无线电和有线电两个营的官兵都培养成懂得通讯业务的专门人材。虽然当时各军区都配备有线通讯连，但由于官兵文化水平低，真正懂得通讯业务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我这次挑选通讯官兵时，特别强调文化素质。军官必须是军校出身的；士兵必须是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的。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每天都必须坚持学习通讯技术和操场教练。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无论是有线营还是无线营，绝大多数官兵都掌握一定的通讯技术，能够熟练地进行操作和排除各种故障，在一次野外演习中，得到了军事部张名久司长的好评。

1943年春，当我对独立通讯队正发生浓厚兴趣，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时候，军事部次长真井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

“独立通讯队已经建成了，而且工作得很好。”真井说：“我想把你调来担任人事课长职务，你意如何？”

“担任人事课长……”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次长是知道的，本人才薄德浅，怎么能担任人事课长这样的重任呢！还是请次长另选他人吧……”

次长笑而不答，我只好告辞出来。

不久，我接到了一份任免状：原军事部人事课长伊贵亨调任南京大使馆武官；由独立通讯队队长肖玉琛接任人事课长；独立通讯队长职务由吕梦龄少将接替。

我担任人事课长后，直到1944年初，才真正了解日本当局创建独立通讯队的目的和任务。

这天，在人事顾问主持下召开了一个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之外，还有参谋司长张名久、作战科长中川（日本人）、情报科长史维忠、军事科长斋藤（日本人）。人事顾问在会上传达了关东军关于加速建立“东亚共荣圈”，决定派一个甲种师（伪军）出征缅甸的指示。会议决定：

一、作战科长、情报科长立即与关东军有关各科取得联系，以便在前线交换情报，协同作战；

二、人事课长着手编制甲种师军官人选；

三、军务科长为编制甲种师提供一切物资；

四、独立通讯队编入甲种师，担任通讯业务。

我接受命令后，仔细翻阅了中、日军官名册，并确定了远东军的军官人选：

师长：赫慕侠。

参谋长：秋山繁（日本人）。

参谋处长：史维珍。

副官处长：肖玉琛。

军械处长：张朝宗。

通讯队长：吕梦龄。

……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远东军甲种师（包括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建制完毕，正整装待发，忽然接到关东军关于中止

远东军筹建工作的命令。

原来，由于缅甸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即国民党青年军）奋勇抵抗，侵缅日军遭到惨败，即使增派援军，败局也无法挽回了。这样，刚刚组建起来的独立通讯队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在人事课长的背后

我很清楚，人事课长这个职务牵动着“满洲国”每个军官的命运，是众目睽睽的一把“金交椅”，而这把金交椅是摆在关东军的老虎堂上的，稍有失策，金交椅就会变成老虎凳。再联想起1933年我家被抄的情景，顿时使我不寒而栗。上任之后，在要害的人事任免上，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瞧准上边眼色，权衡利害：既要尊重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又要取得伪满军事部的谅解。为此，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但总算做到了四面见光，明哲保身，曾受过次长和顾问的多次表扬。然而，奴才终究还是奴才……

1944年春，为核对第五军管区第八旅的人事问题，我带着日系人事课员东义量少校来到赤峰县八旅司令部。

在我到赤峰之前，曾阅读过八旅上报军事部的一份呈文：去年冬天，八旅一营在赤峰以西25公里的山地遭到八路军伏击，损失200余人，大部分被敌方俘虏。其中有两名少尉排长被释放回来，等待处理。

宋旅长说：“赵排长和王排长都是军校毕业生，今年不到24岁，前途无量。他们被俘后能逃回原部，说明他们是效忠天皇的。可主任顾问江岛断定他俩是被八路军赤化以后，派遣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必须处死。”宋旅长带着恳求的口吻说：“希望肖课长施展你的影响，把他俩送军法会审，最多判两三年徒刑，

就是无罪释放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将他们处死，这对部队声誉和安定军心，都是很不利的……”

“我同意把这两个排长送交五军军法会审处理。”东义量说：“不经过审讯，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回来做反正工作的呢？”

“东义量课员说得极是！”我说：“我们一块要求江岛主任顾问把两个排长送五军军法会审，请宋旅长放心。”在宋旅长同意下，我们会见了两位青年排长。

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回家，还要到部队来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被俘回来的人要受到法律处分吗？”

赵答：“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家小，如果不回部队，私自回家，将来被官方查出，不仅本人要受处分，家人也得受株连。”

王补充说：“我们考虑过，国法对俘虏总不会有死罪。就是判两年刑，还可以释放回家尽人子之道啊！”

我和东义量都认为这两位青年军官所谈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决心为他们的生命安全出力。

第2天，我和东义量正想告别宋旅长前往五军管区，在旅司令部门口碰上了主任顾问江岛大佐。我原以为他有重要人事问题专程来赤峰跟我商量，不料他刚一进门就对宋旅长说：

“据了解，一营两名被俘青年军官已被赤化，共产党放他们回来是进行反正工作的，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就会后患无穷！不知宋旅长意见如何？”

“这个问题……”宋旅长尴尬地说：“请主任顾问容我慎重考虑。”

江岛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就匆匆地到教官室去了。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忽然接到五军管区发来的一纸电报说，八旅的两名青年军官“畏罪自杀”了。这两个青年军官是决不会自杀的，显然是江岛私自处决的。他根本没把我这个

人事课长放在眼里……我拿着电报向人事顾问作了汇报，并请求派人调查两个排长自杀的真相。人事顾问藤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随即派东义量和另一名中国课员赴热河赤峰执行调查任务。

经过十多天的调查，两个排长死亡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东义量离开赤峰的第2天，江岛把赵、王两名排长押到教官室，用花言巧语让他们承认是共产党派回来做反正工作的。他俩拒不承认，江岛就用极刑逼供，但两个青年军官宁死不招，最后江岛竟用暴力将毒酒灌下，然后把2人的指纹强按在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上——两名青年军官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我把调查报告分别送呈人事顾问和最高顾问阅读，他俩假惺惺地埋怨江岛做法“不当”，行为“恶劣”，将给予“适当处分”。

后来我才知道，江岛杀害两名青年军官，是经过最高顾问和人事顾问批准的。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权力和法律都操纵在关东军少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而我这个人事课长不过是摆在桌子上的一张小小的麻将牌，在我的背后才是玩弄我的真正主人。

（摘自《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伪满第五军管区内幕

刘 放

伪满洲国的最高军事统帅机构是军事部，它统辖十一个军管区。地处热河西部的第五军管区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军

管区，它统辖十二个团，分布于长城沿线，扼关内外通道之咽喉，窥北平（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在军事上、经济上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伪满时期，这一带被称为所谓“西部国境”，是日伪与抗日武装力量对峙、较量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日寇杀我同胞，掠我珍宝，胡作非为，罄竹难书。

我自伪满军校毕业，就来此处任职。曾充当过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附、军管区司令部部附之职。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了解到一些事情。因年代已经久远，仅能将记忆深刻的一部分写出，难于反映当时历史全貌，也恐怕是在意料之中。

张海鹏与伪第五军管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原东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同年10月1日，抢先脱离了张学良，宣布“独立”。在日本人唆使下，他派兵大举进犯黑龙江，在嫩江江桥，同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展开激战。是役，少将徐景隆触雷毙命，先锋部队三个团溃逃。张海鹏非但没有因此而悔悟，反而变本加厉地投靠日本侵略者。1932年2月，他以“前敌总司令”的头衔，率所部伪军配合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省。到热河后，他的军队于1933年5月被改编为伪热河警备军。张海鹏任伪热河警备军司令兼伪热河省省长，掌管了热河省的军政大权。他为了达到其独霸一方的目的，拼命地发展私人势力，他重用报字“天下好”的土匪头子王永清，任命其为司令、旅长；他任命他的大儿子张俊哲为旅长、支队长；他的四儿子张俊卿（外号四虎子），也被任命为支队长、骑兵团长；此外，在各级军官中，安置了许多死心塌地跟着他的旧洮辽军人。当时，伪热河警备军的重要头目及其所属部队配置情况大致如下：

王永清：陆军中将、赤峰地区警备司令兼第一混成旅旅长，

驻屯于赤峰以北及以西的敖汉、奈曼，翁牛特、喀喇沁等蒙旗，直至乌丹。刘文清：陆军少将、骑兵旅旅长，驻屯赤峰及附近县旗。张俊哲：陆军少将、第二混成旅旅长，屯承德、平泉、滦平、凌源等地。鹏飞：陆军少将、混成第三旅旅长兼朝阳地区警备司令，屯朝阳、阜新、凌南、青龙、隆化等地。索景清：陆军少将、第四混成旅旅长，屯围场以西及丰宁一带地区。

日本关东军之对于张海鹏（当时为陆军上将），只不过是利用其充当打手、走卒而已，绝不会任其自行发展私人势力。日本关东军在凡有伪军的地方，就有相应的、一对一的日军驻屯，名曰“共同防卫”，实则暗中监视。同时，控制伪军的武器弹药，不配备给伪军重武器。自从占据热河之后，日本侵略者立即着手抢修警备道路，于各军事交通枢纽处屯兵，控制了军事交通命脉。他们一面疯狂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一面向伪军派进顾问、教官。陆陆续续地在各个基层安插了日系军官，对军内的要害部门进行控制和掌握，建立了指纹档案，对参与拐械潜逃和武装哗变的伪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且，实行人事大调动，打乱原建制，削弱带兵军官的权限，还不断地把由日伪培训的新军官充实到各基层部队。这样，到1934年，伪热河警备军已经不再是张海鹏所把持的私人军队了，而成为日本人严密控制的、受伪军事部（顶头上司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的部队。

日本人对张海鹏私人势力进行限制，其中之一是借机免了张之四子张俊卿骑兵团长之职。理由是张俊卿胡作非为，影响太坏。本来，张海鹏这支由汉奸、胡子组织起来的队伍，向来是军纪松弛，烧杀抢掠不当回事。张俊卿身为骑兵团长，又是“前敌总司令”的公子，有些胡作非为的事情，亦不足为奇。日本人所以要撤他，不过是想借此来限制张海鹏的私人势力罢了。

日本人采用的另一个办法是调虎离山。当张海鹏领兵进入

热河，局势稍为安定时，他就以“参议”的身份经常被召进伪首都新京议事。在他脱离部队期间，部队的诸项事宜，均由日本人代裁代定。张海鹏最初来新京，以开国元勋自居，自鸣得意。后来看到日本人对于他张海鹏的人毫不客气，该撤的撤，该调的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已经越来越不听他使唤了，这才发觉自己上了当。于是，在司令部常常无端地发脾气，破口大骂，连日本人也骂。日本军官虽然表面上对他“哈伊”（是），实际上根本不把他司令放在眼里。因此，他耍脾气也毫不济事，只不过是放放怨气而已。

日本人对张海鹏其人了解甚深。早在他刚进承德不久，就带领他的幕僚去大佛寺参拜大佛。他向佛爷祷告：“大佛啊大佛，保佑我皇上登大宝，一定给大佛塑金身。大佛寺虽然不能重修，也要沾补、沾补。”消息很快就传到关东军司令部。所以，在关东军司令部认为张海鹏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的时候，就给张海鹏找了上好差事，当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长。从指挥千军万马的部队长官，到进参议院、进将军府，最后当上侍从武官长，职位似乎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被夺了兵权；这一点，张海鹏心里明明白白。但是，他吃的是汉奸饭，不听命于日本关东军怎么能成呢？

1934 年 7 月，伪满机构改革，热河警备军改编为第五军管区，张海鹏被调离热河。临走的时候，他要求带一名副官，日本人没有答应。1935 年 9 月，在他进入将军府之后，伪军政部才将第五军管区参谋处中尉卢汉飞调给他当副官。

1934 年，我同其他同学一道从伪满中央陆军训练处毕业，被派到热河警备军的各基层部队任职。刚到承德，就受到张海鹏的接见，时间在 1934 年 3 月 10 日。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年约 70 出头，肥硕的块头，高个子，头发和

山羊胡子已经全白，讲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在此之前，我曾经听说这位司令肚子里墨水不多，讲起话来却喜欢咬文嚼字，并且从来不拿讲稿。不知道底细的人，冷丁还看不透他到底怎么样。当时，他当我们讲话的大致内容是：

尔等离开学堂门来到边防前线，投笔从戎，为国干城，行为可嘉。从今尔后，尔等就是我的部下。热河军主力是旧洮辽军，随我转战南北……我的官，我的兵，个个勇敢善战不怕死，是我多年忠诚的部下。过去张小六子（指张学良）都惧怕三分。尔等到部队去，要服从指挥，精诚团结。本司令官秉正待人，论功行赏，执法如山。3月1日，皇上已经登基了，我平生宿愿克遂。所遗憾者，乃未能保护皇上回北京故宫登基。我年已古稀，很难再事戎马之劳，实不安心。从此建设王道乐土，顺天安民，乃军人之天职，望尔等……”

张接见后，我们13名同学即被派往驻在朝阳的混成第三旅做见习军官。

会见鹏飞

朝阳是伪热河军混成第三旅旅部所在地，是朝阳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旅长鹏飞，是满族人，复姓马，祖籍辽宁省人氏。1928年（民国17年）他在吉林督军张作相属下充任吉林保安队统带部帮统，与当时任吉林督军署参谋处长、后任伪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的关城山（我的表兄）结交甚密。同年9月，他们两人同去当时属于吉林省管辖的双城县检阅新编练的降队，曾到过我家。当时我正在哈尔滨读书，虽然未见其人，但表兄经常谈起他，所以对他，我也就早有所闻。此次被分配到热河，表哥便给我来信，让我找鹏飞，请他遇事多关照。说来也凑巧，我们13名步骑炮三科同学，正好被分配到鹏旅。我们到朝阳的第

2天晚上，我拿着表哥的信去司令部见鹏飞。鹏飞让我坐下，他两眼朝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就直接了当地对我说："关团长（指我表哥，当时是伪吉林第2教导队步兵团长）来信我收到了。你们分配是由总司令部顾问早就内定好的，见习军官必须下连。你是步兵科毕业的，要到步兵团去。可是步兵团全驻扎在山岳地带的凌南、青龙两县，交通极其不便；朝阳有一个营，连队也是驻扎在山里的二十家子、羊山、七道岭。我考虑你可以到七道岭去，因为这些地方相比较，七道岭距朝阳最近。假若你是骑兵，我可以把你留在朝阳或者我的卫队里；炮兵也行。但你是步兵，我就毫无办法了。我这个当旅长的，无权变更啊。"我问道："七道岭在朝阳哪个区？""三区。"一听到"三区"，我的脑袋轰隆一声，犹如平地一声闷雷，面有失色。他笑了笑，说："怎么样？对我怀疑吗？""不，我听说朝阳三区在热河是最野蛮的地方。"他回答说："是的，那是个出了名的地方，你到热河后想必也有所闻。不过你不要过虑，你们的营长叫王兴周，是黑山人，张作霖的同乡，而且是至亲。他人很有办法。连长程光复，在洮南军官教育班当过教官，头脑敏捷，大胆敢为，是个正派人。他们都是我所信任的。你可放心大胆地去，不会有亏吃的。至于青龙，地方太远；凌南是胡子队改编的，他们很排外，更不适合去。还是到七道岭去吧！不必犹疑了。"出了旅司令部。晚间躺在床上，久不能寐。鹏飞的一席话，深深地震动了我。我开始领悟出他不想见我们这些由日本人训练出来、由日本人派到这里来的青年军官的道理了。他是旗人，素有复辟满清的愿望。他追随张海鹏，大概就是出于他与张有同样的想法和目的。但是，日本人之利用溥仪，只不过是让他当个傀儡而已，绝不会让他恢复清廷。鹏飞从自身的经历中和无情的事实面前，头脑开始清醒了，因而对日本人怨恨不已。一方面自

责，一方面发愤，其心理之矛盾，难于言表。

跋扈的洮辽系军官

我们步兵科同学共8名，由旅司令部派出的一辆大卡车送至凌南步兵第三团报到。第三团团长叫王永生，是个收编的匪首，报字“占东洋”。他出身绿林，非洮辽军旧人，因此，比较受排挤，许多事都要听命于团附关柏山的。在我们8名见习军官来见王永生团长时，关柏山团附在场。王团长倒是蛮热情，比较客气。关团附却恰恰相反，极其冷淡。他面带讥讽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作战部队，士兵打仗全是小老虎，什么学术两科全不懂。这个兵可不好带呀！带不好，他会不听你的，弄糟了，还说不定给你定心丸吃！”然后，他问我们：“你们谁打过仗？”我们大家齐答道：“都没有。”“哼！我就担心你们这些白面书生要够呛！你们下去之后，可得好好见习、见习，干好了才能转实官。”随后，关团附又说：“好，明天就到各营报到。一营的留下不动，二、三两营的明天早晨就走。”他转身又喊：“高副官！去雇骆驼，叫他们明天早晨走。”高副官连忙说：“天晚了，怕雇不上了。”关团附眼睛一瞪，狠狠地说：“胡说！咱们是军用，你不会强征？”王团长插嘴说：“不行啊，没有护送队，他们单独走太危险。”关说：“等队伍，没日期！下面还等人用呢！这也是锻炼锻炼！”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恨坏了这个关团附。同学王福庆（据说此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插嘴道：“临来时旅司令部王参谋长指示，我们三月份官饷要在团部领取，赴任旅费得领，给予通报得办。”关团附不吱声了，停了一会儿，又说：“那就限三天之内办完。”回到住所之后，大家纷纷议论起这位团附，说这一位真够厉害了，团长都没开腔，他团附就发号施令，真够霸道的。当晚8点左右，高副官来了，他说，

"奉团长之命来看看大家，吃、住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大家见团长派人来看，免不得又对团附发了一通火。高副官连忙示意大家不要说，他低声对大家说："诸位从学校新来此处，有所不知，他是三团的活阎王，专横跋扈，团里他说了算。你们要是先见见他团附就好了，你们来就先见团长，他感到吃醋啊！团长，单人匹马地来到三团，是光杆司令。团附是洮辽军旧人，眼界宽、吃得开，遇事总要高团长一头，压制团长。这个团可排外啦，新来的人，照例，关团附都先来个下马威，好让诸位不要小看这位团附。请诸位知道就行了，别往心里去。"有人问高副官，王团长怎么不带些亲信来呢？高副官答道："自从我们开进热河，一步步安定下来之后，部队就开始大换班，从连长、营长到团长都调动，谁调转也不许带人。王团长是后过来的降队，就更不在话下了。旧洮辽军虽然全打乱了，但是人多，所以，办什么事，还是洮辽系军官吃得开。"

热河一隅

我同关操祚一路提心吊胆，终于来到了三营营部所在地二十家子。三营长王兴周，是鹏飞比较器重的官佐，该营所警备的地区是有名的朝阳三区。过去，日本军曾驻此地，但经不起昼夜不断的搔扰与袭击，没有多久，就退出了。三营长王兴周带队前来时，深知此处非等闲之地，企图靠本营的武力而在此处落脚，绝不可能。于是，队伍刚到，就立即派人给当地以刘振东为首的最大一股武装力量送去书信。信写得十分客气，并提出若干保证，要求和睦相处。同时，对部下严加约束，因此，士兵祸害百姓的事件相比之下，要少一点；对伪满和日本侵略者一系列命令、政策，常常采取阳奉阴违的作法，并不积极执行。这样，他们就在全伪满都比较出名的治安混乱地区——朝阳三

区安安稳稳地呆下来了。

在我们到营部的次日，就换上士兵穿的灰军装，去逛已经是较为罕见的枪市。伪满从大同2年（1933年）就公布了《枪炮取缔规则》，可是在这里并未实行；用王兴周的话说，这地方来不得认真，太认真，就要给眼罩戴。此处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它这个令、那个令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会万事亨通。枪都可以公开买卖。一位姓韩的营附告诫我们，到集市上去溜达，只能看热闹，不许问这问那的（因我们的东北口音，一听便知）。枪市虽然并不很大，人流也谈不上熙熙攘攘，但也算小有规模。卖枪的三五成群，约有二十几份，他们把枪背在肩上，晃来晃去，大都是联庄会的人，因此，都不是一个人，往往有数人相伴。买枪的一般也都是联庄会的人。买者将枪拆开，看好各部构件，讲妥价钱，再找好保人，然后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并办好联庄会的枪票。枪的撞针在枪未卖出之前，是不装上的，直到一切手续办妥，钱到手了，才把撞针装上。枪市上出售枪的种类不少，有三八式、德国造、汉阳造，还有在一般地方很少见的韩林春造快火轮（枪极其轻快，样子很秀气，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枪）。枪市上，真正买枪的人并不多，因为枪价较贵。大部分是看热闹的。后来，日本人实行清乡，随着保甲连坐制度的实施以及收缴民间武器，这个枪市才逐渐地消失了。

在朝阳三区一带活动的、以刘振东为首的一股武装力量，是抗日的。常干一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之类事情，颇有梁山好汉之风。受到当地维持会的反对。还有一股以孙永勤为首、拥有数千人之众的武装力量。孙永勤的队伍同刘振东的队伍不同，军纪极差，残害百姓的事很多。这两股力量，三营一般不去招惹。对于刘振东的抗日武装，则还明里暗里与其来往，接济些

弹药、被服、药品之类。在七道岭三营八连的驻地，这种相互之间的来往就更多。八连连长程光复，头脑比较清楚。在八连进驻七道岭的第二天，就派人同刘振东打招呼，请刘谅解。刘回信表示，只要人员不单独离开驻地，就不会有麻烦。所以，尽管这一带闹得很凶，日本人小股部队都不敢轻易行动，但是八连的传令兵却能照样走来走去。有一次中尉连附罗广树带队执行警戒任务，在去朝阳的路上，与刘振东部队遭遇。双方战斗进行得很特殊，不是互相射击，而是朝天射击。因此尽管枪声爆豆似地响了一阵，双方却无一伤亡。此次一仗，送给刘振东部队子弹两千余发。部队回来作战斗详报，谎报消耗子弹两千二百发，实际连二百发也未用上。用一句在当时甚为时兴的话说，叫“糊弄鬼”。

在旧中华民国，当官的吃当兵的空额，相当普遍。伪满初期，伪热河军内吃空额的现象仍较严重。尽管日本人采取利用指纹控制的办法，吃空额仍未能够杜绝。各级军官吃空额所采取的作法是，召集一些三亲六故，进行指纹登记，每逢士兵发饷时，就让这些人去按手印开饷。后来，部队到凌南集结改编，许多空额编制才暴露出来。第五军管区的吃空额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了。日系军官被派进各基层部队以后，军需供应，自成体系，同级基层部队长官，已无法插手，因此，吃空头兵饷的现象也就完全消失了。

1934 年6 月，我所在的步兵三团奉命到凌南集结，等待改编。凌南有一家朝鲜人开设的酒馆，专门接待驻在凌南的日本军人以及在凌南附近开矿的日系职员。我们队伍初到凌南，并不知道底细。因此七连曾有两名士兵，于又饥又渴的情况下，走进了这家酒馆。他们坐在桌前等来等去，只见老板和伙计都忙着伺候日本人。有好几位后于他俩而来的日本人都吃上了，却

还是没有人来顾及他们。他们三番五次地喊老板；老板因见他们是伪满军人则不予理睬，态度十分傲慢。两名士兵不堪忍受歧视，便同老板争吵起来。几名在酒馆喝酒的日本人见此情景，非但不劝解，反而同老板一起，突然大打出手，并找来日本宪兵，把两名伪满士兵抓去，关进了拘留所。附近的中国人，见朝鲜老板如此仗势欺人，日本人如此霸道，莫不愤愤不平。七连侯连长到团部请求派人去宪兵队把人要回来。关柏山团附一听，双脚一蹦老高，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侯连长对兵约束不严，惹事生非。并且说，朝鲜馆子穷当兵的也能去？整死活该。王团长主张去要，关团附也不作声。并说："宪兵放出来也得办他几百大棒。"侯连长在团部里碰了钉子，回来后十分窝火，闷闷不乐。团部少尉副官王维新、和同我一起来的刘玉田，对此事十分气愤。王维新说："团里不派人，干脆你们自己回去，把你那一排弟兄拉去，全付武装，先文后武，他若是不给，就砸它宪兵队狗窝，把人硬抢回来。"王维新是靖安军第一期候补生，1934年末来到热河，他日本话说得流利，带有"红袖头"(靖安军）一种野蛮作风。刘玉田同我一样，也是刚二十出头，年轻敢为。听了王维新这个主意后，立即返回连队，他以到野外侦察为由，选出三十多名强壮士兵，直奔日本宪兵队而来。日本宪兵队只有七个人，看到这一排伪军来势汹汹，士兵一个个怒目而视，知道来者不善。马上笑脸相陪，一再表示道歉；并立即派人把朝鲜酒馆老板找来，令其向士兵赔礼，并罚他停止营业一天。两名士兵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要回来了。王维新对刘玉田说，看来还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大家都高兴而归。事件过后，关柏山团附把王维新责骂了一通。王维新并没听他那个邪，照样我行我素。

王维新嗜好饮酒。因为对前途悲观失望，所以总是以酒浇

愁，在醉酒中度日，也常在酒后闹事。伪满军队对军旗非常重视。每个部队的军旗，都要委派专门的军官掌管。并专设军旗室，门外设警卫兵士站岗。王维新为掌旗官的时候，有一次，又喝醉了，他一边咒骂自己“当什么鬼差事!”一面奔向军旗声言要把军旗折断。守卫的士兵一听吓坏了，幸好众人闻讯赶来，拚命争夺，军旗才未被折断，但也被糟塌得不像样。有一次在承德，王维新去戏院看戏。见一伙伪警察在戏院里吆五喝六，对老百姓耍威风。他是个说打就打的人，脾气暴烈，三五句话，就同警察冲突起来。他虽然是军校毕业，打架有两下子，但毕竟寡不敌众，被警察抓进警察局。日本警察审讯他。他在用日语跟日本警察讲理时，趁日本警察没留神，猛地窜了过去，用手把全承德城内警报器开关合上，顿时，警报器齐鸣，人们乱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日军和第五军管区司令部纷纷询问此事。日本顾问问王维新，为什么要拉警报器，王答：“他警察局胡乱抓人。我是军人，犯法也归宪兵队管，他警察局把我扣在那里就是胡来，行他胡来，就行我胡来。你警察局扣我，我就拉警报。”日本顾问一听，非但没治王维新的罪，反倒把承德警察局训斥了一番 。此事就不了了之。后来，王维新因一次纵酒过量，醉倒在承德离宫墙外。当夜天气寒冷，次日早上人们再见到他时，已经冻死路旁了。

1934 年6 月，部队集中在凌南忙于改编时，从前一些占用连队编制的士兵全回连了。这些兵都是长官的三亲六故。关柏山团附之侄关永江也回连了。他的职务是连司号长，但是，他并不会吹号，纯属仗其叔父之权势，吃空额者。该人回连后，整天吊儿郎当，胡作非为。他调戏房东之女，房东来找连长告状。连长程光复把关永江叫来，劝导他。关永江仗着他是团附侄子，完全没把连长放在眼里，态度十分傲慢。我正在场，目睹此事，

怒不可遏，狠狠地教训了关永江一顿，这一次可捅了马蜂窝。团副很快就知道了此事，并把连长找去，责令连长对我好好调查一番。数日之后，我们全连到团部整队集合，迎接新任团长。我站在我排的队伍前，静候命令。关团附气势汹汹地奔向连长，问道“你调查没有？”一边说，一边冲我而来，指着我破口大骂：“混帐东西！我的人你不知道吗？真胆大包天。打狗还要看主人，你他妈竟敢管我的人？”我尽量冷静地说：“我是少尉，他司号长违反军规，我就要管，而且要狠管。谁的人违反军规都一样。”气得关团附直蹦，嘴唇都颤抖了。高声喊：“我是中校你不服从吗？”我看事已闹到这个地步，也就毫无顾及了，也大声吵了起来：“服从也得讲道理，为了你的人，今天我就不服从！”关团附回头喊：“无法无天了！上尉副官，拿棒子办他！”上尉副官转身便走，我随即向全连下达命令：“立正，上刺刀，装子弹！”全连士兵立即行动。这时，邻近的七连，也在刘玉田的口令下，上了刺刀，装上了子弹。紧接着，全团凡是有我们军校同学的单位，都喊起相同的口令，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关团附忙喊“稍息！”可我连全体士兵，纹丝不动。他怕闹出事来，大声嚷嚷：“我找团长去，让团长处分你。”一边说，一边跑，灰溜溜地滚蛋了。全团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平静下来。王团长即将卸任，这件事当然一推了之；新团长呢，也不愿意得罪青年军官们，只是简单地 问了问事情经过，就草草地了事了。自此，关团附的气焰多少收敛了一些。

王静修其人其事

1934 年，热河警备军改编为第五军区管。是年 7 月，任命王静修为第五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沈阳市北古城子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九・一八”事变

前，系黑龙江军马占山的部下。“九·一八”事变后，也曾追随马占山抗击过日寇。1931年1月，他在代表马占山与日军铃木美通谈判时，竟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堕为可耻的汉奸。他最初任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中将处长。可能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吧，在日本人面前，他是一个典型的碌碌无为、唯命是从的木偶式人物。但是实际上，王静修绝非如同他表面上装出的那样呆傻。王到第五军管区不久，就让日本人秘书岛村搬进自己的办公室。王静修每天上班，就把自己的名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及其他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要“司令官”审阅批示时，王静修总是说：“给岛村吧。”而这位岛村，丝毫也不客气，就为“司令官”代裁代行，并且以此而洋洋得意。王静修自愿当傀儡，凡事无论巨细，他总是一推了事，不负责任。如有什么事去请示王静修，他总是问：“顾问看了吗？”回答：“看了。”“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一次，情报参谋张士洪拿几份有关东边道抗日联军活动的情报，来见王，王说“让岛村看吧。”当岛村看后向王静修复述情况时，王却说：“你看就行了，不必说了。”张参谋回到参谋处刚刚坐下，王静修来了。对张士洪说：“方才那个文件我看看。”于是他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看。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往往你亲手送到他办公室，他却不看；然后，过一会儿他就会跑到参谋处来，打听情况。因为参谋处全是伪满军官，没有一个日系军官，可能在他看来，在参谋处干点什么比较方便。他的这种表面上当甩手掌柜的，实际上事无巨细均予过问的作法，引起了参谋处长王维藩的不满。王维藩背地说：“司令何苦呢？作事应该真面目。”有一次，王维藩拿一份待发的作战命令请示司令官。王静修又说：“给岛村看看吧。”王维藩当着岛村的面说：“这是军事机密，除直接责任者、主管上级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军机保护法明文规定的。”一句话，弄得岛村

面红耳赤；王静修只得接过去亲自过目、签字。王维藩回参谋处后，向警备科长高联毓说："真够呛！把一个岛村抬举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高联毓笑了，没有作声。不一会儿王静修进来了。他问王维藩："方才的作战命令下达了没有？"王回答："下达了。"接着说："阁下，有些重大事情不能靠岛村。他不过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他也不敢负责，那咱们可担当不起！"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王反驳说："送阁下的文件，尤其重要文件，都是经过顾问审核过的。何必顾虑重重，他算个啥？"王静修笑而不语。

从那以后，王告诉参谋处全体军官：再核稿或签阅时，要交司令官本人，不理岛村。从此，凡属带有"秘"、"秘密"、"极密"、"机密"字样的文件，岛村也不敢公开受理了。常常表白："司令官阁下看完的文件，我代为盖章；因为阁下实在太忙了。"而王静修此后也多少问大事了。有一次报纸上刊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殷汝耕任行政长官"的消息。大家在参谋处办公室里议论纷纷。有人说防共就意味着中日调和，抗日是遥遥无期的；也有的持否定意见。谈论正热烈时，王静修进来了。大家请司令官发表高见。他坐下后说："殷汝耕的自治政府是日本人伸向关内的一个触角。它正是日本广田外务大臣所主张的三条，即：停止排日、默认满洲独立、防共的具体体现。它加强了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看吧，有朝一日我们五军还要有人被派到北平去呢。看来这个形势是俺们所没有想象到的。"不久，顾问部骑兵上尉田中巽被派到冀东政府保安队当军事教官去了。以后，陆续地又去了很多日系军官。从此，五军区顾问部成员与冀东自治政府往来频繁；这一切，当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1936 年，第五军管区主任顾问步兵大佐关原六，带许多日系军官及中国人翻译进入北京，在西城区设

立一个“关公馆”。关原六大佐是五军区的主任顾问，又是承德特务机关长；此人进入北京要干些什么？不言自谕。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王静修的讲话，参谋处的军官们开始认识到王说的是很有些预见性的。平时什么事也不过问的、粗心大意的“司令官”，看问题倒是蛮准的。

平时，在军官集会，特别是有日本人多的场合，他讲话往往携带翻译。他说一句，翻译一句。并经常向翻译问：“我方才说到哪啦?”要翻译提示一下再讲。他不摆司令官的架子，一点也不讲究吃，大有农村庄稼院老头儿的味道。他善于接近部下，跟谁都谈得来，也跟士兵唠家常。动不动还给士兵做做模范的基本动作，如射击、刺枪、劈剑等，并讲解动作要领。每天早晨，他早早起床，由承德去滦平；或乘汽车，或骑马，往返一趟40公里。经常找司令部的青年军官陪同。若青年军官起得没他早，就要受他一顿教训。对于他的举动，部队官长可有些受不了。滦平驻军，每逢司令官来滦平营苑时，总免不了要列队迎接；但往往营苑士兵尚未起床，他人马已到。除了经常同士兵一起教练、上课、劳动之外，他还经常下厨房，这摸摸，那看看，问吃得怎么样，吃得饱不饱等。时而，见到小兵，也提问“军人誓文”、“军人敕谕”、“内务规则”、“生活情况”等方面的条例。一般官兵对他印象不错，士兵们说：“他若是个班长、司务长可就好啦!”

王静修对青年军官很重视。当时，军管区司令部里最年轻的军官有三人。即：杨小先（伪满作家慈灯）、申绍志和我。我们都是参谋处处附。因参谋、副官二处都是幕僚军官，所以几乎天天和这位司令官接触。他非常欣赏孔孟言行及曾文正的书籍，并经常用这一套向我们说教。他跟人谈话时，很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讲起话来很有分寸。他用词的意义有时很明确，如

说："俺们"，是指中国人；"他们"是指日本人；但有时又很含蓄，使你非得仔细捉摸不可。

王静修唯一一项大胆决定是成立第五军管区军官教育班。这个教育班，顾问并不同意办；但是在他授意下，参谋处长王维藩很果断地办起来了。原计划轮训初级军官，分步兵科、骑、炮兵科。计划各办多次，原意是把全管区初级军官轮训完了为止。但是这个教育班是短命的，仅仅训练一期步兵军官就被迫解散了。原因是，他办军官教育班的目的是要提高伪满军部队各科初级军官的军事素质；并亲自接触与熟悉这些军官，树立他的统帅威信，企图在必要时能使这支部队为他所用，指挥自如。这当然是为日本人所不容。于是，就制造种种藉口，勒令解散了。

1934 年 7 月，新编的第五军管区，实际上王静修是第一任司令官。它统辖锦州、热河两省警备区，划分为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与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其所属组织系统及配置地区与指挥官分布如下：

第五军管区司令部（承德）：司令官王静修中将、参谋长卢静远少将、司令部附索景清少将、主任顾问关原六大佐、顾问千叶一郎大尉。参谋处处长王维藩上校、副官处处长刘肃华上校、军械处处长吴国贵上校、军需处处长魏崇岳上校、军医处处长赵怀仁上校、兽医处处长杭承祖上校、军法处处长王冠英上校。

第五教导队（大虎山）队长鹏飞少将、第五通信队（承德）队长枝佐（日）、自动车队（承德）队长谷富少校、承德陆军病院院长许思明上校。在承德还有一个陆军监狱。

承德地区警备司令部（承德）：司令官王永清中将、二十六旅旅长王永清中将（兼）、步兵第八旅（驻丰宁）旅长冯秉臣少

将、骑兵第七旅（驻赤峰）旅长刘永清少将。

锦州地区警备司令部（锦州市）：司令官田德胜中将、二十四旅旅长田德胜中将（兼）、二十五旅（驻朝阳）旅长张俊哲少将。

王静修在任期间，正是伪军进入整顿阶段，兵员数量逐步减少，兵员质量逐步提高，一切上了轨道，各种法令建立并实施。每年2月、9月是人事定期变动期。在这两个月内，专办晋级、增薪、调转、退职等。一切均见诸于政府公报。此外，还以团为单位确定军旗授与等等。由于王静修平日善于装呆卖傻，所以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后晋级陆军上将。1936年调至伪第一军管区任司令官。但是，日本人不可能让他永掌兵权，当了一段司令官后，就转到参议府任参议，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

一次逮捕事件

1935年秋季的一天，一群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突然闯进参谋处办公室；副官处日系教官饭冢中佐也在其中，一个宪兵拿出笔记本呼唤"王竹修，陈章斌！"王、陈两人刚刚站立起来，几个宪兵就一拥而上，把他们带上手铐，不由分说就逮走了。次日清晨一上班，参谋处长王维藩满面怒容，一言不发地坐在座位上，他破口骂道："真他妈不像话！居然搜到我的头上了！"原来，昨夜10时许，日本宪兵曾去王住处进行搜查，折腾了好长时间。王维藩为中国人，在日本宪兵的搜查面前是敢怒而不敢言；王维藩的妻子武田秀子，是日本国内著名的舞姬，安肯受这份窝囊气？当晚就去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关原六公馆，质问顾问为什么要搜查他家？声言要回日本国找陆军省算帐。关原六自知武田是有来头的，只是推说不知道搜查一事，好言劝

阻武田，武田才不言回国。此后，日本宪兵再也不到她家去了。可见武田非寻常人物。当初，王维藩作为东北军一名中尉，被张学良选中，派往日本步兵学校留学。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又被送入日本军事最高学府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九·一八”事变时，他在日本陆大就读，成绩十分突出，为校方所器重。当时，日本陆军省当局为了搜罗汉奸、卖国贼，乃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做其工作，诱以高官厚禄，劝他们到东北来，参与伪满洲国建国建军工作。开始，王维藩只是不从，先是要求回中国（指关内），后来看气候不对，他就不敢再言回中国一事了，而改为执意留在日本，绝不回来。但这并未使日本陆军省放弃对王的争取工作。通过种种关系，日本当时著名的舞姬之一、武田秀子同王维藩结识了。武田以她如花的容貌、婀娜的体态、优美的舞姿，曾经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日本人；许多名门贵族、富豪子弟纷纷向她求婚，但都未成功。武田自从结识王维藩以来，常常同王维藩在一起，为王消愁解闷。当时，陆军省正在动员王维藩去东北，王如同重负在身，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他离开东北多年，人非草木，思乡之情，在所难免；况且久无家庭温暖，今遇武田秀子，时间不长，王就坠入情网。经武田秀子的极力说服，王维藩终于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同武田秀子一道回到了东北。武田这个日本著名的舞蹈家，遂成了王维藩的妻子。武田曾经对别人讲过，她是为了她的国家才抛弃别人对她的追求而嫁给王维藩的。这显然是陆军省当局出面做的工作；否则，武田不会对关原六说要回日本找陆军省算帐。

王维藩回到伪满之后，看到日系军官的专横跋扈，看到伪满军官在部队中的傀儡地位，如梦初醒，开始感到自身已沦为汉奸。所以整天是牢骚满腹。在他的参谋处里，没有日系军官。因为他对日系军官非常苛刻，许多日系下级军官，不敢来参谋

处，派来也不赴任。在日本，能到陆军大学学习的军官并不多，加上日本的学阀风气极浓，所以日本一般军官见到王维藩胸前挂着陆军大学的徽章，表面上都要敬他三分。而王维藩的满肚子不快，则专找日系下级军官发泄。他是陆大的高材生，提出的一些军事上的古怪问题，日本下级军官当然无法回答。于是，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责骂。一般的日本军官对他是敬而远之，不敢朝他的面。久而久之，许多日本人都向日本特务机关告王维藩的状。因此，此次王家被搜，恐怕与他平时对日本人训来骂去的态度有关。更直接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参谋处逮捕的王竹修、陈宣斌两人都是王维藩参谋处的人。而王竹修做为王维藩、武田秀子二人的英文教师，经常出入于王维藩公馆。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日本宪兵乘机搞了王维藩一家伙。有的说，这回主要是杀杀"大学王"（王维藩的绰号）的威风，好派日本人进参谋处。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平时，他当着司令官王静修的面，训斥岛村，岛村秘书对他很有意见。他也不把饭冢中佐放在眼里，因为饭冢中佐没进过陆军大学，一辈子也不会晋级将官。遇事，王维藩总不以饭冢为然，在日本人眼里，王维藩太傲了，因此要整治他一番。

十几天之后，王竹修、陈宣斌二人手带手铐，脚拖脚镣，步履艰难地被日本宪兵押到参谋处。他二人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特别是陈宣斌，两只眼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采，直勾勾地瞪着，嘴巴张开。看样子，神经似已错乱。他们进屋以后，直奔西墙，陈用手一指说："在这！"两个穿白帆布工作服、拿行军镐的人就刨了起来。约二十几分钟功夫，墙全刨空了，除了刨碎的砖和灰土之外，一无所有。宪兵又逼问他俩："到底在哪？"王竹修冷冷地说："他（指陈宣斌）是严刑所逼，信口胡说的。"日本宪兵又问："你们跟谁有联系？"两人闭口不言。于是，将

二人带到王维藩身旁问道“是他?”王维藩眉头紧皱，低着头，闷不做声。看来，是压了一肚子火。王、陈两人一边摇头，一边大声说：“不是，不是。”紧接着，科长、参谋，所有军官、属官、军士、文牍、录事、雇员、打字员、勤务兵，都一个接一个地统统过了一遍，逐个问“是不是他?”他俩全是一个回答：“不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叫曹文鹤的雇员，是新来乍到的。王、陈两人都不认识他。因此，经过他时，略为迟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新来的，眼生）。日本宪兵以为这回可算找到了同党。于是对曹说：“你同我们走一趟吧。”曹文鹤平时胆小怕事，从来没经过这样的场面，吓得面色如土，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王维藩说“他是新来的。”日本宪兵连理都不理，连拖带拽地把曹文鹤给带走了。当所有的人被一一问过之后，未听到王、陈二人回答出一个“是”来。日本宪兵气坏了，大声逼问他俩人：“你们到底跟谁联系的？快说!”王竹修依然冷冷地并大声答道：“关原六!”关原六是日本当时在承德的特务机关长、军管区主任顾问。大家一听王这样回答，莫不暗自赞叹他是一条铁汉子，被打成这个样子，还敢取笑宪兵，真说得上是个英雄。气得日本宪兵哇哇怪叫，直骂“八格!”连推带搡地把两人押走了。此次，军法处的一名雇员，军需处的一名录事，也同时被日本宪兵逮走了。

一周之后，曹文鹤被放回来了。他消瘦了许多。对于他到宪兵队的情况，闭口不提；别人也不问及，恐怕问他，他也没胆量说。不过很明显是吃了一些苦头。

王竹修，河北省人氏，北京大学政经系毕业生，曾在承德当过中学教员，在汤玉麟坐镇热河时，做过督军署秘书，在伪第五军管区参谋处当属官。平时言谈之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爱国情绪。他通晓英语，学识丰富，为出身于日本名牌大学

的王维藩所器重，常请他去家中教英语。在他被逮之后，司令部议论纷纷，有的说王竹修是国民党承德党部的人，是汤玉麟留下来的，他看中了王维藩，想要争取王维藩；还有的说日本人为了整王维藩而株连了他，他成了替罪羊。

陈宣斌，沈阳人，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在五军管区参谋处当文牍。他的英语也不错，也曾教过王维藩处长和武田秀子英语。

王、陈二人后来再也未见到，据说可能被日本宪兵整死了。

古北口

1936年春的某一天，千叶顾问率领司令部全体官佐到古北口进行战地见习。千叶顾问领着全体官佐观看了几处当年作战遗址。伪大同2年（1933年）3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驻守在古北口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燃起了这场战争。千叶顾问当时做为一名中队长（连长）参加了这场战斗。此次，千叶顾问就是以当时的战争为例，给我们讲述实地作战的有关情况。在走了几个地方之后，千叶把我们带到古北口西南一个最高山的山脚下。他用手指向山顶说，这是A高地，攻克古北口时，此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中国方面占有优势兵力，前面是黄杰、关麟徵的部队；古北口外还有王以哲的部队。中国方面居高临下，可攻可守，从地形上来说，这里真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从日本皇军方面来说，兵力较少，后续部队增援有困难，加上人地生疏，部队不能分散使用，所处地势也极为不利。日本皇军占优势的一面是武器装备。战争开始后，中国方面从这个A高地上和那边的A高地，以及C高地上，组成了交叉的火网。火力密织猛烈，阻止日军前进。日军冒枪林弹雨，强行攻击，伤亡很重。日军方面派出飞机轰炸，大炮远程支援，配合密切，一

日之间，BC 两高地中国守军相继瓦解溃逃，唯独A 高地仍未撤出。此高地扼古北口之咽喉，如不占领，则无法进入古北口。关东军司令部一再电示，必须攻下A 高地。为此，日军派出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在飞机与炮火的掩护下进行强攻。战斗打响之后，所有步兵炮均集中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掩护强攻，远程大炮和飞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守在高地上的中国军队很顽强，他们火力虽然很弱，时常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可是，一旦冲锋的日军将要冲上近前的时候，他们就像是突然醒来一样，把冲锋的部队压下去。这是我头一次遇到这么顽强的中国部队。他们的友邻部队早已撤走了，他们孤军作战，抵抗着日军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轰击，和一个联队的七次冲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每一次冲锋，日军都大声向中国军队喊话："举白旗不杀！"但是，中国军队毫不理会，只是用子弹、石块回答我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轰炸与冲锋，高地上的石头山被削去一大块。在我们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我的一个中队最后只剩下 7 个人了。10 日下午 2 时，我们冲进A 高地中国阵地时，只见有 4 名受伤的中国士兵端着枪，互相对准胸膛自杀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发现一个活着的中国士兵。目睹那壮烈的场面，全体日军无不肃然起敬。在攻击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山上的中国军队很多；上来才知道，只有一连人；而且，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事，除了一个碉堡之外，就是简单的战壕。但是他们居然能在飞机大炮的轰击和 10 倍之敌的冲锋面前坚持两天两夜！打扫战场时发现，每个中国士兵的子弹袋都是空空的，一个个士兵的嘴唇都是干裂的。看来他们是已经坚持到弹尽粮绝，连饮水也没有了。此次战斗，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队在A 高地上全军覆没；日本军的一个联队，在A 高地前也损失了三分之二。部队长说："无论中国军队还是日本军队在A 高地的战死者，统统

是民族英雄；他们各自为着自己的民族而牺牲，应该受到尊敬。”于是，我们把中国军队的战死者和日本军队战死者的尸体合葬在一起，并在坟墓之上立一石标，上书“民族之魂”四个大字。千叶又用手指着自己胸前的武功章说：“这就是在这场战斗之后授予的。”讲完，千叶领大家参拜了中日合葬墓。

此次古北口战役介绍，对我们伪满的一些年轻军官震动极大：同为中国人，同为军人，古北口那一连中国士兵抗击十倍于己的侵略军最后壮烈殉国；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当报纸上首次出现这一消息时，在伪第五军管区工作的日系军官个个喜形于色。一天上午9时许，副官处通知：10点钟司令部全体官兵，在将校集会所集合，由顾问做形势讲话。千叶顾问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一开始就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吧？张学良把蒋介石关押起来了。”接着，他分析了事件发生后的形势，指出中国必定会发生大内乱。主要根据是：一、国共两党打了十年内战，仇深似海。此次张杨扣押蒋介石，必有背景。就是说，张、杨一定跟共产党有来往。张领兵进关之后，蒋介石虽然表面对他不错，但实际上处心积虑地要消耗他的力量。调他与共产党作战，是一箭双雕，坐收渔利。对此，张学良不能不知道，所以扣押了蒋介石。共产党也一定要伸手，讨还血债，杀掉蒋介石，因此国共两党之争不可能停止。二、何应钦是日本留学生，同日本关系好。蒋介石被扣，何应钦必能领导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大有作为一番，压倒英美派势力。何一定会向张、杨宣战。三、傅作义、阎锡山这些地方派，难免不会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因

此，整个中国，必定会形成一个军阀混战局面。届时，日本将全力支持何应钦，消灭张学良。如中国内战爆发，日本有平息中国内战，奠定大东亚秩序之义务。

千叶讲话之后，日系军官一个个乐在眉梢。下班之前，纷纷邀请伪满系军官去家里吃饭。紧接着，何应钦出兵潼关，派飞机轰炸。日系军官们，总是抢先看报纸，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千叶，更是洋洋自得，陶醉在他那一篇形势讲话之中。周恩来飞抵西安。日本人纷纷说："看吧，蒋介石的死期到了。"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和平条件，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消息传来，日系军官们沉默了，失去了往日的兴高采烈情绪；千叶直摇头，表示不可思议。日系军官们接到了上面的指示：做好打仗的准备。一般日本人有顾虑了。战争给广大日本人民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因此，在日本人中间实际上广泛地弥漫着一种反战情绪。这种情绪在国共合作之后，表现得更明显了。

卢静远

卢静远，湖北省人氏。他本来是前清的举人，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回国后，在袁世凯政府里当官。伪满初期，他担任吉林警备军第二教导队士官候补生连连长。后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以后，又调至第五军管区任参谋长。这位参谋长，六十多岁，老迈昏庸。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像在戏台上作戏一样，踱方步。他同郑孝胥一样，是个清廷复辟派。辛亥革命，使他的举人头衔失去价值。因此，十分怨恨革命党人，怨恨孙中山，更怨恨共产党。他经常咒骂："什么党？党、魔、鬼一流也！阑珊夜行，忽遇黑墙挡路，谓之党；遇白衣骷髅，谓之鬼；遇鬼神附体，谓之魔。党字口下有黑，是

不光明之谓也。”等等，他整天钻在之乎者也之中。部下送去的批发文件，对内容他从来不动，只是在文言虚字上下功夫。文件经他一改，满纸是之乎者也。有几次，他糊里糊涂地把上边下发的文件也给改了，在上面加了不少的之乎者也。气得王维藩处长拿着文件去找他：“你是怎么搞的？这是上边发下来的文件！”他接过来一边看一边说：“唉呀呀！可不是。搞错啦，搞错啦！”还有一次，王维藩把一份作战命令交给他审阅。谁知道命令拿回来后，又是满纸的之乎者也。王维藩十分恼火，当着大伙的面直骂卢静远。并且，还到司令官那里告了他一状。王维藩常说卢静远不懂军事，十分瞧不起这位参谋长。卢静远倒是蛮有海量，对王的尖刻言词，仅是红红脸而已。后来，卢静远到汪精卫那里，做了伪新民会会长。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搜罗了不少卢静远式的人物，卢仅是其中之一。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

伪满靖安军的始末

高乃恒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势力，欺骗世界舆论，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它就着手策划建立以日本人为骨干的伪“靖安军”。

一、伪满靖安军的沿革

（一）1931年10月，日本浪人和田劲（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退役时为中尉，在沈阳经商），为了配合关东军占领东北，

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原奉天兵工厂工人宿舍旧址，设立了司令部。搜罗日本退伍军人和东北军的流散军官作为骨干，在沈阳、辽阳、海城等地招兵买马，建立一支伪军，最初叫“靖安游击队”，和田劲自任中将司令，美崎丈平任参谋长。首先成立第一步兵游击支队，下设两个营九个连，队长是石光宪一。

靖安游击队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械、兽医等6个处和直属通信连。接着成立了第2游击支队、骑兵游击支队、炮兵队等。后于1932年3月改称靖安军，属下为步兵第一团、步兵第二团、骑兵团、炮兵队。

伪靖安军司令官和田劲于1932年10月左右被撤换，改由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的藤井重郎接任（藤井与板垣、土肥原是同期生）。

（二）士兵的招募

第1批士兵是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招募来的，大多数是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这些人只知有钱花有饭吃就行，至于给谁当兵就不管了，日本人利用这一点，尽量附合士兵的要求，每月1日、10日、20日分三次放饷。就这样将伪满军第一支傀儡军队建立起来了，总计官兵3000余人。

（三）历任司令官

伪靖安军自组建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任过司令官的除和田劲、藤井重郎外，还有美崎丈平、赤泽三六、山崎、平川哲一、秋山秀等人。

（四）历次名称变动

1932年3月——1938年1月靖安军。

1938年2月——1940年5月，靖安师，各团番号未变。

1940年6月——1945年8月15日第一师。

各团的名称改变：

1943年8月将“靖安”二字去掉，统一按伪满军的建制称：

靖安步兵第一团改称步兵第三十六团；

靖安步兵第二团改称步兵第三十七团；

靖安骑兵团改称骑兵第四十六团；

靖安炮兵团改称炮兵团。

（五）兵力的扩充

1932年3月——1932年10月　约1 500人。

1932年11月——1943年2月　约3 000人。

1943年3月——1945年8月　约8 000人。

二、靖安军镇压抗日人民的重要罪恶

（一）伪靖安军建立之后，经过3个月的训练，就投入了镇压东北抗日军民的战斗。最初是镇压在沈阳外围的义勇军，继而向抚顺、本溪一带延伸，残酷屠杀义勇军和劳苦人民大众。

（二）1933年秋——1934年夏：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它在东北满的占领地盘，于1933年秋将伪靖安军全部从沈阳调到牡丹江、宁安一带，从事镇压我抗日游击队。赵尚志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以日本人为骨干的伪靖安军，在宁安等地大肆屠杀我抗日军民，抓住我抗日军民就地斩首。宁安一带老百姓被这支伪军骚扰的民不聊生、鸡犬杀光。

（三）1934年——1938年东边道“大讨伐”时的靖安军：

我东北抗日军民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在通化、临江、抚松等地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的游击战。日本侵略者将其豢养的伪靖安军调到该地区，向我抗日游击队猖狂进犯，但被我抗日游击队打得伪靖安军一筹莫展，成排成连被我游击队歼灭。伪司令藤井哀叹说：“没想到还有这么样的土匪（日寇称抗日游

击队为土匪）。”

伪靖安军从1934年至1938年这一期间将其主力均投入东边道，对我以杨靖宇将军为首的抗日联军进行“讨伐”。而我抗日联军越战越强，伪靖安军损兵折将。自称伪满军的王牌靖安军，在同我军较量中均以失败而告终。气得伪一团团长赤泽三六打自己的嘴巴。

（四）“七·七”事变后的靖安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奉关东军的命令，以靖安军步兵第一团、炮兵队、伪第五教导队下属的第五步兵团、第五骑兵团、独立自动车（汽车）队的第一连等伪军组成的“热河支队”，由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任支队司令、伪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任副司令。全支队开赴热河西部丰宁县等地，配合日本侵略军向我抗日军队进攻。

（五）伪热河支队两个司令的下场

1. 一个可歌可泣的事件：伪靖安步兵第一团的某连中士班长×××，此人平时少言寡语，做事认真，很得日本人连长的器重。但他热爱祖国之心始终装在肚子里。1937年8月里的一天，正当藤井司令视察阵地时，来到他班阵地，这时激起了他无比的民族仇恨，看到报仇时机已到，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乘藤井不注意端起机枪对准藤井勾动板机连续数发将藤井击毙。并趁随同视察阵地伪军官们一齐凑前救护藤井的瞬间，他端着轻机枪向山下我抗日军阵地跑去。当伪军官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不知去向，向山下乱打了一阵枪。这时日军官们呱呱乱叫，日本人排长迫田武夫端起机枪射击也晚了。这一震惊中外事件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 1937年9月，伪热河支队副司令朱家训的指挥部被我抗日部队高桂滋师夜间袭击成功，捣毁敌指挥部，全歼汉奸朱家

训等数百名伪军官兵，导致了热河支队的瓦解。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威风。

三、伪靖安军在三江地区的罪恶

伪靖安军从关内宣化和东边道等地于1938年3月全部撤回到沈阳根据地，进行整编和补充，于同年8月调到三江地区的富锦、同江一带，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加强对苏联的进攻准备，对我在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视为心腹之患。为此，把伪满军大部兵力抽调到三江地区，靖安军是首当其冲的。于1938年8月从沈阳把靖安军全部调到富锦同江一带，伪靖安军的兵力部署如下：

司令部——富锦县城

第一团（欠一营）——富锦县五顶山

第二团——富锦县城

骑兵团——同上

炮兵团——同上

第一团第一营——同江县城

同年11月第一团与第二团互换驻地，第二团到了五顶山和同江，第一团全团驻富锦。

（二）发动疯狂的进攻，伪靖安军是马前卒

1938年9月从沈阳调到了富锦之后，立即发动了对我抗日联军的进攻，首先把重点放在同江一带，对我二龙山附近的抗日联军采取了围攻。而我军为了保存实力，在敌人进攻之前把主力就转移到饶河、宝清等地。11月，伪靖安军又把矛头指向抚远一带抗日联军，发动了围攻，而我军则采取了诱敌深入乘其不备，以逸待劳突然袭击，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1. 1939年1月，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配属追击炮一个排，在日本人营长山田忠荣的指挥下，向我饶河一带的抗日部队进攻。我抗联部队查知敌人企图后，迅速采取了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敌人。伪军营长山田忠荣老奸巨滑的人，不敢贸然深入。五顶山驻地的团长石井佐吉大骂山田是个胆小鬼。命令他直追猛进，妄想一举消灭我抗联部队。我军查知敌人企图后，采取了同敌人捉迷藏战术，指挥敌人团团转，等到敌人精疲力尽、麻痹大意时占据有利地形，一举将山田指挥的一个营，打得溃不成军，狼狈逃窜。这一仗打死伪军二十多人，伤四十多人，我抗联部队没受到损失。这一仗，我军的胜利使伪靖安军吓破了胆，伪赤泽三六师长哀叹说："抗日联军是不可小看的"，此后，伪军不敢向我贸然行动。

2. 1940年12月，伪靖安骑兵团第三连在日本人连长斋藤指挥下，向饶河、宝清一带活动的抗联部队进犯。伪军是骑兵，利用其行动迅速向我抗联部队猛追。而我军转山拐弯拉得敌人喘不上气来。乘敌人疲惫之际，利用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敌人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我抗联部队突然发起了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一战斗没用20分钟，除放哨的排长潘石锋等十几名伪军外，斋藤伪连长以下一百多人全部被歼。缴获轻机步枪百余支，战马百余匹。这次我抗日联军重大胜利，震惊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全军，也是靖安军成立以来最大的惨败。

四、轰动全伪军两个大事件

（一）饶河兵变事件

1939年12月住饶河县兴安镇伪靖安步兵第二团第五连士兵，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受我抗日军民的感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号召，伪军掉转枪口打日本鬼子等口号，于1939年

12月全连士兵(包括一个重机枪排)在班长祁××等人领导下，打伤连长荒谷上尉后率部反正，渡乌苏里江投奔苏联。伪靖安军出了这一轰动全东北地区兵变，给了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

（二）乌尔古力山事件[①]

1943年7—8月间，伪军事部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中将来富锦县东的乌尔古力山视察（此山内筑有对苏联的永久防御工事)。伪第七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第一师长山崎积等人陪同，乘的是第二团追击炮连的马匹。当行到山里阵地之前，伪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等人正欲下马之际，牵马勤务兵上前接马的瞬间，突然其中牵马兵×××举起手枪对准日酋楠本中将射击，随后又向伪大臣邢士廉射击。该着日酋楠本不死，子弹打在右兜的钢笔上没有打死，而对伪大臣邢士廉的射击，距离较远也没有打中。随行人员等一听枪声，吓得不知所措，一阵大乱。×××志士乘此之际利用地形向山下跑去，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已不见了开枪的人了。

伪大臣邢士廉、最高顾问楠本中将等人垂头丧气回到了“新京”。伪第一师长山崎下令全师出动搜捕，最终一无所获。

（三）伪靖安军移驻锦州

1943年伪靖安军（此时改为第一师）自从乌尔古力山事件之后，伪师长山崎、第二团长西岛四郎均被撤换。新换了师长平川哲一，又新设立了以关东军的生田中佐为首的顾问部，加强了对靖安军的控制。日寇为了对付我八路军，巩固其南大门，从富锦将伪靖安军全部调到了锦州，这时伪军的兵力达到了8000余人。

伪靖安军驻扎锦州，于1944年初，将第二团改为第三十七

---

① 又称五顶山事件。

团，编入铁石部队，开到冀东唐山一带，指向我冀东抗战的八路军。我冀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得敌人蒙头转向，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一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

驻在锦州的伪靖安军，在“八·一五”日寇投降前，其师司令部，骑兵团和炮兵团等被转移到佳木斯附近的勃利县等地驻防。留锦州的步兵只有一个团（第三十六团）未等来得及移动，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就投降了。伪靖安军全军溃散，结束了十几年的为日寇屠杀东北人民的罪恶历史。

我在伪靖安军的经历

金福山

靖安军的由来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用一个出身日军中队长的叫和田劲，当靖安游击队司令。上校参谋长宫本也是日军军官出身，另外还有一个顾问吉村。下属有上校团长翟锡龈，当时仅有 3 个连步兵、1 个山炮连、1 个骑兵连。第一连长朱广喜少校、第二连长张玉珊少校、第三连长刘牧蝉少校、山炮连长高文卓，骑兵连长的名字忘了。

以后增加兵员，都是招募来的，编成 3 个营、1 个骑兵团、1 个炮兵队。并于 1932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靖安军第一军。我是经介绍考入的，我任第四连三排少尉排长。当时的军长是上校石光宪一（日军少佐），参谋长为德留友宾中校（日军大尉），少校参谋西岛四郎（日军中尉），上尉副官中西作介（日军准尉），少校副官赵乾理（会日语），中尉副官于清淮（会日语）。团长还是翟锡龈，一营长姓朱、二营长姓张、三营长姓刘，一、四、

六、八、九连长及一、二、三机枪连长是日本人，迫击炮连长田宏图中尉。骑兵团长森上校（日军中佐），下有4个连，连、排长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炮兵队长吉村中校（日军少佐），山炮连长宋子伟中尉，下有4个排长，都是中国人。第二军长上校安部（日军少佐），第一营长少校孟昭起、第二营长少校竹本（日本人）、第三营长上尉毛凤武，各连情况我不清楚了。下面将我参加的历次讨伐情况记述如下：

1. 在本溪一带讨伐义勇军

1932年10月上旬，到本溪讨伐。当时出发的编成是由石光指挥的翟团，骑兵连任前方搜索，还有一个山炮连。经抚顺亲眼看到杀害中国人的平顶山惨案，第2天到救兵台。靖安骑兵连的一名骑兵，就被唐聚伍、李春润的部下宋营长的兵打死，当靖安军展开攻击后，宋营却踪影不见了，靖安军宿营救兵台。第3天到清沟城，宿营无情况。第4天到碱厂，当地驻有一个日军中队。到达碱厂的第2天，军部得到情报，命一营长率部去抓捕7个人。其中一名是本溪税捐分局长栾洛斌，说他是抗日军的参谋长，其他不详。当时是由少校副官赵乾理审讯，当他得知靖安军中有人反对杀害爱国志士，便向石光出谋划策，第二天下令翟团长率部去搜索，借此机会将7人全部杀害。赵乾理事后得意地说："回沈阳以后，看给我什么官吧!"果然在第7天回沈阳后，赵乾理晋级中校并任团长，原团长翟锡嘏调司令部任部附，朱、张、刘三个营长也升为中校，只是因张营长与赵乾理有矛盾，把张调司令部当副官处长，派日本人榊承芳少校（日军准尉出身）接任第二营长。

2. 凤城讨伐与藤井、美崎走马上任

第2次是1932年11月去凤城一带讨伐，由石光指挥赵乾

理团第三营，在盖平下车赴龙王庙。森上校[①] 率骑兵团外配刘牧蝉的三营，由海城下车到龙王庙会合。海城下车后的第1天宿营庄河县土城子，夜间被义勇军、红枪会约百余名围攻森上校的宿营地。森上校住在一个围有土墙的大院里，听说红枪会袭击来了，他不服地用战刀堵住门口，结果被刺死了。他的副官日本人中尉也被扎死在墙外粪堆上，他的骑兵第一连长是和森上校住一个院，跳墙逃跑时被扎了一枪头。两个连被打散了，刘牧蝉营坚守未敢出击，以后红枪会就撤走了。第3天在十二神庄与石光军长会合了，石光才知道骑兵团遭袭击的情况。刘牧蝉当时嗓子都哑了。兵力全部集合后，开往龙王庙驻防，第二营留守，其余部队向各处扫荡。

就在这个时候，伪军政部认为靖安军的司令和参谋长军阶太低了，不适合要求，因此派来藤井重郎任少将司令（日军大佐出身）、参谋长美崎丈平上校（日军中佐）、副官处长仓本中校（日军少佐）、参谋处长山口中校（日军少佐）。这时候的和田司令已知自己快下野了，于是来到凤城第一线看看官兵。但藤井副司令非常厉害，也来到凤城，对和田根本看不起。我们于阴历腊月二十九日晚回到沈阳，我患重感冒，原想到沈阳后就回辽阳家中过春节，可军部下令正月初一行团拜礼，所以也没敢回原籍过年。

从凤城回来后，大约在1933年春，和田劲、宫本、吉村3人一同辞职了，以后就是藤井说了算。但吉村为了承包图佳铁路，去当包工头子，因非常苛刻，被工人打死了。吉村在靖安军任顾问时，穿士兵衣服，靴子里插个马鞭子。无论官兵，不知什

---

① 森上校即森秀树，1930年8月升为日军骑兵大佐，1931年10月为靖安军游击队联队长。

么原因，就用鞭子抽打，所以靖安军的官兵们一见他来了，立刻全部散去，这小子最可恶！

3. 奉命缴械伪建国军与阜新讨伐

1933年春天，靖安军第二军也就是第二团，由安部率领去山海关攻击何柱国将军。与此同时，石光的部队去锦州缴械伪建国军。伪建国军原是经关东军许可成立并编成3个团，司令是王天相少将，他会日语。据说缴械是因为建国军在热河和兴安各地的军纪太坏。首先把王天相请到日本宪兵队，并把建国军的第三团用火车送到大凌桥，火车一停，靖安军将两头一堵，便开始缴了他们的武器。其余两个团在锦州车站被缴，当时建国军官兵随便散去。建国军山炮连长金玉崎和四名排长被靖安军炮兵队编入山炮一连。

缴械建国军完了，就去阜新讨伐。这时，藤井指挥的第二团也由山海关同石光部队会合了，也就是靖安军全部来了。除留守的之外全去阜新。途经半截塔打了一仗。义勇军在山上用石头堆成石头人，靖安军打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石头堆，消耗了大量军火。当晚在喇嘛营子宿营，当地蒙古族家家供奉铜佛，大大小小很多，被靖安军劫掠一空。第2天下午攻阜新城，城四角有炮台，义勇军贾司令[①] 驻守。当时石光指挥第一团和炮兵攻北门，第二团攻东门。贾司令一见敌众我寡，便命步兵先撤，骑兵掩护。先在炮台抵抗一阵，然后就撤退了，石光部较顺利地进城了。可是第二团却遇到了麻烦，东门外有个林子，红枪会就埋伏在林子里，二团二营长竹本正率部攻打东门时，红枪会突然从林子里冲出来，靖安军猝不及防，非常紧张。张排长用手枪射击，结果被红枪会扎死，还有不少士兵被扎死或被

① 贾司令即贾秉彝。

俘。被俘去的人大约有三十多名，剩下的狼狈地跑进城内。当晚，靖安军在阜新城内住下了，仅一团迫击炮连住城外烧锅（酿酒作坊）院内。

第2天（1933年4月9日）出去搜索，只留一团二营守城，也就是我所在的营。在南门发现挑煤的人很多，这正是派进城潜伏的红枪会。我们也没注意，他们进城后都躲藏在街面上关了门的小铺里，因为城里所有的买卖全关门了。出城搜索的靖安军沿途拾回靖安军的尸体32具，其中就有张排长。当时因给养不足，主要是弹药缺乏，于是和锦州日军联系，由他们把弹药送到半截塔，再由我们派部队去半截塔接收过来。我们取给养的部队正在北门集结中，忽听到迫击炮连发生炮声，墙障子也被硫磺点燃起火了，迫击炮连长田宏图受伤，勤务兵也被打死。日系排长伊藤伸出头探望，被红枪会扎下墙外。这时，红枪会、义勇军四面包围，开始发动袭击了。原准备出发取给养的部队当即解散各回原防地，我连被派到司令部守卫。后来又将一排派去攻南门，二排去攻东门，仅留下我当排长的三排守卫司令部。

因为阜新城的土壕外全是住户，多为平房，义勇军便于掩护，伤亡少。而靖安军射击训练不良，胡乱打枪，尤其轻重机枪打得过多，到午前10时左右，弹药就更显得不足了。在双方战斗中，靖安军一团三连长受伤，八连的王成山排长被打死，我连一排士兵张向洪被打死。一位义勇军连长牺牲在南门。另外，当城外发起攻击同时，潜伏在城内的红枪会把靖安军九连一个兵正在往门板里挤进时，扎了这个伪军七八枪头子。不幸的是，榊承芳营长在房顶上把这位红枪会战士开枪打死了，当时躺在地上，衣服还烧起来了，可能是身上带有烧攻我们工事的硫磺子弹。到11时左右，义勇军撤走了。我们这才敢出来搜索，发

现南门外在泥坑里死了一匹战马，还有一位义勇军战士，是山炮打死的。西门外六连前，红枪会牺牲有七八名，还有一面八卦旗，这几位抗日烈士是被轻机枪扫射而死的。这次围攻阜新城的义勇军是由贾司令、英司令、田司令[①]、苑九占等人率部进行的。靖安军因无弹药的关系，藤井和美崎研究后，请出当地士绅，姓名忘记了，只知他当过县长；还有公安局长，外号叫什么大马棒，他们率骑着几十匹马的马队进入阜新城，使靖安军得以脱身，逃出阜新城，全军回沈阳了。

4. 辉南讨伐与刀劈吉田

1933年7月，正是沈阳小河沿荷花盛开的时候，石光率一团，还有骑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连，军官有团长赵乾理和朱广喜、刘牧蝉、榊承芳三个营长，去辉南县讨伐。十多辆大车除装载给养外，还有两辆大车上载着约十名妓女。正是伏天，无论日本人、中国人，大多数官兵都患痢疾，泻肚不止。在这种情况下，暂时没有出去讨伐。

到辉南的第3天，我所在的第四连连长佟野利厚上尉（日准尉出身）、第一排排长吉田中尉每天都打士兵耳光，一排的轻机枪班长、上等兵杨雨芝，对吉田非常愤恨。他对我们说："早晚给他放上！"当时我们"将"（即用语言激对方）他，杨雨芝起誓说："你们看着吧！"。听说在阜新时，三个轻机枪班长就有意起义拉出去，这三个人是杨雨芝、方成之，另一个名字我忘了。但二排长王崇山向他们说："热河地区你们拉不起来，出去也得被兵力多的给吃了。"后来他们也就算了。去辉南时，每个士兵身上都带有一个罐头，排长吉田宽三令五申不经他许可，绝对不许吃。头一天到辉南，吉田一检查，发现士兵们都给吃了。吉

① 英司令为英若愚，田司令为田霖。

田就大发雷霆，开始打士兵的耳光，天天为此事发怒。于第3天夜，吉田喝了两瓶啤酒后，就睡在杨雨芝屋内的炕上，其余三个步机班住在对面屋内。这天白天杨雨芝就和本班士兵研究好了，因为辉南城四周都是沟，他们为举事后出走方便，就先在城西南角搭上了木板桥。吉田因喝酒关系早就睡了，到深夜12时许，杨雨芝把本班兵部署好，由士兵李起看着东屋三个班，外边一名士兵放哨。杨雨芝亲自用吉田的战刀劈死吉田，头一刀吉田哼了一声，便死过去了，又朝吉田头部砍了几刀。然后把刀插在鞘里，手持匣枪逼走三个班，由西南角木板桥出走了。

这时，吉田的勤务兵被吉田的血冲醒了，跳过墙就是连部，他慌忙去报告。当时团长佟野利厚正在闹泻肚，猫在柜台里哆嗦，听后急忙报告营、团、军部。接着下令全体集合。我的任务是看护部队行李，但这时我正在税务局里打牌呢，闻知发生了情况，我忙跳过了三四道障子（木板或木杆院墙）跑到放部队行李处。一看我手下的三排士兵没走。我这才去连部，又到吉田被砍死的地方，当时石光正在屋中。这时杨雨芝已经跑出有五六里地，他把农户的柴垛点燃。这样靖安军就不知往哪追了。天明后，第五连发现了高粱地里有3名士兵，他们是打算单独溜出来当胡子（土匪）去发财的。一名是李起，还有一个姓李和姓胡的。五连长吴国士骗他们说：“保证你们没事。”3人就信了，结果被抓了回去。

因靖安军官兵都患痢疾，军部决定回沈阳了。当晚命我监督将吉田死尸炼了，榊承芳营长用会日语的四连准尉高明山当翻译，向我说：“这有吉田老婆的肚脐一个，和他老婆的头发一绺。是他老婆出生时剪下来晒干，出嫁时带到吉田家的，头发是头顶中央的，吉田一直珍藏身边。你先保存好，一会儿有用处。”

我们先挖好一个坑，铺上一块铁板，堆放约一尺厚的劈柴，再将吉田尸体放在劈柴上。这时，榊营长来了，向我要刚才交给我的吉田老婆的“肚脐”和头发。可是，在坑没挖好前就叫我给弄丢了，榊承芳一下就火了，问我“肚脐”哪边去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我没看见，他也没办法。然后在尸体上浇汽油点火炼了，炼后用一把新筷子将骨灰拣入匣中，由吉田的勤务兵捧着出发了。过辉发河时，命令四连暂停在河北岸，这是怕我们起义。在河南岸枪杀了李起等3名哗变士兵，然后才行军回沈阳。

辉南讨伐以后，石光辞职不干了，这是因为他与参谋长美崎不和，加上靖安军取消了第一军的番号，下属直接是步一团、步二团、骑兵团和炮兵队，没有了军长职衔，石光再干就是与赵乾理、刘牧蝉一样级别，相当于团长了。赵乾理以后调到伪治安部当副官股股长，刘牧蝉上高等研究班，因此步一团仅有一营长朱广喜、二营长榊承芳，三营取消了。不久，步一团团长由参谋长美崎丈平兼任。

从辉南讨伐回沈阳后，美崎把凡是出身日军上等兵当伪军连长的、准备当连长的、日军上士当伪军少校的，约30名都派到伪兴安军（以后兴安师）充骨干，连排长多是这次靖安军精减下来的。

5. 伪新京大演习与宁安、东宁讨伐抗联

1934年10月1日要在新京（长春）举行大演习，溥仪还要亲自阅兵。演习为蓝、白军对抗，白军是伪满军第三教导队，由中央训练处长应则礼中将指挥；蓝军为靖安军，由藤井司令指挥。老天不作美，深秋季节下开雨了，双方官兵和检阅的日伪高官们都感到太冷了，到夜间就中途停止了。第2天，伪康德皇帝溥仪亲自阅兵，检阅总指挥是于芷山上将。检阅完了，在长

春公园皇帝赐宴立餐，谁也不许坐着。伪总理大臣郑孝胥、高级文官、在京武官和参加演习的司令部人员，每人每份饭菜四盒，是用“暴马子”（东北山区一种树）作成的盒。外有“御酒”两瓶，还有两盒月饼，每人四块，月饼上有“振武”二字。吃不完可以拿走，外包黄包皮两个。

立餐没开始前，中央公园正北面南搭个台子，台上用席子棚着，右旁侧放一桌。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先于溥仪到达，他乘坐汽车，两边各一“电驴子”（摩托车）护卫。伪皇帝也是前后左右“电驴子”护卫而来，溥仪到时奏伪满国歌。溥仪就说了一句话：今天天气很好。然后由翻译向菱刈隆说了，菱刈隆点点头。他们就座后开始就餐，就餐时可以随便谈话，我吃饭的这排桌子两边对立。最北头正是郑孝胥，身穿蓝缎子夹袍，头戴一顶清朝红顶官帽。溥仪身后一直站着伪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上将。大约吃了40分钟后，溥仪、菱刈隆都走了，在场的文武伪官们就随便了，宴散后满街是手提黄包皮的“文官武将”，各自归家或旅馆。

大演习完了，步一团由美崎指挥两个营，还有骑兵，去宁安讨伐抗联周保中将军，及“平南洋”李荆璞、张祥，还有“双山”的八大队。藤井司令则指挥步二团，还有炮兵、骑兵去东宁讨伐抗日军“李三侠”、“刘三侠”。抗联将士称藤井是“运输大队长”。步一团到宁安实行分散配备，团部设在宁安东大磨，一营在砂拉镇（松岚镇）卢家屯，二营在油房一带。“双山”的八大队投降了，发给证书遣散回家，给“双山”在砂拉镇娶个媳妇。张祥在南湖头被伪靖安军骑兵孟排长杀害。

在卧龙屯南横道河子战斗中伪靖安军一连二排长石川烈被打死，还有宋上士受伤，两腿折了，还有三四个兵受伤。石川烈原二连排长，因一连兵员不足，仅编两个排，即一、三排，第

二排官兵都是由留守沈阳的二连抽调来宁安讨伐的。我因患眼疾在大演习完了，回沈阳留守没去宁安。这次因为石川烈死了，来电叫我去补充。1934年12月末，我到宁安，第二天就是元旦，第三天到卢家屯任二排排长。排里有步枪班长苏德顺中士，他非常仇恨一连长笹鹿隆一，笹鹿隆一精通中国话，是上海同济学院毕业。苏德顺与周保中将军领导的抗联有联系。

当时第一排长都外×中尉（日本人）因患肺病回沈阳了，所以把第二连的排长王九龄中尉调来一连，因他与二排都是二连的，就叫他任二排长，我调任一排长。三排长王鸿祥因有事被笹鹿派回了沈阳，三排长暂由上士刘子超代，连部驻原警察署院内。二排在东街，一排在南街大院内。不久，部队要开回沈阳。

就在回沈阳前三天，将天黑时，笹鹿整理枪械、被服、报表，又一边伏在连部桌子上写字，一边与旁边的伪警察署长谈话。这时，苏德顺班长持枪来到连部，他对门岗说："你去后院，给我找×××，我替你站一会儿。"哨兵走后，苏德顺就在窗外一枪击中笹鹿头部，将其打死。当天特别黑，听说"平南洋"率部来接他。当时连部医官任重英中尉、宋元生准尉、刘子超上士正在我排玩呢，听电话说："连长被打死了！"我马上带一排到了连部，才知道苏德顺干的。当时王九龄排长也到了，他立刻带兵去追苏班长，但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我们当时往团部打电话，团长在外带便衣活动，第2天派西岛少校来卢家屯，叫我们把笹鹿炼了，提前回宁安东火磨团部，又过了两天全团回沈阳了。

6. 美崎率部参加东边道讨伐

1935年春，靖安步一团从宁安回来整训，到暑假期间，因为东边道杨靖宇将军指挥的抗联军声势特别浩大，美崎率二、五

连编成美崎游击队去讨伐。美崎这次讨伐和抗联几次交战。传来情报说，把杨靖宇将军部下的程司令打落马了。这程司令叫程斌，后来在1938年终于叛逆了杨靖宇将军，投降了日本宪兵队，后编为警察队，约有一营兵力，命名为程斌队。我在热河讨伐时见过他，程斌矮个，他的队员大多数是原抗联的人。授给程斌伪满警正阶级。

7. 东宁讨伐抗日军“李三侠”

1935年秋天，因藤井指挥的步二团在东宁失败，抗联称他为“输送大队长”。美崎不服，又指挥步一团和一部骑兵去换二团防。这时美崎不再兼任步一团团长。由伪满军第三教导队教官赤泽三六上校任靖安军一团长。他原为日军少佐大队长，相当营长。在上海与我国军队作战时，他所在的大队仅剩下7个人。当他派自己勤务兵去联络救援时，一动身就被打死了。他把勤务员的钢盔保存起来，并在家中每天上香。赤泽团长脾气特别暴躁。对于连长以下的好动手打，甚至连团副西岛少校都被他用瓶子打过。在靖安一团中，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怕他。

9月，到东宁换防，我当时是中尉团旗官，以后调四连任二排长。二营长换上奥田（日军大尉、中队长），他率二营所部四、五、六连，二机枪连驻小乌蛇沟日军兵营。这兵营是日军新建的，完全是木造的房子。我们靖安军去后，日军就走了。以后五连房舍失火，烧掉一部分房子，司令部和团部又都移到了小乌蛇沟。赤泽团长命令二营长奥田出发讨伐，命令是这样下的：没有效果不要回来！奥田就驻在小乌蛇沟附近村落，不敢回去见赤泽。后由团副西岛少校从中说合，奥田才回来的。

有一天，来了十余名抗联军人归降，他们说是因为日伪军太多了，山中生活实难维持，才走这条路。赤泽把他们送到东

宁县，为了瓦解抗联军心，由民政方面发给路费、身份证，放回家去了。就在这时，靖安军骑兵某班长去沟里搜索，遇见了“李三侠”司令，这个伪班长并不知是“李三侠”，只见他从百姓家出来往后山上时，这个伪班长一射击就命中了，“李三侠”牺牲了。一打听才知道是“李三侠”，他没带多少抗联战士，所以也没对抗。伪班长走近看李司令穿的花缎面皮袄，手持双匣枪，他便把皮袄和枪拿回交到司令部。藤井和美崎已由小鸟蛇沟回东宁去了，一听说打死了李司令，又二次去取李司令的头，拿到东宁县城叫认识的去看，都说正是李司令。美崎用四方木柱子大书“匪魁李三侠首级”，立在小火车站北头示众。

我在伪靖安军中所见

金琦

我于1936年春考入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候补生第5期，分配到第五军管区第五教导队候补生连，地址热河省滦平县北兵营。第五教导队队长是陆军少将朱家训，军官候补生连长陆军特种兵中校宪基。受训期间4个月，于该年9月底结业后，直接升入沈阳东山嘴子陆军训练学校。1937年10月1日毕业，同时我分配到第五军管区锦州地区司令部所属步兵第五旅步兵第三十二团第二营第四连见习，地点东关双岔子兵营。1938年1月1日任陆军步兵少尉，同时调任靖安军步兵第一团第二营第五连少尉排长，该部队当时在华北宣化编入热河支队。1938年7月间，靖安军全军移防到东北三江省地区富锦县、同江县一带。到达富锦以后，第一团第二营驻在同江县二龙山，团部第一营驻同江

县城内，司令部、骑兵团、炮兵团驻富锦城。

1938年冬季，靖安步兵第一团对同江县内街津口以东青龙山地区的抗日部队刘远来部进行讨伐。但对方情报消息特别准确，在第一团由同江县出动之前，刘远来率部早已离去。

1939年冬，步兵第一团主力又向三江省抚远县扫荡，这次出动我因患病在同江县留守。

1940年春，我在同江县兵营训练新兵，但第五连一个排饭岛中尉调驻卧尔狐狸山要塞任要塞警备工作。在同年秋，第五连主力也调驻要塞警备，卧尔狐狸山周围35公里处主要塞山头都有大小碉堡，该要塞修筑主要目的防止苏联进攻。

修这个要塞的工人大部分是由辽西、辽北一带征来的，每天夜间睡觉时都按班把穿的衣服捆在一起，防止工人逃跑。工人住在山坡上盖的席棚内，冬天虽有火也相当冷，夏天小咬和蚊子等叮咬更令人难受。在工人住地席棚周围用铁丝网圈上，只留一个出入门。另外在夜间由我连派一个班警戒，防止工人逃跑。工人上班后，班撤回。工人多数害眼病，还有少数失明，经常有死亡的，如有逃跑的抓回来处死。

有一次辽西绥中县有两名工人夜里逃跑，在富锦县境被抓回放在五连看押；有一名是曾在谢文东部当过连长，家有老母和妻子；另一名是个木匠，在要劳工之际，要的是他胞弟。因他弟弟正要准备结婚，哥哥不忍让弟弟去当劳工，哥哥顶替弟弟去当了劳工。据此情况听后实令人同情。全连官兵几次催促饭岛中尉去“扶桑社”（扶桑社是要塞指挥部代号）向浜冈少佐请求释放两名劳工，但都未能如愿。后将2名逃跑工人枪杀于卧尔狐狸山里。枪杀两名工人时是由富锦日本宪兵队派来一名中士曹长监督，饭岛中尉带队用排枪打死的。饭岛命令士兵打，可谁也不打，饭岛中尉自己把两名工人枪毙了。

1941年卧尔狐狸山要塞警备任务交与第一团第一机关枪连接任。我连下山在五顶山兵营训练新兵。

1942年第一团与第二团换防，第一团回富锦兵营，第二团接卧尔狐狸山要塞及同江防地。

1941年靖安军改称为第一师，靖安步兵第一团改称为步兵第二十六团，靖安步兵第二团改称步兵第三十七团。司令部及所有4个团总兵力约8 000名。第一师师长陆军少将美崎丈平，参谋长陆军步兵上校王维藩。司令部下设六个处，参谋处长陆军骑兵上校宪基、副官处长陆军中校张玉龙、军需处长渡部中校、军械处长陆军少将金铎，军医处长和兽医处长都是日本人，名不记得了。

1943年我任第二十六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在富锦城东街兵营训练新兵。1944年夏季第一师全师移防锦州市东大营、南大营。于该年6月间，我调到步兵第三十七团三营当副官，调后不到两个月，第三十七团编入铁石部队步兵旅。我又调任该团第二营副官。铁石部队编成后不久，便进驻唐山地区，步兵旅进驻滦县野鸡坨，步兵第三十七团（也称内村部队）进驻滦县杨店子镇。铁石部队兵力有1万人。除这两个旅外还有直属部队：铁华队、铁波队、铁血队、铁轮队等。铁石部队司令部驻唐山，部队长是日本人陆军少将，顾问是第六军管区主任顾问陆军大佐，步兵旅长陆军少将薮野，步兵第二十六团团长陆军上校刘德溥，第三十七团团长内村柳太郎中校。

热河支队编成后，队长由靖安军司令藤井少将任之。编入的部队有靖安步一团，炮兵队及司令部直属部队，第五教导队步五团、汽车队、通信队等。第五教导队司令朱家训少将及其司令部也被编入热河支队。该部队由承德编成后，第1次与西北军高桂滋部在热河黑鞑营子被对方奇袭。因伪军官兵素无实战

经验，对方部队抗日杀敌士气高昂，对方在冲锋时，手持大刀片杀声震天，伪满军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战斗。全团官兵见情况不妙，有的擅自退却，对方乘胜追击。因此步五团特别是第二营伤亡情况严重，第二营残余及营长张正被俘。第五教导队长朱家训少将因留着短胡，被误认为日本人，对方士兵们追上他后，用大刀片砍的头。

痛歼邵本良

王传圣*

提起邵本良，南满人民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

邵本良原来是一个胡子头，干了二十多年土匪，还做过东北军的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鬼子看他是个忠实的奴才，不久就封他做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他诡计多端，比日本鬼子还棘手。日本鬼子虽然枪好、炮多，有“武士道精神”，但打山地游击战不行。我们瞧了个机会狠狠地揍他一顿，往原始大森林里一钻，他就找不着了。邵本良可不同，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的兵多是土匪出身，每人一把刀，一进林子就砍路标，怎么转，也迷不了方向，终能找到路。冬天下了雪，我们跟日本鬼子打完仗，钻进林子，把雪地上的脚印一扫，鬼子就跟踪不上了。可是，这办法迷不住邵本良。就是把脚印扫掉，他还会找上来。所以，抗

* 本文原载《星火燎原》(四)，收录本书时作了文字的修改。王传圣曾任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抗联一军少年铁血队指导员。

日联军第一军和他磨了3年多，才最后把他消灭掉。

我是1935年春天参军的。这年8月，杨司令下了决心，要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七团。部队都调动好了，正要开始向柳河进攻，邵本良发觉了，赶快从三源浦往柳河增兵。杨司令改变计划。暂不攻城，将部队西撤。两天后，敌人从县城跟踪过来，敌我双方在一条山岗上打了一仗，敌不支而退回。我军来到柳河县黑石头地方。邵本良伪军又跟踪而来。杨靖宇下令在黑石头沟里设下埋伏。把敌人放进我军埋伏圈，打他个措手不及。邵本良只顾跟踪追赶，没考虑到这步棋，他的二百多人，就这样在黑石头被歼灭了。这一次，使邵本良大伤脑筋。日本鬼子刚发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几挺机关枪，全都装备了我们。据说日本"指导官"知道了这事，大骂邵本良是混蛋。

更使邵本良伤脑筋的事，是在这年9月。

一天，杨司令得到情报，邵本良伪军第7团要从柳河县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领一个连护送。杨司令决定在他们必经之路——金川县境内朝阳沟设伏截车。结果，几十辆大车全部被截下，押车的一连伪军也被歼灭。连邵本良的小老婆也当了俘虏。只是那个刘副官穿着伪兵服装，和尖兵一起走在最前面，算是侥幸跑掉了。不过，在以后不久我军歼灭邵本良伪军团部的一次战斗中，又把他抓住了。

1936年2月，我们去袭击驻热水河子邵本良团部。教导一团组织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手枪队，军部和机枪班配合行动。按照我们的内线关系——邵本良的马夫提供的情况，我们于半夜1点多钟，首先摸进中心炮楼，控制了全街；接着过路南，闯进伪军团部。只见团部屋里吊着保险灯，照得通亮；南北炕上睡着六七十个伪军士兵，就有几支枪。我们问他们，谁也不回答。我们几个小战士吓唬他们："不说拉出去枪毙！"果真我们

拉出去一个伪兵，打了两枪，吓得他们赶紧说真话："刘副官在屋里，谁也不敢讲，枪全在枕头底下。"再问哪个是刘副官，一个伪兵说："弓着腰，高个子，长脸大下巴，戴眼镜。你们可不能放他，从朝阳沟回来，我们每人挨了他40军棍。"我们进屋后，看到确实有个大高个子，穿的是不大合体的伪兵服。我们把他绑起来，审问结果，他承认是刘副官。我们把枕头底下的枪全都缴了，还在后院抓住了这个团的副团长，并且缴得了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只是因为邵本良去通化开会，才拣了一条命。

我军又撤回到河里地区密营。这里四面都是望不到边的森林，是一个休整练兵的理想地方。这时积雪开始融化，大地已经转暖。3月10日那天，杨司令把我找去，对我说："小王，你到通化去一趟好吗？"

听说让我去通化，心里很高兴。我问杨司令："是去买东西吗？"

"不，你去找王德裕同志，看看他又得到了什么新的情报。"

杨司令又嘱咐了一些话，给了10块伪币，我就起身了。

王德裕同志，原是人民革命军的一个指导员，在通化一个中学里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赶到通化城西门外，在一个小店里和他接上了头。关于邵本良内部的情况，大都是他供给的。他是通过邵本良第七团四连连长的关系得到的。那个连长，也是我们的内线关系。

第2天，王德裕同志和我见面，那个连长也来了。他告诉我：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议回来，很快就要发动进攻。他说，他已对日本三毛司令夸下海口，说要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他一个迫击炮连，派飞机配合行动，还调动了许多股伪军归他指挥。

我一听这情况，感到好严重！可是又一想这几年和邵本良

的斗争，又好笑。邵本良这个走狗，真是自找死路。

在通化城里我没敢久停，星夜赶回部队。见了杨司令把情况一说，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邵本良胃口倒不小。小王，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对，要狠狠地揍他一顿！"杨司令握握拳头，又说："不光是揍他一顿，要揍得他再也爬不起来。"

军党委连夜开会。首长们围着地图，一会高声讲，一会轻声说，一会又都静悄悄。我们这些做警卫员的，也都暗暗嘀咕：这一次邵本良不知又要在何时何地挨棍子了。

第2天，整个部队紧张起来，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演习爬大山。交通员像小燕似的，飞来飞去。

4月初，我军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崴子，歼灭了奉天骑兵教导团一部后，邵本良的主力全部跟了上来。我们一些同志都嘀咕说："看样子，这回要和邵本良来个大决战了。"谁想，敌人刚靠上来，我们就转移了。

走了一夜，又走一夜，不住脚地紧走。同志们有些想不开了：怎么老走不打呢？这天出发之前，军部的徐处长讲话说："同志们，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的第一师，吃掉我们的军部，而后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区的二师，桓仁、本溪地区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定，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关东军南满少将司令三毛，见我军只走不打，便调集了一个旅和两个团，向我在老秃顶子地区的一师进行包围。目的是想叫我们去救援，在那里和我们决战。

杨司令率部，真的按三毛的计划转头北上了。不顾连日的

倾盆大雨，急向老秃顶子开进。敌人发现我军“上了圈套”，从背后猛追，还派飞机“送行”。岂不知，我们只是绕老秃顶子悄悄地转了一个圈。就在这次佯动中，一师也从老秃顶子跳了出来。

军部和一师队伍在宽甸县境内的佛爷沟门汇合后，首长们整天开会，部队又开始准备干粮。休息了几天，又开始行动。今晚向南走25公里，明晚又向北走30公里。那些天，连我们也走迷糊了，怎么搞的？真的叫敌人包围了吗？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是不是走不出去了？敌人的报纸上也这样登着：“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我们又向西行进，有时一天行程百余里。住下没等吃饱饭，邵本良就从背后赶到，又开始走。一路上，不断地丢些衣物、饭菜，借了老乡家的碗筷之类的东西，有时也来不及送还，只留下个纸条：“老乡们，情况紧张，所借之物，无暇奉还，请你们自己认领吧！”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故意制造的假象。敌人竟信以为真了，报纸上天天登：说我们“溃不成军”、“末日来临”。邵本良更是争功心切，带着他的部队穷追不舍。

4月末，我军来到了本溪以东赛马集山区。拂晓时，杨司令集合部队讲话：“同志们，咱们走了近20天，不走了。大家说不走该干什么？”

“打！”同志们几乎是同声喊着。

“对！打。”杨司令微笑着说，“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大不打。现在的情况，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歼灭邵本良”、“痛歼老走狗”的口号声，在队伍里呼喊。看地形、修工事、擦枪磨刀，在梨树甸子沟里布成了口袋阵。万事准备齐全，只待敌人到来。

第2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率领着一个先头营，疲惫不堪地赶到了。一进伏击圈，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就“欢迎”开了。一师三团马上扎上口袋口，断敌退路。邵本良伪军只得拚命往沟里冲，又迎头被一师六团的机枪打了回来。教导一团及一师少年营拦腰将敌人斩成几段，我们集中火力打，他们死伤惨重。最后，我们端着刺刀杀下去，“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震撼山谷。坚守北面制高点的我少年营的一个排长，见山下打得紧，忍不住了，留下一个班守山头，带领两个班冲下山去抓虏。邵本良趁此机会拚死攻下了制高点，带着20多人逃跑了。但是他的脚后跟却被子弹打中，受了伤。日本顾问英俊则是躺在死尸堆里装死而得逃脱的。这次战斗共打了近4个小时，歼灭了邵本良的一个营，还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

邵本良回沈阳治好脚伤，又带着日本主子发给他的8挺机枪，一团人三个月的军饷和夏季的服装等给养，准备于8月初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将军又在他必经之地四道江设下了埋伏。我们的一部分伏兵就隐藏在老乡的黄瓜地里，等着邵本良的几十辆大车给养队的到来。这次邵本良由20多骑兵保护着，跟尖兵在一起走。因为大车还没有进入伏击区，眼睁睁把邵本良放过去了，大车只进来10余辆，有的伪军就跳下车，到黄瓜地里摘黄瓜。他们差一点碰到我们架在黄瓜架下的枪口上，我们只好提前开火了。后边的大车见势不妙，掉头跑回去了。邵本良听见枪响，跑进一户朝鲜族人家抢件衣服换上，扔了战马就跑。恰巧被我军一个连长的小警卫员发现了，他拎着十三响的橹子就

在后边追，边追边喊“站住！”追出一里多路，十三颗子弹打光了，还是没有追上邵本良。日本顾问英俊又想用老办法混过去，被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大家一阵乱枪，将其击毙。

邵本良虽然又逃跑了，但是他却已经完全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据传说，日本人这次对邵本良大发雷霆，责问邵本良：为什么杨靖宇专门打你？还大骂邵本良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从此以后，邵本良这个臭名字，在我们作战对象中，再也不出现了。

内蒙自治军始末

正珠尔扎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向我东北发动侵略的同时，由关东军策划，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一带成立内蒙自治军。内蒙自治军成立后曾多次配合日军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给东北和东部内蒙古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和我的哥哥甘珠尔扎布曾参与策划内蒙自治军成立的活动，现对内蒙自治军的始末作一概述。

我和我的哥哥甘珠尔扎布，早在日本留学时即已同日本的极右团体（如黑龙会、大化会、爱之王园社等）以及日本军政要人（如山本条太郎、畑俊六、松井石根、本文尔官、闲院宫等和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少壮将校），有密切来往。

1927年和1928年我和我哥哥相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步兵科和炮兵科。回到旅大后，便开始了策划蒙古“独立”的秘密活动。多次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我早

在日本留学时即与其熟悉。畑英当时是陆军省少将军务局长。我和他的长子畑英一是同期生)、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和以后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人接洽，要求日本帮助我们组织蒙古军队，实现所谓蒙古"独立"。畑英等很赞赏我们的"宏图"，他说："蒙古民族和日本大和民族是同种，是兄弟般关系，应该携起手来，你们的父亲巴布扎布将军生前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致力于蒙古的独立事业，你们应当继承父志，好好努力。"关东军部设宴招待了我们。通过几次接触，我们和关系军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些参谋如花谷等都成了密友。

在与关东军接洽的同时，我们一方面联络蒙古土匪天红(名金昌，苏鲁克旗人，有 一百多名胡匪)，一方面联络蒙古各地要人，动员图什业图旗王爷叶喜海顺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甘珠尔扎布与叶喜海顺是亲戚。叶喜海顺的妻子是肃亲王的妹妹)。天红来大连住了些日子，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后来甘珠尔扎布还带着妻子(满清肃亲王第十四和硕公主、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汉名金璧辉)到了西科中旗(图什业图旗)王府，秘密训练王府的军队。

我由于幼小离开蒙古，不熟悉蒙古的情况，就利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特务组织——郑家屯"满铁公所"，研究蒙古事情。同时联络拉拢内蒙古有势力的人物，如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巴丹、阿鲁科尔沁王坦丕赉、温都尔王阳仓扎布、爱根庙沙布冷喇嘛等。当时，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团和铁道守备队，很需要组织伪军汉奸部队为之效劳。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部连夜由旅顺移驻奉天(沈阳)"东洋拓殖会社"办公大楼。我和我的哥哥立即跑到奉天住在"满铁"附属的万国旅社，开始了建立"内蒙自治军"的公开活动。一面召集滕续文(哈丰阿)等蒙旗师范学生

和其他青年研究，一面到关东军部面见本庄繁司令官、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参谋等要求枪炮子弹，板垣参谋问了我们的计划后，答应给我们步枪3 000支（东北兵工厂制造的七九大盖）、子弹20万发。

在万国旅社，甘珠尔扎布与滕续文、张洪俊、韩凤林、李友桐（阿思根）等30多名蒙古青年开会，商定成立“蒙古独立军”（后改为“内蒙自治军”）。派人联络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科左中旗协理韩色旺。他俩答应只要有武器就参加“蒙古独立军”。又派苏鲁克旗人宋福山联络盘踞在通辽一带的胡匪天红、高山，也得到赞同。

“蒙古独立军”成立后，司令部的人员如下：

司令：甘珠尔扎布

参谋长：萨嘎拉扎布（郑凤翔），巴林右旗人，日本“满铁”育成学校毕业。

秘书长：滕续文，科左中旗人，蒙旗师范学校学生。

副官长：朝凤翔，科左中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除此以外，还设置了宣传、军械等八大处。我担任了最重要的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关东军部还给我们司令部派来一名日本顾问，名叫和田劲，是退伍的中尉、浪人，曾在奉天从事特务活动。

当时我们的计划是：由科左后旗经科左中旗占领通辽县，再往北经高力板、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腰勒吉山会合郭道甫的部队，以后再商议下一步行动。

甘珠尔扎布从关东军那里得到了武器，但在内蒙古没有他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只有在奉天集合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因而无法领运武器。此时，包善一在本旗有200人左右的军队，韩色旺在旗下招募了土匪约200来人，天红、高山等都有土匪200

来人。还有一些甘珠尔扎布的远亲也应召入伍。

我们与关东军联络好以后，计划把武器由奉天经四平、郑家屯运到大蒿子包善一家。但这时蒙旗各地土匪横行，由火车运武器是件冒险的事情。不久关东军把3 000支步枪和20万发子弹运到平齐线一棵树车站。这是离包善一家最近的一个小站，人烟稀少，卸武器比较方便。一天夜间，由甘珠尔扎布亲自指挥包善一的军队和学生队，用包善一强征来的车马，把武器全部安全地运到了大蒿子。在这里把枪的子弹分给了包善一、韩色旺、天红等部队（分配数忘记）。以后，日本顾问和田劲携若干箱手榴弹也来到了大蒿子。但是，包善一在分得多数武器后却不积极活动，为此我们和他争论了一夜，和田劲顾问兜里揣着手榴弹，准备万一包善一不答应就炸死他，最后包善一勉强答应了一起行动。

包善一不肯痛痛快快地参加"蒙古独立军"的原因是：一怕日本撤出东北，二怕中央来人（据说中央已派来了高专员），三怕丢了自己的庞大财产。因而脚踩两只船，想对日本、中央两面讨好。为了使包善一安心，甘珠尔扎布想办法把包善一全家搬到大连安全的地方去居住。这样包善一才勉勉强强地开始行动。后来看到包善一仍然很消极，便又把总司令的位子让给他。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积极行动。韩色旺是包善一的亲戚，原来是个文人，是想跟着包善一找机会捞一把，根本没有什么"蒙古独立"的思想。

内蒙自治军成立后，其组织人员如下：

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　　包善一

第二军司令　　韩色旺

以上两军各有七八个团。实际兵力有二千多人。

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　　甘珠尔扎尔

第一、二军的团长有：高山、那钦双和尔、曹巴格都等。

炮兵队长为白云航（哈斯巴图尔），喀喇沁右旗人，俄国基辅军官学校毕业。

各军团都有蒙旗师范的学生担任相当于指导员的职务。

“内蒙自治军”号称一万，在科左后旗、科左中旗和通辽县一带活动。他们多数是临时招集的土匪流氓，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军风军纪，因而给那一带的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1931年10月中旬，第二军和第三军驻郑通线大林站一带，准备进攻通辽县城。当时驻防通辽县城的是奉天骑兵第三旅。我们进攻以前，派博彦满都带几名蒙旗学生潜入通辽县城与通辽县当局谈判，命其无条件开城，但没有成功。于是便决定攻城。进攻通辽的主力是第三军。甘珠尔扎布亲自率领高山的部队和学生队由西南闯进通辽县城；我领着十几个人由西攻入通辽县城；和田顾问领着十几个日军流氓，乘火车头开进了通辽车站；包善一部队的铁管带着五六十人插入通辽街中心，他们只顾抢东西和抢吃的，结果都被城里驻军打死了。守备通辽的三旅和民团开始反攻，我们互相联络不上，由拂晓打到中午，我们被迫退出县城，跑回大林站。

在进攻通辽县城的时候，包善一没有亲自参加，韩色旺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参加。

攻打通辽失败后，包善一、韩色旺只想扩充自己的势力，扩大地盘，发财致富。闭口不谈蒙古“独立”了。由于内部同床异梦，互相猜疑，终于使“内蒙自治军”趋于瓦解。

当时，和田顾问气愤地回奉天报告关东军说：“内蒙自治军完蛋了。都是些土匪，非讨伐不可！”和田从此再也不当顾问了。后来他在沈阳组织了伪靖安军。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去奉天关东军部见板垣参谋说明

"内蒙自治军"的实际情况和包善一、韩色旺二人的消极态度，并要求关东军部再援助大炮和军队防寒被服，以便重振旗鼓。于是板垣又派另一名特务、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曾在外蒙大库伦搞过间谍活动）当"内蒙自治军"的顾问。松井给我们带来大口径迫击炮二门和捷克制轻机关枪等武器。松井死后又陆续派来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本间诚少佐等人，当"内蒙自治军"顾问，形成了一个顾问团。这样关东军就把"内蒙自治军"完全掌握在手里了。

"内蒙自治军"第一军驻在科左后旗，第三军驻在科左中旗舍伯吐一带。在这期间，日军羽山支队攻占了通辽县城。当时莫力庙（通辽西30公里）活佛阿旺图巴丹也收集了一百多名喇嘛和当地俗人一起保护莫力庙。我到莫力庙，游说阿旺图巴丹参加"内蒙自治军"。他表示赞成，但不想动窝，不肯丢掉莫力庙和自己庞大的财产。于是就把他尊为"救国大师"。我当他名义上的参谋长。后来驻开鲁县的东北军崔兴武旅李守信、胡宝山等进攻舍伯吐，夺去"内蒙自治军"的迫击炮进而攻击莫力庙，把该庙抢得一干二净。"救国大师"从此垮台跑回了通辽。

甘司令计划把三个军团结起来北上会合郭道甫，但包、韩与甘珠尔扎布意见抵牾。这时，松井顾问主张进攻开鲁县城，甘珠尔扎布不同意这个主张而按兵不动。松井负责单独率第一军的部分士兵向开鲁前进，中途松井被民团打死。我又到关东军部向板垣报告情况。板垣一听大怒，说："顾问都打死了，你们还活着!"我把"内蒙自治军"内部矛盾和松井顾问不听意见单独行动的情况说明，并表明我们蒙古"独立"的主张是坚定的，我们计划先北上到兴安岭。目前不能攻开鲁，板垣也没说什么。

第二军里有一个青年团长名叫小喇嘛，为人蛮横，抢杀成性。第二军司令韩色旺也无法控制他。经沙嘎拉扎布等与关东

军特务部茂树阴谋设计，欺骗说要引他见关东军司令官，把小喇嘛等四五人杀害了。

“内蒙自治军”的内部矛盾，在攻击通辽失败后更加严重和深化了。第三军纪律较好，天红、高山所部尚能受约束，第一、第二军纪律松弛，形同土匪，在科左右旗、科左中旗、通辽县一带，盘踞了四五个月，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莫大的损失。“独立”活动，一事无成，给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使甘珠尔扎布兄弟俩无法收拾，便悄悄地离开了“内蒙自治军”。正在这个时候博彦满都等同日本特务菊竹稻穗(又名宝藏，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蒙古科毕业，当时是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召开了蒙古王公会议，决定了东部蒙古参加伪满洲国。

1932 年 3 月，满洲国成立，日军把残余的“内蒙自治军”改编为伪满洲国“兴安军”，任命扎赉特旗王爷巴特玛拉布坦为少将司令。

兴安军的建立和演变

拉喜德瓦

我是王爷庙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第 1 期学生，1936 年毕业，任本校中尉教官。1940 年底到日本留学，1941 年返回，被安排到昌图红顶山“满洲特第 868 部队”任代理连长、队附、连长等职。1943 年晋升为上尉，直至光复。这一时期，我同军内外要员经常来往，耳闻目睹之事较多，现将兴安军的建立演变过程忆述如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把满洲国军队划分为蒙古部队和汉人部队。兴安四个

省建立了由蒙古人组成的四个警备军。由于兴安四省的情况不同，所以，四个警备军的建立经过和内部成分也就不同。

一、兴安四省警备军的建立

兴安南省、西省警备军的建立：

利用被侵略国家的内部矛盾进行统治，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惯用手段。早在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曾策动巴布扎布搞所谓“内蒙古独立运动”，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又唆使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在所谓“继承亡父遗志”的旗号下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甘珠尔扎布既同日本极右团体黑龙会等有密切的来往，又同日本军部、关东军参谋部的军官秘密勾结，企图策划所谓“蒙古独立”。“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成立了“内蒙自治军”，其主要目的是勾结关东军，凭借其帮助组织军队。甘珠尔扎布自封为“蒙古独立军”总司令。但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一面拉拢科左后旗的统领包善一（额尔敦必力格），科左中旗的韩色旺；一面又与盘踞在通辽一带的土匪天红、高山等取得联系，诱使他们入伙。关东军司令部特意派来一名叫和田劲的日本顾问，关东军司令部还指定大特务甘粕正彦担当联系人。

1931年10月13日，甘珠尔扎布决定亲自率领他的第三军（实际上是土匪高山的队伍）500人配合其他各军，进攻通辽县城，结果被张学良东北军第三旅打败。

虽然“内蒙自治军”的建立归于失败，但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利用中国的内部矛盾来统治中国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他们从“内蒙自治军”的失败原因中得出结论，蒙古部队的领导权必须由蒙古王公里面有威望的人来掌握。于是，选中了哲里木盟扎赉特旗末代王爷巴特玛拉布坦，并在黑龙江省泰赉县城中和地

局召开会议，叫巴王爷出任兴安南警备军司令。

巴特玛拉布坦从20年代起拿出扎赉特旗管辖的三个地局的全年收入和自己准备盖新府邸的大部分款项，在齐齐哈尔建立了黑龙江省蒙旗师范学校（即日伪时期扎兰屯师道学校的前身），1929年正式开学。接着，他又考虑到小学教育不普及师范招生就成问题，同年他在自己王府的闲房子里又办了一所小学。"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各地土匪四起，社会很不安宁，巴特玛拉布坦在旗内整顿和加强了原有的保卫团、自卫团等民间保卫组织，亲自带队剿灭或打退了好几股土匪。

1932年9月，巴特玛拉布坦带领100多名官兵，到哲盟钱家店出任兴安南警备军少将司令。他就任后马上收编整顿了原"内蒙自治军"，编制成两个骑兵团和一个独立骑兵大队，又招收了六七十名青年学生编为少年队。司令部、少年队和一部分兵力驻扎在钱家店，其余两个团驻扎在通辽附近，把独立大队（后改骑兵第六团）派往王爷庙（现乌兰浩特）。

兴安南警备军顾问为金川耕作少佐，第一任参谋为粟野中校，第二任为那钦双和尔中校（后晋升上校）。

1933年春，日军侵占热河省，巴特玛拉布坦亲自带领两个团的兵力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占领了开鲁、天山（查布干庙）、林东、林西等地。在这次西征中，巴特玛拉布坦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收编了原热河省汤玉麟属下的李守信（蒙古族）和其他一些蒙古族官兵，并将其一部分编为兴安西警备军。在林西成立了警备军司令部，任乌古廷（蒙古族）上校为司令。同时，让李守信进驻多伦，协助德穆楚克栋鲁普搞自治活动。

兴安西警备军的第二任司令是郭宝山少将。兴安西警备军辖兴安骑兵第三团和第四团。

兴安东警备军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土匪嚣张，旧军阀的散兵游勇和地方土匪互相勾结，组成了各色各样的保卫团、自卫团等杂牌武装，占地为王，胡作非为。1932年兴安东分省成立时，把划归东分省的各旗县的地方武装收编为兴安东警备军，辖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山炮连，司令部和大部分兵力驻在博克图。兴安东警备军第一任司令朝罗巴特尔少将（达斡尔族，1934年晋升少将）；第二任司令为敖瑞平上校；军事顾问泉铁翁少佐；参谋长曾根崎中校。

兴安北警备军的建立：

1932年，兴安北警备军成立，乌尔金（蒙古族）上校（1934年晋升为少将，1939年晋升中将，1945年晋升上将。他是从苏联叛逃过来的布利亚特蒙古军的营长）为司令，日本人寺田利光中佐为顾问，福令上校为第一任参谋长，第二任为丹巴上校。这个警备军辖两个骑兵团，一个独立山炮连和一个国境警察大队（后改为兴安骑兵第九团）。

二、兴安军的发展及演变过程

1938年冬，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兴安四个警备军，设立了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原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中将为司令，同时撤销兴安西警备军司令部和兴安东警备军司令部，保留了兴安南警备军司令部（甘珠尔扎布少将为司令）和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乌尔金中将为司令），增设了兴安师司令部。与此同时，为了扩充蒙古部队（蒙古族和蒙古语言相近的其他少数民族为主），在钱家店原山炮连的基础上扩建成一个炮兵团，兴安军各团的迫击炮连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迫击炮团；原来兴安南省各旗县和兴安西省部分旗县建立起来的治安队，集中建成兴安骑兵第十一团。至此，原来的九个骑兵团和四个山炮团，变为十二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两个独立山炮

连和一个汽车队。为了加速同化蒙古人，便于日本人直接控制，兴安军的口令、公文、命令、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完全强制使用日本文字、日本语言。即使是蒙古人之间，也要用日语说话。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授课完全用日语。就这样，日本侵略者把对待朝鲜人民的同化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内蒙古。

1939年12月间，在沈阳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由当时的治安部最高顾问花谷少将主持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主要总结诺门罕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对兴安军采取的方针政策。参加会议的有关东军参谋人员和兴安军少校以上日系高级军官共30多人。另外还有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军事顾问泉铁翁中佐、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第一军管区参谋长、第三军管区参谋长（都是日本人）。1940年，撤销了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另设了第九军管区和第十军管区司令部。原兴安军管区司令巴特玛拉布坦中将提升为上将，后调任兴安局总裁。原兴安东省管辖地区驻屯部队和兴安北省管辖地区驻屯部队归第十军管区司令部统辖，司令部设在海拉尔。兴安南省和西省管辖地区驻屯部队归第九军管区司令部统辖，司令部设在通辽。1942年以后，第九、第十军管区各设一个飞行队，干部中日本人和蒙古人各半，士兵均为蒙古族人。与此同时，第二师（即兴安师）新设了一个步兵团。1942年使用满洲国统一番号，司令部和主要部队移驻王爷庙。士兵的来源仍然没有变动，不但兴安四省境内的蒙古族，其他省区的蒙古族壮丁也都补充到原兴安军各部队。

三、兴安军的作战情况

1936年末到1937年上半年，兴安骑兵第一、第二、第六团等集中组编成兴安支队，在兴安东警备军司令朝罗巴特尔少将的带领下，赴三江省宝清县参加了讨伐（就是镇压抗日联军的

讨伐行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兴安骑兵第五团经加强后，由独石口入关随日军作战，转战于大同、娘子关和雁门关一带，三个月后才撤回来。

1944年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刻，由兴安三、四、十一团为主，经加强后编成一个兴安支队（所谓铁石部队），开赴唐山地区，随日军参加了战斗。开始时日本人任支队长，后来换成了郭文通少将任支队长。

四、兴安军的兵源和干部培训情况

兴安军自组建后，一直被士兵来源问题所困扰。军队初建时收编胡匪、老兵痞和无业游民较多，平均年龄40岁左右。军官大多数是文盲。加之东北地区胡匪横行，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所以清理这些部队是一项最棘手的工作。为此，他们效仿日本的征兵制度，从1932年开始选择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地区先试行募兵制度，所招募的新兵补充到缺额的团、队，同时把有恶习或病残者逐步清理出去。从1932年以后每年招募一次兵。

1940年满洲国经过国势调查，在“全国”颁布了《国兵法》，从此结束了募兵制，并于当年开始征集第一批国兵入伍。不久又颁布了《勤劳奉公法》。这是和义务兵役制联系起来的带有强制性的劳动法，也就是每年应征入伍服役的壮丁以外的壮丁，即老百姓所称呼的国兵漏子，也有三年义务劳动的任务。

关于干部培训问题除由各军队学校有计划培训外，各部队都有培训任务，自行补充干部缺额。

1934年春季，满洲国军政部决定成立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事后将具体工作交给了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和军事顾问金川耕作少佐，他们立即着手准备。原打算在钱家店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因当年雨水很大，兵营的一部分已被洪

水冲毁了，因此改变计划。于1934年7月1日，暂借郑家屯满铁公所的闲房子成立了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巴特玛拉布坦兼任校长，金川耕作兼任军事顾问，下永宪次中佐任专职顾问。

1935年8月，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新建了兴安陆军军官学校，部分校舍建成后，该校迁到王爷庙。这个学校是一个综合性的军事学校，不但给兴安军培养了各级军事干部，还担负着兴安军现役军官的轮训任务。

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任校长巴特玛拉布坦中将（兼），第二任甘珠尔扎布少将（1939年到1941年），第三任郭文林少将。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垮台，兴安军也随之解体。

间岛特设部队始末

车相勋

特设部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它的组织沿革

“七·七”事变后，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广泛开展，使一意孤行的日本侵略者受到极大的威胁。不仅牵制了日军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力量，而且也使其将东北殖民地化的政策和巩固后方的战略基地的任务受到严重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抗联的进攻，在间岛省各地派驻关东军“守备队”、“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还成立了各种特务外围组织，广设警察署、分驻所和森林警察队，以“治安肃正”为名，不断出动大批军警，对抗联进行“大扫荡”

和“大讨伐”，妄图把抗联镇压下去。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伪满洲帝国间岛省长李范益（伪满洲帝国参议员，1937年11月任省长，朝鲜族），为博得日本主子的欢心，迎合他们提出的“治安肃正”的需要，主动向朝鲜总督府提出了关于招募朝鲜青年组织“讨伐”抗联的特设部队一事。日本方面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立即筹建。遂从1938年9月开始，以扑灭东北反满抗日的爱国武装力量为目的，从安图县治安队、珲春国境监视队、延吉青年训练所、奉天满军军官学校和其它满军部队中抽调日本人军官7名，朝鲜族尉官9名和朝鲜族士官9名，在明月沟（现属安图县）筹备特设部队。

筹建基本完毕后，于1938年12月15日正式举行第一期入队仪式（后来定1938年9月15日为间岛特设部队创立日）。伪间岛省长李范益亲自出面，间岛省五族（汉、满、蒙、朝、日）协和会派出朝鲜族代表参加了仪式。他们在入队仪式上都讲了话。反复强调，特设部队担负着光荣而重大的使命，作为朝鲜青年先遣队，为新满洲国治安而勇敢献身，奋斗到底。特设部队本部设在明月沟安图车站北一华里处（现安图县农机公司院内），这里驻扎着队部和步兵连。分部设在现安图县运输公司院内，并驻扎着机迫连。

特设部队从成立到解散，共招收七期兵，除1939年没招收外，每年招收一期。招收兵约有690名。此外，还从其它部队中调进军官53名，其总数为743名。由于每年都有病人、伤亡和服役期满退伍的人，所以每年服役的人数平均保持300名左右。特设部队第一、二期兵都是志愿报考的兵，从第三期开始实行征兵制。建队后的初期（1938年12月至1939年初），间岛特设部队本部内设有副官、军需、医务3个室和步兵、机迫2个连。

1940年招收第二期兵后，把新兵暂编为新兵连，经过4个月的训练后，同年12月撤销原有的步兵、机迫、新兵3个连，重新改编为步兵一、二连和机迫连。1944年初部队由伪满间岛省调往热河省以后，又重新调整了队部机构。队部把原有的副官、军需、医务3个室撤销后设副官处，统管军医、军需、军机、通信、缝工、无线电等事业，并在副官处内专设管理情报的军官。为了加强与承德军管司令部和明月沟（明月沟仍有留守办事人员）的联系，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在热河省凌源增设了联络所。1944年3月，在热河省榆树林子又增设了情报班。

特设部队是营的编制。军级分为队长（少佐、中佐）、副官（中尉、大尉）、连长（大尉）、排长（准尉、少尉、中尉）、班长（伍长、少士、中士、上士）、战士（小兵、二等兵，上等兵）等级别。部队的主要职务队长、副官都是由日本军官担任，其余军官部分是朝鲜族，特设部队先后共有五任队长和一名代理队长。他们是：染川一男、园部市次郎、桥本清、佐佐木五郎、柴田清、藤井义雄。

“间岛特设部队”的名称，在成立的当时称“朝鲜人特设部队”，后改称“间岛特设部队”。除称“间岛特设部队”外，还根据每个时期任职的队长姓名，称染川部队、园部市部队、佐佐木部队、柴田部队、藤井部队。除此之外，在藤井义雄任队长时，间岛特设部队称“藤井游击队”，1945年2月在河北省司集镇（司各庄）时，改称“支援步兵队”，1945年6月又改称“间岛第一特设部队”。

间岛特设部队自建队至1939年初，受伪满洲国国务院治安部（后改为军事部）所属驻吉林第二军管区司令部领导。自1939年初至1943年末，改由治安部所属牡丹江第六军管区领导。部队调往热河省后，由于活动地区的变化，除继续受牡丹江第六

军管区领导外，在军事上还受治安部所属承德第五军管区司令部领导。

特设部队自1939年12月至1943年末，在伪满间岛省内进行“讨伐”活动。1943年以后，在东北抗日斗争形式暂时转移到秘密的地下工作，而关内各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把“治安肃正”重点，由东北转移到关内。因此，1944年1月15日，特设部队除一部分留守人员和患病者留在明月沟外，其余人员都乘火车到达热河省凌源车站。1944年初至同年秋，他们主要是在榆树林子一带进行“讨伐”活动。1944年秋至1945年1月，在热河省密云县（今北京市管辖）石匣镇一带进行“讨伐”活动。1945年1月至特设部队解散，他们调往河北省，在滦南县司集镇一带进行“讨伐”活动。

到1945年8月20日，特设部队还没得知日军已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仍在离司集镇约15公里的地方进行“讨伐”活动。当我们的八路军某部告诉他们日军投降了，他们才停止战斗，返回东北，撤到沈阳时，部队逃散。

特设部队的队歌和军训情况

间岛特设部队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指挥下，专门从事“讨伐”我抗联、八路军和爱国力量的反革命武装队，是用“大和魂”精神武装起来的走狗武装队。他们的队歌集中地反映了特设部队的性质和成立的目的和任务。队歌是1943年由队部军官板屋秀二作词，共分两节。

歌词大意是：（一）时代的自豪，为满洲的繁荣，实行征兵制的先驱——朝鲜的健儿，担负着先遣者的使命，我们站起来了，我也站起来了。（二）建军年限并不长，而在战斗中冲锋不止不怕死的大和魂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是紧跟天皇意志的特

设部队，是天皇关怀的特设部队。

歌词中的所谓“为满洲的繁荣”就是指为巩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紧跟天皇的意志”就是说，特设部队的一切言行都要按照天皇的意志去办。歌词中的所谓“大和魂”精神，就是特设部队的指导思想。“大和”是日本国的别名，日本民族也称“大和民族”。“大和魂”就是“日本魂”，也就是日本统治阶级宣扬的所谓“日本民族精神”。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扩张，进行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要求日本人民拿出一切来支援侵略战争。这样，“大和魂”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代名词。“大和魂精神激励着”就是鼓动特设部队要发扬日本军国主义精神。

特设部队是在“大和魂”精神激励下，日本军官的指挥下，加紧进行军事训练。从第一期兵至五期兵的训练地址在明月沟，第六和第七期是在黑龙江省宁安。

打骂训练。特设部队在训练中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第二期搞训练时，一名新兵胳膊被打骨折，后来自杀了；第四期兵有一个人叫安权显，因为背不熟军事守则，经常挨打挨罚。他实在忍受不住就逃跑了，队部出动了全体士兵搜查，抓回来后，连打带踢，把他整得昏迷不醒。当天夜晚这个人又跑了，躲避到了朝鲜茂山，改姓换名，又在那里当了学校的教员。过了一年后，酒后吐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被人告密，特设部队派人逮捕，送到牡丹江第六军管司令部监狱。1944年部队调往热河省时，把他放回部队当了伙夫。没多久，他又跑了，加入了八路军，后来当上了连长。

特设部队从第一期兵中选拔70名“优秀分子”，在明月沟特设部队本部开办了军官候补生（即下士官教育队）训练，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教育”后，约有50名士兵于1940年12月结业。

其中绝大部分均升为士官，担任了班长职务，有个别的被分配到间岛省各县，担任了协和青年训练所助教。1939 年至1943年，又从士官级人员中陆续抽调16 名，分别送入各类满军军官学校，这些人毕业后均授予少尉军衔，绝大多数返回特设部队担任了排级以上职务，成为部队的指挥骨干。

1944 年初，部队调往热河省以后，在“讨伐”前，由柴田清队长指挥，搞了几天的军训。主要内容就是学习抗联的游击战术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他们的话来讲，要保持特设部队的荣誉，不要像满军那样纪律松弛，掠夺老百姓的东西。如住老百姓家时，不准睡在炕上，要睡在地板上，做饭不要雇人，要自己动手，还要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不准抢老百姓的东西。其目的是得到老百姓的欢心，依靠老百姓“讨伐”八路军。但是这些是侵略者永远也做不到的，只不过是欺骗宣传而已。特设部队到关内后马上就凶相毕露，猖狂地实行“三光政策”，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

特设部队“讨伐”活动及其罪行

特设部队 在日本军官指挥下，忠实地执行了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积极组织“扫荡”，采取极端野蛮、残忍的手段，对我抗联和其他爱国武装进行了血腥镇压，在“讨伐”中大肆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和无辜的老百姓，制造了许多悲惨的血案。部队调往热河省增设情报班后，又积极开展了搜索情报、进行刑讯、瓦解抗日组织等活动。据调查，特设部队自成立到解散，“讨伐”活动和事件共有108 起，平均每月“讨伐”一次以上。被杀害的抗日战士、革命家属及革命群众达172 名，平均每4 个士兵杀害1 人。被捕者139 名，平均每5 个士兵逮捕1 人。至于强奸、抢劫、刑讯、毒打、放火等罪恶不计其数。他们的“讨

伐”活动主要是在伪间岛省和热河省榆树林子、热河省密云县石匣镇、河北省滦南县司集镇等4个地区。

在间岛省主要是在安图县、延吉县、汪清县、和龙县等地进行“讨伐”。据调查，在间岛省“讨伐”活动10余起，被害的我军战士和群众8名，被捕的1名。“讨伐”活动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手段：一是配合日军守备队进行“讨伐”；二是特设部队单独进行“讨伐”活动；三是组织便衣队，打扮成农民模样，潜入到农村侦察我抗联的行迹和民心动态。

在热河省榆树林地区活动，是在榆树林子周围约30公里以内的各村庄去“讨伐”。主要采取了集中全部精力整队活动和按连队活动相结合的形式。进关以后“讨伐”活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每次“讨伐”均有情报班的积极配合。情报班“打前站”，搜集情报，然后根据已获情报进行“讨伐”。据调查，特设部队在榆树林子地区“讨伐”活动有28起，被害的我军战士、干部、群众22名，被捕者14名。在这个地区“讨伐”的手段阴险毒辣。1944年5月，部队驻扎在榆树林子，有一天抓来了一个约有40岁左右的人。他们把那个人拖到靶场绑在靶上，拿活人当靶子打死了。1945年5月一天，一连秋叶连长带队，夜间到谢家杖子附近一个村庄，见人就打，见妇女就奸污，见物就拿。1944年7月，在离榆树林子约10公里处进行“讨伐”时，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从山上下来，士兵不问青红皂白举枪就打，无辜杀害了一名老百姓。同年，特设部队到离榆树林子约20公里的村庄，把全村老百姓集中起来后，一个个灌辣椒水，逼得老百姓没法子交出了一台缝纫机。同年5月，特设部队到离榆树林子约30公里的村庄，逮捕了无辜的老百姓3人，绑在大树上，由士兵岩本马龙等3人用军刀刺杀了。1944年4月特设部队接到侦察情报后，派40余名士兵，到离榆树林子

约25公里处偷袭我八路军工作人员，逮捕我电台工作人员4名，掠走无线电1台，杀死八路军一名战士。特设部队又把这个村庄的牌长叫来，当众拔出军刀把他就地刺杀了。后来，一个名叫梅原的队部军医砍了牌长的脑袋拿到榆树林子，用锅煮后，把脑壳拿到自己办公室放在桌上。同年6月，他们又在离榆树林子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搞夜间偷袭拿走了一部无线电机，并把无线电技士的头砍下去。

在热河省石匣镇地区的活动，主要是在密云县石匣镇周围50公里以内的大水峪、聂家峪、田各庄、史庄子和平谷县镇罗营等村庄进行"讨伐"。由于特设部队"讨伐"极端猖獗，使这个地区我八路军的军政军民伤亡的人数和被捕的人数都多于前两个地区的合计数。据调查，在石匣镇地区"讨伐"事件达34起，被害的军政人员和群众39名，被捕者62名。1944年10月，情报班逮捕了一名八路军工作人员。在刑讯中他供出了离石匣镇西部10公里的村庄埋藏八路军粮食一事。部队立即出动到该村庄起出藏在洞里的粮食40多麻袋和布鞋40双，还宰了3头牛。在搜查中特设部队用军刀刺杀一名八路军战士。同年旧历八月初一，特设部队到离石匣镇东部约30公里的东庄禾村去"讨伐"，天刚亮时，该村老百姓看见敌人来了，就往村外逃难，特设部队举枪就打，一名老百姓中弹死在稻田里，一名孕妇被机枪打中腿部，爬到高粱地里，被讨伐队用刀将她捅杀，连胎儿都流出来了。1944年11月5日，驻在怀柔县大水峪的满军到县城运粮时，在北台下庄西部遭到了我八路军区队袭击，一辆汽车被烧，几个满军和一个官太太就地送命了。当天下午特设部队配合大水峪的满军到北台下一带增援"讨伐"。特设部队一到现场附近村庄就进行搜捕，老百姓被打死2人，伤残3人。同一天，两名八路军复员军人，也被他们抓去后，用枪打死了。1944

年旧历3月20日，特设部队配合当地宪兵队、警察、混团到离石匣镇东南7.5公里的东田各庄进行“讨伐”，在村庄里打了无辜的老百姓，并抓捕了21名群众。同年旧历七月二十七日他们又配合当地警察到黄各庄去“征粮”（实际是抢粮），逮捕21名老百姓。其中有一名农会主任被押一个月后，被他们砍死。1944年9月，特设部队驻在石匣镇时，在离镇15公里处，配合蒙古骑兵“讨伐”了八路军。在双方交战中特设部队惨败了。一气之下，他们在归途中到镇西部10公里的一个部落，放火烧了20户人家，并抓捕了两名老百姓，被日本人园本一雄用军刀杀死了，还宰了村庄里的两头猪。1944年9月，他们配合当地的日本宪兵队，半夜出动包围了离石匣镇4公里远的一个村庄，在搜查中逮捕了八路军工作人员3名，把他们绑在大树上，连踢带打，折磨而死。

在河北省滦南县司集镇（现改称司各庄）地区活动，主要是在司集镇周围的高庄、任六庄、大兰坨、倴城、甜牛庄、张仙庄、柏各庄等地进行“讨伐”。到这里以后，可以说他们的“讨伐”活动到了极点，手段更加狠毒。仅在甜牛庄和附近的张仙庄、柏各庄的一次“讨伐”，就杀害了我民兵和群众19名。据调查，在司集镇的“讨伐”事件达36起，被害的我军政人员和群众103名，被捕者62名。1945年3月，驻在唐山附近石门镇。有一天去附近村庄“讨伐”时逮捕了八路军伤病员6名，天天刑讯拷打，折磨死去。同年5月，在藤井队长指挥下，各连自司集镇到柏各庄进行“讨伐”，逮捕了两名武工队员。后来他们和八路军交战中，一名士兵伤亡，为了“报仇”，藤井命令将这两名武工队员，杀头祭灵。1945年7月，特设部队在司集镇南约35公里的地方进行“讨伐”时，特设部队一名士兵被我八路军打死了，也为了“报仇”，他们抓了无辜的老百姓4人，说他们是

不穿军装的土八路，就绑在一棵树上用军刀刺杀了。

由于特设部队在“讨伐”中为日本帝国立了“汗马功劳”，伪满洲国国务院先后给特设部队队员授予了武功章、景勋章、柱国章等不少勋章。据伪满康德12年（1945年）3月21日国务院政府公报授予各种勋章的统计数字看，授予特设部队军官和士兵各种勋章的人数达175名。其中朝鲜族167名，日本人8名。

所谓“常胜军”和“十六勇士”

特设部队自称，自己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军”。但是，堂堂的“常胜军”，在“讨伐”中却多次扑了空，打了不少次败仗。据调查，特设部队在间岛“讨伐”规模比较大的共十起，其中四次扑空，三次“打胜仗”，两次打败仗，一次挨打。

1939年7月1日特设部队接到了天宝山矿被抗联袭击的情报后，特设部队在染川队长的指挥下，配合图们日本守备队，到天宝山去“讨伐”。头一天，双方没有大的伤亡。第二天拂晓前，我抗联按原定计划悄悄地插进特设部队和日本守备队宿营地中间地带，同一时间分头向敌人两方开枪猛射，假装偷袭敌人宿营地。枪声一响敌人就上了圈套，两头的敌人惊慌失措，误认为抗联偷袭自己的宿营地，向对面乱打起来。这时我抗联部队迅速地撤离中间地带，两头的敌人在拼命地向自己的对方开枪猛射，天亮后才知道上了抗联的圈套。混战结果，日本守备队死了4人，特设部队1人受了伤。后来敌人把这一自相残杀的事件叫“天宝山事件”。

自称“常胜军”的特设部队，也逃脱不了我抗日武装的惩罚。所谓大沙河“十六勇士”就是其中的一例。1939年8月24日，我抗联部队偷袭了大沙河集团部落，消灭了驻在警察署的日军和武装自卫团。日本守备队由队长宫本率领约80名士兵，

特设部队由下士官教育队班长吴显相率领20名士兵，赶到大沙河去增援。一到大沙河，我抗联早已收拾战利品撤离了。第二天也就是敌人装上尸体返回的那一天，我抗联埋伏在谢家店附近公路的东侧。午后1点多钟，装载日军尸体和特设部队的日本守备队的6辆汽车，进入了我抗联部队的埋伏圈。经过30多分钟的伏击战，敌人除特设部队4名士兵外，全被消灭。当时活着的4个人中，一个人被我抗联逮捕，有一个人背着伤员跑掉了。后来伪满国务院，把在谢家店伏击战中被我抗联消灭的16名特设部队士兵命名为“十六勇士”。日伪当局为了鼓励更多的日伪军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还在明月沟学校礼堂，举行了“十六勇士”追悼大会。并在谢家店惨败的地方立了“十六勇士”纪念碑。

（安图县政协供稿）

伪满飞行队

周正

伪满军基本上没有空军，只有三个象征性的飞行队。第一飞行队在长春宽城机场，第二飞行队在沈阳北的文官屯机场，第三飞行队在哈尔滨南的王岗机场。这三个机场的设备很简陋，都是草地机场，有关气象保证资料，都需求助于日军飞行队。各队的建制相当于小团或独立营。队长的军衔为上校或中校。除飞行军官外，机械师、机械士和机工等地勤人员不佩戴军衔。还配有两个警卫连，连队军官有的由飞行军官兼，也有的是从陆军调来的。各队飞机的数量，包括初、高级练习机在内也不超

过15架。各种飞机大多都是日军淘汰下来，重新翻修的旧飞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飞行军官大多是日本人，从日军飞行部队调过来的。地勤人员也完全是日本人，个别汉人飞行军官是从民航调来的。1943年从伪军校抽调了一批毕业的尉级军官（其中日本人占多半），在第二飞行队学习飞行。他们仅飞完了九五高练，日本就投降了。

在三个飞行队中，被称为较好的飞机只有三架，即第二飞行队的中魁二式战斗机，第一飞行队的零式战斗机和吞龙重爆击机（即轰炸机）。飞机最少、最次的是第三飞行队。直至1944年的秋季，这个飞行队只有四架即九七战斗机、九八轻型爆击机、九五高级练习机，和叫“扶利梯”的初级练习机各一架。所有上述飞机都是日军八○○部队用过的旧飞机，属于被淘汰或接近报废的破烂货。在1944年夏的一天中午，一架大修后的九七战斗机，在王岗机场上空试飞特技时，飞掉了发动机，坠毁在机场边上，机毁人亡。

1944年秋，美国陈纳德飞行队的B—29和国民党空军的B—24轰炸机多次空袭鞍山。处于劣势的日本空军没有办法，只好责令伪满空军，凑凑数。伪飞行队集中了3个飞行队中的“精华”，好歹才选出5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开赴鞍山。空袭警报发出后，这几架飞机也都飞起来了，然而，当B—29机群轰炸时，他们只能在其侧下方仰看“欢迎”和“欢送”。因为他们飞不了那么高，更不用说进行空战了。

伪满洲国江上军

温　野　整理

江上军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决定成立海军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由海军部所属长江第二舰队调拨了“江亨”、“利绥”、“利捷”、“利川”四艘炮舰，以王崇文中将为舰队司令（王崇文，字子翰，福建闽候人），于1919年7月从上海出发，经过东海、黄海、日本海及鞑靼海峡，直到1920年秋季才开入松花江，最后到达哈尔滨。1920年6月4日，在哈尔滨道外十七道街，成立了“海军吉黑江防司令部”，管辖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防务，王崇文任江防司令。江防军有“江亨”、“江通”、“江平”、“江安”、“利绥”、“利捷”、“利川”、“利济”等8艘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旧式炮舰和由商船改装的炮舰，另有几只木制小炮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江亨舰长尹祚乾（湖南人）代理江防舰队长。哈尔滨沦陷后，尹降日，从此江防舰队落入敌人手中。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4月15日，以伪满洲国军政部的名义，公布了“陆海军条例”和“划定警备担任区”。1933年5月28日，满洲国江防舰队，正式成立，归海军建制，受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管辖，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埠头区（道里区）买卖街，司令官是海军中将尹祚乾。同月25日，江防舰队初次开赴黑龙江试航。

1933年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

要》，根据纲要精神，把大量日本军人派入伪军中，担任顾问和各级指挥官，并于1934年10月，对伪满洲国军队进行大规模整编。江防舰队仍属海军，军官士兵都穿海军服，军帽上绣着"满洲帝国江防舰队"字样。当时有7艘旧军舰，4艘炮艇，兵力700人左右。

江防舰队补充队设在道里江桥东侧。主要是负责招募和训练新兵。士兵刚入伍叫"练兵"，在补充队训练一年后，再分配到舰艇上服役。在道外二十道街江坝外，还有修船的船坞和补给厂。

军舰除原有的，又从日本购进了"大同"、"利民"两艘以内燃机为动力的军舰，这在当时就算先进的了。形成所谓的"五战四炮"，即五个战队，四个炮艇队。每个战队2艘军舰，每个炮艇队2艘炮艇。日本海军省也陆续派来一批日本海军的退役军官，还在哈尔滨招募了一批新兵，充实了江防舰队。

这时的江防舰队，受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管辖，日本关东军（陆军）无权过问，也不受日本宪兵队和满洲国宪兵队的监督。由于派系和权力之争，日本军官在舰队内部对士兵管理很严，而对士兵在外边发生的事却很放纵，予以袒护，不准外人干涉。

1939年2月，日本驻满海军部撤消后，就把海军江防舰队改编成江上军，到同年11月间改编完成，司令部迁到道外北七道街江边（现址黑龙江省航运局）。江上军与各伪军管区是同级，直接归伪军政部管辖，只是江上军司令官的军衔比军管区司令官小一级，军管区司令官为上将，而江上军司令官是中将。改编后，改穿陆军军服，只有日本海军军官照旧穿海军服。

江上军的主要官员

江防舰队司令官是尹祚乾，后晋升为中将。尹祚乾的后任是李文龙中将，李后来晋升为上将，调任第四军管区参谋长、司令官（驻哈尔滨）。接替他的是宪原中将，此人是清朝皇族（溥仪的侄子）。最后一任司令官是曹秉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原在东北讲武堂（沈阳）任中校教官。"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晋升上校，任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后升少将，联任八年后调回任溥仪的首席侍从武官，后调任陆军飞行队司令官，几年后又晋升为中将，调任陆军江上军司令官。顾问是派驻江上军的实权统治者，穿日本军服，戴日军军衔。江上军的最后一任日本顾问是来栖大佐。

参谋长是仅次于顾问的日本军官，他直接掌管江上军的全部机构和军事活动。前任是日本人真井，中间是落河。这两个人都是长春伪军官学校的教官，军衔都是少将。

司令部的机构

江上军司令部有7个处，1个所，军官有200人左右，士兵100人左右。

参谋长：参谋处长（即高级参谋）日本人森胁上校，主管作战用兵和教育训练。参谋处下设"人事室"和"健军室"。人事室掌管全军的人员编制、军衔晋升、人员调遣、工薪级别和考勤事项。健军室是特务情报机构。主要是调查官兵的思想，特别是监视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官兵。他们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有计划、有重点地搜集"敌情"（即共产党、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江上军的活动情况）、"社情"（即江上军官、兵的思想动态），布置侦察对象（即"要视察人"）。健军室对内受日本顾问、

参谋长领导，对外与日本宪兵队、满洲国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协同行动。另外，健军室在士兵中物色亲日分子，进行专门训练后，派到重点人身边或重点团队，进行侦察活动。

副官处：是司令部的“不管处”，凡其他处不管的事，副官处都得管起来。所以副官处除设高级副官（即副官处处长）外，还分设文牍副官、庶务副官和专署副官，分管各项事务。

军械处：主要是掌管全军的武器、弹药、舰艇和各种军事装备，除舰艇所需装备由补给总厂供应外，统由军械处管理，并对各团队、补给厂进行监督、检查。

军需处：主要负责的被服、粮秣、经费及所有消耗用品，并对各部门的军需业务进行监督、检查。

军法处：主要负责掌管司法工作，对违法的军官、士兵进行军法会审，执行判决，行使军事警察职权。

军医处：主要负责掌管医疗卫生和防疫保健事项。

电讯所：主要掌管无线和有线通讯。每天对出航舰艇的态势和动向，向参谋处、副官处提出报告。

训练处：主要负责对江上军的军官、士兵的训练。伪满的军官学校没有海军科，所以江上军的军官也只得由陆军学校派来毕业生。但分配到江上军后，不能立即适应水上作战要求，必须学习有关海军科目后，再分配到舰艇上或其它团队。新征来的“国兵”也须经过训练后方能分配。甲种学生班训练伪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四年制毕业生，学习甲板、轮机海军业务。乙种学生班训练沈阳军官学校二年制候补生毕业军官。丙种学生班训练军士出身的少尉候补者，毕业后任少尉。还有军士候补者队，专门从征来的“国兵”中选择，经过一年训练，任少士班长。该处原设在道里江桥北端东侧，后迁到马家船口。

训练处下设教导团，负责教育训练国兵，为舰艇补充兵员，

实际是新兵补充团。

教导团原来下设六个连，一至四连为甲板科，五连是轮机科，六连为通讯科。每连都有日本人任连长或副连长。到日本投降时，就剩下四个连了。

江上军所属各部队

江上军下面直接管辖三个团，一个舰队，两个地区队，一个办事处，一个炮队和警防队。共有2 600人左右。江上军所属三个团是陆战队，负责江上警戒和登陆作战。

第一团：团部设在哈尔滨松花江北糖厂附近。

第二团：团部在富锦，装备有可运军兵的小艇。

第三团：团部设在哈尔滨道里江桥北端东侧原东北商船学校处。团下设三个连一个材料厂。官兵总数450余人。主要配备有九五式轻操舟机折叠舟，船身轻便，速度快，便于机动。担负江上巡逻、警戒、联络、侦察、运送登陆器材和架设折叠舟桥等任务。

舰队：舰队司令部下设五个战队八个炮艇队，一个补给总厂（厂址在哈尔滨道外二十道街江坝外）。补给总厂附属一修船厂，承担一般性修船任务。

司令部下边的五个战队，每个战队由两艘军舰组成，前者是旗舰，后者是配属舰。

第一战队：由“定边”、“亲仁”舰组成。队长由日本人山内上校兼任，同时他还兼任“定边”舰舰长。“亲仁”舰舰长是日本人和泉少校。

第二战队：由“顺天”、“养民”舰组成，日本人松尾中校兼任第二战队长和“顺天”舰舰长。“养民”舰舰长的前任是日本人香月少校，后任是高木中校。

第三战队：由“大同”、“利民”舰组成，队长由艇队司令部附菅野上校兼任。这是个练习舰队，乘组军官士兵较少。

第四战队：由“阳春”、“熙春”舰组成，队长由“阳春”舰舰长张彦果（又名张毅超）少校兼任，“熙春”舰舰长是日本人×××上尉。

第五战队：由“兴亚”、“兴仁”舰组成，队长是兼“兴亚”舰长赵廷勋少校，“兴仁”舰舰长是日本人×××上尉。

八个炮艇队：

第一炮艇队：由“晓江”、“晋江”艇组成，艇队长是兼“晓江”艇长的王绍文中校，“晋江”艇长是杨××上尉。

第二炮艇队：由“威明”、“晨明”艇组成，艇队长兼“威明”艇长是日本人××少校。“晨明”艇长是日本人平田上尉。乘组军官有范春仁中尉（甲板军官）、石宝兴中尉（轮机长）等四人。

第三艇队：由“海天”、“海阳”艇组成。

第四艇队：由“恩民”、“济民”艇组成。

还第五、六、七、八炮艇队：每艇队都由两只炮艇组成。

上述这些舰艇的军官多是日本海军、陆军退役军人，由他们担任舰长，或艇长以上主要职务。

最大的舰上能装200人，大舰上有正副舰长、炮连长，管武器的和前后甲板军官。

各舰艇武器装备不强。第一、二战队每艘舰排水量近300吨，舰长50米，宽约15——20米。“定边”、“亲仁”二舰，前甲板装二门，后甲板装一门12厘米口径双筒电气操纵的连发高角炮，可高射平射两用。舰桥顶部装有6挺1.3厘米口径的高射机枪。

“顺天”、“养民”二舰除甲板上配有8.5厘米口径的平射炮，

其他与第一战队的装备相同。

第一、二战队的4艘军舰，每舰装有300马力内燃机两台，直流发电机一台、空气压缩机一台，从外表看是个庞然大物，但实际排水量却不到300吨，原因是装甲非常薄，除板仓部分甲板约有2厘米外，其余部分只有1厘米左右。因此不仅不可能与当时苏联的同级舰艇对抗，就是对自身装备的高角炮发射时的后坐力都承受不了。所以大家就把它们戏称为"玩偶"军舰。日美开战后，还把高角炮卸下来，运往鞍山防空。这样一、二战队的四艘军舰也就没有用了，只得开进船坞，再没有执行什么任务。

第三战队的"大同"、"利民"二舰，比较陈旧落后，前甲板装有7.5厘米口径的高射炮一门，后甲板装平射炮一门，两舷装有高射机枪各一挺，有两台50马力左右的发动机，巡航速度较慢，作战威力不大。

第四、五战队的"阳春"、"熙春"、"兴亚"、"兴仁"和第一、二炮艇队的"晓江"、"晋江"、"威明"、"晨明"等8艘舰艇，是同一类型的，艇体是5——7毫米钢板结构，各装有100——150马力的内燃机两台，发动机的功率较大，巡航速度快，顺流每小时可达50浬左右。这些舰艇的前甲板装有3.7厘米口径的速射炮一门，可发射一般炮弹和穿甲弹，发射速度快，贯穿能力强。后甲板装有平射炮一门和1.3厘米口径的高射机枪两挺，对空射击有一定威力。所以，这8艘舰艇是江上军舰艇的精锐。其他炮艇都是木质结构，速度不快，武器装备只有重、轻机枪、掷弹筒等，作战威力不大，只能作为一般护航和通讯联络使用。

江上军分两个地区队，设军官一二人，军士和"国兵"40余名，常驻黑河和佳木斯。虎头办事处有十多人，他们负责搜集边境苏军舰艇的动态，同时对江上军巡航的舰艇负责给养的

供应工作。

驻鞍山高角炮队和海上警防队

这二个机构是1942年成立的战时机构。主要是为防御美国“B29”轰炸机到鞍山轰炸。“B29”飞行高度1万米以上，连关东军也没有能打这么高的炮，只有江上军有这种高角炮，有效射程高度1万米。关东军下令把江上军的“定边”、“亲仁”、“顺天”、“养民”四艘军舰上的10门高角炮卸下来，并调一部分炮术较好的军官和100多名士兵，组成高角炮队，由日本人远藤中校统一指挥，派驻鞍山，负责对空射击，保护鞍山钢厂。

再就是组成海上警防队，驻守大连，担负由大连到日本的海上运输护航任务，也就是在商船上装上炮，保护商船，对付美、苏潜艇，实际也没有用上。

傀儡司令官

司令官名义上是江上军的最高头目，对司令官也规定有特殊的礼仪。曹秉森任司令官时，日本顾问以下的所有日本军官，表面上对他都很尊敬，每天午间在军官团会餐时，日本顾问先来，待曹秉森进屋时，他首先带头起立，全体军官也都起立，向曹敬礼。曹秉森有专车和专属副官，可到司令部“酒保”（即小买店）任意选购大米、白面、酒、油、糖、香烟等。他的轿车前面插小黄旗，在汽车风挡右下角贴着圆形黄地白三角标志，表示有将级军官乘车。如他本人不乘车，车前黄旗必须拔下（校级军官乘车，风挡上标志改换红地白三角，尉官则是蓝地白三角）。司令官进出司令部时，卫兵必须列队迎送，号兵吹接、送官号（上将级吹三番，中将级吹两番，少将级吹一番），在场官兵（包括文职人员），都必须原地立正行礼致敬，待吹完接、送

官号，司令官离去，才能自由活动。看起来司令官很“威武”、“至上”，但不给实权，实权掌握在日本军官手中。日本关东军对伪江上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顾问团”进行。江上军设有日本顾问室，除来栖大佐顾问外，还有日本文职官员一人，他经常召集日本军官会议，而履行检查控制伪军的任务，对“满系”军官的思想动态作调查。顾问室还设有日本女密码员一人（即机要员），所有电报都使用军事密码，由她翻译，呈送顾问审阅，机密电报司令官看不到。江上军司令部往下布置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经顾问签署意见后，交司令官批发，日本顾问来栖大佐是江上军的太上皇。

参谋长以下的日本军官都掌握着江上军各重要部门或团队、舰艇的实权，即或有的部门中国人担任正职，但副职都是日本人，实际还是他们说了算。

伪满第五三部队始末

拉喜德瓦

伪满洲国第五三部队又名满洲第八六八部队。组建于1941年9月13日。这个部队真实名称是满洲第二游击队。

满洲第五三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它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建立起来，隶属于关东军情报局，又接受王爷庙（现乌兰浩特）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的直接指挥。最初部队在通辽钱家店召集人马时，担任部队长职务的是矶野实一少校，所以对外就称“矶野部队”。在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日本帝国主义也伺机侵入苏联西伯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对苏联形成了东

西夹击之势。于是日军在积极扩充关东军的兵员、装备的同时，筹划组建一些能够协同作战的机动小部队。满洲第五三部队就是这种机动小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日军大举进攻苏联时，挺进外蒙，在敌后或侧翼截断运输线，袭击后方机关，扰乱居民点，以配合正面战场的进攻。所以该部队的预期战场是外蒙东部地区。部队的任务，决定了部队的成员以蒙古族为主体。军官则由熟悉蒙古地区情况的日本军官和蒙古族军官组成。它招募的士兵既不是现役军人，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受过军事训练和参加过战斗的退役或预备役军人。

这支部队是根据王爷庙特务机关提供的资料筹建的。开始时日本特务机关首先从各地调来了100人。其中士兵80多名，干部10名。士兵是原兴安南警备军少年队的编制撤销后，编入骑兵第五团的现役和将要退伍的士兵各30名。还有通过私人关系招来的退伍士兵20多名。1941年8月下旬，这支部队奉命去四平省昌图县（现辽宁省昌图县）接受正式编制。到了昌图，已召集了700多人。经过体检和审查，留下士兵400多名，军官40多名。这些士兵全是蒙古族，出身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科左中旗和科左后旗的伪满兴安退伍士兵。此外，是从通辽、开鲁、库伦旗、科右前旗、奈曼旗、扎赉特旗、扎鲁特旗、土默特旗、巴林左旗等旗县来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文盲占90%以上。不少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当过胡匪编入伪兴安南警备军后退伍的，也有当过警察的，当过喇嘛的。干部大部分是日系军官，少部分是蒙古族现役军官和退伍军官。部队整编完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于1941年9月13日举行了建队典礼，宣布“满洲第五十三部队”正式成立。这支部队的番号是满洲特务第八六八部队。

1941年9月14日，金川耕作特务机关长又召集全体军官讲

解了部队的具体任务和作战方法、预期战场等问题。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支部队虽然是支游击队，但它与一般的游击队不同。要能够长驱直入挺进敌后，要有打游击战的战斗技术和战略方针"。

这支部队正式组建后，装备和人员情况是：

整个部队共辖3个中队另两个班（相当于小队）。3个中队的第一、第三中队是一般中队，第二中队是机炮中队；另设一个通讯班，一个机动车（汽车）班。队部分教育、研究、副官、医务、兽医、经理（即军需）、兵器室等。一般中队分3个小队，小队分3个分队。自动车班有6辆载重汽车，通讯班有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小型收发报机两部。士兵配备七九步枪，干部和炮手、机枪手各有一支匣子枪。根据任务的特殊性，各中队的每个小队在装备和训练上又各有侧重。第一小队是情报，第二小队是宣传，第三小队是爆破。

初期，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是：部队长矶野实一少校，队附木村武夫上尉、西林正寅上尉，副官能美喜三郎中尉、加藤正属官、小泽启少尉、谷海峰少尉。研究室主任西村正寅上尉（兼）、拉喜德瓦中尉（本文撰稿人）、此仁扎布少尉、包峻峰少尉、野中次男少尉。经理室主任加藤属官、色音珠儒合军需少尉、安藤属官、佐藤伍长。兵器室主任水野时次郎属官。医务室主任申军医少校。兽医室主任中川兽医上尉。第一中队长木村武夫上尉（兼），队附松阿上尉、小田卷五郎少尉、宝金川少尉、川端少尉、达巴胡巴雅尔少尉。第二中队代理中队长拉喜德瓦中尉（兼），队附道尔吉扎布中尉、此仁扎布少尉（兼）、特格喜少尉、伊藤水雄少尉、巴图少尉。机炮中队长西村正寅上尉（兼）、霍日郭春中尉、和其叶勒吐少尉、国广弘少尉。通讯班长水口一吉属官、附田中属官、桥本属官。自动车班长增川

属官、附小川属官。同年年末和1942年初，补充了筱原谦吉上尉、佐佐木军需少校、中西上尉、山口上尉、大崎中尉、崎山上尉、布和上尉、梁善勿力吉少尉、白金山少尉、达理扎布少校、村木茂中尉、博彦陶克图军医少校、仁钦扎布苏军医少尉等人。1943年又补充了长谷川上尉和巴雅尔、巴达玛、巴图等三名布利亚特蒙古族少尉。

部队编制就绪后，随即进行训练。大约过了二十几天（10月上旬），关东军总司令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亲自到部队视察了一番，并作了训示。同年11月中旬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情报课）课长西村大佐到了开原城（现辽宁省开原县车站前的新城），在一家日本旅馆里召集部队军官，上了3天的战术课。这次战术课，是秘密进行的。我去的时候改穿和服，打扮成旅行者，没有携带武器。参加的人员是各中队长、班长、各室主任、大部分小队长。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和他的随员桥本中尉也前来参加。战术课是西村课长主持进行的。会后在战斗训练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内容，在编制上实行3人小组制。这种组织形式，是由于部队的特殊任务而决定的。3人小组便于作战时分散行动，伏击、潜伏时机动灵活，便于隐蔽，不致出现无组织状态。

精神教育方面，利用蒙古人信仰喇嘛教的特点，在兵舍供奉佛像，也允许个人身上戴佛像。部队里特设佛坛，准许进行佛事活动。金川耕作找来了一篇据说是清中叶班禅所作的名曰《参布 林伊如格勒》的经文，内容是预言一场叫“参布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世界叫“章参布拉”（藏语：最和平、最幸福的新世界）。

五三部队从建立起一直进行紧张的训练。其中包括滑雪、游泳训练等。

1942年9月，部队为了培养青年干部，特派包峻峰少尉（后升中尉）前往科左中旗和通辽等地，招募了有高小文化程度的蒙族青年学生四十几名。经过体检录取后，单独编成一个干部候补生队，出口上尉为队长，包峻峰为教官。干部候补生队的一切待遇，都和一般士兵一样。

1942年10月，部队又补充200人。这次补充，目的是将年龄大、身体素质差和不宜继续在部队工作的人员处理回家。招募地点是科左中旗、科左后旗、库伦旗、通辽县等。招募对象一律为伪兴安军退伍人员。标准是身体健康、有文化、年纪小、家庭生活条件好。通过这次调整增补，部队人员达500余名。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提高，平均年龄为30岁左右。

1942年初冬，第五三部队发生了枪杀僧德的事件。僧德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的战士。1941年冬被阿巴嘎特务机关俘虏，送至第五三部队，他不被日本侵略者所利诱，最后惨遭杀害。

1943年5月1日，部队迁驻新兵营。地址在王爷庙靠近洮儿河右岸的高地上。营房是一组土木结构，日、中合璧式的建筑。其中四栋兵舍、一栋部队办公室、一栋将校集会所、小卖店和一栋厨房。中间有一座给水塔和其他附属建筑物。原计划这里作临时兵营，后因时局变化，出动时间推迟，于是变成了长期兵营。

部队迁入新军营后，接着进行夏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是野营演习，包括饥饿训练。地点在兵营后面2公里处的山沟里。时间为一个月。除了军事训练外，还有采集食物（采野生植物）、捕鱼、打鼠、爬山、游泳等。这个阶段，故意少发食物、食盐和日用品。这样的演习，引起众多干部和士兵的不满。少数士兵溜号上附近屯子老乡家混饭吃，也有的偷庄稼、偷小鸡。

野营演习结束后，大概是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突然响起了非常集合的号声，接着传来了徒手去广场集合的命令。部队长亲自下达命令说："各中队、各班派出一名军官带领，全体人员受拉喜德瓦上尉的指挥，去巴公府集合，接受新的任务。干部候补生队和其他全体军官在兵营等待任务"。我接受任务后，指挥全体人员，按一般行军的队形奔巴公府。到达巴公府以后才知道是变相缴械。每个人的武器弹药，全部回收入库。各中队门口都有拿枪的干部候补生和日本人认为可靠的士兵站岗。一会儿，部队办公室的几个小屋都变成了审讯室。一共审问了100余人，被刑讯的就有六七十人。审讯持续进行了三天两夜。原来是部队内部出现了反满抗日暴动的秘密活动。第三中队士兵吴旺布、旭仁宝勒不满日本军官的法西斯统治，串联二十几名士兵，准备抢夺武器，举行暴动。不慎机密泄露，吴旺布等4人被枪杀，二十几人被王爷庙特务机关派人带走，大多数人去向不明。

这个事件之后，部队的人事安排有一些变化，原来部队里的主要职位都由日系军官占据着，这回把三个中队的队长都换成蒙系军官。第2中队长换成拉喜德瓦中尉，第3中队长换成霍日郭春中尉，第1中队长换成松阿中尉。这年年末，原哈尔滨特务机关蒙古班班长松浦秋夫少佐，调任王爷庙特务机关辅佐官兼管特第868部队事务。这时部队的名称也改为"满洲第2游击队"，番号为"满洲第五三部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德战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侵略者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第五三部队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预期战场不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在伪满洲国的东蒙地区。随即部队进行了新的调整。1944年1月到6月，差不多每月有一次武器弹药、卫生、马匹、副食、服装等检查，另外就是一些重要

人物相继来此视察。他们是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姓名军衔已忘）和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井××少将。6月上旬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和辅佐官松浦秋夫来到部队，发布了部队长更换命令。金川担任队长，松浦秋夫担任队副。原部队长矶野实一离队，接着一些主要日系军官也相继离队。又过了几天，部队进行改编，并提出留用士兵的名单。除留用的八十几人（包括军官候补生）外，其余全部离开部队。经过这次改编，取消了以前双重兵籍和两次服现役的现象。改编后，队部内分教育、副官、兵器、经理、医务、兽医等6个室。辖5个中队、两个班（等于小队）。1至4中队是一般中队，第5中队是机、炮中队。各中队分3个小队，小队分3个分队（等于班）。两个班是通信班和自动车班（即汽车班）。通信班有一部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两部小型收发报机，另有几部携带收发报机。自动车班有15辆载重汽车。撤掉了原来的研究室，增加了两个中队，9辆载重汽车。人员总数为700人。主要负责人是：部队长金川耕作大佐（兼），队副松浦秋夫少佐（兼）、志岐孝人少校、包永福少校。第1中队长双宝上尉，第2中队长能喜三郎上尉，第3中队长山门上尉，第4中队长鄂荣彬上尉，机炮中队长伊藤中尉。不久，从干部候补生里挑选出十几名去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深造。剩下的都当了班级干部。干部候补生队这个编制也就取消了。改编后的编制上还有一个特点是：正班长都是从日军调来的现役下士官，副班长都是留用的蒙古族士兵。

1944年6月下旬，王爷庙特务机关趁部队改编的时候，秘密从退伍人员中挑选了三部分人。将以达理扎布少尉为首的30人派往河北省唐山地区参加讨伐八路军的战斗，派以特格喜中尉为首的十五六人携带武器，伪装成农民潜入科右中旗吐列毛都附近，另派达呼拉巴雅尔少尉为首的十五六人潜入阿鲁科尔

沁旗罕庙附近。这两部分人潜入的目的是暗中联系当地居民，以便将来支援部队的作战，平时也起防谍作用。

1944年9月，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在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候补生队礼堂召开了游击战术研究会。会上王爷庙特务机关辅佐官松浦秋夫少佐公布了游击战草案，并逐条作了说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防王爷庙的兴安军各团军官一百多人和第五三部队的全体军官。从此第五三部队的一切军事训练都以此草案为依据。考虑到苏军的主攻方向和必经之路，确定部队的活动地区为王爷庙附近起西至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庙附近。并决定在这一地区征集士兵。1944年和1945年两次征集国兵时，部队都直接派军官到科左中旗、科左后旗、通辽县、科左前旗、科右后旗、扎赉特旗、库伦旗、索伦旗等地与征兵官取得联系，从中挑选合格者补充到部队。

1945年4月1日，最后一批新兵入伍，这批新兵共100名，这时部队的总人数已增至800人。

1945年6月，为了让部队干部了解预期战场的地形和居民情况，举行了一次将校现地战术考察。四十几名军官分乘3辆军用汽车，经科右中旗吐列毛都、乌兰哈达等地，又到阿鲁科尔沁旗罕庙和旗所在地昆都等地，了解地形和研究战术。回来时路过扎鲁特旗的桃儿山、鲁北，科右中旗的大庙、代钦塔拉、突泉县等地。每到一地五三部队还特意携带一些上等烟土作为礼物，访问和联系地方的头面人物。

苏军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传来，兴安总省公署、特务机关等撤往科左后旗的吉尔嘎郎地区。这时兼任第五三部队长的松浦秋夫中佐和队副志岐孝人等带领部队于8月10日奔向预定战场。出发前，又从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抽调若干名军官和刚出校的学生，加强了干部队伍。王爷庙特务机关还专门为部队送

来两车烟土，充作军费。临行时烧毁了营房。出发时命令，以中队为单位分散行动，按时到达预定地点集合。这时绝大多数蒙古族官兵已料到日本侵略者要完蛋了。离开驻地不远，他们就把同行的日本官兵收拾掉了。这时，有的官兵整队等待苏、蒙军的到来；有的犹豫不决地在附近地区游荡；有的趁机逃回了家。只有松浦等人带领的一百多人到达了预定地点。他们不但没有找到部队，反而被其他蒙古人带领的部队袭击，他们无可奈 何地经科左后旗，撤退到大郑线时，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了满洲全境。他们惊惶地经由昌图县北部的古榆树附近渡过了辽河向沈阳逃窜。至此，伪满洲第五三部队寿终正寝，彻底解散。

伪满骑兵二十一团的片断

吴恩斌

骑兵二十一团是什么时候组建的，我不清楚。我只能从1944年3月1日写到1945年8月14日，被苏联红军缴械受降这一段的情况。

骑兵二十一团原驻嫩江县塔溪村南大营。塔溪村就是现在的四站（军营的旧址还存在）从黑河乘客车去嫩江就从这个军营旧址北门（正门）前路过，还可以看到现存的兵舍和卫兵室的房子。大营院里东侧的房子已经残缺不全，大部分毁掉；西侧的房子尽管破旧仍保留原样。两个卫兵室仍在军营正门的两侧，只是大营外面临公路的军官家属房不存在了。

骑兵二十一团的组织机构：团部下设机关和战斗连队两个

部队。按原编制战斗连队应为五个连，即普通连三个，机关枪连一个。但是二十一团没有速射炮连，只有四个连。团部有副官处、参教室（部队迁到洮南之后改为教育室）、军需处、兵器处、兽医室、医务室等。

在塔溪村时，团长陆军上校刘德溥，到1944年9月间被调到第三军管区组建“铁石部队”进关内和八路军打仗去了。新上任的团长是陆军中校张之桢。副官是中尉赵海禄（9、10月间代第一连连长）、军旗副官少尉张政仁、文书准尉孔庆昌，还有两名办公兵，参教室（人员不详）；军需处军需官上尉谷杰，准尉霍修言，军需处管理后勤伙食；兵器室主任上尉李世增，兽医室兽医中尉一人（日本人），还有几名士兵；医务室军医少尉一人和几名士兵。

战斗连队部分，第一连连长上尉高仁舟（1944年11月晋升少校），连附有：中尉李有（后调北安宪兵团），少尉姜永昌，见习军官杜承杰；第二连连长上尉王进良、连附中尉黄宝田；第三连连长上尉冈山英夫（日本人，在赵海禄兼任第一连连长时，他担任团副官）；机关枪连连长上尉张荣世。

全团团长以下约600人左右，军马500余匹。

1945年2月，骑兵二十一团奉命迁驻吉林省洮南县洮南镇南大营驻防。

到洮南后，团部团长陆军中校张之桢(1945年8月1日晋升上校)；教育室主任少校持田秀胤（日本人）；副官处副官上尉（日本人），军旗副官中尉张政仁，文书准尉孔庆昌；军需处军需官上尉谷杰，准尉霍修言；兵器室主任少校王维新（于5月调走，少校高仁舟接任）；军医室少尉军医官一人；兽医室兽医官中尉、少尉各一人（日本人），各室都有一至两名士兵。

战斗连队，第一连连长上尉（日本人），连附少尉姜永昌，

见习军官迟殿阁，还有一名见习军官；二连连长上尉王进良；三连连长上尉（日本人）；机关枪连连长少校张荣世（4月从上尉晋升少校）。

部队迁驻洮南之后，编制与在塔溪村时大致相同。以上是骑兵二十一团组成的大致情况。

1945年3月间在洮南成立了骑兵旅，旅部设在洮南街里。旅长陆军少将徐鹏南，辖两个骑兵团，即骑兵二十一团和骑兵三十八团（团长陆军中校蔡惠斌），两团官兵约1 100余人。到1945年8月向苏联红军缴械受降时不足900人（调去“铁心骑兵队”200余人）。

一、新兵人营后的教育

就回忆第一连活动写一个侧面。新兵入营之后由连长训话，到各班看看新兵。从入营的第二天开始就进入新兵教育阶段。因为新兵在连里是阶级（军衔）最小的，叫“少兵”，一个花。按新兵的叫法，叫做“满红一个豆”是任人摆布的阶级。谁要想打你，找个毛病就可以打你一顿。挨打时不许分辩，按班长（所有的老兵都要称为“班长”）的话说，叫“没理由”。就是不许说话，你说话就多打你几下。新兵就怕晚上点名。各连都一样。一天发生的事晚上算总帐，如：内务（被褥、衣服、床铺）没叠好、卫生没搞好、值勤中出了毛病等等，在晚间点呼（晚间查点人数）时打手板，每天都有挨打的；满军里的新兵本来可以吃饱饭的，但是天天吃不饱，吃热大糙子或高粱米饭，二分钟下饭厅，谁也吃不饱；动作慢了要挨打的，整天饿着肚子出操。

新兵入伍之后主要是术科训练，每天八小时，上、下午，中间各休息十分钟，天天如此。开始是徒手教练、持枪教练、实

弹射击、骑马训练（平地跑、越障碍，不齐地通过）、夜间演习等。晴天、阴天、雨天、雪天都一个样。新兵教育六个月。这半年时间，比十年都难熬。过了新兵教育训练减少了，饭可以吃得饱了。

新兵训练结束前，团部组织一次军事演习，全团出动，团长指挥，检查六个月的训练成果，这是新兵训练结束时的一次团作战演习。

在新兵训练期间，每天要背读《国民训》、《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这些诏书都要会背。文化低的新兵为了背诵这些"诏书"不知挨过多少打。连长训话、讲课以及教室（也是食堂）里的标语都直接灌输如何"忠君爱国"的思想，现把标语的内容抄录几条："尽忠诚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天皇陛下万岁！"、"皇帝陛下万岁！"；更有甚者曰："为陛下而生，为陛下而死，为陛下而奋斗！"。作为一个伪满的国兵来说，一切都为"皇帝陛下"的，通过标语口号和平时教育，使伪国兵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忠实奴才。

二、移防迁驻吉林省洮南

1945年初接第八军管区的命令，骑兵二十一团移防迁驻洮南，在移防前各连队进行整编分组，有一部分军官、士兵留在塔溪村原地，另一部分去洮南。

去洮南的部队是在1945年2月中旬从嫩江县塔溪村出发的，走了两天到嫩江，在嫩江停留了两天。第2天夜间乘火车去洮南，天没亮就到了洮南。下车后去洮南南大营，这里的营房条件和塔溪村相比差很远，房子破旧，据说是伪满陆军上将张海鹏的住宅旧址。周围是营房，中间有个四合院、砖墙；营房

有南门、北门，都有卫兵室设备。骑兵二十一团就住在这里。

团部设在四合院内，即团长室、教育室、副官处、军需处、后器室、周番司令室、医务室等。只是兽医室设在马厩附近。全团团长以下约300人，有一半人留在塔溪村。

1945年4月1日，第5期伪国兵入营了，全团接收新兵二百多人。新兵教育仍定六个月。教育内容与上年大致相同。

大约1945年5月接第八军管区命令，组建作战部队——“铁心骑兵队”，去关内配合“铁石部队”和八路军作战。这次组建“铁心骑兵队”是从骑兵二十一团和骑兵三十八团两个团抽人组成，各团抽一百多人，两团共抽官兵二百多人组成。于1945年6月初，从洮南开往关内。

1945年5月9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终了。”的消息传入骑兵二十一团之后，人们的想法各有不同，日本人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中国人感到解放的时刻将到。尽管日本人用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但“日满一德一心”总是一句空话。比如，日本军队吃大米饭、穿呢子军装；而满军士兵吃高粱米饭，穿黄布军装；总是不一样，因此想法也就不一样了。各怀心腹事，拭眼看时局。大约在1945年6月上旬，日本军队从关内大批撤到洮南。洮南飞机场住满了日本兵，他们的最高司令是上将，在日本军来到洮南之后，军管区命令，各团的行动一律听日军的指挥！

1945年8月9日团部下命令挖工事，在洮南县城周围挖反坦克战壕和掩体。8月10日晚，苏联飞机轰炸洮南城，部队处于战争状态。全副武装，整装待战，每天挖战壕，准备打仗。

三、撤离洮南

1945年8月13日，下小到中雨，早饭前团部接到撤离洮南

向齐齐哈尔进发的命令，随即集合，顶雨从洮南向北进发了。一路上道路泥泞，前面是日本军队，后面也是日本军队，骑兵二十一团被夹在中间，走了一整天，傍晚团长下令到白云桦召宿营，甩开日本军队的前后包围。在天要黑时到了宿营地——白云桦召。白云桦召分南白云桦召和北白云桦召，人家很少，两屯相距不远，每屯只有几户人家，团部设在北白云桦召，士兵露天野营。晚间团长召开了各连长及团部军官会议，研究作战计划，第二天早晨很早就吃了早饭，然后集合，团长下命令！“返回洮南，死守洮南”！部队立即回师洮南。在返回洮南途中距洮南约十多里路的地方，周围是高粱地，前面的士兵在汉族军官的指挥下，开枪打死了日本军官三人，钻进高粱地里一人，士兵用轻机关枪扫射，这名日本军官也被打死。另外，活捉了两人，其中一人是教育室少校持田秀胤，一个是兽医少尉，把他们捆绑起来，然后高挂白旗表示投降。

四、向苏联红军受降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午后 5 点钟左右，由原骑兵二十一团高仁舟少校（穿便衣，戴维持会臂章）领来苏联红军，驾驶四辆十轮大卡车，架着重机关枪，载有三十几名士兵，每人都挎着轮枪，有四五名军官，前来收降。

骑兵二十一团的官兵全部缴械，枪支弹药都分别堆放起来，空手受降。全团集合约有 400 余人。苏联红军卡车一到，机枪对准骑兵二十一团的官兵，有一名苏联军官讲了几句话，苏军士兵把缴获的枪支弹药装上卡车，然后下令回洮南。到洮南蹲了一宿城壕，有苏军战士看守。第 2 天清晨，苏联红军把我们抓获后交给他们的两名日本军官枪毙了。把二十一团的官兵全部关在洮南东门外的一所旅店里（俘虏营），每天给三顿饭吃，但不

准出去；可是，几天后二十一团的士兵逃跑得剩下无几了，苏联军队也就不看管了；士兵逃散了，骑兵二十一团覆灭了。

乌烟瘴气的“禁卫步兵团”

溥杰

伪禁卫步兵团初名“翊卫军”，虽号称军，实际上只有三个步兵连，是在伪“执政府”成立前夕，由熙洽从吉林省的公署卫队和公安部队中拚凑而成，送到长春的。当时官不识兵、兵亦不识官。开到长春才临时逐个点名着手编制。有的本是二等兵，因在输送途中私自在肩章上添上一颗星，便算是正式的上等兵，胆大的添上一条金线便成为军士。夜间站岗时，狡猾的兵藏在床下便可以躲过去，而傻些的便须连站几个钟头无人替换，以至有人以“请客”使别人替代站岗，有时则发生穷吵恶骂、甚至拔刀动武。有的兵肩扛轻机枪宿娼，入房即将武器支于门外。有的因争风吃醋用步枪打死人，携械而逃……兵既如此，官自可知：最初任“翊卫军”司令官的，是前清肃亲王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当时改名金璧东），是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包办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伪政权成立后，便一跃而爬上伪铁路警备司令官、伪长春市长、伪翊卫军司令官等等要职，而且是身兼数差，骄横招摇不可一世。有一次他检阅军队，见一班长不顺眼，便喝令卸下背囊离伍前跪，拔出军刀就要亲手砍头，经大家苦苦哀求，才免一死。

后当宪奎之弟宪原继任时，虽较乃兄稍识相些，但在官兵眼中，仍是一个“相当的人物”。有一次和他的团附玉祺因为争

权夺宠大闹摩擦，双方几至火拼。因玉祺为熙洽派去的人，玉祺便找靠山作“秦庭之哭”，宪原遂受到熙洽的奚落，当时即改变态度，和玉祺拍肩携手偕赴酒楼。兵士都说宪原会作戏。

在我到该部队时，不但已由“翊卫军”降为“禁卫步兵团”，而且日本顾问、应聘官和“日系军官”的势力亦逐渐渗透进去，旧军阀的遗风虽尽除去，但殖民奴才的空气，却涨满全团。有一次伪军官饮宴，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佐佐木的军需官，竟抱住伪团长郭文林大亲其嘴，在当时却赢得日本方面的称赞，说该团长“深得士心”，堪为“日满亲善”的榜样。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〇〇辑）

铁石部队的编成

李雪松*

1944年末，伪满洲国军事部抽调伪军编成铁石部队。所谓“铁石”乃按照伪满军训“铁石纪律”和“铁石训练”而取名，利用“铁石”二字做为进关部队的代号。

铁石部队由联络部、步兵旅、骑兵旅编成。联络部作为军事部的幕僚机构，设部长，由军事部南博彦（日本人）上校担任。内设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医处、军法处、军需处、情报处。联络部在军令方面接受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的指挥。

铁石部队步兵旅旅长是粟野少将（日本人），代号铁心部队，

---

* 李雪松，铁石部队步兵二十六团少校连长。

辖二十六、三十七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队。步兵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代号刘德部队（原驻佳木斯市，属步兵第七旅）；步兵三十七团团长南清一（日本人），代号南清部队（原驻锦州市，属第一师）；骑兵队由骑兵十团及二十八团抽编。这些部队士兵均为伪满三、四、五期国兵，于1944年11月在锦州市集结，年末进入河北省冀东地区。旅司令部设在滦县野鸡坨。步兵三十七团与旅司令部驻在同地，派一个营驻防迁安县，步兵二十六团驻防滦县榛子镇。

骑兵旅由伪满兴安军编成，辖二个骑兵团，官兵均是蒙古族。至1944年末在通辽市集结进入河北省铁道南滦南县（倴城）。步兵、骑兵编成及装备：步兵一个团三个步兵营，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8挺重机枪）。步兵连连长以下188名（不含伙、马夫），步兵连装备12挺九六式轻机枪，12具八九式重掷弹筒。步兵团直属队有战防炮连（四一式平射炮8门）、迫击炮连（八二炮8门）、工兵连和辎重连，并有指挥排、通信排、卫生队。

骑兵每团四个大连，连长以下258名（不含伙、马夫），士兵一马一枪一刀。每连有九六式轻机枪12挺，八九式掷弹筒12具。骑炮连有一四式骑炮4门，重机关枪连有十三年式重机枪6挺，一个辎重连、指挥排、通信排。

战车部队长梁瀨上校，代号铁虎部队。建制有一个战车队、一个装甲车队、一个汽车队，驻唐山市。通信营代号铁波部队，也驻唐山市。辎重营代号铁轮部队，驻滦县。独立步兵营（朝鲜族特设队）代号铁人部队，驻防滦县石门。在唐山市设第一兵站；古冶设第二兵站；滦县设第三兵站。各兵站负责各部队弹药、粮草的供应。

冀东地区铁路以南地形平坦开阔，适宜骑兵机动性运动。铁

路北是山岳地带，适宜步兵活动。因此，步兵多驻守在铁路以北地区，骑兵及装甲部队驻守铁路以南地区。

铁石部队的内幕

郑显*

铁石部队是这支部队的总称，它是一支建制较大、兵种较全、隶属关系比较繁复的队伍。总兵力约10 000余人，相当一个军。铁石部队没设司令部，是由联络部和两个战列部队（铁心部队、铁血部队）组成的。

铁石部队的任务和分布情况

铁石部队在日军一四二〇部队指挥下，它的反动任务是给日军打先锋，围剿八路军，充当日军炮灰，确保日军占领区的安全。

铁石部队联络部驻扎在唐山市，受日本一四二〇部队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也受伪满军事部的间接指挥。联络部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军事联络和部队的补给；铁虎部队（装甲车及汽车队）驻扎在滦县，它在联络部的指挥下，担任对铁心、铁血两个部队的作战掩护、协同进攻与补给运输任务；铁轮部队（大车队）驻扎在滦县，在联络部的指挥下，补充汽车队的不足，担任供给铁心、铁血两个部队的补给运输任务；铁波部队（通讯队）驻扎在唐山市，担任各部队间有线、无线通讯联络任务；宪

---

* 郑　显，铁石部队联络部少校参谋。

兵队驻扎在唐山市，负责向铁血、铁心两部队派遣宪兵，监督检查部队的军风、军纪，监视军官的思想活动，特别是对“满系”官兵的监视；兵器修理班驻扎在唐山市，担负各部队的军械修理；被服修理班驻扎在唐山市，担负全部被服修补；野战仓库分别驻扎在唐山市、古冶、滦县，担负全部的粮秣被服等军需任务。铁心部队司令部和骑兵支队驻扎在野鸡坨。步兵二十六团驻扎在榛子镇。步兵三十七团驻扎在杨店子。主要任务是侦察剿讨铁道北地区的八路军，确保日军占领区的安全，随时防备八路军的“侵犯”和在日军一四二〇部队的指挥下，进攻八路军驻扎的革命根据地。铁血部队司令部和步兵支队驻扎倴城镇，所属两个骑兵团，分别驻扎倴城镇周围地区。主要的任务是担负对铁路以南地区的八路军剿讨，借以确保铁南地区的安全。

铁心、铁血二个部队，除了接受日军一四二〇部队司令部对八路军“围剿”的命令采取行动外，各部队也要自行制定计划，在本地区进行“扫荡”活动，每次“扫荡”前后都要及时向联络部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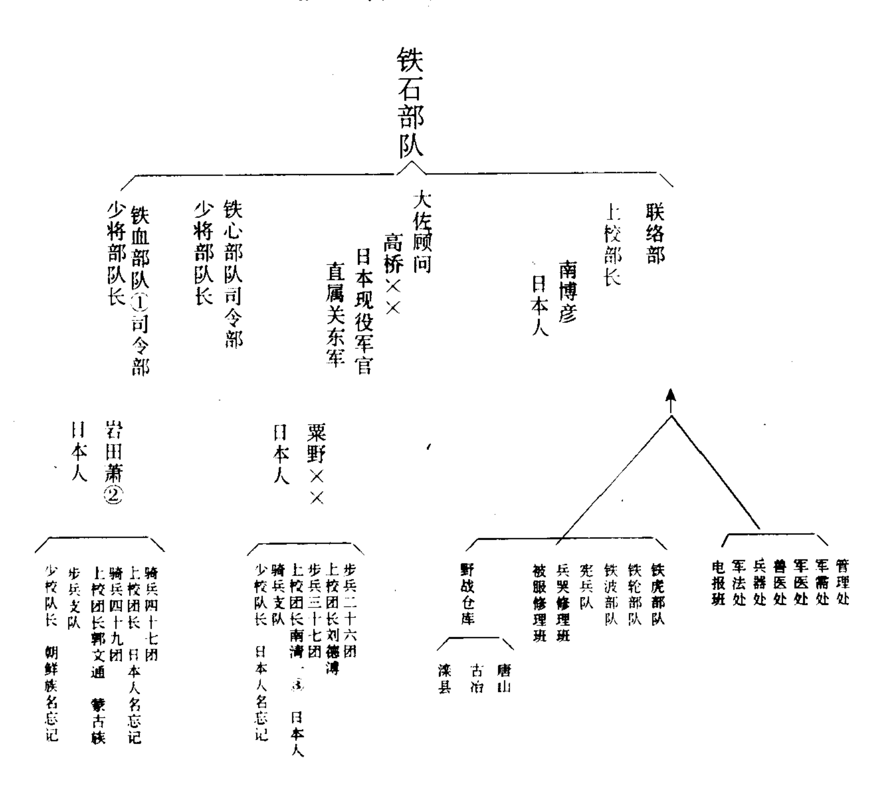
铁石部队对“满系”官兵的奴役与控制

铁石部队中的上、中层的军官多数是日本人。“满系”的官兵受着胁迫，被他们当作奴仆看待，只好一呼百诺，逆来顺受。其中朝鲜族军官、蒙古族军官也不例外。日寇为了控制这些官兵还采取了种种手段。

首先，在思想上对官兵进行奴化教育，时时灌输军人是“皇帝陛下”的股肱，必须效忠“皇帝陛下”。强调“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强调“国泰民安”全赖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庥，迫使这些官兵天天举行遥拜，默祷。同时对这些官兵不断

进行反宣传，以激起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仇恨。说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共妻”，“苏联没有固定夫妻、过着群婚的生活；苏联的孩子不知谁是亲生父母”，“苏联人民吃的是大锅饭，挣钱归公，越穷越好，过的是乞丐生活”等等，说得活灵活现。其次，暗中在部队里潜派宪兵特务，监视这些官兵的一言一行。日本人军官处处显示日本大和民族高人一等，凌辱“满系”官兵是经常的现象，被关禁闭、拘留的事，也层出不穷。如1945年6月间，步兵三十七团有一个士兵，忍受不了这种凌辱，逃跑被捕。经联络部军法处审讯后投入陆军监狱，并通报各部队，以图收杀鸡给猴看之效。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如在1945年7月间，铁轮部队向铁道南的铁血部队运输粮食途中与八路军的基干队遭遇，展开了战斗，一名伪军排长向八路军投诚。此事一发生，在铁石部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日军对“满系”官兵一个个加以甄别、审讯。

铁石部队的组织机构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铁石部队见闻

舍 旺

伪满康德12年（1945年）1月，伪满军事部为了组建铁石部队联络部，从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抽调了陆军中尉包平安、中士舍旺、文书田中××（日本人）。命令他们三天内前往新京（长春）伪军事部报到。

报到后我被编入伪铁石部队联络部军需处，旋即从新京进驻唐山市，直至当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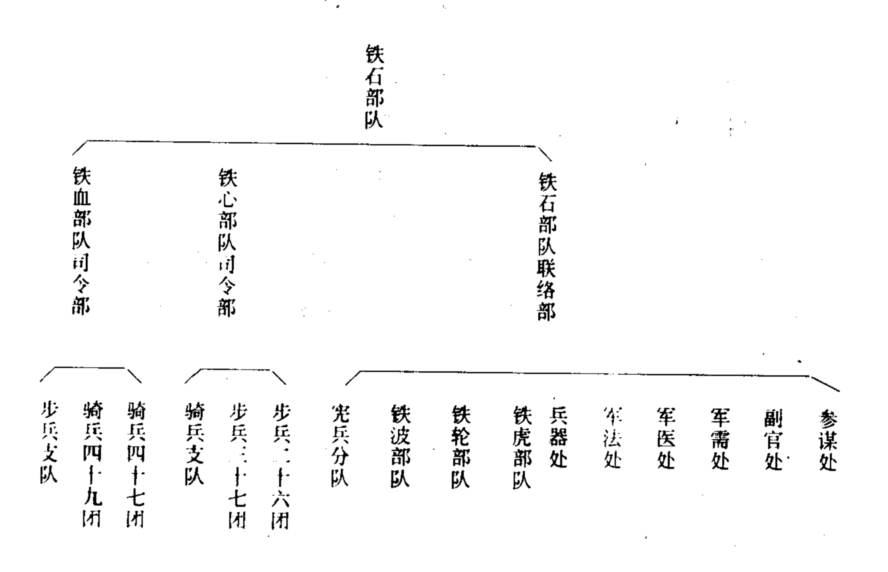
伪满铁石部队是特殊的作战部队。它虽然是伪满军事部的派遣部队，但受日本华北派遣军一四二〇部队司令官加藤勘三郎中将直接指挥，同时也受伪满军事部的直接领导。铁石部队是一支建制较大、兵种较全、隶属关系比较繁复的由各地抽调组成的队伍。

所谓“铁石部队”是其总称，也是伪满军队进驻冀东地区的总代号，是按照“军训”中“铁石纪律”和“铁石训练”取名的。部队除设有联络部外并未设立司令部之类的指挥机构。

铁石部队由联络部、铁心部队、铁血部队组成。其余如铁轮、铁虎、铁波等是联络部所属单位。

1944年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日趋不利，遂将伪满及华北地区的部份日本作战部队先后调往太平洋战场。因此出现日本在华北战场兵力不足的形势。为此，日本关东军决定，由伪满军抽调部分兵力，编为铁石部队进驻冀东地区，以配合日军作战。

铁石部队组织情况：



联络部所属

- 被服、兵器修理班
- 野战仓库
  - 滦县兵站
  - 古冶兵站
  - 唐山兵站
- 情报组
- 电报班
- 兽医所

一、铁石部队联络部

1945年1月初，铁石部队联络部以伪满军事部派出机构的旗号，进驻唐山市斜阳街长达8个月之久。

联络部为伪满军事部在前线的幕僚机构，部长由南博彦上校（日本人）担任。部内除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外，还有军法、军械、军医、兽医、情报、电报班以及被服修理班、野战仓库、宪兵分队等所属各处。此外，还有铁虎部队（装甲车、战车部队）、铁轮部队（汽车运输部队）、铁波部队（通讯队）。野战仓库分设三处兵站，负责各种武器、弹药、被服、粮草等供应。第一兵站设在唐山市，第二兵站设在古冶，第三兵站设在滦县。后来，还专为铁石部队官兵设立两所妓女院。其中，为伪军少校以上军官所设的日本妓女院有日本妓女七八名，为一般士兵所设的中国妓女院有30多名中国妓女。到妓女院要凭联络部发放的票证入院。

那些中国妓女，都是从哈尔滨、黑龙江等地的妓女院中挑选、赎买来的，该妓女院也设在唐山市内。

光复时，野战仓库及其各兵站的大米、面粉、被服等堆积如山的物资，一部分被群众抢走，一部分被铁石部队官兵变卖。

两所妓女院的妓女大部分逃散，其余部分，有的与原铁石部队士兵结婚。还有的无家可归，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

二、铁心部队（步兵旅）

铁心部队由伪满步兵二十六团、三十七团和一骑兵支队组成。部队长粟野重义（日本人）少将；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上校；三十七团团长南清一（日本人）上校；骑兵支队队长为日本少校。

铁心部队司令部和骑兵支队，驻扎在野鸡坨。步兵二十六团和三十七团，分别驻扎在榛子镇和杨店子，主要任务是侦察剿讨铁道北地区的八路军，确保占领区的安全。

1945 年 1 月，铁石部队联络部部长南博彦在唐山市召开团以上指挥官会议，传达日本在华北最高指挥官加藤勘三郎的命令：对冀东地区八路军进行联攻，重点是群山环抱，地势险要的东、西莲花院。加藤认为这里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并命令铁血部队，沿铁道以南地区做好战斗准备。令铁虎部队长梁濑上校率装甲车队，开进古冶，支援南北战场。

铁石部队，以南北合围的态势进攻东西莲花院。进军途中，主攻部队不意陷入八路军的布雷区。爆炸四起，官兵惊慌万状。部队官兵伤亡 50 余人。由铁心部队长粟野少将亲自指挥的第一次联攻以损兵折将而告终。

当年 6 月，粟野少将又指挥南清一部和刘德溥部两个团，按其作战计划，进攻乐亭县石臼岛上的八路军某部。但未攻前八路军已获悉情报撤走。伪军扑空，当夜在分路回师途中南清一部和刘德溥部发生误战，交战中，南清一团长受伤。

南清一伤势虽轻，但在联络部内的日本人中议论纷纷。他们认为不是误战，而是有意所为。联络部参谋可知（日本人）少校说：“奇怪呀，一个步兵团，有一千五百多人，士兵无一伤亡，什么原因指挥官（南清一是日本人）首先受伤?”但是否误战，是有意还是无意，因无真凭实据，日本人也无可奈何了，只能不了了之。

三、铁血部队（骑兵旅）

铁血部队是以伪满兴安骑兵第四十七团和四十九团，并配朝鲜步兵支队组成。其部队长为岩田熏（日本人）少将，骑兵

四十七团团长为日本上校，骑兵四十九团团长为郭文通（达斡尔族）少将，步兵支队队长是一位朝鲜族少校。

铁血部队的两个团每个团四个连，每连由250名官兵组成。该部队官兵总人数为2 500多人，铁血部队司令部及其步兵支队，驻扎在倴城镇内。所属两个骑兵团，分别驻扎在倴城镇周围地区，主要任务是对铁路以南地区的八路军剿讨，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

1945年2月（腊月三十日）铁血部队派出小泉和雄（日本人）上尉连长为首的骑兵四十七团第一连三个排的人马，前往附近村庄搜集春节所需的柴草。早晨7时半左右，小泉和雄率部开进村庄，全村家家户户空无一人。小泉和雄以为该村老百姓获悉日伪军行动而逃，立即下令分散到各院，自行搜集柴草。正值此时，四面八方响起枪声，埋伏在村外的八路军开始了猛烈的进攻。小泉和雄等人慌马乱，毫无还手之机而被就地全歼。这样经30多分钟的速战速决，八路军获胜后，迅速率部撤退。

为此日本人常说："前线指挥官，到现在还不知道，八路军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八路军这个事实。"

据说铁石部队后来又调去一个"朝鲜特设队"。其代号为"铁人部队"，驻防在滦县石门一带，为联络部所属。但对其任务、活动范围不甚了解。

四、铁石部队的瓦解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宣告垮台，伪铁石部队亦随之树倒猢狲散，官兵各自投奔其程。

1945年8月15日，伪满铁石部队联络部南博彦上校以沉闷的声音，向我们宣读了日本裕仁天皇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当时在场的日本人狂喊乱叫，抱头痛哭。从此，日本人盛气凌

人的时代结束了。

铁心部队，在上校团长刘德溥等人的率领下，解除了日本军官的武器，组织所部准备投靠国民党，继而改称为“榆关先遣混成第一旅”。刘德溥自任上校旅长。并派人往返北平多次，最后得到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批准正式受编。受编后部队番号为“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被任命为少将总队长。从1945年开始，率部活动在沈阳以北地区，后来在彰武县一带驻防。

铁血部队，在原伪满兴安军四十九团少将团长郭文通等人率领下，解除日本军官的武装后，全旅迅速返回了东北。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少将高参刘梦黎，亲自前来唐山，欲速收容这两个兴安骑兵团，并发布队号为“山海关先遣军”，任命郭文通为中将司令。还先后两次派我到东北给郭文通送信。但是，郭文通、阿思根等人旗帜鲜明，反对国民党收编，积极进行自治运动。从而国民党收容兴安骑兵的美梦已成泡影。

当时联络部所属各单位也自动潜散，大部分投入国民党。联络部内的日本军官数名趁机携械投奔了驻唐山市的日本一四二〇部队。他们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特别行政区长官姜鹏飞（汪精卫部）勾结，观察形势的变化。

联络部中以原伪满军需少校王化兴为首的近30名中国人，在铁路交通断绝、自己又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被困在唐山市内。这时，从北平来了一位身穿便服，看上去很阔气的“不速之客”，他同王化兴面谈了几个小时后，王化兴召集我们开会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现在国民党军统局高级参谋刘梦黎少将亲自光临，身带委任状，愿将原铁血部队两个骑兵团收容过来，改编为‘山海关先遣军’，司令部设在锦州，任命郭文通为中将司令”。王化兴接着说：“对我们来说，这

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不久就要返回东北，这才是我们今后真正为国民党出力的好机会，是唯一出路……”。

王化兴以少将副司令的身份，组建了司令部，但因无兵力、需迅速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因此，他于当年年末率司令部人员进驻沈阳市，改称“东北保安独立支队”。

伪满铁石部队

刘德溥

一、铁石部队编成概况

1944年冬，伪满军事部，依据关东军的指示，抽调一部“精锐”伪满军，编成一个混合部队（相当于一个师团），然后进驻河北省冀东地区，受当地日军区署，分担一部“治安肃正”（即剿共）任务。据此，伪满军事部，确定编成一个部队，部队名称为“铁石部队”。当由驻佳木斯第七军管区步兵二十六团和驻锦州靖安师步兵三十七团，以及从骑兵二十一团和骑兵三十八团，各抽调一部合编为骑兵队（相当于两个骑兵连）编为铁石部队的铁血部队（相当于一个旅），部队长为日系粟野少将。

另以伪满蒙古军两个骑兵团（番号和原驻地均不清楚）合编为铁石部队的铁心部队（相当于一个骑兵旅），部队长为日系岩田少将。此外，铁石部队的直属部队有：一个辎重队，名为铁石部队铁轮部队，部队长日系中校斋藤。一个装甲车营（装甲汽车和轻战车混合编成）名为铁石部队铁虎部队，部队长日

系姓名不详。此外，还有铁路警护队和宪兵队等，总兵力约为16 000人。以上各部队，在1945年1月上旬，先后从伪满进入冀东地区。各部队的驻地和任务如下：

铁血部队本部及其所属骑兵队，驻滦县北野鸡坨。其属下步兵二十六团驻滦县西北榛子镇。步兵三十七团驻迁安县管内军甸子，担任北宁铁路唐山——滦县间的铁路警护和对铁路以北山区的“治安肃正”。铁心部队主力驻滦南县（原倴城镇）担任铁道以南平原地区的“治安肃正”。

铁石部队的上层机构，是铁石部队联络处，驻唐山市。主要负责人是伪满军事部日本顾问林大佐。他担任对驻唐山日军联络，传达日军对铁血、铁心两部队的指示以及伪满军事部的一切指令，它是铁石部队对内对外联络的中枢机构。

铁石部队联络处，设有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军需处直受林大佐的监督指导，而处的日系军官操纵着实权。

二、铁血部队的编制装备

铁血部队属下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队，总人数约8 500名左右。军官中，日系占四分之一，士兵全是伪满“国兵”，二年兵和三年兵（即入营一年以上者为二年兵，二年以上者为三年兵）。

步兵团：团本部属下三个营，每营部兵三个连，一个机枪连。步兵连每连三个排，每排四个班，每班三个组（一个轻机组，一个掷弹筒组，一个步枪组，全班约20人）。班长和轻机组长均各配有自来德手枪一支，步枪组配有两支狙击枪。计每连有轻机枪12挺，掷弹筒12门，士兵配步枪和手榴弹等。机关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两个机枪班，一个弹药班）。每连六挺重机，每人各步枪一支。团属部队：一个迫机炮连（八二轻

迫击炮8门，步枪、狙击枪和自来德手枪与步兵连同）；一个速射炮连（编制和装备同步兵连）；一个通讯排（无线通信，五瓦特电台两部）；一个行李队（编制同步兵连，计有胶轮大车30辆，輓马60余匹，大卡车4部）；配属部队一个工兵连（编制装备与步兵连同）全团总人数约4 000名左右，乘驮輓马140余匹。

骑兵队：队部以下有两个骑兵连，除每人的乘马外，其人数和装备与步兵连同。

配属宪兵排：主力驻滦县北野鸡坨，每个步兵团均驻3名宪兵军士担任军风纪和官兵动态调查。

三、铁石部队的铁血部队在锦州市集中情况

1944年12月下旬，铁石部队的铁血部队属下步兵第二十六团，在佳木斯市集中后乘火车到锦州市，与原驻锦州的前兵第三十七团集结在一起。之后，在铁血部队长粟野少将主持下，举行部队编成仪式。宣布部队编成命令，举行阅兵分列外，伪满皇帝溥仪派来侍从武官中校田宏图宣达“上谕”，“上谕”主旨是，日满一德一心，以及发扬“国军”精神等等。接着关东军参谋长“训话”大意是：日满两军本着同心同德，共存共荣的精神，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而努力等等。满映（伪满电影制片厂）摄影队对此次编成仪式拍摄了新闻电影。仪式结束后，关东军参谋长在驻锦州日军司令部设宴，招待铁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我当时是铁血部队第二十六团团长，也应邀参加）。宴会中参谋长致词，我因不懂日语，内容不详。宴会后，粟野少将对我说：“参谋长的讲话，是勉励我们到任务地后，好自与日军协作，更要严整军纪以及与共产党作人心的争夺战等等。”

次日，由伪满军事部参谋司派来参谋数人（多数是日系）在步兵第三十七团军官集会所，召集铁血部队连长以上军官，实

行课堂教育。首先阐释冀东地区共产党活动情况、八路军的游击战法，以及在“讨伐”中的注意事项。特别强调与共产党作战，是人心的争夺战，务要严整军纪，剿抚并重。对当地居民尽量羁摩怀柔争取当地人民对我们的好感。并依据八路军游击战法的原则，以白纸战术形式，作了许多问答题，当堂作业和发表原案。此外，强调对外保密，并由军事部照令规定，团、营、连、排的番号，只限用于内部。对外的部队名称，则以各该部队长姓名代称。如步兵第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则称“刘德部队”，但连以下的小部队则只称队。如步兵第二十六团第一连长潘瑞复，则称“潘瑞队”，以此“防谍”。以上教育共进行两天。

四、铁血部队步兵第二十六团进驻榛子镇的罪恶活动

1. 进驻榛子镇

铁血部队在锦州编成后，步兵第二十六团由团长刘德溥率领下，于1945年1月1日，从锦州开拔到滦县榛子镇。（该镇在北宁铁路古冶车站西北约15公里）该镇原驻日军“春兵团”一个大队（即一个营）。步兵第二十六团到达后，接管了日军原驻的房舍。日军始撤回唐山市。

2. 进犯解放区罪恶活动

①搜索扫荡

搜索扫荡，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远距离的搜索扫荡，一般是远击驻地一日行程以上的地点，通常是依照铁血部队长的计划和命令执行。从1945年1月8日，前后共3次，每次都是与邻接部队步兵三十七团协力行动。以分进合围的方式，对于定地点包围扫荡。另一类是，在榛子镇周围边20公里以内的地区搜索扫荡。一般是，由部队自行计划，自行决定。从本年1月至8月，这种扫荡不下30次。尽管我们多次的扫荡，由于解放区

军民一体，组织严密，从未包围住过八路军。而广大人民群众，在同仇敌忾和坚壁清野的行动下，被包围住的仅是一些老幼妇孺。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的人民经常是寝食不安，不论昼夜风雨，只要发现伪军行动的信号，全村居民则扶老携幼地向山里躲藏，而一般青壮年，多是日夜露宿在山间田野里，鸡犬不宁。

伪部队进入人物已空的村落后，当然是无物可抢，借此宣传什么“秋毫不犯”。但如在田野或山洞里，发现了农民的粮物则是八路军的军需品，以“战利品”的名堂，掠夺一空。1945年春，步二十六团主力，在榛子镇东北方（距榛子镇约20公里）的山边地带扫荡中，曾在山洞里发现了5 000余公斤粮食，百余套军服，和数百双鞋，数架缝纫机和千余件铜器（其中大多数是铜佛和一些铜制品）尽数抢掠一空，美其名曰虏获品。

1945年夏，部队主力在榛子镇北方10公里下官营扫荡时，据当时伪滦县保安中队长张旭仁报告，该村东南街路南某户（姓名忘记）是共产党干部的家（当时该家一个人也没有），我当时很嘉勉张旭仁的报告，并对张说：“如确属实在，你们可以把那家的东西什物，拿回你们中队使用。”于是该保卫队便将该家洗劫一空，连锅碗门窗，全都拿走，总之只要有词可借，便行抢掠。

此外，在历次搜索扫荡中，遇有青壮年男子，则是无例外地由情报班加以讯问，稍有支吾，则是打骂交加，说是共产党干部，直至问不出任何情况时，才能释放。这个罪恶的搜索扫荡，给解放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②奇袭剔抉

奇袭剔抉，是铁石部队经常使用的一个罪恶战法，所谓奇袭剔抉，就是在夜间行动。对预定包围的村庄，在拂晓前完成

全面包围，以期把住在被包围村庄中的革命武装和干部一网打尽。天明后缩小包围圈，并按户搜查，将青壮年男子集合在一起，从中找革命干部，遇有言语支吾，和因害怕表现变颜变色者，则认为是共产党的嫌疑，反复讯问。在讯问中打骂是常事，直至问不出任何情况，查不出任何证据后，还得经过庄内住户证明，才能释放。在这样威胁讯问之后，接着便是反共宣传，就是对这些被围集在一起的人们“讲话”，说：“共产党是用富人的钱，穷人的命，来给共产党打江山。”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和破坏了中国的礼教，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骗”等等谰言。这样的奇袭剔抉，从1945年8月，总共不下十几次。在各次奇袭剔抉中，虽没有包围住过革命武装部队，和搜查出来革命干部，但给与解放区革命工作威胁很大。

③进犯解放区的战斗

下官营战斗：1945年3月间，第一营长李治唐，根据团的命令，率全营向榛子镇北方10公里的下官营一带搜索扫荡，当时抵下官营村落东南方时，突受到下官营东端高地射击，便及时展开战斗，激战半日，双方伤亡续出，终以由于该营火力炽盛，和兵力数倍于八路军，八路军始逐次后撤。这次战斗八路军有多少伤亡不清楚，部队番号也不知道。只据李治唐报称：八路军战力极强，占领下官营东端高地的八路军，最多也不过百余人。当我营展开攻击后，尽管我们火力炽盛，而八路军始终是沉着应战，多次攻击前进。

我右翼第一线包围高地，冲锋到阵地前时，竟有一名八路军战士，以手榴弹坚持战斗，最后用手榴弹自爆，壮烈牺牲。这个神话般的行动，当时震撼了全营。此后，便不敢轻易冒进地追击。经过这次战斗后，由于八路军战士自爆牺牲的生动事实，把以往自认为装备优势，对八路军有恃无恐的说法，根本没有

了。八路军锐不可当的说法增多了。对八路军作的必胜信念，连日系军官也缄口不言了。

张庄子战斗：1945年6月间，第二营长日系高山，率属全营去榛子镇东方一带征购柴草，于当日12时左右，在榛子镇东方约五六公里的张庄子休息时，突然受到三方面包围攻击。当时该营长指挥所部，依据村落，展开战斗，但八路军攻势甚猛，逐渐近村庄，该营便陷于被包围中。这时营利用军鸽通信，报告了战斗情况。我接得报告后，率属另外一个营前往增援，约在当日下午5时，增援部队到达张庄了。此时，原被包围的第二营，已经是伤亡续出，苦撑待援。增援部队接替了第二营的占领线。第二营撤至村落内整备，当日薄暮后，撤回榛子镇。这次战斗，八路军的番号和兵力始终不知道。只是在战斗中攻击精神极为旺盛，把伪军打得丢魂丧胆。这次战斗伪军伤亡约20多名，八路军有多少伤亡不清楚。

董庄子战斗：1945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率团主力部队，依夜行军向榛子镇北方上下水峪方面搜索扫荡，约在当日上午5时左右，部队先头行抵距榛子镇约20公里董庄子西端，突然受到炽盛火力的射击。当时正在拂晓，又加上青纱帐起，只听枪声，不了解情况，于是，遂在董庄子西端统一展开。当展开后，反是先头部队的正面，发生战斗。战斗约半个小时后，左右翼侧相继发生了战斗。这样持续了4个多小时后，八路军从中突入，此时，全线动摇。当时经预备队增援，一时把突破口堵住，终是受到三面攻击。于当日10时左右，被迫后退至董庄子，依据村落，行决战防御。因为村落周边，射界视界均较广阔，便于发扬火力，所以八路军未再续行进攻。这次战斗时间，虽仅5个多小时，战斗情况时急时缓，但伪军的士气，则是突出的低落，更加青纱帐蔽目，视界不清，而八路军神出鬼没的行动，打

得伪军草木皆兵，完全被动。

军官则夸大情况，士兵则后退不前。而八路军兵力虽然不明，依各方面枪声判断，毕竟是少于我们的兵力，其所以把我们打得狼狈不堪，节节后退，主要是八路军具有高度敌忾同仇的政治觉悟，从而有着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无畏的攻击精神。其次是战法的巧妙，有效地利用青纱帐的隐蔽，时时处于主动地位。这次战斗我方伤亡了三四名，八路军有无伤亡，不清楚。

相公庄战斗：约在1945年4月间，依伪铁血部队长命令，步二十六团主力部队到滦县野鸡坨集中，尔后在铁血部队长直接指挥下行动。当时，我因身体不好，在榛子镇休养，令中校团附关瑞玺带着团的主力到野鸡坨集中。以后据关瑞玺报称，它们的战斗情况如下：

粟野部队长，亲自指挥步兵二十六团、三十七团和骑兵队。在河北省迁安县卢龙县境内，行大规模的扫荡。某日上午，骑兵队搜索到相公庄时（模糊记忆该庄在卢龙县管内）与约百余名八路军遭遇。战斗开始后，铁血部队长粟野，令步二十六团、三十七团将相公庄四面包围攻击。但被包围在相公庄的八路军，依据该庄房屋，沉着应战。由于八路军英勇的战斗精神，和相公庄四周，都是平坦开阔地的有利地势，兵力虽少，却连续打退了伪军的多次进攻。伪军经多次进攻受挫后，无力前进。这时粟野部队长，又令各团迫击炮和掷弹筒集中射击2分钟，利用炮火轰炸的烟幕，一举攻下。当时两个步兵团共有迫击炮16门，掷弹筒200余门，在集中射击2分钟后，相公庄百余户房屋，已是一片火海。第一线部队在猛烈炮火轰击下，继续攻击前进。但出人意料的是八路军在这样炮火轰击下，不为所动，仍是依着残垣废墟坚持应战。使攻击部队又遭顿挫，不能前进。午后5小时左右，野部队长令各攻击部队暂停攻击，继续严密包围，待

明早拂晓一举攻入庄内。到了翌日拂晓攻入该庄时，竟然一枪未响，始知被包围的百余名八路军，已于夜间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在兵力对比上，八路军仅百余名，而伪军不仅装备优势，人数在6 000人以上，也就是60倍于八路军，结果是八路军安全转移，开了战史的先例。八路军这一辉煌的战例，引起了伪军战斗意志的动摇，甚至有的说："八路军是神兵谁也打不了。"这次战斗，铁血部队有数名伤亡，八路军部队番号和这次战斗有多少伤亡都不清楚。只是在废墟中，看到一位老太太被炸死，相公庄的房屋，大部被炸毁，给予人民生命财产的危害很大。

3. 滦南大扫荡

1945年5月间，铁血部队根据驻唐山市日军的命令，全部进击北宁铁路以南地区，进行为期三周的大扫荡。步兵二十六团依铁血部队命令，首先进击现滦县西方坨子头附近。尔后，夜行军向汀流河前进，在大清河东岸，乐亭县城以西地区，南至石臼坨（渤海口岸）北至乐亭县庞各庄地区，进行反复搜索扫荡。在此期间，昼夜的搜索扫荡和夜间的奇袭剔抉，交替进行。尽管未与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接触，而地方居民则是受了灾难性的蹂躏。凡是伪军所至之处，都是十室九空。

这次大扫荡的地区，仅知是唐山至滦县间铁路以南的地区。参加这个地区扫荡的部队，是铁石部队的铁血部队和铁心部队，具体部署不清楚。只知步第二十六团以西地区是铁心部队（蒙古骑兵）。以东邻接地区，是铁血部队的主力（步兵三十七团和骑兵队）。在这次扫荡期间据当地人民传说：在蒙古军（铁心部队）扫荡区内，到处是奸淫抢掠。同时也亲眼看到，许多扶老携幼的妇女，集体逃难。而步三十七团大肆抓当地青壮年男子，编成踩雷队。就是在行军时，将这个踩雷队摆在部队先头行进，作为踩地雷的牺牲者。

五、营妓

1945年4月间，伪满军事部，从伪满各大都市妓院中，征集一批妓女，分配到铁石部队各部队，是为随营娼妓。这些被征集的妓女，都是负债在千元（伪满币）以上。规定她们只少要当一年或6个月的营妓，便算还清债务。名曰慰劳“国军”，实际上是伪满军事部的摊派。步兵二十六团分配的营妓40名。当她们到达部队后，首先由部队军医，进行身体检查，没有花柳病的，便令其开门接客；有花柳病的，则先治疗修养，俟病愈后即行营业。依照当时伪满军事部军医科指示，每个妓女，每日接客6次。嗣经部队军医实际调查，如每日6次妓女的体力支持不了，遂改为每日4次。部队官兵则按照配给办法，凭配给票游乐。士兵每月可以轮着一次，军官两次；至于住宿，则仅限于军官，士兵只能在昼夜游乐。

当时在榛子镇的营妓，住在该镇东门外一个大院里。名是妓院，实同监牢，既不能与部队以外人士接触，又不能走出院外一步。表面上是说怕受到共产党的利用，实在是怕她们乘隙潜逃。而她们每次接客的代价，则是微乎其微（她们的食宿是部队供给，接客的代价，由部队规定，具体情况记不清了）。每月所得，仅够零用。直至日本降服后，才恢复了她们的自由。

六、投机“反正”　继续反共反人民

1945年8月13日，铁血部队长粟野少将接到步二十六团日系军官给他的秘信，称二十六团日满两系的隔阂很深，团长（指我）对八路军“进剿”态度暧昧。是日他以视察名义，听取二十六团日系军官汇报。

同日15日上午9时许，粟野少将接到铁石部队联络处的电

报，概谓，奉军事部电令，目下苏军进入满洲国境，铁血部队依铁路运输，星夜“回国”，着令粟野部队长，率属所部，即日轻装到滦县车站集中，所有列车运输事宜，已由联络处代为筹备等。上午10时许，粟野对我说明了铁石部队联络处的命令，并令我即时作出发准备，向滦县车站集中，以待后命。我当时稍加考虑后，便对粟野少将说：“部队储备弹药和粮食被服很多，只有大量征用驴驮子和车辆才能运搬。并且每次征用驴驮子，都得在拂晓前进村庄包围才能抓到。否则根本征集不着。”粟野说：“我们只带弹药，不带粮、服，利用行李队的运输工具运搬”。我说：“团的储备弹药，就有百余万发，就是行李队车辆，完全运弹药也不够用。并且第二营，今早已去古冶车站，掩护输运粮服，总得午后5时以后，才能回来。如果把这些弹药弃置不带，岂不等于给八路军补充弹药。况且回国后，说不定马上就参加作战，如弹药不足同样是完成不了任务。现在联络处又没有具体指示，如果这样把弹药抛弃，是否负有很大的责任呢？”粟野部队长，踌躇了几分钟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暂作出发准备，入夜后抓驴驮了，明早向滦县车站集中。

我和粟野说完话后，便回到我住的屋子里，当时与中校团副关瑞玺密议（我俩关系最密切）认为这样匆忙的命令，显系东北情势危急。基于1938年苏军在“满”苏国境张鼓峰，和1939年的诺门罕给与日寇的教训，如果我们直接参加对苏作战，那是以卵击石死路一条。可是我们如现在“反正”预想八路军会援助我们，不仅可以躲过对苏作战，还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我们这个汉奸皮，也可以脱掉。当时关瑞玺十分同意我的主张，并说：“说干就干，事不宜迟，就这样做吧。”关又说：“粟野这次来部队视察，听说是：粟野因为咱团日系军官给粟野去信，说你对日系压制，对八路军作战不积极，所以以视察名义而来调

查。上月铁石部队联络处也指责我们，都是表现出对我们的怀疑。现在只有‘反正’。还回到东北参加对苏作战，则是九死一生，纵然不既时参加对苏作战，也恐怕受日系军官的陷害。”经反复考虑后，决定“反正”。但当时步兵三十七团主力在河南宿营，而该团的团长、中校团副和营长，全都是日系。一般“满系”军官，彼此也不认识。尤其是该团是在伪满军中著名的亲日部队。能否跟我们“反正”没有把握。如用武力解决，很有可能发生战斗，只有采用缓和办法，造成“反正”事实，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归我们控制。而步二十六团的官兵，固然有些把握，终是人心莫测，为了断念其对日本的依附，就说：“日本大本营已然投降”。当时的处置如下：

①对榛子镇城门实行严密警戒，非经部队长（指我）许可一律不准出入。

②指令第一连长，负责缴日系军官的武器，如拒不受缴，则当场射杀。

③对步三十七团日“满”系军官，假粟野部队长的命令，指令到榛子镇集合，听候训话，俟他们进入镇内后，指令日系军官到团本部集合，然后予以缴械。“满系”军官则对他们宣布“反正”就说：步兵二十六团团长与祖国中央早有联系，现奉命“反正”。目下日本大本营已经投降，东北日军已大部向苏军投降，关内日军也全部在包围中。而粟野少将以下全部日系军官，已经全部缴械，你团已来榛子镇集合的日系军官，也缴械。对仍在团的日系军官，由申绍志少校负责，予以缴械后送至本部处理。如有拒不受缴者则予以射杀。这个处置决定后，约在当日午后2时左右，即按预定处置，顺利进行完毕。

部队“反正”后，部队官兵的情绪极为高涨，当时一面以粟野部队长的名义，继续用天线通讯与铁石部队联络处联络，谎

报榛子镇周边地区发现八路军有力部队行动，俟该部队远离榛子镇周边后，即行到滦县车站集结等等，以使铁石部队联络处和日军方面对我们的迟迟不动不致发生怀疑，利于尔后行动上的准备，同时令各部队行至严的戒备，严防日寇的进攻。此外对团的军官，不分年资一律各进一级。并令关瑞玺为步兵二十六团团长，申绍志为步兵三十七团团长，我任旅长。一面令负责情报的上尉团副夏适英，找素与八路军联系的甲长求他与八路军联系，说我部队已决定“反正”，希望与八路军联系，与八路军负责人接头。当时这位甲长侃然应诺，代为联络。这样处置后，等待与八路军接洽后，再决定以后的行动。至于对已缴械的日系军官（粟野少将以下约40余名）备作人质。一旦日寇向我们进攻，利用他们作为制止进攻的缓冲，俟与八路军接洽后，再行决定最后处理。因此，将他们关押在一起，未加杀戮。以后因日军全部投降，在同年9月间，便全部释放了。仅是在缴械当时，有两名拒缴反捕，当场射杀。

15日晚间，约在7、8点钟，据通讯班长报告，在收听到北平的广播日本已无条件投降。这一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欢欣若狂。接着又收到蒋介石在广播中的指令各沦陷区的军政，各在原地维持“治安”，听候指示。在此同时，夏廷英报称：“经某甲长联络，我已与共产党干部见了一面，那位干部说：‘他马上向上级请示，听候指示’。”等。我当时认为跟八路军走，那只能限于情况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是一条出路，但它毕竟不是“正统”，日寇降服后，连八路军本身，还得受国民党政府改编。如果八路军继续反对国民党，与国民党敌对到底，我们跟着它走，则又成为叛乱的军队了。我们与国民党虽然事前没有直接联系，它毕竟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既当汉奸于前，再不能“叛乱”于后。于是马上改变初衷，令夏廷英不要再和八路军联

络。同时并令各部队对八路军采取各不相犯的态势，把榛子镇城门重行关闭。以后听说：当我部队举行“反正”时，榛子镇以北解放区各村庄，都敲锣打鼓的庆贺，准备欢送我们。可是，我在一夜之后，又摇身一变，继续与人民为敌。

到了翌日，我便宣布伪部队番号为东北挺进军混成第一旅，我封为旅长。下旬，依伪军第一师，我任伪师长。同年9月间，依东北行营的命令，改编为东北保安第二总队，我任总队长。1947年8月依东北行辕的命令，改编为东北第十一保安队，我任司令。同年9月依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队的命令，改编为暂编五十六师，我任师长。1948年秋，长春解放战役，全部被歼灭。

有关姜鹏飞与“铁石部队”史实的几点考证

于泾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立刻发动了内战。沦陷了十四年之久的东北，又陷入内战的炮火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于1946年爆发了“四·一四”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战役。关于这次战役，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亲历者后来的回忆，现代历史的著述，都显示了若干歧异和矛盾。本文拟就有关的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意见，供研究东北地方史志工作的参考。

一、关于“铁石部队”

“铁石部队”是由日军直接指挥的一支伪满军队。它形成

的时间，约在1944年末。当时日军已在大陆和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纳粹德国已经濒于灭亡。日本尤为担心的是在冀热辽地区八路军的李运昌部队日益逼近长城东部，威逼平津、唐山和承德等地，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华北的统治受到了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和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签订了一个“满华国境地带治安肃正协定”，企图借助伪满军警部队的武力，维持冀东地区的局势，防止解放区向东北的进一步扩展。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1945年1月15日，伪满军警组成了三支部队，统归日军华北方面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司令官加藤泊治郎中将指挥。这三支部队是：

1.“一心队”：这是伪满的警察队，由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和伪满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指挥。后来由皆川任总队长。这个队组建较早，进关也较早，在1943年就进入了冀东。总共人数约4 500人。当临近抗战胜利时，该部官兵自发地处决了51名日本军官，之后自行解散。

2.“铁石部队”：编成与进入冀东晚于“一心队”，属伪满军的建制。有的史料上说它拥有1.5万人，而国民党的陆军总部在抗战胜利后收编时的实有人数为4 671人，由两个步兵团组成。收编当时命名为“东北保安暂编第二总队”，后来去掉了“暂编”字样。1945年末至1946年初，由唐山空运长春，成为国民党侵占该地的主力，随后于1946年4月的解放长春战役中被歼。

3.“铁华部队”：也属伪满军建制，原为伪满的“铁路警护队”，自1944年3月1日以后，原来的伪铁路警护队改归伪治安部管辖，因此由伪警变成了伪军。这支伪军也和前述的“一心队”、“铁石部队”先后在冀东驻扎。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

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收编当时的兵力大约相当于一个师。这支部队的命运与“铁石部队”相同，都是在长春被歼灭的。

这三支队伍有几个共同之处：一是队部都设在河北遵化县，都在唐山、承德两地设有办事处（当时称“联络部”）；二是都在冀东地区和侵华日军、华北伪军相配合，共同围攻八路军和冀东人民的抗日武装；三是伪军中的某些上层中国人军官和国民党之间长期保持某种联系，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归附国民党军建制，投入反人民的内战。当然也有一些爱国官兵反对卖国求荣，不避艰险为人民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

1946年4月的解放长春战役前后，我方的新闻报道，一律称“姜鹏飞部铁石部队”，不论是《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还是新华社的电讯，大体上都如此。直到1948年长春解放，《东北日报》1948年10月21日的报道还是：“……长春，系于一九四六年四月由东北人民解放军（按：实际当时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自伪军姜鹏飞部手中收复，又于同年5月被国民党军侵占者……”尤其已经过去40年，现在刊印的历史书籍、革命回忆录等等，依然如故。如“……最为顽固的是由大汉奸姜鹏飞指挥的号称‘铁石’部队的第二总队一个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全歼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铁石’部队2万人。”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国民党的东北保安第二总队长是刘德溥，并不是姜鹏飞。在这次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守军的是长春防守司令陈家珍（在长春战役中被俘），也不是姜鹏飞。

二、姜鹏飞其人

姜鹏飞在1946年，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都算得上是个新闻人物。据1946年的档案；其人的主要经历如下：

姜鹏飞，又名凤飞，锦州人，45岁，东北讲武堂第七期生，

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甫起，和程志远相率投敌，为日寇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总队长，第七军官区（驻佳木斯）少将参谋长。1940年，离开伪满洲国去华北，后历任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部部附、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指挥冀东伪军，向抗日军民反复进行大扫荡数次，制造潘家峪事件等惨案。

姜在伪满和华北时期，就和国民党反动派陈仓暗渡，互相勾结，以后变为公开结合。1945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以“总导字1016号任命状”，委姜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其后又以“总导字第1036号任命状”，委姜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又因姜在伪满爪牙甚多，蒋介石集团几次电催他“火速退却关外，尽量收容伪满军”，12月遂由北平来到锦州。

1946年1月姜在锦州见杜聿明，杜指示“担当后方扰乱，相机占领哈尔滨”。2月，姜到达哈市，亲手拟订《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所属各部队接收东北要纲”，规定“收编旧东北军、伪满军、潜伏日军及地下武装团体”，收编了左建堂、李华堂、谢文东等16个匪师。此后，姜鹏飞按照杜聿明的指示，曾经企图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攻占哈尔滨；又阴谋发动暴乱，召集他的部下围攻哈尔滨，但都未能得逞。1946年8月26日，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捕获了姜鹏飞及其部分党羽。同年9月10日，姜鹏飞被处决。姜鹏飞在东北的活动，由他代表国民党所组织的大批土匪队伍，曾一度牵制过我军的兵力，对于东北民主联军也确有过一定的威胁。但是，姜鹏飞和铁石部队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我们根据前面引用过的史料，概括起来可以了解到的是：

1. “九·一八”事变以前，他是东北军的军官。

2. 1932年和程志远一起投敌，成为伪满军的军官。

3. 1940年以后进关，成为伪华北绥靖军的军官。

4. 抗战胜利后先后被国民党委任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和“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5. 按杜聿明的指示，1946年2月潜入哈尔滨，直到同年8月被捕，9月被处决，都是在哈尔滨及其附近活动的。

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1940年以后，他已经属于华北伪军的建制。据现存的史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4月1日，由齐燮元任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姜鹏飞当隶属于这个华北伪军。1944年2月8日，华北伪军改由门致中指挥，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17日，蒋介石集团任命门致中为第九路军总司令，把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所辖的13个集团（相当于旅的建制）改编为3个军，即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和第二十四军。姜鹏飞被委任为第二十七军军长。

三、几点简要的结论

姜鹏飞的下场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他不是伪满军铁石部队的指挥官，也不是1946年解放长春战役中国民党守军的指挥者，这是应予澄清的。40年来流传的不准确的记述，应当予以否定，这对于研究战后东北的地方史是不无意义的。

前面提到的种种记述失实，查其原因，大约主要有如下几点：

1. 伪满洲国军与伪华北绥靖军同属汉奸傀儡政权的军队，都是伪军，因此在人民群众看来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以致容易混为一谈。

2. 姜鹏飞曾在上述的两个伪军中先后任职，而且从1940年起多年在冀东活动。从1945年初开始，两种伪军又统一在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指挥之下，自然也包括姜鹏飞所部在内，所以就更易于混淆。

3. 日伪军联合在冀东的“扫荡”，为当地人民留下了深怨，伪军铁石部队名声很坏，而姜鹏飞又是华北伪军中臭名昭著的头目之一。因此抗日军民常常把姜鹏飞与伪军铁石部队相提并论，以为敌伪力量的代词。民间的流传，逐渐被各界所公认。

当时的新闻报道和以后的回忆录都采用了这种普遍流传的说法，就使某些史学工作者深信不疑地加以引用，因此几乎成了定案。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已有大量的史料公诸于世，综合对照则疑窦丛生，应加以指出。

（摘自《长春史志》）

十一

伪满军校及伪军官兵生活

伪满军校见闻

溥杰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政策下，即逐次把旧东北军剩下的变节部队，用“讨伐消耗”、“归并裁减”和“对立分化”等一系列的“釜底抽薪”办法，调理得差不多之后，就想另起炉灶培植一批真能帮凶的炮灰，于是伪《国兵法》实施了。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依样画葫芦的伪军官学校也成立了。我就是在敌伪的继续“深造”政策下，担当育成这批忠实走狗的预科连长的。

我所担任的那一期虽是第二期，但由这期起，才算是由预科开始受教育的军官学生。而且是由这期起，才是在伪皇帝亲临之下开校的，所以第一期反成为由训练学校转来的“插班生”了。

不但预科的学科、术科都按照日本士官学校预科的样式生吞活剥地去模仿，即伪连长、区队长在讲话、上学科、下教练时，也规定一律须用日本语和日本的军队口令。因此这批伪连长、区队长便被由日本士官毕业的伪军官所包办，而且在中国人学员的各连内，还必须有一个区队长是日本人。这样，这个伪军官学校就成为专门替日寇培育可靠炮灰的唯一军事学校了。

尽管如此，在这里“日系”、“满系”之分，却并不比伪训练学校或其他伪军部队差多少。例如在中国学员方面，普遍有一种“奴才争宠”的不平不满的情绪，认为伪校长以下，没有

一个人、没有一次不在说“日满一德一心”，甚至还说“同生共死”，可是每天在食堂里，日本学员三餐皆是精米白面，中国学员则限于吃高粱米。所以发牢骚，讲“怪话”的人就一天天多起来。后为该校的日本人听到，便绞尽脑汁，诌出一篇大道理来：“因为日本人习惯吃大米，环境骤变恐影响健康，妨碍求学。中国人吃惯了高粱米、苞米，特别是东北人非吃高粱米不可，所以才分成两种不同的伙食，并非歧视。”

尽管日本人花言巧语地说破了嘴皮，但在中国学员方面，早对这种歧视待遇有了深刻的感受，有的人对于“日满一体”居然“窃窃私议”起来，有的索性加入当时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读书会”，在校内暗中传书递简酝酿反日。

这里的首任伪校长为日本的退役少将南云亲一郎。他由日本侵略军的华北某兵团长（等于旅长），当了伪军校的中将校长。他借和日本军部的旧关系，以伪军官学校的“开山祖师”自命，安置私人，拉拢日伪的青年军官，排斥不附己的分子，甚至把该校的“太上校长”——日本顾问也不放在眼里。在我初到任时，正是他得意绝顶的时代。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册）

日本教官的“责任”

刘启民

1933年4月，伪中央训练处在沈阳建立，这是伪满成立的第一所军官学校。该处分既成军官补修教育和候补军官养成教育两种。既成军官教育是对上校以下伪军官的轮训，培养他所

具备“建国建军精神”，使其为日寇的侵略政策服务。候补军官教育是招募中等学校毕业学生，灌输日满“一德一心”的奴化思想，一年毕业，任少尉伪军官。另外，还培养日军编入预备役的“干部候补生”、下士官出身的“军官候补者”，经过培训派入伪满军中，掌握基层权力，他们是日本军事顾问的爪牙。

1934年，伪军政部明文规定：非经中央训练处训练者，不得任军官。用这些经日本人训练出来的人，逐渐淘汰那些旧军官。1935年，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对该处的日本教官讲：要了解被征服的民族是很少有感于反抗的。我们不要只着意于他们的反抗意识，要会使用他们给我们服务。这就是教育成果，也是你们对满军指导上的责任。企图用这些豢养出来的忠实走狗，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策。

回忆在伪军校的奴化教育

杨宗廷

伪满陆军军官学校

伪满洲国时期，在当时的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建立了一个陆军军官学校。它位于由长春去吉林的大道旁，即同德台拉拉屯的位置。占地面积十几平方公里，建筑楼群三十几栋。

这个学校，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奴化和统治东北人民，培养和训练效忠日寇的伪满洲国军官而设立的。

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精心选拔的。每年都由上万名考生中，经过挑选，二三百人被录取。因为当时的青年，怕去当

国兵，想当军官。所以报考的人数相当多。我是在伪康德10年（1943年）入学的。

它的学制是5年制，预科2年，见习半年。本科2年，见习军官半年，毕业后任少尉军官。

预科2年中，午前学文科，学习一般大学课程。教材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午后学术科，有体操、教练、马术、枪剑术等。

本科2年肩戴中士的阶级，分兵种学习，主要学些战略战术等。

在校部管理下，学生分为本科学生队和预科学生队，学生队以下分连，连以下分为4或5个区队。

全校共有区队长以上军官300多名。其中将官4名，校官100余名，尉官200余名。日本人和中国人学生1 200余名。

第一任校长是中将衔南云亲一郎，第二任校长是山田铁二郎，也是中将衔。伪满皇帝的兄弟溥杰曾任过本科第一连连长。

尉官以上大部分是日本陆军大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整个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模式。

伪满皇帝溥仪，每年都要亲身去军官学校视察一次，把学生称为皇帝陛下的股肱。

奴化教育

为了教育学生效忠日本，死心塌地为日本服务。学生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手捧诏书跑步到神社前朗读。让学生相信唯神之道，信奉天照大神，忠诚于日本天皇陛下和满洲国皇帝陛下。把皇帝的每句话都奉为至宝，天天朗读背诵。并经常向日本帝宫遥拜。当军官讲话一提到皇帝和天皇的时候，人人都必

须立刻以立正姿势，表示尊敬。用这种方法强制占领学生思想阵地，天长日久，学生们就形成为无条件反射了。

当时，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已经在全世界广泛传开。日本为了迷惑学生，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神之道混为一谈。一次连长在精神训话时讲“神”字。把一个神字，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是申字。申就是申诉、辩论的意思。左边是示字，示就是指示、出示、证明的意思。这样神就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了，把相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引导到相信唯神之道的歧途上去。

严格的礼节，打骂的教育

军官学校的阶级服从、礼节教育是严格的。学生和军官之间都要用停止间敬礼。戴帽子时敬举手礼，脱帽时行鞠躬礼。入学后要用几节课的时间专门学各种敬礼的方法并反复练习。上下期学生之间一般要用行进间举手礼。如果有没看见而没敬礼时，都要遭到毒打，轻则打几个耳光，重则打的鼻口流血。在敬礼时服装必须整齐，如果有领勾没扣、钮子没扣、鞋带没系，即使敬礼也要挨打。打一个嘴巴，批评几句是最轻的。这样下级生吓得必须经常注意前后左右是否有上级生走来，以免挨打。有的新入学的学生，傍晚由食堂回来，看见黑暗的角落有人影急忙敬礼。因为那若有上级生敬礼正好，没有上级生敬礼也没什么损失，恐怕因为没敬礼而挨打。

挨打时也要立正，日本人用拳头打嘴巴，一下就打一个跟头，牙床子打破顺嘴流血，还得赶快起来，立正站着，准备继续挨打。因此，在军官学校里，挨打已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羞耻的感觉。有时集体挨打，学生分为两排，对面站好了互相打嘴巴。如果有人轻打，教官过去，狠狠地打几个嘴巴，然后说“回去就这样打”。久而久之，集体挨打也无人敢轻打了。

提心吊胆的紧张生活

起床号一响，急忙起床，穿衣叠床洗漱，还得整理内务。一切衣帽、鞋、被褥、装备，必须按指定地点整洁放好，随时准备检查。起床号响之前，谁也不敢起床。听见点名号响，马上到连部前集合，一列横队按到达顺序排好，排在最后五名的学生，因为动作慢，就要挨打。因此，一听有集合号令，都争先恐后整装往外跑，以免排在后面挨打。

全天活动都是集体来集体去，根本没有自由活动。就是上便所也要速去速回，以免耽误集体活动。

严苦的训练

每天午后，连续四小时进行军事训练。从立正、稍息开始，到实弹射击，都要按步兵操典反复练习。在炎热的夏天，全副武装，戴着防毒面具跑步，是非常要命的。思想稍有溜号，动作稍有差错，都要遭到毒打。

夜间非常集合较多。正在熟睡的学生，一听到非常集合的号令，要按指定服装穿好集合。有时迷迷糊糊，穿错服装，就要挨打。因为夜间集合不许开灯，如果一切服装不按指定地点放好，极容易穿错。

一次，在大连夏家河子进行游泳训练，学习三五天以后，有的学生还没学会游泳。教官就把不会游泳的人用船运到大海的深处，从船上把学生一一推下水，学生无奈只好拼命往岸上游去。由于不会游泳，屡次沉下喝汤。有的人确实不会游泳，几次沉下，教官才从船上扔下一个木制酱油桶，给沉下去又浮上来的人当救生圈。有的人不会使用木桶，抓住木桶就往上扒，结果木桶浮上来，脑袋又沉入水中。这样，反复多次，临到岸时，

已灌得死去活来，有的险些死去。由于惊吓和水呛，不能正常吃睡。有人讲这种训练还不如死了好。

不平等的吃穿

学生中有一半是从日本招收来的日本人，和中国学生生活学习在一个连里。一个连中第一、三区队是日本学生，第二、四区队是中国学生。一个区队相当于一个排。自习桌和床位都是两个中国人之间有一个日本人。一切活动都是一样的，但是吃的和穿的不同。日本人吃大米饭，中国人吃高粱米饭。日本人冬天穿绒衬衣，中国人穿布衬衣。一进食堂就显明地看见，一排摆着雪白的大米饭饭碗，另一排就是装着黑红的高粱米饭的饭碗。当时的中国学生，虽然内心有反抗，但行动上好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民族歧视是相当严重的。

中国人不许说中国话

伪满军官学校虽然有一半是中国人，但不准许说中国话。不仅日本教官上课用日语讲课，中国人教官也用日语讲课。在平常生活中，不仅中国人和日本人说话必须用日语，就是中国人同学之间说话，也必须用日语。如果用中国语说，一旦被日本人听见，就被日本人或教官进行一次毒打。

共产主义思想的渗人

一百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书籍，经承德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传入了军官学校。笔者见到的有《资本论》、《大众哲学》、果戈里著的《死魂灵》、巴金著的《女兵》、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当时由于理解不透，只是从思想感情上与几个关系密切的人说，这是日本禁看的书籍，可靠的人可以互

相传阅。所谓传阅看的人也很少，真正理解的人就更少了。后来听说查书很紧，让大家分头抄下来传阅。当时给笔者的任务，是抄写《大众哲学》，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抄完了，据说这一百本书转移到当时的建国大学去了。

军官学校的解散

1945年祖国光复，伪满军官学校解散。军官学校的学生，各奔他乡。有的在伪满洲国皇帝近卫团乔团长的指导下，占领和保护了长春的许多工厂。仅一个卷烟厂的收入，就可以维持长春全市的学校开学。国民党曾经登报招收伪满军官学校的学生，分别上了各种学校。其中国民党警官学校招收的最多。还有二三百人投奔了国民党的第二〇七师。属于共产党的两个领导人赵镜兰和刘汉忠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去了。

（摘自《开原文史资料》第二辑）

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

孙景大

一

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39年春，结束于1945年8月日寇投降，寿命6年半。共招生7期19个连，二千人，毕业生共三期计八百多人。其中有日本学生200多人。仅三期和六期有日本学生。四期至七期，因中国抗战胜利，伪满洲国寿终正寝，伪军校也随之解体，因而未能毕业。

招生来源，除三、六两期从日本国招来两百来名学生外，都是从伪满高中、国高毕业生中（伪满学制改革，从1939年起将初高两级中学合并，学制为四年，名为国民高等学校）招生，经过考试录取的。但这个学校不与其他大学统考，而是单独招生，学科考试与一般大学相同，身体检查较为严格。校部还有学生的档案、照片、指纹等俱备极齐。日伪当局，表面上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不严，实际上外松内紧，特别是对高年级学生，更是注意考察其言行及思想动态。一次在饭厅两国学生拉队对打起来，战局一开，两军对峙，板凳饭桶，皆为武器，战斗十分激烈。事后日寇宪兵队开来了几部汽车，准备抓人。校长南云亲一郎在家得知，用电话斥退了宪兵队，平息了这一事件。这是老牌殖民者（日本军少将，伪满中将）采取的安抚办法，防止激化而已。

学校设在长春南郊拉拉屯（现在是坦克兵学校）占地几百亩，除校本部是一座三层楼房以外，各连队的宿舍、食堂、练武场、俱乐部、马厩、课堂教室全是尖顶偏廊的一排排房子。宿舍的房子甚长，一端是厕所、洗漱室，中间是能住百人的十几间寝室及军官办公室，另一端是自习室。自习室单人独坐，每四个桌子相对合成一组，四个人相对而坐，中间相隔四个书架。

学生除生活用品饮食全部供给制外，每人每月可领到几元津贴（预科6元，本科9元）。被服齐全，有两被一褥，一条毛毯，单夹棉衣、体操服、雨衣、演习外用被以及外出服装共十来套。每逢假日，长春街头，一眼即可看出“军校”的学生。日本用武士道精神灌输学生，“好勇善斗”。往往在街头与别人争斗，特别对伪满警察，有意寻衅，拔剑而起，挺身与斗。按武士道精神，战必胜，败可耻。因服装相同，霎时即可聚集几十人。这时高年级学生一到场，即自动任指挥，并承担一切责任。

决斗以压倒对方，决战决胜为荣，被人打败，落荒而走，是莫大耻辱。

学校伙食与一般大专院校比起来，还算上中等。高粱米为主，高粱米与大米合起来的干饭（叫协合饭）和白面苞米面合起来蒸的馒头。蔬菜以青菜豆类为主，肉、鱼较少。日本学生全部细粮、副食以鱼肉及用豆油炸的“甜不辣”为主（即用瓜等裹上面用油炸）。中日两国学生，两种伙食。每次就餐前，须面对餐桌，静坐“默祷”并口诵“依他他其妈斯”（即感谢的意思）方能开始吃饭。学校院庭内不准步行，即或往返于食堂、宿舍之间也得跑步（节假日可以步行）。有人反映饭后跑步，影响健康，但校长认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多年一贯坚持跑步，并无影响健康之说，为此跑步一直坚持下来。

伪军校一切教材、教法、校内生活管理，全部搬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一套。教材除战术教程、典范令、步兵操典以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马学、地形学、心理学、文学、逻辑等多门课程。预科以学文、史、哲、数、理、化为主，军事操练不多，两年间仅学习从老百姓到兵的基础动作。演习军事，则学到连排作战指挥。本科，战术及各兵种专业课有所增多。教师多是日本人。教授中文的原来有两三名中国学究，以后也改为日本人执教了。日本人培养“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幕府时代，中心内容是忠于君王，为此很重视中国儒教，尊孔读经，非常主张学习古文、古诗、大声朗诵孔明的“出师表”，也伸着脖子引吭高吟文天祥的“正气歌”。日本人叫吟诗为诗吟，不似中国的吟法。以七言诗为例：吟诗伊始，先将原诗述诵一遍，然后高声长吟，如同长号，吟时，第一句和第三句，吟四个字稍顿一下，往下再吟三个字，再稍顿一下，顺便将下一句即二、四句的头两个字吟完停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吟

完下余五个字。

长歌长号，声音凄切。中国人议论他为鬼哭狼嚎。日本武士，以长吟为养浩然之气，以吟为荣。往往在路边树下，军人双腿叉开，两手插腰，引吭高吟，旁若无人。

学校学期四年。前两年是预科（学生叫生徒），后两年入本科。预科毕业后分兵种，计有步、骑、炮、工、辎等五科，军需科另外有学校。预科毕业后不发毕业文凭。按所分兵种，分派到伪满各兵种部队去学习实际操作，名为队附勤务。半年后从部队结业，方能回校入本科。到部队之初，授与上等兵军衔，学习兵的动作。例如辎重兵科，则学习汽车驾驶、汽车修理。以后每两个月晋级一次，即第三个月晋升为下士，第五个月晋升为中士。六月期满佩戴中士军衔回校入本科，称为军官候补生。这个军衔一直佩戴到毕业。毕业那天，改戴上士军衔，到部队去再过半年，方能成为正式军官。预科和本科毕业，均有隆重的典礼，会餐吃红饭以示庆祝（红饭是用小豆大米合煮的饭）。

伪军校有地形学一门课程。教官只在课堂上讲课。野外山地测绘、制图，由日本关东军测绘课课长大森中佐担任指导。实际时间半月左右，在他率领的几个日本军官指导下，测量一座山，制成一个图，交卷就算结束这门功课。这里应该指出的：日本强盗侵略东北时，用的作战地图是五万分之一的，不仅村庄、道路详有记载，就连毛草小路，一条小溪也均有记载。这些当然是关东军测绘课所为。而我们自己国家，当时作战用地图却是三十万分之一的。内容极其简要，一些作战必用的地形、地物，往往没有记载。

预科毕业分兵种时，强迫命令，一概不征求个人意见。多数人不愿当步兵。同学们叫步兵为“步驴子”，身背重重的背包、干粮袋、幕布、水壶，手执大枪，一步75公分，长途行军，汗

流浃背，脖子被背包压的伸出很长，十分狼狈。但是演习已毕，擦枪洗澡，从容就餐，晚饭后，悠闲地进入自习室，十分轻快。而其他兵种，特别是炮兵、辎重兵、演习完毕，拭炮擦车，排除故障，车场一个动作，往往两个小时，弄不好还要挨打受罚。冬天，朔风凛冽，冰雪交加，在空旷的原野上擦洗车辆，冻的涕泪交流，苦不堪言。有时故障排除不了，往往夕阳西下，夜色苍茫，饥肠辘辘。挨到食堂吃饭，早已汤冷饭凉，回到宿舍一看"步驴子"早已进入甜甜的梦乡了。这些技术兵种，往往时间不敷用，数、理等科作业，只能照抄别人，学期考试，成绩欠佳。

学校有校本部，校长一人（没有副职），日本军少将叫南云亲一郎，以后由山田铁二郎继任。校部下边有文、武两个系统。文官系统有教头（即教授之头）日本文学博士中山龟四郎，下边配有教授各科的教授，助教几十人。中山博士，名气很大，鹤发童颜，但不担当讲课任务。一次他在众多学生前讲了八方为国，止戈为武等话，玄之又玄，听之莫明其妙。武官系统为学生队，队长王家善（少将，1948年营口起义），还有日本人秋山秀、中国人乔明远，均为伪军少将衔。学生队下边配有各兵种的教官。学生编为连，各连设有连长、区队长，均无副职。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和他的友好兄弟张挺，均在校任预科连长。

学校本部，每周设值周官一人（叫做周番司令），晚上住校，执行统率全校的任务。各连也设执星官一个，学生每周设值周生一人（预科叫做取缔生徒，本科叫做取缔候补生。取缔取自日文，乃管理之意），值周生如同连队军官，学生必须服从其指挥，学校有"生徒守则"一册。学校生活一切起居，管理各种规定，均有明文，不得越雷池一步。

二

伪军校采取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一整套教材和教育方法。严格训练，严格管理，用万分艰苦训练的办法，使学生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培养成为不怕苦，不怕死，百折不挠，一往直前，忠于君王，服从指挥，服服贴贴的帝国主义军人。入学之初，叫假入学，主要经历从老百姓到兵的一套过渡性的有关训练。校内日常生活十分紧张，天刚亮，军号声中，推被而起，急奔门外，穿衣穿鞋，到庭院列队仅用一两分钟时间。值星官早晨点名后，换上拖鞋入室整理内务，洗脸去厕所，号声一响，跑步去就餐，餐后跑步回来。从宿舍靠近餐厅方向的一端入室，大小便、整理洗脸盆架、入宿舍整理好内务，顺手擦一擦枪，然后急急忙忙到自习室就坐。这个行进顺序，如果走错了，时间不够用，必然在某一个环节上迟误时间，手忙脚乱，甚至迟到挨打。

打人的方法甚多，除教官拳打脚踢以外，还有多种方法。例如：对抗打，把队伍分列两行，相对而立，互相对打；循回打，队伍列一列，排头第一人开始往排尾打，打到排尾入列，第二个人再开始打，一直打到排尾。对抗打，以时间计算，比如对打两分钟，循回打则以人数多寡而论挨打数字，如果五十人一列横队，则挨五十个嘴巴。挨打者必须笔直而立，引颈受罚。

清晨一段紧张工作完成了，到大操场接受周番司令检阅，然后分头列队跑入教室。听课，应该是个美差事，本可以轻松地坐着，四肢得到休息，其实也十分遭罪。夏日炎炎，赤帝肆威，学生们全套军装，内穿衬衣衬裤，汗水湿透衣裳，头晕目眩，昏昏欲睡。而教官大人，站在台上，口若悬河，旁若无人。特别是教高等数学的教官，大舌头，北海道人，口中念念有词，声

音南腔北调，昏睡中只听他念道："拉几匹""斯毛鲁匹"，实在听不清了，学生们眼睛盯着讲台，人已入梦乡了。有的教官，发出善心，允许学生将军衣领口上的一个钮打开，顿时觉得凉风习习，十分惬意了。

下午有时上课，也有时上军事课目或马术、汽车驾驶课。忙了一天，晚上钻进被窝，三五分钟即入梦乡。但往往值星官多事，又搞起夜间紧急行动。夜间行动，最难受，战战兢兢，荷枪着装，或登高山，或去草地，折腾半夜，回来只睡一小觉就起床了，第二天上课听教授们传道更为难熬了。

到外地野外演习，更是个苦差事，比如，去兴安岭葛根庙演习20来天，白天演习强攻一座山头，筋疲力竭，夜间又紧急集合，冒着瓢泼大雨演习"斥候"（即侦察兵）动作，归来后洗掉身上泥土，洗 完衣物，睡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白天又演习山地追击。庙里喇嘛们偷偷议论，日本人是想把这些人累死！当然野营生活有苦有甜，演习休整时间，有一次，煮几只羊，摆在长条桌子上，动手撕肉，肆口大嚼取名"成吉思汗"野餐。夏日大连周水子海水浴，是预科学生必修课（学游泳），劳累程度比兴安岭轻多了，但水土不服，呕吐厌食。当时在日寇统治下的"关东州"生活十分困难，就餐时，围观者甚多，学生因肚子难受把菜饭送给围观的孩子们，他们手头没带盆、筒等家具，急中生智竟把小褂脱下来包上饭和带肉的汤菜。湿淋淋顺衣襟流下，孩子们却满意地跑回家去。

辎重兵曾去吉林江边搞渡船演习。教官大原是个极残暴的日本军人，本事平常，但又装做多才能干的样子，学生们未去之前，已经事先打听好了他那一套把戏，比如野外汽车排除故障，他只能设六个故障。如何排除，学生早已有准备，当他把六部汽车，分别设六个故障，叫学生分六组排除，他和另一个

叫松岛的教官摇头晃脑扬长而去了。以后，学生们很快排除了故障，大家坐在沙滩上闲话古今。这个家伙回来后发现了这一秘密竟恼羞成怒，叫学生滩头整队后，他喊口令：向对岸冲锋！学生们只好冲向大江，但有的水性不好，在刚冲到江水中流时人漂向大江已有危险了，松岛才发了口令“停止”。大家才水淋淋地返回滩头。一次严冬季节全副武装奔向飞机场。因天寒地冻，带去的饭和水已冻成冰块，啃吃一些，只吃半饱。归途，人们十分疲劳，但教官又拔出指挥刀，声称学校被敌空降兵占领，全队又急行军返校去“救援”，强行军的几十里路途中，昏迷倒地掉队甚多，最后冲到学校庭院者，仅几十人。

学生们累的无可奈何时，喜逢预防注射，那时候注射在胸部肌肉上，注射后发烧或发肿，准许卧床一天，真是个大好事。另外，有小病经医官批准，可以入病室休息，入室后身穿衬衣脚踏拖鞋，吊儿郎当，行走无牵。但缺点是每餐必粥，那时候学生们非常能吃，干饭尚且不能果腹，喝粥实在难熬，因此入室休养者甚少。住院比入室强多了，但是必须是大病，当时学生住院指定是恩赐病院，即以皇帝名义而建的军医院。两个人一个房间，伙食较好，除晚上点名查房以外，全天休息。时间久了，与护士混熟了，还可以让她从库内偷出军衣，穿上溜号到街里吃吃饭店，看看朋友。因此住院是天上地下第一大好事。

星期天外出，也是个十分好的美事。一般都早早整理内务，洗刷地板，擦净枪支，以取得值星官的欢心。早餐后着外出服装，接受检查，“三生有幸”教官高抬贵手，顺利地通过了服装检查，跑步奔出校门。出了门才算真是外出了。因为在未出校门之前，还有被军号声召回集合之可能。学校离长春市内20华里，长途跋涉，几十里去入市内，本无大事，无非是溜溜大街，吃两餐饭店而已。那时候学校每月发与的津贴9元，四个星期天

还够吃饭用的。星期天有晚自习，学生必须按时返校。上街一天，暴饮暴食，晚自习时酒气冲天，但晚上点名时，日本教官却故意发问：喝酒了吗？学生们高声答：没喝！则可以顺利就寝。

校内阶级森严，绝对服从。不仅在庭院遇见教官，敬立于侧，恭恭敬敬行个礼，就是遇见上班生，也是如此。上班学生可以任意体罚下班生。

学校发给学生的线袜子，是直筒的，脚跟处出了洞，就转到脚背上面继续穿用，转了四次，就断为两截，只好扔掉。手巧的学生，用圆形笔筒插入旧袜中，进行修补，还可再穿。

三

伪满皇帝溥仪，几次来校视察，有一次还登台检阅了学生的军事演习，并亲自宣读了他的“圣诏”，不外乎希望学生毕业后，能保他的江山，成为股肱。皇帝来校乃天大大事，院内以土垒台，学生们身穿外出装，白手套，配剑列队迎接。时间一到，宫内府紫色汽车，开进校庭。溥仪穿军装佩长刀，上将军衔（从未见过他穿今日上演话剧时那种戎装）。溥仪来校，学生们忙碌几天，但是也有一点好处，伙食大有改善，而且还发一点御用香烟。日本天皇裕仁的三弟三笠宫也曾来过一次。

最有趣的是伪满将军张海鹏来校视察，这个汉奸将军，短短的身材，大腹便便，头如麦斗，却在顶上戴着一个小小的战斗帽，走进礼堂，好似立在地上一个两头尖中间圆的大圆筒，从礼堂大门滚了进来。他发表了一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说，堪称绝妙好词。他口口声声反对革命，大骂孙中山无父无君，他声称见到孙文的像片，就踩在脚下。他表示一心伺候皇上，甘当奴才。两个小时的讲演，真是雌黄惊四座，信口皆荒唐。学

生们不敢笑，只好用上牙紧紧咬住下唇。这个老家伙，讲到最后，兴奋极了，竟高高举起一双胖手，喊起日本天皇万岁！由于兴奋过了头，却喊错了，喊成日本天皇万下陛岁！汉奸们寡廉鲜耻，丧尽人格，甘当日本侵华的鹰犬，甘当坐在日本“老子”怀中、供主人玩赏的哈吧狗。汉奸中竟有一个人当了伪治安部大臣还嫌官小，这个人叫于琛澂，当时伪国务总理完蛋了，日本人需要换马的时候，于大头（于的外号）竟偷偷窜到长春头道沟住在越香春大旅社包房间算命的周茂林先生处去算命，他屏退左右，就连周先生的秘书夏老先生也赶出门去，然后悄悄请教周先生，他能否当上国务总理。周先生双目失明，从小讨过饭，是个有民族爱国心的老先生。听到这些话，十分气愤，回答说：你若能当上国务总理，可将我一双瞎眼球挖出来。本是一句气话，于大头却相信了，再三嘱咐周先生“天机万勿泄露”，事后张景惠当上了伪总理，于大头调到宫内当将军，他还特意去见周先生致谢，并送上卦礼300元。每年正月，汉奸们都找周先生批八字，算流年，问祸福，当然卦礼从优，每次不下数百金。这些人当上汉奸，却心惊肉跳，总是怕祸从天降。周先生从这些大人先生手中赚了不少洋钱，但从心里厌恶这帮日寇的奴才。

四

校内常唱军歌，大部分是日本军歌。但却格外地允许中国学生唱《满江红》。“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等歌曲，使人不解。《满江红》《正气歌》《出师表》等伟大杰作，素为日本军人所崇爱，可能唱吟无妨，“亚人应种亚洲田……”也许是日本强盗，以同种同文，同为亚洲人而套近乎，引导人们反对英美白人，从而偷梁换柱，为其征服亚洲，为“大东亚

共荣圈”服务。但是学生们年龄已经成长，民族爱国心也随之增长，怎能忘掉祖宗，甘当亡国奴呢！特别是1942年以来，伪满洲国由称呼日本为友邦，进而改称为亲邦，即甘当儿邦以后，学生中有识之士，怒不可遏。《满江红》一歌，偷偷改了词，在学生中流传，歌词是“怒不敢言，为什么不给大米饭……高粱米粥喝不饱，人参狗宝讨人嫌（人参狗宝皆是日本菜），到如今瘦了七、八斤真可怜……拿草绳擦破宿室地板，官长战刀透胆寒，两眼常常泪不干……”。伪满洲国歌，也偷偷地改了词，比如“笼屉内，有了大馒头，大馒头，便是人做的，不大、不小蒸的最好，造成大馒头，只有面粉，并无酱油，一个三两半，一个三两半，纵加十倍，也不够油……”等等。

五

1945年日寇投降前，伪满军校学生，在部分中国教官指挥下，携带轻重武器，开上石碑岭，修筑阵地，与日寇对峙。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伪军校解体，一部份学生，到东北大学临时补习班学习，一部份人拥戴原学生队长王家善在长春编为国民党第四纵队，后改为一个师驻防营口，该师在营口起义，都是这些学生从中做了许多工作而实现的。

（摘自《长春文史资料》）

一九四〇年黑山县征兵见闻

郝让先

1940年（伪满康德7年）日寇侵略东北已历9年，把日本的

《征兵法》改头换面编成伪满的《国兵法》，开始实施征兵。

说是征兵，还不如说是拉伕，或者说抓兵则更确切些。伪《国兵法》第19条虽规定凡是年满19周岁的青年男子都谓之为国兵适龄。但实际征兵检查时18岁、17岁的也要，甚至16岁的有时还要。在检查时，征兵官并不征求适龄青年的个人意见，只是看到壮丁名簿上体格方面是甲、面貌端正无缺损，就判为合格。所以当时有些青年胸怀愤怒，无从发泄，只好在高呼“合格”二字时，故意拉长尾声以抒怨气。

一、黑山县国兵民籍股

伪康德7年，我被调转到辽宁县黑山县县公署新成立的国兵民籍股，职位是属官，专管壮丁名簿的汇集。壮丁名簿是由各街村调查填制后报县。内记有合格者若干、不合格者（国兵漏子）若干的统计等。股长是日人叫野字佐美，不懂公文，亦不懂中国话，但汉文单字全明白。我不会日语，所以我俩办事多用汉字笔谈。另外股内有翻译，有事务员、雇员等，合计七八人，属于行政科内。这种情形，不独黑山县如此，东北各县都一样。我在国兵民籍股干事整整一年，在那一年里，春秋两次参加过国兵检查。彼时黑山县设立四个征兵署（即黑山镇、大虎山、半拉门、新立屯镇）。征兵官正职是伪满军上校王士贞，副的是黑山县的梁学贵。征兵官以下有伪宪兵张佐廷和杜某，伪陆军上尉王向午，上士常福庆，军医官日人小岛三郎和军医助手两名，其余即为国兵民籍股全股职员以及各地伪警察，村、屯、甲长等。

二、所谓的“征兵检查”

彼时，有钱的豪绅子弟不愿当兵，可以向征兵官手中送钱

或贵重物品（如金镏子、手表）进行贿赂。这比什么都灵，钱到就免兵役。体格好也不能判为甲种，或者从各方面或“身源检查”上找些缺点，自然就不合格。另外，也有贿赂村长或警察分所长，改变户口簿上的生年月日，或者出钱雇一个穷苦人家子弟，顶替受检。这样钱到事了，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至于穷苦人家的子弟拿不起钱，更找不着贿赂活动的门子，只有当兵卖命了。

伪满征兵的检查程序是：甲、体格检查，乙、身源检查。体格检查由日本人军医官小岛三郎担任。适龄青年一个个愁眉苦脸，恐惧万分。他在检查时任意打人辱人。小岛常用竹棍或木棍敲打受检者的头部。他的检查室有头殿阎君的绰号。

征兵检查乙项是身源检查。内中包括适龄青年的学历、职历、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等。在征兵检查前已由各街村的国兵民籍系据实调查填报到县。经我们归纳整理做出统计表连同原簿一并做为征兵检查时的使用原本。给一个适龄壮丁编一个号码，按号呼名，对照壮丁名簿进行检查。最后由正征兵官作出合格与否的决定。合格者需面向征兵官高呼“合格”二字，声音须宏亮雄壮，否则即认为有不满情绪，甚或被交到警察署拘留审讯。有的在回答征兵官问话时，由于心存恐惧，常常发生所答非所问的现象。于是，当场叫宪兵带去审问，挨打挨骂的不少。如果壮丁自报的年龄、生辰月日，与户口簿不一致时，引起征兵官疑惑，便立即交给宪兵警察推入黑屋过堂打骂。黑山县白土厂门第十二中学教师张天恕就因为一项未弄清楚，被押到锦州宪兵队一两个月。朋友去看他，他不敢说话，只在手心上写了一个“饿”字。在体格检查过程中，壮丁本人也往往出现挨打挨骂情形，如当时曾有一名壮丁为逃避当兵把下身用开水烫成泡了，反而挨顿毒打。

三、征兵检查 百姓遭殃

全县四个征兵署所在的街村，必须在通衢要道、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四门，高搭牌楼，悬灯结彩。征兵署的检查场必须布置得堂皇绚丽。黑山征兵署检查场占用了国高大礼堂，大虎山检查场占用了铁路小学大礼堂及学生教室；半拉门、新立屯亦类此，使学生废学旷课。同时检查场各个室的设备，如医疗用具、食宿用具，……壮丁使用的兜裆布，即有数百条，使肮脏了，就得换新的。诸如此类，书不胜书。各征兵检查场临时配备传达、厨师等佣人夫役不下二三十名。庞大开销，完全出之于各街村，摊派于各民户，而村长、甲长与地主豪绅互相勾结，不但自己不出钱，还能够借机捞一把油水，劳民伤财，莫此为甚。

征兵官连同村长、吏员、甲长等，每天吃饭的不下五六十名，杀猪宰羊，餐餐成席。

那年秋天天气炎热，喝汽水、吃西瓜，当地没有，就用汽车去半拉门、新立屯去拉。副征兵官梁学贵是个大烟（鸦片）鬼，每到一处得先给他找一所吸大烟的下处，预备下大烟，好叫他一天里过几遍瘾。他还向立德堂四东家勒索一尊大铜佛，高约半尺多，胸内嵌着金质心儿。四东家也不是白给，用这件“礼品”，换得他家适龄青年的免役。

从四平兵事处看伪满征兵制度

马桂文*

一、伪满征兵制度

1940年（康德7年）颁布《国兵法》，《国兵法施行令》和《国兵法施行细则》中规定：凡年满19岁男子均有受壮丁检查服兵役义务。各地壮丁检查、国兵入伍由该管区兵事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共同执行。

每年征兵由3月1日开始，由地方（县、市）行政机关将适龄壮丁家庭和素养情况填入名簿，3月末送兵事机关（抄件送省）。由兵事机关整理统计报军管区，转军事部。7月1日开始壮丁检查，9月末结束。翌年2月1日抽签决定入营兵员并编入兵籍。

二、四平兵事处

四平兵事处是在《国兵法》颁布后，在四平省区内成立的兵事机关，当时叫四平兵事办事所。1942年颁布《兵事处令》后，遂将原四平兵事所，改称四平兵事处，隶属于军事部，业务上归第二军管区（驻吉林）管辖。

（一）兵事处的机构和编制

四平兵事处设庶务、征集、召集、军援、学校教育等五个

---

* 本文作者马桂文，曾任伪四平兵事处事务员。

系。处长是陆军上校李煜元，处员五人：陆军少校岩崎××（日本人）掌管庶务、召集；陆军少校镰田一雄（日本人）掌管征集；陆军中校李长富掌管军事援护；陆军中校吴连升、石煜麟掌管学校军事教育，事务员六人：陆军准尉张万有、军队属官常福庆、西协（日本人）、马桂文、李宝贵、军队译官刘汉臣，分别担任处内各系业务。

（二）兵事处的征兵组织

四平兵事处在四平兵事管区（四平省行政区）内执行征兵任务。在本兵事管区内划分四个征兵区，由本兵事处派出征兵官。

第一征兵区辖长岭、梨树、四平，征兵官是李煜元。

第二征兵区辖双辽、昌图，征兵官是吴连升。

第三征兵区辖开原、西丰，征兵官是李长富。

第四征兵区辖东丰、海龙，征兵官是镰田一雄。

各征兵区在市县分设征兵署一至二处，为临时征兵机关，即征兵检查场所。

征兵署由军方征兵官、地方征兵官（市、县长）各1人，征兵医官1人，副医官1人，军医助手2人和4名事务员（军方、地方各派出2人）组成。每县（市）以村（区）为单位进行检查，该区（村）长和各屯（牌）长以及管理国兵民籍的军务人员一律到场。应征壮丁因职业、在学、疾病或办事在外地者，如不在3个月前向本县（市）申请寄留地受检，一律应在居住地受检，否则按法以逃避征兵论处。

在征兵署进行壮丁检查，分书面审查和身体检查两项。书面审查，即按壮丁名簿业经填具的家庭和本人素养两项进行审查。根据家庭、素养、体格等条件的具体情况，把应征壮丁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确定为甲、乙的属合格，如果其中有

一项是丙的就不合格。

壮丁检查开始，全体壮丁肃立迎接征兵官入场就席，先举行个简单仪式，向日满国旗敬礼，征兵官训示一通。仪式后壮丁穿裤衩列坐场内，依次体检。军医助手检查体重、身长、视力，征兵副医官检查五官，征兵医官检查内脏、四肢、体躯各部，将检查结果和等级填入壮丁体格检查表。此表先由地方征兵官审核，再交军方征兵官总核评定，连同家庭、素养均合格的，宣布为合格者，属合格壮丁。对该壮丁人物，加以观察，量其文化、体质、身长和民族特点等决定兵种，盖上步、骑、炮、高射炮……蒙骑、十三团（回族部队）等戳记，然后喊出某某合格。如不合格者，即喊某某不合格，壮丁本人加以复述，退下回原位，等候检查结束，一齐退场。

合格者是不是都要当兵呢？这并不一定，按分配计划需要要抽签决定，抽中者入伍。

不合格即俗称“国兵漏”怎样处理呢？由征兵署造册交地方政府组织国民勤劳奉公队，简称奉公队，强制他们服劳役。即所谓合格者服兵役，不合格者服劳役。

抽中签的第2年3月1日入营。入营分部队入营和集合地入营两种。离部队近，人数少的领到部队入营；离部队远，人数多的，兵事处派人在集合地点入营。新兵因病或事故不能随队入营的，由兵事处领回，令其下年入伍，这叫“即日归乡”。

三、伪满征兵的黑幕

看前边的情况，似乎伪满征兵是“按法行事”，检查、审核是公道的。其实不然，那只不过是个招数，有钱、有势的人根本不当兵，穷人却逃不脱兵役。钱能通神，向征兵官、军医官花上钱，棒棒的身体可以写上个肺结核，当然当不了兵，虽可

当上国兵漏，却也摊不上勤劳奉仕。穷人条件可以延伸，丙升为乙，连残疾都不得幸免。征兵官有绝对权威，他可以颠倒事实，抽梁换柱，要谁当兵，不让谁当兵，都可以随意处理。征兵法成为军政官员公然舞弊的法宝。

（摘自《四平文史资料》）

我当伪满国兵的经过

张德义　孟彬整理

我在1945年（伪满康德12年）3月下旬到8月下旬当了5个月的伪国兵。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苦难回忆：

体检入伍

伪满洲国的《国兵法》规定：凡是年满19周岁的满洲国青年，都必须在当年7月1日参加伪国兵检查。如检查合格，要在翌年20周岁入伍；检查不合格是“国兵漏”，要参加勤劳奉公队服劳役。我的家住在北向阳村。1944年我正年满19周岁，在6月中旬接到通知，叫我6月30日到向阳村公所报到，7月1日参加伪国兵检查。全向阳村有适龄青年31名，6月30日由村公所助理代队，统一到县里报到，7月1日，我们参加了国兵身体检查。检查的地点在伪汤原县协和会（现运输公司后院红砖房）。我们向阳村适龄青年是第一批受检，先把全身衣服脱得净光后走进检验室。检查室里南面坐着很长一排大夫，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他们的前面摆放着一排桌子，上面放着些检验工具和仪器，正东面横头桌后坐着一个日本人中校军官。靠北面坐

着一排日本妓女和中国妓女，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朵大红花，是准备给检查合格的青年戴的。检查时先量体重，身高，再进行外科、内科、五官科检查。受尽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青年们，谁也不甘心情愿去当伪国兵。人们都说：当国兵是给日本侵略者去当炮灰的，打仗时把国兵放在前面，日本军队在后面，国兵不往前冲，日本军队就用机枪打。因此参加体检的青年们都想在自己身体某些方面提出些 毛病，找出某些缺欠，让其检查身体不合格，不去当伪国兵。我当时是想在眼睛视力上让他检查不合格，因为检查别的科都是明的不太好以假乱真。我的两只眼睛的视力本来都是1.5，当检验我的左眼时，我只说看到1.0，右眼我只说看到0.8。最后把各种检验的材料都集中到横头桌后坐的日本人中校的桌上，他拿起我的体检材料后，两只贼溜溜的眼睛看看材料，看看我，看看材料，又看看我，反反复复地看了三遍，足看15分钟。最后，他两眼盯着我说："你的合格"。当时我的头脑只觉嗡的一声吓懵了，忘掉了所规定的要举手喊"合格了"三个字，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后来随检人员来到我跟前，用手把我的右手抬起来，并告诉我快喊合格了！我才勉强地喊出了"合格"二字，当时我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随检人员把我推到左边，妓女怎么给我戴上一朵红花我全不知道。我走出检验室后，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当时村公所代队的助理通知我，要在1945年(康德12年)3月27日到向阳村公所报到，4月1日到富锦江上军入伍。我十分痛苦地回到家里。家里的人听说我国兵检查合格，都哭了，特别是上了年纪的祖父、祖母哭得更是厉害，都舍不得让我给日本侵略者去当伪国兵。我那时是在南岔铁路当工人，受检合格后就无心去上班了。心想：当伪国兵就是死，还去上啥班呢！家里的老人们更是舍不得我，都疼爱我，叫我躲在家里和全家团聚一年，所

以我在家里种一年地。1945 年3 月27 日我到向阳村公所报了到，村公所给报到的青年们安排了一顿饭，还给酒喝。我的心里苦闷，心情极不愉快，我们都痛饮闷酒，我喝得酩酊大醉，两眼含泪回到家里，全家老少哭了一夜，谁也没睡觉。检查合格的青年28 日统一到县里集中，29 日到了佳木斯住一宿，30 日徒步赶到悦来镇，31 日坐汽车到富锦县，由军队派汽车把我们接到兵营。兵营的地址是在富锦镇西戈儿当附近，离县城8 华里路。

军队建制

伪富锦江上军是归伪满洲国陆军部管辖，叫做“富锦江上第一团”。团下没设营的建制，下属有四个连队，一、二、三、四连，四连又称为“材料厂”，军队的军械、器材、物资和粮食等都归四连管理。还设有一个后勤部，是管理伙房和医务所的。连队下不设排，连直属10 个或13 个班。每个连队都设有一个办公室。团部有一个日本人中校团长，一个日本人团副，两个中国人团副，参谋职员若干人。每个连队有一个连长，一个教官，一个见习教官，一个事务长。各班有一个班长，二个班副。我是被分到一连三班的，连长是上尉日本人，教官是少尉姓毕，见习教官也是少尉姓王、事务长姓房。我们三班长姓贯，一班副姓孟，二班副赵俊卿。

纪律枷锁

我们入伍的新兵都是少兵，领章是红板一个花。日本侵略者用一套残酷的枷锁禁固在伪国兵身上，进行统治。我们入伍的当天，班长就宣布了一套纪律。因为事隔时间太久，我只能回忆起一部分，主要的是：上厕所大、小便要向班长请假，回

来还要向班长销假；军容风纪要严整；见着上级（两个花以上的）要给敬礼；不准随便外出；外出时不准下饭馆，不准喝酒，不准上妓院；不准上街往部队里买东西；更严格的纪律是不准谈论国事，不准谈论政治、军事……等等。用纪律枷锁把伪国兵统治的没有点滴自由。如违反了纪律，都要遭受到残酷的处罚。

军事训练

我们这些新兵入伍后，头三个月为训练期，在训练期里是天天上课，每天是8小时，上午4小时在室内上课，讲政治、军事。政治主要是讲"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等，进行奴化教育；军事主要讲操练，讲步枪和机枪的射击技术，讲各种机械和船上用的柴油机等的构造和操作使用技术。下午4个小时是操场上实练，每天下午都是实际操练，我们这些新入伍的伪国兵，都要出几身汗，汗水浸透了衣服，滚上了一身泥巴，都暗自掉几滴眼泪。伪江上军的训练分三个方面：一是步兵陆地操练、演习；二是在船上练。江上军是既没有军舰又没有炮艇，只是些小木板船，每只木板船舱里有一台40马力的柴油机。操练时，一人当主机手（驾驶），一个副机手，一个航手，一个指挥员。在江上反复地练队列、登陆、排除故障等；三是练搭过江河的浮桥，这项操练是最难最苦的。先是练抬原木，四个人要抬4米长、30到40公分粗的原木，先练抬着走，后练抬着跑。有的新兵体质弱，"蘑茹头"上肩一抬就压趴下了，还得起来咬着牙坚持着抬，还有的抬起大木练习跑，一不小心倒在地上，擦得脸和鼻子全是血，还得坚持练。抬原木熟练以后，要把原木竖着放进先挖好的坑里，用夯砸结实，上边钉上横木，再铺上木板，搭成了过江浮桥。在陆地上操练搭浮桥还

少遭点罪；有时还要在水里练搭浮桥。这个操练苦极了，到了秋季，江水凉了，在水里搭浮桥一泡就是二三个小时，衣服湿透了，累得筋疲力尽，苦难实在难熬。

挨打受骂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根本不当人看待，欺侮和打骂。我们入伍的新兵挨打受骂是常事。入伍新兵们是天天有挨打受骂的。我当了5个月的伪国兵，挨的打骂次数记不清了，但挨的4次重打我还是记忆犹新，永不会忘掉。第1次是我刚入伍的第7天，我当的是勤务兵，负责扫地，到伙房打饭、洗碗筷等。我在饭后洗碗的时候，不慎把水溅到了一个中等兵的鞋上，顿时他火了，把我叫到老兵的房里，他打了我30皮带，打完以后我的双手肿的像馒头一样，三天都不能拿东西，我被打后痛得哭了不算，有好几个新兵看我被打成那个样子也都哭了。第2次是我们新兵集体挨打，在操场上操练时因走的步伐不齐，教官来火了，叫全连100多名新兵排成两行，背对背走开，中间隔10米远，都哈下腰，左右两行互相用木枪打屁股。先是左行的打右行的，因为都是新兵谁也不肯去使劲地打。败类的教官一看兵打兵打得不狠就更火了，他说："你们不会打，我来教"。我是左行的排头兵，受教官打的头一个就是我。狗教官抡起木枪朝我的屁股狠打了5木枪，木枪打断了，把我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流着血从操场一拐一瘸地走了500来米到了医务室医治，我两天没能起床出操。第3次是我从街上买了一斤大酱用饭盒装着带回兵营，被班长发现了，因违反了纪律，他朝着我的脸部打了5拳，打得我鼻子、嘴冒血，恨得我泪水往肚里咽。第4次是民族败类赵俊卿班副找我的小脚，打了我12皮带。因为我入伍时从家里带些钱，必须存在他手里，我向他要存的钱花，他不但不给，反

而还打了我一顿。赵俊卿他一边打我，一边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老子就是管你们的。"连队里的日本人和民族败类的官儿们，残酷拷打新入伍少兵的罪行，令人气愤，怀恨在心，暗地咒骂。少兵们不仅对连队的官儿们恨之入骨，而对那些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伪满警察也十分痛恨，找茬对他们进行报复。一个星期天，我们班里十几名少兵到富锦镇街里，迎面走来了一个挎着腰刀狐假虎威的伪警察，我们十几名少兵排成一字队形，截住这个伪警察，向前一拥，把他挤撞个仰面朝天，掉进路旁阴水沟里。伪警察从阴沟里爬出来像落水狗似地溜走了。在富锦镇街里，伪国兵打伪警察的事经常发生。后来每到星期天，伪警察怕挨打都躲着国兵走，街面上看不到伪警察。

生活待遇

入伍的新兵，穿的是每人发给一套外衣，有的领到新的，有的是旧的。我领到的裤子是新的，上衣是旧的，给一套白花旗布内衣，一个战斗帽和一双胶鞋，还发给一套单薄的小被褥和一床更生线的棉毯子，半截毛巾（一套毛巾剪两截分给二个人），一个月给半块肥皂。这就是一个伪国兵的全部家当。吃的就更是苦不堪言。每顿饭前要敬默5分钟，背诵诏书。一日三餐都是带沙子的高粱米饭和菜汤，不好吃还吃不饱。加上班长和班副的多吃，小兵就更吃不饱了。勤务兵从伙房里把饭菜打来后，要先给班长和班副把饭盛足，汤里的菜捞干的盛走了，轮到少兵名下是饭不足，汤里连菜叶也没有了，是顿顿吃不饱，天天得挨饿。因吃不饱，消化不好，营养不良，好多少兵都得了胃病。每到星期日改善一次伙食，两顿大米饭，菜汤不变样。我当了5个月伪国兵，只吃了两次肉。第1次是全团到江心岛操练完了，600名新兵把江心岛围了起来打狍子，抓兔子。我们连打

了二只狍子，抓了十几只兔，吃了一顿狍子和兔肉。第2次是过端午节，团部决定以连为单位，自选厨师，自买酒、肉、菜，自己办伙食，我们连做了十几个菜，一个班在一桌吃饭。往日是在寝室里长条桌上吃饭，过节菜多，室内放不下，都把桌搬到大操场上去吃。菜好酒也多，随便吃喝。可是新兵们心里苦闷又想家，加上长时间都没喝酒了，都端起大碗酒猛喝，菜没吃多少，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又笑又叫；有的睡在操场上。这顿饭从下午3点钟开始，直到晚8点多钟还有醉倒在操场上没起来的。

班副勒索

新兵入伍时，都从家里带点钱准备零花。我家的老人七拼八凑给我带了200元伪币，入伍时一路上花掉30元，腰里还揣170元。入伍后的一天晚上要睡觉时，班副赵俊卿装模作样地偷偷告诉我们班新兵，带在身上的钱都要存到他手里，用时再拿，不然，连部翻出来是要给没收的。新兵们都信以为真，我存到他手里150元；有存500元的；也有存上千元的，大伙共存到手里的钱3000多元。可是，新兵们用钱花向他要时，他却横行无忌，想方设法找茬儿骂新兵，新兵们都不敢跟他要存的钱，一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祖国解放时他逃跑了，钱也给拐跑了。赵俊卿当伪国兵前是大连海员的伪职员，他当兵后把老婆带到富锦安家，他家生活花的钱都是勒索我们新兵的。

祖国解放

1945年8月9日早晨5时，突然全团紧急集合，伪国兵都全副武装到操场列队，由连长训话。连长讲完话，由翻译讲，他说："苏联对满洲国宣战，空袭了满洲国各大城市，全国要立即

出战。”当时苏联红军飞机在富锦投下两枚炸弹，一枚投在富锦女子高等学校院内；一枚投在北江沿浴池院内。团部给我们新兵换了新枪，每人发给50粒子弹，全团杀了好几口大肥猪，大吃一顿以后，就列队到富锦东门外挖战备工事，以备应战。在这个节骨眼，团里的日本官兵，感到末日临头，都惊慌失措，无心指挥。伪国兵军心大乱，暗自庆幸，从心眼里高兴，盼望早日解放。8月13日苏联红军打进富锦，伪富锦江上军一团全部交械投降，我们被解放了。8月25日，我回到汤原县北向阳村家里，见到了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一家人，都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日本侵略者投降，祖国解放，我们全家得到了团聚。

（摘自《汤原文史资料》第六辑）

伪满时的国兵生活

戴士纯供稿　鞠晶整理

伪满洲国的《国兵法》，是从1940年（康德7年）4月11日公布实行的。根据该法，伪满士兵从年满19岁的青年中征集，服役期为3年。

《国兵法》实行以后，按规定凡经检查合格者，每年3月1日入伍，编入伪满军队，成为国军一员。从此，我东北广大适龄青年陷入灾难的深渊。今回顾往事，把亲身经历写在下面：

当时，盘山县也设立了征兵检查站。当应征青年们一进入场地后，就可看到，外有警察站岗，内有宪兵巡查，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体检人员多半是日本医官，对受检者的身高、体重、

视力、听觉……逐项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态度蛮横，百般刁难，不是说身体不干净，就是说站立姿势不对，或是答话声音太小，挨打受骂者不计其数，名为受检，实属过关。熬过道道检查关卡，如被认为合格者，还得规规矩矩地站在日本征兵官面前，高喊一声："合格"，日本人故意苛求立正姿势与声音大小，被逼三番五次喊合格者不计其数，直至日本人认为满意时，才算渡过这一关。

我当时受检合格应征入伍后，被编入奉天（沈阳）第一高射炮部队，部队长叫向日一雄。在高级军官中多数是日本人，中国人寥寥无几，只有下级军官才让中国人担任。日、满军官之间在生活待遇上大有差别，在政治待遇上更是截然不同。伪满军官视日本军官如太上皇，处处仰人鼻息，在日本人面前只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即使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军官也是如此。日本人对伪军时时存有戒心，经常监视官兵之间的关系，伪军官中凡有与士兵接触频繁，感情融洽者，轻则调出，重则降职降薪，直至免职。

士兵生活待遇是低标准，主食完全是高粱米，而日本官兵及其家属完全配给细粮，还美其名曰，日本人不能吃高粱米。

伪兵服役期间，最难熬的是操练。因立正、稍息、左右转等军事口令完全是日语，那时大多数青年都读书不多，没有日语会话基础，动作自然不能迅速、利落，动作缓慢者就遭了殃，日本军管一边骂巴嘎（混蛋），一边拳打脚踢，被打者还得挺胸站立，直到他们精疲力尽为止。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每逢日本军官心不顺，就用惩罚伪兵来泄气，他们命令全排或全连士兵迅速集合，两排对面而立，一声令下，就得互相打嘴巴，凡认为打人不用劲时则亲自动手，有时竟用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背乱打乱砍，真是惨无人道。

伪满军队规定，伪军士兵平时走在街上，路遇日本军官，不论哪个部队的都必须立正、敬礼；相反，日本士兵见到伪军官却扬长而过，不予理睬。这种奴颜婢膝的作法。颇使有民族自尊心的伪满士兵内心不服，有的就故装没看见，匆匆走过或动作迟缓，勉勉强强。有的因此在大街上就遭受日本军官的毒打，伪满士兵虽然把以上遭遇当作莫大耻辱，然而既然当了亡国奴，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日满当局高唱什么"日满提携"、"日满亲善"，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摘自盘锦市《盘山区文史资料》第一辑）

我当伪国兵的亲身经历

刘树德

我是第四期被征的"国兵"，1943 年检查身体，1944 年3 月2 日入伍。我们被征的20 余名，从桓仁坐汽车到通化，会同通化地区的被征者坐火车到安东（丹东），换上军装，才知道自己的去处。我到的部队是第六军管区混成第六旅骑兵第十九团机关枪连。上了闷罐火车，经过两个昼夜到达了间岛市（延吉市），开始了非囚似囚的生活。

每天安排得很紧。早5 点起床，"点呼"后回来整顿内务、洗漱。6 点开早饭，吃饭时还有一套形式，坐好后由值星班长喊"举著"，之后齐念一段日本话，大意是，饭是天照大神给的，感谢天照大神。我们背地里给起了个名叫"馕食咒"，然后才开始吃饭，一碗饭几口就下去了，谁也不敢吃慢了，因为到时间班

长要喊“退饭厅”，不管吃不吃完就得停下，一齐放下筷子退出坐位。饭后到出操的一点时间只许在屋里立正姿势坐着，谁也不许说话，像木偶一样。谁要上厕所需到兵舍门口，向屋里行个礼，并报告某某上厕所，回来时同样喊某某上厕所回来了。早7点到12点出操。紧张地吃过午饭，下午1点到6点仍然出操，6点半晚饭。晚7点到9点是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并不自由，不是学习不着调的军歌，就是值星班长训话，或者是检查内务。晚9点就寝，还得等“值星司令”进行晚点呼后才能就寝。每两天晚上还得轮一次“夜勤”，一个班一个小时，要是轮在就寝后第一个班和最后一个班算是幸运，最糟的是夜中间值勤，一个班前后总需两个小时才能睡觉。兵营中的生活实在难熬，睡眠不足，运动量大，尤其饭不够吃。

伪满国兵的装备和编制，有其名无其实。第六军管区驻牡丹江，下属有步兵第八团，约1 000人，大部分驻热河；留守部队驻宁安。还有混成第六旅骑兵第十九团驻间岛市。这个骑兵团没有营编制，直属4个连400余人。另外还有第二自动车队200余人驻宁安，第六辎重队200余人和一个炮兵营200余人驻牡丹江。工兵营200余人驻明月沟，司令部的军乐队和通讯队百余人驻牡丹江。

在装备上，从门面上还可以看得下去。有三八式步枪，以后又换上捷克式七九步枪，九二式重机枪，九六式轻机枪，山炮、野炮、迫击炮及掷弹筒等应有尽有，岂不知这些武器都是空筒子，日本人对伪军存有戒心，军火仓库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平时一粒子弹也不给。

1945年春，日伪预感末日到来，为做垂死挣扎，对伪国兵进行一次改建，将原骑兵团建制撤销，改编为步兵第三旅第七团，移防牡丹江市八达沟。加上1945年春入伍的第五期国兵，也

不过一千多人。下属3个营，9个连。实际上也是空架子。

1945年8月10日，苏联军队攻进绥阳、穆棱，威胁牡丹江市。步兵第七团向宁安方向转移途中，在团长王秉询的暗示下全团哗然而散，跑到距牡丹江40华里的蛤蟆塘住了几天，由苏军收容移驻海林，在海林又住了一段时间，才各奔他乡。

我曾任军营祀神官

曹也光

我于1940年在满洲国陆军军校毕业后，被派到吉林市第二军管区第二国兵教育队，后到工兵队。

伪满军是以团做为战略单位。团长是持有军旗的指挥官。团内配备建军教育官，主管部队中的思想对策。1940年以后改称为建军教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军需供应上极端困难，因此便把“精神压倒物资”及节约也列入建军教育一项内容。再就是供奉“天照大神”。伪满洲国上自新京（长春）下至县镇以及机关、厂矿、学校、部队都必须遵照溥仪皇帝《国本奠定诏书》修建“神社”、“神龛”。神社、神龛内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上自皇帝下至军队、庶民都得拜神。几乎是凌晨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满军第七工兵队营房设在吉林市松花江南岸，据说是清末建的兵营，有一百余间瓦房，就在营门围墙下修建一座约1.5米高，上盖漆黑色日本式的神社。军官每逢早晨上班除听卫兵喊敬礼口令外，有一件大事必须做的，就是一进营房大门首先拜

神，否则要犯大不敬罪。第七工兵队里日本副官关原专管拜神，官兵都得服从他监督。每逢初一、十五上班之前，部队须整列立于神社前，部队长官指挥祝俸仪式。1943年春，关原副官向我发出命令："今后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命你当祝神官（指挥祀神仪式的军官，在日本大神社里，常由和尚担任。）"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如果稍一疏忽，闹个举动不周或行为不规，是要受军法惩处的。无奈军令如山，我只好提心吊胆地应诺了，并说："祀神的动作、要求我一点也不懂。"关原说："你是第七工兵队里品学兼优、最好的青年军官，所以把这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交给你。此项命令必须服从，至于不懂嘛……我可以教给你。"然后我随关原来到神社前，他一一地向我传授了祀神的鬼把戏，从此，我当上了军营的"祭神官"。

祀神仪式时，上校部队长王凤萱、队副中校郑德陛、作战参谋相子章一三人摆列于队前，各连队按操典制式规定整列，关原任司仪官。这时我到神社前，洗了手面登上神社高台，轻轻推开神社门，先行了个脱帽90度大礼，然后取出御神挂（用白纸做成，形如抬死人的招灵幡，多由日本神社和尚制作，然后卖给伪满洲国各地神社，价格昂贵。），退下台阶走近队长等三个受神者面前，我用御神挂的纸幡在他们头上左三摆右三摆，接着又到正列部队前照样左右三摆后退到神社前，把御神挂放到原处，退到关原的左侧立正站着。这时正列部队官拔刀，士兵上刺刀致最高部队礼。礼毕，我再到神社前施大礼，轻轻把神门关上，才结束整个仪式过程。神社里天照大神是什么样，谁也不清楚。

在祀神完毕后，中校队副郑德陛偷偷问我："曹教官你看神社里供的天照大神什么样子吗？"当时我哼了一声说："什么神！那是一个精制瓷碗装着凉水！""这就是天照大神，纯粹唬人。"

我俩的对话被关原在旁边听到一点，他有些听不懂中国话，当场把我叫去申斥了一顿说："如果泄露天照大神的秘密要受军法制裁。明白吗?"此后无论何人问我神事，我闭口不谈，但我是解开了天照大神这个谜。

写给溥仪一封信所引起的风波

李雪松

这是1941年5月，某日早7时左右，驻在佳木斯市东郊蒙古力兵营的伪步兵第二十六团，突然来了第七宪兵团特高科长荻村上尉。连值周军官王喜山中尉正向我报告连内状况时，阿布副官找我到团长室。我随阿布到团长室时，看到荻村也坐在团长室正和中校代理团长胡骥在谈论什么。胡骥命令我把迫击炮连二等兵金振福找来，并说不准泄露消息。当时把我弄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把金振福找到之后，随同荻村坐汽车一同到宪兵团。对我们俩人分别由宪兵军官进行调查。宪兵上尉刘某向我说明事件原委，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金振福给当时伪皇帝溥仪写了一封问候信，却犯了"大不敬罪"，刘上尉把金振福写给溥仪原信和伪宫内府给宪兵总团司令的批示给我看。信的开头是皇帝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信的中间是从伪《铁军》刊物发刊辞节抄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说"有人享福，有人受苦"。署名步兵二十六团迫击炮连二等兵金振福叩。是蘸水钢笔写的，信封是用墨笔写的，上款：新京，皇帝陛下，下款：佳木斯市蒙古力步兵二十六团迫击炮连缄。

这封由伪宫内府批示给伪宪兵总团司令调查该兵写信目

的。伪宪兵总团司令根据伪宫内府的批示，命伪第七宪兵团长按照伪宫内府的指示进行调查具报。首先让我报告金振福平日思想情况，我介绍金振福原是1938年入队，身体健康，但精神有些呆痴，因此入营四年尚是二等兵，粗通文字，在迫击炮连种地。介绍之后，宪兵团又向我要以下文件：连长平日对官兵精神教育方针，内务教育方案。连的年、期、月、周、日教育训练各项教育计划方案。连长对官兵精神教育，内务教育参政资料。官兵思想行动政策考核表册，等等。于1940年，在伪军普遍施行官兵思想行动对策，连由连长担任对策责任官。命我把上述材料交伪宪兵团审查。

第2天，我携代宪兵指定审查文件到宪兵团，听候调查。调查的主要问题是信中所写"有人 享福，有人受苦"，是指何而言。由军医对金振福的思想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军医检查后初步证实金振福精神方面有不正常的现象，把他留在宪兵团做进一步检查。让我回去听候通知。

第7天，早8时即接到宪兵团通知，让我按时到宪兵团。这天荻村、刘上尉等对我说，此事件调查终了，他们初步结论如下：据调查了解金振福确患有精神不正常的病。据本人叙述写信目的，完全出于对皇帝的敬意，但自己并不知给溥仪写信是犯"大不敬罪"。而连长是直接教育责任者，同样应负法律过失责任。让我把金振福暂先领回，听候上级指示。到7月中旬才接到伪宪兵总团司令通报，大意如下：步兵二十六团迫击连二等兵金振福于本年5月1日私自给皇帝陛下写信事件，经过第七宪兵团对该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认为属实。但对当事人的"大不敬"行为不予追究，命各部队教育士兵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此事看起虽小，但从中也可看出殖民统治者无孔不入的严密而残酷的控制，以及侵略者作贼心虚的虚弱本质。

伪满哈大公路修建见闻

曹也光口述　王连生整理

1942年7月，我所在的伪国兵第七工兵队（地址在吉林市江南）接到伪满洲国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军事部转发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内容是：第七工兵队以作战编制，利用铁道输送，迅速向“南满线”，首山车站西侧15华里处的大乐屯进发。任务是：参加修建哈大公路作业。于是，伪第七工兵队长王凤萱带领部队官兵到吉林市“神社”参拜了“天照大神”，祈求“神”保佑我部队全体官兵顺利完成修建哈大公路任务。接着登火车出发，第2天午后两点钟左右到达首山车站，傍晚来到大乐屯。

到达目的地后，部队以连为单位，修建了露营地，炊事场。都是单层布盖的活动木杆帐房，只能防雨防霜，而不能防寒冷。

次日早饭后，由工兵队高级队副（日本人）相马章一带领全队官兵到达哈大公路施工现场，开始分配作业任务。各连分担的全是路基土工作业。公路修建规格设计，限定路面宽26米（路看到路肩），路两侧各有3米宽人行路。整个公路要求达到水平标准，以便通行快速汽车。

作业没有机械，都是士兵用单轮木架手推车运土，用铁锹挖沙土。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干，很少休息。官兵过分劳累，敢怒不敢言。

按计划工程完成一半时，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陆军中将王济众及主任顾问小川中佐（日本人）来到大乐屯工地做了一番视察。视察结束后和全队军官宴会一次，并对全队官兵进行了

慰问训话。训话大意是：第七工兵队全体官兵此次担负国防建设的重要作业，是无比光荣的。体现了日满两军共同作战精神。为了完成日本亲邦的大东亚“圣战”任务，希望全体官兵要振奋坚韧不拔的旺盛攻击精神，按时完成这一国防建设重任。

后来工期紧张了，每天作业时间增加，白天完成不了的作业量就得夜间干个半宿。光阴似箭，完工时已是秋冬交替季节。

第七工兵队在完成作业任务后，由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国务院在鞍山市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哈大公路建成会议。伪满洲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国务院属下司法部大臣、民生部大臣、经济部大臣、交通部大臣、教育部大臣、军事部参谋司长、农业部大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还有伪国军第七工兵队全体军官及鞍山市各学校，各行各业的代表及有关哈大公路建设的高级官员等，差不多有一万人。大会开始时，军乐队奏满洲国国歌，入会者合唱。紧接着张景惠作了训话，他讲道：“我大满洲帝国承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修筑了有伟大意义的哈大公路，它不仅支援了亲帮‘圣战’，而且还是满洲国的经济、农业、工矿的又一条动脉。”

大会结束后，伪满洲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及各部大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在鞍山市日本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大礼堂宴请了我伪第七工兵队全体军官及有关高级官员。宴会中，张景惠绕场一周，按人斟酒。接着各部大臣也挨个给大家斟酒。几个日本妓女身穿和服，载歌载舞欢跳。

为了笼络人心，让伪官兵忠心耿耿效忠皇帝，还向每个人赠了一木盒糖，糖盒上系着红白两条丝线，表示日满亲善不可分的意义。还嘴上客气说这盒糖是“御赐糖”。拿回去要在家放着，等到元旦时才能启而食之，以表忠心。

哈大公路启工式结束后，我伪第七工兵队仍由铁路输送回到吉林市南岸营地。

十二

伪满军反正



邓文规劝霍刚反正抗日

张振芝

邓文军队原系东北军旧部，驻防在黑龙江省东荒（通北北安一带）。“九·一八”事变后，改称东北骑兵救国军第一军，邓文为军长。装备的武器有重机枪、迫击炮和八匹骡子拉的野炮。有骑兵五六千人。1932年夏，开到拜泉县富强镇（今保富乡）驻防。

当时驻防在拜泉城内的部队是新编的第三混成旅，旅长为朴炳珊。他不听敌人的诱骗，受马占山之命联合黑的抗日力量，决心抗日到底。与邓文联系，邓文同意与朴相会。于是在8月25日，朴炳珊偕夫人刘素蓉带着警卫人员到富强镇面会邓文军长，二人共商抗敌大计。邓文完全同意朴炳珊提出的“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同意商定了协力进攻齐齐哈尔的行动计划。议定朴炳珊从拜泉经克山、泰安由东向西直捣齐齐哈尔电请驻扎兰屯的救国军将领苏炳文、张殿九由西向东攻取齐齐哈尔（已取得了同意的回电）；邓文率部直奔洮昂路，截断交通，阻击敌人援兵北上。计划商定之后，各自准备按计划出兵。

9月中旬，邓文按既定计划率队从富强镇出发，于9月15日上午9时许到达依安（今依安镇）城郊。驻扎在依安的是降日军骑兵第五十八团，约800余人，装备有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该团团长是霍刚，奉日军之命协助依安驻军五十三团二连剿匪，在7月5日从林甸来到依安的。由于邓、霍两人对抗日、降日问题上，各自政治目标大为不一。因而早已降日的霍刚在得知邓

文经依安去洮昂路的消息，很怕到达依安缴他的械，因而竭力阻止邓军由依安城内通过，便在郊区设防阻止通行，因而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当天正是中秋佳节，从上午9时双方接火，到下午5时许，邓文部队包围了全城。双方战斗非常激烈、大炮轰鸣、弹头横飞、惊天动地、彻夜不息。居民家家户户胆颤心惊，人们紧缩在炕墙之下，忍着饥渴，以防飞弹丧命。

霍刚深感势单力孤，继续顽抗，恐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搬出当地官绅出头并护送出城，经过联系，面见邓文，转达了霍刚意见；只要保存霍团武装队伍的完整，可平息战火，让路通过。邓文的答复是队伍暂不进城。遂提出于16日上午，邓文要亲自带随从人员进城与霍刚面谈，但必须保证安全，可以就地停火。联络人员返城面告霍刚，霍刚表示16日面谈，绝对保证安全。因而在黎明前双方停止了战火。

邓文于16日上午带随从人员进城与霍刚直接面会，邓义正严辞地指出："今国难当头，民族垂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光荣，降日可耻。身为军人，不报国耻雪民恨，以何颜见父老，以何语慰列宗。应共赴国难，一致对外，保国卫民乃军人天职，英雄本色。"他规劝霍刚深思，立即回头。在邓文的严厉批评和深刻教育下，霍刚方觉背叛人民之罪，民族精神开始醒悟，表示一定要弃暗投明，反正救国，走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18日，邓文率部起程西进，霍刚相隔一周之后，率领全团队伍正式反正，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与邓军共同作战，抗击日伪军。

我担任了哗变的联络工作

李文成口述　王喜荣整理

1932年5月，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和策动的驻伊通县营城子伪军七连哗变，是南满伪军中最早的哗变部队之一。它的哗变，为创建磐石工农义勇军奠定了基础。当时我参加地下联络工作，又是第一次接受党给我的任务，所以印象深刻，至今没有忘却。

“九·一八”事变前，我在磐石烟筒山当中医，1930年出徒，1931年回乡行医。1932年春，在我的家乡明城一带农民举行暴动，有上千人参加。暴动的农民呼口号，撒传单，扒了铁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在那次暴动前后，经常有一些朝鲜人来明城找我看病、买蜂蜜。有一次一位姓李的朝鲜妇女同我攀谈起来，她用汉语问我，你行医为谁治病。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中国人治病。她打量着我说，中国人都要当亡国奴了，你怎么能治呀？一句话把我问住了。她严肃地说，你光行医救不了国，也治不了病根。接着她向我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她的话打动了我，光治病救不了国。后来刘克文的姐姐多次来我家，动员我参加抗日斗争。从她口中我才知道，那位姓李的妇女是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朴凤的爱人。在她们的影响下，我克服了家庭的阻力，带着药箱走上了革命道路。

磐石中心县委设在西玻璃河套，而县委一些干部经常在明城一带活动，我到五间房找到了县委干部权光。他问我你能离

开家吗？我说药箱我都带来了，怎么离不开家呢。他看我很坚定，就领我到拐子炕，安排住在一户姓朴的朝鲜族家，在这里不几天我就见到了拐子炕党支部书记韩光。因他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化名叫黄埔。

到拐子炕没有多久，韩光把我找去。他说你来后没有安排工作，想让你先熟悉一下情况，现在有个任务，能不能完成。我说请你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对我说："这里有封信，你把它送到伊通县营城子，交到王耿手里。"接着他告诉我王耿的相貌特征和交信的地点、暗号。临走时他千叮咛万嘱咐不要遗失，早去早归。

原来，这是一封磐石中心县委策动驻营城子伪军七连哗变的密件，由县委交给拐子炕党支部，责成拐子炕党支部负责搞联络工作。驻营城子的伪七连原是东北军老十四团的连队，"九·一八"事变后，被收降改编为五旅十四团二营七连。明城、蛤蟆河子的群众反日斗争对他们很有影响，激发了爱国热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很是愤慨，在思索着，寻求着。磐石中心县委根据满洲省委的紧急指示，决定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同时，也要在伪军士兵中策动哗变工作。于是，便派王耿（满洲省委派到磐石搞军运工作的）、朴衡燮、金成焕等同志去七连搞哗变工作。他们到营城子后，在当地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到七连当了补兵，打入伪军内部，开展艰巨而又复杂的思想教育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哗变。

韩光叫我送信到营城子，就是同早已打入七连内部的同志取得联系，把县委的指示送到他们手，再把他们的工作情况报告给县委。我从拐子炕出发，到营城子有120里路，在营城子东一片小树林子里找到了王耿同志。他大约30岁左右，但很苍老，脑袋已经秃顶，这是他突出的特征，因此，人们叫他王秃盖子。

我原以为他是汉族，后来在游击队一次联欢会上，他唱朝鲜族歌曲，我才知道他是朝鲜族叫文碧涛。他把信接去后，又交给我一封信，叫我面交韩光。从此，我就和另外两名朝鲜族同志，一名是尹大下巴，另一位是朴歪嘴子，奔走在拐子炕和营城子之间，传递党的机密。

我是4月份到拐子炕的，送几次信后，就到了5月中旬，大约是在5月17或18日，县委突然叫玻璃河套和拐子炕党支部组织群众迎接哗变部队。由韩光率领二十多人。由拐子炕出发，计划4点多钟到达营城子。可走在途中，就遇见了哗变的士兵。他们背着负伤的刘事务长。韩光留下我们7人，叫抬着刘事务长回拐子炕。其余的人由他领着去追赶哗变部队。我们把刘事务长抬到拐子炕后，先安排在群众家。天转暖后，转移到屯东南一片地边搭的"和尚帽子"里住。我是中医，组织上就把治疗刘事务长的任务交给我。刘事务长说，他是吉林人，哗变那天晚上，营房内找了一阵乱枪，他被打伤。我给他检查了伤势，子弹从前胸打进去，从后胸穿出。伤势很重，但没有打中要害部位。从5月中旬治到8月初，他才康复。他不愿留下来，组织上给他二百元大洋，又给买一头毛驴，他骑着回吉林了。

王耿、朴衡燮、金成焕等同志在接到县委的信件后，抓紧作伪军士兵的思想工作，条件还没有成熟。就走漏了风声。原来营城子有个校长叫张自然，他也想组织士兵哗变抗日，经常请些士兵到他家做客，鼓动他们拉出去。这个消息被连里知道了，在5月16日，连长要缴各排的枪支弹药，于是发生了冲突。哗变士兵夺了连长的手枪，发生了枪战，在当晚哗变部队就拉出来了，哗变部队出营城子后，在中途遇见了"太平绺子"，走到小北山在三棚砬子附近，被从伊通来追击的伪军赶上，在小北山打了一仗，哗变部队被打散了，大部分和"太平"走了，剩

下30人左右，几经周折于19日到达拐子炕，20日到西玻璃河套，受到县委的热情接待。

这30人到达后，一看斗争环境很艰苦，又缺少坚定的抗日思想，要求回家。县委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发动汉族和朝鲜族妇女用幔帐和裙子给他们改制服装，把他们穿的灰军装都换下来，又发给每人20现大洋做路费，叫他们回家了。

哗变士兵带来的30支步枪和子弹，都藏在地窖里。在这之前县委只有由7人组成的“打狗队”，使的是“后门蹲”、“十三太保”、“七星子”、“铁公鸡”等简陋武器。这次有了30支盖子枪，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县委决定成立游击队，动员磐石、伊通、桦甸等地的党团员和会汉语的朝鲜族青年参加，同敌人开展武装斗争。

5月末，“磐石工农义勇军”正式成立了。有30多人参加。为了斗争的需要，分为磐石、伊通两个游击队长，每队15人，15支步枪，“打狗队”的7支短枪也分给游击队。磐石游击队长是孟洁民，伊通游击队是朴衡燮。几经战斗，义勇军离开了磐石和伊通，转战到桦甸的蜂蜜顶子，整编了义勇军，改编为4个大队，总队长由孟洁民担任。游击队回到磐石后，在磐东石虎沟将工农义勇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南满游击队。孟洁民任总队长，初向臣任政治委员，李红光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由孟洁民兼任，第二大队长是李万和（我当时叫李万和），第三大队长是刘克文。从此游击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游击于桦甸、磐石、伊通、辉南等县的广大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王耿是朝鲜族，绰号王秃盖子，真名文碧涛，是黑龙江东宁县人。他曾在苏联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被捕入狱。1929年出狱后在满洲省委工作。1932年到伊通搞过军运工作，

5 月策动驻营城子伪军七连哗变，8 月被伊通保卫总队以“乱党”分子逮捕，后被李红光、初向臣营救。同年10 月磐石工农义勇军在桦甸蜂蜜顶子改编时任政治部主任。1933 年被派到辽宁省的台安县（包括辽中、台安、盘山三县）任南满特委负责人。1934 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先押到哈尔滨南岗监狱，后解到朝鲜京城监狱，1937 年被判为无期徒刑。

作者简介

李文成原名李万和，是吉林磐石人，1932 年入党。他参加游击队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第二大队长。后在战斗中负伤，治愈后，被一名亲属出卖，被捕入狱。出狱后行医。解放后曾任前郭县卫生局副局长，是县政协委员。

伪靖安军司令藤井被刺记

韩福寿

1937 年8 月，伪满军伴随日军作战将靖安军集结于承德，连同原驻热河之步兵第五团和骑兵第五团混合编成一个支队，靖安军司令少将藤井重郎任支队司令，向热河边境长城线进发。8 月16 日到达距长城外约50 里丰宁县黑鞑营子一带。分散宿营时，有两个团，遭受了中国抗日部队第八十四师高桂滋先遣部队的夜袭，颇有伤亡。该队遂将死亡者户体，在黑鞑 营子举行火葬。日军飞机为支援该支队，连日通过此地向长城线方面的中国军队进行轰炸和侦察。在这种情况下，素怀抗日壮举的靖安军第一机关枪连少士李玉峰（河北省籍，伪康德2 年应募入

伍），便伺机杀掉作恶多端的藤井重郎。8月17日，李玉峰被派值岗哨，在黑鞑营子村西方3里之山地执勤。当晚饮酒，激昂感慨对其他哨兵声言：“我非打死藤井司令不结！”18日晨，藤井重郎率随从官员来哨所视察。李少士还在盹睡，哨兵告之藤井司令来了。李少士当即擦擦眼睛，下坡向藤井跑去，迎面对藤井用自佩的“自来德”手枪一击，打中腿部，藤井当即倒地，向坡下滚去。而李少士追上藤井后，一跃骑在藤井身上，又枪击藤井胸部，终将藤井刺死。此时仓皇失措之随从日系军官，方以械棒群击李少士，李遂当场殒命。事过一周，满洲国通讯社才发表通讯消息说：藤井少将在西南国境，与敌对峙，在山地密林中侦察敌情时，遭受了敌人侦察兵之袭击而壮烈战死，为此升为中将云云。这是日伪统治机构隐蔽事实，虚报情况。事后，该支队日系军官严禁传说刺死藤井之事，避免滋长军心动摇，以致李少士的姓名和他的事迹，特别是举义之际的民族气节和英雄言行，除了当场的人，其他人就都不得而知了。

藤井少将被刺经过

金琦

参加热河支队步一团第五连官兵亲眼看见的事实如下：1937年夏天，热河支队主力计划对西北军高桂滋部进行全面攻击，热河支队所属各部队在热河黑鞑营子一带各山头准备待命，待支队司令攻击部署命令下达后，开始准备战斗。正当此时，日军轰炸机由该部队上空飞往华北，第一机关枪连中士班长李玉峰（脸上有麻子，河北省某县人），见到飞机在上空飞过时，他

嘴里念叨："这飞机又到我家乡轰炸去了，我恨日本鬼子，有机会我非打死他们几个鬼子，解解心头之恨。"他说完之后，本班士兵们有的说，"班长别吹牛了。"这么一"将"，他把自己的手枪装上子弹，然后说："你们看着吧，等有机会的！"说完这句话不大功夫，藤井司令率幕僚及各部队长来视查地形及对面情况以便作攻击布署。藤井司令是由山下往山顶看，眼看到轻机连附近了。士兵们有的用肘一拱"麻子班长"，有的用目光暗示：来了，你敢打吗？李玉峰立即举枪，"啪"的一枪就打中了藤井司令。藤井被打中之后滚下山坡，当场毙命。当时，所有随同人员都被突如其来的事实给惊呆了，不知所措，以为是兵变。稍过一会儿，随行人员才明白过来，其中，随行的靖安步一团团长上校山崎，命令第一机关枪连长（日本人）将刺客捆起来砍头。日本连长当时问李玉峰："你为什么打死藤井司令？"李玉峰回答说："你们日本人侵略中国，飞机刚才还由上空飞往我的家乡去轰炸，我恨你们日本人。"日本连长说："你打死我吧。"李玉峰说："你官太小了，不打你，打你们日本人司令，给中国人报仇！"说完这些话之后，日本连长把他捆上砍了头。他的爱国的热情及勇敢牺牲的精神实令人可敬可佩。

虎口余生

张书柏

伪满康德6年（1939年），我26岁，被迫征兵编入炮兵队。同期入伍的有姚家村王洪文。入伍后在大虎山进行基本训练三个月。6月末部队被派往兴安北省诺门罕前线与苏军作战。我和

王洪文都编入三炮团独立连。

受尽虐待

在前线，开始是防御战斗，后来就进行主攻战斗。炮火十分激烈，每次战斗都有很大伤亡。战斗稍有间隙，就强迫我们去修防御工事。由于饥饿、疲劳、昼夜不得休息，患了重感冒。排长看我不能上前线，就叫我带病去放牛，晚上，背几十斤重的东西，徒步往前线送“给养”。不论黑夜白天，上有苏联飞机轰炸，下有日本鬼子逼着我们去卖命。由于战争紧张激烈，“给养”供应不上，加之日寇对我们残酷苛薄，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喝不着水，我们这些患难的中国人，不愿为日寇卖命，个个厌战。日子长了，人不吃饭，哪能干活。还经常遭受排长毒打，特别是炮兵队长大正丰（日本人），“八嘎牙路”长在嘴上，骂个不停。稍有不周之处，就拳打脚踢，还命令排长对我们严加看管，逼得我们实在没有活路。

密谋造反

一天，我和少士班长李宝文，在放牛时秘密商量，想办法逃跑，脱离虎口。我对他说：“我们天天吃不饱，还挨揍，不定哪天得送死。”他说：“我算不给日本鬼子卖命了，各排里大多数人有这个想法。”说这话时王洪文也在场。我们三个人又进一步研究决定在7月28日开始行动。原打算把四个中国人排长和日本队长（大正丰）一齐打死，又一想这四个排长虽然很坏，但毕竟是中国人，不如把他们用绳子捆好，堵上嘴，集中力量打死日本鬼子队长。当时定的行动计划是让杨春辉用手捏脖子，由李德善用刺刀一下刺死。就这样经过周密商量之后，待机行动。

刺死队长

行动日期到了，7月28日夜间10点钟，我和王洪文共带9名弟兄，先骗过站岗的，闯进炮兵队长日本鬼子大正丰住处。进帐篷后，见这个鬼子队长正在看书，他抬头对我们发问："什么的干活?"说明迟那时快，李德善纵身一跃跳到炕上，用全身力气一把死死捏住鬼子队长的脖子。杨德辉的刺刀没跟上去，站在那儿没动。当时我心急如火，再不动手，那就晚了，于是我一个箭步跳到炕上，用力一刀，把鬼子队长大正斗刺个透心凉。这时有一个姓董的上士班长，跑向司令部报告去了，情况很快轰动了驻地。马上我们跑到外边集合共有77人。

我们原计划事成之后往苏联跑，还没走几十步，机枪就响了。我们边跑边打，枪声像炒豆似地从四面响起，跑出一段路之后，仅剩下33人。往东北跑不行，又折向东南，天快亮了，有人提议去苏联不行，奔齐齐哈尔找抗联去。日夜兼程，一连走四天四宿，随身带的粮食全吃光了，只好采野果充饥。有人带望远镜看到远处有一户人家。又走二里路，发现这家大门前有一辆大马车，我们不敢靠近，怕找麻烦。这时33人分成两股，19人那股刚一过河，就被日本军给圈去了。我们14个人过河后，鬼子们高喊"枪的放下，投降的好。"我们就地卧倒，开火打上了。这次战斗受伤3人，1人死去。剩下的10个人，又疾步18天，最后到内蒙的五叉沟。

休息两天后继续赶路，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棚子前，里边住的是南满铁路工人。我和王洪文先闯进去，收缴两支大枪一支小枪，还有少量吃物。我们带着武器让一个工人护送过河，过河以后把枪又还给了他们。

我们十个人还是往前走，这一天来到内蒙的哈吗甲。天已

黑了，发现有一户人家，进去一看是蒙古族，这家老俩口子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索伦警察厅当官。这老头问我们是那来的叛兵？我回答说不是。老头接着说："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向官方报告，你们先上后山躲一躲。"第二天，老头给我们一些吃的，送我们到山南，正好碰上他的儿子回来了。我们心都凉了，不知是福是祸。经老头介绍情况后，他儿子说："你们这样走不出去。"又回到他家，把十一支大小枪留下，给我们换上了便衣，每人还给五元钱。就这样我们十个人到哈拉黑火车站，买了火车票，我和王洪文坐了两天一宿火车，到青堆子下车，连夜到王洪文家。当王洪文一叫门，可把他妹子吓呆了，连说："家里人都听说你死了。"经我的介绍，他家人才真相大白。

第二天我回到家里一看，家都散伙了。为了躲避风声，先到老叔家，藏在仓子里，呆有六七天。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去阜新孙家湾做工。以后又回家躲着。

被抓入狱

1941年农历五月初九，忽然来了两个穿黄军装的人，说是锦州宪兵队的，由区划长戴希文领着，一进屋就把手铐给我带上了。先带到沟帮子警察署押了一宿，第二天送锦州宪兵队。三天后才审讯，由宪兵队吴排长审问，他厉声说："叛变是你的主谋人不是？"我立即回答："不是，我是新兵，不敢干那事。"接着又追问："大正丰队长谁刺死的？"我说："不知道。""齐排长是谁绑上的？上苏联去了多少天？"我说："这全不知道。"他看我不承认，就威吓我说："宪兵队就是阎罗殿，到这里来的人不死也得扒层皮。"紧接着让我把手张开使大板子狠狠地打，把手打的条条裂口，鲜血淋漓。

次日，过第二堂，灌凉水。先用黑布把眼睛给蒙上，往嘴

里灌，不张嘴往鼻子里灌，一连灌了三次，把头发根灌得直冒血水，被折磨得晕过几次。当我稍有知觉，又问是谁主谋叛变、杀人，在苏联呆几天。我下定决心，死也不承认。这个排长又逼我到外边捡石子。回来叫我跪在石子上，双手各举一根秫秸，秫秸倒向那边，那边的宪兵就拳打脚踢，足足跪有两个多钟头，膝盖全紫了。不管他怎么折磨，我誓死不承认。第三堂提审是过电。一进屋叫我举起双手用两个铁夹，夹在两只手指上，通电后，身不由已，浑身颤抖抽筋，随之神智不清，停电后还是逼供，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第四堂进屋后不由分说，里外开攻打嘴巴，第五堂又重新写笔录。在锦州宪兵队折磨18天，没有结果。

后来鬼子看我一字不透，就把被我们绑的齐排长找来做证。我一看这回坏了，承认与否都得死。

最后过堂的军法官是日本人，翻译姓梁，他们立即宣布：判处极刑，同时呈报满军司令部。到第八天狱警提我到司令部，宣判我无期徒刑，送到沈阳满军监狱，押了四年多，直至“八·一五”光复，日本鬼子投降，才与家人团聚。

伪满空军第三飞行队的起义

龚患

1941年1月4日，在日伪的重要城市哈尔滨，发生了一起震动日伪统治集团的事件，即哈尔滨王岗伪满空军第三飞行队全体士兵起义事件。

一

伪满空军第三飞行队驻于哈尔滨市南郊王岗，共有142人，其中日人干部及飞行员59名，伪军官兵83名。1940年又从第一、第二飞行队抽调14名伪军官兵到第三飞行队帮助工作，因此起义时第三飞行队共有伪军97人。由于敌人在募兵时进行欺骗性宣传，说飞行队生活如何优越，因而不少人受骗入队。实际上伪军生活极其清苦，劳务沉重，而且还经常要受日人的训斥和体罚，部队士气十分低落。

1940年夏，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从庆城（今名庆安）、铁力山区向日伪统治腹地三肇平原游击。十二支队一到三肇地区，就在我地下党和当地抗日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打开丰乐镇、血战敖木台、智取肇源城，在敌人的心腹地带搅了个人仰马翻。第十二支队的胜利给在殖民统治下的三肇人民带来了希望。新组建的伪满第三飞行队士兵，大部来自三肇地区，因此抗联第十二支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兵营，在士兵们颓晦、阴霾的心情中透进了一缕璀璨的阳光。

第二连四班中士班长苏贵祥是双城人。他的哥哥原在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打死，心头深埋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被召募当兵以后，在沈阳伪军航空学校受训期间，又亲眼目睹了日本宪兵在街头肆意虐杀我无辜同胞的惨景，更增强了他报仇雪恨的愿望。苏贵祥生性豪爽，注重义气，在士兵中颇有威望。抗联第十二支队在三肇平原连连获胜的消息传来后，苏贵祥就串联起十多个知心朋友，准备"找机会干一件大事"。苏贵祥班里有个战士叫刘远泰，是苏的好友和同乡。刘远泰在1940年春节之后，利用探家机会逃离了伪第三飞行队，后投奔了在双城一带活动的一支抗日山林队"庄稼人"。刘

远泰几次将王岗伪军第三飞行队情况告诉“庄稼人”队头，说明只要能去接应，还有十来个弟兄要出来。但“庄稼人”队头认为刘远泰当过伪军，说的话不可信，未予重视。

这年夏天，共产党员张瑞麟到“庄稼人”队去开展工作，认识了刘远泰。张瑞麟很重视刘远泰所谈王岗伪军飞行队情况。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来到三肇地区后，张瑞麟通过地下党关系找到十二支队。同年11月，“庄稼人”队和十二支队会合一起行动，张瑞麟便将刘远泰介绍给了十二支队代理支队长徐泽民。徐泽民详细地了解了王岗伪军第三飞行队情况后，又和支队其他领导成员共同分析研究，认为王岗伪军第三飞行队是敌人吹嘘的最“优秀”部队，如能组织其中部分士兵起义，将会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尽管部队开到哈尔滨近郊去接应起义人员要冒很大危险，也值得一试。

1940年12月14日，刘远泰受徐泽民派遣离开十二支队驻地肇源县陈家围子前往哈尔滨。

二

1940年12月15日，刘远泰来到王岗以南的五家火车站，想从这里找关系与苏贵祥班长联系。正巧这天苏贵祥有事也来到五家车站，和刘远泰不期而遇。苏便约刘到哈尔滨市里找个地方畅谈。两人来到道外正阳头道街天乐园饭庄，要了饭菜边吃边谈。刘远泰告诉苏贵祥说，他已参加了“红军”，就是在三肇地区活动的十二支队。苏又惊又喜，连连询问十二支队情况。刘一一详细介绍，最后说他这次冒险来哈尔滨市找苏，是奉了十二支队支队长徐泽民的命令前来联系的，希望苏能联络几个兄弟，带点武器拉出去。苏贵祥当场一口答应，说这是大家久已盼望之事，只希望行动时，十二支队能过来接应一下。刘远泰

答应立即返回肇源去找十二支队联络，并嘱苏注意掌握武器、被服两仓库情况。两人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后分手。苏贵祥回营后，立即开始秘密串联二连的栾金城、杜云发、龙兴国和一连的唐天赐、王忠、张春荣、计允库，奉天第二飞行队来的姜少柏等共9人，分头对武器库、被服库作了调查。这9人还各自联络了几个自己的好友。

12月22日，苏贵祥按约定时间在哈尔滨火车站会见了刘远泰。刘自与苏分手后即过江到肇源县四合堂与徐泽民约好的联络点接头，但等了一周未得十二支队和徐泽民的消息。这次见面，刘告诉苏未和十二支队联系上，建议苏暂缓行动。苏贵祥不同意，因已在队内做了许多工作，时间长了万一走漏风声，后果将不堪设想。刘远泰也感到形势紧迫，决定再返江北去找十二支队。这时由于敌人派出伪兴安军等骑、步兵对在三肇地区活动的十二支队进行“讨伐”，部队被迫天天转移。因此，刘远泰二次过江，仍未能与十二支队接上头，但得到了十二支队在肇源尹家围子有联络站的消息。

12月28日，刘远泰按约定时间第三次返哈尔滨市，在火车站与苏贵祥、栾金城、唐天赐等会面。大家听说找到了十二支队的联络站，都松了一口气，决定马上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当下一同乘车到双城县刘远泰一个亲戚家中举行了秘密会议。苏贵祥分析了队里情况后，提出将起义时间定在1月4日晚上。因为第三飞行队中的日人军官宿舍均在哈尔滨市内，除值勤者外，都是早来晚走，不宿在营内。1月4号正值新年休假后的第一个周末，敌人在管理上会更松懈，加上4号晚开始由二连值勤，也是行动最有利时机。大家一致同意，决定1月4日晚起义。行动路线定为过江后北进到肇东县境去会合十二支队。此外还研究了起义分工，由苏贵祥任总指挥。会后，刘远泰带栾金城、唐

天赐二人去肇州尹家围子——十二支队联络站联络，报告起义日期和路线。苏贵祥返回部队做准备，约好1月2日在哈市天乐园饭庄碰头。

12月30日，刘远泰、栾金城、唐天赐3人乘马爬犁前往肇源县尹家围子。当晚借宿在离尹家围子不远的村里，听到了敌人大部队正在尹家围子一带"讨伐"的消息，不敢再贸然前往，只得返回。这时，刘远泰看到行动迫在眉睫，而自己还未能与十二支队联系上，回去无法向苏贵祥交待，决心一人再去找关系，让栾、唐二人先回哈尔滨。1月初，刘远泰将王岗伪军飞行队起义的时间、线路通知了肇州某村的联络点，自己则害怕承担责任，未敢再回哈尔滨。

1941年1月2日、3日苏贵祥和栾金城、唐天赐等人连续两天在天乐园等刘远泰落空，知道十二支队接应已无望，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按时行动，将部队拉出去后再找十二支队汇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三

1941年1月3日晚7点，苏贵祥、唐天赐、栾金城等借新年聚会的名义，在二连军士宿舍里召集起义骨干会议，布置起义任务和分工。苏贵祥对大家说，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都长不了，"红军"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现在去投红军，是最好时机。他宣布起义时间为1月4日晚9时，要求大家按照分工按时完成任务。会上还宣布了严守秘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等纪律。在此之前，唐天赐曾将准备起义投奔红军一事透露给了他的好友，哈尔滨新泰西服店工人史登云。史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当时就要求参加唐天赐一伙的行动。3日下午，唐天赐将起义时间通知了史登云。

1月4日这天，伪军王岗第三飞行队营房内外平静如旧，军官们都早早返回市内去度周末，只有几名值日伪军军官和两个单身日人军官未曾外出。下午3点，按惯例一连向二连值勤交班完毕（各连值勤时间为24小时），二连值勤步哨班长龙兴国和往日一样布置了岗哨。不久，史登云从市里来到军营“看望”老乡唐天赐，被邀到卫兵值班室休息。各连起义骨干借口看望唐天赐的老乡也先后聚到了卫兵值班室，由苏贵祥作最后一次起义行动部署。苏贵祥鼓励大家要满怀信心，排除万难，保证准时起义。这时，值勤哨兵班长龙兴国下令关闭营房大门，向便门派出4名岗哨，严控部队与外界联系，同时派3名卫兵警卫值班室，实际上的起义指挥部。

下午5时，各连例行晚点名，伪军值日军官李德三没有参加，只下令由各连值日班长负责点名后向他报告，将近7点，龙兴国派人来侦察军官宿舍，见李德三等已准备就寝。苏贵祥即命令唐天赐、栾金城小组开始行动。唐、栾带领3名士兵来到武器库砸开库房门，搬出机枪2挺、匣枪10支、子弹12箱，并将这些武器搬到指挥部门前。苏贵祥分给起义骨干每人匣枪1支、子弹30发，其余搬到二连分发，此时二连全体士兵已志愿参加起义。分工被服库的杜云发也带两名士兵打开被服库，搬出军衣、棉大衣，背包等装备，发给二连士兵每人一套。9点整，苏贵祥下令切断营房内外通讯联系，然后亲自率姜少柏、史登云等5人去解决一连值日军官和其他人员，唐天赐带人去对付总部值班人员，栾金城则去日军宿舍解决两名留营日军军官。苏贵祥和他们约定，以听一连枪声为号，同时行动。苏贵祥来到一连军官室，顺利击毙李德三在内的6名伪军军官。一连枪声传到伪飞行队总部，总部3名值日军官纷纷逃出，唐天赐等将其中一人打成重伤。其余两人逃到一连躲避，被苏贵祥小组击毙。栾

金城小组经过短暂的枪战，打死了两名日军军官。一连士兵闻枪声惊起，苏贵祥持枪喝令不准起床，然后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明二连全体士兵不堪忍受日军的虐待与低劣的生活，决心哗变另谋生路，现在已控制了全营房，欢迎一连兄弟一起行动。一连中早已参加起义的一些人带头表态，愿意和二连一起行动，其他士兵看大势所趋，也纷纷表态参加哗变。只有一名日军心腹趁乱跳墙逃出，被值勤哨兵发现追踪到王岗火车站捉回处死。这样，前后共用半个多小时，打死日伪军11人，排除了起义的全部阻力。

10时整，全体起义人员85人在卫兵值班室门前集合完毕，此时苏贵祥已安排好一辆卡车，将枪支弹药悉数装车，部分士兵也一同乘车由苏贵祥指挥开赴江北，其余人员由龙兴国指挥步行离开王岗。中途汽车返回为步兵接力，到松花江边后弃车改乘马爬犁继续向北。5日晨7时到达大关家屯。苏贵祥下令部队休息造饭，并召集起义骨干会议，研究重新编组部队等问题，决定成立起义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八个小队。大队长苏贵祥、副大队长王辅廷、一中队长龙兴国、二中队长姜少柏、第一机枪小队长唐天赐、第二机枪小队长计允库，第一至第六小队队长依次为杜云发、关子良、金世忠、杭文胜、王忠、苏贵斌，随后召开了全体大会，宣布编制并按新编制编组了部队。会上苏贵祥对大家说明：我们这次逃离伪军并不是单纯为了改善生活境遇，而是为了脱掉伪满洲国军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和“红军”第十二支队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们的同志很快就要来接我们了。听了苏贵祥的话，部队顿时活跃起来，那些原来被迫随大流的士兵，也兴奋地主动扯去了自己的伪军肩章、领章。苏贵祥下令，一要加强警戒，严密封锁消息；二要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对付追来的敌人；三要严格纪律，绝对不准侵犯

群众利益。会后各小队分头领取了弹药和其他物品，然后吃饭休息。下午4点。起义大队继续向北行军，半夜12点到太平川休息。苏贵祥带一支小队攻占了太平川伪警察所。正在这时，伪警察署来电话，询问起义大队行踪，苏贵祥回答说：没有发现敌情。为了安全起见，苏下令继续行军，于1月6日晨7时，到达榆树林附近一村屯休息。在夜间行军，有10名士兵趁夜逃走，因此到达榆树林时，起义大队全员数是75人。

四

日伪当局于1月5日晨始发觉伪军第三飞行队士兵起义全部逃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哈尔滨日本驻军在全市加强警戒，严密监视市内各伪军、警部队动向；命令日军滨江防卫司令部抽调两个日军大队编组成“讨伐队”，负责“讨伐”起义部队；又命长春伪第一飞行队到哈配合“讨伐”行动。5日下午，千余敌人分乘汽车出动。6日，敌侦察机在肇东县榆林一带发现了起义部队，日军“讨伐队”随即向这一地区包围前进。

1月6日下午2时，起义大队发现敌人侦察机后，苏贵祥即集合部队进入一户围墙坚固的地主大院准备迎击敌人。他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坚持下去就会胜利，“红军”一定会来接应我们。接着，苏贵祥命副大队长王辅廷率第一机枪小队守住东南侧炮楼、中队长龙兴国率第二机枪小队守住西南侧炮楼，六个步兵小队也作了相应部署，苏贵祥率史登云等在中央望楼负责全面指挥，约定以苏贵祥枪声为行动号令。

下午4时，日军“讨伐队”到达榆树林地区，呈半月形向起义大队逼近。当日军进入射程后，苏贵祥指挥枪响，起义军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使敌人难以靠近大院，陆续死伤20余人。日军只得用掷弹筒远距离轰击。不久，瞭望楼和两侧机枪

阵地均多次中弹起火，苏贵祥、龙兴国等干部、士兵27人先后牺牲。敌人仍未能进入大院。起义大队坚持到下午5时半后，趁天黑突围。但是由于数倍于我之敌已将这一地区层层封锁，所以突围人员不久即全部被俘，起义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共打死打伤敌人32人，起义部队牺牲30人，被俘45人。

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代理支队长徐泽民，于1月5日左右才接到地方党组织辗转送来关于王岗飞行队起义要求接应的消息。这时部队正在肇源县南部活动，接通知后，徐泽民和队内其他干部研究，认为约定起义时间虽已过了，但仍可以在中途接应，决定部队立即向肇东出发。途中，徐泽民下令攻打松花江南扶余县境的上代家屯以补充给养。但由于敌人一直在追踪十二支队，十二支队在松花江冰面上一出现，就被一支伪兴安军骑兵紧紧咬住。十二支队在松花江南、北岸来回与敌周旋也未能摆脱敌人，不得不停下来设伏阻击，才打退了这股蒙古骑兵，但又延误了一天时间。次日十二支队到达肇东县大四站，徐泽民急于接应起义部队，冒险白天穿越公路，结果被敌人发现，部队仓促应战，遭到伤亡。接着在越过铁路时又受到敌人袭击，损失30余人。由于部队伤亡较大，无力再继续寻找、接应起义部队，决定返回铁力山区游击根据地休整部队、治疗伤员。十二支队行至兰西县大成玉庄时，徐泽民擅自离队去找地方党组织，才得知起义已于1月6日被敌人残酷镇压。

伪军王岗第三飞行队全体士兵起义事件在敌人营垒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侵略者军、政当局认为“满军最优秀”部队中发生了此事，说明“满军尚不足信任”①。伪满统治集团则认为，从来这类事情都发生在“红区”，这次发生在哈尔滨“实为一大

① 敌伪档案《关于王岗事件的报告》。

不祥事件”。事件发生后，日伪当局惊慌万状，草木皆兵，一面严密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一面加强控制伪军，“防止士兵的动摇及事件波及”。他们派出宪兵、特务在伪军中侦察搜捕，从1月11日至15日，日伪宪兵司令部以叛国可疑者罪名逮捕了伪新京第一飞行队杜准尉以下41人，和刚由第一飞行队调到哈尔滨王岗服务的士兵6人；1月23日，伪军奉天第二飞行队内由于议论王岗事件，也以阴谋叛国罪逮捕官兵5人；1月30日在伪军奉天飞行学校逮捕学员3人……。

无论敌人怎样控制，王岗伪满空军第三飞行队起义事件影响，仍在伪军中广泛波及，它给许多伪军中的爱国官兵做出了榜样。

（摘自《黑龙江党史资料》第九辑）

抗联战士孙发谦

马宝泉　搜集整理

孙发谦于1939年（伪满康德6年）被强征入伍当上了伪国兵，该部队隶属于日伪嫡系部队伪靖安军二团一营三连重机枪排。当时，军长是梅歧太郎，后由赤斋三六继任，团长张明久（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营长斋藤夫富，连长荒谷成男。

新兵入伍后进行严格训练三个月（不发枪徒手训练），当时生活很苦，吃的是红高粱米和大萝卜、白菜。特别是在军事训练时，经常挨打受骂遭受非人待遇，真是度日如年。训编期满经过整编配备了武器弹药后把他们调防到榆树林子“剿匪”（即对抗联作战）。

1941年春，孙发谦所在的二营六连的士兵周岩峰（现任辽宁省阜新市侨联主席），因为吃不饱就偷着跑到驻地附近的盘山，到一个老头家里想买点鸡蛋。当他和老头唠起嗑时，老头很关心地问他想不想家？生活上苦不苦 能不能吃饱？他看老头很是忠厚老实就说出心里话："唉！不但吃不饱还成天挨打受骂，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老头听了非常同情地对他小声说："往后再遇到抗联开火时，把枪朝天上放，你要是把枪一扔就更保险了，想参加部队人家留下，要回家给你发路费。"周岩峰听到这一番话后心里很是震动，回来后就和一个要好的老乡叫丁玉喜的讲了，也和孙发谦讲了，听后也有同感并小心嘱咐周千万不能叫日本人和汉奸知道，以后如果有机会就找条新的出路。

从那以后，又经过几次"剿匪"，"匪"没剿到一个，老百姓却受害不浅，周岩峰等人耳闻目睹了日寇残暴的"三光"政策（即抢光、杀光、烧光），更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同时，在抗联部队的政治宣传下，更加懂得了"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思想逐渐转变了。

不久，周岩峰和同排班长国如阜（现名张维国，解放后任哈尔滨林管局副局长，现离休。）、祁连升（解放后任吉林省武警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现离休。）、孙学义（解放后在广州军区任职，已故）就分别利用"同乡"和"把兄弟"关系，秘密串联了一些人．孙发谦就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态度坚定，工作机敏，很快成为骨干分子。从此，起义准备活动在加紧进行中。

1941年春，孙发谦所在部队调防到饶河县，到11月份又被调防到抚远县东安镇。东安镇同苏联只隔一条乌苏里江。这对起义极为有利，串联活动更加频繁，面也越来越大，扩展到五连，起义条件逐渐成熟。转眼间1942年的端午节来到了，按照

预定计划，周岩峰等人把本连的“同乡”和“把兄弟”请来以聚餐过节为名进行密议起义事项，正当大家喝到兴浓时，连部一个死心踏地追随日寇的祝上士挎着指挥刀走进屋来，大家都非常讨厌他，于是就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又吆五呼六地划起拳来，这个祝上土在屋里转悠了两圈看到没人答理他只气得破口大骂：“他妈的别以为老子不知道，想他妈的哗变没那么容易，小黑屋子早给你们预备好了，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气哼哼地走了。其实他当时并不清楚，也可能发现到一点蛛丝马迹，借此敲山震虎而已。

这个预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后，周岩峰等人商定马上采取应急措施，决定派刘云阁去海林给驻在饶河县的二营五连送信，约定时间提前起义。刘云阁回来后，连部就把他抓起来了，因为他外出没请假所以受到了怀疑，准备把他送往佳木斯监狱（因等定期航班船）。

日寇连长荒谷成男召集班长以上的到连部开会，他在训话中说：“据可靠情报，目前本连队有些不轨份子正在阴谋哗变投苏，皇军要采取严厉措施！”他当场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头一个就是周岩峰，另外还有几个人（而起义的其他几个组织者、如正在参加会议的班长国如阜、祁连升、孙学义等人并没有暴露），他警告说：“这些人都是反满抗日分子，已经准备好了监狱，就设在离驻地2里多路的警察大队，到时候抓起来的干活！”在会议进行中，孙学义借口上厕所去给周岩峰送信，叫他马上躲避一下。散会后，国如阜也通知了周。面对这种非常情况，立刻召开了骨干分子会议，孙发谦也参加了会，会上讨论了当前的危急形势，最后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在当夜。因为这天夜间值班的卫兵司令是国如阜，步哨长是孙学义，他们严格挑选了当夜的值班岗哨和流动巡逻兵，当时国掌管武器库。当晚他

打开库门取出一批武器弹药，祁连升平时负责“酒保”（即掌官吃喝的）马上派人上街购买酒菜。在吃喝中把两个不太可靠的班长灌醉了。到了深夜11点，他们把所有的岗哨全部撤掉，当时作了分工：派国如阜渡江去苏联方面联系；祁连升带几个人负责寻找渡船；周岩峰带着10个人，每人两支手枪负责解决残存敌人可能的反抗。全部安排就绪后，起义于1942年的6月8日凌晨1点拉开序幕。首先在营房大门的两侧各配备一挺机枪，以便封锁逃敌和阻击可能前来应援的敌人，然后派李福把当日的日本值星官干掉，当周率领其他人来到三道门前时，正巧碰到刚出门的日寇电台台长，当即被周一枪击毙。这时他们立刻冲进营房，只见大铺上的伪兵们，一个个半睡不醒，目瞪口呆，只见一个死心追随日寇的副排长正在偷着摘墙上的手枪，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福冲上去一刺刀把他给挑了。这时，周岩峰跳上大铺大声宣布：“弟兄们！起义开始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和我们一齐去苏联抗日救国，想回家的可以回去，谁想反抗就和副排长一样下场。”经过简单动员，除了有20多人表示要回家外，尚余71人赞同起义，周要大家带好武器弹药，到粮秣库取吃的然后到营房门前的广场集合。接着，周又带大伙跑步包围了日寇连长的住处，当周敲门高喊：“报告”后，只见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里面问：“哪里打枪？什么人的干活？”周没有答话抬手就是一枪，只听到哎呀、噗冬一声，日寇连长倒下了，但没有击中要害。这时他的夫人跑了出来，周又朝她打了一枪，只听她惨叫了一声就倒下了。当周等人返回值班室时，电话突然响起来，他接过电话一问，原来是警察大队的日本军官询问：“你们那里为什么打枪？”周马上机智地回答：“是土匪攻上来了，我们正在反击，连长命令你们赶紧抢占北山制高点，防止土匪从那里逃跑。”只听电话里“哈咿！”一声，他马上把电话

线割断了。这时祁连升已经找到一条船，因为船小人多只好分批渡江。当船第4次渡到江心时，日寇追兵也赶到了江边，但因距离太远，也无可奈何了。只听那个没被打死的日寇连长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周岩峰你们回来吧！死几个人的没关系，不要过江了，过去的事皇军既往不究！"大家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想叫我们回去，真是白日作梦！"船越划越快，时间不长就到了对岸。

这次被称为日寇嫡系部队的一个边防驻军连起义，震动了日伪朝野。当时，伪满洲国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要求全部归还起义人员，当即遭到苏联政府的严词拒绝。

这批起义人员进入苏联后，受到了良好接待。4名起义的组织者：周岩峰、国如阜、祁连升和孙学义被专车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即远东省会伯力）军区招待所，在稍事休息几天后，他们受到了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阿巴那琴柯大将的亲切接见。总司令在接见中，对他们及其71名战士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表彰和鼓励，他代表远东军区宣布授予他们4人中尉军衔，并当场发给了军服。不久，起义人员被送到抗联在苏联的"野营"驻地，即远东独立八十八旅（又称国际教导旅）。"野营"召开了欢迎大会。会上，"野营"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和起义人员的组织者之一的祁连升分别讲了话，会上演出了文艺节目，会后举行了会餐。

孙发谦被分配到教导旅的二营三连当战士，在苏联"野营"期间，孙发谦及其战友们学习了《联共（布）党史》、《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同时又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繁重的营房建设。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物资供应十分贫乏，他们每天三餐几乎全是黑㘞巴（面包）、菜汤，定量很低，生活上是很艰苦的。在这种严峻条件下，孙发谦承受了

考验，表现得很突出。由于他生活上很刻苦，学习上认真，在军事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带病参加营房建设的繁重劳动，曾多次受到表彰，不久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又升任了班长、排长。从此更加坚定了他为反侵略、反压迫而战，为建设新中国而斗争的信念。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正式向日宣战，接着出兵东北。同年6月末孙发谦受命归国。他和战友们乘飞机到佳木斯，被派往勃利县任命为卫戍司令部副官，曹树彦被任命为副司令（现任宣化炮兵学校校长）。孙发谦和战友们一道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清剿土匪的工作。

我带领靖安军一个连起义

国如阜

1942年7月7日早晨将近3点钟，在乌苏里江上有二十多只小渔船，载着七十多人，由江西岸向对岸苏联，火急划去。

这七十多人身着全副武装，一部分人持桨划行，其余的人（船上没桨）用枪支或钢盔划行。在渡江中，我在船头指挥各船，是这次起义队伍的总指挥。另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和一个小个子，不时地向后边张望。他俩是祁连生、周岩峰，也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

这支队伍是伪满洲国靖安军步兵二团二营六连的国兵。他们在“七·七”事变5周年这天，在伪满边境县饶河的东安镇举行起义。枪毙了亲日的“哈巴狗”和电台长（日本人）之后，全连渡江，投奔设在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训练营地。

富锦驻防

我的二哥于1937年和祁连生同时被征当“国兵”。我在第2年5月也被征入伍，和祁连生同属伪靖安军步兵二团二营六连。二哥和祁连生是换谱弟兄，相交莫逆。我入伍后，祁在多方面进行照顾，很快二人也成为挚友，经常在一起出入。

伪靖安军步兵一团于1937年开到富锦，其步兵二团在我被征入伍3个月后也开到了富锦。在富锦这一段“国兵”生活是我思想成长的重要阶段，后来举行东安镇起义的思想基本在这时形成。

伪靖安军步兵二团二营六连到富锦驻防后，我在假日常出来打不平，为老百姓出气。对于仗势欺人的伪警察，更是恨之入骨。上街基警察署长，常欺负老百姓。一次叫我遇上一顿好打。富廷岗一个警尉补调戏妇女，叫我遇上好一顿骂（因屯长给拉架没揍着）。我个人侠义行为，虽然能震慑几个人，但是解决不了大问题。一次在永生花店（赌钱地方），我在打两个输打赢要的痞子时，被两个陌生人上来拉开了，并领我到街内饭馆吃饭。吃饭中间，赞许我的行为同时讲：中国人要自强，不能当亡国奴，要不当亡国奴，必须团结起来，单靠个人奋斗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对我一次重要的启蒙教育，使我心胸豁达、视野开阔。这两个人在富锦炸狱以后就不见了，据说是抗联地下游击队员。

对我思想起重要影响的另一件事是在富锦柳大林子的驻防。柳大林子是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点，抗联和日军曾在这一带打过仗，日军不断受挫。我和祁连生接近群众，时间长了群众也愿意向我们讲心里话。群众讲：抗联怎样和老百姓亲如一家，哪次战斗打死多少日本鬼子，怎样打死的……抗日联军

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斗争精神，使我们两个青年人的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同时在边防驻防中，经常看到和听到被日本抓来和骗来（多半从关内）的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刺刀和皮鞭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过着牲畜般的生活；一项工事修完之后，劳工累死饿死过半，剩下的又经常被集体活埋或集体屠杀。这些事不断地浇灌了我和祁二人为国反正的思想之花。

第一次要走

1940年，伪靖安军步兵二团开到河北、热河一带去讨伐八路军，我因正生病没去，祁连生去了。

祁连生到关内一看，真是另一个世界和东北大不一样。村庄里的墙上到处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口号，使祁精神振奋，同时也感到惭愧。“同是中国人，如隔万重山。”这次关内之行时间不长，没和八路军打仗，冬天又被调回。我听到祁讲的关内革命形势后，深受震动和启发。

伪靖安军是伪满最高军事机构——军事部直接统辖的军队，敌伪统治较严，连以上军官基本上都由日本人担任。这些军官对士兵十分凶残。在连里设“思想对策委员会”的秘密组织，暗中监视士兵的行动，稍露不满情绪，就以“思想不良”“反满抗日”罪名，横加迫害，重者不但杀头而且株连家属。平时对士兵训练也非常凶残，耳光、脚踢、棍棒是家常便饭。一天队列训练，有两个大个士兵，由于精神紧张，怎样努力也不符合日本连长的要求，连长先打他两个耳光，然后又叫排长打。被打者每被打一下，嘴里还得说“哈依！”我目睹被打场面，深深地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

当天晚上，我找祁连生到外边散步，愤愤地向祁说：这不是人呆的地方，我们走吧，找李景荫去（李景荫富锦人，抗联独立师副师长，其部队在富锦活动时间较长）。临走之前，先把日本连长根本正二干掉，然后到富锦找到抗联后回来再打靖安军。祁连生连连赞同。想法有了，但是怎样走出去，怎样把根本正二干掉，并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正当我计划怎样走出去时，不巧，祁连生突然病倒了，这个计划只得暂时搁置起来。

东安镇起义

日本随着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东北边防线进一步加强防守。1941 年初，靖安军步兵二团开赴饶河驻防。一是参加修路，二是警戒。1942 年初又开到饶河东安镇驻防，顶替原来驻东安镇的机枪连，该连留下一班配属在二营六连里。

东安镇渔民多，流动人口多。因为隔江就是苏联，江面又不宽，这些人对苏联比较熟悉。驻东安镇的靖安军经常雇老百姓打鱼、打柴和干其他活。在和群众接触中了解了苏联的一些情况及老百姓对日本统治下伪满洲国的不满情绪，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和祁起义的决心。

我们二人通过溜马研究起义计划。当时配属在该连的机枪班有一些驮机枪的马，这些马需要天天溜。为了躲开众人耳目，常常借溜马的机会研究起义问题。认为起义后，从东安镇过江去苏联是不成问题的。当时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士兵只发枪，不给子弹，弹药库归我的上司排长掌握，钥匙在我的手里，这是起义的关键；附近又没有别的军队，又是一个好条件。

我的各样术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射击成绩，枪响见物，在全连属第一，日本教官也很满意。在1939 年就是班长，到东安镇已是中士班长了，加上平时我爱护士兵，在士兵中享

有威信，对上边及亲日的“红人”又不阿谀奉承。这就使亲日派显得孤立，常把我视为眼中钉，老想“整我”。

该连勤务班长陈永灿，是一个哈巴狗式人物，死心塌地的汉奸，深得日本人的信任。我一见他那在日本人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就觉得恶心，非常厌烦他。陈曾在日本连长面前说我“思想不良”，由于排长陆平的保护，日本教官没相信陈的话，我没有被撤职，但是日本连长暗中派人监视我。我从同伴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把陈治一治，不但起义的大事要付诸流水，而且个人生命也很危险，于是决心要治一治这个哈巴狗。

陈永灿当兵前是个二流子，吃喝嫖赌啥都来，这就给我抓住了机会。一次在外修路，我特意弄来几条大的鱼，找陈来一起吃，陈一见是好吃的非常高兴，但是没有酒，又有点扫兴。连长的酒在陈永灿这个勤务班长手里保存着，我怂恿陈把连长的酒拿来一瓶先喝，保证以后给补上。把陈灌得酩酊大醉以后，立即报告日本连长：“陈永灿偷连长酒喝”，日本连长气得发昏，把他打骂一顿，又撤了他的职。

以后，我又利用机会给日本连长打了七八只树鸡子，日本连长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解除了戒心。这使我站住了脚，清除了起义的障碍。

1942年春的一天，我对祁说：“日本鬼子不会太长了，我们为国家尽一份力量的时候到了。”初步意见是“八一”动手，先发展几个可靠的人。

这时我和周岩峰也成为至交，后来，周岩峰和孙学义也参加了进来。

一次连里“思想对策委员会”的骨干成员祝上士，召集班长们开会：“现在连里空气不正常，听说有人要哗变，要渡江投

奔苏联，这需要往上报告。”我说：“这个事需要了解了解再说，现在不好说有没有。”

会后，我找祁分析，形势严重。祝上士所查的对象是不是我们二人不能断定，但是亲日派对我们有戒心，这是可能的，动手晚了有危险。

反复周密考虑后，把起义时间提前到7月6日晚上。因为这天晚上是我带班，到哪去没人怀疑和干涉；一旦被敌人发现，我有全连武器库的钥匙，也不至于赤手空拳。

好容易盼到6号这天。我等四人装作嘻闹追逐的样子，跑到江边空房子里开会，会上确定起义具体分工。

祁连生，白天准备好渡口船只，晚上负责兵舍；孙学义白天协助祁准备渡口船只，晚间负责除掉班长室的祝上士和杨中士；周岩峰干掉电台长（日本人）和姓付的值班排长；我负责全面指挥，控制武器、弹药并利用带班条件，做好一切起义准备。

当晚，杨中士喝了点酒，在兵舍和一个士兵谈话，到10点多钟还不走，使人着急。我以“卫兵司令”的身份，强迫士兵熄灯躺下，杨中士不得不走。我由哨所过营房再到江边反复检查起义准备情况的过程中，引起了在北面小山包上哨所值班的薛兴起、王维林两个人的注意，他们对我说：“国班长，今晚有事吧。你们要走，把我们也带着呀，让我们干啥只管说，我们一定跟你们走。”我向祁问明了二人的情况，当即吸收了他俩，并把解决付排长的任务单独交给了薛兴起。在此之前我还吸收了两个人，起义人员扩大到8个人。在取枪支弹药之前，把起义时间，定在清晨两点。

2点的钟声响了。薛兴起冲进付排长住所，向付开了枪，由于紧张、慌乱，这一枪没有打准，付排长光着身子向班长室跑，

在班长室执行任务的孙学义，刚好打死祝上士、杨中士，见付迎面跑来，又趁势向他射出一梭子子弹，把付打死在地。那边周岩峰听到枪声，用刺刀把日本电台长捅死。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来，日本连长从东安镇打来电话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卫兵司令身份回答："营里来了几个狍子，我们给打死了。"

睡在兵营里的伪国兵听枪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慌乱地穿衣服往外跑，我、祁赶忙把大家稳住，然后告诉大伙："我们起义了！祝上士、日本电台长等人已被击毙，不能再当亡国奴了！我们马上就要过江，投奔抗日联军去，愿意去的一块走，不愿去的自便，时间紧迫，现在就要出发！"话音刚落，就听下面纷纷地说："我们也不给日本人当兵了，不当亡国奴了，我们跟国班长走！""对！跟国班长走！"

在兵营里除了被击毙的4个人，只有6、7个人因家庭负担重不能去，其他71人都愿意跟着走。我和祁等人立即指挥大家到兵器库领取枪支弹药，然后拥到乌苏里江边。这时已接近3点钟，分别乘上20只小船向对岸出发。起义前没有想到这一连人都能去，原来准备的船只不够用，只得临时又凑起一部分船只，船桨都在渔民家里，就把枪支和钢盔当桨用。永不停息的江水，立即枪楫齐飞，浪花飞溅。船到对岸，东方开始放红。

伪满正规军一个连的起义，还比较少见。这次伪靖安军步兵二团二营六连全连士兵的起义，对伪满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伪连长荒谷成男愚蠢无用，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从此日本法西斯军部再也不敢让满军驻防在国境线上了。

经过7、8天的周折，这支70人的队伍，到达抗联训练营地。周保中、李兆麟二位抗联领导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把我们编入抗联队伍，使之成为抗日保国、爱护人民利益的新式部队。"九三"解放以后开回东北，为人民解放、战斗在东北大地……

（本文是在国如阜同志口述，胡淑英、高树桥二同志写的“祁连生口述材料”的基础上由张国熙整理）

回忆东安镇起义

祁连生* 口述 刘逢春整理

旧社会，东北流行一句话："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老百姓对旧军队的痛恨所表达的思想情绪，像我们这样的穷苦人当然是不愿意为统治者卖命的。但穷苦人子弟又往往逃不过当"国兵"的灾难，那年，真的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家里没钱，不去吧，就要大祸临头。于是我被迫当了伪军，1942年我在靖安军步兵第二团二营六连当中士班长。几年的伪军生活，我感触更深。日本鬼子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倍受欺凌，当亡国奴的滋味我受够了。我总是想，什么时候能摆脱这种局面呢？要想办法不当亡国奴。

年青人心里有话，是存不住的，总想找个知心人唠唠。我也有几个好朋友。比如国如阜，他是我的同乡，他1938年5月当兵后，就被分到六连，彼此之间，感情融洽，无话不谈，我们还磕头结拜为把兄弟，成为挚交。我对孙学义也很了解，他当兵时，我给他当过副班长，关系很不错。国如阜的好朋友周岩峰，给连长荒谷成男（日本人）当勤务兵，他们平时接触较多，相互很知心。这样，我们几个人都觉得靠得住，互相信任，说起话很投机，经常凑在一起，打开话匣子，唠得无拘无束。谈

* 作者系吉林省军区离休干部。

话内容也逐渐扩大了，由个人到家庭，由兵营到抗联，由经济到政治，开通脑筋，丰富思想，很有教益。不知不觉地，仿佛有个共同的东西，把我们拴在一起。

东北抗日联军攻打柳大林子时，我所在的二团六连奉命由富锦调到柳大林子驻防。过去，我们只听到日伪对抗联的反面宣传，我们到这里后，听到当地群众流传许多抗联的歌谣和故事。抗日部队，不仅经常同数倍、数十倍的敌人作殊死搏斗，还要经受东北高寒山区严冬的考验。不愧是真正的中国人，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从而，更增加了我们对抗联的崇敬。

这年秋天，我们所在的伪满军队被调到关内“讨伐”。当时，国如阜正在生病，没跟部队去。我们这次到关内虽然没有跟八路军打过仗，却使我了解了许多八路军的情况，关内一些村庄的墙上大标语写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给我一个十分鲜明的印象；八路军所到之处很受老百姓欢迎，这同伪军是大不相同的。从关内回来，我把这些见闻悄悄地告诉了国如阜，我们在心灵深处，燃起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后来，我们一起商量，想把日本连长打死，实现去找抗联或者到苏联去的愿望。

不久，我们所在的连由柳大林子调回富锦县，于1941年7、8月间，六连又抽出第一排配属第二机枪连驻在东安镇。当时，快要封江了，但是由于人员太少，我们没有行动。1942年春，六连全连调到东安镇，并把重机枪一个排配属给六连。这样，力量强了，人员也多了，环境、情况都比较熟悉，这是起义的好机会。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北满的军事部署，连长荒谷成男对连队控制得更紧了。有的人不满伪军，讲了些牢骚话，引起了祝上士的注意。一天，他气冲冲地走进班长住的房子，骂骂吵吵地说：“这些小子想造反吗？没那么容易。”当时，在连

队里，有几个像祝上士这样的亲日派，最典型的还得算是勤务班长陈永灿，这小子在日本人面前是一副奴才相，可恶已极。我们觉得他是起义的一大障碍，弄不好，事情要败坏在他那里。我们研究，要首先打击一下亲日派的威风，拔掉陈永灿这根钉子。

陈永灿当兵前是个二流子，吃喝嫖赌无所不好，我们商量要抓住他这个弱点。在一次外出修路时，国如阜想办法弄到了几条大鱼，把陈叫过来一起吃。陈永灿觉得不够味，国如阜趁机怂恿他拿酒去。陈永灿是勤务班长，连长的好吃好喝全都由他保管。陈永灿说："连长的东西，我可不敢动。"国如阜说："没关系，喝了由我改日还他一瓶。"陈永灿以为是真话，高高兴兴地掏出钥匙，开了锁，拿出一瓶酒来。这小子喝着酒、吃上鱼，津津有味。国如阜暗自心喜，把他灌得酩酊大醉，之后，就出门向连长报告了。连长发现陈永灿竟敢偷他的酒喝，发火了，把陈打了一顿，还撤了他的职。我们听说后，心里真痛快。国如阜的枪法是很不错的，飞禽走兽，举枪就能打着。那天，国如阜专门给连长打了七八只树鸡子，连长对他开始有了好感。我们清除了最可恶的亲日派，连长对国如阜也解除了戒心，站住了脚。

1942 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受挫，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市。一天，连长荒谷成男给全连训话，他故做镇静地说："大家不要怕，飞机轰炸东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最重要的是注意苏联……。"他讲话虽然声嘶力竭，但与往常那种神气十足的神态已经完全不同了，流露出了惊慌失措的情绪。会后，我和国如阜都感到这个时机很好。事也真凑巧，连里的亲日派祝上士从外面回来了。这小子是连里"思想对策委员会"的骨干，是日本人的帮凶。他一回来对我们起义是很不利的。他先召集班长开了会。会上他说："现在连里空气很不正常，听说

有的人要哗变，要渡江，要投奔抗日联军，到底有没有这事儿？”这套阴阳怪气的话，使我们感到很突然。最后，他还要班长们密切注意连里所有人的动向，并彻底查清楚那一个人思想不良，发现情况立即上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们起义的时间了。于是，我和国如阜又分别找了平时靠得住的朋友周岩峰、孙学义，互相通了气，他们非常同意。我们几个人首先开了秘密会。开会地点在营房山坡下江边破空房子里，时间大约是7月1、2日。会上决定7月6日夜间10点钟开始行动，乘坐打鱼小船过乌苏里江去苏联。

起义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呢？我们是经过周密安排的。那时，士兵只发枪，不给子弹，弹药都锁在库里。6日晚，正轮上国如阜带班，国如阜平时在连里负责管理武器库，控制全连的武器装备。这样，即使我们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再说，6日晚间动手，第2天，就是“七·七”国耻5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要用行动说明，中国人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即使在他们控制得相当严密和信任的“靖安军”中也是这样。

当时，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大一些，有些事情想得自然多一点。为了使起义更安全稳妥，少出纰漏，大家共同商量，人员做了具体分工：国如阜负责打开弹药库，发给起义人员子弹；周岩峰负责抓连长，消灭报务员（日本人）；孙学义负责班长室，主要是看管祝上士、杨中士；我负责兵舍，防止坏人动手，并动员士兵随我们一起到苏联去，不当亡国奴。这样，一切都准备停当，我心里却犯了核计：我起义出走，一身轻，无牵无挂，而国如阜却不同。他那时刚刚结婚不久，妻子就住在离富锦县不远的上街基，家中还有年过半百的母亲，起义成功或失败，亲属都会受到株连，这些不知他考虑过没有，于是，我便去问他。

他听了后，沉默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要抗日，要求生，就得豁出来……”从他那坚定而刚毅的目光里，我已经看出，他早把自己和亲属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6月6日晚，江面风很小，又没有大浪，真是难得的好天气。部队都入睡了。杨中士这晚喝了点酒，9点多钟了，他还坐在兵舍里和士兵东扯西拉。国如阜从哨所回来，准备给我们分发弹药，但杨中士在，不得不把时间又往后拖。大约11点钟左右，国如阜又回到兵营观察情况，看见杨中士还在和士兵“磨道”，国如阜灵机一动，就以“卫兵司令”的身份督促他们熄灯，杨中士只好回班长室睡觉去了。我是负责兵舍的，又不能暴露，就假装睡觉躺在炕上，实际上刚才发生的情景我都清楚地看在眼里。过了一会儿，国如阜又走进兵舍，悄悄把子弹分给我们几个人，然后他轻轻地碰了我一下出去了。我心领神会，停了片刻，假装上厕所就出去了。他低声告诉我：“起义的具体时间定在下半夜2点正。”紧接着他又问我：“薛兴起、王维林这两个人怎么样？”我一愣，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心平气和地说：“他们也要参加进来，可靠吗？”我说：“这两个人对日本人很不满，参加起义还靠得住。”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了声：“那好啦！”

原来，国如阜当晚带班来回走动几趟，引起了薛兴起、王维林的注意，他们焦急地走到国如阜身边悄悄说：“国班长，你们要过江可不能甩掉我们俩，我们下决心跟你走！”国如阜当时没有吱声，先进兵舍和我们商量，回来后，告诉了他俩，他俩眉飞色舞，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

深夜天漆黑漆黑的，没有一点亮光。2点左右，国如阜带王有才、薛兴起去开弹药库门，值班排长付中尉正挨着弹药库睡觉，听到动静，他惊疑地问：“谁呀？”这时，不知他俩是谁开

了一枪，由于慌张，付中尉光着身子由后窗跳出往班长室跑。正巧，负责班长室的孙学义刚刚打死祝上士、杨上士，孙学义看见付中尉失声地叫喊跑过来，心想，我正等着你呢。他端起手枪，“叭”地一个子弹给他定到那了。枪声惊醒了连长荒谷成男，他马上打电话问：“刚才枪响发生了什么事?!”周岩峰机灵地回答：“连长，没有什么。刚才岗哨看到山上有狍子，打了几枪。”周岩峰放下电话不久，“叮铃铃，叮铃铃”，又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周岩峰慌忙地跑去问我：“齐班长，连长又来电话了，你说接不接?”我果断地说：“不接，干脆把电话线切断。”兵舍里睡在梦中的士兵听到枪响，都惊慌地爬了起来，吵闹声谩骂声、吆喝声混杂一起，乱作一团。我赶紧进屋把大家稳住，大声说：“大家不要动，我们今天晚上举行起义，就是为了大家不当亡国奴。我们要到乌苏里江对岸，投奔抗日联军，愿意的就跟我走，到弹药库领子弹……。”我这么一说，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许多人蜂拥而上，纷纷向武器库走去，有的还趁机偷拆了重武器零件。70多人很快分乘几十条小船向东岸驶去。这些船只大部分没有船浆，我们就用钢盔和手划船，船走得很慢，好在顺水行舟，凭借江水的流向自然向东岸飘去。我记得东安镇有个老渔民，他听说我们去找抗日联军，还偷偷地送了我们一趟。上岸后，我首先清查了人数，没有人沉船，我很高兴。为了安全起见，防备万一，我让大家把枪都架起来，统一由一名哨兵看管。接着，又领一名副班长赵福田划小船顺流而下，到苏联边防军处报告。小船上，绑上了一根树枝，树枝上，挂上了一条雪白的毛巾，小船像扯起了风帆，急速破浪前进。

天亮了，东方现出了黎明的曙光。大家欢腾、雀跃，兴奋异常。顿时，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觉得天是那样蓝，水是那样清，空气是那样甜，那种愉快和喜悦的心情无法用语

言形容。七八天后，我们71人，被苏联边防军安全地送到了抗日联军训练的地方——沃罗诺夫斯克（即北野营）。当时，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亲自参加了为我们举行的欢迎会。我们这些从旧军队来的人，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深深地感到革命军队的无限温暖。这是难忘的转折点，新的生活，新的斗争从此开始了。

刺杀伪满军最高顾问楠本的常隆基

刘学让

伪满康德10年（1943）年5月上旬，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本笹隆，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密令，在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上将、伪满第七军管区（驻佳木斯）中将司令赫慕侠、驻富锦伪靖安军司令官少将美藏等日伪军事要员簇拥下，到富锦视察日本秘密军事要塞——号称北满边陲陆上“航空母舰”的五顶山阵地。为保卫这位赫赫有名的日军中将阵地视察，调动了当时驻“国境”第一线的富锦的日伪步、骑、炮兵四个伪军团，二个日军（相当旅团）“七七五”、“六一三”部队并加驻富锦江上军队，把小小的五顶山围的像铁桶一般。可就在这位不可一世的楠本中将刚刚进入山区，对阵地一眼都没来得及“视察”，便被一个普普通通带马兵、伪满国兵的无名小卒——常隆基，在当地开枪射击。这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的“五顶山”事件。

常隆基何许人，他为什么要打死日军中将，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带马兵，从哪弄的枪支，又怎么能在警戒森严，护卫如林，

刀光剑丛中枪杀日本楠本中将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常隆基有此壮举，那也是历史的必然。

苦难的童年

常隆基老家住辽宁省西丰县，小地名叫龙潭寺（现西丰县同台乡台壁村)。1917年生人。小隆基刚刚3岁，贫穷、疾病和牛马般的劳动，夺去了他家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柱——他年轻母亲的生命。这位贤淑、善良、能吃苦受累、不满21周岁的母亲，留给常隆基的除了两间破旧草房外，便是一个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劳动的父亲和一个来到人世不满2个月的又黑又瘦的小弟弟常学基。

刚刚3岁的常隆基，整天哭叫找妈妈。那个来到人世不满2个月连母亲乳汁都没尝过的小弟弟却不喊不叫，因为他已气息奄奄，再无力哭叫与挣扎了。常言说：少怕丧妻。这位常年病魔缠身的汉子面对困境，再加上一个整天哭叫找妈妈，一个眼看要死去的两个月的孩子，他那心真比刀扎还难受。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他一天也不愿留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人间。正值这父子三人哭天不应、喊地不语之际，好心外婆来了。她翻山越岭，肩扛三升“高粱破子”跨进灾难深重的两间破草屋。这位五十出头的外婆，没眼泪，没哭声，放下肩上的三升“高粱破子”，抱起两个孩子说：这点粮你自己对付着吃，孩子我抱走了。

旧社会穷人活命难。这位忠厚、倔强的老外婆，宁肯自己灰菜掺谷糠，终于把小常隆基和那个奄奄一息的小弟弟常学基，用她的汗水、血水，养活长大了。

常隆基8岁那年，尽管连锄头都拿不动，也得整天跟着病歪歪的父亲下田劳动。在自家唯一着9亩山荒地里牛马般地抛洒

汗水。

“总得叫孩子识几个字呀”。又是这位好心的老外婆，把常隆基接到自家。小学两年没读完，11岁的常隆基领着9岁又瘦又小的常学基，为了养活病重的父亲，又到到九亩山荒地里寻找父子三人赖以生存的“价值”。

常隆基14岁那年，他父亲连“指挥”两个孩子下地干活的力气也没了。小常隆基一声没吭，叫起小弟弟，风里来，雨里去，侍弄那九亩山荒地。可两个孩子洒了一年的汗水，大秋后换来的粮谷不够全家人吃到过小年的。为了活命，为了养活苦命多病的父亲，兄弟两人便走村串户挨门讨要，“大爷爷、大奶奶”地喊着。

常隆基从小就性格倔强。乡亲们都说：这小子“蛮”。虽挎上讨饭罐子走街串户，一般富家子弟也不敢冷嘲热讽。一日在外屯讨要，见他的小朋友黄凤祥被一个富家孩子打得鼻口流血，常一怒之下把那个富家子弟打得鼻青脸肿，还得跪地下叫常三声爷爷。当晚，那个富家子弟的家长便找到常家，强行拿走两升高粱做“治伤费”，常父气得把常隆基叫到面前，打了三鞋底子。可常隆基没哭、没喊。第2天，全村哪也看不到常隆基的身影。

龙潭寺距西丰县60华里。天没亮时常隆基偷偷跑出村，半路上他爬上了去西丰运煤的小火车，到县城后他傻眼了。肚中无食又无分文……忽然想起他父亲讲过，有一个表叔在县城种菜，可是西丰县城他从未来过的，上哪儿找呀？又蛮又倔的小常隆基找到当天深夜，终于找到这个从来未见过的表叔。说明情况后，他就再也爬不动了。

表叔收留了他。让常隆基帮他种菜、拾粪。常隆基每天早上起来，拎个粪铲子，背个粪筐，四处转游。一天他趴在日本

小学铁栅栏上往里看学生“下操”，不小心粪筐从肩上滑下，半筐粪撒在校庭内。常心疼半筐粪呀，便走进校门去拾那撒在地上的粪便。这时正好下课了，几个日本小孩骑在常的身上逼他吃地下的马粪，常操起铁铲一阵痛打，三个日本男孩全趴在地上不动了。日本人知道后出动军警抓打人凶手。常隆基明知惹了大祸，表叔家也不敢去了。夜间又偷偷爬上一辆去四平的运煤火车，跑到四平他一个远房姑姑家。

常隆基20岁那年，他父亲终于噙着两眼热泪，憋了一肚子苦水离开了人世。

不能去“堵枪眼”

伪满康德4年（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梦想吞掉全中国，为“以华治华”把满洲做为它第二“本土”与“生命线”。首先是改变过去的募兵制为征兵制。不少青年在“国势调查”时都少报年龄，常隆基的年龄也是在外婆的授意下，一次就少报了5岁。当时人们有一种幻想，五年后小日本子也就完蛋了。可到1941年已经25岁的常隆基，户口上正好是当国兵入伍的规定年龄——20岁，为了不给日本人当“炮灰”、“堵枪眼”，常隆基在征兵前二个月就跑了。

征兵开始，日本人按各区、村、户口向伪村长要壮丁。伪村长找不到常隆基，问他的弟弟也说不知道。西丰县公署动员股长（伪满征兵工作由动员股主管）不答应，限村长七天内把人送回县里，不然便以“反抗国兵法”、“反对大东亚共荣圈”之罪论处。伪村长四处派人打听常隆基的下落，最后终于被他们打听到了。伪村长亲自带人到四平市郊，摸到了常隆基姑姑家的住址。天刚亮，常还没有起床便被村长、警察堵在屋里。他们把常隆基直接送到西丰县公署。怕当“炮灰”少报五岁年龄

的常隆基，终于没逃脱这场“国兵之灾”。

没“活路”了

常隆基押送到西丰县，正巧他的好友黄凤祥也来了。第二天，经日本军医官“检查”向征兵官（四十来岁一位满军中校）说了一句“姚——细！”征兵官说了一声“你合格”。紧接着中校征兵官在合格国兵花名册最后一页的常隆基、黄凤祥二人名下写了几个字“靖安军步兵”。

新兵入伍要经过六个月的训练。常隆基从小在家种地，又多年给地主扛大活，学了2年文化也忘光了。各种训练全用日语口令。他“左转右转”分不清，“立定、稍息”记不住，为此没少挨、受骂、受罚，经常全连训练结束，罚他一个人做“单兵训练”。

同村好友黄凤祥也是同常隆基同时入伍的，恰巧又都在靖安军步兵一团，而又同在第七连，为此黄凤祥没少劝常隆基，也没少帮助常隆基。可黄凤祥也是农村孩子，比常隆基训练成绩好不了多少。好在连长邹士朋也是辽阳人（家住辽阳、李大人屯），是位老东北军出身，年纪四十左右，长一脸大麻子，外号叫“邹大麻子”。看面貌挺凶，可心地却很善良。有时见常挨罚，也个别教教基本动作与要领。可常隆基一见日本教官头就“嗡”的一下，教官没喊口令，他就吓得懵头转向。

每次训练不是队前挨骂，就是解散后罚跑步了。因此遭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毒打。打完“拿古鲁”（双拳紧握、左右开弓往脸上打），便是日本“武士道”，连打带摔直到把人打个半死，或者日本教官打累了，方算罢休。这样的“武士道”加“拿古鲁”，对常隆基来讲已是常事。由于他多次不合格，气得教官哇哇怪叫。大家为常隆基曾罚过二次班、排打“协和嘴

巴”。每次“协和嘴巴”打完，人人都鼻青脸肿，个个忍痛叹气。尤其是常隆基为自己不争气，“拐带”全排、班人受此污辱、毒打，更感到对不住大家，恨不得早点死去，免得大家跟着受累。大多数新兵虽为常受罚、挨打但还是劝常别上火，用心学习，甚至牺牲假日休息时间为常“单兵训练”。可常隆基这个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庄稼兵，又加上年纪大（25岁）、没文化。怎么学也是不及格。有一次实弹射击，每人30发子弹（空炮），科目是以排为单位，五百公尺散兵追击。教官一声令下，只见六路纵队冲向前，枪声似爆豆般响在野外训练的上空。常隆基由于过分紧张，“追击”中把枪跑丢了。当他转回身找枪时，早被高岗上戴高倍望远镜的日本团长和教官看见了……

回营地后，常隆基刚刚把枪擦好，日本教官满面杀气地向他走来。常隆基早就做好了接受日本教官的一切惩罚准备。没等教官开口他主动地规规矩矩地站到教官面前，日本教官像发疯的野兽扑向常隆基。当同班的几名战友把被打得半死的常隆基抬回寝室后，他才慢慢地睁开流着鲜血的双眼。好心的战友给他擦去满脸的血迹，扶他躺下。开饭的号声响了，常隆基被打得不能下床，他的朋友黄凤祥从食堂给他偷回点饭菜，又倔又强的常隆基没掉半滴眼泪，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看着“偷”回来那半碗饭菜出神。任旁人怎么劝，他始终一言不发。熄灯号响了，值星军官要查铺的。他倒在床上一夜没有入睡，心里只想一件事：逃跑，跑出去个人遭罪；可全排、全班少受连累。好友黄凤祥悄悄地劝他，他只是一言不发……

后来“逃跑”的念头打消了。那时候国兵开小差被抓回来，不枪毙也得蹲军法处，并拿家里人、亲属问罪。他怕可怜的小弟弟和七十多岁的外祖母为此遭来杀身之祸。逃跑不成只有一条路了——早点死去。

有一次轮到常隆基“不寝番”（值夜班站岗），到下半夜正好天气又黑又起风了。上岗不久，另一名“不寝番”进卫兵室吸烟去了。进卫兵室那位哨兵回来时，哪也找不到常隆基，他轻轻地喊了几声，空旷的大营没回声。他马上意识到“出事了”！急忙向卫兵室的值星军官报告说：“常隆基携枪开小差了。”那位教官令他不要声张，又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在营房内四处寻找。当发现有人吊在树上时，把人吓得四散跑开，这位军官（少尉）马上抽刀割断了绑腿，原地没动进行人工呼吸。十几分后，常隆基终于又活过来了。那位好心肠的少尉军官，命令大家对此事保密，千万不能叫日本人知道。有苍蝇就免不了下蛆。常隆基上吊自杀一事，终于被日本教官知道了，常隆基被罚20天禁闭。

豆腐兵——勤务兵

1941年初冬，6个月新兵训练总算是熬出头来了。常隆基一到连队就较引人注意。一是这批新兵里属长的老；二是他又倔又强，从不言语。为此黄凤祥没少劝他，身在异地，要多交朋友，多个朋友就多条路……当时步兵团有个老排长（年近40岁），是一位老东北军，是靖安军的号兵“状元”。不让他退役就是叫他为各团训练新兵。此人见多识广，虽嗜酒如命，为人却心地善良。尤其二杯黄汤下肚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呀，什么到时候苏军要兜他（指日本）的后路，关里这个（手势指八路军）早晚有一天也得打到这边来呀，等等。有时吓的人们走开不敢听，有人劝他喝酒可别说了。小心叫“亲日派”人听见，常隆基不言不语，有时偷偷地把自己少得可怜的津贴费给这位老排长买了两瓶“二锅头”。久而久之，这位老排长对这个扛大活出身的庄稼兵也有了好感，有时喝酒也叫

常喝两口，常隆基不会喝，每次都呛得掉眼泪。有一回是星期天，常又给老排长买了一瓶酒，半斤猪头肉。这位老排长见没外人，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边喝边讲。从老排长讲的话里常隆基才知道：富锦县当时归三江省管辖。军事上归第七军管区，司令官是赫慕侠中将。富锦离苏联近，划为国境第一线。日本在富锦派重兵把守，日、伪军人数在万人以上。伪军中属于靖安军的是四个团：有骑兵团，步兵一团，步兵二团，炮兵团；伪军的江上军，原关东军系统的有“七七五”、“六一三”部队，日本守备队，日本宪兵队，伪满宪兵团。每到节假日，富锦大街穿黄军装的“满街筒子推”。老百姓怕事，尽量少上街。另外特务、暗探、警察多如牛毛，昼夜检查，一旦发现可疑者或没“证明书”的十有八、九有去路，没回路。

为此常隆基从不上街。由于常与老排长常接触，被“有心人”向连长打了“小报告”。邹与老排长都是老东北军出身，对全团最笨、挨打最多的常隆基更是了解、同情。故而对打“小报告”取宠的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伪满对军队的素质也极为重视。除“术科”照常进行外，团部对新兵的“学科”抓的紧、要求严。一次学科考试常口试、笔试全不合格。在教室内遭一顿凌辱、毒打。这回他没想死，听老排长讲：这离苏联挺近，过了江，再过一道江就是。他暗暗打算，跑！往苏联那边跑。一天夜里乘别人睡熟之际，他偷偷收拾东西，怀里揣几个早预备好的干巴饼子，不巧被值星教官发现了。他把常隆基叫到卫兵室，常隆基从来不会也不敢说谎，叫值星军官一吓唬全说了。但没说往苏联那跑，只说回家种地。第二天在全连队列前宣布了常的罪状，罚20天禁闭。

在禁闭室里，常隆基左想右想是没活路了。跑吧，跑不出去；死吧，又死不了。学科刚开始不久，当完三年兵，不打死

也得缺胳膊少腿地回家。这可怎么办呢？……他在禁闭室内没想到别的，只想二个字“跑”“死”，别无他路。一天夜里，常报告“入厕”，看守禁闭室的也是个新兵，便看押着常向厕所去，他端着枪在外边等候着，老长时间不见常出来，又等了一会，还是不见常出来，他预感到不妙，便进厕所一看，吓的妈呀一声，转身往回跑。“不好，常隆基又上吊了！”常二次寻死上吊均未如愿。在原罚禁闭20天的数上又增加20天，而且责成值星官严加看管。一个多月的禁闭没蹲完，常隆基已经病得不行了。还是那位老排长找到常的连长，说了几句好话，邹连长才命令将常放出来送医务所治病。这期间邹连长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代乳粉、点心给常隆基，在连长的关怀下，常的病渐渐地好了。由于连长常和他接触，常隆基也觉得连长这个人还挺好，无缘无故用自己钱给他买东西吃，这在伪满国兵中确实少见。常一次向连长试探着说：只要不出操、训练，给我个别的差事什么都行。邹连长见常隆基折磨成这样，也颇同情。第2天早操结束，排长找到了常隆基，传达连长命令：常隆基从即日起，到伙房当“豆腐兵”（做豆腐供连队用）。从此，常与黄两个人接触的时间更多了，常在炊事班做豆腐，这里也当然有那位好心的老排长一份力量。其实当豆腐兵是连长关照常隆基，做豆腐就可以吃豆腐充饥。伪军也是吃不饱的，骑兵饿的没办法可以偷马料（豆饼）吃，步兵连马料也没有。

为感谢连长救命之恩，为报答老排长的帮助，这位老实的庄稼汉也悄悄地给连长不时地送点小礼物（豆腐皮儿），也常给老排长买点酒喝。常到连长家，只要有什么零活，不用太太吩咐，他便主动地干起来。这位比连长小十几岁的年轻漂亮的太太渐渐地对这个豆腐兵也有了好印象，她说：这个人心眼实，手脚勤快，比现在这个勤务兵好，可靠。因为连长现在的勤务兵，

是个城市兵，油嘴滑舌，有时借机“外迫”（不回营住），尤其偷偷赚太太的零钱，太太很讨厌他，便向连长提出让常隆基当连长的勤务兵。开始连长不同意。因为常隆基是全团最笨的一个兵，学科、术科都是倒数第一名，又极不善辞令，长像又很一般，小眼睛、胖呼呼的。可毕竟是年轻、漂亮的太太说了算。当然，连长除同意太太的看法外，他也有自己的如意打算，那就是借给常隆基个胆子，他也不敢给连长卡上一顶“绿帽子”。就这样、常隆基在1942年秋天，从整天抱磨杆当驴的豆腐兵、一步登天，当上了连长邹士朋的勤务兵，黄风祥接替常隆基当上了豆腐兵。

只说一次谎

豆腐兵当上了勤务兵，一时成了骑兵团的议论中心。“邹连长怎么挑这么个人当勤务兵呢？”有人说常与邹是老乡亲（根本不是），也有说是年轻、漂亮的太太相中的……

常隆基除加倍的干好勤务兵的本职工作外，几乎连长家的杂役全包了，给太太送豆浆，取牛奶也是风雨无阻。太太对这个不言不语、勤奋老实的勤务兵当然十分满意。觉得这个又笨又倔的勤务兵一天比一天机灵、聪明了。她哪知道，常隆基背后有一名“高参”（那位号兵老排长）。

军马是长官的命。邹士朋连长的那头大白马是全团的最好军马。不仅个头高大、骨架端正，而全身无半点杂毛，真如雪花一般。跑起来四蹄生风、不颠不蹿。三年前在全军越障碍比赛中，这头大白马一路领先，帮邹连长得了冠军，把日本团长的“阿尔登”（马名）甩的没影。常隆基把连长的大白马当成他的第三个主人，精心喂养，接送连长上下班风雨无阻，从此连长更加信任他了。

1943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美藏司令部一连向所属各团下三道命令，要全团人马按规定着装，枪械武器要擦的见光发亮。带革鞍具全部打保革油擦净擦亮。马镫、嚼子……凡带铜器的全得见亮照人。军马除刷洗干净外，要全部洒消毒药水儿。鞍鞴不整洁，马粪兜破旧的一律新做……。一时间全团人马忙个冒烟起，尤其鞍工兵、缝工兵更是昼夜不消停地忙。至于为什么？一时间谁也猜不到。正职连以上日满军官，几次去“七七五”部队开会，忙了两天两夜。从团部传出消息说是为了迎接从新京（长春）来富锦视察的高级将领。高级是哪一级，视察什么，谁也不敢问，只好按司令部的命令，人马不着消停，一遍又一遍地擦洗。

4月27日晚，美藏少将命令：从步兵二团挑选10匹最佳军马，10名最好的带马兵，加紧训练，供某将领入山视察用。军令如山倒呀，当夜从全团中挑选出10匹一色白军马，而邹士朋的大白马名列前茅。

第2天一早，10匹军马，10名带马兵全部从各连抽出集中训练。训马官是位日本中尉教官。常隆基当选为带马兵，这主要是他老实、忠诚、不会出意外的。但常隆基原来学科、术科都不及格，加上几个月的豆腐兵，半年的勤务兵，把原来学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军事要领、动作，忘得几乎所剩无几。为此在训马中，又几次挨日本教官打。据1960年黄凤祥回忆讲：“出事”的头两天，常又被训马教官毒打一顿，打的嘴角流血，满头大包。黄劝他千万小心。常曾透露，“这回我非干掉他几个大官不可！”黄吓的忙把常嘴捂严……

5月1日晚间，连长邹士朋把常隆基叫到团部，又亲自嘱咐说：明天上午，新京（长春）来的日满高级将领要去五顶山视察，你可千万要小心谨慎，万一出点差错，你我的脑袋都保不

住……

常隆基默默地听着连长的嘱告，不时地摸摸昨天被打得满头大包，一言不发。他心事想着什么呢？一股无法遏止的复仇怒火，从这个老实、倔强的庄稼兵心里已经开始升起来了。

按常规，在这种“非常时刻”连长应住在连部，可这位邹连长照旧回家住的。第二天常隆基来的比较早，又把两匹大马刷洗一遍，提前去接连长。到连长家刚刚打过6点，连长太太还没起床。邹连长却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时间虽早些，但邹一夜不在连队，他也怕出点差错，便与常双双上马，慢步向兵团大营走去。

清晨，通往大营的街道上，格外寂静。两匹马并肩慢步而行。连长小声地说，今天骑我大白马的是这次视察团的最高日本军事顾问，楠本中将。常一听是日本中将，心里跳地挺厉害。当两匹马又走一段路时，常隆基突然滚鞍下马对连长说：你的“料寿”（功勋章）怎么忘戴了？连长一摸胸前，光光的、一枚没戴。常隆基要回去取，连长又怕误了时间，常着急说，今天我是带马兵，现在就把大白马交给我，十分钟准时取回“料寿”。两人换了马。常隆基上了大白马，两腿一挟向连长家飞去。

常隆基到连长家一推门，坏了，门闩上了。他急促地“咚！咚！咚！”敲门。太太问明敲门人后，穿着睡衣，懒洋洋不高兴地把门打开，极不耐烦地问：刚走又回来干什么？常急促地讲：为连长取“料寿”、短枪。太太回屋取了“料寿”，却没拿短枪。常向太太要枪，太太板起面孔讲：这枪连长再三关照，除他本人外，谁也不给！说罢转身就走，常隆基这时可真着急了。抢吧，怕坏了大事；空手回去吧，再没有雪恨之机了。这个老实庄稼兵，今天可发脾气了。他大声喊着说：原先军官不准带枪是美藏少将命令，今早邢大臣下令：为日本中将安全，连长以

上军官一律带短枪。太太没见过常隆基发过火，从来也没说过谎的人、今天怎么了？……这时常又硬梆梆地甩过一句话：太太，时间到了，我得马上回团去，你不给枪，日本中将出了事，让连长兜着。常隆基说完转身就要走。太太一看这老实人发火要走，忙说：别，别，我也没说准不给呀！说完忙回屋里取来了连长的手枪和全部子弹。她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千万交给连长本人呀。常接过枪翻身上马，直奔五顶山。

暹威五顶山

常隆基飞马跑出连长家那条胡同时，迎面走来一辆大车，驾辕的大青马看见这匹出众的大白马，咴儿、咴儿、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拉了一大堆马粪，大车过去后常隆基急忙跳下马背，用大白马高大身躯为掩护，将短枪、弹夹放在新做的那个马粪兜儿里，上面盖些马粪。

常隆基骑着全团的最好军马，大摇大摆地走进团部大门，亲手把“料寿”交给了连长。

这时进山部队已全部在院内集合好，司令部命令：士兵带枪不准有子弹，军官只许佩刀，不准带枪。接着日满军官逐人逐马的检查、搜身，九名带马兵齐刷刷地站在青一色的大白马左侧，常隆基赶紧进入带马兵行列，由两名日本军官把常隆基与大白马仔细搜查后，向“七七五”部队长（大佐）报告说：“异状那依”（没发现什么）。

几分钟后，几辆日本关东军的小汽车开进院内，从小车上下来十几名日伪军高级将领。在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前面走的是五十岁开外的一个配带中将肩章的日军小老头，他就是最高军事顾问楠本笹隆中将。第七军管区司令官赫慕侠紧跟在美藏少将与邢士廉后边，其余日满军政要员们簇拥这位最高顾问

楠本中将走进了团部。几分钟后，“七七五”部队长跑步到营门前命令：骑兵团为先导仪仗队，“七七五”、“六一三”部队紧随视察团，最后是步兵团。一声令下，这支日伪掺杂，人马混编的大杂烩队伍浩浩荡荡向五顶山阵地出发了。10名带马兵徒步紧跟他们分管的马匹左侧，邹连长骑着常隆基那匹马走在第7连的前头。他不时地回过头来，似乎有些担心地看看那匹大白马，又看看和大白马寸步不离的常隆基。

这支“混杂军”的行军速度很慢，守在大白马左前方的常隆基，用两眼的余光时而偷偷地看看端坐在大白马上的楠本中将，一会儿又向那个“马粪袋”瞄几眼。10时40分左右，这支“混杂军队”来到了五顶山西的小河子处，七七五部队长下令：全体下马，徒步陪视察团入山。首先是仪仗前导队“唰”的一声，跳下马背，笔直地站在盘山路的两侧。10名带马兵规规矩矩地双手把马背上的日伪将领们，小心地扶下马来。常隆基扶下楠本同时，左手一抖马缰，右手直插那个马粪袋，大白马一个左半转身，那位最高军事顾问还没分清东南西北时，常隆基的枪口对准他的左胸膛，乒乓两枪，楠本的勋章、钢笔全打碎了。他连五顶山阵地一眼都没有看，就被这突发事件吓呆了。这突然两枪似晴天霹雳，把在场的日伪高级将军武士们全都吓丢了魂。当他们看到楠本倒在地上时，才如梦方醒，大叫大喊“抓刺客！”“抓间谍！”命令士兵开枪，可士兵又无子弹（前两天便都集中到团部的弹药库）了。几名日军军官忘了抽战刀、举刀鞘向常隆基砍去。邢士廉唯恐回京无法交待，也举刀向常隆基扑来，常一甩手就是二发子弹，老滑头邢士廉一个就地十八滚，钻在马肚子底下。常认为雪根的目的已达到，便飞身上了大白马向山下跑去。大白马似乎懂得朝夕与它相处的这个庄稼兵的心情，放开四蹄在挤满日伪军的山路中间狂奔横冲，如入

无人之地。

几名日军军官以及在场的邢士廉、美藏少将和“七七五”部队长乱作一团，向伪军下命令：驻富（锦）绥（滨）同（江）三县的日伪军，全部江上军船只，日本关东军全部守备队，所有特务、警察……，全部出动。西从新城镇，东到勤得利，严密封锁江面，不准一人一马渡江。陆地上，把通往宝清、集贤、同江、饶河的旱路全部卡死。要十步一人，五步一岗，拉成“人网”，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刺客、“大间谍”。又追加一句：抓不住这个大刺客，饿死渴死也不准撤退！

可惜现场无电话，当这道道特别紧急命令逐级传达到受命各部队时，骑在大白马上的常隆基已跑得无影无踪了。黄凤祥讲，他们的团长松奇骑马跑回团部时，只剩下一只马靴，帽子也跑丢了。

滚滚松江水

先说几句后话。

常隆基在五顶山枪击楠本笹隆中将一事，当时在中外都有很大震动。这一枪，它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梦想把满洲做为他生命线而制定的“以满治满”计划的彻底破产；这一枪，也充分地说明：尽管山河失色，城市摧毁，但人心是不可征服的。

五顶山事件后，日本关东军最高统帅部立刻下达一项紧急命令：(1) 凡满军（所有兵种）连级以下军官之武器、枪支、弹药一律上缴团部，由兵器班统一保管。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准携带武器枪支上街、开会和回家。(2) 从命令下达起，凡满军步骑、炮兵中的全部弹药，一律清查、上缴兵器库，由加强连日夜看守。即使实弹射击的军事演习，也得按规定由两名（日满各一人）指挥官签名盖章，否则一粒子弹也领不出来。

更叫日本法西斯大伤脑筋的是，在满军中和在所有伪政权中任职的日系文武官员，日夜提心吊胆，外出时大部结伴而行，似乎随时都有“黑枪”在瞄着他们。一时间他们的“思想异常混乱”。有“关系”、“门子”的日本人，编造各种理由要求退役返籍。最多的便是以“病”为由，逐级申请要求回“本土”医病。为防“出事”凡有满军团以上部队驻防地，均相应地配备一定数量的日本关东军。

俗话说：“人各有其志”，而步兵一团挨打最多，全团最笨，术科、学科都不及格的常隆基，在五顶山上却表现出他非凡的大智大勇。如果按照热爱中华、有高度民族气节的炎黄子孙的高度来看，常隆基的学科、术科都是合格的，而且成绩优异。当然常隆基怀有内疚之痛，此事牵连了邹连长，他当场被抓获了。这位邹连长回家和年轻太太见一面的机会都没给，直接押送到富锦宪兵队。

跃马飞奔的常隆基，凭借当时入山部队、军官都不准带枪，只许佩刀。而所有士兵虽荷枪在身，可惜全是空枪，无一粒子弹。所以常隆基单人匹马冲下来如入无人之地（山下根本不知山上发生什么事情），见常单身匹马飞下山，纷纷给他让路，所以他眨眼之间跑到了太平川。他不敢进村，一抖马缰，从太平川东北一块麦地横 插过去，穿沟越涧，马不停蹄地向东北方向疾跑，转眼之间到了大榆树。当他一口气跑到邵店村那片树林边时，大白马一头扎进泥坑里，先挣扎了几下，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这匹全团最好的军马，滚得满身污泥，睁着一双红肿的大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继之一口一口的鲜血流进了混浊的泥水中。任常隆基怎样喊叫，怎样卧倒爬起地扛、抬都无济于事，大白马终于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大白马之死，无异给常隆基逃脱狼群虎口造成了极大的困

难。他看着死在泥水中的大白马，再看自己满身泥巴和被挂得零碎绸子一样的破军服，真恨不得和大白马一块死去。一阵风吹来，他似乎清醒了。狠狠心便向东北方跑去，刚跑出十几步，他又慢慢地回来了。他采集些荒蒿、野草和刚刚发芽抽叶的树枝儿，在这个大泥坑里掩埋、安葬了帮他杀敌有功的"战友"。最后，向长眠此地的大白马深深地三鞠躬，然后，擦干脸上的泪水，向正东的一个村子跑去。他跑了10里多路，又渴又饿又累，两条腿再也抬不动了。

理智提醒他，此时不能进村。在前边岗坡下有个小窝铺（大兴屯刘家的小窝铺），他看四处无人，便疾步向小窝铺跑去。小窝铺里有3个人。一个中年妇女，两个老头，都在五十开外。常隆基向两位老人说：我贪事了，打死了日本大官，正抓我呢，求 给换衣服。地窝铺没有破旧衣服呀，最后只给他换了上衣。常打听过江的路，老头说，从胡别达拉过江，奔江北大桦树。常喝足水，拜谢过换衣指路恩人，便又一头向东北扎去。

后来才知道，在大兴屯北窝铺给常隆基换衣服的人姓刘，外号刘大眼珠子，为此事也蹲过日本宪兵队。

常隆基向东北又跑了10里多路，累的再也走不动了。在一块洼地头上，躺在玉米楷子堆中休息了半个多小时。玉米地头北边，便是一个村子（现在的富士屯）。站起身来想进村找点吃的，再把裤子、鞋全换了，过江逃走。可他马上意识到，现在进村等于自投罗网，一定得等到天黑后。这样，常隆基又蹿到一片小树林中，捡一块干地方躺下休息。

突然，村里传出了一阵犬吠声。他霍地站起身隐到树后，抽出手枪，呀！只剩三颗子弹了。又熬过一段时间，村子里半点动静都没有了，他悄悄走出林子，只见靠村西头一家，尚有微弱的炊烟徐徐上升。他整理一下衣服，带好手枪，悄悄地向那

家摸去。

这是紧靠村西头的两间小破草房，院子里零零乱乱地晒着几片渔网。常隆基警惕地四外看看后，轻轻地敲了几下破板门，门吱呀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一位50左右岁的老头，他就是富士屯的高希浦。老高头一见门外人这身打扮，心里一愣。他上身着便服，下身是军裤，脚上穿一双军用胶皮水袜子。老高头想，这不是特务吗？……

常隆基紧紧抓住老人双手说：老人家，我贪事了，我在五顶山打死三个大官，二个日本人，一个满洲中将（他当时不知打死几人），救救我吧……刚才村子里狗咬，是伪警长挨家挨户传达皇军命令：发现小股国兵，尤其独自一人时要立即报告，窝藏不举，全家杀头。老高头看看跪在他面前这个青年人，二话没说把常隆基拉进屋里，他回身关上门，忙叫老伴找几件破旧衣服，老高头亲自把刚端出的剩饭、菜又给常拿到面前。常喝了一瓢凉水，边吃饭，边把五顶山的经过简要地向老人说了一遍。最后说出自己打算过江，投奔苏联。常隆基换上便服、便鞋，按老人的嘱咐，连夜过江。

村外西北岗下边，便是个鱼亮子。这个鱼亮子是大特务陈丰年开的。名为捕鱼，实际是监视来往过江行人，尤其严防苏联谍报人员。

陈丰年外号陈二爷，是同江县特务股长小村手下一名大特务（当时富民乡归同江县）。陈的鱼亮子共有四名特务，除陈外有江海峰、林茂、程英。据1952年公审陈丰年时，陈自述：那天（五顶山事件那天）太阳下山大后了，慌慌张张跑到鱼亮一个身着便服（极不合体）的青年人，说有急事要求用小船送他过江。天这么黑了，又起风了不能走船，他说事急，一再恳求送他过江，问他是什么急事，他支支吾吾讲过江找一个姓王的

打鱼的老头。

陈丰年是个老奸巨滑的老特务，人情通、地理熟，知道江北根本没有这个人，便叫江海峰稳住常，慢慢盘问，江越问常越慌，陈一使眼色便再不问了，并答应常第二天天亮刹刹风就送他过江。常无法只得答应下来，住在鱼亮子。可常一宿没合眼，几个特务也没敢动手。第二天天一亮叫常上船，乘常下炕无防备之机，几个特务一齐动手抓住常。陈丰年说：他（常）左手去掏枪（右手被抓住），因左手不好使，枪没打响就叫我们把枪给下了。

下枪后把常绑在晾网的网桩子上，派两个人到屯里去找车，这时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不一会儿从村里赶来一辆牛车，把常绑在牛车上往二龙山送（当时同江县署设二龙山）。由两个特务赶车，大特务陈丰年拿着常隆基那只手枪抄近路走（毛道），没走多远便从大道前方传出枪声，原来是车上绑的常隆基跑了。陈便命令特务开枪，追！

常越过一段空地，一头钻入江通柳丛中。但这一阵枪响却引来了大批捉拿五顶山刺客的日伪官兵。当陈丰年说了情况后，一日本军官下令："搜通"封锁江面。这时大特务陈丰年才略知他抓到又逃跑的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常隆基在柳条通中沿江跑了2里多地，在一个江弯处碰上个钓鱼的老头（后知姓王），常问他哪水浅，在哪能趟过江。老头说，这大江深的很，哪也无法趟过去呀。常听后又跑了一段路，这时沿江人马越聚越多，常已被数不清的日伪军包围，又无法游过江去，便一头扎进滚滚的松花江。

伪满军队中地下组织“真勇社”组建经过以及活动情况

侯洛

我曾在辽宁省文史资料和营口文史资料中看见登载国民党暂编五八师师长王家善于1948年2月25日率部在辽宁省营口起义等文章中，提到在伪满时期王家善组建过“真勇社”的问题，参加过国民党暂编五八师起义的人，其中有的在上述文史资料上写文章时，也提到他自己参加过“真勇社”，但他们都对“真勇社”真实情况不了解。“真勇社”从1941年那次关键性会议以来到现在也有46年了，因此，应该把“真勇社”的一些关键情况澄清。这对于王家善本人和参加过“真勇社”的人们也是有好处的。尽管王家善及“真勇社”的其他社员有的已经逝世了，也有必要把当时推动王家善加强“真勇社”和我们打算运用“真勇社”这个组织和个别人，实事求是地介绍出来，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知道组建“真勇社”内情的同志张为先、丁宜、何正卓同志已逝世多年了，剩下的只有田琛、石迪和我，以及于清淮同志，现在把我们四个人的回忆概述如下：

一、“真勇社”组建经过简况

1. 为了把“真勇社”组建经过情况说清楚，首先要简要地介绍“真勇社”社长王家善其人。王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

北前，已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东北军队中任职。“九·一八”事变后，仍留在东北，任伪满中校。1935年被伪满选派赴日本陆军大学学习，这是日本陆军中的最高学府。整个伪满期间，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王于1938年春自日本陆大毕业后返回伪满，先后任上校、少将。由于王能掌握日本的军事理论和训练方式、方法，所以日本关东军对他器重，他对伪满下级军官不摆架子，相处也融洽，所以王在伪满青年军官中有一定声望。王家善虽然身为伪满军人中的上层人物，又受日本军事教育多年，但思想上是反满抗日的。

2. 我们党组织给予王家善的思想影响和对他的工作。1936年3月王家善在日本与正在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的张为先认识。张是1932年在英国留学时参加共产党，1934年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派回东北，因为没有接上党的关系，不得已1935年1月到了日本，在日本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1937年6月在北平与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之一南汉宸同志接上党的关系，接受地下工作任务，仍派回东北。我们对王家善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6年初到1939年春何正卓同志回东北。1936年5月由“东京反帝大同盟”成员刘椿龄（东京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以王家善为领导，其中有何正卓同志共五人参加，组建“协行社”，以抗日为中心任务，以读书会形式，每人分担研究题目，每周召开一次讨论会，暂不发展组织，主要是研究，讨论国际形势、抗日形势。这时，张为先同志经刘介绍与王家善相识，张以研究国际形势、交流认识的面目给与王家善以爱国反满抗日的政治思想影响。王家善正统观念很强，亲国民党思想亦深，但张为先同志仍和他保持同乡与朋友关系。据王家善与何正卓同志讲：他借1936年暑假之便，秘密赴南京，9月初返回东京，到南京后见到齐铁生（东北人，C.C.分子）、

国防部副部长熊斌，同时，也见到何应钦，取得他们谅解后，要王仍回东北以便将来呼应抗日。王自南京回日本后，发现刘椿龄参加“东京反帝大同盟”，对刘不满，便把“协行社”解散了，与张为先也不来往了。不久，王家善组建伪满在日本各军校学生参加的“陆海军人同学会”，此学会是半官方的，因为是在伪满大使馆武官处领导下组织的。这个“陆海军人同学会”是以王家善为核心，要何正卓参加并做他的幕后工作，武官处对同学会什么想法和意见以及同学会对外行文，王带回后都与何共同研究方答复。

何正卓同志1936年参加“东京反帝大同盟”，因为他与王家善关系非常密切，遂受组织之命，仍与王加强联系，增进友情，保持密切关系，相机进行政治思想影响。王家善于1938年春毕业回东北前，告诉何正卓同志：他有个“真勇社”组织，并介绍马德泽、邵炳麟二人与何共同研究推动“真勇社”的发展。他告诉何“真勇社”也是以抗日为中心任务，是一个秘密组织。何当时也不便问“真勇社”组建原因，王又说是他去南京时，何应钦给起的名。王家善离开东京后，“真勇社”在日本基本上活动不多，互相来往也少。

第二阶段，从1939年春何正卓同志回东北后到1942年春何被捕。

何正卓同志1939年春毕业后回东北，开始被分配到哈尔滨江上军（即海军）司令部。约1941年初又调到伪满治安部（即军事部），王家善不久从奉天陆军训练学校调长春，先任伪治安部上校军事课长，后任参谋司长。这样何与王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何正卓到长春后和王家善都住在长春市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两人住 的较近，何住在王的斜对过。晚间工作之余，他们经常来往，无所不谈，有时就谈到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

的问题。这期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欧洲打起来，1940年6月苏德战争又打起来；同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这在伪满有识之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摆脱了孤立，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行列，抗日战争胜利是大有希望的，而且为期亦不远了。因此，在伪满军人中的一些中、下层军官的思想和伪满各种军校的学生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意识更加增强了。大约1939年末，何正卓同志向我们组织反应"真勇社"的问题，王家善自日本回东北后，"真勇社"成员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在齐齐哈尔就发展了二三十名，军人中有林家岳、于文泽、郝景祥等人，非军人中还有十名女的。何曾受王家善之托，去齐齐哈尔参加一次他们的会议，是在于文泽家召开的，于的爱人在外边放哨。会上林家岳说：1939年8、9月间，苏、日诺门罕战争期间，伪满陆军被迫参加战争，其中一个连的一部分官兵，在战争前线起义进入苏联，这就是于文泽领导的"真勇社"成员从中进行爱国抗日思想影响所致。这是何后来和我见面时讲的，何在1953年5月自传中，也叙述了这一段。我认为这是"真勇社"爱国抗日的实际行动的具体表现，应当指出这种表现是功不能没的。于文泽1946年"四·一四"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不久又撤退后，他仍留在长春，不知此人是否仍健在？健在时，可以对此问题说得更清楚些。由于以上这些情况，经组织研究：要求何正卓同志推动王家善搞一个类似统一战线和更加灰色的纯伪满军官组织。因此，要何试探王是否可以搞一个清一色的伪满留日军官同学会的组织（目的是不要女的参加了）。然后逐渐扩大把伪满各种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在校学员有选择地吸收进来。这对伪满说来，组织一个同乡会和同学会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并不特殊，伪满日本人中就有

这种同乡会、那种同学会。我们当时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在伪满军队中的中坚分子，有许多是日本的陆、海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在这些人中有不少有爱国抗日思想，同时这些人大都和王家善都熟悉，年岁较轻的有不少还是王在伪满军事训练学校所教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又送到日本军事学校深造，把这些人组织起来，首先通过他们为我们收集情报，同时，在抗日战争关键时刻，即我解放军打到关外时，可以起里应外合作用。搞个伪满留日军官同学会组织，王家善开始表示同意，经过一个时期后，王向何正卓同志说：是否把过去的“真勇社”这个组织加强起来，搞一个正式纲领，组织机构，纪律原则，正规化一些。“真勇社”的成员，不但要吸收留学日本陆海士官学校的伪满军人，同时也要吸收伪满各军事学校毕业的伪满军人，但条件必须是政治上可靠、有觉悟的爱国抗日的人。这样，便按照王家善的意见办了。

3. “真勇社”组建的情况。我过去写的有关“真勇社”的建设是从1941年5月算起，根据有些“真勇社”成员，如刘启民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来信说：应从1936年算起；又根据何正卓同志1953年8月的自传中说：王家善在1938年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东北前告诉何，他有个“真勇社”组织，而且1939年在齐齐哈尔曾发展了一些成员。因此，“真勇社”建组，从1936年算起是对的。当时我说的从1941年5月算起，是根据1941年那次会议有了正式行动纲领，建立了组织机构，确定了组织纪律。同时还明确领导核心人员的分工，以及王家善的政治报告（当时称之谓国际形势报告），确定了总社设在长春市，其他地区为分会，如齐齐哈尔等。总负责为王家善，开会时进行了正式仪式，即全体与会人员向重庆方面郑重三鞠躬。关于1941年那次关键性会议时间问题，现在根据何正卓同志上述自传所叙

是在1941年12月15日晚7时至次日晨3时，于长春市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何正卓同志家召开的。我现在回忆，何正卓同志说的是正确的。而5月是根据于清淮同志回忆的。有了何正卓同志的自传根据后，我又和于清淮同志再一次一起回忆，他也同意何正卓同志自传中所叙的日期。因此，"真勇社"1941年那次关键会议，应该是1941年12月15日。1941年12月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为王家善，参加成员有：

何正卓，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毕业，伪治安部江上军（即海军）军官。

于清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教官。

关操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刘启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牛匡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伪满军官学校区队长。

褚遇春，伪满军教导队毕业，伪满治安部上尉课员，后任禁卫军少校。

但据何正卓同志上述自传中还有马德泽（在关东军报导部临时服务）、孙镜洁等人。王在这次会上主要讲：一是东北已沦陷多年，日寇又侵占我大片领土，我们不能甘当亡国奴；二是在伪军中成立一个反满抗日组织，名叫"真勇社"逐步取得武器和兵权；三是发展对象为伪满军中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军官；四是注意从各军管区中发展，同时要做好伪满军中、上层工作，以备将来策反；五是当前任务放在发展社员。并宣读行动纲领，主要是：团结爱国青年军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相机反正策应反攻，收复失地，复兴中国。口号是：多读书，善处人。总社设在长春，分社有吉林、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承德、通化、佳木斯、牡丹江、锦州、大连军官学校、训练学校、江上军、宪兵总团、军需学校、军医学校等。

"真勇社"的分工是：社长王家善，政治何正卓，作战关操作，教育于清淮，情报刘启民，组织牛匡时，后勤褚遇春，以上这些人除褚遇春外，都是由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平均年龄仅30岁。这六个人都是王家善亲自选定的，同时，也是"真勇社"的骨干，其中何正卓和于清淮是王最器重和信任的。有的参加"真勇社"的人把这次会当成正式会。因为这次会前，何与王家善研究了"真勇社"的行动纲领问题，王便委托何起草，同时，何提出要搞一个政治报告，王也委托何起草。

我是1938年秋经组织介绍在日本与何正卓同志联系的，何与我是同乡，我们两家相距有20华里，彼此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有些一般情况都互相听说过，所以联系时比较自然。何1939年回东北后，仍和我有联系。我是1940年春回东北的，同年秋，我到了长春，因此，与何的联系比较正常。此期间，何与王的关系和1941年召开"真勇社"会议的问题，都是组织经过我，然后由我部署何去办的。因此，"真勇社"的行动纲领和王家善的政治报告，都是何与我共同研究起草的，纲领基本思想和政治报告基调主要是不分宗教、信仰、党派、阶级，团结伪满军队中真正爱国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抗日，收复失地，复兴中华。当前任务是积极发展社员了解伪满各阶层军人动向，了解日、伪军队动向。行动则俟抗日大军到来，里应外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真勇社"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我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精神，但它不暴露十大纲领内容。政治报告是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国内外形势发展内容，并能为王家善所接受而写成的报告提纲。当时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日本也正在酝酿是北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进攻美国。所以王急于想再召集一次会议，但因于清淮同志又去了日本学习，何正卓同志即将调回哈尔滨江上军司令部，这次会议没有召开。但在何去哈前夕，专门与王

谈了在这样好形势下，可以加强发展“真勇社”成员。可是1942年1月末，何因国民党牵连，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拟定搜捕他，何事先发觉逃跑至大连躲藏，1941年3月何被捕。从此，王家善本人也开始注意敌人对他注意了，而暂时不活动了。

4.“真勇社”是一个松散组织，虽然纲领规定有会议制度，但实际上，王家善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以王家善本人为主，有时在正卓同志参加下，以碰头方式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真勇社”的成员以刘启民、褚遇春、关操祚最积极。到了1943年共发展有70余人社员。

石迪同志1941年春从日本回东北后，也到了伪满军事部（即治安部）工作，他也住在洪熙街伪满军官宿舍，他是与何正卓同志同住在一座房子里（是平房式）。石过去也认识王家善，由于和王住的相近，所以也时有接触。刘启民、褚遇春与石迪关系不错。他们也时有接触。刘、褚便把石当做发展“真勇社”成员的对象，有时谈“真勇社”一些内部活动情况，他们并不回避石。石采取的态度是不即不离，这是组织上要石这样做的。我是石迪同志从日本回长春后，就和石取得联系的。根据组织指示：要石在不参加“真勇社”的前提下，与刘、褚维持朋友关系和他们接近，以便了解“真勇社”内部情况，一方面从他们那里套取情报，一方面从“真勇社”社员中物色对我们有用的人，以便将来能为我们所用，我们在“真勇社”内部有何正卓与于清淮两同志，在外部有石迪与关克两同志（关克当时是在伪治安部次长秘书官室作文官秘书），有时也和刘启民、褚遇春接触，他们两人，有时也向关透露过“真勇社”一些情况，所以，这时期“真勇社”的一切活动情况，我们是很清楚的。

1941年末，何正卓同志调回哈尔滨伪江上军司令部，1942

年3月因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受牵连被捕入狱。王家善不久也离开长春去佳木斯任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于清淮同志不久离开伪满被我们派到冀东。王家善本人已发觉日本特务方面注意他，所以从此以后“真勇社”总社便没有什么组织活动，但“真勇社”的社员与社员间个人与相互往来的活动仍在进行，不过比过去谨慎多了，秘密多了。同时，经过严格考察仍个别地发展社员。关于“真勇社”的问题，1987年我们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地区情报工作情况”专门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的。

二、我们如何运用“真勇社”

1. 我们的地下组织，当时虽已在伪满军事机构中建立了一批情报队伍，而且分布在陆、海、空军各部门，这是有一定数量和素质很好的情报队伍，共产党员在日本投降前占50%，他们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或其他日本大学毕业的，军衔均是尉级和校级，因此，在搜集伪满、日军事情报上是有成绩的。由于形势发展需要，最好能影响或团结一部分军事力量，平时从他们那里套取情报，当我抗日大军打进来时，动员他们里应外合地抗击日军。所以我们从1935年在日本时，就对王家善进行反满抗日的政治影响，以致派何正卓同志一直加深与王家善的密友关系。这就是我们推动、促进王家善重新组建“真勇社”的想法。“真勇社”社员，民族意识较强，反满抗日思想较深。另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都懂日本军事知识，了解日本侵略情况；二是经伪满选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或选派去伪军事学校学习，可以获得信赖容易隐蔽；三是他们在伪满上层军官、大汉奸等人物中有的是亲属关系，有的是师生关系或其他关系，在关键时刻，可视机策反；还有王家善自日本回东北后，多年从

事军事教官，所以不少从伪满军事学校毕业的是他的学生，因此王在伪满军队中，尉级和校级军官中，不但有威信，还有号召力。而伪满军队中之实力者，正是中尉以上和中校级的少壮军人；所以团结王家善和"真勇社"这批骨干力量，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现实意义的。王家善虽然国民党正统思想很重，但对国民党特务则采取拒绝态度，我们知道大约1941年秋国民党华北军统特务派"真勇社"社员林家岳特别来东北拉拢王家善，当即遭王断然拒绝，并要其他"真勇社"社员对林的行动加以警惕（林家岳是去北平后与军统发生关系，此后，林又回过东北一次，据日本投降后了解：林在日本投降前并没有能发展"真勇社"的人参加军统）。因此，我们认为王家善是一个正派军人，所以，才下力量做王家善及"真勇社"人员的工作。

2. 运用"真勇社"为我们搜集情报。尽管我们已在伪满各军事机构中，有一批情报队伍，但通过运用"真勇社"搜集来的情报可以充实我们的情报，同时也能印证我们的情报。因此，当时伪满陆、海、空军一切军事部署、战斗力、军事力量、装备武器、战略思想、军事设施、军工厂以及军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基本上都能掌握，所以，我们当时在获取日、伪满在东北的军事情报上是有一定力量的，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3. 日本投降后运用"真勇社"情况。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家善因是佳木斯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被苏军扣留，石迪同志奉组织之命，假借日本投降前已参加"真勇社"，在长春恢复"真勇社"组织，经推举为代理社长。同时又取得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会罗大愚的信任，参加了东北军事宣抚委员会。以后遂得打入军统特务组织"滨江组"。这是日本投降后，戴笠把他的亲信张勃生少将由重庆派来的。张携带电台、别动队长，在东北搜集情报及执行破坏暗杀计划。我们除派石迪

同志外还另外派伪满军人出身的两名同志打入该组内部。从而掌握"滨江组"全部密码，和阴谋破坏暗杀计划。1946年2月，当张勃胜将离哈经长春飞重庆报告时，在我公安部门配合下，通过苏军一举将张等三人逮捕，因系大案被苏军将张解往苏联。国民党经苏军同意派煤炭专家张辛夫博士来辽宁省抚顺市，兼任抚煤矿厂长，不久被暗杀。国民党遂大肆展开反苏反共活动，同时美国也制造舆论大肆宣传此事，一时使苏联陷于被动。后来，苏联将"滨江组"的电台、别动队和在东北搞破坏暗杀阴谋计划公布于世界，并且说这是"滨江组"搞的，为的是嫁祸于苏联，这时，苏联由被动变成主动，一场国际政治外交事件被压下去了。这是石迪同志的功劳。

王家善在营口率师起义前。当时辽南情报站副部长石迪于1946年秋开始，在58师内部即派进情报人员，后又建立情报五人小组，其中刘凤卓（团副）、赵百禄（连长）两人就是日本投降前参加"真勇社"的，这个情报小组在搜集58师的情报和王家善的思想变化以及促进与推动王家善起义，做了显著贡献。

4. 日本投降后，何正卓同志与王家善的关系。

王家善从佳木斯苏军拘留所逃回哈尔滨后，找到了何正卓同志，商研在东北组建一个师的兵力，由王任师长，何任参谋长。遂于1946年2月去北平，往见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如熊批准就能获得建军武器和军费，但王、何他们在北平虽前后两次见到熊，熊口头也表示同意，但并未给予委任状，同时，对王、何态度也不热诚，王甚感失望。此时，何正卓同志曾向王提出：应将王于"七・七"事变前去南京见到何应钦并由何应钦亲自指定组织"真勇社"一事，向熊说明；或者即应去南京见何应钦报告王在伪满工作情况等。王家善听后立即郑重表示：千万不要再提出此事，如被人传出可能会坏事的，我当时是为

了号召一批反满抗日的军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说我在日本时偷去了南京，谎说见到了何应钦，并由何应钦指定回东北组织“真勇社”，这是假的。这是1946年3月何正卓同志与王家善从北平回来路过沈阳时，亲自向我说的，这时王家善说的是何应钦指定他组建“真勇社”的事，才真相大白。但在东北其他许多参加过“真勇社”的人们，可能至今还不清楚这个问题

另外，何正卓同志还谈到：他和王家善在北平没事时，何在街上买了不少有关国民党的书籍和共产党的书籍。王看后对何说：“中国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是无疑的，但根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美军装备与支持，以及世界各国的支持，中央政府维持二十年、三十年的局面，也是无疑的。”这就是王家善对国、共两党当时的认识。王家善回沈阳后态度有些消极；何正卓同志便向王试探；国民党不要我们，如果共产党同意我们建一个师的兵力，我们投到共产党那边怎样？王立表同意，要何找路子。此事何向我说明后，我立即向正在沈阳领导我们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做了详细汇报。潘汉年同志指示：（1）王家善现在到我们这里，我们绝不会同意他单独建立一个师兵力的，同时根据王现在的思想状态到我们这里既不能满意，也不会长期留在我们这里的；（2）你告诉何正卓同志要他帮助王依靠国民党组建一个师，等到国民党军政大势已去，我军兵临城下时，做好王家善的工作，他到时能毅然率部起义，这样，王家善到我们这里，才能有所作为。虽然后来何正卓同志被国民党委任为辽宁葫芦岛海军学校校长离开了王家善，未和他一起建立一个师。但当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发表后，我当时很快地就回想起潘汉年同志的指示是多么高瞻远瞩，多么正确的指导啊！

5. 王家善在营口率部起义问题。（1）确如潘汉年同志所预

料那样，国民党军、政大势已去，我们兵临城下；（2）由于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3）石迪同志勤勤恳恳，遵照党的指导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但我还认为我们从1935年在日本就对王家善做工作，一直到日本投降前何正卓、石迪同志仍不断地向王本人及“真勇社”的社员们做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们还在继续做王家善的工作，因此，对王家善及在58师中“真勇社”的社员思想能了如指掌，所以石迪同志才能巧妙地运用有利时机，争取起义一举成功。因此，我们长期以来，就对王家善及其周围人们做统战工作，也是应该而且值得提一提的。

此材料田琛、石迪、于清淮三位同志已审阅过。

关于“一二·三〇事件”后的“真勇社”的活动
——对侯洛同志关于“真勇社”回忆文章的补充

刘凤卓

一、1941年末，何正卓同志调回哈尔滨伪江上军司令部，1942年3月因“一二·三〇事件”波及到国民党时受牵连被捕入狱。日本特务机关已发觉“真勇社”的活动，对王家善严加监视。王家善不久调离长春伪军校，先去热河任伪旅长、后又调到佳木斯任伪满军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于清淮同志不久离开伪满，被我们派到冀东。王家善离开长春时，将“真勇社”总社的工作交代给在伪军校中任连长和区队长的关操祚和

刘启民等，并嘱咐他们要在伪军校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坚持反满抗日的宗旨章程，但可不再使用“真勇社”的统一名称，可自行决定组织名称。如：东北抗日青年挺进团，抗日义勇军或其他抗日小组等，更灵活、更隐蔽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积蓄抗日力量，待机配合我大反攻。1941年震惊东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大搜捕、大镇压的“一二·三〇事件”，更加激发了东北爱国青年，前仆后继的反满抗日怒潮。压迫越凶，反抗愈烈。“真勇社”长春总社负责人刘启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1942年秋就恢复了“真勇社”的活动。在敌人刺刀下，更易于发现培养、了解考核发展对象。1942年冬起就先后多次发展社员。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前夕，在伪军校中就发展三百四十多名“真勇社”员，在全东北伪军中就有二百多名社员。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在苏联对日本宣战前夜，刘启民密传王家善指示：各地“真勇社”员要掌握武装力量，配合苏军作战。当1945年8月上旬苏军突破日伪防线，全面展开进攻作战时，各地伪满军中的“真勇社”员纷纷起来带头杀死日本军官，举行反正起义，配合了苏军作战，受到了前线苏军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长春伪军校同学砸开军械库夺取了武器弹药与日军对抗作战，杀死日本警官劫狱成功，营救出70多名在押途中的反满抗日爱国志士。在长春的“真勇社”负责人关操祚、刘启民等召开社员会议，布置防备日本关东军垂死挣扎，保护长春人民，迎接苏军配合苏军作战的计划，同长春人民一道极为热烈地庆祝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王家善、何正卓还未到长春时，刘启民、刘凤卓主持召开了有三百人参加的“真勇社”公开化大会。相继推举了石迪同志代理长春支社社长。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内战，拥护国共合作，实行和平建国

为“真勇社”的宗旨。当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注册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和反对，几经交涉，国民党还是不承认“真通社”的存在。王家善、何正卓到长春后，在讨论“真勇社”问题的总结发言时，何正卓同志指出：“我同意一些社员的分析和看法，看起来当局是怕东北人复活东北地方势力，再出来一个东北王；可能也怕咱“真勇社”靠不住“左”倾有关。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的‘真勇社’，抗战胜利了，也算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我们大家都应该来珍视这一光荣历史。现在呢，都应该来拥护，实践国共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协定，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离开这个宗旨，‘真勇社’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会毁掉她的历史光荣。我看还可以继续向当局申请呀！”这个发言为“真通社”的善始善终起到了正确的导向作用。从此，“真勇社”也就不宣而散了。“真通社”的一部分骨干，保留在国民党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后来改编为暂58师之中，成为1948年2月王家善师长率部营口起义胜利成功的积极因素。

三、1946年“四·一四”长春解放，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二和第四总队被歼。熊式辉才任命王家善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少将总队长，到沈阳以北地区，收容残兵。